

世界名人丛书

# 纳赛尔传

[英] 罗伯特·斯蒂文思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出版说明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是埃及革命的先驱、现代中东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领导埃及人民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他在埃及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一贯倡导阿拉伯团结，在国际事务中恪守不结盟原则，坚决反对大国势力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纳赛尔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阿拉伯事业和埃及革命。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中东地区和埃及的现代历史以及了解纳赛尔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我们特将此书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威、宋荣华（第1—6章）；龚乃绪（第7—10章）；何迪（第11—13章）；聂庆忠（第14—15章）；王为（第16—17章）和李平（第18—19章）。

# 目 录

第 一 章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1918—1936) .....	1
第 二 章	军队和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埃及(1936—1946) .....	16
第 三 章	幻想、失败和密谋(1946—1949) .....	38
第 四 章	通往革命之路(1949—1952) .....	57
第 五 章	夺取政权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2—1954) .....	80
第 六 章	阿拉伯国家、苏联和西方(1954—1956) .....	108
第 七 章	苏伊士运河与西奈半岛(1956.7—1957.5) .....	158
第 八 章	填补真空:与美国的斗争(1957—1958) .....	202
第 九 章	叙利亚的挑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1958) .....	225
第 十 章	“阳光灿烂的顶峰”:纳赛尔在世界舞台上 (1958—1961) .....	249
第十一章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兴衰(1958—1961) .....	266
第十二章	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国民宪章(1961—1962) .....	286
第十三章	发展埃及:五年计划与政治体制(1962—1967) .....	297
第十四章	也门战争:阿拉伯半岛与阿拉伯联合运动 (1962—1963) .....	315

<b>第十五章</b>	阿拉伯冲突与阿拉伯共存：也门、沙特阿拉伯、复兴党人与马格里布(1964—1969) .....	341
<b>第十六章</b>	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大国：和平的破裂(1957—1967) .....	360
<b>第十七章</b>	在战争边缘上：叙利亚、联合国紧急部队和亚喀巴湾(1967.5—1967.6) .....	389
<b>第十八章</b>	六日战争：挫折(1967.6.5—1967.6.11) .....	413
<b>第十九章</b>	后果：为复兴而斗争(1967—1970) .....	427



## 第一章

###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1918—1936)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18年1月15日出生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也是主要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亚历山大。他的父亲是邮局职员，先后两次结婚，共生了11个孩子(其中10个是儿子)，纳赛尔排行老大。

纳赛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亚历山大和开罗这两个大城市里生活并接受教育的，但同埃及许多城市家庭一样，他家也来自农村并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纳赛尔8岁之前一直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镇上，而且还到上埃及他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庄去度假。纳赛尔的父亲阿卜杜勒·纳赛尔·侯赛因30年前出生在尼罗河西岸离大城市阿西乌特大约3英里远的一个名叫班尼莫尔的村庄里，这个家庭很朴实，但按照埃及农村的标准衡量还算是相当富裕的。

从亚历山大沿尼罗河河谷向南到班尼莫尔大约有500英里，是一条狭长的绿带。它镶嵌在浩瀚无际、毫无遮蔽的褐色沙漠和岩石之中，是埃及壮丽宏伟的心脏地带。穿过尼罗河三角洲农业区和金字塔、威严的伊斯兰寺院塔尖以及工厂烟囱耸入云霄的开罗城，火车再在尼罗河和世界上最大的伊思梅尔帕夏运河之间的狭谷中缓慢地行驶250英里便来到阿西乌特。沿途景色变化甚微，但充满生机。就“人溶于自然”而言，世界任何地区都无法和埃及相比。平坦的河谷上布满了精心耕作的小块田园，专门供应市场的菜园里

点缀着无数棕榈树、密密麻麻的甘蔗或者是沙沙作响的玉米棒。盖着褐色泥土房的乡村像欧洲风景画上的某个农庄，密密地挤在一起。许多村庄的面积不如英国一个乡村大，却聚集着一个小型商业城镇的人口。褐色皮肤的农民穿着暗灰色和蓝色短上装或长袍，手握鹤嘴锄，在烈日中勤奋劳动，还有的蹲在树荫下乘凉休息。狭谷那边时而矗立着一堵花岗岩峭壁，时而出现一排低矮的碎石沙丘。在另一边绿洲的尽头是整齐的荒漠边缘。

如果继续南行，风景开始有所变化。大片茂盛的果园和橘园开始出现。沿着加高的运河河堤呈现出一派埃及古典的田园风光。扎着穆斯林头巾的男人和身穿长裙的妇女骑着毛驴欢快地走过。成群的骆驼背着大堆干枯的甘蔗杆，唯有骆颈时隐时现，宛如茅草覆盖的乌龟在蹒跚而行。牧童吹着哨子，赶着成群的山羊和绵羊，沿着运河堤岸成一路纵队轻快行走。奇妙而珍贵的水牛，全身光溜溜的，活像一只倔强地抬着头的地鳖。夜晚奇妙得简直不可思议：静静的运河泛着银光，树影和人形在夜色中参差交映，远方的地平线红白相间，烟雾朦胧。

除了淡水、架电线的铁塔、电话以及为附近整个地区服务的小学和社会福利中心之外，今天的班尼莫尔看上去与纳赛尔孩提时代度假时几乎没什么区别。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沿着一条小渠穿过棕榈园，越过于干枯成褐色的玉米篱笆延伸到班尼莫尔。街道上没有铺设石子路面，尘土飞扬，到处都有大群的孩子在玩耍。街道蜿蜒前伸，两旁矗立着红砖砌成的高大双层建筑，木制大门上雕刻着各种图案。在本世纪初，这里大约有 2000 人，而今天，人口已增加到 6000 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但也有一些科普特基督教徒。他们不得不靠着不到 2000 英亩的土地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按照当地传统，这个村庄的名字取自班尼莫尔部落。大约在公元 7 世纪阿拉伯征服埃及之时，这个部落就从阿拉伯半岛的赫贾兹（南也门）迁徙并定居在这里。部落中流传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古老格言。纳赛尔家族约于 200 年前来到班尼莫尔，是传统



上统治埃及农村的大家族之一。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分支都在各自的地盘上确立了威望。纳赛尔的祖父侯赛因·哈利勒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农民，活了107岁。在65岁那年，他娶了第3个妻子；他90岁时这个妻子又为他生了第3个孩子。纳赛尔有一个叔叔叫塔哈·侯赛因，是一位热心而又英俊的男人，年龄可能比纳赛尔还小。他像纳赛尔的另一位叔叔阿蒂亚一样，至今还在班尼莫尔当农民。他们各自拥有大约7英亩耕地。纳赛尔的父亲（死于1968年）是7个孩子中的1个（6个儿子，1个女儿），生于1888年。他在一所根据村民提议建在隔壁清真寺的一间房子中的《可兰经》学校里上了一年读写课后，于13岁那年被送到附近的阿西乌特，在一所科普特人办的学校里学习。尽管纳赛尔家的财产超过一般人家，但由于土地日趋减少，所以不得不到外地为几个儿子谋职。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僧侣政治的社会中，当一名政府官员或宗教布道者是谋取经济保障和较高地位的最令人羡慕的途径。凭着一张“毕业文凭”——小学毕业证书，阿卜杜勒·纳赛尔·侯赛因在邮电部门谋到一份差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派到亚历山大，成为市郊邮局的一名副局长，首次分配就很幸运。大都市里充满新奇事物，对年轻人颇具吸引力。亚历山大居住着许多上埃及亲戚，可以为他提供某些安全，这使他产生了留在城市的想法。在整个19世纪中，亚历山大从一个几乎被抛弃的8000人的城镇发展成一个拥有50万人的繁华的现代化城市。亚历山大日渐扩大的工业和商业活动不但吸引了成千上万垄断亚历山大商业和贸易的欧洲商人和地中海东部的商人，而且还吸引了大批移居而来的埃及民工。上埃及某些地区的居民甚至集体举家迁入。

正是从这群居民中，纳赛尔的父亲找到了一位妻子。1917年，他与有成就的承包商兼煤炭商穆罕默德·哈曼德的女儿结了婚。哈曼德早先来自上埃及明亚省的米拉威，是纳赛尔家族的朋友。纳赛尔母亲对纳赛尔的影响似乎超过了他的父亲。她把娘家精于经商的某些聪明才智传给了纳赛尔。由于她在亚历山大长大，性格上

比土生土长的丈夫更加活泼，城府也更深。上埃及人，或者人们所称的赛迪斯人，富有果断、勤勉、精明、倔强和务实的美称，以至于人们把他们称为埃及的约克郡人或得克萨斯人。其实把他们比作西西里人或许最为合适。赛迪斯人拥有南方人的热情和傲慢，特别关心个人荣誉，特别尊重妇女，因而显得与众不同。这些特征使赛迪斯人很容易卷入部族间的仇杀，感情上也容易因冲动而犯罪。他们一贫如洗，但毫不吝啬，殷勤好客，宗教上极为狂热。在赛迪斯男人身上，稳重高雅的举止下面总隐藏着一股炽热的情感。在商业和家族事务中，赛迪斯人表现出黑手党人那样地团结。土匪在农村同样拥有一定地位，他们通常是当地大地主雇用的亡命之徒。埃及一位现代作家是这样生动地描绘冷酷的封建乡村生活和上埃及顽固不化的道德法规的：“白天在高高的玉米地（偷情）的女人，到了晚上，人们却发现她的肚子已被剖开了。”傲慢和报复的传统掺杂着大战期间农民的不满和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使得1919年埃及革命中的农民起义有时显得极为激烈。这种态势在纳赛尔孩提至青年时代不时地酝酿和爆发出来。

纳赛尔出生时，埃及仍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实际权力掌握在英国军队和英国政府的代表——高级专员手中。英国官员控制着埃及的军队和警察，并以顾问身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政府的所有部门。从克罗默统治时起，英国人的数量和权力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英国人之下是埃及的官方统治者赫迪夫或苏丹。当时在位的是福阿德。福阿德是穆罕默德·阿里大帝的曾外孙，在意大利长大，曾在日内瓦和维也纳住过一段时间。他的意大利语和法语比阿拉伯语和英语还要熟练。他长相显得富态而且使人有尊严感，为保持体型，他总是清晨5点即起床锻炼。他谨慎地做着一些公益活动，诸如建立新的埃及大学和为战时红十字会募捐等，从而掩饰了他的独裁政治野心。1917年他被英国人选中推上王位。

撇开政治权力不谈，苏丹周围和下面的社会经济大权控制在上层地主和高级官员手中，他们的祖先通常是土耳其人。他们与强



大的外国商团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外国商团在地中海东部国家的经纪人帮助下,控制了埃及的大部分财政、贸易及工业大权。接下来是由埃及的专业人员——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新闻记者以及受西方影响较少的农民中产阶级、乡村首领、传统的宗教领袖、下层官员组成的知识阶层。他们力量尚小但正在发展壮大,是支持早期阿拉比帕夏民族起义的坚强后盾。纳赛尔的家庭属于这个阶层。最后是大量的城市工人、贫苦农民以及无地的劳动者。

1919年革命的新特征是:各个阶层的埃及人至少暂时投入到第一次真正的全民族独立运动中,这在萨阿德、札格卢勒和华夫脱党的领导阶层中得到充分体现。征兵征用给农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城市工人深受生活费高涨之苦;大战期间建立的新工厂劳动条件尤为恶劣。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不满。然而,这些并不是革命的主要原因。

有史以来,亚历山大就是一个各阶层杂居在一起、彼此间关系高度紧张的城市。在海边的高大建筑和连结亚历山大与尼罗河的运河北岸的庭园里,居住着控制棉花市场的英国商人和其他富豪,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在44.7万城市人口中约有4.6万是外国人,其中多数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中大多是艺术家和熟练工人。这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市的另一端是贫穷的穆斯林居住区。移居来的工人居住在类似他们刚刚离开的乡村的贫民窟里。纳赛尔出生的巴科斯区是一个安静的中下层平民居住区。他的父母住在一幢泥砖砌成的共有三四个房间的简陋房子中,周围被一个小花园和树木环绕着。他父亲在经济上可能得到境遇较好的岳父家的帮助。纳赛尔的叔叔哈利勒在亚历山大上学,跟他们住在一起。纳赛尔的父亲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纳赛尔的叔叔哈利勒因为政治原因曾坐过一段牢——也许因为他参加了学生的示威活动,或者因为参加了1921年亚历山大非常严重的动乱。

在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纳赛尔逐渐长大成人。他早年的生活就像那个时代一样不稳定。由于父亲要到全国各地出差,他

们也经常搬家。纳赛尔住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还远离家人，他还在许多不同的学校读过书。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贸易状况时好时坏，与埃及人的生计密切相关的棉花价格时涨时落，经济困难和周期性危机也时常发生。

纳赛尔 3 岁那年，全家人第一次离开亚历山大，迁回阿西乌特。但在 1923 年，阿卜杜勒·纳赛尔·侯赛因被派到开罗东北尼罗河三角洲接近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哈塔巴任邮局负责人，于是，纳赛尔在哈塔巴一所铁路子弟小学首次就学。1924 年，他被送到开罗，与叔叔哈利勒·侯赛因住在一起，第二天就上了那里的小学。哈利勒在宗教财产部工作，业余时间做些小本生意。

战后埃及民族革命的第一幕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它只取得部分胜利。1922 年 2 月 28 日，英国政府在开罗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的辞职威胁下，同意单方面宣布中止埃及保护国地位，承认它是一个立宪王朝统治的独立主权国家。但是，宣布独立必须保留 4 项条件，它们将留待英埃条约谈判中予以解决。

这 4 项条件是：保护英帝国的交通（主要指苏伊士运河）；保护埃及免受外来侵略；保护外国人的利益和外来少数民族；保证苏丹国的地位。同时宣布福阿德国王一世为埃及苏丹，开始着手制定一部议会宪法并定于 1923 年 4 月 19 日颁布。

此后 13 年，当纳赛尔进入青春年华并产生政治意识时，埃及政治史至少从表面上看转向对英国宣言和埃及宪法这两个文件进行阐释和补充阶段。围绕着宪法的制定，国王和最强大的民族政党华夫脱党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由于英国的支持忽左忽右，双方的优势交替上升。国王要求获得通过敕令中止或支配宪法的专制权力。华夫脱党拥有议会多数，在宫廷无法控制的每一次选举中均取得巨大胜利。但为了对付政敌，它同样也不反对专断蛮横地利用议会多数。英国人、国王和华夫脱党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联盟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埃及政治陷入了似乎难以摆脱的混乱之中。由此产生的挫折使三方曾试图动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英国采取传统的炮



舰外交,向埃及港口派去舰队并以之为后盾提出最后通牒;国王采用的实际上是宫廷政变;华夫脱党则采取半革命的群众性煽动,借机引发骚乱并偶尔使用恐怖主义手段。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要华夫脱党提出的独立和达成一项协议条件令人无法接受,英国就打算把华夫脱党撵出权力圈。但在埃及,华夫脱又是唯一能与之达成被自由选举的议会接受的永久性条约的一支力量。为了赢得英国对其国内地位的支持,国王以及他组建的由少数派政党和朝臣组成的政府愿意与华夫脱党就英国从埃及和苏丹完全撤离的要求达成妥协,但不能违背华夫脱党的革命意志把这种协议强加给埃及。

但是,尽管英国当时也许没有力量或政治愿望把一项新的协定强加给埃及,但看上去它依然强大得足以维持现状,保护它所谓的根本利益。

纳赛尔的学生时代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度过的。他在开罗与叔叔哈利勒生活了3年,住在开罗一个古老别致的地区,离爱资哈尔清真寺和汗·哈利勒市场不远。叔叔出门上班后,纳赛尔就有大量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事情。有一个年龄稍大些的男孩寄宿在他叔叔家,纳赛尔就与他一起了解这个地区生气勃勃的生活:众多的小旅馆、熟练手工工人、热闹非凡的酒吧、辉煌的清真寺以及荒芜的宫殿。在学校里,他学习阿拉伯语、算术和穆斯林宗教课程,方法大多是死记硬背。

在叔叔的帮助下,纳赛尔与母亲经常保持通信联系。他深深地爱着母亲,但只有回到哈塔巴度假时,他才能与母亲团聚。母亲的注意力已转移到3个弟弟身上。从1926年3月底开始,纳赛尔再也没有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已经去世。纳赛尔一个月后回到家中才获悉这一噩耗。即便这时,家里人还托词说母亲生病不在家或是回亚历山大看外公外婆去了。母亲的去世无疑是雪上加霜,使纳赛尔悲痛欲绝,给一个外表严肃克制的孩子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纳赛尔本人把它称为“一次残酷的打击,它永远深深埋在我心

里”。他还谈到以后的若干年中他一直没有回家。一些人认为，这使纳赛尔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使他在掌权以后尽可能避免流血。这或许也是纳赛尔以后一直害怕和怀疑有人图谋反对他的一个原因。纳赛尔作为政治家体现的仁慈留待以后讨论，但至少母亲的早逝给他时常远离家门、从来没有真正的家庭感并经常受到扰乱的童年增加了另一个不安的因素。早早远离家门的生活经历使纳赛尔形成了多重性格，不安、多疑、紧张、热情与隐瞒真情的耐心和能力交织在一起。在他日后成为谋略家和知名人物时，这种性格得到了充分体现。很早的一本官方出版的纳赛尔传记是这样描述他的学生时代的：“就他的年龄而言，他体格高大强壮，有创见，孤独且心不在焉，读起书来废寝忘食。”

不久以后，另一个人的去世也给纳赛尔留下了短暂的印象。1927年8月27日，萨阿德·札格卢勒逝世。为了参加这位民族英雄的葬礼，许多人拥到开罗街头，以致整个市中心不得不开封起来。纳赛尔当时只有9岁，可能也看到了葬礼，听到了他叔叔的政治性谈话。他叔叔是个民族主义分子，不过已不再热心于政治活动。纳赛尔的叔叔回忆道：

……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每当我看到飞机在头顶上方盘旋，我总是高呼：

噢，万能的上帝，愿  
灾难降临到英国人身上。

他说，有一段时间，纳赛尔试图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不久他发现：“我们从生活在马木路克时代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种符咒。”它最初是这样的：

噢，辉煌的上帝，  
消灭所有的奥斯曼人吧。

1928年，纳赛尔的父亲再度结婚并有了第4个儿子肖基。纳赛尔似乎一开始就与继母格格不入，因而疏远了与父亲的关系。

纳赛尔后来把父亲描绘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烟酒不沾，不上酒吧，不谈政治，除了工作外，唯一的爱好是外出打猎。他热爱家庭，希望儿子们有文化，能自食其力。

父亲再婚之后，纳赛尔被送到亚历山大，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在那里的艾塔林中学就读了一段时间。但他没有学好，不久作为一名寄宿生被送到开罗郊区的赫努万的一所学校学习。1929年，他父亲调到亚历山大，纳赛尔回到家中上了拉斯丁中学。当时，埃及的大中学校经常罢课或示威游行。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持续到纳赛尔念完中学和大学为止。正是在这里，纳赛尔与政治狂热分子有了初次接触。在相互竞争的政党驱使下，大中學生把自己看作是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的一支先锋队。一旦长辈们畏缩不前或被控制得太严时，他们就承担起抗议的职责。同时，学生们感到作为潜在的精英分子，他们肩负着赢得埃及独立、实现社会文化生活现代化的特殊责任。在这方面，他们意识到自己与父辈兄长之间存在的鸿沟。

伴随着埃及争取独立和外国占领之间的斗争以及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政治论战，埃及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冲突。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兴起和哈里发职位的废除引起了有关政治和宗教关系的论战。开罗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中保守的穆斯林神学学者对受西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的埃及作家和思想家引进的新思想的挑战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普通的埃及人关心的是比较表面化但也是比较直接的问题，如服装和风俗越来越接近于欧洲以及有关妇女的地位、一夫多妻制或关于离婚的争议。纳赛尔后来写道：在他成长的埃及社会中，“令人震惊的混乱和困惑折磨着我们的心灵。”



[他写道]我有时在思考一个普通埃及家庭——生活在祖国首都的成千上万个家庭中的某个家庭的状况。举个例子，父亲是一个身穿长袍的农民——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母亲是土耳其后裔。儿女们都上了分别采纳英法教育制度的学校。所有这些都处在13世纪的思想 and 20世纪的现象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的环境中。我们生活在一个还未定形的社会，它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相比先前走过同一道路的其他民族，他仍在逐渐发展，还没有稳定下来。

纳赛尔第一次参加政治示威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中学生。这次示威发生在亚历山大，纳赛尔偶然加入到示威队伍中，学着高年级的同学喊了几句口号。他的脸被警棍击中，在监狱中待了一夜，然后他父亲才把他营救出去。纳赛尔问过难友为何要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告诉他，这是警察和“青年埃及”之间的冲突。父亲把他送到另一所中学，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因为以后的3年，中学生参加游行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和危险。埃及实际上处于国王和残忍的伊思梅尔·西德基帕夏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西德基曾是华夫脱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与札格卢勒决裂。他是个知识分子，玩世不恭的政治家，性格刚强，被人誉为理财专家。他对使用武力和残忍手段镇压公众的反抗津津乐道。在他统治期间，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及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死伤了几百人。反对派的政治集会遭到阻止，新公布的宪法限制公民选举和议会的权力。

1933年，纳赛尔的父亲被派往开罗，在萨克伊老区（或东门）的澳朗费什负责一所邮电局的工作。纳赛尔在纳赫达·米斯里亚（埃及文艺复兴）学校中继续读高中。邮局和纳赛尔全家都在一幢3层楼中。这所楼房坐落在一条名叫海米斯·阿德斯的死胡同里，旁边是犹太人的一座教堂和他们开设的一家药房。纳赛尔一家从隔壁的一个名叫塞缪尔的犹太地主那里以每月三四英镑的租金租下了两层4间房子，纳赛尔在北面有一个可以俯瞰庭园的房间。以

后4年,他一直住在这里。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纳赛尔在家中得不到一丝安宁,有时不得不跑到附近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在安静的园子里看上一会儿书。

纳赫达中学因在大中学生的示威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而颇具声誉。直到那段时期结束,纳赛尔一直站在示威运动的前列。他是开罗中学生执行委员会主席。在1935年至1936年读中学的最后一年中,纳赛尔热衷于政治,以致他的在校时间只有45天。在这些年里,他不失时机地大量阅读历史、政治和阿拉伯及穆斯林作家写的名人传记。它们中有论述穆罕默德和埃及民族主义的伟大先驱塔米尔·艾丁·阿富罕尼以及穆罕默德·阿卜杜的作品,特别是建立埃及民族党的杰出青年鼓动家莫斯塔法·卡米勒的著作。除了穆罕默德和甘地外,莫斯塔法·卡米勒或许是纳赛尔心目中东方国家最伟大的英雄。纳赛尔也阅读早期穆斯林改革家和反帝国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卜杜勒·拉赫米·卡瓦基比的作品。他是一个叙利亚人,因逃避土耳其人的迫害逃到了埃及。在他最有名的著作《乡村之母》和《王朝的特征》中,卡瓦基比触及到以后成为纳赛尔未来政治思想中心的两个主题:一个是讨论东方国家如何改变落后面貌,消除外国人的统治,它强调阿拉伯人应在伊斯兰社会复兴中起主要作用;另一个是认为,西方国家在占领某个东方国家之后不但没给人民带来自由,反而与恶霸、一小撮政治家以及宗教领袖沆瀣一气,欺压百姓。纳赛尔也读过陶菲克·哈基姆写的一部埃及著名小说《复活》,并为之深深感动。《复活》描写了一位15岁少年穆赫辛的生活情景。穆赫辛与叔叔住在开罗,假期回到乡村庄园的父母家中。小说感人地刻画出一个腼腆而又富有激情的青年人认识爱情、产生社会意识和为国自我牺牲精神的过程。小说以敏锐幽默和自然朴实的笔调描写了城乡生活,使人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带着恐惧感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开罗的一套房子中,深深感到与父母的文化差异和代沟正在扩大。小说最后写到主人公热情地投入到了1919年革命示威运动中。纳赛

尔也许很容易认为穆赫辛的性格和他相同，小说反映的背景也和他自己的经历极为相似。

通过阿拉伯文译本，纳赛尔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及亚历山大·凯撒、甘地和法国著名人物拿破仑、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传记。他对法国革命尤感兴趣。他在一家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伏尔泰——自由的斗士”的文章，他特别赞赏伏尔泰反对滥用权力和反对教会的思想。他崇拜伏尔泰，只因“他冷静而不残酷”。

据说狄更斯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深深印在纳赛尔的脑海中。在未来的革命委员会中，他反对杀戮政敌，因为那本书给他留下了暴力滋生暴力的教训。

1935年1月，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力斯·凯撒》在校园中公演，纳赛尔在剧中扮演凯撒。这也许是一个无可争辩的预言。当加麦尔·凯撒在舞台上被人刺死，纳赛尔的父亲惊恐地从观众席上站起来，直到他确信儿子依然活着、仍可以动弹才重新坐下。

1935年初，王室专制统治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华夫脱党迫切要求恢复1923年宪法。纳赛尔和他的校友们开始接触在西德基帕夏统治下较为自由的气氛中产生的一些政党。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代表中学生的委员会，纳赛尔担任委员会主席。纳赛尔试探了包括华夫脱党在内的当时大部分主要的民族政党的态度，他首先和艾哈迈德·侯赛因领导的“青年埃及”党进行了接触。这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右翼集团，受到王室的鼓励和意大利资金的秘密资助。在国王和华夫脱党以及温和派和穆斯林反动派之间的持续冲突中，“青年埃及”从欧洲输入了新的政治组织和暴力方法，发展成为法西斯式的“绿衫”青年运动。为了与之对抗，华夫脱党组建自己的“蓝衫军”。2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若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团体在高压下转入地下。伊斯梅里亚一个名叫哈桑·巴拿的书法教师于1928年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开始秘密组建密谋机构。穆斯林兄弟会是极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混合产物。



1934年哈桑·巴拿来到首都之后，穆斯林兄弟会在开罗的大中学生中影响甚大。纳赛尔没有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但他与华夫脱党中的青年人以及“青年埃及”有过一段时期的合作，但他追随这些人的时间并不长。他的观点似乎已更接近于莫斯塔法·卡米勒建立的旧式民族党。卡米勒的追随者已减少成微不足道的一小群人，但他们对英国的态度比华夫脱党更为坚决：他们要求英国不经谈判立即从埃及全部撤军。纳赛尔与民族党副主席，当时和“青年埃及”有联系的法特希·拉德万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后来的纳赛尔革命政府中拉德万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国家指导部部长。

仍在激励着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埃及人的最直接的动力是从外国统治者中获得独立的民族大业，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政党就是最受欢迎的政党。人们感到，纳赛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带有某种真挚的热情，他在1935年9月给同窗好友哈桑·纳沙尔的信中，以青年人惯用的言辞和夸张手法写道：

目前的局势岌岌可危，埃及已经陷入绝境。在我看来，国家正在走向灭亡。人们已经极端绝望。谁能结束这种状况？为了祖国独立甘愿献身者在何方？能重建国家，使软弱和受屈辱的埃及人民能够重新站起来，像自由和独立的人们一样生活的人在何方？尊严在哪儿？民族精神在哪儿？我们青年人的所谓活力在哪儿？他们说埃及人是懦夫，不敢喊出一点儿声音。埃及人需要有一位领袖率领他为国而战。依据这种方法，同样一个埃及人会变成一声霹雳，使王朝土崩瓦解。

穆斯塔法·卡米勒说过：“即使我的心从左胸移到右胸，即使金字塔移位，即使尼罗河倒流，我也不会改变原则。”

我们多次说，我们将齐心协力将国家从沉睡中唤醒，发掘出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力量。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一事无成。

我亲爱的伙伴，我希望你能在1935年9月3日下午4时来我的住所讨论这些事情。我希望你能来。

这封信发出后几个星期，纳赛尔的行动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尽管实际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希望重返议会政府并执掌权力的愿望与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特别是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给埃及带来的威胁合起来迫使华夫脱党和英国走向妥协。华夫脱党宣称，如果能在1923年旧宪法的基础上恢复议会政府，它准备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条约。这一条件的实现花了一年的时间：国王不愿让步，英国一方面同意恢复西德基帕夏1930年宪法，另一方面又威胁说，他们认为1923年宪法不合需要，因为它不切实际。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在一篇公开演说中不合时宜地重复了这一论调，致使华夫脱党谴责英国干涉了埃及内政，并引起大中学生的二连串骚乱。

塞缪尔·霍尔爵士的演说发表后，纳赛尔发动开罗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一道连续3天举行了示威活动。警察开枪打死了2名大学生并逮捕了许多学生。英国警察的左轮手枪的一颗子弹呼啸着划过纳赛尔的前额，给他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伤痕。

1935年12月12日，福阿德国王恢复了1923年宪法。同一天，由华夫脱党和其他政党领袖组成的民族阵线要求英国为达成一项新条约开始谈判。由于4月25日福阿德国王逝世，仍在英国求学的未成年的王子法鲁克继位，谈判稍微推迟了一段时间。5月份华夫脱党在大选中再度上台。6月，新首相莫斯塔法·纳哈斯帕夏与英国开始了正式的条约谈判。条约很快完成并于1936年8月26日签订。

该条约用一个军事联盟取代了英国的占领，它赋予英国在和平时期沿苏伊士运河某个规定的地区驻扎1万军队和在战时动用全国设施的权力。英国则支持埃及加入国联。埃及同意对苏丹的共管制暂时延长。英国同意废除陈旧而又遭人痛恨的“强求条款”。在“强求条款”规定的制度下，外国人享有特殊并往往被滥用的法律权利。新条约得到埃及议会以及除民族党外所有政党的同意。

纳赛尔本人后来总结了自己当时的政治活动和对条约的敌意态度。他说,没有一个埃及人对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埃及这一目标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他早就断定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他对采取何种行动方式的考虑有所改变。

在我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积极行动”意味着热情,但我以后逐渐认识到,这样的热情并非我一人拥有,为了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把这份热情传给他人。

当时我是纳赫达中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我领导过许多示威运动,嗓子都喊哑了,许多中学同伴和我们一道坚决要求埃及实现彻底独立。但是劳而无功——我们的呼声消失在微弱的回声中,没有撼动群山,摧毁岩石。我终于认识到“积极行动”只有使所有民族领导人团结一致才能实现。于是我们这支怒吼着的反抗队伍以青年埃及的名义,挨家挨户地巡回拜访领导人,征得他们的同意以协调行动。他们确实表示过同意。但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几乎摧毁了我的信心——他们同意签订1936年条约。

1936年条约允许英军在埃及处于统治地位或许使纳赛尔彻底觉醒,尽管如此,纳赛尔已不得不减少政治活动,为完成中学学业作最后的冲刺。校长一开始不允许他返回学校,但是一部分学生坚持要求纳赛尔应作为一个英雄与校长同乘一辆四轮马车返回学校。校长被迫再次接纳了他。在夏天的考试中,纳赛尔勉强通过毕业考试,从而结束了粗略且时常中断的教育。此刻,纳赛尔已经18岁,他不得不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未来的事业。埃及和纳赛尔生命中的新阶段就要开始了。



## 第二章

### 军队和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埃及(1936—1946)

纳赛尔一直被军事生活所吸引。他曾告诉一名英国记者，纳尔逊是他心目中第一位外国英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读了有关纳尔逊的书籍，并敬仰他自愿承担一项危险任务的献身精神。（他精心选择这一例子也许是为了与采访者的国籍一致。尽管在这次采访中纳赛尔已提到穆罕默德和甘地的一生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但是，军队并不是纳赛尔的第一职业选择。他想上大学学习法律。他决定进入军事学院是把它作为摆脱贫困家境的唯一途径。在父亲第二次结婚后，他们父子俩的关系不佳，但他又无力独自承担大学生生活的费用。

他第一次要求进入军事学院的申请遭到拒绝，这也许是因为缺乏当时成为一名军官必须的家庭背景或社会地位。作为第二选择，他申请进入警官学校。他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与他家人的要求相一致。仍由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指挥官拉塞尔·珀萨领导的开罗警察，在当时被看成是精锐兵团。只有纳赛尔的祖父支持他顶住家庭压力，为这个年轻人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又一次遭到拒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记录纳赛尔在学生时期煽动学生运动的警察档案妨碍他进入警察学校。但与此同时，他至少能暂时按照他最初的愿望到开罗大学学习法律。这

种学习仅持续了几个月,但使他充分体验了大城市学生生活的兴奋、希望和曲折。这所大学的学生中生活不很富裕的越来越多,毕业后的就业前景暗淡。1937年,他重新申请加入军事学院并获批准。有两件事对他的这次申请起了帮助作用。1936年与英国签署条约后,埃及军队正在扩编,需要立即增加军官。在华夫脱政府的较为平等的领导下,将从较为广泛的阶层中招募这些军官。通过哈利勒叔叔和他在阿西乌特的那些有影响的朋友,纳赛尔成功地与一位刚被任命主管新生挑选工作的将军进行了秘密接触,并给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7年3月17日,纳赛尔进入了开罗军事学院。经过5个月的见习,他被正式录用。他进步很快,被编进一个特别小组,用一年的时间修完通常需要用三年的课程。在发动1952年革命的“自由军官”中担任领导的其他7名成员也几乎在同时进入了这所军校。他们是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波格达迪、安瓦尔·萨达特、侯赛因·沙菲、查卡利亚·毛希丁和加麦尔·萨拉姆、赛拉·萨拉姆兄弟俩。另外一名“自由军官”中的重要人物卡迈勒丁·侯赛因于一年后进校,1939年毕业。查卡利亚·毛希丁的堂弟哈立德·毛希丁毕业于1940年。

纳赛尔日后最亲密的两个同盟者查卡利亚·毛希丁(后来长期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并短暂地担任过总理职务)和阿米尔(后来成了纳赛尔最亲密的朋友,是他与军队间的主要联系人)不属于他在军事学院的朋友之列。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亚历山大会见后开始的。此次见面还使他结识了萨达特。起初,萨达特对纳赛尔那种阴沉的缄默感到别扭,但后来则为他性格的力量所打动,并成了他忠实的崇拜者。根据萨达特的描述,纳赛尔20岁的生日是在军校庆祝的,只用了扁豆、甘蔗和栗子这几样东西。在简朴的庆祝活动结束前,纳赛尔以诚挚的语言号召在座的朋友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纳赛尔已具有强健的体魄和成熟的思维,他阅读了大量的阿

拉伯文和英文书籍,特别是军事、政治史和名人传记,其中有5本是描写拿破仑的,有3本由丘吉尔撰写的书以及关于劳伦斯、加里波弟、俾斯麦、福克和戈登的书籍。对读书的共同爱好成了他与阿米尔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阿米尔的热情好动、彬彬有礼与纳赛尔的严肃、寡言少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8年7月1日,纳赛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军事学院的最后一次考试。他被任命为陆军少尉,派到曼卡拜德营地。此地离他父亲出生地班尼莫尔村只有几英里,是埃及军队的主要驻地之一。

当时,军人职业是实现抱负的渠道。然而,尽管纳赛尔有着强烈的政治和个人抱负以及发誓对军旅生涯格外的偏爱,但对于一个激进的年轻鼓动家来说,决定到仍受外国人控制的军队中去谋求发展,哪怕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或许也有着难以预料的原因。尽管有了“1936年条约”,埃及军队及防务仍大部分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一个贫穷的国度里,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使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失去工作的时候,军队确实能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和社会地位。

1952年埃及军人革命及中东地区发生其他一些军事政变之后,出现了大量论述军队在东方政治中的作用的书籍,几乎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学说建立在纳赛尔曾是一名士兵并把军队当作政治武器这一事实上,因此应审慎地看待这种学说。因为从纳赛尔本人的经历看,与其说他是一名步入政界的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一名加入军队的政治家。他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在政治上都是积极向上的,然而,有关军队在东方政治中的作用的学说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如果想让人们完全理解纳赛尔为什么做出从军的选择及后来产生的政治作用,就需要解释埃及军队的一些特别的社会和历史特点。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发展中国家”里,军队经常是革命先锋队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在政局动荡时,它是最协调一致、最有组织的力量,而且还因为它能提供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技术骨



干。纳赛尔本人曾说过：“在埃及这样的国家里，军队是一支有文化的力量。”在他所著的《革命哲学》一书中，纳赛尔称军队是唯一一支无阶级属性的民族力量，只有它才能使埃及走出因两种同时进行的革命发生冲突所造成的困境。（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要求团结，而社会革命又不可避免地造成阶级间的冲突，致使民族团结遭到削弱。）只有军队才能开辟一条同时进行这两种革命的必由之路。

既然军队现代化的首要目的是抵御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入侵（在奥斯曼帝国时就是如此），那么军队里就产生了民族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外国控制的年代中注定要以革命特征出现。在阿拉伯和东奥斯曼帝国，所有的政府都常常是军政府，军队最受欢迎有才之士。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最近。埃及的情况则有些复杂，主要是因为占据埃及军队领导层直至上世纪中叶的土耳其—高加索人与被强行征召入伍的埃及人之间存在民族鸿沟。所以，农民出身的埃及军官阿拉比上校于 1882 年发起的首次民族起义不仅是针对欧洲外来势力，同时也针对与赫迪夫连为一体的那些军官。那次起义在英国的占领下结束了。

阿拉比起义失败后，隶属于英国占领军和赫迪夫的埃及军队只是 1924 年在苏丹才显示出几分政治热情。在 1919 年的革命中，这支军队几乎还没有从政治上觉醒。英国对这支军队的政策也处于矛盾之中：既要让它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一些诸如维护国内治安及在英军的指挥下重新征服苏丹之类的有限的活动，又不能让它强大到对英国在埃及的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

“1936 年条约”使埃及军队终于处于埃及人的指挥之下，但它又规定，军队必须由英国人训练，装备必须用英国的。1937 年，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来到埃及。这个代表团写的第一份报告是尖锐坦率的。由英国人指挥了 50 年的埃及军队正处于悲惨的境地。（纳赛尔已投身于这支军队）。在它的 11 个步兵营里没有任何轻机枪或重机枪，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支援武器或反坦克武器。炮兵力量

不足,装备陈旧。这支部队没有坦克、无线电和防空武器。埃及的空军力量仅有 38 架很小的飞机。这些飞机不能携带武器。飞行员训练有素,但没有实战经验。据英军代表团第一份报告所述,军队训练仍以几乎是远古以前的战术思想为指导方针。

招募新兵的方式也使这支军队缺乏内在的力量,这也反映了埃及社会的弊端。一端是凭关系获得任命的高级军官,另一端是被强行征召入伍的士兵,这些人通常是目不识丁且又无钱赎买免服兵役权的农民,他们将 5 年服役期视作一场灾难。埃及最高统率参谋部“也许是这个军事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

“1936 年条约”签定之后实行的扩充计划为这支政治反应迟钝的旧军队注入了像纳赛尔及其朋友这样一批新鲜力量。这些人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精力旺盛,雄心勃勃,政治上深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普通教育的发展。)

纳赛尔到达曼卡拜德后不久,就给他的校友哈桑·纳萨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讲述了该地的情况及自己的感觉: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沙漠、农田、水塘和运河构成一幅图画。北部的片片农田和南部横跨东西的绵绵山脉,都被沙漠像有力的大手一样地锁住了。

我高兴地告诉你,我的性格依旧,曼卡拜德的加麦尔依然是那个你早就认识的加麦尔。他从幻想中找到希望,但他的希望如浮云一般流逝。

曼卡拜德本身是一个村庄,在它附近是一个驻扎着 3000 名军人的军营。在这里,纳赛尔用聊天、看书或看望班尼莫尔的亲戚来打发自己的空余时间。在营房里野外的篝火旁,纳赛尔及他的年轻军官朋友们谈论最多的是本行工作和政治,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一样,有一种特别的政治

责任感,同时也是由于年轻的穆斯林缺少同女性的交往及其他娱乐,除了政治之外没有什么可谈论的。在穆斯林埃及,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都带有男性和僧侣的特征。除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层人物中间,很少能看到西方社会的体育活动及其他社会娱乐。工作以外,他们除了谈论政治就找不到其他方式来宣泄他们的精力、理想及青春的浪漫,因为宗教遭到怀疑,性生活受到限制,社会福利工作很少得到发展,连文学的内容也高度政治化了。这一代的埃及青年被那些令人迷惑的不同文化或不同的语言所缠绕,不能认清自我。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国家一半受外国人的统治,一半受形同虚设的国王和议会的统治。立宪主义的外表掩盖住了警察国家和反革命势力的实质。

因而,纳赛尔和他朋友们对他们服役的军队、对与上级官员和英国教员的关系,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大量的不满,就像他们30年代的欧洲同龄人一样,他们被幻想中的社会公道、改革社会的希望和对军国主义的抵制所激励。但是,这些复杂的感情与主要抱负目标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30年代成长起来并在大战前夕逐渐成熟的欧美年轻人的政治观深深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经济大萧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事件,对绥靖主义或重新武装的抉择以及迫害犹太人和维护民主自由的斗争。正如当时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和印度争取自由之战对欧洲人来说只能是次要的问题一样,像纳赛尔那样的埃及人也知道什么是他们身边最重要的问题。在形成个性的这些年中,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最直接的政治影响的是外国继续占领他们的国家——尽管有一旦需要即与王朝专制沆瀣一气的“1936年条约”作遮羞布以及埃及政治自由的缺乏和极度的贫困。

世界经济萧条对棉花出口的影响使埃及也深受其害,但她受害的程度还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产生的危机对美国 and 欧洲的影响那样大。埃及的大部分人落到几乎仅能糊口的地步。生活水平低



得无法再低：甚至西方工业城市中的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对一般埃及农民来说也成为一种奢侈。他们在泥屋中与牲畜为伴，或许有一英亩耕地，或许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一家人每周的收入大约为50个皮阿斯特<sup>①</sup>，一年的总收入为15个英镑。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公民权。他要么遭到警察欺侮，要么在地主或者官方任命的督察的胁迫下参加投票，有时还要受到在农村中相互竞争的政党的利诱。日渐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农村大量剩余失业人口为寻找工作涌入城市，可怕的贫民窟在城市中蔓延开来。劳动条件还比不上19世纪初实施工厂法以前的英国。10岁以下的男女童工被雇用从事本该由年轻人和成年人承担的工作。妇女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每星期也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得可怜。没有强制性失业保险或疾病津贴。为数不多的几家工会势单力薄，在官方的限制下陷入了瘫痪状态。工会既未得到承认也未遭到禁止，但不允许它们组成工会联合体。政府主要代表有产阶级，它动辄使用警察和军队帮助镇压罢工。公众对社会问题有所讨论，但仅限于民族解放这个话题。检查制度以及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活动的严厉禁止，也使讨论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中东主要的革命思潮依然来源于早期的法国革命和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及宪法改革运动。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左翼小团体外，几乎还没有人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文化和社会问题方面，埃及仍纠缠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曾争执不休的宗教、思想自由和生活方式自由等问题。

埃及的社会顶端，就像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俄国一样，是一个辉煌而脆弱的外壳，组成这一外壳的是一种与广大下层人民格格不入的文化。对那些身居顶层的人来说，30年代是骄奢淫逸的时期。

新国王法鲁克经过短暂的摄政时期之后，于1937年7月19

---

<sup>①</sup> 埃及等国的辅币单位。——译者

日登上王位，时年 18 岁。此人看上去天真无瑕，颇具魅力。他的顾问们，例如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穆罕默德·莫拉吉还保证，新国王是一个虔诚奉教的人。法鲁克一开始就颇得人心，当他娶了一个埃及贵族的女儿、美丽迷人的法丽达之后，他就更受欢迎了。但是，充斥着阴谋的宫廷环境以及下臣们的阿谀献媚已经开始腐蚀这个王子。当然，这位王子平庸的智力，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受教育状况之糟糕也许早已注定了他的垮台。

生活奢侈程度仅次于宫廷的是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上流社会人士”：显赫的土耳其裔埃及人和拥有埃及土地的帕夏，为数极少的埃及新工业家和银行家。这些工业家和银行家们成功地打入了长期以来由外国人——欧洲人和地中海东部国家比较富有的人所控制的禁区。这些人再加上外交使节和躲避欧洲严冬的外国观光者，成为社交界中最有生气的一部分。舞会、鸡尾酒会、运动会和招待会通常在诸如喜克索一类的大饭店举行。在这些娱乐场所，香槟酒泛着泡沫，不时演出歌剧或进行文娱表演。穆罕默德·阿里俱乐部是老派的政治家时常出没的地方；盖茨拉体育俱乐部坐落在宽阔的金色尼罗河河畔，它是英国占有的一个巨大绿洲，上面有板球、马球和杜松子酒以及英法大使馆和大帕夏的豪华别墅。但从开罗市中心，从仍然驻扎着英军的凯斯莱尼勒军营传出的军号每天都在提醒人们注意谁是维持那个浮华外壳的最高力量。

豪华的表层下面不但有衣衫褴褛、目不识丁的农民，还有日益壮大的由工程师、律师、医生、新闻记者、教师、小商贩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有着新的期望和新的技能，但没有任何权力。他们曾经接受过欧洲式的教育，甚至作为大学生出过国，但是回到家乡后却与掌握埃及命运的外国势力人物联系不多或根本没有联系。此外，尽管他们发现与饱受传统的穆斯林文化熏陶的老一辈难以交流，但像纳赛尔及其同伴那样的新的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由于家庭的缘故与乡村的农民保持着联系，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而逐渐缩小。

有些人看到并崇尚西欧实行的民主,希望埃及拥有更多的自由,另外一些人则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下严明的纪律和动员国家力量的程度所打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感到难以全力介入欧洲英法民主国家和德意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争。确实,意大利在把阿拉伯的利比亚变成殖民地的过程中,所做所为和征服埃塞俄比亚时一样遭人憎恨。意大利强大的和不断增加的军队出现在埃及边境,逼近尼罗河源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埃及人争辩说,英国在埃及驻扎军队尽管是对意大利的一种防御,同时也挑起了她的贪婪。这实际上是敌对的大国间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埃及应尽可能保持中立。况且,环顾一下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民主国家的行为又能好到哪里去?民主国家一贯鼓吹自由民主,但在自己的国度以外它们真正实行民主了吗?在许多埃及人看来,英国显然总是置民主原则于不顾,支持不代表人民的政府,即便这些政府残忍腐朽,只要这样做对维护英国的帝国利益和延长军事占领有必要就行。

埃及青年人看到,语言和宗教上与埃及息息相关的所有阿拉伯邻国的状况和埃及极为相似。他们看到了伊拉克的革命运动和镇压行为,看到了她在英国统治下的独立和埃及一样是虚有其名,只不过伊拉克争取独立的动机不是苏伊士运河,而是石油。在大约旦,存在着一个傀儡艾米尔和一支英国控制的军队;在苏丹,英国在所谓共管名义下实行统治,埃及作为参加管制的另一个国家则有名无实,实际上遭到了排挤;在北非,法国处于控制地位,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经济上被法国所统治,实际上遭到了法国的吞并。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巴勒斯坦。埃及人看到,英国为了保护旨在建立国家的犹太移民的涌入并给自己提供一个军事基地,用武力镇压了占当地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从1936年开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了自治和独立一直进行着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如果在本国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能像西班牙内战对英法青年人那样影响富有理想的埃及青年,那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抗。



他们看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弱小民族，面对强大的英军坚持斗争达3年之久。在那些自愿帮助巴勒斯坦的人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站在最前列。

唯一保持着自由并希望保持中立的中东国家是早就蔑视西方国家并与之作过斗争的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礼萨·汗统治下的伊朗在英俄这两大势力之间充当缓冲国的角色，当这两个国家出人意料地结为盟国之后，伊朗的作用也就消失了。沙特阿拉伯由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还未被充分认识，加上其石油伙伴是还没有在中东养成帝国习性的美国，因而保持着独立地位。也门能保持独立是因为它遥远、落后和商业上无利可图。在广阔的穆斯林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的1亿5千万穆斯林是英国和荷兰帝国的属民；非洲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教徒则受到伦敦和巴黎的统治。在中亚，古老的穆斯林国家同样遭到俄国沙皇的摧残。1938—1939年，世界前景一片暗淡。但是，对什么是最大的不公和悲哀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主要取决于是从伦敦和巴黎还是从开罗，是从约翰·康福特的剑桥还是从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曼卡拜德军营来看问题。

根据当时曾在曼卡拜德的安瓦尔·萨达特的回忆，假如年轻军官们在深更半夜的谈话中流露出想随便聊聊的迹象，“那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要插进来，把我们引回到更为严肃的话题上”。纳赛尔

沉默寡言、态度严肃、信仰坚定。他说到做到。他非常热爱养育他的这块土地，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原籍老家的格言隽语。

萨达特20年后在对这段时期的描绘中指出，纳赛尔当时已开始鼓吹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王室和封建主义”，把埃及从混乱中挽救出来。萨达特说，正是在“1939年初，曼卡拜德的军官们建立了一个献身解放事业的秘密革命团体”。然而其他一些迹

象表明,最后发动 1952 年政变的秘密组织——“自由军官”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在军队中成立的。这个组织开始酝酿于 1942 年,1944 年举行了第一次有组织的会议,1949 年后才形成严密的组织。曼卡拜德军营的一群聪明和富有理想的年轻军官发现彼此拥有共同的善恶感,尽管后来他们被派到不同的岗位,承担不同的任务,政治倾向及活动各不相同,但一直保持着联系。

1939 年初,纳赛尔从曼卡拜德被派往驻在苏丹的一个埃及步兵营。萨达特说,纳赛尔自愿到被称为军中不满现状分子的流放地服役是因为他相信,由于自己言辞坦率,他已经被上司列入黑名单。在前往喀土穆之前,纳赛尔先去了亚历山大,在那里与同在一个营服役的阿米尔和查卡里亚·毛希丁结为好友。纳赛尔给朋友哈桑·纳萨尔写了一封信,描绘了他在前往喀土穆的列车上与一位声音宏亮且又健谈的参议员相识的情形。这封信充分显示了纳赛尔在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着辛辣的幽默。在以后几年中,纳赛尔的讽刺、半开玩笑、有时恶作剧的风格与他那严肃庄重的个性形成了反差。他在苏丹的同事注意到,他从不开怀大笑,不过,他时常微笑。他喜欢动物,在屋子里养了一只可供玩赏的大猴子。

纳赛尔在苏丹呆了将近 3 年,其中大部分时间住在白尼罗河上的杰贝勒·奥利亚大坝附近。正是在这里,他与阿米尔建立了密切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纳赛尔处于一种忧喜参半的复杂情感之中。他服役的部队离家一千英里,不仅缺乏装备,没有训练和作战经验,甚至无法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效力。但是,这支部队却被要求间接参加一场它认为实际上和自己无关的战争。当英国统帅下的苏丹国防军时刻准备采取积极行动以防意大利的可能进攻时,在苏丹的埃及军队仍然呆在平静的警戒岗位上。每个士兵和爱国者都会感到职业和政治上的双重耻辱,当然也存在一种宽慰之感。埃及毕竟没有与英国占领军并肩作战。

纳赛尔对战争的看法是,埃及应保持中立。假如她不得不卷入战争,则应该趁轴心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摆脱英国。从纳粹的观

点看，纳赛尔决不是一个亲德分子。他的态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爱尔兰人罗杰·凯斯门特爵士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芬兰人——他们要求得到德国的帮助以击败俄国人——相似。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中东成为一个活跃的战场的时候，纳赛尔一直呆在苏丹。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为其他国家的青年提供了锤炼性格的机会，而纳赛尔却是一无所获。

假如英国把埃及军队看作一个潜在的重要盟友，训练并装备它，让它承担更加积极的作用，英国可能至少得到埃及军队的好感。但英国自身缺乏装备，又对埃军的军事价值和政治可靠性缺乏信心，对埃及政府和埃军总参谋长也持不信任态度。1937年底，法鲁克国王解散了选举产生的华夫脱政府，通过操纵选举，把以皇家内阁前任首脑阿里·马赫尔为首的少数党组成的宫廷政府推上了台。阿里·马赫尔保证埃及将承担1936年条约规定的对英国的义务。但是，埃及并没有对德国宣战，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身上。国王和阿里·马赫尔试探罗马可否达成一项协议：意大利不进攻埃及领土，埃及以维持中立作为回报。埃及的公众舆论赞成中立，特别是德国在欧洲获胜、法国沦陷之后。加入一场只有英国在孤军奋战且无望取胜的战争，对埃及来说无利可图。

法德停战和意大利加入战争改变了地中海局势。转眼之间，英国在中东地区失去了驻在叙利亚的法国陆军和驻地中海的法国舰队的支持。大量的意大利军队投入到反对英法的战争中。当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宣战之时，她在利比亚驻有大约21.5万军队和一支强大的空军。8万意军集结在长达1000英里的利比亚沙路尽头的埃及边境。与之对抗的是韦维尔将军率领的由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组成的5万军队。埃及军队的3个营和一些炮兵部署在马特鲁港地区。为了避免卷入与意大利的战争，阿里·马赫尔政府命令埃军从边境地区撤军。除非意大利进攻埃及本土，轰炸埃及城市，否则决不反击。

1936年条约规定埃及政治独立高于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



但是在战争的压力下，这个表面温和的东西开始遭到损耗。1940年6月20日，在英国的压力下，国王免去了阿里·马赫尔的职务，因为他不愿意对在埃及的意大利侨民采取安全措施。埃及总参谋长阿齐兹·米斯里将军是一位土耳其—高加索血统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因为英国人怀疑他同情轴心国而长期病休。在英国人的要求下，他于1940年8月最终被解除了职务。

正当意大利的先头部队于1940年9月向埃及境内65英里的西迪巴拉尼挺进时，以萨达特为首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军官开始与意大利人进行秘密接触。他们的目标是在开罗发动一场政变，趁意大利向埃及挺进之机把英国人驱逐出境。萨达特说，为此，他受命于“革命委员会”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巴纳和阿齐兹·米斯里将军取得联系。

这些计划没有导致重大的行动。到1940年12月，韦维尔已把意大利从埃及驱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但萨达特建立的联系日后有了结果，他们在穆斯林兄弟会和纳赛尔军官团之间建立了一个长期的、重要的、最终是激烈的暴力行动的关系。萨达特成为两个集团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尽管他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但其他许多有影响的军官要么是其成员，要么是其同情者。到此为止，穆斯林兄弟会已不再只是一个宗教或道义上的信仰复兴者的运动，它开始把自己看作一支有广泛群众影响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建立一个秘密的准军事组织。萨达特发现巴纳“容易狂热，但思路清晰”，“能够把握埃及面临问题的实质”。他认识到，穆斯林兄弟会对未来的军队起义能给予大量潜在而有益的帮助。纳赛尔在亚历山大与哈桑·巴纳见过面，但他从来不是兄弟会成员。

萨达特对命令他建立这些联系的“革命委员会”的性质不了解，但它可能是由军队中不满现实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几个不固定的团体中的一个。它与当时远在喀土穆的纳赛尔的联系可能极少。

到1941年春，利比亚的轴心国军队得到了德军的增援。他们

在隆美尔的统帅下，把英军再次赶了回去，并包围了托布鲁克。萨达特的民族主义团体与隆美尔的代表进行了接触，请他们帮助在埃及搞政变，以配合伊拉克的加拉尼起义。与德军早有来往的阿齐兹·米斯里尽管对伊拉克起义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决定去一趟当时处于法国维希政权统治下的贝鲁特，与那里的德国停战代表团取得联系。他试图乘潜水艇离开埃及，但未能成功。只得改乘空军军官（民族主义分子）驾驶的飞机前往——这些人在后来的革命政府中表现极为突出。但是，飞机起飞后不久即发生爆炸，米斯里被捕。米斯里声称，他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向英国提出的以合作换取合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遭到英国人的拒绝。后来，他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送进监狱，但服刑期不长。

米斯里的活动失败之后，埃及军队中的密谋者似乎销声匿迹了。纳赛尔于1941年8月从喀土穆给他的朋友哈桑·纳萨尔写信，痛心地说道他与那里的埃及同事的关系未能改善：

我的缺点是坦率。我不知道什么是狡猾和谄媚，也没有对上司拍马奉承……在这种环境中，我是唯一相信觉悟和忠诚的人，我遭到了惩罚……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准备实行的改革计划？现在我想实现它们需要1000年。

就像其他年轻人梦想名誉和金钱，梦想写小说、赚大钱、娶漂亮媳妇一样，纳赛尔和朋友们梦想并计划着埃及的改革和革命。

1941年底，纳赛尔回到埃及，再次接近了政治活动的中心，并与其他民族主义者军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一开始被派到阿拉曼，后来又被派往亚历山大以西6英里的一个单调乏味的沙漠哨所，还是远离前线。但是，正当1942年初隆美尔发动新的攻势时，埃及的动乱日趋增加，其怂恿者不是年轻军官，而是宫廷内部的一个亲轴心国的集团。轴心国的煽动，加上埃及经济状况令人不满，缺少用于进口的船只、食品和其他商品供应不足，促使爱资哈尔大

学的学生在穆斯林兄弟会和宫廷集团的鼓动下,举行示威游行以欢迎隆美尔,要求召回阿里·马赫尔。这再一次为英国政治上的激烈干涉提供了机会。英国的干涉对埃及的未来,对英埃关系,对纳赛尔的一生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深远影响。

1942年1月,以侯赛因·西里帕夏为首的埃及政府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与法国维希政府断绝了关系。决定作出时法鲁克国王不在开罗。由于未能与他商量,国王表示反对此决定并要求外交大臣辞职。2月2日侯赛因·西里帕夏政府辞职,从而引发出一场政治危机。英国害怕国王会召回阿里·马赫尔,组成一个更加亲轴心国或持中立态度的政府并从幕后予以操纵,因此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于2月3日敦促国王组建一个以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帕夏为首的新政府。英国认为,华夫脱党最受人民欢迎,是埃及唯一能够确保与英国的联盟关系、在轴心国强大的军事威胁前控制住动荡的局势的党派。

为了实现这一要求,英国大使于2月4日中午给王室发出最后通牒,声明“除非我在下午6点前听到纳哈斯帕夏被召回组成一个新内阁的消息,否则法鲁克国王陛下必须考虑后果”。下午3点,应法鲁克国王的要求,政党领袖和资深的政治家在开罗的阿卜丁宫召开会议,决定同意组成以纳哈斯为首的联合内阁。同时,他们也签署了一份抗议照会,作为英国最后通牒的答复送给英国人。照会以国民议会议长的名义抗议“这种对埃及独立的侵犯行为”。这一行动本来是想为最终接受英国要求找到一个较为体面的台阶,不料专横和不耐烦的兰普森决心采取直接而激烈的行动。因为从技术上看,最后通牒没有得到执行。一个营的英军和一队装甲车包围了阿卜丁宫。下午9点,兰普森由驻埃英军总指挥斯通将军陪同,在一队精心挑选并乘坐轻型装甲车的士官生的护送下,穿过宫门长驱直入。王宫卫队未作抵抗。先是有人把大使一伙人带到会客室,随后他们来到国王的书房。但据一位目击者说,宫门是用装甲车撞开的,保卫人员被缴了械。随后,兰普森在手握左轮手枪的



两位南非侍卫官的左右簇拥下，拨开宫中侍者，迅速冲到国王的书房。据说法鲁克已让3名握着手枪的阿尔巴尼亚警卫藏到了书房门帘后面。

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亵渎的仅是精神和道义。大使告诉国王，他必须任命纳哈斯为首相，并使其拥有自由选择内阁成员的权力，否则，他必须退位。经过短暂的犹豫，国王答应了英国的要求。

华夫脱党的确仍是埃及最受欢迎的政党。当隆美尔率领的轴心国军队长驱直入阿拉曼，英军正在考虑是否将总部撤出开罗以及盟军在世界各地均处于劣势的紧要关头，华夫脱党证明了自己是英国在战争中的有效盟友。但是，英国大使为把纳哈斯扶上台，暂时赢得这个重大利益所动用的手段（这个手段有无必要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带来的长期影响几乎摧毁了埃及整个现存政治结构及其与英国的关系。它为下一场推翻国王、华夫脱党和英国联盟的革命民族主义浪潮开辟了道路。由于纳哈斯是在英国的支持下上台的。因而，它削弱了华夫脱党的民族威望，毁掉了国王的信心以及他的声望。它也表明，1936年条约是建立在武力而非友谊基础上的。

不同的国家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同一事件，“阿卜丁宫政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多数英国人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对那些听说过的人来讲，这件事只不过是一部古老帝国历史的一个脚注，是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当时对埃及人来说，这是民族的耻辱和灾难。1942年2月4日成了埃及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

像其他军官一样，纳赛尔对阿卜丁宫的政变义愤填膺。这不是因为他对国王抱有爱心，而是因为他把这件事视为对整个国家的侮辱。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后来成为1952年军事政变的著名领导人，当时是一名陆军中校）向法鲁克国王写信要求辞职，国王未予接受。

一批革命军官聚集开罗，讨论是否要对英国实施报复，但要求

谨慎行事的意见占了上风。以后也没有发生过报复行动。然而，革命运动在军队中有了新的动力。纳赛尔和阿米尔下定决心，埃及再也不能遭受如此侮辱。民族独立运动此时已从舆论准备阶段转向采取军事行动阶段。

纳赛尔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军队在这场政变中无能为力感到羞愧。10天后，即他进一步了解了详情之后，他写信给朋友哈桑·纳萨尔说道：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信中所述详情使我义愤填膺。但是，面临既成事实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切。事实上，我认为英国已打出了他们手中唯一的一张王牌，他们只想威胁我们，假如他们知道有些埃及人想杀人，想以武力推翻他们，他们就会像妓女那样遭之大吉。这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习惯。这一事件对我们和军队是一个深深的震动。过去，军官们谈论的是快乐享受，现在他们谈论的是牺牲和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尊严……你看，尽管他们势单力薄，但后悔没有进行干预以恢复国家的尊严，用鲜血来维护国家的荣誉。但是，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纳赛尔又说，政变是“一次沉痛的教训”，它教育军队：“还有一种被称为尊严的东西，我们必须予以捍卫”。

从这封火气十足的信可以看出纳赛尔的许多性格特征：极强的自尊心，忠诚于民族尊严；易怒的情感与对实力状况的深思熟虑。他随后的行动表明，他时刻等待并耐心准备在一个更有利的时机采取行动。

纳赛尔集中精力悄悄为地下革命活动招募军官，但在这以后没几个月似乎出现了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1942年夏天，隆美尔进入埃及和德军横扫高加索似乎预示了盟军的失败和整个中东的丢弃。埃及军队中的革命团体计划从中捞取好处。他们本来准备在开罗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用阿里·马赫尔代替纳哈斯帕夏，并与

正在推进的轴心国军队联合起来把英军赶出埃及。这项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内部支持和与德国的外部联络。萨达特是联系这两股势力的核心人物，但联系均未成功。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领导人哈桑·巴纳态度友好但不愿承担义务。他最后主张军官们加入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建议遭到萨达特的拒绝，理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意识与我们根本不同，合并实际上是我党的自杀”。

与德国人联络时，萨达特则更不走运。1942年6月，隆美尔向开罗派出两个代表，他们通过另一名埃及军官哈桑·阿扎特少校与萨达特取得了联系。其中的一名代表汉斯·阿普勒（化名侯赛因·加法尔）的母亲是德国人，继父是埃及人。他在埃及接受过教育，讲一口标准的阿拉伯语。他和同伴身穿英国军装，乘坐一辆英国的汽车，取道西瓦绿洲穿过英军沙漠前线，随身带着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和4万英镑的假钞票。但从其他方面衡量，他们似乎训练不够，属于业余间谍。他们在开罗最著名的肚皮舞中心附近的一座宽敞的水上游艇上建立了总部并开始过上豪华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不久便引起英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并很快遭到逮捕。据萨达特所说，两个德国间谍后来谈到温斯顿·丘吉尔（1942年8月正在开罗，准备去参加莫斯科会议）亲自找他们谈话，答应免去他们的死罪。萨达特不久也遭逮捕。经过由两个英国情报人员和—一个埃及警官组成的特殊法庭的审判，1942年10月8日他被革职，囚禁在米纳赫的一个拘留营。萨达特力图隐瞒与军队革命团体的联系。

萨达特与两个德国间谍进行冒险活动时，纳赛尔不在埃及。他已晋升为陆军上尉，于1942年9月9日回到了苏丹。1943年2月7日，纳赛尔被任命为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后又回到开罗，这时，战争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军队立即发起革命运动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了。到1943年5月，德意两国军队被全部赶出了非洲和高加索，一年之后，盟军最终取得胜利的前景已渐明朗。尽管欧洲和远东仍有激战，但轴心国对中东的威胁已经消除。

这种前景导致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激进主义派别应放弃在英法的敌人帮助下消除旧的征服者——英国和法国的希望。尽管一些人已经在美国人，甚至俄国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有可能充当未来向英法施加压力的工具，但他们相信，现在他们得依靠自己；第二，提出战后政治要求的日子已经来到。因为除了像伊拉克的拉希德、耶路撒冷的穆夫蒂和埃及军官团体把赌注押在轴心国的胜利上之外，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公众舆论支持盟国或至少保持着善意中立，他们部分地希望这样的合作不但能确保国家生存，而且能确保战后在政治上最终得到承认。他们寻求的报答是那些依然处于托管制或限制性条约束缚的阿拉伯国家战后能获得充分的独立，首先是确保英国在 1939 年白皮书中制订的巴勒斯坦政策不会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下被抛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全部要求是立即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国家。他们至少要求履行白皮书，这将使犹太人的移居最终要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因此，这将保证除非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否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绝不会占据多数，也永远不会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部分地是基于对白皮书将得到履行的假设，部分是由于阿拉伯人在斗争中已经精疲力尽——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反抗者在大战爆发时就已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停战。

为了对付轴心国的宣传，确保阿拉伯人的合作，解除为数不多的盟军部队对当地安全承担的责任，加快夺取法国维希政权控制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在政策上对阿拉伯的民族独立愿望表示了泛泛的同情，同时力求避免承担具体的义务。英国对受其他一些国家控制的阿拉伯民族作了最慷慨的许诺，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实现了这些诺言，例如向利比亚的塞努西许诺把他们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给予独立；许诺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1943 年的独立仅是名义上的，真正的独立一直等到 1946 年英法军队全部撤离才实现。但是，埃及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为获得英



国答应战后撤军,废除 1936 年条约所作的努力没有得到英国的任何让步。英国人显然认为,埃及在军事上得到了英国的保护,战争表明条约对两国均有价值,埃及应对英国感激不尽才是。英国政府也回避阿拉伯领导人,特别是伊拉克的努里斯·赛义德为迫使英国遵循巴勒斯坦白皮书的坚定誓言而作出的努力。丘吉尔不赞成白皮书,他一贯是一个热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此外,尽管白皮书仍然代表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官方政策,但因丘吉尔有不同意见,英国政府实施起来就变得愈加困难。诸多报告逐渐透露德国在欧洲曾惨无人道地屠杀犹太人,因而,要求英国政府更大规模地向犹太移民开放巴勒斯坦大门的政治和道义压力很快增大。这种压力还得到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和一支强大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地下军事组织的支持。这一组织鼓励非法移民,准备一旦需要即针对白皮书政策发动一场武装起义。

早在 1942 年(这是决定盟国在中东的命运和埃及民族主义未来的关键性一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942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纽约巴尔的摩饭店召开的会议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采纳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协会主席戴维·本·古里安提出的纲领,主张在巴勒斯坦立即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犹太人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无限制的移民。这项纲领违背了查姆·魏茨曼博士早些时候提出的缓进策略,即在保留英国托管统治的同时,通过移民确立犹太人多数,逐步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犹太国家。本·古里安纲领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犹太人在欧洲遭到大屠杀所产生的新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再不能指望在英国的保护下通过移民逐渐占据人口的多数,因为 1939 年英国发表的白皮书已迫使英国当局回到限制移民、维持阿拉伯人多数的政策上。因此,从逻辑上讲,建立犹太人多数和一个犹太国家是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蔑视。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犹太当局已开始发展并加强当初为保护犹太人免受阿拉伯人进攻

而建立的地下军事武装。从1943年开始,另外两个更为极端的犹太人军事组织也加强了活动;1944年,这两个组织发动了恐怖主义袭击,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犹太人叛乱的第一枪。

英国对阿拉伯人采取的一个安抚性姿态是鼓励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早在1941年5月的一项声明中,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达了英国的同情。正是由于英国的同意,埃及首相纳哈斯帕夏于1943年7月采取主动,呼吁在亚历山大召开一次阿拉伯国家会议以讨论建立阿拉伯联盟事宜。1944年10月8日,签订了建立联盟的协定书。(联盟和宪章直到1945年3月22日在法鲁克国王和沙特国王会晤之后才生效。)但第二天,纳哈斯政府就遭法鲁克国王的解散。从前是英国的干涉扶植了纳哈斯,今天,又是英国人把纳哈斯赶下了台。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已经过去,华夫脱政府也越来越不受欢迎。

军队革命者的活动令人沮丧地陷入一片沉寂之中。1944年11月,萨达特逃出监狱,但因警察追踪而转入地下。纳赛尔的革命生涯和个人生活也进入了准备时期。在军事学院,纳赛尔讲授战术和轻型武器的使用方法,并为进入参谋学院深造作准备。他的朋友阿米尔是陆军管理学校的教员,他俩利用与军官候补生的关系,招募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参加秘密活动。哈立德·毛希丁就是纳赛尔当年招募的新成员中的一个,他在描述与纳赛尔的初次见面的情形时说,他是“一个自尊的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并且尊重他人的尊严”。

纳赛尔和阿密尔经常拜访的一个朋友——阿卜杜勒·卡齐姆,卡齐姆是一家小毛毡工厂的厂主,住在阿巴西亚附近,与军事学院同属一个区。他是一位拥有伊朗国籍的茶叶商的儿子,是纳赛尔的叔叔哈利勒·侯赛因的朋友。他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已经去世,只有另一个妹妹塔西娅与他住在一起。塔西娅长得美丽动人,一头乌发,性格恬静。她过着舒适的生活,因为她父亲每年从股票收入中分给她8000英镑(每个月200美元)。纳赛尔和塔西娅相识一年

后便结了婚,当时她 22 岁,纳赛尔 26 岁。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出生在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她为纳赛尔繁忙的密谋活动和日后公开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平静稳定的家庭环境。

据纳赛尔说,她在婚后 3 个月发现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东西”。但她极为谨慎,没有张扬,也没有过问。有时她还帮助密谋者送送信件。她把主要精力花在家庭和后来出世的 5 个孩子身上。即便在纳赛尔投身于公共事务并赢得声望之后,她仍然按照穆斯林的传统方式,默默地过着鲜为埃及公众所知的生活。

## 第三章

### 幻想、失败和密谋(1946—194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赛尔年方 26 岁，刚结婚组成了家庭。他在军队中进步很快，跨进参谋学院时已是少校。他是一个忠诚和有能力的军官，个性很强，思维敏锐，但缺乏实战经验。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主要战场之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充当了一个旁观者，他对作战双方都没有寄予多少同情。被埃及人视为占领者而非保护者的英国遭到的削弱和失败，使他，或者至少是他的团体中的某些人从政治上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机会。就像其他显赫人物和消息灵通人士一样，纳赛尔等人错误地估计了和这件事有关的国际势力有多么强大。战后，纳赛尔和朋友们看到周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这是一个带着病态和不公正的世界，而他们看来无力改变它，至少在未来几年是如此。

从外表上看，纳赛尔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职业军人。他住在开罗郊区靠近军事学院的一所小屋中，业余时间用来看书学习、看电影、拜访同事和朋友。他内心充满政治热情但从不外露。他开始秘密地筹划一个革命组织，将自己的满腔感情逐渐化作公开的行动。除了把英国赶出埃及之外，当时他的心中是否还有一个长期计划或清晰的目标是值得怀疑的，但他对战争结束时本该自由的埃及继续受他人统治而产生的沮丧和愤懑在埃及和整个中东地区都引起了共鸣。

埃及再次处于革命的骚动之中。1919 年开始，因 1936 年条约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暂告平息的民族革命从 1952 年 7 月的军事政变开始又掀起了第二次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处于一种奇怪的地位。它既不是战胜国,也不是战败国或中立国。它像土耳其一样于 1945 年单方面对德国和日本宣战,试图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宣战使阿里·马赫尔首相失去了生命:当他离开议会时遭到一个年轻的民族主义律师的暗杀。作为一个不太情愿的盟国,埃及的战争履历中夹杂着在危机关头与英国耍两面派和大胆合作的双重色彩。从表面上看,埃及在 1945 年的形势与 1919 年时截然不同,它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有国王和议会的独立主权国家。因而,从名义上看,1919 年革命达到了两个主要目标——民族独立和建立议会政府。但从另一方面看,它现在的处境和 1919 年时并没有什么不同。大批英军仍然驻扎在埃及各地——不仅仅驻在苏伊士运河区,也没有限制在 1936 年条约规定的一万人之内。

外国军队和当地百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由于盟军通常只看到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中最落后的一面,这种冲突有增无减。对于多数英军士兵来说,埃及人只不过是一群卑劣、肮脏和背信弃义的“中东人”。当这些英军士兵若干年后回到国内时,他们的这种看法将会成为促使英埃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精神遗产。

1942 年 2 月的阿卜丁宫政变只是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主要例子,它表明埃及的宪法和主权仅是徒有其名。英国人仍是真正的统治者。尽管埃及的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生活费用暴涨。战争期间埃及挣得的 3 亿英镑资金在使用上受到英国的限制。英国出于自身的经济或政治目的将这笔资金用来救济他人。战时繁荣的结束意味着失业的增加。

人们再也不相信旧的政党和政治体制了。在年轻一代人的眼中,1919 年革命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既没有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也没有建立真正的议会制。除了这些目标之外,近年来又增添迫切要求解决埃及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呼声:城市和人口的增加

和正在扩大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影响。此外,由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半心半意地认为外交上应承担一些义务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其中最急迫的是巴勒斯坦问题。

新的革命浪潮旨在实现埃及的真正独立,建立一个能代表人民利益,能解决卫生、教育、住房和就业等迫切问题的有效的政治体制,并能在新生的阿拉伯世界中发挥埃及的领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受过教育的埃及人首先寻找的是在半个世纪以来令人沮丧的斗争中失去的自尊。

埃及新的政治运动受到了各种力量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和力量日益增大的左翼团体。左翼团体包括的范围极广,其中有规模很小的地下共产党,有“旅伴”,有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会,还有由年轻的华夫脱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左派。俄国作为盟国在战时受人尊重的表现以及英国和西欧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刺激了左派的成长。艾哈迈德·侯赛因的“青年埃及”运动起源于法西斯主义,但现在也转而采取比较左倾的民族主义路线并改名为伊斯兰社会主义党。极端右翼势力只剩下穆斯塔法·卡迈勒领导的民族党残余分子。所有这些团体都有某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憎恨西方帝国主义,希望永远消除英国军队的存在;它们对英国的动机和影响表示出的深深怀疑导致他们采取了声称埃及对苏丹拥有主权的错误政策,这一政策中混杂着法鲁克国王的虚荣心;它们蔑视埃及的议会制,将其看作是建立在与英国合作基础上的虚伪的机构。(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多次自愿与国王合作,有些革命军官甚至对恢复活力的华夫脱党仍抱有希望。)它们中的多数团体,特别是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右翼团体,对暴力和阴谋有共同的兴趣,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些团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新型的领导阶层。包括华夫脱党在内的旧式政党,领导成员过去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中的精英分子和产生于赫迪夫和克雷默统治时期的官僚阶层和专业人员中的精英。现在,领导人一部分来自社会地位低下的律师,更多的是中产阶级中

的专业人员、商人，还有一些是工人。

军队和纳赛尔的军官团体在这场骚动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许多人在革命后对纳赛尔在军队搞的秘密活动做了描述。例如，安瓦尔·萨达特所著《尼罗河上的暴动》把它描写为在纳赛尔富有远见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明确的、一贯的、有计划的行动。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纳赛尔本人的叙述也许更为令人信服地反映出当时对形势判断的模糊，人员临时东拼西凑以及行为和思想方式仍处于摸索阶段的状况。埃及当时的状况就是如此混乱。例如，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先后顺序已记忆不清的萨达特描述了1945年为何成为“我们秘密准备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从现在起，我们根据精心制定的计划、为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行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审时度势，选择时机，一旦他发出信号，即开始为自由而战”。萨达特说，纳赛尔采纳了一种逐渐渗透、避免鲁莽冲动的理论。当萨达特听说埃及首相穆罕默德·努克拉西向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提出埃及的民族独立要求而遭到冷遇后，他提出炸毁英国大使馆的建议，但纳赛尔很快就否决了这一建议。纳赛尔想到了1924年统帅埃及军队的英国司令官李·斯塔克爵士被暗杀之后英国的报复行为。

纳赛尔的团体一开始分成两个部分，即以纳赛尔为首的军事部和以萨达特为首的民政部。纳赛尔还为他的组织设立了一个管理体系，把它分为五个部门，分别掌管经济事务、作战人员、安全、恐怖活动和宣传。很难了解这些活动进行得究竟有多么认真。例如，经济部处理的不是未来的经济政策，而是为本组织寻找资助和帮助任何一位坐牢者的家属。根据萨达特的回忆，恐怖活动部采取的一次最激烈的行动是一个海上警卫队员向华夫脱党的头头纳哈斯帕夏扔了一只鞋！后来在1952年革命前不久，纳赛尔和其他一些人的确曾试图暗杀在军队中最令人憎恨、最腐败的侯赛因·赛利·阿密尔将军，但没有成功。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以一段很长而且很感人的话描写了他们的一次伏击过程以及当纳赛尔听

到被害者的妻儿发出的尖叫之后所产生的懊悔。他谈到，当听说被刺人幸存下来后他感到极为宽慰并且更加坚信这样的暗杀不能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他回忆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曾认真考虑过一个暗杀国王以及 30 个有关的主要政治家的建议，但没有采纳。

由于保密的需要以及宣传活动必须以个人接触和讨论的方式进行，因而宣传部的工作受到了阻碍。1949 年巴勒斯坦战争之后，这个组织得到了壮大，直到此时宣传活动才可以公开进行，甚至可以散发一些印有“自由军官”字样的油印品。在 5 个部门中，最重要的部门似乎是安全部，它负责招募新成员；还有作战人员部，它负责装备和训练。战后建立的基层组织直到 1949 年后才得到真正的发展。每 5 名成员组成一个基层组织，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所属组织的成员，本人招集的其他成员组成另一个基层组织。与军队各部门的联络也建立了起来。只有纳赛尔和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知道确切的人数和所有成员的名单。在顶峰期，这个组织大约有 1000 名成员，其中几百人是军人，但真正的积极分子只有百十人。每个成员按月交纳应急基金。用这点微不足道的资金，再加上出售他们“精神上的良师益友”、退役的阿齐兹·米斯里将军农田里丰收的芒果的收入，他们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小车间制造手枪，用成千上万个可口可乐瓶生产莫洛托夫式手榴弹。

有关作战人员部的情况以及该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如何也不清楚。纳赛尔团体中有几名军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或者是它的同情者。纳赛尔反对与穆斯林兄弟会合并，但同意在军事训练上与之合作。这种合作显然也是粗略的，因为军官们对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首领要他们绝对服从的要求及其目标的含糊深感不满。在 1947 年底埃及志愿人员准备前往巴勒斯坦参战以支持阿拉伯非正规军时，这两个组织间的合作最为密切；当穆斯林兄弟会很快转入恐怖主义活动并遭到政府镇压时，两者的关系就中断了。

但是，至少在战后初期，纳赛尔的团体可能只是军队中几个团



体中的一个，它的成员分布的范围不广，组织不太严密，影响也不大。在埃及当时的议会制度下，主要的反对派仍然是华夫脱党，尽管它已蜕变为一个由富人统治的政党，失去了一些群众基础。议会外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反帝阵营”。由于英国和埃及官方又一次未能找到一个军事和外交上的权宜之计以迎合当时人们的迫切希望并消除人们的忧虑，这个阵营得到了迅猛发展。

1945年12月20日，接替被暗杀的朋友和同事阿里·马赫尔担任首相的穆罕默德·努克拉西正式向英国提出为修改1936年条约而进行谈判的要求，埃及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努克拉西要求英军迅速彻底地从埃及和苏丹撤军，在埃及王朝统治下实现两国的统一。这个要求广泛体现在“撤军”和“尼罗河谷统一”的口号中，它进一步显示出法鲁克国王渴望保持他对苏丹的宗主权的心情。埃及人同时怀疑苏丹的自治努力是英国为取消埃及在那里的共管权，建立一个只与英国发生联系但与埃及分离的苏丹国而搞的一个阴谋。在野的华夫脱党在左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下采取了一项中立政策。它拒绝与英国建立新的联盟或做出共同防御安排，甚至拒绝就这些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努克拉西向英国提出的建议遭到了冷遇。英国人同意举行会谈，但同时又声明他们认为战争的经历已表明1936年条约的原则是可行的。这种答复竟然来自埃及寄予厚望的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因而它使埃及人感到了双重失望。它导致了开罗严重的学生骚乱——警察开枪造成了死伤达170人的“阿巴斯大桥大屠杀”——和亚历山大及其他地区的工人骚乱。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也相继出现。为了发泄义愤，人们向英军投掷炸弹并以其他方式进行攻击，但一些英军仍然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不走。

努克拉西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是伊思梅尔·西德基。这位30年代的强人现在仍然聪明狡诈、残酷无情，但毕竟已是71岁高龄，健康状况也不佳。他在以惯用的铁腕镇压了骚乱的同时也试图解

决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并且重新开始了与英国的谈判。

会谈是在中东和全世界形势发生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举行的。1919年，埃及需要对付的只是一个英国。那时，法国专注于地中海东部国家奥斯曼帝国的那部分领地；美国和俄国的势力还没有延伸到阿拉伯地区；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还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联系。现在，法国彻底撤离出中东，美国和俄国开始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个独立程度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体系正在形成。尽管埃及在英国的支持下充当了新的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但就像法国人在英国的压力下，不情愿地刚刚离开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一样，她也仍没有获得独立。伊拉克和约旦则像埃及一样，名义上取得了独立，实际上由于条约束缚而依附于英国。利比亚已经有望获得自由。在巴勒斯坦，65万犹太人自己行动起来。他们曾在希特勒的屠杀中陷入绝望，现在又投入到要求建立国家的反英起义之中。但是，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也要求至少获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同等的独立。

中东反帝暴动是整个亚洲，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那反对欧洲统治的广泛起义的一部分。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法国力图卷土重来，确立其在北非的统治。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短时期（或许是一两年）内，英国在中东和多数阿拉伯国家实力地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将之迅速和富有想象力地加以利用，英国可以用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的方式解决除巴勒斯坦之外其余中东国家的政治问题，从而也许能够限制巴勒斯坦冲突的影响。但是，这种实力的基础是脆弱而短暂的。被战争弄得疲弱不堪的英国经济无法长期支撑英国在中东的军事机器，特别是在印度撤军和失去印度军队之后。英国被迫要求美国给予帮助以应付希腊内战，支持土耳其和伊朗，对付俄国战后施加的压力。英国需要的这种支持和经济援助意味着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必须更多地倾听美国的意见，并且必须面对美国公开从政治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一事实。

因而，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日后表现为阿以冲突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与英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自身之间的关系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巴勒斯坦争端对英国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实施由他本人倡导、其继任者大致予以承认的广泛的中东政策形成了一个重大障碍。这一政策旨在通过制订和平时期英国从阿拉伯国家全部或大部撤军的新条约体系使英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平等的基础。但是，在处理埃及问题时英国面临的障碍不是巴勒斯坦问题，而是它仍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它对自己在中东的实力地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事实仍缺乏彻底的认识。假如它修改过的联盟条约仍不被接受，那么它仍然指望依靠现存的军事地位、基地和旧的条约。它没有认识到，一旦自己再也不能或者再也不愿以武力来统治，就只能在具有共同利益这一基础上保证自己的军队能继续留在阿拉伯国家。曾于1948年率领英国第一个缔约代表团访问埃及的斯坦兹盖特爵士后来说道：“假如我们接受了英军只有得到埃及政府同意方可留在埃及的原则，协定一个月内就能达成。”例如，不管双方对埃及1936年条约的延续问题在法律上存在何种细微分歧，政治和军事的现实是——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支没有得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同意、无视其要求撤军的愿望而呆在这个国家的军队，即便法律上没有规定，实际上也已成了一支占领军而非盟军。这样一支军队和它所属的国家要么强大到足以孤注一掷的全部接管占领国，否则，驻地终将陷入重围，战略上就会处于劣势，就不再是一种资本。对战后中东这个事实予以论证的第一个人既非埃及人，也非阿拉伯人，而是巴勒斯坦犹太人。英国军队远没有强大到足以独自接管埃及的程度，但它的力量却足以阻止苏伊士运河的收回，给试图驱逐它的人以沉重的打击并使埃及无法为他人所管。战后，任何一届埃及政府欲想长期执政，至少得试图争取实现英军撤离。既然埃及无法强大到足以驱逐英国，那它只有两个方针可供选择：要么付出政治和军事代价用谈判来实现英国撤离，要么迫使英国为保

持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付出昂贵但徒劳无益的代价,从而最终下决心自动撤离。从1946年到1951年,埃及进行过多次谈判尝试,但英方对军事联盟和苏丹的地位这两项条件开价太高,埃及政府无法接受,因而也无法存在下去。1951年,华夫脱党采取了第二条方针:试图通过不合作和游击队的困扰,迫使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基地劳而无益。但这项政策失去了控制,它打倒了华夫脱党自己,加速了埃及革命,却未能把英国驱逐出去。最后,英国人和纳赛尔终于在1954年签订了协议,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就在于纳赛尔把从前的谈判战略和游击战争的威慑结合起来使用的缘故。

在1952年革命之前,最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的是1946年9月西德基和贝文之间拟定的条约草案。但这一草案终因有关苏丹的条款而破裂。西德基辞职后,穆罕默德·努克拉西又重新担任了首相。1947年1月,克努拉西宣布把争执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与此同时,贝文告诉英国下院,英国将继续恪守1936年条约,等待埃及有一个“更能代表民意的政府”来重新开始谈判。但英国不会简单地一走了之而“留下一个真空”。两个星期之后,即1947年2月18日,贝文宣布英国将把巴勒斯坦争端递交联合国,明确暗示英国将准备推卸义务,从巴勒斯坦撤出。同一年,英国开始从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缅甸撤退。由于承诺不断增多,实力却不断下降,英国开始大规模循序渐进地撤退。在埃及和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英国在此后10年之内只实现了一半诺言,而实力也只削减了一半。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这些国家还不够强大;另一个原因是,在工党政府看来,英国工人的福利远比消除帝国主义势力更为重要:中东的石油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从印度获得的任何利润。此外,中东也容易受到俄国的影响。

联合国无力帮助埃及解决自身的问题,也无力帮助英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9月,安理会最终听取了埃及的抱怨,但没有做出任何结论。法律依据受到巧妙的平衡。埃及有强硬的政治和道义理由要求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但在苏丹问题上,埃及



在道义上处于劣势。它对苏丹的政策十分混乱，显然它反对英国提出的让苏丹自治的倡议。不管怎样，当时的联合国仍处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有关埃及问题的重要决议如不符合英国的愿望即不能获得通过，除非美国对决议予以支持。但美国当时对埃及不感兴趣。出于战略考虑，美国在中东关心的是土耳其和伊朗；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它关心的则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出于石油利益的考虑，它关心的是沙特阿拉伯。除此之外，它宁愿让英国人去关心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不过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美俄两国的支持确保不受英国欢迎的决议能够通过。

1947年11月联合国全体大会决定同意把巴勒斯坦划分为独立的犹太人和阿拉伯国家。这一决定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愤怒，埃及民族主义者遭到安理会断然拒绝后产生的失落感顿时消失了。阿拉伯人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和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事实，还因为分治的性质是极不公平的。未来的犹太国将获得几乎与犹太人数量相等的阿拉伯人口和巴勒斯坦大部分较为肥沃的土地。而阿拉伯国家分得的只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一一半的阿拉伯人和大部分是贫瘠的山陵的部分土地。此外犹太国早就获得了内格夫的南部沙漠三角地带，从而割断了埃及与北、东部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

阿拉伯联盟决定反对分治计划，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它以灾难性的悠闲速度安排招募志愿人员加入一支非官方的“解放军”，以此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947年底，即在英国托管中止前的5个月，阿拉伯国家的正规部队进入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战争早已开始。在此之前，随着英国集中精力进行最后撤离工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了控制英军撤走后的领土已与犹太人的武装组织发生了冲突。

埃及不缺乏战争志愿人员。穆斯林兄弟会站在应征的最前列，但在官方的鼓励下，从军队中也招募了一批志愿人员。纳吉布将军曾描绘过他统率的整个营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志愿人员中的情景。

在过去的一年中，纳赛尔的团体几乎没进行什么活动。政治警察密切注视着军队，跟踪着他们。他们几乎不召开会议，纳赛尔本人则专心致志准备参谋学院的最后考试。他在心中盘算着是否应放弃考试加入志愿前往巴勒斯坦的军官行列，还是再等上个把月。分治决议做出后的第二天他就在紧挨开罗的宰敦会见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袖莫夫丁，向他提出他和他的同僚可以从事志愿人员或教员的工作。莫夫丁回答说这必须征得埃及政府的许可。但像纳赛尔这样的人早已被禁止参加。在阿拉伯联盟正式同意建立一支志愿的“阿拉伯解放军”前往巴勒斯坦之后，纳赛尔是否该脱下军装，加入战争呢？1948年3月，在纳赛尔的住所召开的一次“自由军官”组织的会议决定，一些成员立即加入游击队，其他人则等待下一轮。

加麦尔·埃丁·侯赛因立即动身加入了埃及上校阿卜杜勒·阿齐兹率领的战斗在希布伦附近的志愿军。早些时候，纳赛尔组织中的两名空军军官，阿卜杜勒·拉蒂夫·巴格达迪和侯赛因·易卜拉欣已去了大马士革，准备为法齐·卡乌基率领的正在叙利亚集结和训练的非正规军“阿拉伯解放军”提供空中支援。没过几个星期，纳赛尔和他的朋友查卡里亚·毛希丁、阿卜杜勒·哈蒂姆·阿米尔以及其他一些人作为埃及正规军的一部分也踏上了奔赴巴勒斯坦的征程，因为埃及政府犹豫再三后，决定由官方公开进行干涉，以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就在这个决定作出前几天，首相努克拉西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参议院，埃及将不准备公开干涉，理由是军事上未作好准备。努克拉西还谈到了埃军领导人的建议。已被任命为埃及远征军副司令的纳吉布反对公开干涉。他认为，埃及的行动应限于对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非官方支持。他后来评论说，埃及不可能赢得战争，但也不能遭到惨败。不过，努克拉西很快改变了立场，这显然是由于法鲁克国王的压力所致。埃军受命于5月16日——英国托管结束前一天进入巴勒斯坦。

努克拉西显然已向因缺乏大战准备而有所顾虑的军方领导人作了保证,参战的主要目的是占领领土以提出政治要求,因此预计不会打多少恶仗。干涉的表面理由是保护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但某些因素似乎也促成了国王的决定,希望转移国内激烈的革命热情就是其中之一。但首要的原因是公众普遍认为支持和保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需要阿拉伯军队的干预。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当时英国人仍滞留在那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损失已极为惨重。犹太人已能夺取像雅法那样的重要城市和阿拉伯所属海法地区以及耶路撒冷新区。在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或遭驱逐或惊慌出逃。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德尔雅辛,250名阿拉伯村民遭到屠杀。它与其他暴行一起激起了埃及强烈的公众舆论。第二个原因是维护埃及作为阿拉伯联盟最重要国家的尊严问题。第三个原因是阿拉伯巴勒斯坦的未来地位问题。

阿拉伯联盟内部开始分裂为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个是与英国结成紧密联盟的大约旦和伊拉克的哈希米德统治者,他们赞成建立一个以“新沃土地带”为基础的阿拉伯联合;另一个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它们反对哈希米德的计划,想在埃及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广泛而又松散的阿拉伯联盟。黎巴嫩巧妙地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保持了中立,而叙利亚的路线则随着大马士革掌权者的更迭而不断改变。有迹象表明,大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利用英国统率和资助的阿拉伯军团,对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至少是对分治计划中划归阿拉伯人的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然后,他又进一步把1947年2月宣布的大叙利亚计划发展为赞成大叙利亚(由叙利亚、大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和伊拉克组成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将存在自治的犹太人和黎巴嫩基督教国家。在未能与埃及达成协议的英国看来,这也是一个合乎逻辑和切合实际的想法。贝文同意阿拉伯军团开进巴勒斯坦,只要它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分治计划中划给阿拉伯人的地区。因此,埃及进行干预的一个动机是阻止阿卜杜拉夺取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全部或大部领土。另一个动机是确保阿拉伯人控制埃

及和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陆上通道内格夫地区。

不管有没有合理的政策考虑和来自王室野心的压力，公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寄予的同情可能迟早会迫使埃及政府予以干预。

巴勒斯坦战争产生了许多传说，迄今为止阿拉伯历史学家仍没有对这场战争作出全面认真的叙述更助长了传说的增加。最有煽动性的是失败国家中妇孺皆知的“遭人暗算”的传说。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埃及军队5月16日进入巴勒斯坦本土时，它并没有明确的军事或政治目的。此外，它的战斗力量十分弱小，甚至在和以色列交战中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而后者是刚刚成立的国家，武器严重不足，正处于重新组建军队的阵痛之中，其人口也只有埃及的1/3。在巴勒斯坦战斗的7支不同的阿拉伯武装力量之间没有认真的合作。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阿拉伯正规军比以色列拥有更多的重型武器，特别是炮兵、坦克和飞机。不过，双方动员和投入战场的人数甚为接近。人数略少的以色列军队具备号令一致、政治及战略目标明确、内部通信距离短而严密的优势，某些部队还训练有素，有较为丰富的现代战争经验。他们在统帅、筹划、组织上都胜过除大约旦阿拉伯军团以外的所有阿拉伯军队。单个看来双方的作战人员都很勇敢。埃及人擅长防卫，以色列人对涉及的问题有更强的亲身感受和政治意识，因此既能拼死坚守具有政治价值的阵地，又能更主动、更大胆地发动攻击。

战争初期，埃军共有9支部队，4支投入巴勒斯坦战争，3支用于主动出击，另外的用作预备队。此外，埃及还有一支同等人数的志愿军，其中大多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们已在南巴勒斯坦希布伦地区作战。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埃及在巴勒斯坦共有4万人。

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共打了4次战役，其间的几次停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一次战役是向巴勒斯坦西部的推进，战线从地中海海边岛屿伊斯杜德（今天以色列的阿什杜德城）穿过马杰



达勒、法卢贾、贝特贾夫林到伯利垣和耶路撒冷的南郊。

纳赛尔和纳吉布都在战争回忆录中描述了埃及在战争开始时那种混乱和缺乏准备的情况。纳吉布回忆道，他乘火车越过埃及边境后不得不雇用当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卡车运送军队继续前进。由于没有牵引车，他们不得不丢弃了一些可发射 6 磅重炮弹的大炮。英国制造的枪枝时常缺少弹药，英美的坦克则缺少零件。在第一次停战期间，双方避开联合国正式的武器禁运协定，在国际黑市上疯狂购买武器。埃及买回了在投掷者脸上爆炸的意大利手榴弹、过时的西班牙野战炮和 1912 年造的毛瑟枪。士兵们本来就怀疑文职人员在他们背后趁机捞取好处，此时他们更确信国王和政府从购买武器中谋取了暴利。

纳赛尔的描述说，部队从来没有吃过一顿热饭。当他和他的队伍赶到加沙时，只得到 1000 英镑的货币用于购买当地的乳酪和橄榄油，算作是士兵们的给养。他抱怨开罗指挥战争的命令矛盾百出。在战争初期，埃及步兵在没有坦克掩护，甚至在没有事先侦察的情况下向工事坚固的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注意到开罗电台总是不真实地广播埃军取得了不断胜利的消息，而一般士兵根本不知道战争的原因。他问过一位士兵：在他看来，他们是在干什么。这位士兵回答说，他们当然是在“进行拉比基军事演习”（埃军每年都要在苏伊士运河东边的拉比基举行一次军事演习）。

为了能参加战斗，纳赛尔提前从参谋学院毕业。他告别了因两个女儿的出世而扩大的家庭，坐火车前往加沙。在列车上，他遇到了阿米尔和查卡里亚·毛希丁，他们也准备加入在前线的队伍。他们忧心忡忡地在一起研究地图，讨论作战方法。

纳赛尔作为一个少校参谋隶属于移至伊斯杜德（加沙）的第六军。在那里，他注意到埃及军队极为懒散，没有利用 6、7 月份的第一次停战间隙训练军队并加固自己的阵地。相比之下，以军的活动颇为频繁。他把这种反差部分地归咎于造成埃军士气低落的认识，即这是一场“政治战争”，其结果不在于士兵在战场上取得多大成

就，而在于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大国在联合国幕后的政治角逐。

纳赛尔对战争前景深感忧虑。他批评那种出于政治目的、由小部分埃军组成小分队四处出击以占领更多的领土、从而没有一支快速机动部队作后盾的做法。在伊斯杜德的橙园，他与阿米尔躺在行军床上，望着满天繁星彻夜长谈。他感到阿米尔抱有一种乐观态度，而且平静悠闲。

主要是因为埃及和叙利亚的坚持，阿拉伯人拒绝恢复第一个月的停战。埃及公众希望取得胜利。阿拉伯领导人也认为，以色列从停战中捞取的利益比自己多。由于采购团勤奋而有效的工作，尽管联合国实行武器禁运，以色列还是通过走私运进大量的武器。许多武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7月，埃及重新投入战斗时，以色列力量已明显增强，埃军则几乎毫无进展。在争夺内格巴要塞的战斗中，埃及丢掉了一些阵地。

在埃军对内格巴不成功的进攻中，纳赛尔被一块飞弹碎片击中受了轻伤。在住院治疗中，他注意到医疗条件极为糟糕，而内格巴战役负伤的战士正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他陷入沉思并在日后写道：

我厌恶战争……我对自己说，如果仁慈无力争取到和平，它就不值得存在。（当他获悉一位朋友阵亡的消息时写道）我发誓，有朝一日身居要职，我要考虑上千次以决定是否让士兵投入战争。只有绝对必要，国家受到威胁，除了战争以外无法挽救国家时，我才这样做。

在7月18日至10月15日第二次停战期间，纳赛尔回到开罗作为期4天的休假。9月9日回到巴勒斯坦后，他的部队移防巴勒斯坦内地，加入了以苏丹人塔哈贝为旅长的部队。这个旅驻守在包括极重要的法鲁耶十字路口在内的前线核心地区。在法鲁耶地区，

中巴勒斯坦与内格夫之间的南北向道路与东西主干线相交,后者从加沙开始,途经马杰达勒、贝特贾夫林穿过埃及前线的侧翼到达希布伦。在法鲁耶地区的一群阿拉伯小村庄中,伊拉克苏米达西边的警察哨所和伊拉克曼希亚东边的村庄是最关键的地区。纳赛尔所在的6营驻守在伊拉克曼希亚,负责保持贝特贾夫林与希布伦山之间埃军的联系。正是在这里,纳赛尔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经验,第一次经历了与以色列人的直接谈判。

在第二次停战期间,国际政治中的新动向开始影响到军事形势和双方的计划。1948年7月,联合国调解员、瑞士的伯纳多特伯爵提出一项政治解决计划。在伯纳多特于9月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之后,这项计划经过修改后(它提出耶路撒冷国际化而不划给大约旦)予以公布。它把内格夫划给阿拉伯人——后来成为约旦王国的大约旦和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统一体。1947年分治计划中划给阿拉伯人的西加利利则给了以色列。这项计划使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内格夫。但伯纳多特计划也扩大了阿拉伯政府之间,主要是埃及和大约旦之间早已存在的政治分歧,因为它把阿拉伯巴勒斯坦这块最大的份额给了阿卜杜拉国王。

这些政治事件对军事行动产生的影响不久就显示出来。10月15日,以色列以埃及对根据停战协定南下内格夫据点的一支以色列护送队进行了干涉(埃及人宣称,护送队通常无视停战协定,伪装成非军事性质的运输队走私武器)为借口,发动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大规模反击,目的是把埃及人驱逐出内格夫地区。

以色列向伊拉克曼希亚和伊拉克苏米达地区埃军战线的两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驻守在法鲁耶的全旅官兵顽强抵抗。经过一次反击后,伊拉克曼希亚才得以守住。伊拉克苏米达要塞抵抗住了6次进攻。在第7次亦即最后一次进攻中,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炮火倾泻在这一地区。埃军被迫放弃了阵地。这样,以色列人便切断了法鲁耶旅与加沙和马杰达勒之间的联系。10月21日,这个旅接

到埃及最高司令部发来的命令，要求做好撤退准备以免遭到彻底包围。但后来又改变了命令。当10月23日再次更改命令时，以色列人已完成了对法鲁耶这块弹丸之地的包围。

以色列人要求被包围在法鲁耶的军队投降。在白旗下，双方阵地上的指挥官以及塔哈贝旅长和以色列前线指挥官伊格尔·阿隆中校举行了会谈。纳赛尔作为参谋人员出席了较高级别的会谈。在巴勒斯坦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段话中，纳赛尔描绘了首次会谈的情景。10月24日，一辆以色列装甲车飘着白旗向埃及阵地接近，大喇叭里传出一阵喊声：“以色列军官想会见埃及军官。”纳赛尔和其他两名军官及一名带冲锋枪的中士跳上一辆吉普车。一名以色列军官从装甲车车身中探出头来，傲慢地用英语说：“我是统帅这一战区的总指挥助理，我奉命向你们阐明你们的处境，你们已遭到四面包围，我劝你们还是投降吧！”

纳赛尔答道：“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我们的处境。但是我们决不投降……我们要捍卫我军的荣誉。”以色列军官随后“不太傲慢”地先用阿拉伯语然后再次用英语要求投降。当纳赛尔强调决不投降时，以色列人“较为客气地”请求允许寻找以色列死者的尸体。纳赛尔同意了。

正是在这些停战谈判中，纳赛尔碰到了日后晋升为中校的莫迪凯·科恩上尉。科恩在阿隆的参谋部任职，是一个出生在也门会讲阿拉伯语的以色列人。科恩后来在《犹太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到他与纳赛尔的谈话。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以下一段话：

只要我们在一起，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肯定会跟我讨论反英斗争话题：如何组织秘密反英抵抗运动以及如何成功地动员世界舆论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英国。

据伊格尔·阿隆本人的日记记载，纳赛尔的个性及敏锐在当



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拉伯国家政治分歧的另一个结果是,无论在10月份的反攻中还是在12月份以色列发动的最后进攻期间,埃军都没有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到任何认真的支持。1948年12月22日以色列发动了新的进攻,旨在消灭埃及军队,把它从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分治计划宣称是自己的领土上驱逐出去,迫使埃及同意和谈。以色列的主要攻势是向南部的内地推进,然后从东向海边进攻,把埃及所有的远征军切割成两半。以军用坦克沿着古罗马大道迂回穿过了沙漠,夺取了西奈边境上的要塞阿斯鲁加和奥贾。埃军因后方受到攻击而大吃一惊。以色列人迅速扑向海边并突入拉法郊区和埃及的阿里什基地。这时,在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的支持下,英国向以色列发出了一份实际上的最后通牒,命令以军撤出埃及领土。以军停止了攻击。在奥贾,埃及军队开战以来首次变得毫无组织,士气低落,以致许多军队缴械投降。但在加沙—拉法地区,埃军继续奋战,法鲁耶这块弹丸之地多次抵抗住了猛烈的进攻。大量空军和炮兵的炸弹覆盖了整个地区。12月28日凌晨2点,以色列对纳赛尔镇守的伊拉克曼希亚发动了一场强大的攻势。在夜色、薄雾和瓢泼大雨的掩护下,以色列人成功地从两处渗入埃军防线。纳赛尔用包括厨师在内的大约100名后备人员,在1.5英里以外的法鲁耶阵地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密集火力掩护下发动了一场反攻。当以色列人在黎明前再度发起进攻时,遭到了埃军的猛烈炮击,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以军受重创而退。

法鲁耶要塞保住了,埃及远征军的其余部队却面临与埃及本土完全断绝联系的威胁,物资和通讯已全部中断。1949年1月7日,埃及政府要求进行停战谈判。停战谈判在罗得岛联合国总部进行,接替伯纳多特担任调停人的拉尔夫·本奇博士担任主席。停战协定于1949年2月24日签订,加沙地带留给了埃及。在奥贾战略重地建立了非军事区。上述两地区日后成了冲突的根源。在整个内格夫地区,除了连接亚喀巴湾的东南狭长地带以外,均落在以色

列手中。这块狭长地带后来在与大约旦进行停战谈判期间被以色列用一次突然的强行推进所夺取。

作为埃以停战协定的一部分，法鲁耶驻军带着战争的荣誉，带着武器和飘扬的彩旗，在其勇敢抵抗得到承认之后撤出阵地。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遭到了惨败。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75万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半数以上)被赶出了家园。在一个他们占据其人口2/3多数的国家里，他们失去了大部分主要的城镇、所有主要的海港和铁路、大部分的沃土和水资源。埃及没有失去国土，但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大大改变了。新的以色列国在领土上把它与亚洲的阿拉伯国家分割开来并控制着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国家之间的南北交通。一个带着精悍的扩张本性、为阿拉伯国家所担忧的非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边境建立起来了，它占据了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战略地区。从对埃及人的心理影响来看，这场战争的结果可以与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败相比。

作为法鲁耶的英勇保卫者之一，纳赛尔不久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归故里。就像其他归来的士兵一样，纳赛尔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埃及。但是，他比以往更加坚信，埃及的一切必须改变。

## 第四章

### 通往革命之路(1949—1952)

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常常被认为是战后阿拉伯东方政治史上的一个分界线。然而，它并不是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国家诸多革命和军事政变的真正原因，它只是加速了已经开始的革命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管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者还是合作者，曾同英法帝国主义列强打交道的旧王朝统治者们均受到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挑战。后者的目标不仅是要实现彻底独立，而且还要进行社会革命以及在阿拉伯国家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统一。

人们已经明白并汲取了巴勒斯坦之役的惨痛教训，特别是军官们对战争的教训印象尤为深刻，这就促使他们想方设法要将阿拉伯军队从旧王朝政权的支柱变为破坏旧世界的革命工具。

纳赛尔在1952年革命后撰写的《革命哲学》一书中概括了他根据自己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经历所得出的结论，回顾了自己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初认识及随之而来的一些有关阿拉伯意识的最初概念。这些认识和概念都是在他读中学时即萌生的，当时他与其他同学每年都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纪念日一道上街游行。“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当时的主要反应是从感情上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些“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在1947—1948年巴勒斯坦危机达到顶点时，他对军事问题所做的研究使他相信，为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而战已不仅仅是出于民族和宗教同情，而且是事关埃及的国家安全。战争正式爆发前，当他

与同伴秘密进行帮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准备工作时，他们的动机是：

既不是同情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也不是喜欢冒险，而是出于我们有明确、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安全促使我们有必要保卫我们阿拉伯兄弟的前沿阵地，我们注定要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区。

纳赛尔蹲在曼西亚的防空洞中思考着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状况。他看到该地区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都被包围着，就像他和他的战友们被围在法鲁耶地带一样。包围者就是“帝国主义者”。在这场政治战中，阿拉伯军队就如同一盘棋中的小卒子：表面上看调遣它的是本国政府，实际上这个政府自身却被帝国主义外部势力操纵着，而帝国主义同时又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和主要靠山。

在人们看来，纳赛尔的分析非常透彻。他看出了“帝国主义国家”（指西方国家，而且主要是指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仍占据主导力量的英国）、卑躬屈膝和追逐私利的阿拉伯政府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正密谋勾结在一起。纳赛尔根据魏斯曼的《尝试与错误》一书以及自己的观察认定，没有某个“大国”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就不会达到目的。

纳赛尔总结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补救办法是阿拉伯人自己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与以色列的靠山帝国主义作斗争，推翻被帝国主义操纵的腐败自私的阿拉伯政权。最后，纳赛尔认为，军队作为表达民族意识的工具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他这时还没有阐明军队本身就是政府的主要工具这一“纳赛尔主义”信条。这些结论多数会成为，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已经成为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条。阿拉伯国家之间四分五裂彼此敌对是巴勒斯坦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所有阿拉伯人都清楚的事实。另一个原因是阿拉伯社会的落后状况。这种状况表现为：军事力量薄弱，缺乏政治领导，多数阿拉伯人缺乏技术训练，受教育程度、政治



意识和为民族事业献身的精神也不如巴勒斯坦犹太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大国在战争及解决争端的进程中广泛施加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埃及、伊拉克和大约旦这三个当事人的阿拉伯国家均屈服于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这同样也是一个事实。英国在这些国家驻有军队或基地并且控制了武器供应。英国是伊拉克和大约旦国王的保护者，他们把自己能保住王位归功于英国的权势。埃及国王尽管不情愿，却仍然依赖英国维持埃及的现状。

然而，在许多非阿拉伯人和多数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看来，英国政府在合理或不合理地谋求私利时，似乎一贯偏袒阿拉伯事业，并且一直利用其影响使埃及和阿拉伯人免遭更惨重的损失。但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看来，英国的态度并非如此。许多阿拉伯人认为，英国实际上是一个软弱和没有多大影响力的盟国，它曾屈服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反抗和美国人的压力。它在最后一刻干预西奈争端仅仅是企图迫使埃及承认 1936 年英埃条约有效。那么，英国这个盟国对于阿拉伯的利益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英阿联盟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英国应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护阿拉伯人并由此体现出彼此在安全上的相互利益。但在阿拉伯的重要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英国人因害怕冒犯犹太人和美国人却不愿或不能够采取行动；可是一旦阿拉伯国家和埃及触动了英国的利益，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加以干涉。但是，如果英国人过于软弱而不能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又怎能奋起抵抗俄国人？（英国人为了表示赞同签订中东共同防务条约而把俄国人称作新的魔鬼。）阿拉伯人的这种推理忽视了大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由于这种复杂性，大国的政策常常会陷于矛盾之中。因此，这种推理所导致的结论难免过于简单化了。

英国驻兵中东并非为抗衡俄国人，而是致力于控制阿拉伯人。而且从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上看，与日趋衰落的英国结盟显然会招来苏联的敌意，但这种联盟却又不能有效地消除这种敌意可能带来的后果。

尽管如此，埃及政府在巴勒斯坦斗争中的失误并不在于它打了一场“政治战”，而在于其政治战略比其军事战略还要糟。它选择了错误的优先考虑政治的做法：过多地强调挫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领土阴谋，而没有采取最为实际有效的联合行动，尽一切可能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部分在于法鲁克国王与阿卜杜拉国王的私人关系不和，部分在于埃及和沙特传统上对哈希米德家族的反对。同时，开罗还认为大约旦的扩张加强了英国的地位。

如果阿拉伯人的软弱和分裂以及帝国主义的危险控制确实是纳赛尔在被围困于法鲁耶的那些艰难的夜晚苦苦思虑的问题，那么他回国时埃及的现状证明了他的忧虑是有理由的。英国军队陈兵苏伊士运河区，埃及处于无情的高压控制之下。就在巴勒斯坦战火正酣之时，埃及国内几乎爆发出一场革命。1948年4月亚历山大城警察的罢工导致了骚乱、劫掠和军队的干预，暴露出埃及大城市中不断增长而又被忽视的贫民的野蛮性。政府采取了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企图缓解失业，但它主要的应对办法却是从西德基政权开始加紧搜捕“颠覆分子”。数以百计的政治反对者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或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被囚禁在集中营里。

重新出现的反英骚乱再次引起了民族主义者对社会的不满。紧接着又传来埃及兵败内格夫的令人沮丧的消息。夏日骚动之后，11月又爆发了一场更为凶猛的骚乱和排外狂潮，欧洲人、犹太人及其财产成了主要的冲击目标。开罗城的犹太商店遭到洗劫；据报道大约有150名犹太人被杀。这场骚乱的领导者是力量和影响一直在迅速增长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人似乎准备以革命行动夺取政权。他们中的志愿士兵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表现勇敢，深得公众的同情，因此政府迟迟不敢采取行动镇压他们。面对着开罗的紧张局势，埃及统治阶级开始惶恐不安。11月骚乱后，一贯勇敢而且爱国的努克拉西下令解散穆斯林兄弟会。3周以后，即1948年12月28日，他被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暗杀。

努克拉西的继任者易卜拉欣·阿卜杜勒·哈迪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数以百计的兄弟会会员遭到逮捕和拷打，不经审讯便被投入沙漠牢房。1949年2月12日，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袖谢赫·哈桑·伯纳被暗杀，人们确信不是政府的秘密警察就是努克拉西的朋友或家属雇用杀手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警察声称已发现了一个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会员在内的广泛的革命恐怖组织。

对于穆斯林兄弟会中恐怖主义分子的调查(由于为巴勒斯坦战争训练志愿人员，这些恐怖分子的活动已经部分公开)也导致警察注意到他们和军队的联系并下达了对纳赛尔的逮捕令。军事警察搜索了纳赛尔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罪证。5月25日，谢赫·阿卜杜勒·哈迪首相召见纳赛尔，认真询问了有关穆斯林兄弟会与军队的联系等问题。萨达特回忆说，这次召见时的气氛是极为紧张的。哈迪首相在一定程度上指责纳赛尔帮助训练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恐怖分子。一向镇定自若的纳赛尔暴跳如雷，显然他想让哈迪相信，他与任何颠覆活动都没有关系。军官们蛰居了一段时间，直到根据阿卜杜勒·哈迪的命令，警察的镇压活动缓解下来为止。接着在参谋学院的支持下，身为教官的纳赛尔开始重建他的秘密军事组织。正是在这时，自由军官运动才开始建立起更稳固、更广泛的军事组织和制定出了更严密的计划。同时，该组织第一次正式取名为自由军官协会。基层组织受到了彻底检查，成立了由10名军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是后来的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核心。纳赛尔少校是该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除了他以外，该委员会还包括5名陆军军官——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加麦尔·埃丁·侯赛因、萨拉·萨利姆、哈立德·毛希丁和安瓦尔·萨达特以及4名空军军官——加麦尔·萨利姆、哈桑·易卜拉欣、阿卜杜·拉蒂夫·巴格达迪和阿卜杜·穆尼姆·拉胡夫。

1949年10月，执行委员会在阿米尔的寓所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通过了一项在以后5年中准备发动一场革命的行动纲领。在

这个纲领中,反对帝国主义是主要的目标,这首先意味着英国军队必须撤出埃及。纲领还要求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民主的议会制度。

纳吉布将军回忆说,他正是此时第一次与自由军官协会建立了联系。纳吉布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身负重伤,因其勇猛而享有盛名。一直是他下属的阿米尔曾前往开罗医院探望过他,有一次纳赛尔也随同前往。显然,他们是想让这位将军成为秘密组织中潜在的高级成员。从此,纳吉布似乎一直与自由军官协会保持着来往,但却从未被允许参与军官组织的最深层的密谋。

几个月的恐怖镇压之后,法鲁克国王解除了阿卜杜勒·哈迪的职务,代之以侯赛因·希里为首相的看守政府,负责选举筹备工作。法鲁克国王注重与华夫脱党保持和睦关系,他日益不满许多部长对其不断出现的私生活丑闻的指责。不过,他也一定意识到他正在成为孤家寡人,因而必须对公众的情绪作出某些让步。法鲁克的新闻顾问黎巴嫩人卡里姆·萨伯特(他是国王的密友中贪污腐化最严重的一个)通过与华夫脱党的总书记福阿德·萨拉吉丁的私人关系,正在秘密为华夫脱党重返政治舞台扫清道路。从华夫脱党后来的行动看,双方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做成了一笔交易——假如华夫脱党重新执政,它决不会对王室的腐败行为进行过于详尽的调查,反之亦然。

在1950年1月的大选中,华夫脱党可能是因为获得了王室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支持才赢得了多数票。但即使得此相助,华夫脱党的选票仍不足全部选票的半数。这一点再加上民意测验支持率较低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势力强大的这个民族党派已开始失去群众的支持。尽管如此,埃及人民仍抱以厚望,热情地欢迎华夫脱党重返政坛。英国对此则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埃及人民期盼华夫脱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从过去5年中高压和腐败的王室统治中解放出来,希望华夫脱党领导人能在年轻的自由分子的影响下,翻开新的一页,发动埃及所需的社会经济改革。人们还指望



它完成把英国军队驱逐出埃及的民族事业。伦敦方面则希望华夫脱党会再次表现出签订 1936 年条约时的政治风度,就英埃在苏伊士运河基地和苏丹问题上产生的争端达成妥协,尽管这个党反映的是民族主义的呼声。

埃及人民存在这些幻想开始时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华夫脱党政府网罗了许多忠诚而又有才干的部长,如财政部长札基·穆塔尔、社会事务部长艾哈迈德·侯赛因(国际公认的埃及农村福利专家)、教育部长、著名学者兼作家塔哈·侯赛因和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拉丁。政府发起了一项有限的社会福利保障和普及免费教育计划,保安措施和新闻的检查也放宽了。贝文访问开罗之后,英埃之间恢复了谈判。

埃及人又开始能够比较自由地呼吸了。但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到,对华夫脱党所寄予的希望是难以实现的。在公众看来,国王私生活的丑闻又加上了华夫脱党首相自己的丑闻。首相年老昏聩,一切听从其年轻妻子的支配,而他的妻子又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小集团的一员。在对这个政治小集团的调查眼看要水落石出时,华夫脱党又与王室勾结起来加以阻止,并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向巴勒斯坦战争期间购买劣质武器的问题上转移开。据报道,与该丑闻有关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国王的一名亲信,据说他接受了武器商 100 万英镑的贿赂,其中大部分被国王中饱私囊。作为回报,华夫脱党的部长们可以不受约束地更加贪污腐化。朝鲜战争使棉价高居不下,在政府的纵容下,华夫脱党人通过操纵亚历山大棉花市场获得了大笔财富。

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出现了僵局并一直持续数年之久。停战等于是迈向和平的第一步。但结局是既非和平亦非战争,敌对状态一直未能消除。除非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包括撤退到根据 1947 年“分治计划”规定的边界内,否则阿拉伯国家是不会考虑通过谈判签订最后和平协定的。阿拉伯国家坚持首先要使巴勒斯坦阿拉伯

难民重返家园；与此同时，以色列却开始接纳成千上万的新移民并拒绝考虑让阿拉伯难民重返家园，也拒绝考虑与一揽子和平解决方案无关的其他特殊问题。以色列争辩说，1947年“分治计划”规定的边界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拒绝和随后的巴勒斯坦战争已经失效。以色列毫不含糊地表示，除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之外，它占领的土地寸土不让，并且说即使有阿拉伯难民的话，以色列也根本不打算接收。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所做出的最大让步是提出只接收80万难民中的10万人。此外，以色列表示愿意提供补偿，但难民应安置在阿拉伯国家。

只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他成功地将除加沙地带以外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合并到了他的大约旦王国）准备秘密地无条件与以色列谈判和平条款。但这一秘密最终还是在东阿拉伯国家中泄漏出来，他为这一鲁莽的举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51年7月20日，他在阿拉伯耶路撒冷遭到暗杀。

阿以和平谈判未获成果使得西方国家（美、英、法）不得不再次做出努力，至少要防止战火再起。1950年5月，上述国家发表了“三方宣言”，保证停战线不受侵犯，并允诺控制中东武器输入，以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平衡。

“三方宣言”符合西方强国的新利益，尤其符合英国将中东国家组织起来共同抵御俄国的需要。宣言的诞生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东的政策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混乱境地。这种状态是西方国家此后10年的中东外交的特征，它加速了西方势力在该地区的衰落和苏联影响在该地区的崛起。这也是纳赛尔执政后发现的一个使他困惑不解的现象。在他看来，西方的政策没有反映出西方的合理利益，更不用说考虑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了。

西方国家的进退两难之处在于：只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就不会有包括埃及和以色列的邻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参加在内的真正的中东防务计划。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上的相隔和通讯联络不畅，而且还涉及到武器供应问题。如果将阿

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看作是中东防务计划中平等的伙伴而且向它们提供适当数量的武器,有关武器控制的“三方宣言”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于1951年7月12日警告说,想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战时合作是“异想天开”。他此后采取的“行动主义”政策——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对付阿拉伯国家并以军事压力维持和巩固政治现状——的大部分内容与其说是针对阿拉伯国家,不如说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其意图就是要表明,西方国家的中东计划必须将以色列考虑在内。本·古里安坚持认为,以西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为基础的中东防务计划只有在保证以色列生存的政治和军事解决办法找到之后才能发挥作用。

在英埃重新开始谈判时,英国方面强调的一个新问题是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在中东地区防务计划中的地位。此前,尤其是在1936年签订的英埃条约中,英国强调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海上交通的生命线。中东地区防务计划的新的重点应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以及计划中的向希腊和土耳其的扩展相一致。这也反映出英国人对阿拉伯地区东部的伊拉克和波斯湾油田特别感兴趣。斯大林在东欧的推进政策尤其是朝鲜战争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害怕莫斯科会直接发动军事进攻,对中东地区构成主要威胁,而这时中东内部的虚弱——社会落后,半殖民地地位以及地区间的敌对冲突——恰好给苏联的渗透造成了可乘之机。

起先,英埃在防卫问题上似乎还有达成妥协的可能。纳哈斯帕夏在坚持要求英国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军的同时还宣布准备考虑在数百名英国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维持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基地。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可重返基地。但由于种种原因,协议没有达成。恶化的国际形势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导致英国在军事上坚持过高的要求,这些要求甚至比贝文1946年向西德基提出的要求还要高。埃及政府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把苏丹问题与运河基地问题联系起来。它自己也对苏丹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此外,英埃两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都不得不考虑各自国内的困境。在1950年大选中,英国

工党仅以 6 票多数获胜，赫伯特·莫里森这位本世纪最无才能的外交大臣取代了疾病缠身的贝文。英国工党不仅受到在埃及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保守党的攻击，而且受到亲犹太复国主义的下院议员的攻击。华夫脱党在国内的支持率也下降了：同英国的谈判没有产生积极结果；没有能控制住物价的上涨。公众越来越认识到华夫脱党的腐败。戒严和新闻检查的解除致使观点激进的民族主义报刊纷纷出现，其中有些报纸声称得到了共产党国家大使馆的资助。

“自由军官”成员们也利用保安措施放松的机会散发油印传单。他们也曾同其他人一样对华夫脱党寄予希望，但军火丑闻败露很快使他们觉醒。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国王和军队中腐败的高级官员。另外，他们的传单也反映了华夫脱党激进派的民族主义要求：英国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走；埃及应像印度一样采取不结盟的中立政策。

英埃这两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所犯的悲剧性错误导致了 1951 年夏秋之交的一场危机。英国和埃及在有关防务问题和苏丹问题上均固执己见，实际上它们的最终目标并无多大的差异。悲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埃及坚持要将苏丹统一过来，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这个能力；英国坚持要求埃及在防务问题上与其合作并保留基地，但它不可能强迫埃及这样做，除非它再次全面征服整个埃及，实际上这种征服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不管埃及承认与否，英国通过鼓励苏丹自治已经证明埃及不可能有效地阻止苏丹人走向自决的进程，尽管埃及提出作为苏丹的共管国之一的要求在法律上可能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它禁止任何敌对势力控制尼罗河水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英国或许没有意识到埃及同样也可以表明如果埃及在和平时期不予以合作，英国在运河区的基地便毫无用处，尽管英国在那儿驻军可能是合法的，尽管阻止敌对势力控制中东交通和石油供给在战略上和英国的利益有很大关系。双方的重大利益只能通过说服而再不能通过使用武力获得。然而，每一方却都能够破



坏、阻止和威胁另一方，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只会使双方更加仇视对方，此外再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尽管莫里森借口新的防御计划正在酝酿而紧急呼吁推迟谈判时间，纳哈斯帕夏还是于1951年10月9日宣布废除1936年条约和1889年苏丹问题协定。4天之后，西方大国以美、英、法和土耳其的名义向埃及提出了建立中东防务组织的建议。这个组织将替代英埃条约，埃及也将是创始成员国。与此同时，英国提议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苏丹为实行自治所进行的准备。苏丹人的建议也和英国的相似。尽管这些建议没有迅速为埃及接受，但它们最终还是在解决苏丹问题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的中东防务组织计划实在是太不合时宜，太异想天开了。埃及政府很快就指出，中东防务组织计划的条款和内容意味着运河区将由原先的一国占有改为四国共同占有，而且埃及提出的任何军事建议都将遭到多数否决。这项计划“邀请”埃及成为合作伙伴，接受其他4个大国事先已计划好的安排。在这4个大国中，有一个国家无视埃及人民的意志仍在占领着埃及；另一个大国法国则刚刚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其中第三个国家土耳其曾经是埃及的宗主国，埃及为摆脱其束缚获得自由而斗争了一个半世纪；美国尽管在历史上没有过多地干预中东地区事务，但它现在显然已成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它在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的目的是为了承担它在东西方冷战中不可逃避的义务，而绝大多数埃及人恰恰都希望在这场冷战中保持中立。

1951年10月16日英国大选前夕，莫里森在下院进行了一次挑衅性的演讲。他声称埃及在中东防务组织中的地位与英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地位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英国本土也驻有外国军队，他不打算向任何人隐瞒这一情况。但是，正如每一个聪明的埃及人都了解的那样，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英国决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要求美国军队撤走，那么尽管美国人会举出诸多不宜撤军的理由，但他们最终还是得撤走（正如15年后美国

人按照戴高乐将军的要求撤离法国一样)。很难想象美国人会拒绝撤离并且对极力要赶走他们的英国爱国者开枪,也很难想象美国人为维持在英国的驻军而占领城镇,毁灭村舍。假如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英国政府毫无疑问将会因未能驱逐走美国军队而被推翻。

这种情形恰恰就在埃及出现了。1936年条约废除之后,英埃之间的关系是很奇特的。这两个国家为联盟问题而争执不休,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一场战争。但华夫脱党拿不准军事斗争应进行到何种程度为宜。它宣布禁止向苏伊士运河区的英国军队提供劳工和物资供应,但在发动军事进攻这一问题上却态度暧昧。它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使用暴力,暗地里却又容忍甚至鼓励学生、穆斯林兄弟会员、共产党人甚至一些帮派团伙进行游击战行动,例如伏击英国军队,袭击英军仓库和军营。最后政府不得不接管了这些“解放突击队”,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将这些力量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警察最初还帮着控制暴力活动,后来就退到一边袖手旁观,最后甚至变得公开支持恐怖活动了。

英国驻埃及司令官厄斯金将军在新的保守党政府的支持下,对恐怖分子的袭击进行了无情的回击。他牢牢控制着运河区域和伊斯梅利亚市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枢纽。伊斯梅利亚这个大城市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总部所在地,许多英国侨民也住在这里。为保护苏伊士运河附近的一条输水管道,一个埃及村庄的50所房屋被炸药和推土机毁成一片瓦砾。伊斯梅利亚数十户埃及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在苏伊士运河区和另外一些地方,英军坦克的炮口瞄准着那些庇护埃及狙击者的房屋。

埃及军队和纳赛尔的秘密组织在这场非同寻常的民族危机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从总体上看,埃及军队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英国军队控制着苏伊士运河上的铁路和公路桥,西奈半岛的埃及驻军必须通过这些桥梁获得给养;埃及军队则占据着开罗至苏伊士运河的公路,扼守着首都的门户。在开罗军队和苏伊士运河区

的英军哨所之间横亘着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所有进出苏伊士运河区的交通线路都控制在英国人的手中。双方的对峙陷入僵局。不管怎样，埃及军队在人员和重武器装备这两方面均处于劣势。如果两军直接交锋，那将是一场大屠杀。

如果埃及军队被迫回避，其内部必然会产生激愤的情绪。游击战则又另当别论。自由军官组织后来也谴责华夫脱党没有经过适当的准备就让埃及和强大的英军进行决死的战斗。但是，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安瓦尔·萨达特回忆说，他们至少在当时还是称赞华夫脱党反抗英国人的爱国精神的。他们甚至还向华夫脱党的总书记、内政部长萨拉吉丁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条件是华夫脱政府必须废黜国王。自由军官组织秘密帮助培训“解放突击队”中的志愿人员，这些人中有一部分身着便服在运河区战斗。但自由军官们此时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正在同国王及秘密警察展开较量，这场斗争即将变得公开化。

国王很快便失去了民心。在运河区危机期间，他任命聪明能干但明显亲英的哈菲兹·阿菲菲出任新的内阁首相，这一举措更使他名声扫地。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爆发了大学生领导的反对国王的暴力示威。与此同时，自由军官们首次向国王公开提出挑战。他们推选出自己的军官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同国王提出的人选进行竞争。他们推举纳吉布将军竞选这个主席的职务，推举其他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竞选委员，抵制极不得人心的侯赛因·阿米尔将军。这是军队内部各派力量的较量，自由军官组织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成功。1952年1月6日，纳吉布和自由军官组织的所有候选人均当选了。国王暴跳如雷，他怀疑军队中有一个颠覆组织，但又不知其成员有哪些人。

自由军官组织和宫廷警察一直在试图获得对方的秘密。正当警察就要掌握自由军官组织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时，自由军官组织同宫廷建立了联系。萨利姆少校想方设法赢得了陆军总参谋长海达尔将军的信任，萨达特则与国王的医生和亲信尤素福·拉萨德

博士拉上了关系。

纳赛尔后来在描述这段密谋时期的活动时写道：

我甚至想到谋杀前国王及其同党。这些恶魔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与自由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神圣的事物……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非常像惊险侦探小说中描写的情节。我们有自己的秘密暗号和标记。我们在夜间行动并贮藏了大批的枪枝弹药。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成为我们唯一的希望，实际上，我们为此做了许多次的尝试。

但纳赛尔对采用暴力手段抱有怀疑态度，他说：“诸如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怀疑与信任、残忍与同情以及博学与无知等彼此相互联系的因素一直在困扰着我。”他对 1952 年谋杀侯赛因·阿米尔将军未遂进行的反思更增加了他对以政治谋杀充当革命武器的怀疑。

经历了一次次充满戏剧色彩的冒险之后，纳赛尔开始拓宽政治联系并更为系统地发展了他的政治主张。在参谋学院，他阅读了大量关于政治历史及人物传记的书籍。他在政界结识的新朋友中有一位是华夫脱党机关报《埃及人》的主编，名叫艾哈迈德·阿布勒·希斯。此人是自由军官组织成员萨拉瓦特·奥卡萨上校的内弟，一位激进的中立主义者。

到 1952 年初，埃及已处于混乱的边缘。游击战和英国的报复在苏伊士运河区日益加剧。1 月 25 日，厄斯金将军宣称他打算立刻解除被怀疑帮助游击队员的所有埃及辅助警察的武装，并将他们驱逐出伊斯梅利亚。伊斯梅利亚主要的警察营房均被英国军队和坦克重重包围。受过英式训练的警察指挥官遵照萨拉吉丁从开罗发出的“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指示，拒绝了英军命令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

在小型武器短暂地交火之后——埃及警察没有重武器，英军



坦克对警察营房进行近距离射击。警察勇猛抵抗了3个小时，最后不得不缴械投降。埃及警察阵亡41人，伤72人，而英军只死了3个人。

有些观察家当时即认为英军的这次攻击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英军动用了过分强大的武力，而且没有给埃及当局和警察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寻求一种体面的撤退。这次攻击产生的后果是直接而又影响深远的。所有的埃及人都把这次袭击视为一场残酷的杀戮，它使全埃及都处于群情激愤之中。

第二天，开罗的辅助警察部队一队一队地从营房走上街头，前往政府机关和王宫进行游行示威。一路上都有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加入游行队伍。起初，游行只发表言辞激愤的演说，没有采取暴力行动。但当人们得知当局没有采取防范措施维持秩序，而且警察（无论如何，他们是同情其同僚们的义举的）也没有接到干涉游行队伍的指令时，游行的人群便骚动起来。一些突发事件也起了作用。开罗城的地痞涌出贫民窟搜掠钱财。一些携带着易燃物品和破坏性工具的政治纵火犯和流氓团伙列出了一连串攻击目标，利用当局实际上已撒手不管的机会，把举国上下对英军暴行的愤怒转变为一场肆无忌惮的大屠杀与大毁灭。绝大多数的攻击目标是开罗市中心与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利益有关的建筑物，或者是酒吧、电影院及其他类似的公共设施。攻击目标的选择表明了人们对帕夏们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的愤恨。埃及“美好往昔”的象征牧羊人大厦遭到劫掠；英国赛马俱乐部受到攻击，有12个人，其中包括9名英国文职人员被残杀。当愤怒的群众穿过尚未封锁的街道时，巴克莱银行大厦和其他700多所大楼一起被烧毁或劫掠。据报道，在这场劫难中共有17名欧洲人和55名埃及人死亡。

在英国大使馆，拉尔夫·史蒂文森大使正因是否该“按下电钮”而犹豫不决。只要按动这个电钮，苏伊士运河区的英国军队即可开进开罗进行干预，保护英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当有关破坏情况的报告送来时，他的心情非常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英军占领开

罗,那就会重演70年前的历史,造成一场政治上的灾难。而且他相信,埃及国王为了保住其王位,最终必然要动用军队进行干预。当他试图与内政部长萨拉吉丁取得联系时,他被告知部长出外购买房子去了。首相纳哈斯帕夏正忙于收割自己的谷物。国王则在阿卜丁宫设午宴款待许多陆军高级军官。数小时过后,无论是国王还是埃及政府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显然双方都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威胁对方,迫使对方首先采取镇压行动。据说国王可能也犹豫过,因为陆军司令官哈达尔帕夏曾告诉他不能保证军队的忠诚。这不单单是因为对军官有怀疑,而且也是因为搞不清普通士兵是否也参加了首都的野蛮暴乱。萨达特说,自由军官组织成员那天得到该组织的命令,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遏制这场暴乱。

当天下午,燃烧着的建筑物冒出的浓烟已笼罩了整个开罗城,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死难者的鲜血遍地流淌,被洗劫过的时髦商店里一片狼藉。直到这时国王才下令军队清理街道。3小时后,开罗城再度得到控制。但是,埃及古老的王朝受到一次重创,它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原过来。

有关“黑色星期六”事件的责任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后来对此事件进行了正式调查,也没有得出什么彻底或者说是明确的结论。纵火团伙似乎是属于艾哈迈德·侯赛因领导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党”,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说明艾哈迈德·侯赛因参与了密谋活动。也没有证据证实当时流传的纵火犯是由一个共产党集团国家驻埃及大使馆收买和组织的说法。从对娱乐场所的攻击和对非阿拉伯人商店的招牌进行排外性的破坏上,可以看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及其支持者参与了这场暴乱。华夫脱党和国王暗地里可能都想让局势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以便借此来损害对方的声誉,但它们都没有预料到事态会失去控制。显然,这一天发生的事件是由于埃及广大群众的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受到压制,再加上一直使他们受到威胁的警察高压统治突然放松下来所导致的。英国人屠杀伊斯梅利亚的警察等于是摧毁了维持秩序的一支

主要力量。英国在开罗的利益由此也就失去了保护。统治埃及达30年之久的国王、华夫脱党和英国人这三股势力现在共同使埃及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在是它们一道下台,由其他人来接管权力的时候了。

但是,在旧制度还没有完全崩溃之前,埃及又经历了6个月的动乱和危机时期。在此期间,前后共有4位首相试图用老办法来修补这个制度。与此同时,“黑色星期六”已经再好不过地表明,军队在已经出现的革命形势中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当政客们玩弄政治花招时,军队中策划发动一场“体面的政变”的力量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为控制军队本身而进行的第一阶段的斗争早已秘密地开始了。

首先应该下台的是华夫脱政权。纳哈斯在“黑色星期六”过后第二天已被国王解职,10年前下野的阿里·马海尔重新被召回取代了他。阿里·马海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骑墙派。他一方面同华夫脱党、国王以及英国保持关系,另一方面,为感召激进的年轻人,他又答应颁布改革条例。然而,国王之所以想恢复权威和重建国家,其目的仅在于对华夫脱党进行报复。阿里·马海尔既不想解散议会,也不想同华夫脱人作对,因此他很快又被纳吉布·希拉利所取代。希拉利以前是一位聪明而又诚实的华夫脱党党员。他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并且深得民心。后来由于抗议政府中的贪污腐化行为而脱离了华夫脱党。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发动一场反对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运动取得华夫脱党内自由分子的支持。他同意解散议会、流放华夫脱党总书记萨拉吉丁。但是,国王感到希拉利对贪污行为进行的调查危及到他自身的利益。

因此,希拉利在6月30日又让位给一直没有参加政府工作、只是充当各派之间调解人的年迈的侯赛因·塞利。塞利对华夫脱党采用了更为妥协的态度,并且要求进行一次新的大选。他还建议国王任命纳吉布将军为国防部长,以此平息军队中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但是国王此时已愚蠢至极,他非但没有任命纳吉布将军,

相反，他准备对军队中的批评者采取报复行动。他的这种作法后来证明是徒劳无益的。7月15日，他下令解散军官俱乐部委员会并逼迫侯赛因·塞利任命遭人唾弃的侯赛因·阿米尔将军为国防部长。当侯赛因·塞利警告国王这样做将产生严重后果并给他列出据信已经从事反对他的活动的人的名单时，国王斥责道：“一群坏蛋。”侯赛因·塞利辞职后，国王又重新召回希拉利再度出任首相。希拉利答应让国王的内弟伊斯梅尔·谢林上校当国防部长。国王同时开始着手处理军队中那些被怀疑为谋反的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已经制订出计划，不但要解散和逮捕一些反叛者，而且要让秘密警察暗杀其中的某些主要人物。

国王的计划传到了自由军官耳中（消息来源之一是艾哈迈德·阿卜杜·法思，他通过他的内弟奥卡夏上校把消息传了出去），结果导致了自由军官组织采取了一个仓促的行动计划。纳赛尔和他的伙伴们过去几个月中一直在讨论如何行动。

2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事件发生两个星期以后，自由军官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于下月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由于他们没有把握取得梅哈纳上校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推延了发动政变的时间。梅哈纳上校是一名反复无常而又野心勃勃的军官，自由军官们指望把他指挥下的炮兵部队争取过来。他们本想争取福阿德·萨迪克将军参加这次行动但未能成功，因此他们又选择了纳吉布将军作为这次行动的名义领导人。有关纳吉布在自由军官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法。据纳吉布自己说，他是在1952年春天经过执行委员会选举后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但是，在政变发生前，他实际上同委员会的成员只见过4次面。萨达特则说纳赛尔仍然是委员会的主席，纳吉布直到政变前24小时才对委员会的计划真正有所了解（自由军官其他主要的领导者对我也是这样讲的）。萨达特还说，政变前执行委员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是在7月16日由纳赛尔主持召开的。这一天正是国王下令解散军官俱乐部委员会的第二天。出席会议的其他人有：哈桑·易卜拉欣、



加麦尔·侯赛因、阿卜杜·哈希姆·阿米尔和哈立德·毛希丁，还有萨达特本人。纳吉布没有参加。正是在那时做出了采取行动的決定。政变按计划是在7月21日午夜举行。另外还有一个供选择的计划，即如果政变失败，就大批暗杀旧政权的领导人。但此计划遭到了纳赛尔的反対。7月20日下午，纳赛尔同阿米尔去纳吉布的住处告诉他有关行动的计划。但是，由于其他来访者在场，他们只能谈及军官俱乐部委员会的事。

纳吉布自己的解释是，采取行动的決定是7月19日在他住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这一天正好是侯赛因·塞利辞职的那一天。参加会议的有纳赛尔、阿米尔、易卜拉欣和毛希丁。大家一致认为纳吉布应该呆在家里，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不要积极活动，因为他已经受到紧紧的跟踪，他的活动将会引起怀疑。

两种说法都认为政变日期定在了7月22日。后来，由于准备工作没有按期完成，政变推迟24小时举行。拖延的举动差点将这些密谋者致于死地。政府已经有所警觉。7月22日晚，埃及三军总司令同总参谋长侯赛因·法立德将军在总司令部开会商议采取行动。自由军官们得到了一位军事情报官员的密告后，先发制人对司令部发动了攻击。纳赛尔在听到他们开会的消息时说道：“这将节省我们的时间和麻烦。我们非但不用从他们的家中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逮住，反而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阿米尔领导了这次对总司令部的突袭。因为总参谋部派去包围自由军官驻地的一连士兵倒戈，这场袭击进行得比较顺利。

政变计划大纲是由纳赛尔起草的，阿米尔和加麦尔·侯赛因则补充了细节。纳赛尔驾驶着他那辆黑色的奥斯汀牌小轿车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进行串连。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指挥官。有一次，他的车在黑夜中停下时，反叛部队因没有认出他来而差点将他误杀掉。

这次行动按计划将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要保证取得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其次是接管文官政府并任命一位新总理；最后是废黜

国王。（最初的计划更为复杂，它规定要同时接管政府所有主要部门。纳赛尔把此计划简化为首先集中力量取得对军队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纳赛尔和阿米尔手持左轮手枪夺取了总参谋部后，其他部队随后占据了开罗其他重要场所：某些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电台和电话交换台。加麦尔和萨拉赫·萨利姆则控制了驻西奈半岛的武装部队。一支装甲部队被部署在从苏伊士运河通往开罗的公路上，这支部队的使命是阻止运河区英国驻军试图对埃及首都进行干预的任何举动。同时，反叛者派遣了一名军官，即当时负责空军情报工作，后来成了纳赛尔的政治顾问的阿里·萨布里前往美国使馆。他向美国人通报了这场政变的情况，并要求他们向驻开罗的英国使馆传达这一情况，敦促英国不要干涉纯属埃及内政的这一事件。萨布里保证将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并警告说，英国进行干涉的任何企图都将遭到抵抗。尽管英国在军事上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它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过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

纳吉布在第二天凌晨得知了政变第一阶段已获得成功的消息。他被护送到了政变者占领的总司令部，并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时他才公开以政变领导人的身份出头露面。早晨7点钟，萨达特以纳吉布的名义在电台宣读了一个声明，向埃及人民简要说明了有关政变的情况以及政变的目的。声明（萨达特说是由阿米尔写成的）提到要整顿军队，清除“卖国贼和无能之辈”，并将军队“控制在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的有能力、诚实并且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的手中”。

声明宣称军队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保护外国人。它还警告说：任何暴力或破坏行动都将以叛国罪论处。

这些措施受到了开罗人民的普遍欢迎。那些对此感到不快的人也被街头的坦克和低空盘旋的飞机镇住了。当时还没有指出政变的后两个阶段的政治目标。国王和由他指定的首相希拉利仍然

以为这只不过是军队内部的改革问题，可以通过妥协加以解决，不会影响到文官政府。国王同在亚历山大的部长们及在开罗的军队司令部之间的电话联系一直都在进行着。希拉利首相答应，如果反叛者宣誓向国王效忠，他就支持这场运动并接受纳吉布担任总司令的职务。但是，反叛者已经开始自行选择一位新首相。他们的第一个人选是阿里·马海尔。马海尔同意出任首相，但同时又小心谨慎地附加了一个条件，即他必须由国王正式指定。希拉利辞职后，国王说他准备接受阿里·马海尔为希拉利的继任者。革命者们事先为阿里·马海尔拟好了一系列要求，让他提交给国王，作为接受首相职务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进行广泛的政治清洗，实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并解聘国王身边所有的随从和顾问。但是革命者们已经计划把政变继续推进到废黜国王的最后阶段（国王此时在亚历山大），他们担心除非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法鲁克国王可能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转败为胜。他们确信英国人已经在考虑法鲁克发出的进行干涉的呼吁，并且最后是因为美国施加了压力才使英国人止步不前。艾登说，英国无意为保持法鲁克的王位进行干涉。但是，他警告纳吉布，如果有必要采取行动来保护英国人的财产，他将毫不犹豫地干预。

7月25日凌晨，纳赛尔告诉萨达特：“国王今天必须下台，最迟不能超过明天。”就在毛希丁上校指挥的军队和坦克正准备包围位于亚历山大的王宫以支持革命者对国王所下的最后通牒期间，执行委员会在午夜却一直讨论着国王的命运问题。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同纳吉布一起在亚历山大，其余的人同纳赛尔呆在开罗。要求将国王判处死刑的加麦尔·萨利姆从亚历山大用飞机送到开罗，征求纳赛尔等人的意见。但是，9人中的大多数，包括纳赛尔和纳吉布在内，否决了他的想法，并决定将国王流放国外。加麦尔·萨利姆带着纳赛尔写下的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最后决定的记录返回亚历山大。这个记录写道：

解放运动应该尽快废黜法鲁克国王以便处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必须尽快铲除法鲁克留给我们国家的贪污腐化的弊端。我们必须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扫清道路。在这个新时代里,人民将行使主权并过上体面的生活。公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不经审判我们不能处死法鲁克。我们没有精力长期监禁他,也不能纠缠于他的所做所为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上。这样做可能导致我们忽略革命的其他目标的危险。让我们饶了法鲁克的性命并把他流放国外吧。历史将判处他的死刑。

7月26日早晨7点钟,毛希丁指挥的军队占领了蒙塔扎和拉斯丁这两座王宫。在同国王卫队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中,有6人受伤。阿里·马海尔首相向国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中午以前把王位交给他年幼的儿子艾哈迈德·福阿德王子,并在当晚6点钟以前离开埃及。英国大使向在亚历山大的纳吉布递交了一封信件。信中写道,英国政府准备把政变完全看成是埃及的内部事务,并表示国王及其家庭成员不受伤害并“体面”地离开埃及是令人高兴的事。

刚到下午,国王便签署了正式的退位文件。他被允准乘坐王家快艇离开并享受21响礼炮的待遇。将近下午6点时,法鲁克在拉斯丁王宫告别了阿里·马海尔和英国大使,身穿海军将军服在王宫码头登上了快艇。同他一起离开的有纳瑞玛王后、年幼的王子以及他的前妻所生的三个女儿。200多件装满国王私人财产的箱子被匆忙装好堆在甲板上。

纳吉布到快艇甲板上向法鲁克告别。当纳吉布结束同国王简短而又令人尴尬的交谈准备离开时,国王说道:“我希望你能好好照管军队。你知道是我的祖父创建了这支军队。”当纳吉布回答说军队状况良好时,法鲁克又补充一句:“你的工作将是困难的。你知道统治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纳吉布正在参加为统治埃及达150年之久的穆罕默德·阿



里王朝的送葬仪式并接受惊奇而又激动的亚历山大市民的欢呼时，这场政变（它还称不上是一场革命）的主要策划者纳赛尔作为幕后谋士正在开罗艰难地工作着。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将一直扮演这个角色。

## 第五章

### 夺取政权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952—1954)

国王退位后，纳赛尔及其同伴面临着三大难题。埃及的传统政治体制已经瓦解，他们或者是改革旧体制，使其重新运转，或者是创建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英国人依旧驻兵埃及和苏丹。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有 7.5 万名士兵和价值 5 亿英镑的装备。英国人还在加紧策划将苏丹永远从埃及分离出去，将其更稳固地纳入大英帝国的轨道。英国军队一日不撤，埃及就一日没有政治稳定可言。但是，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英国军队，如何才能迫使其撤离埃及呢？

埃及当时的国内状况则更是令人沮丧。经济停滞不前，生产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口增长率，占人口 2/3 的农民所经受的贫困、疾病和受剥削状况更是世所罕见。

农村地区除了偶尔因争夺土地而发生骚乱外，相对说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与此同时，“黑色星期六”则反映出大城市贫民的愤怒情绪。规模很小、只有 100 万从业人员的工业依然不景气。革命前夕，埃及人均年收入为 42 英镑（合 100 美元），仅及英国的 1/10。而赤贫者的收入则更低。农业纯收入每年人均只有 22 英镑（合 52.8 美元），下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每天所得只有大约 10 皮阿斯特（合 10 便士或 24 美分），甚至半年一无所得。埃及男子的平均寿命是 36 岁，而美国男子为 69 岁。埃及按人均拥有医生的比例比西欧

国家少 6 倍，拥有医院床位数比英国少 80 倍。5 岁以上的埃及人 77% 是文盲。这是多年形成的社会痼疾，非一日所能根除。此外还有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困扰着埃及。

朝鲜战争时期埃及棉花丰收，国家本可以因此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华夫脱政府却留下了 3800 万埃镑的赤字。结果造成银根吃紧，预算赤字达 8100 万埃镑。政府不得不以高价收购大量没有售出的剩余棉花。

两年之后，所有这三个问题——英国驻军、政治体制和经济——都得到了处理并且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缓解。英埃双方就英军撤军和苏丹前途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一位保守的财政部长初步采取的一些痛苦的补救措施使国家的财政恢复到了正常的状况。通过农业改革和开展一项规模不大的工业化计划使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迈出了虽然是很小但却是重要的一步。埃及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在旧有基础上重建政治结构的想法——如果说它确曾这样认真想过的话，公开拥戴纳赛尔为领袖的自由军官组织现在已经公开展开活动并成为一个新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核心。这个精英集团包括军官、专家治国论者、行政官员、专业人员以及其他同情这些行动的人或从中得益的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已经开始寻求一种群众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18 年后这种努力仍在进行着）。但是，纳赛尔及其同伴们的统治地位已经成为这种新的体制的核心。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独裁统治，但它将以某种形式征求公众的意见，在实现其统治目标的行动中将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在统治方式上不是如此的话）。

这几年来是纳赛尔的势力及其统治日益发展形成的时期。到 1954 年底，如果说埃及外交政策的模式尚未形成的话，那么其国内事务却已经有了一种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此后的 10 年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埃及人很高兴看到国王被赶下台，但他们对新当政的人却一无所知。少数埃及人可能听说过纳吉布是一名杰出的战士，而对于

熟谙政治内情的人来说，他在军队内部国王的效忠者和将成为改革者的人之间最近发生冲突时是一位中心人物。但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不管是埃及人还是外国人，对政变的其他领导人也是一无所知。开始时一切都是以纳吉布的名义进行，似乎他就是政变的领导者。另一位被公众认为在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人是拉施德·麦赫那上校，是他提出了搞军事政变的主意。他先是被自由军官委员会明升暗降为摄政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他最后走向身败名裂和身陷囹圄的第一步。但是渐渐地，在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外交家之间流传出一种说法，即纳吉布将军和阿里·马海文领导的政府背后有一个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的军政府。这个军政府通常于晚上在曾属于法鲁克国王的快艇上会面，这只快艇停泊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上。他们先是进行一番热烈而随意的争论，然后采用投票方法进行表决。除了纳吉布是年届54岁的将军外，军政府其余人员绝大多数是30多岁的中级军官。据传最具影响的军政府成员是“比克巴什”，即34岁的纳赛尔中校。事实上，这个神秘的军政府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13人执行委员会。不久它就以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开展活动。

即便是曾经阅读过处于地下状态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早期宣言，政变后又亲耳听到了他们的公告的人，开始时候都很难弄清自由军官组织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想要赶走英国人；他们想要改组军队，但只有赶走国王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廉洁公正、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封建领主”利益的政府。除此之外，他们的政治主张看上去既模糊而又自相矛盾。

这种模糊的政治主张究竟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还是有意要将这场政变引上歧路？纳赛尔是否一开始就打算借助军队的力量爬上权力的顶峰？或者是纳赛尔迫于一系列事件和经历的压力而抛弃了他早期所向往的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宪政制度的理想？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纳赛尔和其他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的著作和言论中找到。尽管从一开始他们的行动就显示了他们意欲夺取政权



的愿望,但他们的绝大多数言语都强调了他们对民主的期待和无意执政的想法。

纳赛尔在 1953 年发表的《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他起初认为军队的任务是充当一支冲向“压迫堡垒”、为民众向“崇高目标迈进”扫清道路的先锋队。后来他惊愕地发现,大众并没有追随军队去冲锋陷阵,而是像他们的中世纪祖先消极观望马木路克骑兵在开罗街头互相厮杀一样袖手旁观。政治家和知识阶层也同样令人失望:他们似乎只关心满足私欲、彼此攻讦或傲慢地炫耀自我。但即使在幻想破灭,在废除了 1923 年宪法和解散了政治党派之后,纳赛尔仍然宣称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必定是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我们的角色仅仅是充当一名卫兵,在有限的时期内发挥作用的卫兵”。纳赛尔所写的这本小册子还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有进取精神而又视野开阔的人。即便他对埃及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看法并不一定一贯正确,但起码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提出来的。

1953 年 6 月,差不多就是在写作《革命哲学》一书的时候,纳赛尔对自由军官组织的政治主张还作了一个更为实用主义的解释。他在接受《金字塔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和大多数自由军官组织成员故意决定在政变之前不制定任何明确的政治计划,他们要避免使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因为:

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的秉性各不相同,各人的出身和社会经历不相同,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清除军队中的不良分子,把祖国从外国占领下摆脱出来,建立一个廉洁公正、真诚地为人们谋利益的政府。夺取政权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自己面临着制定出一项政治、社会和经济计划的难题。我们必须尽快确定各项制度。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主张的分歧迫使我们当时同那些不同意革命委员会中多数人决定的那些人以及在我们所建立的那个政府中工作的那些人分道扬镳。

如果说实用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纳赛尔的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纳赛尔缺乏政治目标或实现这个目标的决心。政变之后,纳赛尔和那些老牌政客的相互接近实际上都是在自欺欺人。他们中间有一方是错误地理解了民主进程,另一方则是错误地理解了现实权力。纳赛尔及其同伴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的早期行动和建议,诸如赶走国王、清洗军队、号召各政党纯洁组织、引进农业改革和设立摄政委员会等决定无疑都是正确的,一定会得到一切善良人们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文官政治家、政党和议会政府按照军政府的要求得到“纯洁”,那么,它们就是实行上述变革的最合适的工具。自由军官组织正是借助文官政治家阿里·马海尔向国王递交了要求其退位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他本人亲自将自由军官组织拟定的土地改革计划付诸实施。

根据萨拉赫·萨利姆少校所说(他后来是军政府的公开发言人),自由军官已经计划好在6个月之后返回兵营。纳赛尔亲自说服军政府允诺在6个月后,也就是在1953年2月举行议会选举。而其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军官则要求采取更激烈的革命行动。当政治家们对自由军官组织独断专行地做出的变革提出异议时,这些自由军官没有将这些保留意见视为在自由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正常的批评行为,而是把它们看成是这些政治家摆脱不了腐烂的旧社会的不可救药的证据。这些偏激的看法使自由军官们相信他们必须以革命方式重新塑造这个社会,而且只需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便可完成这种使命。如果说这些军官们不想得到权力,那么,他们至少需要权力所带来的果实;假如他们选择了民主的道路,他们仍想获得当时只有通过独裁方式才能得到的政治和社会成果。

经过几年的计划和梦想之后,纳赛尔及其盟友必定早已拥有了坚定的政治目标。他们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发动政变并获得了成功,因此他们显然不愿简单地将权力拱手让给文官政治家,除非他们相信,他们的最重要的措施能被贯彻执行。当然,这也是老资

格的政治领导人所期望的。

如果说一开始职业政治家们,包括华夫脱党领导人纳哈斯帕夏和刚从欧洲归来的萨拉吉丁等都认为军官们主要关心的是军队改革的话,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纳吉布将军担任政变领导人使这次政变容易让人接受。他曾再三声称要尽快恢复宪政。他选择了一位著名文官政治家出任第一任首相。(阿里·马海尔应召的方式表明,他是到了最后一刻才被选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了数年的秘密计划之后,政变者中却没有一个人知道阿里·马海尔的住址。与其相识多时的萨达特在阿里的一位好友、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他的踪迹。)

军政府决心废黜国王是第一个引起人们震惊的举动——甚至阿里·马海尔也是如此。当自由军官们坚决要求废黜国王时(尽管国王接受了他们所有的要求),阿里·马海尔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但是后来,自由军官们推荐了两名受尊重的文职人员同麦赫那上校一起参加了摄政委员会。然而更为令人震惊的事接踵而至。9月7日,纳吉布将军取代了阿里·马海尔的首相之职,并组成由文职技术专家和一些军官在内的政府。阿里·马海尔被解职的原因是他反对军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以及不愿清洗华夫脱党组织。

纳吉布在就任首相后的当天即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该法提出了温和而又全面的农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重新分配土地。这项工作主要由空军联队指挥官、萨拉赫·萨利姆的兄弟加麦尔·萨利姆负责,并得到两位左翼“进步人士”的帮助。其中一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艾哈迈德·福阿德,另一位是《资本论》的阿拉伯文译者、经济学博士拉施德·巴拉维(他后来写过一部关于1952年政变的著作)。

无论是从人的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土地问题都是埃及非常突出的问题。首先是面对人口急剧增加所产生的耕地不足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有限的耕地面积内分配方式不但极不

公平,而且生产效率又极为低下。在19世纪,四季灌溉和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的发展已改变了埃及农业的面貌,这使得埃及经济从传统上只能维持两三百万人口的基本生活发展到了高度商业化、并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供养两千万人口的程度。贫困的埃及拥有相对发达的交通、信贷和市场结构。但是它每平方公里650人的高人口密度,即便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也算是突出的。穆罕默德·阿里实行的国家垄断土地和封建土地分封、英国人及其直接继承者采取的放任政策以及由于穆斯林继承法所产生的土地所有权的分裂状态等因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土地所有者中不足6%的人(约16.2万人)掌握着65%的耕地,而在土地所有者中占94%的人(约260万人)却只占有35%的土地。在前者中(即土地拥有量超过5公顷的人),占有2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所有者占20%,而这些人仅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0.1%。

许多地主,包括许多占有家庭世袭份额土地的小地主,都住在城市里,而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地主自己不经营土地,而是以经常是很苛刻并且违反官方规定的条件把它出租给佃户或以交谷物的方式租给佃农。土地价格平均每公顷400埃镑,这对于一个小农来说已高得难以支付。地租通常是根据棉花和其他作物的价格来确定的,平均为土地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地主一般提供周转资本,但是,大部分农民由于过分无知,甚至都不会利用可以得到的有限的合作信贷和政府信贷(大的土地所有者都非常了解如何利用这些信贷),而是向他们的地主、乡村中的高利贷者或捐客们借贷。生活更糟糕的是无地的雇工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些人总数大约有800万,他们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7埃镑。

某些大土地所有者是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可以为其村民提供诊疗所,但一般说来,“封建主义”是对埃及农村社会状况的一种客气的描述。一个大的土地所有者是他所在地区的主人,他可以随意调动警察为其服务。他经常雇佣自己的一帮打手和他的代理人来强行收租和压低工资。唯一能对他的权力进行限制的是村庄里的



中等土地所有者以及一些竞争头人地位的大家族。纳赛尔的家庭就来自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可能支持敌对的政治派别，并且它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者成为权力的主要靠山，或者成为叛乱的策源地。

埃及的农民除了去埃及自己的城市外，一般不离开他们熟悉而又热爱的尼罗河谷。工业的发展状况尚不足以为涌入开罗和亚历山大贫民窟的千百万人提供就业。这个结果在农村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景象。这种悲惨情景只是由于下列因素才得到缓解：温暖的气候、麻醉剂、无知、宗教、农村和城市普遍存在的贫民窟生活（因为整个埃及几乎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农村贫民窟）特有的幽默和相互间的亲密团结。这些状况令人想起了某些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农民的描述或者麦考莱对17世纪天主教爱尔兰农村生活的荒凉景象的写照。纳赛尔及其盟友非常了解这种状况，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关系，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战士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基于这种背景，自由军官组织所提出的土改建议确实显得比较温和。但这一土改方案仍不失为东部阿拉伯世界社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将为中东和北非其它阿拉伯国家后来进行农业改革提供了一个范例。它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把每人占有土地数额限制在200公顷，并允许依赖土地生活的人额外占有100公顷。除此之外占有的任何土地都要被征用并由国家重新分配给小农场主、佃户和雇工。被征用土地的代价将以不能讨价还价的政府债券的方式支付，年息3%，30年付清。赔偿费定为土地出租价格的10倍。出租价格反过来又是基本土地税的7倍。它达到了市场价格的一半或者更少一些，这要取决于土地所有者交税的情况。向新的土地所有者销售土地的价格也以相同的条件再加上新政府的农业改革局（后来升格为部）15%的行政管理费用来确定。购买土地的费用也是以3%的利息在30年内付清。可供分配的土地总共将近100万公顷。最终大约有100万人——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据称在土地重新分配计划下从土地占有权中获利，反之，有一万名大土地所有者受了损失。

但是，土地分配——同样适用于国有土地、华夫脱党掌握的土地和捐赠给穆斯林教会的土地——只不过是农业改革的四个不同方面之一。农工的最低工资确定为每天 18 个皮阿斯特（合 43 便士），而且农业工会也成为合法化。地租的价格定为土地税的 7 倍（土地税大约为从前市场价格的一半），租佃和交谷租种的条件也有了新的规定。合作的作法受到了鼓励以克服土地所有权和农场经营上的分散状况。一种新的农业信贷制度也开始实行。国家已开始逐渐控制和监督土地的开垦。

农业改革的经济效果自然要假以时日才能感受到。在此我们只想注意一下直接的政治后果。规定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意味着限制真正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地方上的权利以及他们在国家政治上的影响。这种结果的产生不只是因为土地分配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因为这种限制性的法律表明政府的权威不再由土地所有者支配，而是站在了农民一面。

但是，即便政府以补偿方式充公土地的允诺没有兑现，继续占有 200 公顷良田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笔财产。它代表着一笔大约价值 8 万英镑的资本以及每年从地租中获取的 6—8 万英镑的收入。而且，地主在土地被征用前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把多余的土地卖给小农场主而不必坐等政府强占和补偿。许多人都是削价处理了这些土地。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建议军政府强迫实行更低的 50 公顷的土地所有限制额，但军政府拒绝采纳这个建议。它担心这样做即使对农业生产整体上不会有所损害，它所涉及的行政管理问题也将难以处理。

但是，保留 200 公顷土地仍不能使埃及的旧统治者满意。阿里·马海尔在麦赫那上校的支持下，试图把 200 公顷的限额增加到 500 公顷，或者使多余的土地交纳累进税而不是被充公。华夫脱党的总书记萨拉吉丁也反对这项法律。据一份报告透露，纳赛尔一直准备一旦华夫脱党人接受了土地改革方案，就把政权转交给他们并恢复议会政府。在执行委员会就此问题的表决中，纳赛尔开始

以 7 票对 1 票取胜并且在实施他的计划前辞了职。但是，纳哈斯和萨拉吉丁拒绝了这项改革方案。

华夫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是旧的政治体制崩溃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群众支持而仅存下来的两个团体。如果失去王宫以及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军队和官僚体制的支持，少数派政党不过是由素质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一小撮人而已。他们同国王的联系最容易使他们名誉扫地。但是，尽管华夫脱党领导人遭到失败并屈辱投降，穆斯林兄弟会后来受到镇压，但华夫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拥有各自的群众组织。它们在学生、工人和农民中仍然有追随者，在自由军官组织中仍然有同情者，尤其是华夫脱党的左派已从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转变为共产党人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军官中间颇具影响，但是，他们误以为这种影响会使军政府赞同他们有关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想法。军政府邀请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加政府，但是，拒绝穆斯林兄弟会对有关伊斯兰教方面的立法行使否决权以及任命四位部长的要求。一位名叫巴克霍利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任命为宗教捐赠部长，但他随后同兄弟会决裂了。

华夫脱党党员，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共产党党员联合在一起，有时孤立地，有时结成统一战线，有时直接地，有时通过自由军官间接地活动，这是以后几年中纳赛尔以及军政府面临的主要反对力量。在同这股反对力量进行的斗争中，自由军官组织开了第一枪。当这些政治派别表现出不太情愿按照军官们的愿望清洗自己的组织时，军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这些政党重新组建并根据某些条件进行重新登记。

政治领袖们现在终于开始意识到执掌大权的是军队。但是，华夫脱党仍然无视这一事实。自由军官组织的反应是逮捕华夫脱党总书记萨拉吉丁和其他 60 名著名政治家，其中包括两名前首相。华夫脱党只得屈服，撤销了萨拉吉丁的总书记职务，并提名由名声好一点的乔马取代年迈的纳哈斯帕夏。但是，该党的名誉和影响遭到了损害。

那些被逮捕的人大部分在12月初被释放出来。但是,10月14日,麦赫那上校被逐出摄政委员会并遭到软禁。自由军官怀疑他是在广泛的阵线上展开的一场反革命活动中的核心人物。这个阵线包括旧的统治集团的政治家、土地所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及其在军队中的同情者。

到了12月初,军政府已决心放弃原先打算同清洗过的党派合作并在1953年2月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它认为选举仅仅意味着又回到旧制度中滥用职权的弊端上来,唯一的不同只是废黜了法鲁克国王。即便举行选举也难以摆脱过去的革命曾遇到的令人骑虎难下的问题:华夫脱党人和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控制的议会现在必定会不失时机地要求这些从事革命活动的军官交出在军队中掌握的权力。因此,纳吉布将军在12月9日宣布废黜1923年宪法并将已经允诺进行的选举再推迟3年。在此后的6个星期里,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最终取消过去的政党制度并确保至少在以后3年的“过渡时期”中,它自己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在1953年初发生的一些激烈的学生骚乱之后,军政府声称查明了一起反政府阴谋。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指控,其中包括麦赫那上校和其他42位著名的政治家、一些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48名据说是共产党党员的人。一名陆军军官达玛奥利上校因为犯了煽动士兵哗变罪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麦赫那上校经过审讯后在3月30日被判终身监禁。但是,萨拉吉丁和其他被捕的政治家直到1953年9月才受审讯。他们被指控贪污以及与国外势力合谋推翻政府而在一个特别革命法庭受审。这个法庭在空军联队队长阿卜杜·拉迪夫·巴格达迪的主持下,由军政府的3个成员组成。这是政治的而非司法的审判。从这些审判所产生的宣传效果上看,它们是军政府首次进行玩世不恭的政治冒险,从而歪曲了司法的公正性。萨拉吉丁和法鲁克的心腹兼新闻顾问卡利姆·萨比特被判处终身监禁。穆斯林兄弟会的仇敌、前首相哈迪被处以死刑,缓期执行。纳哈斯帕夏的妻子被罚了一大笔款。同时,共产党的成员也以颠覆罪



受到审判。

1952年8月，在靠近亚历山大的达瓦尔纺织厂发生了骚乱。军政府对这场骚乱的过激反应已经表明了它反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工厂的经理们叫来警察制止一次据传是由非法的共产党组织的罢工，共产党已经通过罢工行动成功地促使邻近一家工厂承认工会组织并增加了工资。这次骚乱越闹越大，汽车被烧毁，公司办公室也受到冲击，有9人被杀，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和两名士兵，23人受了重伤。

在厂区，军政府设立了军事法庭，两名据认为是带头闹事的人被处以死刑。其中一位名叫哈麦斯的年仅24岁的年轻人得到纳吉布私下的许诺：如果他供出指使他行动的人的名单，他将减刑为终身监禁。他拒绝这样做，结果同另一个人一块被绞死。据说是由军政府多数人投票同意才最终决定执行死刑的，纳赛尔是投票赞成宽大处理的3个人之一。

逮捕了政治领袖们之后，1月16日军政府又宣布解散所有的政党并没收它们的财产。只有穆斯林兄弟会例外，它仍然作为一个社会和宗教的组织受到优待。1月23日，即在发生革命整整半年以后，纳吉布在他所做的纪念讲话中宣布了拟议中的过渡时期政治统治措施的纲要，并在3个星期以后颁布了临时宪法。纳吉布作为“革命领袖”代表赋予革命委员会全部最高权力。所谓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由自由军官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内阁由军官和文官混合组成，享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国家的总政策由革命委员会和内阁联席会议指导制定。在3年的过渡期内，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即解放大会，将取代各种政党。2月6日，又宣布这个大会（它自称是一个全国性组织而不是一个政党）的秘书长是纳赛尔。这令人想起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国民大会。军政府成员（包括纳赛尔和纳吉布在内）已经开始在全国巡回演讲以寻求对这个政权广泛的支持，并消除由于采取经济紧缩政策、恢复新闻检查和打乱政党政治生活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这个政权真正的权力机构已开始呈现出来。它的核心是革命委员会。纳吉布的友好和温和的举止，他的烟斗和亲切的话语使他深得人心。纳吉布也消除了外国舆论以及埃及提心吊胆的少数民族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忧虑。但是，对那些要同埃及政府认真打交道的人来说，事情已变得越来越明显：最有实力的人物是纳赛尔。

当纳吉布发表革命半周年纪念讲话时，纳赛尔站在他的右手。他看上去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显得有些笨拙。纳赛尔的抛头露面象征着他已获得幕后操纵者的邪恶名声。与“温和”的纳吉布不同，他由于采取了严厉和不得人心的行动而被指责为“疯狂者”。纳吉布语调柔和地讲道，这个政权强调的是秩序和权威、责任和克伦威尔式的清教主义，而不看重埃及和阿拉伯政治领袖们传统上一贯讲的华而不实的词句和允诺。纳吉布为“解放大会”颁布的口号是团结、纪律和工作。担任了大会秘书长职务后，纳赛尔第一次正式走出后台，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开始他唯一的官方职务是总司令纳吉布的私人参谋机构的领导。在这个职位上，他特别关心的是通过清洗和重组军队来巩固政权基础。在军政府中，他同其他成员一样，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中享有表决权。他似乎是完全凭着他的个性和工作能力控制了革命委员会。另外，他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军官们的组织者，并且只有他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完全了解军队中的秘密组织，这使他掌握了特别的权力。现在作为解放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将掌握这个支持政府的主要的群众组织。5月19日，他正式成为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副主席。

1953年6月，在废除君主制并宣布成立共和国后，纳赛尔第一次作为副总理和内务部长进入内阁。纳吉布既是临时总统又是总理。在重新改组过的内阁中，有5名军官和10名文官。空军联队司令官巴格达迪担任了国防部长一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擢升为上将，继纳吉布之后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年的下半年，纳赛尔把内务部移交给他的另外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查卡利亚·毛希丁中校。这样他和他的最忠实能干的朋友们就控制了国

1  
A  
2  
家的主要保安力量以及唯一允许存在的群众政治组织。纳赛尔的势力已逐渐强大起来并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他可以击败任何对手的挑战。

这种挑战——纳赛尔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仍然差点失败的一场争斗——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在宣布成立共和国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流传着政权内部纳吉布和革命委员会不和的谣言。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会员们也表现出蠢蠢欲动的迹象。在穆斯林兄弟会各级成员中，一些人迫切要求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另一些人则要求由比较保守的“最高指导”哈桑·霍得比来领导，他们之间从而产生了分歧。这次骚乱的原因之一是极端分子对现政权的一些做法感到不快：它同英国就苏丹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同英国就运河区问题开始谈判，并且严密控制对英国采取进一步的联合暴力行动或游击战。

起初，看不出政权内部的分歧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压力之间有什么联系。政权内部产生分裂主要是因为纳吉布成为总统兼总理后逐渐意识到他自己深得人心，开始感到他应该掌握更大的实权。他不满足于扮演挂名首脑的角色。他抱怨说，在他参加革命指导委员会或内阁会议之前，军政府年轻的军官们经常瞒着他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各种决策。

军政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反对纳吉布经常没经过它的事先同意，在对事实真相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政策声明。这场争端与其说是在政策上所产生的分歧，不如说是在个性和权威上出现的纷争，尽管1953年9月所面临的那些政治考验可能也是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纳吉布后来自己声称，这场争端主要是因为“心理”和策略上的分歧，而不是因为战略上的不同。他写道：

阿卜杜勒·纳赛尔具有一名36岁的男子所惯有的虚张声势的习惯。他认为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不必顾虑任何公众舆论的态度。我则以一个53岁的男人所特有的谨慎小

心的态度坚持说,我们将需要一切我们可能获得的公众的支持。我进一步认为,为了保证实现一些目标而牺牲或推迟实现另一些目标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

纳吉布尤其希望得到更多的个人权力以便可以任免部长和军官。他要求对内阁、革命委员会和总司令做出的决定有否决权。军政府则要保留决策权及多数表决的制度。

军政府同纳吉布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争端在两个星期时间里达到了高潮。1954年2月12日,在开罗大学,武装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同解放大会的学生支持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在警察赶来恢复秩序之前,几名学生已经受了伤。政府很快予以还击,取缔了穆斯林兄弟会并逮捕了它的几百名主要成员(包括“最高指导”)。取缔穆斯林兄弟会的禁令后来解除了(直到1954年10月26日它才最终解散),其大部分领导人在答应穆斯林兄弟会今后的活动仅限于宗教和社会福利方面后被释放出来。

1954年2月23日,纳吉布在写给革命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提出辞职。他宣称:“我再也不能按照我认为能最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方式履行我的职责了。”纳吉布提出辞职明显是对革命委员会的,尤其是对纳赛尔的权威发出的一次挑战。纳吉布之所以亮出手中这把政治铜,很明显地是因为他指望依靠他在埃及深得民心以及他在处理苏丹关系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他将飞往喀土穆参加5天以后举行的苏丹议会成立典礼。

纳赛尔的第一个反应(这也将成为他日后处理问题时的典型做法)是争取时间。他派了军政府的两名成员加麦尔·萨利姆和侯赛因·沙菲去说服纳吉布收回辞呈。如果纳吉布不听劝告,就要求他在结束对苏丹访问后的两个星期内不要声张此事,以便革命委员会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纳吉布同意了后一个建议。但是,第二天,据说在萨拉赫·萨利姆及其他一些军官的压力下,委员会背着纳吉布召开会议,经投票表决后解除了他的职务。萨拉赫·萨利姆



作为苏丹事务部长，对纳吉布在苏丹问题上采取主动的做法极为反感。当晚，当纳吉布在家的時候，军队包围了他的房子，电话线也被切断。他被软禁起来。

纳吉布被赶下台的消息传出后在开罗引起了一场同情他的大规模的游行。游行是由华夫脱党中残存的领导人及左翼组织发起的。他们同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一道仍能发动大批的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穆斯林兄弟会、左派和华夫脱党结成这个统一战线的目的在于利用纳吉布的声望迫使军政府恢复政党、议会并给予更大的新闻自由。但是，对纳赛尔来说，更使他忧虑不安的不是街头上支持纳吉布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而是军队内部以及革命委员会自身所出现的分裂。2月26日，纳吉布的支持者们在骑兵军团的兵营里召开了一次群情激奋的集会。革命委员会中最年轻和最激进的成员哈立德·毛希丁就隶属于这个军团。他原先就反对取消政党并敦促通过选举国民代表大会迅速恢复民主生活。纳赛尔亲赴集会场所同士兵对话，对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有传闻说纳赛尔当时遭到孤立并有在兵营中被逮捕的危险。哈立德·毛希丁则一直坚持认为骑兵军团并不是要准备发动政变，纳赛尔也没有被逮捕的危险，尽管当时在场的一些军官可能试图提醒纳赛尔，他们的坦克已经包围了兵营。

为避免分裂扩及整个军队从而毁掉革命的权力基础，也许也是为了从兵营中所处的险境中脱身，纳赛尔说服革命委员会采取妥协措施。哈立德·毛希丁将出任总理，纳吉布将被邀请重新担任总统。

第二天清晨，哈立德·毛希丁和其他7名年轻的骑兵军官，穿过警戒线和铁丝网来到纳吉布在郊区的住所，把消息告诉给了这位将军。纳吉布打算接受妥协，但这出戏远远还没有结束。一个小时后，特工人员按照纳赛尔的指令把纳吉布从家中带走。他们把他先是带到开罗市郊阿尔蒙扎机场附近的炮兵司令部。当表示抗议的士兵包围了炮兵司令部时，他们又把纳吉布带到沙漠中一个隐

蔽的场所。同时，那些拒绝妥协并支持纳赛尔的自由军官们开始组织对骑兵军团的反击。骑兵兵营被包围起来并受到空中轰炸。由于街头的示威仍在继续并且苏丹的一个官方代表团已飞到开罗敦促释放纳吉布并保护其安全时，一个新的妥协方案又被提了出来。这个方案的内容是纳吉布重新担任总统，但要由纳赛尔而不是哈立德·毛希丁担任总理。纳吉布对此再次表示同意。

纳吉布和纳赛尔之间出现了令人感动的公开的和解，但是这种状况没能维持多久。很明显，纳赛尔为缓和了一场似乎要断送整个革命成果的危机而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些事件同时也表明纳赛尔同纳吉布的分歧有多么深，他所面临的危险有多么大。革命委员会在恢复议会制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未得到解决。纳吉布公开宣称他重新担任总统是因为在恢复议会制问题上达成了谅解。从苏丹回国几天后，纳吉布宣布了将在7月23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之前将创建全国代表大会和临时议会的计划。他还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

3月9日，直到自由选举势在必行时，纳赛尔才把总理职务移交给纳吉布。据说纳赛尔因工作的压力而感到身体不适，他的医生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从表面上看纳吉布似乎是大获全胜了。但是，纳赛尔实际上已经开始组织第二次军事政变，这一时机的选择及其隐蔽性令人想起马克·安东尼在凯撒死时所做的一番演讲。这可是一件武力与政治手腕结合在一起的杰作。当纳吉布尚在喀土穆时，政变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纳赛尔下令逮捕了几百名被控试图利用纳吉布—纳赛尔危机发动一场反革命活动的罪犯。他已经利用他担任总理的10天任期清洗了军队中，尤其是炮兵中的亲纳吉布分子。哈立德·毛希丁被派到欧洲执行“特殊使命”。这是他被从革命委员会中驱逐出来并遭到两年流放的前奏。其他16名骑兵军官也被关押起来，3个月后经审讯被判徒刑。同时还对被断定是共产党分子的22名平民判了徒刑。纳赛尔还指定自由军官组织的一名忠实成员加麦尔·侯赛因少校担任社会事务部长，由

此加强了他对贸易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控制。在积蓄力量以及消除潜在的反对势力组织者的时候,纳赛尔一直让纳吉布打头阵。他的目的不只是赢得时间,同时也是让纳吉布自己最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地位上。纳赛尔早已洞悉,不管纳吉布的愿望如何,按照纳吉布提出的条件重建民主制将意味着军队这场运动的终结,并且,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取得的大部分成果也将被断送掉。公众同纳吉布一样可能也误认为能够同时分享革命的果实和过去那种政党制。纳赛尔的谋划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表明:他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3月25日,革命委员会经多数表决同意发布了一个宣言:宣布恢复各种政治党派并声明“革命委员会将于1954年7月24日将全部权力移交给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将宣告埃及革命的结束”。正如纳赛尔所计划的,宣布革命委员会将自动解散对于军队和公众中所有那些反对旧政权和害怕它重新取得无限权力的人来说是一个震动。通过操纵解放大会和贸易工会,纳赛尔就可以使这种感情爆发成要求保留革命委员会和支持纳赛尔而不是纳吉布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游行由于伴随着一场交通工人的总罢工而更加声势壮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一次自由军官的集会上,纳赛尔取得了自由处理这场危机的权力。

纳赛尔由此毋庸置疑地向人们显示,不管是谁享有名义上的地位,在军队和工人中以及街头示威游行的队伍里掌握着通向权力的关键人物唯有他自己。他最终获取名位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纳吉布虽然仍得民望,但缺乏任何方面的有组织的支持。4月17日,纳吉布由于精神压力太大而被迫再次辞去总理职务。他也从革命委员会中被排挤出去。纳赛尔再次接过总理职务,纳吉布则继续担任总统。但是,纳吉布逐渐变成一个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直到10月份最后被赶下台为止。

随着纳赛尔的东山再起,军队的独裁统治再次建立起来。大选再次被推迟到3年过渡期结束后举行;政党活动再次遭到禁止;新

闻检查制度也重新恢复起来。38名前政府部长及23名记者被剥夺10年政治权力。对民主思想所做的唯一的让步是成立了由内阁指定的由240人组成的国家顾问委员会。

埃及自由人士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并且被多次滥用的议会宪法制度就这样最后遭到了毁灭。埃及的议会应该被取消吗？如果纳吉布取胜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埃及的议会制度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至少可以给人们一些政治发展的希望。这些希望可能将逐渐削弱埃及的贪污腐化现象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使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公众从政治磋商中有所收益。英国的议会生活直到上个世纪还是贪污腐化并由土地所有者控制的。以上述观点为基础，我们来衡量一下将会出现的3种可能性，首先，由华夫脱党再次控制议会可能将断送土地改革并终止其他经济和社会改革，可能也不会有阿斯旺大坝工程和比较缓慢的工业化成果的出现。其次，将不会同英国进行谈判并就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即使有政治团体希望达成这种协议的话，它也不具备这样做的能力。最后，即使纳吉布获胜并重新组成议会，它不久也可能在比1952年政变更残酷的革命中被再次毁灭。因为社会和经济压力以及重新掀起反对英国占领运河区的斗争加在一起将更难处理。失望的情绪将会无处不在并为蠢蠢欲动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党分子展开活动打开方便之门。

在埃及，要取得政治稳定和真正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好同英国的关系。纳赛尔权力的巩固使他得以同英国达成一个拖延了18个月之久的协定。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变前自由军官们的秘密活动同当时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号召已经产生了共鸣，这些口号是要求尼罗河流域的统一以及英军从埃及和苏丹立即无条件地撤出。他们拒绝同英国进行任何谈判，谴责共同防御计划并要求实行中立政策。但是，当自由军官执掌权力以后，他们不得不面对要同英国打交道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应该继续甚至加强抵抗活动以反对英国



在苏伊士运河区保留基地吗？或者他们还是应该采取迄今为止毫无成果可言的谈判的方针？这种方针受到了大部分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指责并且将来肯定会被他们的反对派用来攻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军官们同时采用了施加压力和对话两种方法。他们将重点放在谈判上，但是抵抗仍然继续并保持了游击战所形成的威胁，尽管抵抗活动实际上是在一个低水平上进行的。同时，军政府正在准备作出两个重要的决策，以便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扫清道路。第一个是要承认苏丹的自决权。如果苏丹愿意，它可以选择独立而不必同埃及结为联邦。第二个是同英国就苏丹问题及苏伊士运河区问题分别举行谈判。

1952年底，纳吉布将军同苏丹4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1953年1月10日，他们达成了协议。一个月后，埃及同英国就苏丹问题达成协议。两国承认了苏丹人的自决权。苏丹人有权选择独立或是同埃及结成联邦。苏丹将尽快通过选举产生议会，随后实行为期3年的自治。在此期间，苏丹将享有主权。苏丹总督将在一个五人委员会的咨询下行使职权。该五人委员会将由埃及和英国各派一名代表，两名苏丹人及一名巴基斯坦人组成。

在埃及，这个协议被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及其他一些人视为是破坏人们所热望的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在英国，保守党内一伙右翼帝国主义分子对英国政府在埃及压力下明显放弃把苏丹并入英联邦的可能性表示忧虑。出人意料的是，英国方面坚决要求签订苏丹协定的不是英国驻开罗使馆，而是英国驻喀土穆的管理当局。苏丹政府民事部长詹姆斯·罗伯逊爵士不客气地告诉英国政府，如果英国不给苏丹人自由，它将不得不对苏丹人开战，其结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英国在苏丹只有一个团的军队和几百名军官。这个国家的面积如同西欧一样大，实际上对它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信任之上。

这个协议并没有终止英埃双方在苏丹的竞争，而是将这种竞争转入到比较容易处理的争夺地方政治影响的范围之内。1954年

初,当民族联合党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并以伊斯梅尔·阿扎里为首组成了第一个苏丹民族政府的时候,开罗表现出了欢悦之情,在伦敦则产生了震动。但是,两年以后,正是伊斯梅尔·阿扎里领导苏丹取得了完全独立。他迫使英国和埃及接受苏丹议会的一份宣布独立的简短声明,从而取代了英埃当初煞费苦心设想的苏丹独立进程。苏丹问题仍然是英埃关系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它尤其助长了英国保守的新闻界和英国下院中帝国主义论调鼓吹者的气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苏丹问题已不再是就英国驻埃及军事基地达成协议的一个主要障碍了。就基地问题本身而言,双方也采取了更为认真的和解姿态。埃及人要求英国军队全部撤出并拒绝承担任何中东共同防御义务。英国则坚持运河区军事基地必须随时为中东地区防御发挥作用。两国都存在着由于感情受到挫伤以及公众舆论对事实真相缺乏了解所产生的问题,同时还要面对一些具有军事战略性质的麻烦。但是,另外一些因素有利于达成协议。从英国方面看,以氢弹的发明及斯大林死后冷战“解冻”的可能性为依据,防务战略正在重新审定。英埃双方在中东的政策是制止苏联对中东的进攻。氢弹的发明也可能使诸如苏伊士运河区这样的大规模军事基地逐渐失去作用,因为它太容易受到攻击。而较小的基地情况会好一些。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在埃及充满敌视的状态下,从军事观点来看,保持运河区基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英国在埃及的指挥官们已经同意这种看法。华盛顿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解决英埃双边关系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已开始对中东产生了更广泛的兴趣。丘吉尔和艾登希望艾森豪威尔提供支持,以便同埃及进行新的接触。1953年初,艾登在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向他提交了英国制订的保持在埃及的基地的计划。英国希望埃及接受的“A计划”的内容是,英国为保持苏伊士运河基地将在埃及留下7000名穿军服的士兵,以便一旦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或伊朗受到攻击或威胁时,基地可以“重新启用”。此计划还规定在空

中实行共同防御,并且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基地继续保留军事指挥权。艾森豪威尔一方面同意中东防务需要运河基地的原则,愿为英国提供外交支持,并表示将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拒绝参加反对埃及的统一战线。他后来表示了他的怀疑,即鉴于埃及的民族感情英国的“A计划”能否为开罗所接受。他认为,英国的“B计划”更为现实一些。它规定,在少数英国人或联合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参加下将苏伊士运河基地置于埃及的控制下。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是纳赛尔迈出的。1953年4月,他在接见《观察家》杂志驻开罗的记者时说,为了保证基地在战时重新启用,他将愿意允许一定数量的英国技术人员留在苏伊士运河区,但前提是英国不要试图以此作为占领埃及的借口。英国心领神会地将这次谈话看作是为对话打开通道。1953年4月28日,谈判在开罗举行。埃及代表团由纳赛尔率领,成员有萨拉赫·萨利姆、阿米尔和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法齐。法齐和萨利姆进行具体谈判,但关键人物是纳赛尔。英国代表团开始时由拉尔夫·史蒂文森率领,成员有英国驻中东地面部队总司令罗伯逊将军。罗伯逊是一名沉着而又聪明的军人,在柏林封锁期间,他作为英国驻德国的主要代表曾经机智地发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作用。

史蒂文森后来因病连续请了7个月的假,外交部的拉宾·汉基接替了他的工作。但是,第一轮会谈只持续了一周时间。英国从它的“A计划”出发,试图使纳赛尔陷在讨论保持基地及基地在战时重新启用等技术问题的细节中。纳赛尔没有上当,他坚持要求只有英国接受了军队完全撤出的原则后才能讨论细节问题。基地必须接受埃及的军事指挥。在埃及人看来,穿军服的英国技术人员的继续存在绝不是英军的完全撤出。当英国人表示只有当他们知道可以保留下什么之后才可以对撤出基地做出保证时,纳赛尔于5月6日中断了会谈。他宣布:“我们不准备浪费时间。”

丘吉尔利用他们的比较富有灵活性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患病不在的机会,试图采取强硬态度,他痛恨放弃埃及的想法。在

致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说：

埃及独裁当局断然中止同英国进行的讨论。这一举动恰好是在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埃及时采取的……如果因为美国的纵容纳吉布决定将口头威胁变成实际行动，那么，流血事件很可能会产生。英国对此概不负责。

5月11日，作为中东和巴基斯坦之行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同纳吉布和纳赛尔在开罗见了面。

尽管双边会谈正式破裂并且埃及人在运河区采取了一些威吓作法，包括组建了一支“全国解放民兵组织”，英国同埃及人之间的非正式接触在这以后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停止过。罗伯逊将军后来说，他私下里把运河区基地看作是一个“军事上毫无价值的东西”。埃及人占据着尼罗河三角洲，可以在晚上猝然进行袭击并向英国武装部队的士兵及其家属射击。保护运河区基地已经用去了三个师中最精良的部队，而英国再也无法向埃及增派更多的军队了。

应纳赛尔的请求，罗伯逊将军在他的别墅里同纳赛尔举行了秘密会谈。罗伯逊在谈话中感到纳赛尔是一个“聪明而且坦率的人，但是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在谈判中，“他滔滔不绝，显然是做了准备工作。他彬彬有礼而又头脑清晰……在会谈期间，他着重讲了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这是他内心深处既定的目标”。

1954年1月，在纳赛尔和史蒂文森之间继续进行的冷静讨论中纳赛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同意在土耳其一旦受到攻击时，运河基地可以重新启用。这是埃及迄今为止一直拒绝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英国方面是否同意全面撤军。全部撤军意味着英国控制基地并留下一些为数不多的不穿军服的英国技术人员。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方面将在这些问题上让步时，纳赛尔放纵或



鼓励对苏伊士运河区英国部队发动武装进攻。1954 年的最初几个月，埃及和英国的政治形势都有助于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仲夏时节，双方的政治环境都很平静，这足以为导致最后解决创造条件。英国同意从埃及撤出所有武装部队，并以英国公司同埃及签约的形式留下文职技术人员以维持对基地的使用。英国国防大臣安东尼·黑德被派到开罗就达成有关协定的一些原则进行谈判。7 月 27 日，他同纳赛尔草签了协定。然后，由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1954 年 10 月 19 日，他和纳赛尔最终签署了协定。

该协定废除了 1936 年条约，并规定英军在此后约 20 个月中分阶段从埃及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基地的现存设施在英军撤出后由埃及加以控制。但是，基地至少要有 1200 名英国文职技术人员维持使用 7 年。在此期间，如果出现了埃及或加入阿拉伯共同安全条约的任何一个阿拉伯签约国以及土耳其的武装进攻，英国军队就可以重新占领并使用基地。

签字仪式结束后，纳赛尔宣称：“英埃关系中丑恶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正书写新的一页……现在，英国和埃及没有任何理由不在一起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两个星期以后，美国同意向埃及提供 4000 万美元的援助，英国宣布重新向埃及转让武器。纳赛尔实现了伟大的民族目标。英国军队在持续占领埃及 72 年之后，不久就将撤出。但对于埃及爱国者中一些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纳赛尔为换取英国撤军而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他已经拱手让出了苏丹。他不再坚持完全采取中立的立场，而是在一个中东防御系统中，把埃及同西方连接在一起。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对他的抨击最为激烈。尽管自由军官们同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关系，纳赛尔对他们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的做法从来都不很赞同。他自己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但又是那种传统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传统为他对世界的看法打上了烙印。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宗教狂，他的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观念毫无疑问是世俗的。

因为纳赛尔取得了纳吉布的胜利，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埃及一直没能兴风作浪，但是穆斯林兄弟会一些好战分子却去了叙利亚，他们从那里展开对纳赛尔的攻击。他们谴责他是一个暴君并同西方勾结在一起。1954年2月，叙利亚的阿德比·西沙克利军事独裁政权被推翻以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泛阿拉伯中立主义开始成为叙利亚政治及其对西方政策的基调。1954年夏季，纳赛尔经过缜密考虑后也废除了新闻检查，这足以使穆斯林兄弟会再次抬头并利用埃及新闻界攻击他。

1954年10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一次大规模公众集会发表演讲时，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迪夫の木匠在几尺以外的地方向他连开6枪。纳赛尔未中一枪，他身边的两个人却中弹倒在地上。当人群开始出现恐慌，同他一起站在讲台上的人夺命而逃时，纳赛尔站在原地并要求下面的人群不要动。他以一种虽然没有失控但由于精神紧张而显得有些尖声尖气的语调喊道：“请记住，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革命仍将继续。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警察搜索暗杀者时，纳赛尔仍在继续进行演讲。

这个案件为纳赛尔对穆斯林兄弟会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提供了机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已经成为他的最坚决和最危险的敌手。他这样做还可以把纳吉布将军赶下台。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遭到了禁止。它的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被关押起来。警察声称发现穆斯林兄弟会的恐怖主义派别掌握有大量武器。这些人被指控一直在谋划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暴乱。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指导”哈桑·霍得比虽然辩称自己同恐怖主义组织无关，仍然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加麦尔·萨利姆领导的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受审。报告谋杀纳赛尔和推翻军政府计划的证人同时还指控纳吉布也参与了这些活动：穆斯林兄弟会夺取政权后将邀请他接管政府并稳定全国形势。几天以后，在1954年11月14日，纳吉布被解除共和国总统职务并在开罗郊区他的别墅里被软

禁起来。他被指控心甘情愿地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共产党分子当作工具加以利用。所有这一切都是平静地进行的，公众舆论对此没有什么反应。纳吉布在埃及街头的那些示威者中仍得人心，但他在3月遭到失败后，已经退居幕后。不论是在学生中还是军队里，当时发动支持纳吉布游行的所有活动分子现在都处于纳赛尔的控制之下。

纳赛尔同英国签订的协定以及他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采取的残酷无情的打击已经遭受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各种各样人物的激烈抨击。对他进行批评的人中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中立主义者和宗教界的领袖，还有叙利亚的左派和中间派。他们刚刚推翻了本国的独裁者，认为纳赛尔旧政权同样是压迫人的政权。由于罢免了纳吉布的职务，纳赛尔进一步失去了民心。纳吉布一直被看成是起平衡作用的人物。当哈桑·霍得比和其他6名兄弟会领导人被判死刑，除了霍得比其他人都被绞死，许多阿拉伯政府呼吁对他们进行大赦，而且阿拉伯世界掀起了抗议的风潮。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抗议者袭击并烧毁了埃及的使馆。

到1954年底，纳赛尔又成了新的国家元首和革命委员会主席。他现在成了埃及的主宰者。即使说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至少他在书面上实现了让英国从埃及和苏丹撤出的民族目标，这一切将在几个月后完成。但是，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国家还是在海外，一般公众仍然不太了解他的个性。他的所做所为，或者说被人们知道的有关他的所做所为，一般说来并不为人们所喜欢。对公众而言，他看上去仍然是一个沉默寡言、禁欲和无情的人。他缺乏纳吉布那种为人随和的个人魅力。西方很少有人认为纳赛尔比软弱的纳吉布更容易妥协，如果纳吉布一直能够这样做的话。在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上就是如此。在埃及，土地改革的后果（到此时为止分配了7.5万公顷土地）还不足以为广大群众补偿为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紧缩措施产生的损失。

而且，由于土地面积严重不足并存在大量失业人员，事实证明

减少地租和提高农场雇工最低工资是很困难的。但是，紧缩措施在填补预算赤字和维持收支平衡上是成功的。政府还没有制订出自己的明确的经济规划，只不过大概倾向于发展工业和实现社会福利而已。政府推行了土地改革并鼓励贸易工会发展（尽管工会处于政府控制之下而且没有罢工的权利）。虽然如此，它所采取的一般性的经济措施主要是依赖于私营企业，这同前几届政府的做法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军政府发言人尽管有时也声言不赞同“垄断资本的控制”，但他们一直声称反对社会主义。1954年1月，军政府颁布了一个“合作宪章”，规定实行资本、劳力、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各种剥削现象及社会主义的不能自由发挥作用的影响。军政府显然急于吸引西方的投资和经济援助，它的基本经济原则显然是亲西方的，政治方向尤其是亲美的。

对新闻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取缔著名的华夫脱党机关报《埃及人》和其他一些报刊，引起了埃及知识分子的反感，但是，其他中产阶级人士则欢迎纳赛尔的铁腕统治，因为这样可使他们免受过去的街头暴力之苦以及由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党人所造成的双重威胁。埃及和国外的商人不仅欢迎这样一个稳定的机会，而且也可为可以同西方更好地进行贸易活动感到高兴。

对于埃及国外好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纳赛尔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纳赛尔同英国达成了妥协，而英国据说正在考虑同以色列媾和。纳赛尔还可能使埃及采取一条孤立主义的或是亲西方的路线。纳赛尔当时除了在苏丹服过役并在1953年去汉志进行正式访问和朝觐外，还没有离开过埃及。虽然他接待过尼赫鲁、铁托和一些阿拉伯领导人的来访，但在国际舞台上他主要的还是同英国打交道。

尽管如此，他私下里已经表现出了他善于吸引别人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在有关苏伊士运河基地的谈判期间很好地了解了纳赛尔的拉尔夫·史蒂文森回忆了谈判期间他对纳赛尔的



印象：

我在谈判期间发现，如果纳赛尔同意某件事情，他就会抓住不放。我到他家去拜访他时，也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喜欢他住在兵营附近他的中校寓所的方式。他生活简朴，对金钱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虽不深刻但属于他个人的思想。在政治上，他几乎没什么经验。

纳赛尔当时年届 36 岁，许多西方政治家在这个年龄才刚刚完成其政治学徒生涯的初级阶段，准备缓慢地攀登权位阶梯。他除了零星地读了一些中学课程并在陆军军官学校和参谋学院学习了一些内容狭窄的课程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如果说他智力惊人并且勤奋不倦的话，那么，他的一般文化知识非常有限。作为一名战士，他只是从没有成功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学到一些有限的现代战争经验。在成为埃及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统治者之前，纳赛尔只有两年半的公共政治生活经验。

在他同纳吉布的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刻，在他以生命为代价进行冒险时，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他的辱骂声中，纳赛尔尝到了权力的苦涩，也啜饮了它的甘甜。更多的困难很快就要到来了。但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过 18 个月之后，这位年轻人将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国际危机中的中心人物，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和西方的死敌。

## 第六章

### 阿拉伯国家、苏联和西方(1954—1956)

在革命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纳赛尔和他的同伴们主要关心的始终是政权的巩固和英埃争端的解决。此后两年,以苏伊士运河危机为最显著标志,纳赛尔实现了解放埃及的目标并形成了他以后外交政策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不结盟,其中包含与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同以色列作斗争;寻求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所有这些目标都是相互联系的。纳赛尔追求这些目标既是出于他对埃及国家利益的考虑,也是他的感情、意识形态和渴望“绝对政治”的愿望所致。这些目标将不可避免地使他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发生冲突,英国的政策总的说来是要维持现状。

西方国家批评纳赛尔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没能阻止外国的“投机冒险活动”,把埃及相当有限的资源用于武器装备而不是经济发展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顽固坚持这种观点的通常只是那些对埃及试行的重要社会经济变革视而不见,只专注于纳赛尔外交政策中过于不切实际的方面的人。)如果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能履行其部分诺言,埃及这条值得称道的路线本来会可行得多。然而,英法当时试图保持其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的残余势力,同时在欧洲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对付苏联的可怕进攻。为此,两国的经济负担加重,国际地位遭到削弱。以色列则把国家预算的很大部分用于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保持1948年

战争中占领的面积远远超过联合国分治方案中划给以色列的大片领土。

有迹象(如预算分配)表明,纳赛尔最初的意图是避免沉重的军备开支以致力于国内的发展。但是,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形势以及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纳赛尔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反抗英法帝国主义控制的民族主义斗争和同以色列之间尚未决出胜负的斗争是令阿拉伯世界难以安枕无忧的两个主要政治问题,对此,任何一个埃及领导人都难以简单地采取回避的方法。

的确,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表明,他已意识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埃及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结论早已被1939年阿里·马海尔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充分认识到。它就像保卫低地国家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一样成为埃及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考虑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问题时尤其如此。纳赛尔政策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他从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出发考虑问题的远大目光。以往的阿拉伯领导人没能像他那样意识到:纵然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只要它们在政策上携手一致,就能凭借其地理位置和石油资源获得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纳赛尔已注意到埃及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和非洲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他的这种分析理论上源于1951年前他在参谋学院所学到的战略知识,实践上源于他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获得的经验,感情上源于他长期以来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革命哲学》中的这部分内容直到后来才被安东尼·艾登、盖伊·莫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以及时事评论家注意到并被指责为类似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样的一份帝国蓝图和征服计划。(纳赛尔后来讥讽说:“何止是希特勒?艾森豪威尔说我不仅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亚非国家革命对其经济利益的冲击,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种族和宗教宣传来混淆这一根本分歧。他们必须懂得有必要正确评价民族主义并学会与之共处,否则,他们的经济将受到不

利影响。”) )

其实,《革命哲学》有关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世界和非洲这三个“圈子”中的角色的描述同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在欧洲、英联邦和英美联盟三环中的地位论述在性质和动机上无甚差异。但是,纳赛尔的这本小册子通篇渗透了他对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遭受外来压迫的漫长历史的悲愤,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和不信任。纳赛尔对各个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强烈责任感无疑将迟早导致他同以色列发生进一步冲突。如果西方大国在中东的非殖民化过程拖延太久,还将导致他在北非必然是同法国发生冲突;在中东,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可能会与英国发生进一步冲突。埃及已经承担了至少是非正式地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义务:例如,自1945年以来,北非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是接受设在开罗的总部的指挥并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作战的。

但是,到了1954年年底,纳赛尔似乎倾向于采取一种比以往消极的政策,即:与西方进行部分军事合作;适当限制武装力量;谋求同以色列边界的安定以及对阿拉伯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趣有所减少。纳赛尔关心的主要是埃及独立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当时,西方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然而,西方国家试图把阿拉伯国家拉入一个新的地区性军事联盟的压力,以及与此同时以色列在本·古里安领导下由于担心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阿拉伯领导人而采取更富有侵略性的“行动主义”的政策,刺激了埃及内部的不安定因素。纳赛尔依赖的军方要求获得更多的武器,并对以色列采取更为主动的政策。极左和极右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是纳赛尔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反对者,他们坚决要求采取较为积极的中立反帝(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反西方)政策。

如果纳赛尔能使军方相信:同西方国家合作会取得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即西方会向埃及提供更多的武器,并产生一种从好的方面说可以迫使以色列让步,最起码也可抑制其进攻性政策,他也许能顶住那些激进的中立主义反对者的压力。但是,英美在1955年



协同努力促使阿以争端妥协解决时，它们似乎不愿也不可能向以色列施加很大的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美国向埃及提供的不过是象征性的武器援助，其条件是阿以问题和平解决；英国则要求埃及加入西方控制的中东防御条约，或者与之合作。当时，英美两国只是一心一意地建立军事条约以防苏联可能的进攻或共产主义的颠覆，它们没有意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和西方军事基地比苏联或共产主义的威胁更大。1954年，纳赛尔同英国签订了几乎让他丧命的协定后，不久，人们就对他是能否满足西方的要求及是否能度过危机都极为怀疑。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纳赛尔不可能带头进行政治冒险寻求一项同以色列解决争端的办法。西方如果不向面临以色列压力的埃及军队提供武器，埃及就将不得不另谋出路，而唯一可供选择的新的武器来源就是苏联集团。

1955年2月21日，安东尼·艾登先生途经开罗，他在英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同纳赛尔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此时，埃及同西方的矛盾正趋于激化。艾登当时是外交大臣，但不久就要当首相。他此行是去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陪同他的是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哈丁爵士。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于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次会面的：

纳赛尔完全同意约翰爵士所作的精辟的战略分析。他宣称埃及与西方有着一致的利益和认同感，但他指出，土耳其—伊拉克条约（将在几天后签署）时机不当，内容欠妥，严重阻碍了阿拉伯国家同西方有效合作的发展。

我对这种理由并不陌生（艾登评论道），有些事情永远都不合时宜。我们竭力想说服纳赛尔不要再发表批评的言论，并劝他如果条约合理就不要再反对。但是我认为这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如此，在整个谈话中，身体健壮的纳赛尔上校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他多次提到英埃关系已大有改善，埃及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希

望将来能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纳赛尔无法接受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这种做法。我当时给伦敦的报告中附带指出：“无疑，这是一种嫉妒心理在起作用，况且他领导阿拉伯世界的愿望遭到了挫折。”

纳赛尔在谈到这次会面时说，艾登“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听我对他和哈丁讲述我对防务问题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巴格达条约》是保卫中东的错误方法。哈丁发表了一些看法，但艾登毫无表情”。从远东回国的途中，艾登在巴格达作了停留并同他的老朋友、伊拉克总理赛义德和国王费萨尔对英国与伊拉克的新的军事协定作了最后修改。1955年4月4日，该协定正式宣告生效。与此同时，英国宣称它将坚决遵守《巴格达条约》（当时被称为土伊协定）。

这个激怒了纳赛尔的举动以及艾登后来对他与纳赛尔会谈的评议都显示了英国人对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政治舆论的真实状况惊人地无知。他们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重要性不以为然，更不用说纳赛尔本人的地位了，而英国当时还有赖于纳赛尔的合作来维持它在苏伊士运河区庞大的军事基地。艾登和纳赛尔因为忙于处理自己的国内问题，都没能注意到对方为达成1954年的协定所冒的风险。双方都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协定已经冒着很大的风险作出了让步，都不切实际地期望对方以后能有更多的让步。

纳赛尔希望英国承认埃及在东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希望西方在阿以对立中更多地同情阿拉伯国家，增加武器供应和经济援助。他打算一两年后再从埃及刚获独立的角度审订外交政策，考虑同西方建立正式的结盟关系。艾登是不顾党内反对与纳赛尔达成1954年协定的，他还得考虑保守党的传播媒介和公众舆论，因为舆论认为纳赛尔是不可饶恕的敌人，从埃及撤军是英帝国衰弱的最耻辱的标志。因此，艾登希望纳赛尔少惹是非，不要损害或攻击英国在中东或非洲其他地区的利益和行为以便帮助他摆脱困境。他们两人面临的困难的性质极不相同：艾登面临的是一些下院

后座议员的反对,最坏的结果莫过于下次选举的失败;纳赛尔则身居酝酿着革命的火山顶上,一着不慎就可能致个人丧命和社会失控。

1953年,英美重新计划签订中东防御条约时,纳赛尔劝说杜勒斯不要强迫阿拉伯国家加入任何新的联盟。1953年5月,杜勒斯访问开罗期间,纳赛尔告诉他,阿拉伯国家对与外国结盟心存疑虑和反感,因此,尝试建立联盟等于是自取灭亡。它只会削弱阿拉伯各国政府,让共产党人坐收渔利。加强中东的防卫力量应当依靠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及其社会改革与进步的政策,因为共产主义的最大危险不是外部的军事威胁而是来自内部。

这次会谈后不久,埃及军政府在开罗电台设置了“阿拉伯之声”节目。这是唯一的从一个阿拉伯国家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播音的电台节目,它必将成为纳赛尔最有力的政治武器之一。

开始的时候,杜勒斯的想法是首先发展“北部防线”,即在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建立联盟,以条约和基地完成对苏联和中国的环形包围。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便是1953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推翻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第二步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1954年4月2日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美国关注这些国家,不仅反映了它急于遏制共产主义国家这一主要目标,也反映了杜勒斯不想深深陷入阿拉伯世界政治泥潭的愿望。杜勒斯希望在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同时,避免被迫在阿拉伯内部纷争、阿以冲突和英国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纠纷中表明立场。由于强大的犹太人院外集团的压力,阿以冲突一直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非常危险而又得不偿失的问题。但是,杜勒斯为了让纳赛尔同英国取得谅解,打算答应向埃及提供有限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4月,杜勒斯同意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原因是伊拉克政府公开与西方友好,而且同以色列没有共同边界。

英国在中东的防御利益在一个重要方面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就把苏联排斥在中东之外这一点而言,英美的愿望是一致的,

但是,英国人更关心保持自己在中东的政治影响,从而保护自己的石油利益和通讯交通免受阿拉伯国家的威胁。这就意味着要支持亲英和不损害英国石油利益的政权,必要时还给予这些政权以军事支援,这在当时主要是支持对英友好、相信不干涉石油事务的伊拉克。英国人同这些国家领导人由此发展的密切合作关系不只是一个对外防御的联盟。它也成为了一种默契:维持某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根本不管这些地区的人民是如何地讨厌这种制度。英国成功地促使伊拉克政府把70%的石油收入用于经济发展。但是,英国对伊拉克政界的贪污腐败和赤裸裸的警察镇压的做法熟视无睹,赛义德和其他一些人正是由此取得了由地主所组成的议会的支持并镇压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抗。

氢弹试验成功后,英国在中东保持军事基地的理由牵强无力了,它在政治上控制产油国的动机却因而变得更加重要。1954年的英国从埃及撤军协定达成后,赛义德在巴格达重掌政权后能否长期承受住民族主义者要求修改英伊条约、英国从伊拉克撤军的压力很值得怀疑。不管怎样,英伊条约到1956年期满,英国有必要寻求某种途径支持伊拉克的统治集团,使之维持同英国的合作关系。

赛义德着实担心苏联的进攻,他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和英伊条约问题的方法。他设想建立一个西方支持的新的中东防御体系,把阿拉伯国家同美国谋求的“北部防线”联系起来。两者的连接点便是土耳其。赛义德向纳赛尔提出了这个建议。1954年8月,赛义德和埃及国家指导部长萨拉赫·萨利姆少校在伊拉克北部的萨尔桑克进行了商讨。9月15日,赛义德和纳赛尔又在开罗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暴露了双方的想法相去甚远。会谈结束时,他们都产生了误解。

纳赛尔在与英国的谈判中,一直试图把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重新启用限制在阿拉伯国家遭到侵略的情况下,反对把土耳其包括在内。他最后同意接纳土耳其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实际上已经开



后门把埃及同北约连在了一起”。1954年的英埃协定达成后，纳赛尔准备修复同土耳其的关系，但他不打算像赛义德那样走得那么快，那么远。英埃协定毕竟只有7年。纳赛尔想等到英国军队撤出运河区，埃及享有完全独立以后，再进一步考虑埃及政策中的结盟问题。他认为防御体系应当建立在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的基础上，这个体系对西方保持善意中立，这样，西方出于地区防御就能提供援助，为阿拉伯国家训练军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便能取得类似印度的地位，即：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军事组织上与西方关系紧密，但仍然保持外交和军事的独立和不结盟。

这项政策的成败取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能否听从埃及的领导。如果它们选择与阿拉伯以外的国家结盟，埃及将不得不中断在阿拉伯条约中与他们的联盟关系，或者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中立受到危害。因此，1954年，即在《巴格达条约》签订或万隆会议之前，埃及已经在对亚洲阿拉伯国家发起一场反对同外界缔约的运动。纳赛尔指责土巴公约损害了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然而纳赛尔本人对他中立政策的实质也很模糊。甚至到了1955年《巴格达条约》签订后，他仍在考虑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联合的军事体系。由于英国将与埃及、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双边协定，这种体系必然会同西方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伊拉克同英国达成类似英埃之间的那种协定，纳赛尔是不会反对的。伊朗也可以按土耳其加入英埃有关苏伊士军事基地协定的方式参加这样一个协定。实际上，这种安排与《巴格达条约》所做的安排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包括英国、土耳其以及通过英土把北约和其他西方盟国联系起来的防线的最终义务同它们在《巴格达条约》中的义务是相同的。那么，除了艾登列举的嫉妒的动机外，纳赛尔对《巴格达条约》为何感到如此不安呢？主要原因似乎是：纳赛尔认为，这种表面上阿拉伯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防御体系不会像西方国家出于战略需要而建立的体系那样能引起阿拉伯舆论的强烈反感。尽管这种差别仅是公众反应的程度不同而已，但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背景下，它

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埃及远不具有印度那样的有利地位，因而难以雄心勃勃地指导地区性外交的情况下，纳赛尔政策的弱点就是阿拉伯国家的弱点。另一方面，纳赛尔的观点也许非常符合阿拉伯人的政治心态。因此，在对外承担义务时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是现实的。

赛义德从未忽视阿拉伯国家的弱点。他除了相信自己有能力统治本国民众之外，几乎别无幻想。伊拉克是地理上靠苏联最近的阿拉伯国家。赛义德无意中立，他认为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他认为伊拉克只有同西方有效结盟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据说纳赛尔对此的答复是，埃及的政策将一如继往，“未来会在我们之间作出评判”。

赛义德与纳赛尔的分歧及其同西方结盟的根源也许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话表达得最清楚，这篇文章直到他死后一个月才发表。赛义德写道，纳赛尔无疑赢得了阿拉伯人民的广泛支持。

但是，他没能懂得西方无法容忍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他没能意识到西方不会允许阿拉伯国家保持中立，这个地区对西方极为重要，西方不可能做出这种蠢事。他不明白中东在经济上与西方密不可分——例如，中东的石油无法在其他地区找到如此广阔的市场。尽管纳赛尔曾是个军人，他忽视了如果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为敌，苏联并不能保护它们这样一种军事现实……

但是赛义德到1955年9月还没有放弃与纳赛尔达成一致的希望。同纳赛尔的开罗会谈结束后，赛义德显然认为，虽然埃及目前不可能参加他的计划，但它以后还是会参加的；埃及不会反对伊拉克率先采取单独行动。但是，纳赛尔在会谈后却以为赛义德已经承诺不再仓促制定任何新的方案。1954年12月，阿拉伯国家外长在开罗举行会议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误解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

但是，赛义德已准备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年底，他与英国和土耳其共同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让土耳其在英美的支持下参加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英国起初有些犹豫，但身不由己。门德勒斯访问巴格达期间同赛义德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他们早已缔结的防务条约。

用当时英国驻开罗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的话来说，纳赛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不可遏，他采取了一个难以后退的强硬立场”。史蒂文森在看望纳赛尔时向他指出，他这是自寻绝路，纳赛尔回答说：“这是你的错误，你事前没有告诉我。”史蒂文森向他保证，英国事先没料到赛义德和门德勒斯会这么快就取得一致。纳赛尔承认自己发了脾气，但他说了不少话：“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发生。除非你提醒我，否则我很容易草率行动。”

1月22日，纳赛尔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总理会议。这是他亲自参加的首次阿拉伯国家会议，他的目的是谴责伊拉克并取得一个拒绝同本地区以外国家签约的宣言。赛义德拒绝前往，但派了一个代表团。

1月30日，会议派出一个有萨拉赫·萨利姆参加的代表团前往巴格达与赛义德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结束后，赛义德在与萨利姆道别时说：“我不是纳赛尔麾下的一名士兵。请转告他，我永远不会对他唯命是从。”总理级会议在2月6日结束，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这次会议是战后阿拉伯世界发展中意义最重大的会议之一。纳赛尔同法迪勒·加麦里率领的伊拉克代表团之间的冲突远非他们个人或国家荣誉之间（尽管也有这方面的因素）的简单的纷争，而是双方各自精心设计、忠实信守的相互竞争的政策之间的严重对抗。这些政策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双方对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两种对立观点。纳赛尔认为，如果阿拉伯国家能利用联合阵线进行讨价还价，西方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必要的武器而不要阿拉伯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伊拉克人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如果阿拉伯国家不承担一些防务义务，西方是不

会提供武器援助的。纳赛尔过高地估计了西方政策中的理性色彩而又低估了各种政治势力在西方国家中的作用。

从策略上看,这次会议的争论焦点是叙利亚。这预示着叙利亚将在纳赛尔的阿拉伯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叙利亚如果同伊拉克取得一致,它们还能得到黎巴嫩和约旦的支持。尽管叙利亚同意不与外部国家结盟,但它既不谴责伊拉克,也不反对订立条约。会议结束时,开罗电台开始猛烈抨击赛义德是阿拉伯国家的叛徒。2月13日,叙利亚大马士革政府倒台,新的亲埃反伊联合政府掌权。联合政府容纳了中立主义者、左翼的复兴党和独立派的领导人,他们倾向于取得苏联的支持反对以色列。

1955年2月25日,赛义德和门德勒斯在巴格达签订了新的联盟条约。新盟约的产生最终加剧了以纳赛尔为一方和得到英国支持、美国不太热烈的同情的赛义德为另一方的争取其他阿拉伯国家忠于自己的斗争。

拉尔夫·史蒂文森接到伦敦的指示后,于1955年春向纳赛尔作出保证,不谋求《巴格达条约》扩大到伊拉克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之后双方的斗争暂时平息了一段时间。纳赛尔在回复这个保证时对史蒂文森说,如果像英国这样的非阿拉伯国家作为条约成员国与伊拉克和土耳其采取一致的立场,他不认为这是针对埃及的敌对行动。

双方就《巴格达条约》达成的谅解出现平息纷争的效果,由于纳赛尔同时承受的另一方面的压力的加重而遭到削弱。(尽管纳赛尔一向认为巧合的事情都是阴谋,他天性如此。)1955年2月28日,以色列军队打破埃以边界自停战以来长达6年的相对平静,向加沙地带埃军阵地发起了进攻。埃及的36名士兵和2名平民丧生,29名士兵和2名平民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有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自1949年停战以来埃以边界最严重的一次冲突。

与在《巴格达条约》问题上的分歧一样,加沙地带的冲突由来



已久。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签订一系列停火协定之后，人们原以为会由协定迅速转向和平解决，但这种希望遭到破灭。和平努力失败后，边界摩擦日益增多。双方都无意把停战线当作可行的边界线。这些停战线不仅军事上不安全，而且不少地方的划分很不人道，许多阿拉伯村民被从他们的土地和谋生场所隔开。边界冲突渐渐发展为相互渗透、军事进攻和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些冲突大多发生在跨度很长、居民众多的约旦边界。埃及的边界——除加沙地带外大多是沙漠——相对平静。埃以双方关系紧张主要表现在埃及拒不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声称，停战仅仅是敌对行动的暂时中止，因而它同以色列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它有权封锁运河。1888年的《苏伊士运河自由航行公约》允许埃及在战时出于安全需要采取这种行动。1951年9月，安理会否决了埃及对停战的解释，要求它容许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对此，埃及未予理睬。只要以色列拒绝执行联合国诸如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重返家园的决议，没有哪一届埃及政府能执行这样的联合国决议。但实际上，埃及当局对运载非战争物资的非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进出以色列从未干涉过。

1953年，有迹象表明伦敦和华盛顿在埃及革命后正在修改其中东政策，形势由此出现了新的变化。迫于冷战的压力，新当权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了杜鲁门政府的亲以色列政策，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寻找朋友，尽管还不是公开的盟友。英国也开始考虑从埃及撤军。

形势的发展使以色列领导人深感不安，原因是多方面的。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大、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一个更好战和强悍的领导集团。尽管开罗的革命政权起初并没有非常重视以色列，但英国从运河区撤军很可能使埃以之间的缓冲区消失，苏伊士运河将不可避免地控制在埃及手中。以色列认为，英美为建立中东防御体系而寻求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不仅会削弱它们在1950年宣言中所承诺的对以色列的保障，也意味着西方将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更

多的武器。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比任何一个阿拉伯邻邦或它们之间的任何联盟都要强大,但未来的趋势似乎将渐渐朝着打破均势、不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以色列政府因而作出了3个反应。它从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获得了更多的武器。与英美相比,法国似乎更可能向以色列输出武器。它还谋求在英国同意从埃及撤军之前确保自己的船只自由通过运河。最后,以色列政府要求华盛顿保证,美国如果同阿拉伯国家建立任何新的防御联盟,它要向以色列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

1954年2月,以色列再次把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安理会,但没有结果。1954年9月28日,就在英埃关于运河区协定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以色列试探性地派了一艘名叫“贝特加利姆”的货船向运河南端航进,船员都是以色列人。埃及以这些船员袭击埃及警察为由逮捕了他们,扣留了这艘船。10月中旬,“贝特加利姆”事件被提交安理会,但就此进行的辩论一直延迟到1955年1月。埃及此时已经释放了船员,并提出将把被扣留的船只及货物交给以色列委托的任何人,条件是该船不得通过运河。埃及还透露,它一直没有阻挠装载认为不属于战争违禁品的非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开往以色列。“贝特加利姆”事件没能影响英埃双方达成协议。而以色列采取的另一次行动也未能达到破坏的目的。这次行动就是后来在以色列轰动一时的“拉冯事件”。“拉冯事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阻止英埃协定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埃以关系。

1953年年底,本·古里安辞去总理职务,为以色列驻内格夫沙漠的先遣部队出谋划策。他让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平哈斯·拉冯主管国防部事务。拉冯在同僚中以精力充沛和狂妄傲慢著称,不少人认为拉冯是本·古里安的接班候选人。拉冯曾一度反对本·古里安的“行动主义”政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大规模报复的鼓吹者。1954年7月中旬,据说拉冯批准了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的一项建议,即:炸毁英美在埃及的官方机构,并嫁祸于埃及人。以色列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恶化英美与埃及的关系,破坏英埃谈判,确

保英国军队继续留在埃及。拉冯显然不知道，等到他批准这项建议时，破坏活动已经结束并遭到了失败。在埃及的一些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被征召起来，组成了规模很小、间谍技术低劣的间谍网，他们奉命进行一些爆炸活动，但大多数人已经被埃及的秘密警察逮捕。几年后人们才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派往埃及建立间谍网的人中有一个同时为埃及工作的双重间谍。这些间谍(有一名妇女)被捕后与外界隔绝长达几个月，他们被捕的消息直到10月初才予以公开。直到这时，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才开始听取事件的真相，因为事件引起的争论正在导致国防部内部拉冯与军队统帅和军官们的分裂。埃及政府在审讯并处决了企图杀害纳赛尔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后立即审理了这桩犹太间谍案。结果，受到指控的两个犹太人被处死刑，一个是在突尼斯出生加入了法国国籍的马尔朱克博士，另一个是教师塞缪尔·阿兹扎尔；6名被告，包括一名妇女马塞勒·尼诺，被判处长期监禁；另一个被告马克斯·见内特在单人牢房中自杀。审判是公开而公正的，但马塞勒·尼诺在法庭上声称她在审讯期间受到了虐待。

据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家说：“此后，以色列很不明智地向纳赛尔施加了公开和非公开的压力以挽救两个死刑犯的生命。”但是，就在判决宣布4天后，马尔朱克和阿兹扎尔被绞死了。据说纳赛尔曾答应美国调解人、美国人权同盟主席罗杰·鲍德温，埃及将缓期执行这两个间谍的死刑，但是其他的同僚们都不同意，因此否决了这个意见。间谍事件在以色列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激起了以色列公众反对纳赛尔的情绪，也引起或者至少加快了以色列政策的重大改变。

判决执行几天后，拉冯辞职，本·古里安复任国防部长。本·古里安重返国防部后，首先关心的是恢复在拉冯与军官们争吵时受挫的以军士气，恢复公众被“贝特加利姆”事件和间谍事件动摇的信心。他复职一星期后便下令向加沙地带发起进攻，声称这是对埃及情报人员和破坏分子袭击以色列的报复。尽管此前确实发生

了这类事情，联合国停火监督员伯恩斯将军在1955年3月17日给安理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进攻加沙之前的伤亡数字表明，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停战线沿途还是比较平静的。”埃及政府告诉伯恩斯，以色列的袭击是埃及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他们认为是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目的是加剧埃以边界的紧张局势。1954年11月，纳赛尔在与伯恩斯进行首次会谈时告诉伯恩斯，他不想同以色列发生边界纠纷，也不想进行军事冒险。伯恩斯对此评论道：

很难确定纳赛尔的话有多么可信，他说话时显得诚恳坦率，但没有威胁恐吓，相反却似乎是通情达理的。但是，人们不该忘记，他是一个通过阴谋和革命获得权利的政治家。

但伯恩斯在分析纳赛尔的政策后认为，埃及不可能正在筹备发动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因为这——除了作为一项长远目标——与纳赛尔把中东阿拉伯国家统一在埃及霸权下的主旨不相符合。

夏里特虽然原则上批准了对加沙的进攻，但也对伤亡规模感到害怕，尤其在他开始同美国一起探讨与埃及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新途径以后更是如此。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是最可能带头同以色列寻求现实解决争端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人们认为，在涉及同以色列的争端的问题上，那里的公众舆论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那样情绪激动。但是，对本·古里安来说，进攻加沙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更有力的安全政策的第一步，而这种政策必将最终导致针对埃及的“预防性战争”。不管有意无意，进攻加沙在《巴格达条约》签订后第3天进行令人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审自己政策的时候，犹太人地下武装哈加纳向巴勒斯坦的战略要地发起了进攻。以色列这次进攻加沙是向西方国家显示自己的力量并提醒它们，以色



列在西方目前考虑的任何中东军事安排中均不容忽视。但对加沙地带的进攻导致的主要后果是加剧了埃以双方的军备竞赛,并开始了新的更加残酷的恐怖主义、偷袭和报复的循环对抗。

以军对加沙的进攻加剧了埃及军方向纳赛尔施加要求获得更多的武器的压力。尽管埃及在签订苏伊士运河协定后从英国获取了少量现代化武器(主要是很久以前订购的“百人队长”式坦克,供货已经停止),纳赛尔清楚,以色列正从新的武器来源——法国——取得数量可观的新式武器。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爆发的起义使以色列的论点在巴黎有了更强的说服力,这些论点主要是为了说服法国军方领导人的,即以以色列和法国应该合作共同对付阿拉伯国家。1954年年底,法以两国国防部长签订了一项法国向以色列提供坦克、飞机、枪支和雷达的协定。

另外,还有一些非正式的交易。1955年1月的一天,纳赛尔邀请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会谈。纳赛尔愤怒地猛烈敲击一下堆放在他办公桌上的票据,说这些票据是100辆“谢尔曼”式坦克和100架口径75毫米的炮塔内旋回式机枪(两者结合便是“超级谢尔曼”式)的订单复印件。这些武器显然是用船直接从英国运往以色列的海法港的。“你们应该保证我们同以色列人的武器平衡,”纳赛尔说,“你们打算为我们做些什么?”史蒂文森回答说,他将核实一下这项消息,但又指出:不管怎么说,英国已经向埃及提供了比“谢尔曼”式更先进的“百人队长”式坦克。纳赛尔答道,以色列掌握100辆“谢尔曼”式坦克便有了很强大的攻击力量,除非他也能取得武器,否则他的政权不可能指望得到军方继续支持。

史蒂文森的查询证实了法国一直在秘密破坏1950年的三方武器控制协定。法国的利益是,用废铜烂铁换来英国的“谢尔曼”式坦克,由英国运往瑟堡,然后直接转运以色列。不久,纳赛尔让史蒂文森转告艾登,如果英美不能向他提供武器,他将不得不另谋出路。史蒂文森相信纳赛尔说到做到。

英国明确表示,埃及能否获得大量的武器供应取决于纳赛尔

对《巴格达条约》能否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2月，美国拒绝了纳赛尔提出向埃及提供价值2700万美元的武器的请求，理由是埃及不能支付现金。早些时候，纳赛尔拒绝了美国向埃及提供武器的建议。原因是美国附加了条件，即纳赛尔应接受美国的军事使团。

就在纳赛尔继续徒劳地向西方寻求武器的同时，他用对付苏伊士运河区占优势的英军的策略对付以色列的军事压力。他组织突击队（即“敢死队”）在以色列进行大规模的恐怖和破坏活动。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纳赛尔在国际舞台上作了第一次重要的露面。他在幕后的委员会的工作中表现了出色的冷静和办事效率。他在万隆的经历使他有了新的世界政治视野。他感受到了代表十多亿人民的领袖们对埃及人民——还有他自己——对殖民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切齿痛恨的共鸣。这展示了不屈不挠的亚非国家广阔的政治前景。回国途中对印度的访问加强了他的中立主义倾向，而此前他与尼赫鲁和铁托的接触以及他对《巴格达条约》的反对都助长了这种倾向。会议期间，在杰出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积极努力下，纳赛尔同这位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万隆会议对这位中国总理来说是一次个人的外交胜利。在两位领导人的谈话中，纳赛尔向周恩来询问中国能否向埃及提供武器，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答应中国将购买埃及的部分棉花，并向苏联转告了纳赛尔的询问。

据纳赛尔讲，他第一次就武器问题同苏联接触是在1955年6月通过苏联驻埃及大使进行的。也是在这年6月，纳赛尔告诉美国驻开罗大使亨利·拜罗特，苏联允诺向埃及提供武器。如果他无法从美国获得武器，他将接受苏联的建议。拜罗特向他的英国同事史蒂文森转告了纳赛尔的话，史蒂文森又向伦敦作了汇报。伦敦随后指示史蒂文森警告纳赛尔，如果他接受苏联的武器，英国就不可能再向他提供武器。纳赛尔非常气愤。不久，他向汉弗莱·特里维廉（他于1955年8月接替史蒂文森继任驻埃大使）指出，他认为英国传来的这个信息是一种威胁，他不能接受。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同

英国就武器问题进行任何会谈。

5月,以色列在其独立纪念日阅兵式上展示了部分购自法国的新式飞机和坦克。在同年夏天的以色列国会竞选中,充满了赞成和反对“行动主义”的争论。由恐怖组织前领导人梅内姆·贝京领导的右翼自由党公开鼓吹扩张以色列的疆界——甚至提出了“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口号——以及向阿拉伯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在新成立的国会里,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左派和右派的行动主义者占了多数席位。以色列的事态发展引起了埃及的很大不安,而加沙地带武装冲突在8月和9月初的加剧更增加了这种不安。8月22日,以军攻占了加沙地带以东5公里处分界线附近的埃军驻地,打死打伤6名埃及人。作为报复,埃及向以色列再次派出突击队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行动,杀死了11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打伤了9人。埃及在此前3个月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这种恐怖活动,只是在2月加沙地带发生第一次冲突以后才重新开始。8月31日,以军又向加沙地带的埃及警察驻地和其他阵地发起了进攻,打死了36名埃及士兵、警察和平民,打伤了13人(这是埃及公布的数字)。埃及总司令阿米尔将军打算发起反攻,但被纳赛尔制止。

这个插曲加上纳赛尔争取获得西方允诺提供大批武器的努力不断失败,不可避免地促使纳赛尔采取新的大胆的路线。9月27日,特里维廉拜访纳赛尔,询问有关埃及正在进行军火交易的传闻。纳赛尔实际上证实他已经签署了购买苏联武器的协定,尽管他说那是通过布拉格进行的。英国外交部没同特里维廉和纳赛尔进行进一步商量便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纳赛尔对此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泄了密,是有意“把他推入困境”。当天晚上,他发表了一个挑战性的演说,宣布了订购武器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在接到有关报告后,派特使乔治·艾伦飞往开罗,试图劝说纳赛尔改变主意。但是,艾伦的使命正如英国的进一步的抗议一样没有成功。

纳赛尔又在开罗的军队检阅式上发表讲话,宣布埃及在上个星期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项以棉花和大米换取武器的“商业协定”。在陈述了他请求西方提供武器遭到失败后,纳赛尔指出:“法国一直在与我们讨价还价,法国人要我们不要谴责他们在北非的政策,否则就得不到他们的武器。也就是说,法国要我们背叛阿拉伯人的本质,放弃人道主义,容忍它在北非的屠夫行为。”美国提出了共同安全条约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附加条件;英国提供的武器远远低于它所承诺的数量;与此同时,以色列却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几个国家获取武器。纳赛尔还指出,西方报纸说以色列军队在武器装备上比埃及军队精良,阿拉伯所有国家的军队加在一起也难以打败以色列。

一个星期以后,以色列政府公开宣布开罗所说的以色列有武器优势“毫无根据”,并说明了自己获取更多武器的意图。然而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的助理部长西蒙·佩雷斯却说出了另一番话。在对国防部人员的讲话中,佩雷斯对过去两年的重新装备计划作了回顾。他说:“在取得武器方面,我们已经为以色列赢得了相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优势。”以色列已经大大扩充了装甲部队,并获得了“使我们拥有新的空中优势”的现代化飞机。

纳赛尔第一次同苏联集团进行军火交易(他后来承认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与苏联而不是与捷克做的)的确切条件是什么从未正式公布过。据美国官方估计,埃及购买了80—100架米格喷气式战斗机,30—45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100辆斯大林式和T34型坦克,几百架装甲部队运载机,还有大炮、卡车、反坦克火箭炮以及一些轻型武器和弹药。这些军火的费用由埃及在长达几年的时期内以交付棉花和大米的方式偿还。华盛顿对这笔交易的价值估价在9000万至两亿美元之间不等。英国则估计军火金额在1.5亿英镑左右。这笔钱购买的武器包括300辆中型和重型坦克,100多架自行火炮,2艘驱逐舰,4艘扫雷艇和20艘机动鱼雷艇。

埃以危机自英国从运河区撤军的协定达成后便出现了,而与



捷克的军火交易则使危机进一步加剧。纳赛尔在阿拉伯公众中的声望一夜之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们钦佩他的勇气,敬佩他拒不屈从西方国家所强加的武器控制制度,这个制度似乎是要使阿拉伯人受制于以色列的军队。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只是纸上谈兵,纳赛尔却敢做敢当。当时,阿拉伯人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次军火交易广泛的国际意义。阿拉伯人知道他们和纳赛尔都不是共产党人,阿拉伯国家也无意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苏联不像西方那样在提供军火时附加政治条件,埃及为什么不可以从苏联获得它所急需的武器呢?对于那些生活在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人(也许黎巴嫩的马龙派天主教徒除外)来说,以色列是一个比苏联更直接更现实的危险。

苏联的军火生意并没有把冷战带进中东。此前,冷战已在中东存在,并为那些建立西方支持的地区性防御体系的措施加剧,又在《巴格达条约》成立时达到了顶峰。但是这次军火交易明确了一点,即中东不再纯粹是西方的势力范围。西方不能再简单地指望拒苏联于阿拉伯世界的门外。俄国在离开中东近40年后,又在这里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大国影响,它廉价地在阿拉伯最重要的并对非洲有影响的国家确保了自己有价值的政治立足点。西方不可能再把阿拉伯国家当作自己动荡不安的卫星国了。在该地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经以新的方式展开。这场斗争成了西方和共产主义集团之间为赢得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同情的竞争的一部分。这场争夺是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和平共处”主张及他们喧嚣一时的印度之行引出的。然而,西方国家未能及时意识到中东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对杜勒斯来说,中立主义是“不道德的”。英国惯于用军事和行政手段在中东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对用政治经济手段对付阿拉伯国家则感到难以适应。

然而,在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愚蠢的惊慌失措产生之前,杜勒斯和艾登已经首先着手恢复西方失去的政治地位。从以色列第一次进攻加沙到苏埃达成军火交易的几个月里,不仅埃以紧张关

系急剧恶化,同样也有杜勒斯在艾登的支持下努力促使埃以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这种努力在苏埃达成军火协定后的几个月里仍未中止。这个和平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对以色列要求的反应。以色列的要求是美国与它结成与《巴格达条约》并行的联盟或提供军事保障。

英美解决问题的设想引起了纳赛尔的兴趣。英美认为和平解决争端的关键是边界、难民和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对纳赛尔来说,前两点更为重要。他认为以色列必须准备接受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并向其他难民提供补偿。如果阿拉伯人提出的全部难民重返家园的要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他们至少必须得到一些象征性的领土补偿。埃及此时因停火线而产生的最大忧患是:由于以色列控制了内格夫,埃及失去了与东部阿拉伯国家的陆上联系。约旦最大的困难是无法进入地中海。纳赛尔的首要要求——或许也是他最起码的谈判条件——是获得比尔谢巴南部的内格夫的大部分,以重新建立与约旦的陆上联系。

伦敦和华盛顿讨论了各种复杂的有关建立交叉或走廊地带的方案,这些方案都是为了把埃及、约旦和加沙地带连接起来而又不阻碍以色列进入埃拉特。美国似乎对其中的一种方案最为欣赏。这个方案设想,以色列放弃沿西奈边境的一条狭长地带,这片地带从加沙开始一直南下至亚喀巴湾南端的约旦边境。这条走廊不但不会穿过以色列的中心地区和任何居民集聚地,还能把约旦与地中海、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和埃及联接起来。走廊将从无法用于农业生产的荒漠中穿过。如果把它非军事化,它还能成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缓冲区。英美也就能找到一种办法使以色列经过这条走廊到达埃拉特。

实现这个方案的障碍是很明显的。除了埃及要求获得内格夫地区包括埃拉特在内的更多地盘外,以色列人普遍反对放弃1948年战争中占领的任何一寸领土。更主要的是,以色列人,尤其是本·古里安强调内格夫和他们在亚喀巴湾的立足点对以色列有着

具体现实的、思想感情上的和几乎神秘的重要性。以色列认为它能进入地中海和红海是很有价值的地缘政治优势，埃及是享有这种优势的唯一的另外一个国家。以色列还打算把埃拉特作为它在非洲和亚洲扩大贸易和政治影响的入口。由于阿拉伯国家禁止以色列通过运河，因而埃拉特将会成为以色列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输入港。也许有一天它不仅是一条输油管道的终点，还能成为另一条从埃拉特经过内格夫到地中海的可与苏伊士运河抗争的运河。以色列一直对内格夫南部的岩石荒地有丰富的矿藏抱有希望。本·古里安梦想把半是沙漠半是草原的北部内格夫变为可以开垦的疆界，以便在未来为以色列膨胀的人口提供疏散地，尤其要考虑到如果苏联的 300 万犹太人获准迁移的情况。

不过，如果按美国的方案真正能够和平解决问题，该方案对以色列潜在的有利方面并非微不足道。对这样一种结果来说，付出这种代价按理不算过分。美国人和一些以色列经济学家认为，以色列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居住和扩张的梦想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内格夫，尤其是在它南部的不毛之地发展农业无利可图。预想中的矿藏是否能达到值得开采的数量还令人怀疑，况且运输问题也困难重重。如果双方能签订和约，使苏伊士运河对以色列开放，并且阿拉伯国家能解除石油封锁，那么埃拉特就不那么重要了。

杜勒斯在 1955 年 8 月 26 日的演说中间接但公开地提到了美国方案的这些设想。他提出，美国将帮助安置和赔偿阿拉伯难民，它将通过正式条约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一致同意的边界提供保障。杜勒斯还希望其他国家也能一同提供保障，但保障要由联合国首先提出。他还指出，由于以色列认为“即使是不毛之地也具有感情上的意义”，要达成永久性的边界协定也就难上加难。次日，英国政府表示同意杜勒斯的建议。阿拉伯国家对这些建议很冷淡，因为接受建议就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国家。但阿拉伯国家几乎已经接受了美国特使埃里克·约翰斯顿提出的有关解决约旦领海问题的建议，但是在叙利亚的坚持下，又于 10 月 12 日最终拒绝了。以色列

对杜勒斯的建议更是断然拒绝。10月18日,夏里特在对国会的讲话中表示欢迎建立保障以色列边境的安全条约的建议,但又声明以色列不会考虑任何单方面的领土让步。

几天后,以色列的政策急剧转变,从用谈判解决问题的思想转向制定防御性战争的计划。1955年10月22日,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召回在法国度假的陆军参谋长、陆军少将达扬,指示他制定夺取蒂朗海峡的计划,以确保以色列通过亚喀巴湾和红海的航行自由。这个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埃及上个月采取行动加强对以色列通过亚喀巴湾的航行封锁作出的反应。埃及声明海峡是其领海的一部分,禁止以色列船只和飞机通过蒂朗海峡,其他国家的船只和飞机通过海峡也要得到埃及的允许。

边界冲突和相互报复的反反复复已经成为阿以冲突的传统模式,以色列扩大了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则加紧进行游击偷袭和封锁。双方都能从感情上、政治生存和正当权益方面找到很有力的理由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但是,纳赛尔和本·古里安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这些策略上的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深远影响。

不管纳赛尔加紧封锁蒂朗海峡的行为是否明智、是否道德,埃及声称有权这样做并非没有正当理由。国际海洋法有几个最有争议的方面,这实际上是其中一方面的一个特别复杂的实例——一个几乎是内陆海峡的案例,其中的海岸线重要部分的主权引起了争议。阿拉伯国家一开始就拒不承认以色列在埃拉特的权力,尽管该地区在1947年的划分方案中被划给了以色列。1949年,埃以达成停火后,约旦和以色列的停火谈判也进入了最后阶段,以色列在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出兵占领了该地区。但蒂朗海峡两岸和其中的两个岛屿都分属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亚喀巴湾海岸也基本属于埃及和沙特,只有埃拉特附近的海峡南端几公里由以色列控制,而环亚喀巴港口的狭长地带则归约旦。海岸与蒂朗海峡中的岛屿之间的通道只有两英里宽,因此这条通道在埃及和沙特的领海里。法律上的问题是,亚喀巴湾是否像以色列所说的是国际水域的一部



分,所有船只都可以自由而不受损害地通过;埃及在停战的情况下提出的行使战时封锁权力的要求——这个要求在上次运河事件中已被安理会否决——是否符合亚喀巴湾事件的情况。

埃及在此时对埃拉特采取行动加深了本·古里安的疑虑,他视之为企图剥夺以色列占据内格夫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阴谋的又一迹象。他认为这种解决方法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所希望的以牺牲以色列为代价平息埃及的不满。

至此,采取和平步骤和制定战争计划之间的竞争步伐加快了。1955年9月间,边界关系紧张的主要地区从加沙地带转向了奥贾非军事区及其两边的埃以边境的主要战略防区,埃以互相进攻的几条主要路线中有一条从该地区穿过。以色列借口建立集体村落在奥贾非军事区建立了军事据点,破坏了停战协定,而埃以双方驻扎在毗邻地区的军队在部署和数量上都违背了停战协定。进攻与反击不断发生,联合国促使双方达成撤军协定的努力未能奏效。

1955年11月2日,本·古里安接替比较谨慎的夏里特成为以色列总理。同一天,他对国会发表了一个好战的演说,警告埃及它的游击行动和封锁蒂朗海峡有可能导致战争。本·古里安要求双方全面遵守停战协定,并提出同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直接和谈,但又声称:“如果暴力行动干扰了我们在陆上和海上的权益,那么,我们将保留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保护我们权益的行动自由。”本·古里安还指出:“我们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任何人发动战争;我们不想取得一寸外国领土,但是,我们将誓死不让任何人夺走我们的一寸领土。”

尽管本·古里安发表了上述声明,但他却同时建议内阁让以军发起进攻,夺取蒂朗海峡,换句话说,对埃及发动战争。内阁“判断时机尚不成熟”,但又表示以色列要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采取行动。

英美政府开始对不断加剧的边界紧张关系感到不安,但无论是英美还是法国都不准备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维持和平,也不想通

过联合国或根据 1950 年的三方宣言采取有效措施。他们的行动仅仅局限于对伯恩斯坦将军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调处努力的口头支持,以及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促使争端的和平解决。

11 月 9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提出美国愿意通过正式条约对阿以双方一致同意的边界提供保障。同一天,在英国首相传统的一年一度伦敦市政厅的演说中,安东尼·艾登要求阿以双方就未来的边界达成妥协。艾登指出,阿拉伯国家已经表示它们愿意在 1947 年的划分方案和其他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同以色列讨论和平的条件,而以色列则坚持 1949 年的停战线。“严峻的事实”是,如果阿以双方希望取得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和平,“它们必须就各自的立场达成妥协”。

艾登也是在发表这篇演说的同时想出了一个解决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关于的里雅斯特争端的成功的提议。这篇演说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欢迎,但遭到了以色列的愤怒指责。纳赛尔欢迎艾登的建议,认为它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他曾公开表示,他认为 1948 年的贝纳多特方案是一个比 1947 年划分方案合理的谈判基础。由当时的联合国调解人起草的贝纳多特方案计划把内格夫和加沙地带划给约旦,作为交换,以色列控制整个加利利,该地区西半部在 1947 年的方案中划归了阿拉伯国家。

纳赛尔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解决方法都必须包括阿拉伯难民或能重返家园或能得到赔偿,尽管他认为,如果重返家园意味着回到以色列政府的统治下,也许绝大多数难民都会选择取得赔偿。如果以此为基础纳赛尔就能认真进行谈判,取得问题的和平解决吗?我作为一个记者,在当时同包括纳赛尔在内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中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以色列为取得问题的永久性解决而让出一部分领土,阿拉伯国家会比 1949 年以来其他任何时候都愿意接受最终和约,包括接受边界得到大国保障的以色列国家。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还会有漫长的讨价还价。并且,只有阿以边境能有较大的平静,各方停止对《巴格达条约》的

纷争,这个过程才能真正开始。对纳赛尔来说,为取得和平解决争端而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意味着相当大的政治危险。当时,他正同伊拉克争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忠诚,尤其是争取叙利亚和约旦,而这两国比其他国家都更关心以色列问题。不管纳赛尔对于寻求和平是否认真,他对避免战争这一点是很认真的。虽然埃及获得了苏联的武器,但它的地位较之以色列仍处弱势。1955年12月12日,艾登告诉下院:“我相信,以色列现在同它任何一个阿拉伯邻邦或它们之间的任何联合相比,在军事上都不居劣势。”能准确评估双方力量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认为,埃及需要两年的时间熟悉和掌握从苏联获得的新式武器。《巴格达条约》以及条约产生的争吵,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和及其集体安全条约的分裂,削弱了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地位。在埃及军方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反击行动的压力下,纳赛尔最关心的是避免边界武装冲突,因为他知道埃及根本无力支撑这样的反击行动。纳赛尔建议埃以双方在边境的军队应当从边界线两边各后撤500英尺,这个建议后来包括在获得安理会批准的伯恩斯坦将军的方案中了。不久对纳赛尔和平意图的评估便成了学术探讨性的问题了。在艾登的伦敦市政厅演说6天后,英美的和平提议因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而夭折。本·古里安在国会发表的措辞严厉的演说中指责艾登所提出的是“一个减少以色列领土从而有利于它邻国的建议”,而且“毫无法律上、道德上或情理上的基础,因此不予考虑”。

本·古里安的不妥协态度又因为他得知以色列与法国埃德加·富尔政府于3天前签订了新的武器协定而加强。根据这项协定,以色列将获得另外24架海市蜃楼式喷气式战斗机以及更多的坦克和枪炮。法国一直反对英美作出的有关《巴格达条约》的计划,因为它历来就不满足于英国和伊拉克可能就叙利亚问题作出的安排,叙利亚曾是法国单独的势力范围。法国的这种态度使外交部对埃及和以色列这两个都反对《巴格达条约》的国家的态度也很矛盾。但是以色列政府成功地绕过外交部,同法国国防部和一些部

长、军人和政客建立了联系,这些人最关心的是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他们以国防部长马努里为首,既有影响又固执己见。他们同意以色列的观点,即:法以两国在阿拉伯有共同的敌人,特别是纳赛尔这个向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并进行广播宣传的敌人。这个法以新联盟在1956年1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莫内领导的政府上台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莫内的社会党和激进党人联合政府是因其在阿尔及利亚寻求和平的诺言而获选的。但是,在莫内2月访问阿尔及尔期间遭到了愤怒的欧洲工人以投掷西红柿相迎之后,他改变了政策,开始对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反抗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同时,以色列在巴黎的影响由于法国社会党和以色列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而得到加强。

纳赛尔因此面对了一个不断加强的法以联盟。然而尽管他与苏联有武器交易,他同英美的关系尚未僵化到敌对的程度。美英对埃及的政策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仍留有余地,直到最后因为阿斯旺水坝的资金筹措和约旦的前途这两个问题,美英对埃及的敌对政策才具体化。对美国来说,第一个问题是决定性的因素,对英国来说则是第二个。

埃及革命政权当政不到一年就开始认真研究在阿斯旺南部的尼罗河上建立大坝了。对这项工程的最后设想是:它将长期蓄存尼罗河水,使上埃及得以四季灌溉,同时使另外的125万英亩土地可供耕作。大坝还将为工业化提供相当可观的电力,而工业化对于为埃及迅速膨胀的人口提供就业必不可少。大坝约2.5英里长,365英尺高,拦成一个344英里长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大坝安装的12台涡轮机每年将提供100亿千瓦的电力。

埃及计划在10年内分两阶段建成大坝。工程费用估计在13亿美元(4.66亿英镑)左右,其中三分之一须用外资,并且外资的大部分将在第一阶段使用。取得这笔外资是建造大坝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同苏丹达成新的尼罗河水量分配的谅解,而且建筑大坝会使尼罗河流域在苏丹境内的124英里长的延伸地



带遭到淹没,因此约有 5 万人需要搬迁,埃及还要就此与苏丹取得谅解。

自 1953 年埃及政府开始与世界银行讨论国际资金援助以后,几家欧洲公司就对实施大坝工程产生了兴趣,其中西德公司最先作出了表示。世界银行在埃及政治比较稳定之前一直不愿考虑贷款。这就意味着埃及要首先与英国就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达成谅解,然后再同苏丹取得谅解。1955 年,纳赛尔及其同事仍在试图劝说即将诞生的苏丹国家的领导人选择与埃及联合而不是完全独立。埃及的利益所在显而易见——确保尼罗河上游不被敌对势力控制。也许还有一个次要的目标,即为埃及的过剩人口寻找一个疏散地,尽管埃及农民很少迁移。联合为苏丹带来的利益就不那么明显了:埃及的支持对于结束英国的统治是有帮助的,埃及还是很多北部苏丹人的文化中心,但是埃及有关联合的建议不能保证带来物质利益,诸如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留在苏丹的英国官员的可疑影响加深了埃及对苏丹的担忧,这种担忧也反映在埃及选择的手段上——它用贿赂和阴谋加紧在非穆斯林的南方和穆斯林的北方相互争斗的各派中进行宣传。这种策略加强了英国外交部里这样一派人的势力,他们认为纳赛尔对英国怀有无法改变的敌意,不能信任他会遵守协定。

然而,英国官员自己并不忌讳小施诡计。到 1955 年秋,苏丹选择独立已势在必行,英国政府在喀土穆的英国总督诺克斯·赫尔姆的压力下建议英埃放弃苏丹协定中要求成立国民代表大会的条款,共同宣布苏丹独立。纳赛尔通过英国大使特里维廉答复说,他现在确信如果进行自由投票,苏丹人民将会选择独立,但是他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并将不得不尽可能长时间地遵守这个苏丹协定。特里维廉劝告外交部信守协定条款,但遭到了否决。英国秘密地向苏丹总理阿扎里提出建议,让他发表一篇包含要求英国支持内容的独立宣言,阿扎里未置可否。但是就像特里维廉预料的那样,纳赛尔听到了英国行动的风声。他认为这破坏了他与英国大使达成

的谅解：在处理苏丹事务时，双方谁也不要试图“将对方置于困境”。1956年1月1日，阿扎里在同苏丹国会取得一致后宣布苏丹独立，纳赛尔强忍失望，同英国一样立即承认了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埃及与苏丹联合政策失败的牺牲品是主要负责苏丹事务的埃及国家指导部部长萨利姆少校。1955年8月，他被免职，作为安慰，他获得了报纸专栏作家的工作。）

尽管关于尼罗河水量分配的协定迟迟未能签署，美英因为自己新的利益遭到了苏联的挑战而促使世界银行对大坝资金问题采取比较紧迫的措施。1955年，苏联表示它愿意提供1亿英镑的贷款供埃及用于工业化，同时为建筑大坝提供材料和技术人员，从而使苏联的援助超出了武器供应范围。英美政府对苏联在中东和非洲不断扩大的经济政治渗透的前景深感恐慌。它们决定共同进行高价投标以阻止苏联，从而确保西方资助大坝。12月17日，美英宣布它们将提供大坝工程第一阶段所需要的部分外汇，并将“根据将来的具体情况真诚地考虑”与世界银行一道在工程的以后阶段给予进一步支持。

在第一阶段，美国提供了5600万美元（相当于2000万英镑）的贷款，英国提供了1400万美元（500万英镑），这些资金一同作为世界银行2亿美元贷款之外的对工程援助。其余的资金使用埃及货币，并由埃及自己承担。

1956年2月，当艾登和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会晤讨论中东政策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纳赛尔对英美援助的态度将是他与西方合作前景的一个重要预兆。

纳赛尔和国际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的接触已经显示出他对英美援助和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极端怀疑。英美的条件是，埃及拒绝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援助；大坝工程比其他工程优先；批准那些以竞争为基础的工程项目合同。世界银行也对埃及政府的资金使用在预算和支付平衡这两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纳赛尔面临外国对埃及经济密切监督的危险而心存疑虑，犹豫不决。他得到的解

释是，世界银行是属于联合国的国际性机构，它的高级职员都是来自各国的非官方雇员，它的制度对各国都一视同仁。然而，纳赛尔不无真实但相当坦率地指出，美英向世界银行提供了这样大的一部分资金，因而它们很可能对银行的贷款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

美国政府把纳赛尔的谨慎归因于他已暗中得到——或认为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承诺作为防备措施，并正在左右要挟以取得最可能有利于自己的地位。然而，它们低估了纳赛尔受到埃及历史影响的程度。纳赛尔时刻担心埃及刚刚赢得的独立会再次因为外国债权人的绝对势力而丧失，就像赫迪韦·伊斯梅尔的债务首先导致了欧洲对埃及的财政控制，随后便是英国的占领。

如果不是其他事态的发展削弱了纳赛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双方因大坝产生的误解本来是可以消除的。11月上旬，约旦国王侯赛因告诉英国，约旦准备参加《巴格达条约》。这件事的主要推动者又是土耳其，侯赛因就是在土耳其总统访问约旦期间下此决心的。英国为又一个阿拉伯国家参加条约而欣喜，因为此前伊拉克作为条约唯一的阿拉伯国家颇感孤立。这个举动公然违背了英国几个月前对纳赛尔作出的不把条约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保证。但是英国可以申辩，纳赛尔与苏联的武器交易造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局势。为了抵消预料中的埃及的敌对宣传，艾登决定要充分显示与约旦结盟的价值。他派帝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前往安曼。作为见面礼，坦普勒带去了10架吸血鬼式喷气式战斗机，许诺英国将提供大批的其他军事装备，并答应约旦一旦签署《巴格达条约》，双方就起草新的协议取代两国现存的条约。坦普勒将军1955年12月6日至14日在安曼逗留期间告诉约旦政府，英国将为阿拉伯军团的另外两个步兵营、一个中等规模的炮兵团和一个坦克团提供装备和军费。

为了掩盖破坏原先向埃及所作的保证，英国外交部指示特里维廉通知纳赛尔，坦普勒的使命无意逼迫约旦参加《巴格达条约》，条约问题只是在讨论武器供应时出现的。但是，纳赛尔清楚这是

“一个自欺欺人的解释”。结果，他加紧进行反对英国和《巴格达条约》的宣传，从而进一步损害了英埃关系并危及了约旦的国内形势。

由于约旦的4位巴勒斯坦人部长辞职而拒不接受坦普勒的建议，约旦政府因分裂而垮台。这些部长声称他们反映了大多数民众的意见——至少当时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包括难民有这种意见——因而反对约旦参加《巴格达条约》，因为那将意味着与埃及分裂。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不能冒险失去埃及对他们在边境反对以色列的支持。在约旦内阁爆发危机的同时，国内又发生了普遍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坦普勒只得空手而归，只是他与约旦政府一致同意他将在约旦政府感到稳固有力的时候返回约旦继续谈判。不少约旦人担心由国王亲信组成的新政府会再作此图谋，开罗电台的宣传也增加了这种担心。人们对政府未能举行新的选举而感到愤怒，这种担心和愤怒在1956年1月的早些时候导致了约旦国内更广泛的动乱，特别是在西部约旦河沿岸的城镇。动乱中至少有7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许多建筑物被焚烧。英国准备向安曼空运军队，而侯赛因国王则要求伊拉克出兵。但是英国和伊拉克最终都未出兵。接替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外交大臣的赛尔文·劳埃德向纳赛尔传递了一个含有抗议、威胁和怀柔的信息。这是警告纳赛尔，英国将来与埃及的友好关系取决于埃及停止对约旦的敌意，特别是停止开罗电台的反英宣传。劳埃德向纳赛尔保证：英国无意孤立埃及，英国希望开罗与巴格达之间能有良好的关系。

坦普勒事件过去之后，纳赛尔开始认为英国政府试图在赛义德的帮助下孤立埃及，使之再次依赖英国。英国政府则在寻求一项与埃及敌对的政策。纳赛尔和英国都声称自己的行为仅仅是对对方敌对行动的反应。尽管纳赛尔心存疑虑，他仍然准备考虑特里维廉在1956年1月1日与他谈话中提出的一个有关停止外交纷争的建议。这个建议本来可以恢复双方以前的谅解，即如果《巴格达条约》不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纳赛尔就会停止对条约的攻击。



但是，当时英国政府仍然急于扩大签约国。它显然认为，伊拉克政府和赛义德的声誉迫使他们同纳赛尔争取影响阿拉伯国家，如果这场斗争失败，那将意味着赛义德和巴格达政府受到孤立的危险。

很奇怪，英国的外交活动甚至没有从时间上进行相互协调。艾登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的提议是否能成功取决于阿拉伯一方，主要是埃及的反应。纳赛尔的反对会立刻把这个提议埋葬，因为只有埃及和纳赛尔的影响和领导地位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但是与此同时，艾登却在准备把约旦拉入《巴格达条约》，英国的举动必然引起埃及的敌意和疑虑。此外，此举还特别预示了它将毁灭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以便同以色列妥协解决问题的前景。约旦同以色列有很长的边界线，其人口的三分之二是巴勒斯坦人，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在阿拉伯国家“遏制”以色列的军事前线中的地位都至关重要。在纳赛尔看来，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意味着埃及和叙利亚将单独对付以色列。好像是要警告叙利亚不要依赖它的埃及盟友，以军在接到本·古里安亲自下达的命令后于1955年12月11日向太巴列湖附近的叙军阵地和村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坦普勒当时正在安曼。这次进攻造成了56名叙利亚人丧生。此次行动表面上是对以色列声称的叙利亚枪击以色列渔民的报复，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外交表示。通常反映以色列政府观点的《耶路撒冷邮报》写道：“我们希望以色列的进攻已经使许多叙利亚人确信，同埃及的军事条约只是增加了叙利亚的危险而不是保障了它的安全。”然而，这次进攻的结果不是破坏而是加强了埃叙联盟。它促成了叙利亚和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前景的破灭，克服了叙利亚内阁内部对于从苏联购买武器的最后阻力，并确保了那些主张与埃及密切关系的一派人在大马士革的优势。（当时，以色列发生了一则笑话：进攻叙利亚的命令是由一个三人特别委员会下达的，该委员会由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组成。本·古里安同时占居两个职位，他既是总理又是国防部长，而当时的外交部长夏里特正在美国活动试图购得武器。本·古里安的行动对于

夏里特的使命无甚帮助。)

纳赛尔没有在这场挑战面前退缩,而是强调对叙利亚承担新的义务的重要性。他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对叙利亚的任何进一步侵略都将遭到埃及全部武装力量的反击。进攻叙利亚的后果还将使阿拉伯各国政府对以色列在一个星期后对和平方案提出的反建议没有予以任何认真的注意。以色列拒绝任何较大的领土变动,它建议共同调整 1949 年的停战分界线,向难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让他们重返家园,并为他们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重新安家提供贷款。它向埃及提出,给予埃及同黎巴嫩贸易和经过内格夫到达约旦的贸易过境权。对于约旦,以色列提出,约旦可以免税使用海法港的设施,并有从约旦到海法港的贸易过境权。

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进攻和约旦国内因《巴格达条约》引起的动乱致使阿拉伯国家试图找到一个对付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共同政策。联合国加紧寻求在阿以之间达成妥协。哈马舍尔德在调解过程中曾一度似乎取得了很不寻常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国的一致支持。但是秘书长实现和平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相信对埃及采取敌对态度比维持阿以和平更为重要。英法认为纳赛尔威胁了它们在阿拉伯产油国和北非的利益,美国则决定以埃及为典型打击苏联追求中立国支持的政策。

《巴格达条约》和苏埃军火交易使在中东争夺势力的地区性斗争国际化了。这两件事使美苏更积极地卷入了中东事务,而此前在该地区居优势地位的大国一直是英法两国。但是,中东的斗争仍然没有超出地区性的规模,并且英国仍然是卷入其中的主要外部国家。纳赛尔争取实现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国家联合与独立的政策是对中东自巴勒斯坦战争后一直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通过约旦哈希姆政权与伊拉克而纵横中东的英国——霸权的挑战。这场斗争最后以公开对抗达到顶峰。以色列和英国在这场斗争中不由自主地结成了反埃联盟。直到这时,对抗仍然以政治斗争的方式进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和约旦这

两个国家的问题上。以色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企图使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埃及则与英国及伊拉克竞争对安曼和大马士革的影响。

英国政府认为，纳赛尔对英伊势力和《巴格达条约》的反对违背了他在1954年运河协定后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诺言。但是，《巴格达条约》——就像纳赛尔曾经警告杜勒斯的那样——产生了背离其初衷的结果：它加剧了亚洲阿拉伯国家的不稳定，有助于加强苏联和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苏联似乎比西方更能适应深藏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观念中的中立主义。《巴格达条约》在阿拉伯世界划出了新的界线。纳赛尔、较为正统的中立主义者、复兴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统统被纳入“反帝”阵线。他们坚决反对西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继续控制阿拉伯国家，反对可能是用新手段保持西方霸权的诸如《巴格达条约》的图谋。这个反帝阵营中一个奇怪而短暂的盟国是沙特国王领导下的沙特阿拉伯。沙特曾因巴拉米绿洲同英国发生了纠纷，它又同埃及站在一边反对哈希姆的野心。叙利亚有亲伊拉克的一派，又有亲埃及的一派；有希望与西方结盟的人，也有赞成中立主义的人，因此国内四分五裂。叙利亚的中立主义者倾向于把苏联当作抵抗以色列、土耳其和英伊合作的联合压力的保障。在约旦，侯赛因及其东部支持者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又产生了分裂，前者想依赖伊拉克和西方；后者绝大多数居住在西部河岸地带，想依靠埃及作为他们反对以色列的盟友。

在1956年的上半年，纳赛尔一直试图减少而不是增加这种混乱，他采取了遏制而不是进攻的政策。由于不存在真正同以色列取得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纳赛尔准备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以巩固停火，平息边境冲突。4月，纳赛尔在开罗与哈马舍尔德会谈之后同意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定，该协定包括停止双方所有正规和非正规武装力量的敌对行动。约旦也同意类似的停火建议。但是，没有真正的和平以及双方持续的军备竞赛意味着埃以要继续寻求武器和盟友，改善自己的地位以防止停火的失败。在本·古里安更多

地转向法国的同时，纳赛尔试图与约旦和叙利亚在以色列边境建立共同战线。他也想同西方就“冻结”《巴格达条约》的纷争达成谅解。纳赛尔因为国内原因需要一段平静的时间，他也需要时间改善同西方的关系。1月，他开始同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就大坝贷款进行谈判。同时，他于1956年1月公布了宪法草案作为在埃及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第一个步骤，最后一批英军已经开始撤出，到6月英军全部撤出后，革命后的过渡时期将正式结束，新宪法经公民投票赞成后将正式生效。

但是，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无法调解的阿以冲突、西方内部的政治压力以及西方与苏联的对抗一起使得所有稳定中东的尝试都失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升级和法国势力的失败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埃及支持民族主义者的反法斗争加强了法以联系。在约旦，侯赛因国王于3月1日解除了英国人格拉布将军的阿拉伯军团司令的职务，艾登认为这是纳赛尔从中作祟的结果。英国国内攻击艾登优柔寡断，因此这件事使这位首相武断而气愤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纳赛尔是英国在中东所有利益的危险而不可调和的敌人，在他变本加厉地损害英国利益之前，必须把他赶下台。

格拉布的解职并非纳赛尔所为，而是侯赛因国王个人的仓促决定。这是一个21岁的君主和一个岁数比他大一倍多的外国军人之间的个人对立和猜忌的结果。侯赛因急于要表示他对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的同情，而效力于约旦的格拉布是旧式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依然存在的象征。埃及攻击格拉布的宣传无疑间接地影响了侯赛因，因为这些宣传对约旦舆论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但这仍然是侯赛因没有同纳赛尔或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商量而单独作出的决定。

在纳赛尔看来，此时解除格拉布的职务很不适宜。这项消息是赛尔文·劳埃德停留开罗期间传出来的，当时他正在进行中东之行。尽管英国国内对劳埃德此行批评甚多，他还是来到了开罗，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探寻与埃及达成妥协的可能。劳埃德是在同纳赛尔共进晚餐后返回驻地的途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他显然相信这是纳赛尔所为，因此纳赛尔在谈话中欺骗和嘲弄了他。纳赛尔则表示，他是那天晚上同劳埃德分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起先还以为格拉布是由英国政府撤回的，他当时认为英国的这一举动很明智。他在劳埃德第二天飞离埃及之前也是这样对他说的。劳埃德认为纳赛尔在戏弄自己，因而感到气愤。纳赛尔直到劳埃德离开之后，听了格拉布去职的完整经过才明白劳埃德情绪不好的原因。这些误解使艾登对格拉布事件的反应非常强烈，也使他的怒火必然指向纳赛尔而不是侯赛因。纳赛尔似乎被当成了一个怀有无情敌意而毫不可信的人。英国当时的国务大臣安东尼·纽汀后来回忆道：“在那不幸的一天，艾登得出了世界不能同时容得下他和纳赛尔的结论。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埃及独裁者’必须被铲除，否则，他将摧毁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也将摧毁艾登作为英国首相的地位。”

艾登在下院陈述了自己的外交立场。他在3月7日说道：

破坏约旦和我们之间的条约同维持友好关系的保证完全不符。如果埃及真想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它可以如愿以偿，但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如愿的。有一种情况必然会使埃及无法获得这种关系，那就是遵循一种一方面承认友好关系而另一方面又煽动敌对情绪的政策。

赛尔文·劳埃德从开罗带回了纳赛尔的一项建议，这个建议是以纳赛尔早期与特里维廉的谈话为基础的。建议重新提出如果《巴格达条约》不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双方就停止关于条约的纷争。纳赛尔将不得不同意，因为伊拉克同时参加了这两个条约。3个星期过去了，劳埃德对此建议未作任何答复，纳赛尔便在接受英国两家报纸采访时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一举动的本意是

想同英国调和，却引起了英国极不友好的反应。这次采访的内容当天就见报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指出，纳赛尔公开提出合作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尽其所能地破坏英国的利益。任何排除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巴格达条约》的建议都是不可能的。据英国驻埃大使说：“纳赛尔把这番话看作是战争宣言。”他认为这是公开驳回他私下向劳埃德提出的停止纷争的建议，于是他展开了猛烈的新闻舆论攻势抨击英国。

但是，英国和侯赛因的关系得到了修复，英国继续向阿拉伯军团提供援助。尽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纳赛尔并没有策划解除格拉布的职务，但是从这时起，英国对纳赛尔的政策已经改变了。英国不再谋求取得埃及的支持，而是转向孤立埃及，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摧毁纳赛尔的政权。纽汀记录的他同首相在格拉布事件发生后不久进行的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可以说明英国政策的这种变化和艾登的心情。纽汀向艾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使纳赛尔对英国在阿拉伯世界利益的打击无效而又不与埃及发生毁灭性的正面冲突的方法。据纽汀说，艾登在与美国裁军代表团一同进餐尚未结束时给他打了电话，首相在电话里吼道：“但是，所有这些孤立纳赛尔或者像你所说的‘使打击无效’的废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让他完蛋，你难道不懂吗？我想让他下台，如果你和外交部不同意，你最好来内阁说明原因。”

艾登在法国找到了主张这种政策的知音。法国总理居伊·莫内当时正前所未有地深深卷入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战争。他已经把纳赛尔当作了法国的主要敌人。对他来说，纳赛尔不仅是阿尔及利亚反抗分子的鼓动者和援助者，也是像希特勒那样的富有侵略性的独裁者。就像希特勒的扩张意图体现在《我的奋斗》一书中那样，纳赛尔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在《革命哲学》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这样的比较此后在英国常被艾登及其同僚反复引用，但是这种比较并非出自历史判断，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歇斯底里。除了埃及与战前的德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国力和政治

形势以外，希特勒和纳赛尔的那两本书、他们的个性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无一相同。法国外长克里斯汀·皮诺并不同意莫内的观点，他接受了尼赫鲁的建议，在赛尔文·劳埃德访问埃及几天后前往开罗拜会了纳赛尔。回到巴黎后，皮诺告诉莫内，他并不认为纳赛尔是另一个希特勒，而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人，他永远不会成为中东的独裁者。但是，这次会谈就像此前纳赛尔与赛尔文·劳埃德的会谈一样引起了双方的误解，这种误解又使巴黎像伦敦一样感到纳赛尔不可信赖。皮诺似乎以为——说“似乎”是因为此后几年他对这件事的讲法都不一样——纳赛尔已经向他保证埃及将不向阿尔及利亚抵抗分子提供军事援助，但他后来却违背了这个诺言。纳赛尔则否认自己曾给予皮诺这样的保证。他说自己曾告诉皮诺，阿尔及利亚革命是发自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己的事。埃及没有人与阿尔及利亚人共同战斗，但埃及为阿尔及利亚训练了士兵，因为“无论在哪里，支持我们的阿拉伯兄弟都是我们的责任。当皮诺问纳赛尔：“你们现在还在训练阿尔及利亚士兵吗？”纳赛尔好像说“没有”，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人可供训练成士兵了”。也许皮诺由此推断，纳赛尔在向他保证这种训练已经最终而不是暂时结束了。

艾登对纳赛尔中东政策的日益加剧的忧虑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4月份访英期间不自觉地显露出来了。赫鲁晓夫不久前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著名的谴责斯大林的讲话，并解散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他当时正有意和解。在访问英国前夕，苏联政府宣布它支持安理会请求哈马舍尔德即将实施的中东和平使命。在伦敦，艾登直率地告诉赫鲁晓夫，英国认为来自中东的石油供应非常重要，它将不惜发动战争确保石油供应不被中断。苏联领导人向艾登表示，他们理解英国在中东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当艾登提出控制向中东提供武器的问题时，苏联领导人没有拒绝这个建议，但又指出，控制规模必须要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扩大到其他中东国家，如土耳其。

就在这些谈话前不久，巴格达条约理事会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议。美国宣布它将同条约组织进行更紧密的军事和经济合作。西方国家在5月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上达成了向以色列出售更多的飞机、坦克、军舰和其他武器的协议，这又表明了美国也开始重新考虑对埃及的政策，并进一步向新的英法反纳赛尔阵线靠拢。杜勒斯同意加拿大和法国向埃及出售32架海市蜃楼式喷气式战斗机，也同意英国向以色列海军提供两艘驱逐舰。除了这些一致同意的武器出售外，法国还至少秘密地向以色列提供了另外12架海市蜃楼式战斗机和大量的其它武器。

5月16日，纳赛尔决定承认共产党中国并同台湾断绝关系，这使美国更加怀疑纳赛尔与共产主义集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纳赛尔则向西方外交官解释，他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有报道（这些报道不甚准确）说苏联可能同意西方提出的中东武器禁运的建议，因此，如果禁运中止了苏联对埃及的武器供应，他就能在北京找到一个武器来源。但是，倘若这是承认北京的一个原因，或许不是唯一的原因。埃及已向中国出售了价值1000万英镑的棉花，共产党中国的使团已在开罗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别墅安营。

纳赛尔的决定激怒了美国政府。当时，英法以及与美国友好的巴格达条约成员国正敦促美国对埃及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实际上，纳赛尔此时根本无意在国外引起事端，因为他即将结束巩固埃及的独立和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一历史时期。6月13日，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埃及。为了按时履行1954年的协定，英军在占领期满前几天从塞得港乘船悄悄溜走了，这是为了避免公开退出的尴尬。6月18日，纳赛尔眼里含着泪水升起了架设在塞得港海军大楼上的埃及国旗，这里前不久还是英国的海军指挥部。埃及的战斗机从头顶上掠过，军舰鸣礼炮21响，纳赛尔面对欢呼雀跃的数万埃及人说道：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们一直在梦想着这一时



刻的到来。我们的先辈和兄弟们为此奋斗了数十年，他们只想看到只有埃及的国旗飘扬在我们的天空，但是他们却没能等到这一刻。同胞们，我们向上帝祈祷，永远不会再有别国的旗帜飘在我们的国土上。

埃及人民终于感到他们真正独立了。开罗以精心安排的军队检阅来庆祝这个重大时刻。来自阿拉伯各国的军人组成了方阵，纳赛尔接受了他们的敬礼并还礼。新上任的苏联外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作为外宾参加了检阅式。一星期以后，埃及进行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并选举纳赛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从4年前推翻法鲁克的军事政变开始的埃及革命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了。那些曾组织和指挥了革命的军官们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被解散了。埃及从此能得以按新宪法治理了。尽管埃及民众的投票活动看上去未受任何干扰，但是按西方的标准，这次投票并不民主。纳赛尔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而且，在投票之前也没有任何有关宪法和总统候选人优缺点的认真公开的讨论。多数票多到了令人尴尬的程度：每一项提案都以超过99%的多数票通过。宪法本身的主要条款也含糊不清。尽管军事管制法被废除，新闻检查被取消（后来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又恢复了），政治犯被释放，但仍然让人随时感到隐藏在其后的军队和警察的威力。纳赛尔仍然掌握着所有主要的实力部门。但是，新宪法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这些权力，除非他不打算建立更为合法的代议制政府以取代纯粹的革命政权。

由纳赛尔指定的一个小型委员会起草的这个宪法，在前言中列举了革命的6个主要目标，即：消灭帝国主义；废除封建主义；结束垄断，结束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强大的军队；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健康的民主生活”。

按照美国的模式，总统根据宪法成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总统的任期为6年，有权任命内阁成员。以后的总统将由选举产生的

立法机关国民议会投票选举出来，并经公民投票通过。

国民议会有权决定给予民众更多的政治自由或更广泛的参政机会。所有的法律都要由国民议会批准，它有权使总统的否决无效，有权质询各部部长以及使用不信任票解除其职务。它也能以重大叛国罪弹劾总统和部长——如果它敢于这样的话。然而，其他因素限制了这些权力得以大胆使用的可能。埃及没有正常的议会政治的政党派别。议员候选人要由职能不明的“国民公会”选出，这个公会代表所有公民并按总统指定的方式组成。成立“国民公会”是要取代“革命大会”，它是政府首次尝试建立并已失败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建立新组织的主要目的据说是清除那些革命前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人，这些人通常被说成“反革命分子”、封建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工具。但是，这同样也将为纳赛尔清除其他潜在的反对者提供了机会。

显然，第一届议会的成员将要经过精心的挑选。第一次会议预定在1956年11月召开，但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议会选举一直延迟到1957年夏天。有一点可以相信，由350人组成的议会，不管这些人是如何仔细挑选出来的，只要它举行公开的会议，就将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它最终会有勇气行使宪法赋予它的权力。至少在当时，纳赛尔在没有建立自己的有效政治组织之前要继续依靠军队里的自由军官组织作为其力量支柱。他解散了革命委员会之后组成了新的内阁。纳赛尔没有留用与他一同领导革命的加麦尔·萨利姆和安瓦尔·萨达特，但让阿米尔和查卡利亚·毛希丁两人继续分别掌管军队和警察。纳赛尔还把转为文职的军官派到许多重要的行政和外交岗位。

当然，即使那次使纳赛尔成为总统的公民选举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别人可以参加竞争，纳赛尔仍将赢得压倒性的多数，这一点不容置疑。因为他实现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宿愿，完成了让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埃及的使命。但是，纳赛尔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实行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赋予宪法的承诺以真正的效力，从

而为自己的权力建立更加牢固的宪法基础。这也许是他的一个错误。后来纳赛尔透露说,他当时一直在考虑采用两党制。

纳赛尔成为总统后同埃及民众的关系也很独特。他没能像纳吉布将军那样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他在公共场合也不轻松随便。他的讲话语调缓慢,态度认真,经常重复,语言表达不很流利,技巧不娴熟。他觉得在公共场合很难表达那种驱动着他的激情和能活跃气氛的幽默。然而,他却以与众不同的方式享有崇高的威望。普通的埃及人似乎对他怀有并不十分由衷的钦佩和一种略带畏惧的尊敬,这是学生对一位很有魄力而又品格高尚的决心使学校规范化的校长所怀有的钦佩和敬畏。受过教育的埃及人对纳赛尔的态度从热情的支持转为冷淡的默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对军人官僚政治的强大势力不满;其他人则怀疑纳赛尔对恢复宪法保护下的生活的承诺,或者担心他不断增大的雄心会把埃及拖入不必要的冒险,消耗埃及的资源。但是许多批评纳赛尔的人都称赞他结束了旧政权的耻辱,进行了民心所向的社会改革,激起了埃及新的力量和希望,并以极大的精力孜孜不倦地努力发展他所认定的公众利益而不谋私利。除了土地改革、反腐败运动和英国撤军以外,埃及政府还取得了其他富有建设性的成就。它扩大了教育和福利服务,鼓励工会和合作团体的发展,尽管工会和合作团体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它解散了执行伊斯兰教有关个人地位法规的特别宗教法庭,把宗教法规的执行纳入正常的民法体系是埃及社会生活在这方面发展的里程碑。此前,这方面的发展多年踟蹰不前。在可用于发展的有限的资金范围内,埃及政府支持进行工业化工程的建议。其中有两个值得骄傲的项目,一个是西德公司承办的建在海尔旺的投资额达 1000 万英镑的钢铁厂,另一个是阿斯旺大坝的水力发电站。但最大的希望还是寄于阿斯旺大坝。埃及同世界银行和英美关于大坝资金问题的谈判仍在进行,苏联站在幕后,似乎有意提供援助但又不明确表态。

在国际上,纳赛尔似乎处于一个很有力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

是如此。西方国家和苏联竞相向他提供经济援助。既然西方暂时放弃了扩大《巴格达条约》的企图，埃及同英法的关系尽管很冷淡，但双方除了在新闻报道和宣传中相互批评外还没有达到公开敌对的程度。尽管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情绪比较平静，阿拉伯国家不太愿意跟随埃及进行冒险，卷入动乱，但叙利亚和约旦的政治发展趋势还是有利于埃及的。阿拉伯温和派希望纳赛尔和西方停止争吵。其中的主要障碍似乎是开罗电台猛烈的反英宣传，包括鼓励非洲民族主义者如肯尼亚“曼曼”游击队的反抗斗争，埃及也怀疑英国新闻舆论的敌意，这种敌意又促进了反英宣传。1965年5月，纳赛尔接见了英国大使，这是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前促成双方和解的最终尝试。特里维廉当时表示英埃并不存在特别的争端。最后一批英军正在撤出埃及，苏丹的问题也已经解决。因此，双方为什么不能平静一段时间？纳赛尔不能像阿塔托克那样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吗？纳赛尔对此的回答是，埃及不能对自己的周围地区漠不关心，他在埃及以外的行为通常是对别的国家敌对举动的反应。特里维廉推断纳赛尔认为自己“注定要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斗士”，而且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革命阴谋家”。也是在这次谈话中，纳赛尔告诉这位大使：“你们不可能用对待法鲁克的炮舰政策来对我，我没有王位，没有世袭的统治地位，也没有财产。”

纳赛尔在庆祝埃及独立的典礼上发表的讲话，在谈到他平时常提到的帝国主义时措辞并不偏激，而且他还希望同英国改善关系。同以色列冲突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所有边界关系紧张的地区，但是，由哈马舍尔德促成的停火协定如果获得大国的支持仍然有希望巩固停战。苏联外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在埃及庆祝独立时访问了开罗，随后又访问了大马士革。整个访问期间，由于苏联供应了武器他受到了广泛欢迎，他也暗示苏联将为大坝提供资金。同时，谢皮洛夫强调苏联希望减轻中东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拒绝承担使苏联卷入反对以色列的义务。赫鲁晓夫本人在接受埃及《金字塔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苏联不断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



系将保持在莫斯科同西方“竞争而和平共处”的更广泛的新政策的范围里。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宣传的方式进行，苏联要避免承担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外交或军事义务。关于以色列问题，赫鲁晓夫劝告阿拉伯国家要忍耐，并警告说阿以敌对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纳赛尔还想听听谢皮洛夫能提供什么样的经济援助，他在6月20日也接见了乘飞机来访的尤金·布莱克。纳赛尔想得到西方对大坝的援助以避免对苏联的严重依赖，因为这种依赖会危及他的不结盟政策。但他也担心西方会提出一系列条件以控制埃及的财政。他和布莱克就这些条件达成了协定，但是协定的签署取决于埃及能否同意英美在各自的备忘录中提出的条件。纳赛尔就英美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英国大使认为这个方案无可非议。英国政府在迟疑了一段时间以后同意了修改方案中的大部分提议，由于美国正在重审对埃及的政策，国务院延迟了答复。英美两国驻开罗大使都敦促他们的政府继续对大坝提供援助，并指出，与其让纳赛尔求助于莫斯科不如就此结束这个问题。

但是，华盛顿和伦敦已有不祥的迹象显示它们可能对大坝工程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美国国会和英国下院都有一帮很有势力的人反对向埃及提供援助。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考虑撤回对大坝提供的贷款，这一变化是艾登尚未公开的经过格拉布事件具体形成的新政策自然发展的结果，这项政策便是把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当作敌人而不是当作潜在的伙伴或中立国来对待。

艾登还援引了经济上的原因——英国自己的财政紧缩和传说中的埃及因支付购买苏联武器的费用而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但实际上拒绝援助的主要动机还是政治性的。英国对大坝提供的贷款只有500万英镑。艾登更担心埃及代理人在与英国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敌对行动和宣传。在伊拉克，赛义德抱怨纳赛尔用威胁的手段比他用合作的方法获得了更多的援助。英国下院有些保守党议员也有同样的抱怨。

赛尔文·劳埃德在听到了美国国务院对大坝的意见后发现美国有着与英国同样的忧虑。因此，英国政府在7月中旬决定撤回对大坝的资助，尽管艾登“本想再延迟一段时间而不急于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政府也因为国内外原因开始考虑撤回自己对大坝的援助。国会对整个外援问题颇感棘手，几个势力强大的院外集团联合起来专门反对对埃及的援助。支持犹太人的院外集团正试图劝说美国政府逼迫埃及同意让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南方产棉州的院外集团认为，在美国棉花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向埃及提供资金帮助它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结果于美国不利。纳赛尔突然承认北京一事不仅激怒了杜勒斯，也引起了支持蒋介石的院外集团的积极活动。国会里也有一种强大的反对中立的趋势，杜勒斯本人就抱这种观点。不少人要求美国政府把援助的重点从那些像埃及那样的中立或有时敌对的国家转向美国的盟友和朋友。

还有两个因素对美国政策的改变起了促进作用。其中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杜勒斯相信苏联已经提出为大坝提供比较优惠的援助，纳赛尔正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左右要挟以取得最有利的条件。杜勒斯认为苏联的援助承诺是虚张声势，如果撤回美国的援助，他就能迫使苏联不得不或者收回承诺或者对一项它无力支撑的工程进行投资。在美苏竞争对亚、非国家提供援助的开始阶段，这将对苏联竞争前景的沉重打击。让纳赛尔失望便是对其他中立国的一个有力教训，要他们不要以为同时与美苏打交道要比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更有利可图。第二个因素是，西方认为埃及目前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态度都有可能使埃及成为经济援助的无底洞和得不偿失的政治泥潭。西方国家参与的是一件代价昂贵的事，它不仅不会根本改善埃及的经济状况，还会因为埃及将承受巨额负担使西方受到责难而不是赞扬。不久，英国的一些中东问题专家经过比较后认为埃及没有伊拉克那样的发展前途，因此也做出了这种悲观的评估。这就等于说，应当让2300万埃及人在贫困和绝望中越陷越深，而不是帮助他们自立以摆脱这种困境。

埃及驻美大使艾哈迈德·侯赛因博士本人是个农业专家。他提醒纳赛尔，美国的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7月中旬，侯赛因返回开罗劝说纳赛尔放弃他的反建议，不要再持怀疑态度，应该毫不迟疑地按西方国家提出的条件接受它们对大坝的援助。纳赛尔告诉侯赛因，他认为美英政府已经决定不再提供援助了。尽管如此，纳赛尔还是让侯赛因转告美国人他将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人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纳赛尔还向侯赛因提到，他料想美国会取消援助的承诺，如果那样的话，他可能要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取得建造大坝所需要的外汇。

在过去的几年，埃及国内一直在公开讨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埃及政府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1954年，纳赛尔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放弃了国有化的做法，赞同在到1968年运河租借期满这段时间里通过谈判增加埃及在运河公司外汇收入中的份额。运河在租借期满后将绝不再出租。运河是埃及人民感情意义上的国家象征，埃及为开筑运河付出了巨大牺牲，而得到的利益却微乎其微。埃及还认为运河为英国的占领铺平了道路。因此，纳赛尔指定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运河的管理以及为租借期满后接管运河制订计划。同时，埃及在1955年和1956年同苏伊士运河公司就运河的开发和加宽计划、运河公司人员的“埃及化”以及扩大公司对埃及的投资比例进行了谈判。

埃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公司中没有股份，赫迪韦·伊斯梅尔提供的45%的公司基金共17.7万股，在1875年以400万英镑卖给了英国。私人拥有的股份有一半在法国人手中。1955年，迪斯累里80年前的那次著名的买卖为英国赚了330万英镑，埃及以税收的形式获得了230万英镑。然而纳赛尔更关心这样的事实：苏伊士运河公司虽然在名义上是埃及的，但公司外汇收入的大部分都被投资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它对埃及的收支平衡没起作用。1956年6月10日，埃及政府和运河公司宣布一项协定，规定在此后的7年里公司对埃及的投资不得低于1000万英镑。一星期之前，埃及

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会”的首席代表(该公司有 32 名董事,其中 5 名埃及人,10 名法国人,9 名英国人,一名荷兰人和一名美国人)声明,到 1968 年运河的 99 年租借期满后,埃及将不再延长租期。

7 月 17 日,艾哈迈德·侯赛因回到美国并向新闻界宣布,埃及打算接受西方对大坝的援助。他想尽早同杜勒斯进行会谈,向他转告纳赛尔的决定。但是,杜勒斯一直让他等到 7 月 19 日。他同侯赛因在国务院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并递交了一份公文,宣布撤回美国的援助。侯赛因尽其所能请求杜勒斯为埃及与西方的未来关系着想,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但无济于事。最后,大使不顾一切地指出埃及可能要转而请求苏联的援助,这只是增强了杜勒斯的决心。

几乎就在侯赛因刚刚辞别杜勒斯,美国新闻界就掌握了公文的内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文的措辞极不友好。(杜勒斯后来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称,他原本不想用这种挑衅性的措辞拟定公文的。)做出撤回援助决定的理由是两个必要条件——就尼罗河水量分配达成协议和埃及要有能力为建造大坝提供足够的资源——没能得到满足。美国的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埃及的经济普遍薄弱,信用不可靠的印象。这里很明显还有深一层的打算,即:其他与尼罗河有关的国家也许不会同意埃及的大坝方案,整个大坝工程只能停留在纸上。美国唯一安慰埃及的说明是,它希望同埃及保持良好的关系,仍然愿意考虑埃及的其他经济发展计划,包括尼罗河的其他计划。

纳赛尔听到美国撤回援助的消息后被美国宣布消息的方式和措辞,而不是撤回援助这一事实激怒了。他是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同尼赫鲁和铁托元帅会晤后乘飞机午夜抵达开罗机场时收到美国决定的正文的。尼赫鲁也随他来到了埃及。美国在这三位中立主义领导人举行非公开会议的时候做出这种决定似乎用意深远而又不无羞辱之心。人们至今尚不清楚,纳赛尔在尼赫鲁第二天飞回德里之前是否同这位印度总理商讨了他的反击措施。7 月 21



日，纳赛尔开始认真研究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可能，并对国有化引起的国际反应进行了估计。他最后认为国有化不会出现英国军事干涉的危险，尽管英国会因为受到最大的影响而很有可能作出强硬的反应。纳赛尔在最后作出决定之前同内阁讨论了这一计划。

7月23日，埃及政府正式决定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第二天，在离开罗5英里的毛斯塔拉德举行的庆祝一家新的炼油厂开工和苏伊士运河至开罗的输油管道开通的典礼上，纳赛尔发表了一个极不友好的愤怒指责美国的演说，他表示两天后将对大坝问题作出答复。他声称：

如果华盛顿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无耻而毫无根据地想让世人怀疑埃及的经济能力，那么我要对它说：“你们会被气死，因为你们无法控制我们，也无法主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走的道路——一条光荣、自由和值得自豪的道路。”

就在纳赛尔发表演说之前，他让埃及石油管理局局长穆罕默德·尤尼斯制定了一项接管运河的计划。尤尼斯原是一名工程兵军官，以办事效率高著称。他接到指示后组织了几个由士兵、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的小组，准备接管设在伊斯梅利亚的运河公司总部以及塞得港北端和法特克港南端这两个主要的运河控制点。同时，军队做好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或对付反抗力量。一旦纳赛尔发出信号，各小组要切实有效地控制运河公司，并保证运河航运照常进行。纳赛尔的信号就是他于7月26日晚在亚历山大发表广播演讲时要说的“斐迪南·德·勒塞普”（负责开筑运河的法国人的名字）。这项重大的秘密一直未被泄漏。只有尤尼斯知道这一切，而各小组成员要执行的命令都被封在发给他们的信封里，他们只有在接到指令后才能打开信封。尤尼斯指示，任何一个组员都有权枪决其他拒绝执行命令或泄密的组员。

7月26日晚7点40分，纳赛尔站在俯瞰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阳台上，面对约25万群众开始了讲话。这次演讲长达2小时40分钟，它是纳赛尔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次演讲。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宣言，还因为它是一次戏剧性的表演。纳赛尔开始时讲得很缓慢，他反复抨击西方帝国主义试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保持势力范围，指出西方想通过以色列、军事条约和控制武器供应来支配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但是，纳赛尔说道，埃及已经形成了一项自由而独立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埃及和阿拉伯民族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埃及人处处恭候外国高级专员和大使们命令的日子已经过去。但是仍有一些

帝国主义者想让我们成为其附庸，他们可以发号施令，让我们唯命是从……他们要我们听从这样的提议：以色列已是既成事实，由他们赔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我们为阿拉伯主义感到自豪，我们的土地不会被用来卖钱。他们想让我们向以色列全面屈服，抛弃巴勒斯坦和我们的北非同胞，接受安理会的决议，接受在阿尔及利亚的屠杀。他们想要我们执行其指定的政策。埃及不会仰人鼻息，它要有自己独立的国格。

这次讲演的性质，它对西方国家的公然愤怒蔑视，它的随便而又幽默的通俗、亲密的表达方式以及一位自信而受到拥护的领袖的语气在纳赛尔讲述他如何应付美国特使乔治·艾伦时体现得更加明显。艾伦是在纳赛尔与苏联进行武器交易时来拜会纳赛尔的，他还随身带来了美国政府的一封信。因为纳赛尔相信信中肯定含有对埃及的威胁，他当时就表示自己不会接收，如果艾伦来递交那封信，他就把艾伦赶出他的办公室。“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位职业领袖，而是因为革命的原因才成了领袖……他们以为我们都是些职业政客而已，但是我们的埃及已经能够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了。”

当纳赛尔强调经济独立与政治独立同样重要的时候，这次讲演的真正主题不久便出现了。他同样亲切、生动而又详尽地描述了有关大坝贷款的谈判，并讲述了他是如何最终认识到世界银行和美英所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是“一个要控制我们经济独立的阴谋”。撤回贷款援助意在“惩罚埃及，因为它拒绝支持军事集团”。

他们通过延缓我们提高生活水平来惩罚我们……他们宣称我们威胁了他们的石油供应，但是我要说，我们将不再是任何人的势力范围。我们不反对你们合理的经济利益。

纳赛尔说，他同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会谈时，经提醒想起了“斐迪南·德·勒塞普在1854年来到埃及劝说赫迪韦·伊斯梅尔开筑苏伊士运河，并帮助筹集资金”的事。提到勒塞普就是向守候在运河区的尤尼斯及各小组发出开始接管运河公司的信号。同时，这也引出了纳赛尔演讲的主题。

纳赛尔说道，勒塞普劝说的结果，便是埃及劳工完成了运河的开筑（12万埃及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和埃及提供了大量资金。伊斯梅尔政权购买了45%的股票，但随后又被英国政府骗去了。结果，在运河公司1亿美元的年收入中，埃及只获得了300万美元。历史不容“背信弃义和欺诈蒙骗”重演。埃及将自己建造大坝，用运河的收入支付费用。埃及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筹集运河一年所得的1亿美元而不必等待美国的7000万美元的援助。“不论什么时候，华盛顿若有非议，我都会对他们说‘气死吧’。”

在宣读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以后，纳赛尔说：“现在，你们的兄弟，埃及人民的儿子，正在采取行动接管苏伊士运河公司。我们作出这项决定是要恢复埃及失去的光荣，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自豪感。”

## 第七章

### 苏伊士运河与西奈半岛(1956.7—1957.5)

纳赛尔在7月21日从布里俄尼返回开罗,他以参谋人员的风格起草了一份文件,对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可能出现的国际反映作了“估计”。后来,纳赛尔又从各个角度对文件内容做了一些轻微的修改。文件的要点是,他认为最强烈的反应将来自英国。至于法国,他认为这个国家已被阿尔及利亚拴得很死,它在《巴格达条约》和中东其他问题上与英国有不一致的看法。他认为英国是不愿意动用武力的,因为它要考虑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中东的石油利益所经受的风险,以及一旦苏伊士运河被封锁对它本来已岌岌可危的地位的影响。出于同样的理由,纳赛尔认为英国也不会与以色列结盟,即使英国想要动用武力,但由于其军队的不利位置,它也打不了两三个月。那时候纳赛尔将会有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良好机会,起码他会从创造一种反对动用武力的国际气候中受益。纳赛尔的印象是美国会反对任何动用武力的企图。他没打算认真地考虑以色列单独与埃及交火的问题。

这时纳赛尔认为还看不出苏联对他预言的结果会作何反应。在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之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纳赛尔曾要求苏联提供支持。但毫无疑问,他期待着并准备接受苏联的外交支持,特别是联合国的外交支持。

除了他对美国立场的估计之外,纳赛尔的算计几乎全错了。由“苏伊士运河事件”引发的世界危机最终导致英、法和以色列有计



划地联合起来攻击埃及。正如纳赛尔几年以后自己所承认的，当时他未估计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所受伤痛的程度，他也未认识到英国的艾登已经把他看成个人的敌手。艾登不仅把纳赛尔看成是对英国利益和在中东舞台活动的威胁，而且还把他看成是英国民族生存的威胁。尽管纳赛尔早先已注意到法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勾结，但他没有预见到运河危机为预防性战争提供了机会，这一点来源于本·古里安的思想。纳赛尔对法以联合的疏忽可能部分来自这样一种思维习惯：10年后，当法国人从黎凡特撤出后，英国人将是埃及人在中东与之周旋的最主要的外部势力，至于阿尔及利亚，尽管埃及对之寄以真挚的同情，但它毕竟离中东阿拉伯人太远。

纳赛尔的这种分析是他在政治谋划中错误地估计西方人的感情和利益的另一个例子。在他对西方政府的想象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把它们视为持过时的帝国论调的瞎子。这种帝国论调引导西方政府去干那些力不能及的事。与此同时，他又把它们看成是能对自己的利益作出理性判断的大国，期待它们不会感情用事，对一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斗争采取宽容的态度。在他的谈话和演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对西方，特别是英国人的政策感到迷惑。在他看来，英国的行动不断地与它自身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纳赛尔还对英国人的缺乏理智感到奇怪。或许是由于纳赛尔对任何西欧国家的情况、舆论和政治缺乏第一手经验，他发现很难把握西方人由于国力下降和在世界上已改变的地位所导致的感情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埃及本国的问题，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既重大又难于处理的。对纳赛尔来说，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要为埃及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外汇，二是要显示一下一个贫穷、弱小的国家不甘于忍受不平等状况再持续下去。

从法律上讲，纳赛尔具备有力的理由，他可以拿出足够的证据支持他的论点，即苏伊士运河公司是受埃及法律管辖的埃及的公

司。正如他所申明的，苏伊士运河本身无可争辩地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一个国家依据它的司法权，在提供足够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将私人投资收归国有，这是国际法的基本惯例。除了苏伊士运河公司自身愿否出让租赁权之外，纳赛尔没有破坏任何协定，本来这就不是一个国际条约，而只是私人公司与埃及政府之间的协议。

事实上，英国和法国政府几乎没有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由杜勒斯首先提出，然后被西方国家使用的法律根据实际上是利用了公众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和苏伊士运河本身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的普遍混淆。这个法律根据的内容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是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出让租赁权的“一个国际机构”，其权利来自 1888 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该公约保证所有国家的船只任何时候都可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公约要求建立一种管理苏伊士运河的制度以保证航行的自由，建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目标就是为了使其成为实施这一公约的首要工具。英国人认为这一根据没什么价值，很容易被纳赛尔推翻。纳赛尔指出，苏伊士运河的管理与 1888 年公约没有任何联系：到 1968 年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租赁期限将到期并转交埃及政府时，没有时间限制的《君士坦丁堡公约》却仍然有效。苏伊士运河公司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义务让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地航行于苏伊士运河。从法律上讲（至少从 1922 年英国承认埃及的主权开始）这是埃及政府的责任，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自英国军队从埃及境内撤走后，埃及就成了唯一实际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国家；甚至在英国军队还没撤走时，埃及就实施了控制权。就在英国军队还驻扎在运河区期间，埃及已坚定地拒绝让以色列轮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有关苏伊士运河管理的唯一一个国际条约是 1888 年公约，埃及重申它将遵守这一条约。在埃及人看来，将运河公司国有化并没有也没改变它的这一立场。埃及人争辩说，禁止以色列轮船在苏伊士运河航行正是遵守了 1888 年公约，因为巴勒斯坦停火并没有结束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埃及人的这种观点遭到 1951 年安理会决议的否决，该决议呼吁埃

及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纳赛尔要求将此问题交付国际法庭裁决。

英法方面,特别是英国,知道自己在法律方面有些站不住脚,于是希望其他国家支持它们提出的观点,由一个国际机构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技术和财政。它们说,唯有如此,它们才能相信运河公司会有效地运营,而且既不会在埃及无经验的管理下降低效率,也不会使通行费增加过多,同时每年的收入还可用来帮助埃及发展经济。但是纳赛尔能够证明,在9月15日运河公司的英法领港员撤走之后埃及仍能把运河管理得井井有条。在财政方面,他提出与运河使用者协商签订一个固定的通行费用协议,并保证将这笔收入合理地用于埃及经济的开发活动。但是对英国和法国政府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政治上的:埃及一旦控制了运河,会不会利用禁止或延缓船只通过运河的手段来制裁与其有政治分歧的国家?如果纳赛尔控制了阿拉伯产油国,埃及最终会不会为了经济或政治目的,通过切断中东的石油供应来“向西欧敲竹杠”? (英国的石油进口有一半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如果纳赛尔在这次“政变”中取胜,他的地位会不会因此而增强?他会不会因此而最终控制那些依然同英法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

英法政府总的来说对纳赛尔缺乏信任,害怕他们对它们的利益采取坚决敌对的态度。它们仅对运河的法律、技术和财政争执感兴趣;它们为自己公开进行辩护的政治目的也只是为了消除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或削弱他的权力。在艾登看来,确保运河的国际控制是一种考验:它既可用国际社会的担保来取代纳赛尔令人怀疑的口头保证,同时又可能给纳赛尔本人致命的一击。如果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结果,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那就必须动用武力。

显而易见,除非埃及人进行合作,否则不可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在苏伊士运河区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如果强行这样做,那只有将整个埃及全部征服。果真如此则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英国占领时期的

状况,英国刚刚才通过 1954 年运河区协议从那个困境中解脱出来。艾森豪威尔在 1956 年 7 月 31 日给艾登写的一封信中向他指明这种打算的危险和困难:这种政策只是在一种假设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即英法的军事干涉会带来纳赛尔政权的倒台,而且继任的政府会同英法签订协议。这种对埃及政策的错误判断令人十分惊讶,因为英国在过去 40 年中已经发现埃及是一个极不驯服的谈判对手。这种判断部分出自艾登过分信赖从埃及获得的情报,部分出自纯粹的一厢情愿。驱动冲突双方的力量是感情因素,而非逻辑判断。

阿拉伯世界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舆论普遍认为,杜勒斯提出撤回援建阿斯旺大坝资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经济上的损失,也是处心积虑地为了打击纳赛尔奉行的中立主义以及他寻求获得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的决心。同样,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也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外汇,而且是对西方在中东的统治地位的蓄意挑战。如同和苏联在军事领域做军火交易的性质一样,这是埃及寻求在经济领域打破对西方的依赖。这种行为方式明显地是要蔑视西方权威,这正如纳赛尔认为杜勒斯的“大坝公报”提高了埃及的声望一样。其实这种方式隐瞒了最根本的事实,即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是对欧洲国家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体系和已变得外强中干的西方资本主义致命的一击。

埃及人和阿拉伯公众理解并满怀热情地欢迎纳赛尔的决定。以伊拉克的赛义德为首的一些反纳赛尔和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虽然在公开场合也赞同纳赛尔的决定,但在私下他们却向英国政府暗示,他们很愿意让纳赛尔吃点苦头。他们不敢将这种想法告诉本国人民,这显示出他们自身地位的软弱以及作为英国的盟友他们的价值有限。当纳赛尔的决定传来时,赛义德和费萨尔国王正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与艾登进餐,据说赛义德当即鼓动艾登:“狠狠地打他(纳赛尔),现在就打。”后来他又重复了这样的劝告,但加



上了英国不要与法国或以色列一块采取行动之类的话。艾登并不需要别人的鼓动。他的直接反应是：纳赛尔的这一行动的后果将取决于“谁在从阿加迪尔到卡拉奇这片中东土地上享有权威。我们认为西欧的经济命脉将会因埃及人对运河的攫取而受到威胁”。英国不能容忍纳赛尔“破坏它的生命线”。艾登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看成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独裁者的巨大征服计划中的一个步骤。这是一种可怕的推论。在危机消逝之前，艾登认为纳赛尔不仅打算统治中东，而且还打算与俄国建立联盟，通过切断石油供应来控制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命运。（除了可能是对十字军东侵延迟的报复，这个计划的目的不明，而且难以被解释。）在艾登的脑子里，纳赛尔就像希特勒，而苏伊士运河就是莱茵区。现在就该制止他的行动，如果必要就动用武力。法国总理莫内和皮诺早先同美国人的谈话一样，也拿莱茵区和苏伊士运河作比较。但法国主要关心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而不太重视同以色列的关系。法国把纳赛尔错误地当成了阿尔及利亚反抗者的精神支柱，他们相信，如果纳赛尔在运河“政变”中获得成功，那么法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希望将不复存在。

以色列对运河“政变”的第一个反应是保持沉默，并且向外界表明它并不认为埃及与西方大国围绕运河公司发生的争执和它有关。本·古里安后来写道，以色列原则上并不反对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但他把此事看成是“不祥”之兆，因为纳赛尔因获得共产党国家的武器而建立的自信心因此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在美国方面，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就把运河的未来与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视为两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而且其中哪个问题也不可能用战争来解决。杜勒斯围绕大坝采取的行动是第一个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外交孤立来“降低纳赛尔的威望”（这是当时美国外交官在私下场合、美国记者在公开场合非常喜欢用的词汇）的措施。当运河“政变”的消息传来时，正要动身离开秘鲁的杜勒斯表示要“与它长期周旋”，正如艾登早先在大坝问题上要他做的那

样。苏伊士运河对美国不像对英国和欧洲那么重要。艾森豪威尔并不相信艾登描绘的纳赛尔会使欧洲工业停滞不前的恐怖图景。美国专家的一项研究很快表明,通过重新开通连接好望角的航路和增加从西半球的供给,西欧的石油供应还是能得到保证的。尽管这样做每年需耗资大约 6 亿美元(2.15 亿英镑),从而给英国造成额外的负担,但不会产生灾难性影响。

对美国来说,苏伊士运河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加以有效地管理,而且应该依据 1888 年公约的规定使之对任何国家都能自由通行。军事干涉唯一可行的理由是通过运河的航行遭到禁止,不论是埃及人不能使之正常运作,还是由于他们有意破坏 1888 年公约规定的原则。因此,只有在和平解决的每一种途径都失败的情况下才能诉诸武力。艾森豪威尔从他处理巴拿马运河的经验中感觉到,管理苏伊士运河并不像英国和法国所认为的那样困难。他的这一观点得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德纳·伯克将军的支持。

关于纳赛尔的影响,华盛顿把这看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苏伊士运河会使人想起“殖民主义”,因此不能试图利用这一事件推翻纳赛尔。当埃及面对两个老牌帝国英国和法国时,它可能会赢得阿拉伯和亚非国家的广泛同情。但是在危机出现后的几星期内,美国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使用武力。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中,美国对使用武力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杜勒斯试图避免使英法认为美国支持它们使用武力的政策,从而采取过火的行动。另一方面,杜勒斯也希望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作为在谈判中向纳赛尔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对杜勒斯来说,最重要的是控制谈判进程和赢得时间:他知道,英国和法国准备在 6 周后发动进攻。

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召开的会议上,英国内阁支持艾登提出的必要时使用武力使运河脱离纳赛尔控制的政策。内阁指示参谋总长准备好一旦需要即夺取运河的军事计划。英国征召了 2 万名士兵,并向东地中海派出军车、军舰和飞机作为“预防性措施”。英国还下令冻结苏伊士运河公司在伦敦的资产和埃及人的剩

余存款,并对埃及实行禁运。艾登在7月27日打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长长的电报中,向艾森豪威尔通报了英国内阁的决定。艾森豪威尔发现这封电报有点“使人心烦意乱”。艾登还在电报中宣称,西欧的石油供应受到了直接威胁。这些石油大部分是通过运河运来的。除非“我们全力反击……否则我们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将会毁于一旦”。艾登继续写道:“我和我的同事们坚信,我们必须做好最后用武力使纳赛尔恢复理智的准备。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准备这样干下去。”

艾森豪威尔派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墨菲去伦敦,要他在杜勒斯从秘鲁返回之前尽量延缓任何过激行动。墨菲发现英国的大臣们正处于一种好斗的情绪中,他们决定“不惜血本”地进行战斗。杜勒斯在8月1日与墨菲会面后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和法国外交部长皮诺,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由国际社会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协议。外长们还同意美国提出的建议,8月16日在伦敦召开由主要海洋国家、1888年会议的8个签字国和16个苏伊士运河主要使用国参加的会议(以色列没有受到邀请,并被公开排除在外,三大国一致同意应将阿以争端与运河问题区别对待)。在三国外长协商期间,艾登于7月30日对下议院发表声明,阐述了解决运河问题的基本立场:“任何将苏伊士运河这一大的国际水域完全由一国控制——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的——使它单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企图都不会被英国政府所接受。”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必须留出几个星期的谈判时间,因为英法军事计划人员发现,如果仅仅冒险采取空降的行动方式,他们在9月15日之前是不能完成对埃及的入侵的。行动日期后来向后延迟,开始定在9月26日,后来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和地中海气候原因又延至11月5日。由于塞浦路斯缺乏良港,海上入侵舰队不得不集结在马耳他,从这里到埃及还得6天时间。英国计划在登陆之前的一星期或更长时间内首先实行空中轰炸和心理战,因为英国人普遍希望在军事占领之前埃及人会垮下来,或者推翻纳

赛尔。

在预先作出军事准备的同时，伦敦会议的邀请也发出了。连同邀请一起，英法美三国在8月5日还发表了一个声明，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共管运河权威机构的联合建议要点，后来这份建议又由杜勒斯向伦敦会议作了介绍。并且成为著名的8国建议的基础。埃及和希腊（因塞浦路斯问题和许多希腊人住在埃及而对英国持敌对态度）拒绝出席伦敦会议。在8月12日的声明中，纳赛尔阐述了自己拒绝邀请的理由。他否定了三个西方国家外长关于运河公司具有“国际性质”和它是1888年公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他声明说，任何把苏伊士运河公司与航行自由混淆起来的打算只是企图为干涉埃及的内部事务寻找借口，三国外长建立国际共管运河机构的建议“完全是国际殖民主义形式的一个变种”。这次会议的邀请是一个极大的国际阴谋，他们企图通过冻结资产、动员军队和进行战争来饿死和恐吓埃及人民。纳赛尔最后强调，埃及打算保证运河的航行自由，并且建议召开一次由1888年公约签字国参加的会议，来重新考虑1888年公约的内容。

纳赛尔后来透露，当初他已决定接受伦敦会议的邀请，并且不顾他的部长和顾问们认为他可能会毫无必要地受到侮辱的劝告，打算亲自与会。但是艾登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攻击纳赛尔的“黑色履历”，指责纳赛尔没有一点想与艾登同桌谈判的打算。纳赛尔没有亲自去，而是派他的主要政治助手阿里·萨布里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伦敦会议。在会议中，苏联和印度在任何问题上都坚决捍卫了埃及的立场。

在伦敦会议进行过程中，纳赛尔离开开罗休养几天，这说明他在为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做准备。从他在亚历山大大发雷霆之后，纳赛尔就小心谨慎地避免再发怒。他的目的是要向世界表明，尽管管理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围绕苏伊士运河的行动只是“一般的商业活动”。在围绕运河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关键问题是要在事实上，如同在书面上一样，承认埃及的主权。纳赛尔从一开始就打算不向



任何人出让主权,由埃及自己完全控制运河,这是他的坚定立场。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从运河收益中增加埃及的外汇来源。在其他问题上他准备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在合作和不受外部控制的基础上允许它国提供技术和财政帮助。与此同时,他还要保持运河畅通,避免为军事干涉提供借口。他重申了他在7月31日提出的遵循《君士坦丁堡公约》规定的保持运河自由通航原则的打算。他开始招募、训练领港员,用他们代替英国和法国的领港员,以防他们撤走时没人工作。同时在印度的劝说下,他没有将早先发出的关押那些停止工作的领港员的威胁付诸行动。他允许想走的领港员离开埃及,但原先的公司要求这些人在进一步的指示到来之前仍留在原地。(领港员总共有187名,他们分属13个国家。其中56名法国人,52名英国人,32名埃及人,12名希腊人,其余来自其他西方国家。)

纳赛尔并没有坚持要求所有的船只都向埃及新的运河管理机构交税。当英法命令本国船主不要向埃及交税,而是把费用记入旧运河公司在伦敦或巴黎的帐上时,纳赛尔还是继续允许英法船只通过运河。尽管存在英法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同时埃及人的财产还被冻结,但是住在埃及的英国公民和法国公民并没有受到骚扰,他们的资产也没有受到损害。冻结埃及人在伦敦、巴黎和美国的一部分资产使埃及蒙受了无法使用1.1亿英镑和5000万美元资金的损失,这意味着埃及只有400万英镑的外汇来支付进口物资的费用。通过把进口限制到最低限度及从友好国家获得贷款,埃及的经济仍能正常运转。特别是埃及从苏联那里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进口小麦的贷款,同时还增加了运河收入。尽管英法进行联合抵制,但埃及还是得到了55%的运河通行税,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和大部分为方便起见悬挂巴拿马和利比亚国旗的美国船主的船只支付的费用。

在军事上,纳赛尔尽可能地做好防备。埃及的军事人员已被动员起来,还制定了将国民卫队发展成“民族解放军”的计划,并将驻

西奈半岛的军队(那里可能驻有埃及军队的一半)调到了运河区。纳赛尔试图使靠近以色列的边界保持平静。在8月份,加沙地带只发生了不多几次小的事件,但这一地区的局势依然紧张而危险。

然而,英法无论如何也要走走过场的。英国议会接连通过议案;英法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西欧的舆论普遍发出了好战的叫嚣。与此同时,伦敦会议上出现的愤怒的发言也日益增多。

伦敦会议在采纳了由杜勒斯起草并亲自提出的三方建议后结束。8月23日发表的《十八国宣言》确立了国际控制和管理运河的原则,以保证它的公正和有效的使用。《宣言》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术语,“使它从任何国家的政治影响之下脱离出来”。运河的管理被委托给一个包括埃及在内的国际委员会,其成员根据使用运河的情况、贸易类型和地理位置来选择。宣言声称,它承认埃及的主权,并且建议埃及保证“公正地恢复”对运河的使用。会议派出一个代表18国的代表团去向纳赛尔解释这项建议,但没有向其授权与纳赛尔谈判或讨论修改这项建议。代表团由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率领。

显而易见,不管伦敦会议表面上如何允诺承认埃及主权,纳赛尔肯定不会接受这项旨在使运河脱离埃及控制的建议。建议所显示的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姿态与军事集结的背景——8月28日法国军队宣布在塞浦路斯与英国军队会合——遥相呼应,为代表团造成了一种最后通牒的气势。从纳赛尔的本意来说,他希望只要可能就保持谈判,而且代表团在11月4日完成了会见纳赛尔的第一项任务。与孟席斯的谈话是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纳赛尔与西方政治家的唯一一次直接接触,两位领导人在关于旧的帝国秩序与亚非非殖民化的新世界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尽管孟席斯来自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但他还是一个属于旧帝国、一个属于以不列颠为中心的白人联邦的人物。孟席斯有一副红脸膛,身体结实而且行动敏捷,喜欢用左手,爱打板球,而且喜欢英国礼仪传统。他还是个精明、熟练的律师和政治家。

在给艾登的私人信件中，孟席斯表述了他对纳赛尔的个人印象：

我听说纳赛尔是极富于个人感召力的人，他会使我不知不觉地相信一些外部的事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在某些方面很像个可爱的小伙子，非但不具魅力，而且不善交际。他很容易发怒。他同你谈话时会不时地把眼睛转向天花板，而且当他认为不能做某些事时会迅速地咧嘴笑一笑。可以说他是个值得重视的人，但不是个很机智的人。他在许多需处理的问题上缺乏训练或经验，因而他处理不好。他偶尔会给人怒气冲冲的印象，但是一旦他找到一种比较幽默的处理方式，他的怒气就会消失。他的逻辑思维不是很严谨。……

在10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罗伯特·孟席斯对这次与纳赛尔的接触又作了比较轻松的描述：

尽管纳赛尔有容易恼怒的脾性——我想我们都有一些脾性——但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我们正在谈论的充满爱国情绪的埃及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精神。纳赛尔是个仪表堂堂、非常机智的人，他明显地控制着他的政府。尽管不太老练和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但他使人印象深刻并给人以鼓舞。

经过5天断断续续的讨论和书信往来，纳赛尔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拒绝了18国建议。孟席斯报告说，他曾面对面地劝说纳赛尔，向他解释，由国际委员会控制运河不会比埃及作为所有者从承租人那里获得租金更多地违反埃及的主权，但他最后失败了。

孟席斯与纳赛尔的交谈清楚地显示出西方人对中东的看法与纳赛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苏伊士运河只是这种互不理解的最初表现。首先是大多数西方政治家错误地理解

了他们与纳赛尔和阿拉伯人关系的性质,不管用什么动听的词句来表述,这种关系基本上不是一致的,而是一种实力较量,这一点早被较弱的一方所承认。孟席斯在其简短的报告中试图尽可能地迎合埃及人的民族自尊,但他确实奇怪为什么纳赛尔会不接受他关于所有者与承租人的分析。然而对任何一个埃及人来说理解这一点都是很容易的。这不是地主随意出让土地,通过选择土地承租人而获得厚利的问题,而是试图在武力要挟下进行强取豪夺。这也不是根据市场行情要求租金的问题:对孟席斯来说,如果运河通行费由埃及人单独控制,“费用极有可能涨至交通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这种前景他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对“敲诈”的恐惧不仅使艾登脑海中产生运河失去控制,纳赛尔帝国将控制中东石油的可怕图景,而且他还确实担心纳赛尔会像个贸易同盟领袖和老练的公司放贷人一样,会组织阿拉伯人利用西欧的唯一石油来源和处于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来最大限度地榨取西方的资金。事实上属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确实是一些国家维持发展的主要通道。上述推论全是出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需要。英国和法国所做出的反应,除了因敏感和自尊所产生的联想之外,和19世纪罢工破坏者的行为一模一样。它们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已失去了“伙伴同盟”的领导地位,并且正在使用武力来对付好战的激进分子。法国外交部长皮诺有一次同杜勒斯交换看法时曾绝望地抱怨说,一旦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政变”中成功,西方就只能依赖“阿拉伯人的慈悲”了。其实事实本身是很简单的:由于英法两国已不像过去那样具备以武力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它们只应在良好的愿望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重建与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拉伯国家也应凭借对石油、交通和重要战略地理位置的部分垄断,在自身不受别国统治的前提下发展与西方的友好关系。即使阿拉伯国家无情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榨取西方利益,对西方人来说最精明的办法也不是进行军事威胁,而应采取经济措施,通过开发替代来源和供应通道而降低对中东石油和交通线的依赖。如果阿拉伯国家真想获得更多



的钱,理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对富裕的西欧来说这可能是“敲竹杠”,但对贫穷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这只是依据西方市场法则提出的公平要求。

孟席斯谈话揭示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纳赛尔像其他阿拉伯激进主义者一样,没能找到使西方相信上述基本事实的语言,同时也没能使英法放弃他们的恐惧。对纳赛尔来说,把西方看成是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一样的历史复合体是很难的。尽管旧的关系已被打破,但双方谁也不相信彼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

纳赛尔在最后拒绝 18 国建议的信中说,该建议被“埃及人民认为是不友好的,是对他们应有权利和领土主权的侵犯。这一建议妨碍了真正的合作”。

为使谈判继续进行下去,纳赛尔做出了第一个让步。他重申了埃及准备从运河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专款用于改进运河设施的打算。他宣布埃及政府还准备“着手建立公正和平等的收取通行费和其它费用的制度”。他还在 9 月 10 日发出的备忘录中建议召开一次新的苏伊士运河会议,这次会议不但要重新审议 1888 年会议制订的有关通行自由的原则,而且还要讨论运河的发展,以满足未来通航和建立公平的通行费制度的需要。为了及时实施这一计划,纳赛尔建议举行由运河使用国代表参加的谈判。这项建议被英国政府发言人三言两语地拒绝了。

艾登已估计到孟席斯代表团的失败,他和法国已经开始准备采取下一步措施。艾登认为,由于纳赛尔轻蔑地拒绝了和平解决方法,那么下一步就是在走向战争之前将此问题交付安理会直接表决。这一次杜勒斯反对将此问题提交安理会,他担心英法这样做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为取消英法准备提交安理会的打算,杜勒斯自己提出建立一个运河使用国合作组织、一种集体与埃及政府打交道的合作体的建议。如果需要,这个组织将安排在运河上引领该组织成员国的船只,并向其收费。杜勒斯将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看作是与埃及谈判及延缓英法使用武力的一种措施,而艾登则认为杜勒

斯是在向埃及实施高压政策，是走向战争的最后一步。即使在提出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建议并在9月19日召开的关于苏伊士运河的第二次伦敦会议采用这个建议之前，艾登显然已经判断失误，或者说被蒙骗了。

9月12日，艾登向下院宣布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计划时对英国工党反对派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如果埃及拒绝与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合作，那么将使用武力保证船只在运河通行。在此之前的9月10日，艾登会晤莫内之后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指示仍留在埃及的英法领港员在9月15日离开埃及。在西方各国首都，战争的议论已经越来越普遍。苏联总理布尔加宁给艾登写信提出了抗议。纳赛尔也第一次对战争的可能性表示出真正的关心。

9月13日，埃及驻华盛顿大使通知杜勒斯，埃及将把设立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和用武力通过运河均视为侵略行为。它将进行抵抗，“即使牺牲整个民族也在所不惜”。同一天，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问题。他说美国不打算使用武力通过运河，如果美国的船只被制止通过运河，将要求它们绕道好望角。两天前，艾森豪威尔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在目前条件下不打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除非等到国会开会并宣布交战，就我目前所处的地位来说，我不想进行战争”。

美国的这些声明使埃及松了一口气，但引起了伦敦和巴黎的愤怒。看起来好像战争的威胁开始消退了。形势依然紧张，但在运河公司领航员撤出后的10天里紧张度逐渐减轻，在此期间召开了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第二次伦敦会议，最后英法决定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9月15日，在英法领港员撤离的同一天，纳赛尔在比勒拜斯向埃及空军军校学员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谴责西方设立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是打算抢走埃及的运河并剥夺其合法的运河收入，他声明埃及准备抗击武力威胁和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他说：“那些侵犯埃及的人将不会活着离开埃及。我们将打一场常规战、

总体战和游击战。那些侵犯埃及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灾难将降临到他们头上。侵犯埃及就是侵犯整个阿拉伯世界。”这是纳赛尔自亚历山大演说以来情绪最激烈和最富挑战性的一次讲话。这可能反映出他日益相信埃及事实上不会交战，或者在他的心里打算以此提高听他演说的军人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因为这时候整个埃及都面临着没有英法领港员但却要使运河正常运转的最严峻的考验。

在随后的一星期里，埃及通过了这个严峻考验，它证明在先前的领港员撤走以后自己也能使运河有效地运转。留下来的埃及和希腊领港员，加上经过严格训练的新从苏联、南斯拉夫、德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招募来的领港员，在穆罕默德·尤尼斯的有力领导下，终于保持了运河开通，而且平均每天通过的船只比以前还多。

面对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的即将破产和打算靠撤走领港员来压制埃及并以此作为战争借口的失败，艾登与莫内看来打算做出最后的决断：要么承认纳赛尔获得了胜利，要么在没有有力借口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开战。从开罗方面看，好像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纳赛尔没料到——同时艾登也没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正在出现。迄今为止各方都想使之与运河冲突区分离开来的阿以争端（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分离开的）正以两种方式卷入危机：一种方式是通过以色列与法国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约旦的态度及约旦与英国的关系。

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一开始，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就与法国军方和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秘密接触。（7月27日，法国请求并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同意后，向以色列出售了24架法国最新式的海市蜃楼式战斗机，事实上卖了60架。）早在8月份他们就开始非正式地讨论袭击埃及的可能性。8月7日，法国同意提供一大批军事装备给以色列用于发起进攻。到了9月初，军事会谈变得更为正式，而且以色列知道了英法袭击埃及的军事计划细节。到了9月的

最后一周,本·古里安已原则同意让以色列参加一次联合行动。达扬将军随后同已取代了太爱搞和解的摩西·谢里特的新任外长果尔达·梅厄夫人一起,带着军火采购单飞往巴黎。他们带回的是一项供货许诺,计有 100 辆超级谢尔曼坦克,200 辆大型半履带式以及 300 辆四轮驱动式卡车,20 辆坦克运输车,1000 门火箭筒和一个中队的运输机。

以色列原本计划搞一项有限的行动以摧毁加沙地带的阿拉伯突击队基地和在西奈的埃及军队,夺取并开放蒂朗海峡。按原计划,此项行动应在 4 天内完成一场大规模的闪电式突然袭击,然后大部分以色列部队立即撤离。以色列军队原计划集中相当于 3 个师的力量,先歼灭埃及的一个正规师和分散在西奈的国民警卫队,然后再收拾加沙地带的力量薄弱的巴勒斯坦师。以色列人使得被派往以色列参加会谈的一些法国军官相信:法国只投入有限的部队配合这次行动,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得塞得港或是其他一些埃及领土作抵押。

为满足法方的愿望,本·古里安同意扩大原定计划,使之包括一次远征,即派以色列军队奔袭至苏伊士运河附近,从而征服西奈半岛的绝大部分。到了 10 月 2 日,达扬就可以告诉他的总参谋部按照这些计划进行作战准备了。此战役拟在 3 周内打响,尽管以色列政府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对法国政府而言,此计划正式讲来也仅仅是一个“以色列假设”,但是法以参谋人员协议已于 10 月 10 日在巴黎签订,并且法国对以色列行动提供支持的细节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敲定了。

至于英方究竟是何时获悉法以谈判内容的仍不能确定。艾登可能在 8 月底就听到了风声并对其总的构想有所了解。但根据安东尼·纽汀所说,显然艾登和法国关于英方参与法以计划可能性的首次认真讨论是在 10 月 14 日。当时有两位法国使者(一位是劳工部长兼皮诺出席联大期间的代理外长阿尔伯特·加齐耶,另一位是副总参谋长莫里斯·沙勒)秘密来到英首相夏季官邸会见



艾登。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些重要事件，它们影响到艾登对法国计划所作的反应。苏伊士运河第二次伦敦会议于9月19日开幕，9月21日闭幕。会议达成了成立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的协议。比以往更清楚的是，杜勒斯此时设想的是把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当作与埃及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和合作的手段，而不是把它当成进行胁迫的工具。因此，伦敦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和法国于9月23日将争端提交给安理会，要求于10月3日，即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成立两天后进行辩论。9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向安理会提交了关于阿以边境紧张局势的报告，这样安理会对中东危机的其他方面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经过一段短暂的安宁之后，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在哈马舍尔德于7月19日至23日最后一次出访中东期间向他做出的和平承诺，此时已经开始动荡了。埃以边界虽然相当平静，但约旦的边界上却发生了较多的事件。约旦国内也出现了政治骚动。由于约旦议会投票通过与埃及和叙利亚缔约以取代英约条约，侯赛因于6月26日将之解散。在筹备大选的时候，以约旦和伊拉克为一方，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联盟为另一方竞相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以色列也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以确保在约旦的军事和政治现状中不会出现任何可能严重影响其安全的变化。如果出现诸如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开进约旦这样一种混乱局面，那么以色列也已事先表明其保留干预的权利，其方式可能是占领约旦河西岸。

9月10日，以色列军队发起了对边境上的约旦军队和警察哨所的“报复性”袭击，这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4次袭击战中的头一次。后几次报复袭击的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以色列计划向埃及发起攻击的注意力。这些袭击可能还有向英国人施加压力的意图，即迫使英方同意对埃及发动进攻，避免因英约条约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艾登担心英国可能不得不按照条约规定向约旦提供支持，因此他鼓励侯赛因国王寻求伊拉克的支持。于是，侯赛因于9月14日前往巴格达与他的表亲费萨尔国王会晤。一周之后，纳赛尔飞往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国王和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会谈。纳赛尔及其盟友重申了他们早已向约旦提出的替代英国援助计划，并建议将约旦军队置于埃叙联合指挥部的指挥之下。侯赛因当时并未接受此项建议，因为他正与伊拉克谈判以建立彼此间更密切的军事合作。然而，侯赛因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英国开始时持鼓励态度，但后来却又犹豫不定，再加上以色列的威胁，伊拉克派军队之事就搁浅了。

在纳赛尔从沙特阿拉伯飞回开罗后的第二天(9月25日)，以色列向约旦发起了第三次袭击，在胡珊警察站打死了39名约旦人。此时，本·古里安和以色列军事领导人已集中精力把埃及，而不是约旦作为真正的攻击目标。但在10月上半月，联合国停火观察员认为以色列似乎仍要向约旦发起进攻。当以色列向约旦边境城镇奎其尔亚发起第4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袭击时，人们更以为以色列要攻击约旦。在这场袭击中，有50余名约旦人被打死，以色列方面也死了18人。

虽然奎其尔亚袭击战可能对以色列进攻埃及的准备工作起了有益的掩护作用，但它对约旦局势的发展仍有影响。艾登在9月26日与劳埃德一起去巴黎与莫内和皮诺进行了秘密会谈，但并未被告知法以计划，因为侯赛因国王在奎其尔亚袭击战期间呼吁英方提供空中支援，艾登的反应是给赛义德发电报，叫他迅速向约旦派出一个旅的伊拉克军队，以阻止侯赛因向纳赛尔寻求支持。同时，劳埃德在安理会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并提醒以色列注意英国在英约条约下所承担的义务。赛义德和侯赛因同意调动伊拉克军队，但以色列人通过法国方面提出抗议，称此举将对他们构成威胁。本·古里安怀疑艾登的这一措施可能是英伊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是要约旦摆脱埃及，而且还要以牺牲以色列利益为代

价来实现一项全面的阿以争端解决方案。

按照纽汀的说法,尽管法国代表以色列提出了抗议,但艾登不愿完全取消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莫内才于10月14日迫不得已向艾登通报了法以进攻埃及的计划。对英国来说,当其盟友法国支持以色列进攻埃及的时候,自己却在那里保护约旦免遭以色列的袭击显然是行不通的。莫内直到此时才把事情告诉英国人还另有原因。其一,法以计划进展很快并已相当成熟,因此需要很快付诸实施,否则就不能按时于11月6日实现英法的既定目标;其二,如法国要兑现向以色列许下的压制住埃及空军的诺言,那就需要英国的支持——只有英国才能提供攻击埃及机场的轰炸机;其三,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本·古里安想确保英国人不至于在最后一刻往后退缩,以免他受到两面夹攻。难道英国人不会乘以以色列进攻埃及之机支持约旦和伊拉克发起一次战役,夺走以色列的一些领土吗?确保英国人不会突然成为敌手的最佳办法是让英国人站在以色列一边。最后一个原因是,艾登很快将既找不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又找不到推迟军事行动的理由。杜勒斯已使他彻底打消了让美国支持其武力政策的希望,苏伊士运河争端已提交给了安理会。在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成立的第二天,此时已更为怀疑英法打算诉诸武力的美国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不知道在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的计划中有什么“牙齿”。对于美国人,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来说,埃及在英法领港员撤走之后仍显示出使运河保持通畅的能力,这显然是个转折点,它排除了使用武力的最后一个借口。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西方与纳赛尔就其与苏联关系和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方面的争吵是需要区别对待的两个政治问题:它们是冷战中“长远问题”的一部分。

艾登拒绝了杜勒斯提出向埃及施加有效的经济和道义压力的呼吁:“与纳赛尔无法谈得通”,他还称再拖延下去只会使纳赛尔巩固他的胜利成果。

实际上,在10月5日开幕的安理会会议上以及在劳埃德、皮

诺和马哈茂德·法齐 10 月 10 日至 12 日于哈马舍尔德的办公室举行的私下会谈中,埃及人都表示愿意谈判。除了坚持运河最终由埃及控制并反对国际控制这一原则外,他们实际上准备在有关运河的其他问题上作出妥协。然而,纳赛尔似乎是头一次同意运河使用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组织地参与处理诸如通航收费标准以及维护、开发资金分配等事务,这可以被看成是埃及政府愿和使用者之间达成伙伴关系的一种形式。

在这次会谈中,有关各方在被称之为“六项原则”的各项条款上达成了协议。这些原则是:

1. 不受任何歧视,自由、通畅地在苏伊士运河上航行穿越。
2. 尊重埃及主权。
3. 运河的运营脱离于任何国家的政治之外。
4. 过河费用标准的制定由埃及和使用方协商解决。
5. 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开发。
6. 埃及和原苏伊士运河公司之间若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应接受仲裁。

双方对实施这些原则的方法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法齐拒绝了英法方面提出的在 18 国提议的基础上组建国际董事会的要求,但他愿意考虑“在埃及主管当局和使用者之间进行有组织合作”的建议。他还准备接受将 1888 年公约加以扩大,将关于最高过河费问题,维护、保养和开发以及向联合国汇报等方面的义务包括进去。

劳埃德认为与法齐的会谈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艾登却已不耐烦了。他指示劳埃德催促安理会对那项制定出 6 项原则但要求通过 18 国提议加以实施的英法决议投票表决。埃及接受的是决议的头一部分而不是第二部分。在 10 月 13 日投票表决时,整个决议得到了安理会 11 票中的 9 票赞成,但有关实施方法的第二部分内容却被苏联给否决了。尽管投票结果如此,劳埃德和法齐仍与哈马舍尔德保持接触,以便 10 月 29 日在日内瓦恢复谈判。

埃及在纽约的态度有可能正如有的报道所传纳赛尔当时在开



罗告诉印度大使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和解手段”。但纳赛尔也遇到了来自朋友和支持者们的强大政治压力以及来自敌对者的一些经济压力,因此不得不提出妥协的解决方案。印度方面正敦促他搞调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急切想解决问题。然而,在安理会投票表决之后,艾登至少可以公开宣称通过联合国实现和平解决希望已经破灭,因此有理由诉诸武力。这一局势以及犹如一团乱麻的约旦问题就成了法国使者加齐耶和沙勒 10 月 14 日秘密访问首相夏日官邸的背景。这两位法国人没有绕圈子。再次呼吁英国制止伊拉克将军队调进约旦之后,加齐耶问道,如果以色列进攻埃及,英国方面将作何反应。据当时在场的纽汀说,艾登“半开玩笑地回答,他本人很难为纳赛尔上校而战”。沙勒随即概述了英法可在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时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计划。在以色列夺取大半个西奈之后,英法方面将立即命令以色列和埃及都从运河区撤走各自的部队,以便让英法军队占领运河并将交战双方分隔开来。艾登答应尽快让法国政府知道他对此项计划的看法。

纽汀说,从艾登在会晤后的谈话来看,他知道英国首相早已拿定主意配合法国计划。在 10 月 16 日上午举行的英国各部大臣会议上,纽汀徒劳无益地敦促对法国计划加以直截了当地拒绝——此计划将给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和其他利益带来损害;它将破坏联合国宪章;它必将引起美国的反对,并在英联邦中造成分裂。劳埃德被艾登从纽约紧急召回,他一回来就告诉纽汀他不同意这项计划,但随后又被艾登拉了过去。就在当天下午,艾登和劳埃德飞往巴黎,与莫内和皮诺进行秘密会谈。劳埃德回国后立即告诉纽汀说艾登已完全同意法国的计划,法国和以色列还要在巴黎作进一步商谈。据一位消息灵通的法国人说,艾登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显示出要改变主意的迹象,但当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威胁说即使英国人不参加也要执行这项计划时,艾登最终还是下决心要干。

本·古里安在达扬和以色列其他领导人的陪同下,于 10 月 22 日黎明秘密乘飞机到达法国与莫内和皮诺进行最后的谈判。据

信这些谈判要么是在巴黎近郊靠近维拉库贝勒军用机场的塞维赫的一处私人别墅里,或是先在机场内一座没人使用的楼房内举行的。劳埃德也从伦敦赶来,据说与帕特里克·迪安(现在是勋爵)这位外交部高级官员一道参加了头天的会谈。随后迪安留下来起草并于10月25日签订了尚未正式生效的英法以“塞维赫协定”。

该协定规定以色列应于10月29日晚对整个西奈半岛发起进攻。进攻将以向苏伊士运河东岸附近空降部队为开始。当以色列在广播里宣布其军队正逼近运河口时,那就是给英法发出信号,让它们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军队各自从运河两岸向后撤退10英里,以便使英法部队开进去。据猜测,埃及会拒不服从最后通牒,这样英方就可立即对埃及机场进行轰炸。轰炸将夜以继日地持续下去,直至英法部队6天后相继从空中和海上袭来,在塞得港登陆并占领运河区。这样英法方面只需将他们早已制定的占领运河区的军事计划加以实施就行了。

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马上就开始进行动员工作。10月28日,本·古里安赢得了内阁中绝大多数成员,而且还有以色列反对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对这项计划的支持。更多的法国军火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以色列。将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护伞和海上保护的法国飞机、飞行员和军舰都进入阵地,各就各位。为了蒙蔽其他国家,以色列公众得到的印象是军事上的准备与约旦的局势有关。约旦局势的发展确实提供了绝妙的掩护。10月21日,约旦亲埃及的民族主义派别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赛义德在艾登从英首相夏季官邸发出的警告的恐吓之下,没敢向约旦派去任何伊拉克部队。约旦政府在10月25日决定加入埃叙联合军事指挥部,这样就在战时将约旦的部队置于埃及总指挥官的领导之下。

艾登和莫内10月16日在巴黎举行决定性会晤之后,美国已无法通过正常的军事渠道从其盟友那里得到情报。艾森豪威尔认为以色列可能在谋划夺取约旦河西岸,因为约旦似乎正处在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他向本·古里安发出几封私人信件,要求古里安

克制，并警告他别以为美国政府会因为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而袖手旁观。在第二封信中，艾森豪威尔提到与三国宣言的另两个签字国英国和法国进行磋商，达扬在日记中曾对此作了一番冷冰冰的评论：

从他的两次来信看来，很明显他（艾森豪威尔）认为迫在眉睫的冲突似乎要在以色列和约旦间爆发，而且英国和法国将与他合作防止此冲突之爆发。他对局势是多么孤陋寡闻！现实与他的判断在各个方面都恰好相反。

在英、法和埃似乎有意将在纽约开始的运河问题谈判继续下去这一现象的麻痹下，在最后阶段的总统竞选和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波匈反苏局势使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尽管有种种神通广大的情报来源为他效劳，但显然没有怀疑过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会向埃及联合发起进攻。纳赛尔同样也没有过这种怀疑。他极为自信地排除了这种力量组合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结合叫人看起来与英国在中东的利益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或许他也担心过英国独自或是与法国一道仍有可能发动进攻——他在10月中旬对英国记者汤姆·利特尔说，他认为与英国搞妥协现已是不可能了，因为“艾登勋爵想打击我，而我又无法不让他这样做”。当利特尔暗示埃及无法抵御英法部队时，据说纳赛尔回答道：“但我不打算和他们打。我打算往后站并等待世界舆论来拯救我。”

甚至在本·古里安于10月17日在内塞特讲话时指名道姓称埃及是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之后，甚至在以色列厉兵秣马，进行战争动员之后，纳赛尔仍未加强兵力对付以色列。他没有改变他在危机之初所做出的从西奈半岛撤出相当一部分军队来保卫运河区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决定。他们的威胁来自英国和法国。在埃及的总共9万名军人中，据估计通常有6万人驻扎在西奈和加沙地带，这些部队由4个师和1个装甲旅组成。在八九月份这段时间内，纳赛尔

已将其中两个师和那个装甲旅撤到了运河以西。

余下的埃及部队大都集中在西奈北部的防御阵地上。这些阵地以拉法(在加沙地带南边)、阿里什(沿西奈海岸再往西)和在南部的库赛玛所组成的三角地带为依托。再往南穿越西奈至伊斯梅利亚的另一条干道是依靠阿布阿格雷的有利地形进行防御的。一旦拉法失守,加沙地带与埃及的联系中断后就无法防守了。大约5000人警戒着加沙地带,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或国民警卫队的部队。

在库赛玛以南这片西奈沙漠上,边境线和沙漠中的道路由大约1500名持轻武器的摩托化边防部队组成的哨卡和巡逻队把守。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有大约1200名埃及卫戍部队,他们大多数是后备队和国民警卫队员。还有一些海岸炮台控制着贯穿蒂朗海峡的亚喀巴海湾的入口。

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埃及装甲部队由约100辆谢尔曼式和苏制T34坦克以及50门“射手”式自行反坦克火炮组成。

按以色列的估计,埃及可使用的空军力量在当时有57架战斗机(30架米格式,15架蝙蝠式和12架流星式)、12架伊柳辛轰炸机和60架运输机。在西奈之战中只动用了一部分飞机,纳赛尔一开始就把其它的飞机放在一边不用,后来又让这些飞机飞到了国外。

为对付埃及的这些兵力,以色列投入了6个步兵旅、1个伞兵旅和3个装甲旅(约4.5万人),其中包括约300辆谢尔曼式、超级谢尔曼式和法式AMX坦克。以色列方面可用于战斗的空军力量有53架喷气式战斗机(16架海市蜃楼式,22架飓风式以及15架流星式)再加上64架活塞式飞机以及10架运输机。

因此,以色列人起初在兵力和坦克上是占优势的,同时法国人的空中掩护(由60架喷气式战斗机提供)又给了他们空中优势。

西奈一战显示了以色列军队的某些杰出的战斗技巧,并暴露出埃及部队,尤其是军官们的一些可悲的弱点。但也不像当时一些



记者添油加醋地描绘的那样，埃及部队不经抵抗便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迅速地惨败下来。后来的一些更坦率，消息更确实的报道，其中包括达扬将军自己的说法，都清楚表明发生过几场十分激烈的遭遇战。埃及军人的表现说明他们长于固守，但在机动性和反攻方面较差。这些记述也表明英法空军的干预以及英法军队登陆的威胁对埃军很快遭到惨重的失败起了重要影响，或至少帮助以色列人减少了伤亡。

以色列向埃及发动的攻势是 1956 年 10 月 29 日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开始的，当时空降旅将 398 名伞兵降落在苏伊士运河南端以东约 40 英里的米特拉关口。这支部队从天而降的消息是以色列在广播里公开宣布的，目的在于制造“对运河的军事威胁”，从而给英法干涉提供口实。同时，以色列军队从 3 处越过边界进入西奈南部，并迅速攻占了一连串的埃及边防站卡。一个旅从亚喀巴省首府埃拉特开了过来，夺取了埃及边境线内 8 英里处一个名叫纳卡布的小哨卡。只要埃及空军不再构成威胁，这支部队将立即顺着沿海湾的坑坑洼洼的沙漠公路向前推进并向沙姆沙伊赫发起袭击。空降旅的其他部队从昆蒂拉越过边界，进而穿越西奈南部与米特拉关口的伞兵汇合。该部队夺取了扎马德和纳克尔这两处埃及哨所，而且其先头部队在 10 月 30 日晚 6 点已与米特拉的伞兵汇合。第三支突击部队是由一个装甲旅掩护的一个步兵旅。它们在沙巴越过边界，向西奈北部埃及军队主要防御阵地的南端发起进攻。尽管埃及军队进行了阻击并战死了近百人，但扎马德和纳克尔还是很快失陷了。为争夺库塞玛阵地的一部分，两军展开了更激烈的战斗，以色列军队打了三小时才攻克了埃军阵地。达扬的计划是将主要进攻隐蔽至第二天进行，但这一计划差点叫装甲旅过早地通过库塞玛向阿布阿格雷据点外围推进给破坏了。至此，不仅是纳赛尔和埃及指挥部，而且整个世界的确都警觉起来了。

然而，埃及人在一开始确实被搞得措手不及。总司令阿米尔将军正出访叙利亚和约旦商谈这几国与埃及组成联合指挥部的事

宜。那天晚上，纳赛尔一接到以色列军进攻昆蒂拉并在米特拉空降的消息就让全体武装力量处于戒备状态。他立即向米特拉派去增援部队，并指示两个步兵旅和一个装甲旅随时准备沿中央和沿海公路开进西奈，埃及人预料此地是以色列人的主攻方向。埃及空军开始时反应迟缓，但第二天它起飞了 50 架次，第三天是 100 架次，主要是对以军进行地面攻击。到了午夜，埃及已经明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一次袭击而已。纳赛尔命令处于戒备状态的增援部队跨过运河，从而将他在西奈的兵力增加了 1 万人左右，而且增派了由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组成的混合部队。

叙利亚军队要求参战，但纳赛尔劝其暂时不要插手。后来他宣称是不想给以色列开辟另一战线的机会，也不想使英国和法国人借此入侵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据纳赛尔说，除了叙利亚，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仅表示要给予道义方面的支持。在下一周先是与以色列人然后又是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斗中，埃及部队始终孤军奋战。纳赛尔还说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参战，原因是他告诫他们不要这么做。然而开罗电台却在广播中呼吁阿拉伯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如果这场斗争仅仅是与以色列一家展开的，那么纳赛尔在后来或许会吁请阿拉伯国家参战。但到了 10 月 30 日晚，局势出现了变化：这场冲突已扩大成国际性危机。那天下午，艾登和莫内在伦敦进行了最后一轮磋商后，发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和埃及分别将其部队从苏伊士运河往后撤退 10 英里，并允许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占领运河区的要塞。他们自称是要“将双方交战人员分隔开”，以确保运河的安全。他们限埃及和以色列在 12 小时内给予答复。以色列同意了，埃及则像预料的那样加以拒绝。纳赛尔马上就认定，如遵从此通牒那就是对正遭到进攻的埃及的一个惩罚，而对进攻者以色列则是偏袒。况且埃及还得把它的部队从 100 英里的地段往后撤，以色列则可以长驱直入，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大半个西奈，英法军队也得以占领运河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

纳赛尔当晚9点召见了英国大使汉弗莱·特里维廉,向他通报了埃及的答复。纳赛尔告诉特里维廉,埃及将进行战斗,但向他保证英国人在埃及的生命财产将得到保护。甚至在英国开始轰炸埃及、英军入侵埃及之后,这一诺言也得到了信守。一些英国人被看守了起来,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也是出于安全保卫方面的原因。他们中间包括英国记者和在运河区军事基地工作的400名英国平民,埃及军队当时就把这个军事基地完全接管了过来。这些人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只是在几周之后,当纳赛尔试图加快执行联合国决议让英法撤军的时候,他才开始从埃及驱逐英国人和法国人并扣留他们的财产。

正当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代表的紧急要求下准备开会讨论以色列的进攻时,最后通牒的消息宣布了,而当天早些时候,英法一直蓄意对其盟友美国政府隐瞒此事。美国代表提出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到停火线之后。决议敦促所有的成员国都不要在该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援助。决议案遭到了英法的否决。苏联类似的决议案亦遭否决。南斯拉夫随后又提出一项决议案。它按照为避免否决而制定的“一致和平”程序,要求召开一次联大特别紧急会议。这项决议案于10月31日以7票支持4票反对得以通过。

纳赛尔最初显然认为,英法通牒只不过是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牵制运河区埃及主力部队,从而使它们难以应付可能发生的英法干涉。当时他并没改变他的军事部署。他既没有派更多的部队增援西奈,也没有把那些早已上路的增援部队撤回。但他将一部分空军力量撤出西奈战役,以应付新的威胁。只到第二天晚上,即10月31日晚6点,英军空袭开始时,也就是通牒期限过了12小时之后,他才确信英法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纳赛尔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危险和复杂的局面。显然以色列的攻势非常凌厉,即使将埃及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也不一定足以将其制止。除此之外,他还面临实力远远胜过埃及的欧洲两大势

力的进攻。用通常的军事术语说，他难以长期抵抗这支联军部队。但他并没有丧失勇气。当危局摆在面前时，他显示出了个性的力量以及他在埃及的强有力的地位。他完全能把他的同僚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不仅能冷静地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纵横捭阖，同时还能够果敢地采取军事行动。他显露出比他周围的一些平庸之辈高出一筹的领袖素质：机智和勇气；迅速掌握核心问题的本领；良好的政治时机感；令人折服的统帅能力。

他的头一个念头是埃及群众是否会在英军的狂轰滥炸之下精神崩溃。当纳赛尔在房中听到开罗郊外传来堪培拉式喷气机的呼啸声和炸弹在玛扎机场的爆炸声时，他驱车穿过已实行灯火管制的首都街道来到政府大楼，以便摸清城市的状况。当人群向他高呼“我们将战斗，我们将战斗”时，他心里才踏实下来。他感觉在组织埃及的抗战中，他可以指望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

在英军将开罗电台的广播发射机炸坏后，他到了阿扎尔清真寺这个传统的爱国感情汇合中心，作了一次战斗动员讲话。当他听说一个代表前政客和富商巨贾的团体正考虑敦促他与英法妥协、答应其要求时，他警告说无论是谁劝他投降，都会在总统府的花园内被当众枪毙。

对国民的士气有了把握之后，他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多地 把在西奈的埃及部队解救出来。如果英法联军在运河区登陆，在西奈和加沙的所有埃及部队都将被完全切断联系。况且，如果非得暂时牺牲一部分领土的话，那丢掉空荡荡的西奈沙漠总比丢掉任何其他的埃及领土强，尤其是比丢掉尼罗河三角洲和运河区要强，这个地区可是人口稠密的埃及心脏地带。从长远看，对付英法联军只能依靠外交手段再加上游击战。但只要是能从运河那边撤回来，每一件武器和每一个士兵都会在这一政治加军事的冲突中发挥作用。

国际上对英法干涉的反应向纳赛尔说明，埃及享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支持既来自美国又来自苏联，还来自阿拉伯世界和亚



非国家。然而，纳赛尔这时与苏联人打交道还是谨慎的。他不想冒犯美国，尤其是因为从11月1日起，俄国人自身正忙于镇压匈牙利革命。甚至在英国，艾登的行动在议会和新闻界都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公众舆论莫衷一是，分歧很大，而且已经有舆论公开指责与以色列的“勾结”。在国外，艾登则遇到了来自美国，英联邦和苏联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但纳赛尔认识到，除非埃及自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否则这一切有利条件仍有可能化为乌有。如果埃及正规军被打垮（当时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么它就得准备打游击并打出剩下的唯一王牌，即封锁运河。纳赛尔下令将早已备好的堵塞用的船只沉入运河。在接下来的48小时中，共有47条船只被沉到运河里去了。截至11月1日，运河已被关闭。两天后，当叙利亚军队工程兵把从伊拉克通过叙利亚到地中海的国际石油公司的输油管线上的三个泵站炸掉时，向英法提供石油的另一条中东石油输送主渠道也给堵死了。为了支持埃及，沙特阿拉伯禁止向英法输送石油。艾登的行动犹如一场恶梦：他自己最担心的石油供应中断终于出现了。

纳赛尔还授权将40万支步枪发给了平民，以便组成人民抗战小组。当晚（10月31日），纳赛尔下令从西奈全面撤出埃军。加沙的部队得到指示在适当的时候投降，以免给当地众多的人口造成伤亡。在此事件中，加沙地带的一部分警备部队，即尤尼斯率领的巴勒斯坦旅拒绝缴械投降，最后终于被以军飞机坦克的进攻摧垮。沙姆沙伊赫守备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该部队指挥官在他的部队显然不能撤出的时候决定坚持打下去。

据说纳赛尔为了让军队首脑们同意执行他的撤退命令曾以辞职相威胁。当时，西奈战役已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以色列人已向埃及设在阿布阿格拉和拉法的主阵地发起了进攻，他们无意中还陷入了米特拉关口的激战。在阿布阿格拉，以色列装甲旅从库赛玛开过来，从南面和西面突破了埃及的外围防线。连同从奥加刚突进过来的步兵旅一起，它几乎将埃军的两个主要据点卡塔夫和什

汉包围起来,但在这两处阵地上的埃军顽强坚守,击退了以军反复发动的进攻。一支埃及坦克部队从阿里什杀过来,企图用反冲锋解除对阿布阿格拉的威胁,但被击溃。埃及步兵和装甲部队沿海岸公路开过来增援阿里什,沿中央公路开过来参加阿布阿格拉或米特拉的战斗,但由于得到法国飞机助战的以军的空袭而受到了阻碍。一艘法国巡洋舰也参加了当晚对拉法埃军阵地的炮轰,这是为以军向该地发动进攻作准备的。另一艘法国护卫舰《凯尔桑》号甚至在英法最后通牒的限期未到之时便于10月31日参加了在海法港外击伤并俘获埃及驱逐舰《易卜拉欣·奥瓦尔》号的战斗。

在米特拉山口,以色列空降部队指挥官置达扬不得恋战的命令于不顾,于10月31日决定占领两面都是陡坡的狭窄山谷。这支空降兵纵队发现他们处在埃军从峡谷两边的山洞中和四周高地上发出的猛烈火力之下而动弹不得。这场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后以军才将埃军阵地攻克。以军自己承认的损失是阵亡38人,伤120人,还有一些车辆被击毁。以方称有150名埃军被击毙。其余大约有一个营的埃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了。

在纽约,11月1日召开了联大紧急会议。11月2日上午3点通过了一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呼吁立即停火,将有关军队撤至停战线以后并停止将军事力量调进该地区。它还呼吁采取措施重新开放运河。在进行最后辩论时,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在美国的支持下,提议建立一支联合国部队来维护中东和平。埃及宣布如进攻一方的军队停止侵略,它将接受停火。

此时,西奈和加沙的主要战斗已近尾声。拉法失守了;进入阿里什的以军发现埃军已把它变成了一座空城。那天(11月2日)傍晚,加沙地带已被占领,埃军已从阿布阿格拉剩余的据点中撤走。从阿布阿格拉沿中央公路向西推进的以军坦克已两次与正从罗德·萨利姆和吉夫加法撤退的埃军装甲旅后卫发生冲突。这是此次战役中仅有的坦克战,双方都遭到一些损失。退却的埃及部队缺少空中掩护,已开始遭到以色列和法国空袭带来的沉重损失。在英

法联军对埃及军用机场进行轰炸之后，纳赛尔已限制埃及空军的活动以保护飞行员，并将剩下的米格和伊柳辛飞机送到了卢克索、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西奈的道路上塞满了被击毁和冒着烟的埃军车辆以及丢弃的装备。数以千计的埃及士兵扔掉了军装、装备和靴子进了沙漠，他们挣扎着试图徒步穿过沙丘回家。正是在这个阶段，本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组织得很好的撤退变成了乱糟糟的大逃亡。

外交家和军人之间现在开始了竞赛。旨在实现停火并防止英法入侵的和谈努力集中反映在关于建立一支联合国部队的加拿大提案上。提案的支持者们把它看成是预防英法干预的一种措施，英法则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认为它有可能使已从海上开往埃及的英法远征部队的行动合法化。法国已下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把对埃及的进攻打到底，但艾登的政治困境却在加剧。英国首相的希望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让其部队占领运河区直至联合国部队到来，或者是应把英法军看成是联合国的先头部队，这样就仍有可能使英法的军事行动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但美国和以印度为首的亚非国家在联合国都明确表示，它们决不能接受这种意见。

以色列主要关心的倒不是由英法军队或是联合国部队来占领运河区，它的主要兴趣在于实现自己的战争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占领沙姆沙伊赫和蒂朗海峡，这必须在国际压力迫使它接受停火之前完成。不过，本·古里安希望英法会进行干预。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即以色列最好不要单独作为干扰破坏和平、无视联合国决议的侵略者出现，而要把英国和法国与它拉在一起受审。但由于埃军在退却，以色列正迅速完成西奈战役，战斗可能在11月5日英法计划的登陆日之前结束。这预示着艾登所需的借口将不复存在。他再也不能宣称他是在力图将双方交战人员分开以制止战争蔓延。

11月3日晚，联大开始辩论亚非国家的一项以更强烈的措词再次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案和加拿大提出的吁请联大秘书长在

48 小时后就组建派往中东的联合国部队计划提出报告的决议案。11 月 4 日这个星期天的凌晨,两项决议案都通过了。苏军当时正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镇压纳吉政府。埃及投了弃权票,但后来说它将于当晚 8 点接受决议案并准备停火。在以色列部队已完成对几乎是整个西奈以及加沙地区的占领并正集结力量准备对沙姆沙伊赫发动最后攻势的情况下,以色列代表那天也感到有把握向联大宣布只要埃及作出同样响应,以政府可接受停火。但在英国的压力下,以色列后来又撤销了对接受停火的表态并将它推迟到英法军已在埃及开始登陆之后,因为尽管听到了联大决议的消息,英内阁还是作出将军事干涉进行到底的决定。

次日,即 11 月 5 日黎明时分,600 名英国伞兵在塞得港登陆,487 名法国伞兵在位于苏伊士运河彼岸的法得港登陆。当天中午刚过,又有一些后续特遣队投入了行动。他们得到了海岸外面停着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所提供的火力支援。法得港落入了法军手中。在塞得港,经过一阵激战,埃军指挥官于下午 3 点半同意停战以讨论投降条件,但纳赛尔命令塞得港总督拒绝投降,因此两小时后又恢复了战斗。在穆斯林兄弟会、共产党、政府以及纳赛尔的解放大会的组织下,地方抗战小组纷纷涌现。带扩音器的广播车鼓动塞得港人民坚持抗战,说伦敦和巴黎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实际上,苏联人当晚确实通过布尔加宁致艾登、莫内和本·古里安的信件对英、法和以色列发出进行核打击的威胁。(据纳赛尔说,这些信件是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建议写的。)苏联总理还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建议苏美联合进行武装干涉以制止中东战争。次日苏联报刊就开始谈论派“志愿军”去帮助埃及。苏联是否真有此意图,这得打个问号。无论如何,纳赛尔此时正寄希望于联合国和美国对英法施加压力。当时他并不想要苏联的志愿人员。如真接受这些人员,那他必定会失去美国对他的支持,而且这些人可能像英国人表现的那样,请神容易再往后送神就难了——或者这些苏联人的行为会像他们正在匈牙利干的



一样。纳赛尔 11 月 8 日告诉美国驻开罗大使雷蒙德·海尔：“不要介意苏联的这些举动，我对任何大国都不相信。”纳赛尔后来说，直到 11 月 6 日苏联来信之前，他从未与苏联方面商谈过援助的可能性。然而，当时有许多人都真以为苏联集团会派出“志愿军”，这就是他们要求万分火急地组建联合国紧急部队，要求美国施加压力让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的原因之一。

苏美同时支持埃及的短暂的巧合并不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间冷战的减弱。艾森豪威尔答复布尔加宁，苏联不得进行干涉，无论是否与美国一起干都不行。他还警告说，任何对英国和法国的进攻都会招致美国对苏联的报复。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在塞得港第一天的战斗中，以军夺取了全部沙姆沙伊赫。以色列空军没遇到抵抗，进行了一通狂轰滥炸。埃及守备部队在经过 9 小时的战斗，阵亡 100 人，伤了 31 人之后投降了。以色列在完全征服了西奈之后并且在英法军登陆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才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在联合国，哈马舍尔德一直和加拿大和其它国家代表一起夜以继日地苦干，以求制定出一项建立联合国部队的计划。加拿大提出的关于建立这样一支部队的决议案当天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紧急部队，由联合国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的加拿大籍负责人伯恩少将统领。

次日，即 11 月 6 日黎明，英法突击队和支援部队从海路在塞得港和法得港登陆。在持续到下午早些时候的战斗中，英法军由坦克开路、海军飞机掩护，逐步从得到大批武装平民支援的埃军手中将该港口的控制权夺了过来。埃及人伤亡惨重。

塞得港的埃军投降后，一支英军装甲纵队开始沿着运河向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推进。但它刚深入到塞得港以南 25 英里处的一个叫开帕的村庄，英国政府就宣布它接受即将从午夜开始生效的联合国停火决议。

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有许多政治和外交上的原因，但经济因素有可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不论英法军队是打下去还是停下来，

在这以后的许多周内，都不会有石油从运河或叙利亚管线输送出来。美国政府表示它的财政援助要用于因更换石油供应国而需付的额外开支，而且它是否支持英镑的稳定将取决于英国是否早日接受停火。美国坚持施加这种经济压力以确保英法撤军。美国对伦敦和巴黎方面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不仅说明了艾森豪威尔对艾登和莫内欺骗他是何等的愤怒，而且也不仅仅是出于美国对其在中东地位的关切。美国政府似乎把中东和匈牙利问题联系在一起，将其看成是一场正在扩大的世界性危机。若不加以制止，那它就会把美苏连同他们巨大的核武库一起拖进一场危险的对抗之中。在这种局势中，英法坚持在埃及登陆犹如顽童在渗漏着的油罐附近点火柴玩。

于是战斗停了下来，只是在塞得港还有些零星的埃及游击队进行骚扰活动。纳赛尔现在不仅要用几个月时间处理善后工作并开展紧鼓密锣的外交斗争来实现英、法、以的撤军，还要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和找到某种政治解决方式。埃及已经免除了打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所产生的对人力和物力的严重影响，也免除了时时存在的冲突可能扩大成一场更具破坏性的由代理人打世界性战争的危險。但是，纳赛尔现在要搞的外交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刚刚结束的一周战争还要困难。它需要技巧、顽强和对国际政治的敏锐判断才能扭转军事现状，才能落实占领军的和平后撤。因为尽管在战争高潮之中埃及享有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但如果英法以联军的占领拖得太久而且以谈判取代了射击，那再想让这种支持保持在同样水平上就肯定是难上加难了。

除了时常变化的世界舆论外，纳赛尔手中掌握的三件主要的武器都是带着危險的双刃剑。人们担心如果苏联集团派“志愿军”，那西方国家和苏联集团间就会发生冲突，而且美国和苏联都担心英法失败后对方在中东的影响会增大。纳赛尔要让这种危險存在下去但又不能让它太剧烈，以免迫使美国由敦促英法撤军转而它们加以支持。拖延运河的开通和输油管线的通畅，加上美国的压

力和对英法军持续占领发动游击战的威胁是纳赛尔对付英法的主要武器。但这也是带有冒险性的。这对埃及本身在经济上是个破坏,而且如拖下去就会使埃及失去一些国家的支持。说到底,要想让以色列撤军,唯一有效的方式仍是美国的经济压力。但纳赛尔是在他自己正顶着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压力,拒不接受在中东建立美国反苏势力范围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却不得已而求助于美国的。他不能付出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代价,这不仅是因为他反对将埃及变成任何大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而且还因为如这样做就会与苏联敌异,而当时他仍需要美苏两家的支持。

同样,在通过哈马舍尔德与联合国就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埃及的行动条件(尤其是在加沙地带)进行交涉时,纳赛尔也像是在走钢丝绳。他力图确保埃及尽可能少地出让政治主权,但他讨价还价过久,过于强硬又总是使自己处于失去国际同情的危险之中。

在接受停火的同时,英法和以色列并没有承诺按联合国的要求迅速、无条件地撤军。在以后的3周中,英法提出的撤军条件是:在运河区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并使其执行本来属于英法的任务——清除运河中的障碍并确保运河安全直至达成对其进行国际共管的协议。但艾森豪威尔只接受无条件撤军,其他一概拒绝。伯恩斯将军告诉纳赛尔,按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要让联大允许使用联合国紧急部队来压埃及同意将运河国际化是不可思议的。11月9日在开罗与伯恩斯会谈时,纳赛尔向他表达了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可能产生这种作用的担忧。

伯恩斯是在尼罗河畔革命指挥委员会旧总部大楼内的总统临时办公室里与纳赛尔会面的。这幢楼实行灯火管制,戒备森严。(伯恩斯在进入开罗的路上已注意到街头的坦克和军队频繁过往,他猜想这样做要么是让老百姓看到政府仍有威力,要么是将坦克掩蔽在建筑物集中的地区以免挨炸。)这里的环境“很像是一所临时搭起的野战指挥部”。纳赛尔“穿一件古色古香的灰羊毛开衫,显得相当疲倦,但仍生气勃勃,信心十足”。

哈马舍尔德关于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于11月7日获得了联大的批准。该报告明确提到这支联合国部队不是一支观察员部队,但也不是一支军事占领部队,只有经埃及政府的同意它才可以开进埃及。正如伯恩斯后来指出的,这不仅是个法律的问题,而且也出于实际的考虑。一支6000人的部队是不能将其意志随便强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取决于埃及人的合作,而且要维持这支部队的供应线和通讯联系也得经埃及人的首肯才行。在讨论组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过程中,这种合作的条件已经由纳赛尔、法齐和哈马舍尔德之间的一系列会谈商定。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先遣部队于11月15日乘飞机抵达运河区。尽管撤军的决定直到12月3日才由代理首相巴特勒正式宣布(艾登去牙买加休假3周),但英国人在月底前已通知美国方面说他们将从埃及撤军。艾森豪威尔立即决定美国将向西欧提供石油供应方面的帮助,并向英国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援。他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修补西方联盟并将苏联人排除在中东以外。

英法军队的撤退至12月22日宣告完毕。在此之前,埃及用被他们扣押的470名运河区军事基地英国技术人员换回了186名埃及战俘。纳赛尔将所有基地的设施和仓库全接管过来,并于1957年1月1日正式宣布终止1954年签订的英埃协定。直到12月27日,在大批埃及军队重新占领了塞得港并且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接着以色列的逐步撤退已开始进入西奈之后,纳赛尔才允许联合国动手清除苏伊士运河的沉船。

力争以色列完全撤军的斗争持续了两个月。在西奈战役开始之前,本·古里安早已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要他们别指望保持对西奈的控制或者并吞蒂朗海峡的岛屿。他预计美国会压以色列放弃对埃及领土的占领。后来他显然是在民族主义情感因素的诱惑下,并出于现实政治的原因才力图抓住西奈不放,因为一来古代以色列人正是在这片荒凉之地漫游过而且上帝正是在此给了摩西法典匾牌,再者西奈是国际上的战略要地。战争的胜利之梦很快就过去



了,但他为以色列保存西奈战役的主要成果打了一场判断敏锐的外交后卫战。这就是争得了国际保证,不让埃及对以色列船只通航亚喀巴湾进行干扰,也不允许阿拉伯突击队再从加沙地带发动袭击。

以色列军于12月和次年1月分阶段从整个西奈撤走,所到之处将道路、铁路、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都加以摧毁。联合国紧急部队随后开到了西奈。到了1月底,以色列人仅占据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至沙姆沙伊赫的西海岸。但以色列人在得到关于加沙地带不再恢复埃及军事和民事控制,而且联合国紧急部队将接管沙姆沙伊赫并驻留在那里这一保证之前,一直拒不从该地撤军。

联合国试图满足本·古里安关于这一保证的要求。2月11日,杜勒斯给古里安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美国政府在这份备忘录里许诺寻求将联合国紧急部队部署在该地以便制止双方在加沙地带互相袭击,并承诺发挥其作用以保障各国船只在亚喀巴湾“国际水域”里通行无阻。以色列仍拒不撤军,并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切有分量的政治和宣传力量,以图调动起美国公众和国会舆论来对抗艾森豪威尔准备实行经济制裁的威胁。

面对国会领袖的阻挠,艾森豪威尔把他压制以色列的理由通过电视直接摆在了美国公众面前。在联大内部,一场由亚非国家发起的要求对以色列实行制裁的运动方兴未艾。当杜勒斯与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兼驻华盛顿大使阿巴·埃班谈判的时候,哈马舍尔德则在开罗和纽约分别与纳赛尔和法齐制定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加沙和沙姆沙伊赫所起作用的妥协方案。

哈马舍尔德在这次争端中使用的外交技巧是力图将法律问题与维持和平的实际问题分开。因此,在公开承认埃及有重占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权利的同时,他在私下却力劝纳赛尔说不寻求充分行使这些权利将符合埃及的利益。就沙姆沙伊赫而言,纳赛尔能较容易地办到,因为那是西奈沙漠的一个遥远、空旷的角落。但加沙地带却是居住着40万充满政治激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是

阿以争端中最为敏感的象征之一。纳赛尔付不起这个政治代价。他无法接受终止埃及对该地区有效地行使主权或控制并代之以国际化,尤其是这样做就会违背加沙地带人民自己的意愿。

秘书长从纳赛尔那里得到了一个谅解,即埃及不寻求重占沙姆沙伊赫,并且一俟以色列撤军后即允许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那里。秘书长还提出了一个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租地使用权保障的说法,他相信纳赛尔已经接受了。这个理论得到了11月7日联大决议的赞同,它承认联合国紧急部队是经埃及人同意后才去埃及的。同时,它还规定了有关调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问题,诸如该部队部署的改动或其撤离将由秘书长主持下的顾问委员会(由巴西、加拿大、锡兰、哥伦比亚、印度、挪威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组成)处理。该委员会可将紧急事务提交联合国大会。按本·古里安的话说,以色列人把这一程序理解成旨在“确保不采取任何可能挑起敌意的持久步骤。”(法齐在与哈马舍尔德的谈判中敦促将联合国紧急部队部署在停战分界线的两边,但以色列拒不让联合国紧急部队开到以色列一方。)哈马舍尔德在2月26日回答埃班提问时确认在从沙姆沙伊赫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之前将先按此协商程序办理。4天前,哈马舍尔德已“满怀信心地”声称:“埃及政府期望,从以色列的军事和民事控制下接管加沙首先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独家进行。”这一声明称埃及愿意在有关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加沙停战线上的事宜进行合作,这种驻扎是为了将埃军和以军分隔开并有助于“绝对结束双方互越边境线进行袭击和渗入”。哈马舍尔德补充道,在“过渡期”内,还会有进一步的安排,以便进行民事管理、经济开发和提供有效的警察保护。但在2月26日回答埃班关于这些安排是否排除埃及回返加沙地带的问题时,哈马舍尔德说安排中没有任何限制埃及根据停战协定享有的权利的内容(该协定给了埃及控制加沙的权利)。

在经过进一步谈判之后,以色列外长梅厄夫人于3月1日在联大宣布以色列将按联合国决议从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撤军,

但这一撤军应基于她的下述设想：联合国按其2月11日备忘录应支持和确认以色列在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行权利，而且联合国紧急部队应驻扎在沙姆沙伊赫，在未经秘书长与他的顾问委员会磋商之前不应撤离。她还设想，联合国紧急部队将在加沙地带单独实行军事和民事的控制管理并将这一管制持续至对该地带的前途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止。她保留了如加沙地带回复到从前的状况，以色列可捍卫其权利的自由。美国代表对以色列的设想予以赞同，但马哈茂德·法齐代表埃及坚持必须将以色列的撤军看成是无条件的，而且埃及和阿拉伯人民在加沙地带的权利不容损害。

这些分歧在3月7日以军撤出加沙地带，联合国紧急部队接管过来的时候就更加表面化了，当地的阿拉伯民众举行示威，难民们也举行示威要求回归埃及。联合国紧急部队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并朝人群头顶上方开枪。虽然在联合国紧急部队指挥官伯恩看来这些示威是埃及方面鼓动起来的，但他们或许还是反映了该地带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愿望。哈马舍尔德指望着在制定与埃及实行某种共管的更带永久性的安排的同时，联合国紧急部队可能对该地区保持约两周的完全控制。这似乎就是他所解释的与纳赛尔达成的“谅解”。因此，当他听到纳赛尔在联合国紧急部队接管后的第三天就宣布委任了一名马上就行使职责的加沙地带行政总督时颇感震惊。纳赛尔坚持走这一着棋的结果是联合国紧急部队仍驻扎在边境地区，与此同时在加沙地带重新实行了完全的埃及民事管制。这一步骤引起了以色列的愤慨，它还威胁要重占这一地带。这些反应虽然没造成不良后果，但纳赛尔在这件事后使人相信他对哈马舍尔德食言了，这就进一步损害了他在华盛顿的声誉。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愤怒地评论：“仅仅是由于西方的克制才保住其政权的纳赛尔中校未能抓住显示其真正的政治家风度的机会，因而使他的国家失去了所有有自尊心的政府的援助和合作。”

纳赛尔是食言了吗？处在有利的判断地位的伯恩斯将军所作的判断是，如果说纳赛尔果真食言，那也只是指时机方面而不是他

行动的实质。纳赛尔与哈马舍尔德商定由联合国紧急部队独家专管时仅仅是说“首先要”。在任何情况下，秘书长或埃及政府都没有承诺将不许任何埃及行政官员或军事人员重新进入加沙地带。至于在“首先”之后的安排，哈马舍尔德设想的是共管，但伯恩斯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纳赛尔总统不同意秘书长 2 月 22 日声明后半部分的措词……并告诉法齐他不能接受。但总统的这一回绝从未传到秘书长那里。”

3 月 8 日，以军从沙姆沙伊赫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取而代之。同一天，纳赛尔允许联合国开始将堵塞运河的最后两只沉船打捞上来，叙利亚政府也让国际石油公司着手修复管线。第一支船队于 3 月 29 日通过运河，10 天后运河已可通行最大的船只。但与纳赛尔连续不断的谈判——先是通过哈马舍尔德，后又通过美国——都未能协商出运河运营协定。英国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结束并进行了私下会晤之后，首先试图将在 10 月中旬中断了的谈判恢复起来。但纳赛尔现在处在较强的地位，他更不准备作让步，特别是因为在英法联军进攻之后，让步是不会得到埃及公众的理解的。3 月 24 日，埃及单方面就运河的前途公布了一个宣言。该宣言重申运河将由一个拥有财政自主权的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经营；通航费因而必须向该当局交付；原苏伊士运河公司将得到补偿，而且埃及将按照 1888 年公约保障通航自由。纳赛尔以前所作的关于国际参与的所有让步，诸如在确定通航费标准，确保维护和开发等方面，全都没有兑现。

英国政府起初试图组织一场对运河的抵制并劝说英国船东行绕开苏伊士运河航行，但一个月之后又将此劝告撤消了。3 月 28 日，安理会通过了美国的一项决议案，称埃及关于运河的宣言应得到试行的机会，尽管它不符合安理会在上一年 10 月所制定的“六项原则”。安理会应法国要求于 5 月 15 日再次开会讨论运河问题并进行了 5 天辩论，然后就无限期休会了。

赔偿原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谈判拖得更久。这与埃及、英国和法



国由于战争破坏造成的财政索赔和反索赔扯到了一起；此外有关冻结埃及资财，埃及没收英法财产，加上对夺取运河基地设施的赔偿等问题全搅和到了一起。

苏伊士—西奈之战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破坏了外国人和东地中海人在埃及商业生活中的突出重要地位，这对埃及来说不仅充满了个人悲剧，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除将约2700名英法公民驱逐外，还有约1.4万名犹太人（占埃及全国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数是外籍）以及一些埃及公民，被警察骚扰和经济压力逼得背井离乡逃亡在外，其财产被没收或者按官方的说法是“冻结”了。那些携外国护照的人中有许多出身于祖辈多少代都一直居住在埃及的家庭，他们利用外国国籍享有“投降条约内全部条款”、领事法庭进而又是混合法庭所给予的特权。1957年上半年，在对所有的外国制造公司和出口商社实行了“埃及化”而且用法律规定在一切贸易往来交易中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之后，不仅是犹太人或英法人，而且连其他的“外国人”也开始离去。在理论上，“埃及化”意味着在某些工作岗位和在贸易管理部门的非埃及人士由埃及公民取而代之。实际上，无论纳赛尔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是经常宣称反对宗教或种族歧视的），“埃及化”常常意味着埃及穆斯林能优先找到工作并具有较高的地位。

从任何角度看，对埃及犹太人的处理都令人遗憾。但在总的后果上说，这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仍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的处理相比较却是小巫见大巫。况且埃及犹太人受到这等待遇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埃及还找不到什么事情能与以色列边防警察屠杀41名阿拉伯村民（他们是以色列公民）相提并论。这些人是在以色列克法尔·卡西姆村于西奈战役开始时被杀害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谁也没告诉过他们的宵禁。在商业界实行的某些“埃及化”措施可能是埃及社会、政治变动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部分。但纳赛尔受苏伊士冲突过后出现的仇恨、自豪和恐惧情绪的驱使而过于匆忙地行事却招来了不必要的困难，而且

由于“埃及化”再加上驱逐外籍人士,埃及既失去了宝贵的经济、技术诀窍,又失去了社会中一些最自由开放和聪明智慧的成员。

战争中,埃及或许死去了 3000 人(塞得港里死了大约 1000 人,西奈战役中阵亡 1000 人,另 1000 人是在退却中死于空袭或沙漠中的高温和干渴),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但埃及在西奈失去了正准备用来袭击以色列的大量苏制坦克和飞机的说法则是以色列为了搞政治战而编造的。达扬将军后来的叙述表明,埃及在西奈的军事部署中一个主要弱点是其过于侧重防守。他列举的埃军苏制装甲车数量为 27 辆 T34 坦克(与 52 辆美制谢尔曼式相抗衡),还有 6 门苏 100 式自行火炮和 60 辆装甲运兵车。埃军在西奈损失的飞机有 4 架苏制米格 15 和 4 架英制蝙蝠式和流星式飞机。据以色列情报部门说,在西奈的埃军第 3 师接到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并在最野蛮、最残酷的战斗中毁坏和消灭以色列”的指示。埃军有朝一日将会尝试实现这一目标,这很有可能,但在 1956 年 10 月要达到这一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

苏伊士之战对纳赛尔是一个政治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个经济上的胜利。它使现代埃及民族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埃及人在 75 年以来首次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完全的主人。它极大地增强了纳赛尔在埃及国内的地位,并鼓舞他更深入地开展“阿拉伯革命”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它结束了英国人在阿拉伯中东腹心地带占主宰地位的时期,而且它使美国和苏联在该地区正面对抗,而阿拉伯人自己却在美苏两方之间寻求“填补真空”。它加速了英帝国的衰落并加快了全世界,尤其是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它显示出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并发展经济的决心,它还证明这些国家如给以财力上的帮助无疑将有发展经济的技术能力。

纳赛尔自己说他认为苏伊士之战不仅给了埃及人乃至全体阿拉伯人以信心,而且还“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立自信心并坚持要求自身的独立”。他指出,从历史上说,“苏伊士之战的意义是 19 世纪

的老办法过时了，在 20 世纪还用 19 世纪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了。”

但是纳赛尔的大赌博的结果也有其暗淡的一面。虽然它有可能增强了阿拉伯和亚非国家的自信心，但在同时却在西方与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关系中，在西方势力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关系中注入了一种危险的不信任感。最后一批以色列和英法士兵撤出埃及领土之后刚刚一两个月，这种猜疑在中东又一次演变成一场国际危机。

## 第八章

### 填补真空：与美国的斗争(1957—1958)

纳赛尔在苏伊士危机之后成了在阿拉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领袖。作为一场政治民族主义运动，从1919年开始的埃及革命随着苏伊士危机达到了最高潮。在此之后，这场运动在埃及的重点是社会和经济变革，其民族主义内容并入到“阿拉伯革命”这一更广阔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这是一场将所有阿拉伯国家转变为独立、现代化国家并最终成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运动。这场运动还要将这些国家组织成一个更加广泛的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阵线。

埃及人和阿拉伯革命这种更紧密的结合部分是纳赛尔精心选择的结果，部分是时运使然。埃及的国内需要与阿拉伯运动的要求将会经常发生冲突。支持阿拉伯政策，如与以色列的对抗以及始于1962年的也门革命和战争分散了埃及国内建设的精力和物力。同时，纳赛尔对阿拉伯事务的参与不仅受到他个人对反帝解放运动的观念的支配，也取决于他对埃及国内和对外利益的看法。因为如果埃及的经济发展想要高于它的迅速增长的人口，那就需要得到相当多的外来经济援助。纳赛尔的结论是埃及能从苏联或西方获得的援助额可能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成正比，作为一个潜在的盟友将会得到鼓励，或者作为一个可能的敌手则会受到姑息迁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在非洲，在不结盟国家集团中都是个大国，而两个超级大国正是在这三大领域内都开始了更激烈的争夺。作为



这样一个大国，埃及可将其外交政策变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财富。（正如《金字塔报》主编和也常常是纳赛尔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海卡尔所形容的那样）如果埃及真是在政治上孤立于阿拉伯世界之外，（纳赛尔担心这是《巴格达条约》签定之后西方的一个目标）那它就只能在经济上垮掉并在没有现代武器的情况下单独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相对抗。

苏伊士危机从两个方面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证实了纳赛尔所深信的阿拉伯团结是埃及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为了增强对以色列的防御，而且也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控制住油田和输油管道对西方有威慑作用。（这也许使他夸大了阿拉伯团结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苏伊士危机对埃及人产生的同情感和对纳赛尔成功处理危局的仰慕使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叙利亚尤其如此。

处理苏伊士危机的成功也促使纳赛尔本人雄心勃勃地寻求在阿拉伯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此时他将自己看作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集团的领袖，这个集团的每个成员国都有一部不平凡的历史并具有千丝万缕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联系，它们现在占据着能向全世界提供很大一部分石油的战略要地。渴望带头将这一潜力调动出来以实现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并非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野心。然而，对于埃及这样一个总的说来力量薄弱的国家，这样做却包含了许多危险，尤其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中。但也正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弱小和不稳定才成为纳赛尔采取更积极的阿拉伯政策的原因之一。他的动机不单是要增加埃及自身的影响，而且也是为了防止在英国人撤走的同时让美国人和苏联人进入东阿拉伯世界从而使阿拉伯国家再次沦为大国的势力范围。这些大国之间的争斗可能将中东变为核战场。

在东阿拉伯推行“阿拉伯革命”必然使纳赛尔与这场革命所触动的一些势力发生冲突。这些势力包括西方，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残渣余孽、以色列以及那些在政治地理、社会特权或国际

阵线方面坚持现状的阿拉伯政府或集团。在西阿拉伯即马格里布国家，纳赛尔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承诺使他与法国发生了冲突。当阿尔及利亚运动沿着阿拉伯革命路线发展时，这种承诺也意味着他将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和倾向西方的摩洛哥王国间产生敌意。

但纳赛尔同样也发现自己与阿拉伯革命内部潜在的敌对派领袖处于竞争状态中。这些竞争对手中有共产党人，尤其是有产生于叙利亚这个“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人。因为如同埃及革命一样，阿拉伯运动已日益成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体。其侧重点最初是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解放那些被人为分裂开的单一“阿拉伯民族国家”。但其重心渐渐地转向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问题。虽然共产党人在组建政权方面进展甚微，但阿拉伯革命者们在社会和经济思想上愈来愈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尤其是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影响。同时，在西方势力仍有一定影响的阿拉伯国家中展开同西方国家的斗争表明，阿拉伯革命者已修正了中立主义策略，以便得到苏联的支持。

纳赛尔在苏伊士危机后的10年中搞的“阿拉伯革命”经历了两个鲜明的阶段。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阶段从1957年开始，到1961年结束。紧接着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阶段，持续到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面临着新的局势为止。在埃及的对外关系方面，这10年中出现了两个胜利和灾难都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事件：埃及和叙利亚短暂却具有历史意义地合并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7年，以色列击败了阿拉伯国家。但对于纳赛尔来说，压倒一切的问题仍是埃及自身的社会革命。在与叙利亚闹崩后，他找到了将这个问题与继续进行阿拉伯革命调和起来的理论武器，这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对阿拉伯团结的新的解释：阿拉伯团结将不再是摆脱依赖和落后状况的前提条件，而是其结果。因而，推动阿拉伯团结既包含了埃及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也包含着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解放”运动的鼓励。

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至少产生了两个长期的成果：加快了阿拉伯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及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化；发展了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及埃及本身的计划经济。

然而，纳赛尔在1955年对阿拉伯革命承担义务是被别人逼出来的。随着苏伊士危机的消失，临时结成的国际联盟开始破裂。旧的不和又开始重新出现。现在既然英国人除了在阿拉伯半岛的边缘外，已失去在这一地区的霸主地位，那么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来施加压力，要求建立同盟关系、军事基地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倒向他们一边。尽管纳赛尔在阿拉伯群众眼里是英雄，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此时又开始发出反对埃及的领导地位、反对纳赛尔的“积极中立”政策的呼声，而在埃及正遭受英法和以色列进攻时，他们不得不把这种呼声闷在心里。美国的新政策鼓励他们和纳赛尔唱反调。美国匆忙向英法及其巴格达条约盟友保证要继续给予支持，并保证对苏联的企图加以警惕和抵制。

美国在苏伊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掩盖了正是美国的冷战政策才引起了危机的事实。撤消大坝援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想限制纳赛尔作为一位中立主义领袖所产生的影响。纳赛尔当时已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在华盛顿看来，他是在牺牲西方的利益，帮助苏联扩大在中东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对于向埃及使用武力，尤其是在国际反应不利的苏伊士事件的背景下向埃及使用武力确实表示过不赞同，但在与安东尼·艾登的通信中，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与英国首相同样的担忧，即对苏联渗入中东和纳赛尔的作用感到担忧。在苏伊士运河争端解决后，他把这一点看成是仍然存在的问题，并准备对纳赛尔施加诸如经济封锁和鼓动阿拉伯内部的争斗等压力。

1957年新年伊始艾森豪威尔就告诉美国国会领袖：“美国必须抢在苏联前边填补中东的真空。”因此，从这之后，“填补”英国人撤走后留下的“真空”的想法一直贯穿于华盛顿的中东政策之中。总统在1957年1月5日对国会的讲话中针对中东提出的“艾森豪

威尔主义”包括两个要点。它提议美国与中东国家合作以增强它们的经济实力并进而增强其政治独立。为此目的，它请求每年给予中东地区最多达 2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要求国会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以确保那些期望和请求援助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公然发动武装侵略”。

两个月后，国会批准了“艾森豪威尔主义”。3 月 9 日该主义成为法律。艾森豪威尔后来用与艾登的苏伊士恶梦格调相同的文字写下了下述内容：

我们已有效地征得了国会的同意来宣告政府有决心阻止苏联向地中海，向苏伊士运河和输油管线，以及向给西欧家庭和工厂提供燃料的地下油湖的进军。

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布尔加宁元帅在 1957 年通过 3 封信件反复提出的苏方建议。该建议要求达成一项中东问题的谅解，最基本的内容是发表一个反对武力干涉的宣言，要求从中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基地，并对军火运销实行控制。在制定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过程中，美国尽力避免了在签订巴格达条约和在苏伊士危机中所犯的一些错误。该主义并没有试图强迫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建立新的军事同盟，也没有提议对任何国家进行军事干涉，除非这些国家“期望并值得”这种帮助。干涉据说只限于遭到“国际共产主义”或由它所操纵的任何国家发起进攻的情况，言外之意也就是排除了由于地区敌对行动而产生的冲突中进行干涉。

虽然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相比更能够理解中东国家对英法进攻埃及的军事行动做出的反应，但他与其他西方领袖一样对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存在着总体上说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他和杜勒斯未能认识到共产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或复兴党人这类激进民族主义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他们不了解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是地区



权力斗争和内部社会变动，而不是参与东西方冷战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反共才是阿拉伯统治者寻求西方支持反对这个地区敌手的有用的符咒。

虽然艾森豪威尔主义容忍了中立主义者，不要求他们公开作出对西方的军事承诺，但它仍要求他们公开作出非中立的反苏或反“国际共产主义”（人们都把它们当成一个意思）的承诺。但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主义才得到了美国公众和国会的认可，不过大多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舆论并不买它的帐。作为对苏联在东阿拉伯公开搞军事入侵的一个警告，艾森豪威尔主义从长远看在稳定世界权力平衡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作为限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增长的一个工具，该主义却如同巴格达条约一样不合时宜。正如尼赫鲁警告艾森豪威尔所言：它增加而不是缓和了中东的紧张局势；它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内部争端，诸如黎巴嫩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伊拉克和约旦的亲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哈希姆王室之间以及叙利亚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教派、种族矛盾和对立；它使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对昔日盟友相互争吵不和，从而又增添了新的分裂；它在外表上看起来是旨在稳定和加强阿拉伯国家以对抗苏联的压力，但其实际效果却是分裂和削弱了东阿拉伯并给共产主义的渗透打开了更大的缺口。

无论某些阿拉伯政府可能持有什么观点，但由于苏伊士危机，当时的阿拉伯公众舆论在感情上是亲苏的（虽不是亲共），这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英国舆论一样。而且，尽管美国在苏伊士危机中因提供援助而得到了感激和赞许，但美国仍将埃及的资金冻结，迫使埃及不得不依赖苏联的小麦和石油输送以对付西方的经济封锁。

要把苏联完全排除在中东事务之外，无论如何为时已晚。苏联早已成为在埃及和叙利亚有代理人的中东势力。起初，苏联外交没有受到国内公众舆论的拖累，显得比美国人更能适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在叙埃合并和伊拉克发生革命之后，苏联人似乎已

插手阿拉伯政治，支持当地的共产党。这时，他们就受到了纳赛尔的指责，其蔑视程度在某些方面不亚于他对西方干涉的抨击。这种局势很有点讽刺性。如果在艾森豪威尔主义公布之时，华盛顿能对“国际共产主义”保持沉默，那它用不了两年就会发现，被它视为苏联工具的纳赛尔正在谴责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而且言词比华盛顿还要尖刻。纳赛尔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不到一年，他自己就与叙利亚仓促联手阻止在那里出现的共产主义势力。而几个月后美军在黎巴嫩登陆的借口却是为了保护该国免受据说是由“国际共产主义”挑动的所谓来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威胁。事情变得很清楚，最好是由阿拉伯人自己去处理他们内部的共产主义问题。

纳赛尔从一开始就反对作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基石的“真空”理论，尽管起初他还因需要美国强迫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撤军而有所顾忌。在纳赛尔看来，中东并不存在什么“真空”。该地区已被阿拉伯人占据着。他们只要有武器和钱就会捍卫自己，就会独立于东西方之外，而且在冷战中他们的中立对于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都是必须的。在中东，纳赛尔既不想看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也不想看到苏联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

不久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纳赛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对抗美苏影响。这些事件证明纳赛尔的势力虽然足以阻止在中东形成任何反对他的竞争或敌对集团，但埃及力量还太薄弱，不足以将其政治意志强加给整个亚洲的阿拉伯国家或者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这一定理在以后10年的阿拉伯革命中都是成立的。

在纳赛尔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企图显然是为了孤立埃及。很清楚，它针对的不是已通过巴格达条约和与美国的军事协定与西方联在一起的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美国人肯定已经知道，纳赛尔当时无法公开宣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因为那样就使他有可能失去苏联的支持。因此，按纳赛尔的推理，该主义的意图只能

是从他手中夺走其当时的阿拉伯盟友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并未肯定承担义务的黎巴嫩。该主义是西方的苏伊士政策更微妙的延续，为的是破坏埃及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

当艾森豪威尔选择赛义德国王作为向阿拉伯世界鼓吹其主义的头一个推销员时，纳赛尔的这一猜疑更为加深了。美国政府“要探索将赛义德国王抬出来作为反纳赛尔砝码的可能性”。鉴于美国通过石油贸易与沙特阿拉伯建立的长期联系，作此选择并非完全令人吃惊。但它显示出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新兴政治力量知之甚少。

赛义德起初并不情愿履行这一使命。他对以色列和英国人的抱怨比对苏联人的多，他还告诉艾森豪威尔，有关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倒向苏联的报道是夸大其词的。这两个人都对赛义德说过，如果苏联人试图干涉他们的内政，那他们就会立刻断绝与莫斯科的一切交往。

2月份，赛义德从华盛顿刚返回就在开罗会见了纳赛尔、库瓦特利和侯赛因国王。这次首脑会议之后发表的公报显出了三方出现分歧的迹象。公报没有明确提到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拒绝了中东“真空”的概念并肯定了“积极中立政策”。3月12日，艾森豪威尔派民主党议员詹姆士·理查德作为特使出访中东各国首都，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拉拢支持者。这次出访很难说有什么收获。只有夏蒙总统领导的黎巴嫩政府是中东唯一公开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阿拉伯政府，但这种做法背离了黎巴嫩政策，并为以后的一大堆麻烦埋下了祸根。

然而，美国的外交攻势不久就给纳赛尔的四国联盟造成很严重的紧张后果。最敏感的国家是约旦。自从一年前解除格拉布将军的职务以来，侯赛因国王一直推行随激进民族主义大流的政策。但此时他已有了新的想法。消息灵通的外国观察员认为1956年10月的约旦议会选举产生了由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组成的以纳布勒西为首的联合政府。纳布勒西政府所依赖的

联合议会包括 11 名民族社会主义成员(纳布勒西所在的党)、两名复兴党以及贴着“民族集团”标签的 3 名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该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谈判来废止英约条约,追随纳赛尔的不结盟政策并与埃及和叙利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适当照顾约旦的物质利益”。这也包含了对苏联采取不太敌对的态度。

1 月中旬,纳赛尔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一致同意由每年共同向约旦支付 1250 万英镑以替代英国对约旦军队的补贴,一旦英约条约终止就立即实施这一协议。终止条约的谈判于 1957 年 3 月 11 日结束。6 个月内英国的军事存在以及英国的补贴和英国对约旦边境的防卫保证均将结束。

但侯赛因国王早已开始努力扭转纳布勒西政府的政策倾向。他担心这样下去不仅要增强苏联在约旦的势力,而且最终会使他的王国被某一个或几个阿拉伯盟友给吞并或瓜分掉。因此,他通过美国寻求一条连结西方的新的生命线。

以约旦政府持有泛阿拉伯观点为由向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发起挑战是困难的,因为这些观点在这个国家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支持。说它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太软弱在国内则不会有风险,对华盛顿也更有吸引力。1 月 31 日,侯赛因公布了致总理纳布勒西的一封信,警告他不要容忍共产主义势力在这个国家的增长。侯赛因列举了诸如允许苏联的通讯社开展活动,允许放映苏联影片以及政府还讨论与莫斯科或许还有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等危险行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也不慢,他们指出所有这些活动在过去多年中都得到了西方政府及其大部分反共盟友的纵容。)

侯赛因与政府间就外交政策控制权问题出现的危机在 4 月份爆发了。双方都试图得到军队的支持。但军队在政治上分裂了。以同情复兴党人的约军参谋长阿里·阿布纳瓦少将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集团支持政府为一方,其余军官和许多军士及士兵则忠于侯赛因本人。4 月 10 日,侯赛因解除了纳布勒西的职务。民族主义派军官们警告说,除非新政府为各方所接受,他们不能对军队



和国家中的爆炸性局势负责。侯赛因将此看成是“一份傲慢无礼的最后通牒”。于是忠于国王的军官和军士在泽尔卡兵营发动兵变，以挫败他们认为由他们的民族主义派指挥官搞的反对国王的政变计划。他们为支持国王而进军安曼时叫民族主义派军官指挥的炮兵部队给截住了。侯赛因果断地亲自干预才制止了战斗并完全控制了军队。他将阿布纳瓦和其他受到嫌疑的军官们流放国外，实行了戒严并将支持前政府的数百名民族主义者予以监禁。侯赛因在自传中将这些事件仅仅描述成挫败了某些得到埃及、叙利亚和苏联鼓励和资助的军官的反叛阴谋。他宣称，这一阴谋是要逼他退位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及加入纳赛尔和叙利亚人的亲共产主义阵线。失败者一方及其辩护士们则将这一事件看成是侯赛因本人策划的政变，是为了粉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搞臭纳赛尔并赢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但危机期间的一些扑朔迷离的军事调动却表明双方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然而，约旦危机带有冷战的色彩，这场冷战正开始在东阿拉伯，在纳赛尔、美国及其中东盟友间展开，苏联则在幕后不时发出警告。特工人员十分活跃；搞“颠覆”或“反颠覆”用的钞票大把大把地流来流去；秘密的和公开的电台倾其所能进行宣传煽动。美国第七舰队定期开来进行外交示威。西方人听到许多关于纳赛尔方面搞秘密战的情况：开罗电台搞“阿拉伯之声”宣传活动；阿拉伯报纸被收买；所谓针对阿拉伯领导人的暗杀图谋；在阿拉伯军官当中搞阴谋策划；还有埃及武官在阿拉伯一些首都搞阴谋活动等等。西方公众很少听说过有成群的电台在对埃及及其盟友展开宣传战（据纳赛尔说，这些电台最多时达到 11 个，其中有些是西方组织的）；他们也很少听说过伊拉克、后来还有沙特阿拉伯花了许多钱搞报刊贿赂；很少听说过收买杀手行刺纳赛尔的企图（最著名的据说是赛义德国王曾拿出 200 万英镑给叙利亚军事情报头头萨拉杰上校，让他安排人在飞行时行刺纳赛尔。但令众人惊愕不解的是上校竟然拒绝了）；他们还很少听说过伊拉克曾鼓动特工，据说还是美

国特工，策划推翻叙利亚政权。

侯赛因在约旦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行为被描述成“纳赛尔在亚洲阿拉伯所遇到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它意味着纳赛尔的阿拉伯联盟（至少是与其中的两个政府相关）已土崩瓦解，而且也是美国新中东政策的一份收获。赛义德国王宣布支持侯赛因，且美国也宣称约旦的独立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将第六舰队调到了东地中海，同时立即付给侯赛因 1000 万美元的第一笔援助资金。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竟如此十万火急地犒赏一个刚推翻民众选举政府的国王，这甚至令那些习惯于东方贿赂传统的人也有点震惊。

但约旦事件对西方及其阿拉伯盟友，除侯赛因自己外，都只是代价沉重的胜利，因为它为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剧烈权力斗争作好了准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这场冲突毁掉了叙利亚的亲西方色彩，并使该国与埃及完全联合了起来。它还推翻了黎巴嫩夏蒙总统的亲美政府，扫除了伊拉克王朝，毁掉了巴格达条约。纳赛尔和苏联人都加强了各自的地位。约旦仍处在侯赛因的统治下并大致得到了西方的防御保护，这一事实可能不会受到纳赛尔的反对。约旦穷得叮当响，它与以色列间的漫长边界线的防务是个沉重的军事负担；任何将约旦与叙利亚或埃及在政治上合并的企图都有招致以色列夺取约旦河西岸的风险，以色列已发出过这样的威胁。纳赛尔希望通过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难民的亲埃情绪在约旦建立有利的影响，而将维持国际现状这一不得人心的负担留给侯赛因国王，尽管这得费许多口舌才能办到。

1957 年 5 月，以纳赛尔和他的叙利亚盟友为一方，以亲美的阿拉伯政府为另一方的宣传战公开打响。黎巴嫩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那里的议会选举结果是夏蒙总统的支持者及总统的亲美政府在与全国联合阵线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联合阵线由反夏蒙总统的人组成，他们或是反对他的外交政策，或是怀疑他正计划寻求下一届总统连任——这么做就需要修改宪法了。

反对他的外交政策的人不仅限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者,还包括那些认为夏蒙投靠美国损害了黎巴嫩民族团结基础即全国条约的人。该条约的精髓有两方面:第一,黎巴嫩基督教徒承认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条件是黎巴嫩保留其特殊的独立和中立,不被强行拉入某个阿拉伯联盟或在阿拉伯争端中倒向哪一方;第二,黎巴嫩穆斯林承认黎巴嫩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及其特殊地位,只要这样做不包含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为敌的政策。

夏蒙分子在竞选中获得空前规模的胜利理所当然地使人们认为他们对行政机构和地方保安部队的控制起了决定性作用。夏蒙总统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追随动摇了维系黎巴嫩政治稳定的基础,而这次选举对整个政治结构是进一步的沉重打击。这迫使反对党更多采用议会道路之外的办法,并使夏蒙总统和反对党都增加了对国外支持的依赖。内战的种子就此播下了。

约旦和黎巴嫩发生变化之后,争夺叙利亚的斗争必然接踵而来。这件事对纳赛尔来说是更复杂、更重要的。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背离了阿拉伯联盟,伊拉克、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夏蒙政府结成了亲西方的阵线,在此状况下由中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组成的叙利亚联合政府自然感到孤立,感到威胁从四面八方而来。这年早些时候,它通过一次精心安排的对阴谋罪的审判,企图安抚一下还在鼓吹与伊拉克和西方结盟的叙利亚人,即人民党的领导人。但这个国家和军队仍存在着分歧,其程度足以使内战在外来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为了寻求抗拒西方压力的支持,该政府仰仗埃及和苏联。至于是应把开罗还是莫斯科当作主要的援助来源,联合政府内部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并不在于外交政策或意识形态方面(除共产主义者之外),而在于内部的争权夺利上。亲莫斯科集团以叙利亚国防部长哈立德·阿齐姆为首。他是一个古老的叙利亚家族的成员,百万富翁。此人十分聪明而又野心勃勃,他在法国统治时期不冷不热的民族主义态度使他在民族主义者中几乎没有盟友。亲莫斯科集团还包括由一位能干的库尔德人哈立德·巴

格达什领导的叙利亚共产党,该党虽小但活跃。

主要仰仗开罗的有泛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它当时是叙利亚政治中首要的激进动力;有以总统苏克里·库瓦特利和总理萨布里·阿萨利为首的旧民族主义保守派中的一部分。但在亲埃及的派别中,激进派和保守派又因叙利亚的国内政策而产生分歧,并为控制军队而争斗得不亦乐乎。在斗争过程中,叙军总司令官尼扎姆丁这位中间派人物被左翼分子阿齐兹·比兹里上校取代了。任命比兹里不是因为他同情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主要派别,不论是复兴党或保守党,都没有联系。然而,他的这一委任,连同其他几件事一起引起了美国政府——后来又引起了纳赛尔——的惊恐,这两方均认为叙利亚正迅速滑向共产主义阵营。8月6日哈立德·阿齐姆在莫斯科与苏联人签订了一份范围很广的经济、技术援助协定。一周后,叙利亚政府驱逐了3名被指控为阴谋推翻当地政府的美国人。有关苏联在叙利亚秘密修建空军基地甚至派遣了志愿人员的无稽之谈更是给美国的忧虑火上加油。这些消息大多数出自贝鲁特和巴格达的某些阿拉伯人,他们想得到美国支持,发起一场搞垮叙利亚政府、限制纳赛尔势力的运动。

叙利亚的舆论,在复兴党人、纳赛尔以及美国压力的推动刺激下是反美亲苏的,但它仍主要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倾向。叙利亚共产党尚无足够力量接管叙利亚并将其变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苏联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给其有效的军事支持,他们不可能铤而走险搞这样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不仅要遇到西方可能进行的干涉,而且还会疏远埃及,而他们在埃及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外交成果。

1957年的8—10月间,围绕着叙利亚问题出现的一场国际危机迅速爆发并且又几乎以同样的速度消退了,其来去匆匆简直像夏日的暴风雨一样。华盛顿派出一位高级外交官和中东事务专家洛伊·亨德逊作为特使来到安卡拉与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领导人以及约旦国王侯赛因进行磋商。他还去贝鲁特见了夏蒙总统。他并



没有去叙利亚，但向华盛顿报告了叙利亚邻国“极担心”叙利亚可能变成“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基地。按照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原则，用这个术语就有可能引起美国干涉。叙利亚和苏联指责美国阴谋对叙利亚进行干涉。一年以后，在巴格达审判伊拉克前外长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巴班时，曾宣读了据说是亨德逊在土耳其的会谈记录，这一指责就更明确了。据说，当时亨德逊已催促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并宣布土耳其已保证给以支持，而且美国第六舰队将起威慑作用。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回忆录中充分证实在美国和其中东盟友间确实商议过对叙利亚进行干涉并推翻大马士革政府的“谋划”。他的记述也表明这一密谋纯粹是不切实际和无知的，而且它的结束又颇具闹剧的味道。可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艾森豪威尔却准备面对他所认为的可能是世界核大战的风险。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一个清楚的事实正在出现，叙利亚的邻国，包括同它一样的阿拉伯国家，都得出了叙利亚现政府必须下台的结论。否则共产主义者就会很快完成对它的接管。这块昔日的中立地区就会变成苏联的一个强大的前沿阵地。”

正如签订巴格达条约时一样，在这一事件中牵头的是好斗的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伊拉克也表示同意。曼德列斯还在黎巴嫩总统夏蒙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支持下，敦促美国在叙利亚与苏联签订防御条约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正式卫星国”之前对它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从原则上讲，即便是为了抚慰华盛顿的软心肠者，美国也不能对叙利亚发动进攻，除非该国实际上已对邻国“犯下了侵略罪”并招来了别人的报复。但艾森豪威尔已经尴尬地意识到，对中东进行干涉的借口实在是太好找了，这反而使进行干涉变得很困难。曼德列斯向美国提出的建议是让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在各自与叙利亚的边界上集结军队以分散其兵力，然后由伊拉克从东边发起武装干涉。美国承诺支持这一谋划，方式是加速运送军火并阻止任何外来的，如从苏联或以色列来的干扰，条件是此行动只限

于推翻叙利亚政府，而不是长期占领叙利亚领土。曼德列斯去伦敦与哈罗德·麦克米伦商量此事时，麦克米伦把叙利亚比作是1948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第六舰队开到了东地中海，为的是把苏联人吓到一边去。艾森豪威尔糊里糊涂地卷入东地中海的这场纠葛之中并以近乎草率的方式准备冒一场重大战争的风险，这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冒险在某种意义上犹如艾登处理苏伊士危机、赫鲁晓夫处理古巴危机一样属于严重的判断失误。幸运的是，阿拉伯盟友们的办事不力使艾森豪威尔免于进行这一冒险行动。伊拉克人对他们将扮演的角色开始有了另外的想法——不是因为害怕核战争，而是怕有可能失去其输油管线和石油收入。因此他们要求土耳其人率先行动，而侯赛因国王则跑到意大利度假去了。赛义德国王谴责美国造成危机并谈论起以色列和亚喀巴湾，而不是共产主义叙利亚的危害，这下把艾森豪威尔给弄糊涂了。土耳其人仍跃跃欲试。夏蒙总统则要求美国提供保护。但在没有阿拉伯人为美国干涉提供借口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拖住土耳其人的后腿。建立在一个薄弱基础上的危机气氛为苏联人的插足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当密谋实际上已告吹的时候，他们不用冒多大的风险就能以叙利亚独立的拥护者的面貌出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警告土耳其不得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而且莫斯科再次提议发表反对在中东使用武力的四国宣言。

随着反控诉不断提交给联合国，危机开始渐渐消退。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急忙脱身。艾森豪威尔自己承认叙利亚的邻国现在不再惶恐不安了，这就宣告了危机的结束。由于叙利亚政府在对苏联的支持喜不自胜的同时显然朝纳赛尔靠得更紧，因此它更有必要进行战术退却。西方向叙利亚施加压力的效果几乎与其初衷刚好相反，叙利亚的亲西方和亲伊拉克的势力进一步削弱。西方还把叙利亚进一步推进了纳赛尔的怀抱，而没有使它同开罗断绝关系。

自苏伊士危机以来,纳赛尔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在观察西方外交的进展。侯赛因在约旦的“政变”,赛义德国王的冷淡,黎巴嫩选举维持了一个亲美政权,现在又是叙利亚危机,这一切似乎都证实了他的怀疑:虽然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终目标可能是遏制苏联,但美国人肯定相信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得孤立埃及。尽管侯赛因和赛义德的背离对纳赛尔是个挫折,但不是致命的打击。可是纳赛尔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叙利亚投入亲美阵营这一局面的出现,即使因此陷入叙利亚政治的烂泥潭中他也在所不惜。

自从叙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以来,它的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逐渐支离破碎的过程,这一进程因巴勒斯坦战争失败后叙利亚军队介入政治而更加快了。叙利亚既无稳固的政治结构,也无明确的民族认同感。它的国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法国托管当局的裁决而人为确定的。这个国家真是一个城市之国,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其中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胡姆斯、哈马及其农业附属区,再加上沙漠部落和山区的少数民族。在家庭、城市、部落或宗教社团的层次上,叙利亚人的政治和情感的效忠很少奉献给一个不稳定的叙利亚民族国家,而是更多地给予了一个比较广泛的阿拉伯社区。在这个大的社区中,大马士革这个阿拉伯哈里发(穆斯林政教合一体)的首都被认为是历史中心。

叙利亚人对这比较广泛的社区之本质看法不一。曾领导反法独立战的老一辈民族主义者的阶级来源主要是保守的贵族、地主、阿勒颇或大马士革的富商巨贾以及一些专业人员。他们比较喜欢一种松散的阿拉伯联盟形式,在这种联盟形式中,他们靠自身努力而获得的地区权力不至于全部丧失。有人把这种形式的联盟看作是一个“大叙利亚”,它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这些国家的领土,这一大片领土在历史上曾构成了奥托曼统治下的叙利亚版图。另一些人则期望与伊拉克结成一个“新月形沃土”联盟,或是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选择同伊拉克结盟是受到了阿勒颇这个伟大的北方商业城市中的商人的影响,

这些商人构成了人民党的基础。他们的对手、根基主要在大马士革的“全国集团”则倾向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部分原因是它们都反对哈希姆王朝。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团体势力的兴起向老一辈民族主义者的权力发出了挑战。他们将叙利亚国际作用的新观念与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更大兴趣结合起来。巴勒斯坦战争和首次军事政变之后的5年中，这些团体中有两个在争夺最高权力。它们的办法是通过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而不是靠议会投票。他们是复兴党人和叙利亚民众党人。民众党是一个右翼亲美团体。它以泛叙利亚而不是泛阿拉伯的眼光来看待“叙利亚国家”。在他们的想象中，叙利亚国要扩展得比“大叙利亚”还大，还应包括伊拉克、土耳其甚至塞浦路斯的一部分。该党得到了非逊尼派穆斯林和非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复兴党则仅把叙利亚看成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该民族包含了从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至波斯湾，从北部的托鲁斯山脉至南部埃塞俄比亚边境的所有讲阿拉伯语的人。这两个团体都抱有用社会改革和政府经济的干预来取代民族主义者传统的自由化国内政策的想法。复兴党通过与阿克拉姆·豪拉尼的社会主义党的合并增加了其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内容。豪拉尼奉行强硬的现实主义，其群众基础是叙利亚中部哈马地区大土地庄园中的贫农，这与复兴党两位创始人比较温和的风度和近乎于神秘的理想主义形成了对比。这两位创始人是受过法国教育的知识分子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埃丁·比塔尔。阿弗拉克这位来自大马士革的文质彬彬的阿拉伯基督教徒历史学家是该党的首要意识形态专家，而比塔尔这位哲学教员则是党的组织家和战术家。

1954年，复兴党在争夺叙利亚幕后第一大势力的斗争中击败了叙利亚民众党。复兴党因与一部分旧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结盟才取胜的，他们的联合首先是反对赤裸裸的军事统治，其次是为了对抗伊拉克和西方军事条约。当时，复兴党正公开谴责纳赛尔是亲美军事独裁者，并怀疑他把埃及置于阿拉伯斗争之外，而且正



准备与以色列单独媾和。

在除埃及之外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叙利亚复兴党在动员大众舆论的斗争方面才算得上是纳赛尔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纳赛尔采取的“积极中立主义政策”，展开的限制扩展《巴格达条约》的斗争以及与苏联作军火生意等使他同复兴党的关系由争夺转变成为一个战术联盟。于是，在叙利亚政治中注入了新的成分。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以及他的个人领导既支持了复兴党，又成为叙利亚民众情感中新的焦点。此外，复兴党的更为保守的民族主义盟友把纳赛尔的埃及看成是既抗衡复兴党又抗衡共产主义者的砝码。

纳赛尔关于阿拉伯联盟的想法后来看起来几乎与复兴党的没什么区别，尤其是当他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时候。然而，它们的出发点不一样，而且它们潜在的区别在以后10年内常常再现于纳赛尔与复兴运动的起伏波动的关系中。这种区别如同戴高乐将军倡导的欧洲联合的思想同阿登纳和舒曼这两位富于独创性的“欧洲人”提出的并体现了一个超民族的“欧洲”共同体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一样。纳赛尔对阿拉伯联合的首要兴趣是创建一条维护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独立、反对外来势力的共同战线。他的第二个兴趣是推动埃及经济发展。阿拉伯世界为埃及的工业化产品提供了更广泛的市场。正如欧洲共同市场一样，从一个大的区域性经济中可以互利互惠，其中包括有希望从阿拉伯产油国获得投资。埃及不像其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它有着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强烈自我认同感。很自然，它是以国家共同体统一行动，而不是以屈从于一个超民族联盟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尽管纳赛尔敢于呼吁阿拉伯人民反抗他们的政府，但至少在这一阶段他的主要目的是强迫这些政府接受他的外交政策，或者当有关政府拒不服从时就把它推翻。他预言阿拉伯的政治联合是有着共同语言和历史良知的人们的自然目标，但在短期内除了制订共同政策之外，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来追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统一。

或许反映阿拉伯共同利益的政治结构可能在此基础上出现，但这将是个长远的进程。

然而，复兴党却认为实现阿拉伯联合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早已存在的“阿拉伯民族”必须从外国势力强加给它的政治边界和伪民族区划中解放出来。它认为阿拉伯民族国家和政府不是可以用来建造一个新的超民族共同体的基石，而是有待扫除的人为障碍；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外国利益服务或是保护当地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特权。这一观点如同埃及关于民族国家的想法一样也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因为阿拉伯亚洲尽管曾处于奥托曼统治下，但一直到最近仍是个没有划分边界的统一体。

叙利亚政治的无政府特性使纳赛尔更倾向于实行政治联合以确保其政策在大马士革的最高地位。再也不可能单纯依靠与叙利亚政府的合作或是对其施加影响，必须创建并维持一个新型的政府。

在1956年和1957年期间，要求与埃及联合的倡议不断从叙利亚传来并得到了复兴党的鼓励。1956年，纳赛尔主要关心的是创建一个联合军事指挥部，而叙利亚议会却设立了一个推进联邦联盟设想的委员会。由于苏伊士危机，复兴党愈加认为纳赛尔是可以用来实现其阿拉伯联盟构想的工具。1957年2月，当库瓦特利总统向纳赛尔提出按联邦方式搞宪制合并的想法时，他表现冷淡。1957年3月，纳赛尔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说：

目前，我并不是按任何联邦或邦联制的思路在考虑问题……我比较喜欢诸如阿拉伯联盟这样的组织成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强大且令人生畏的纽带。

纳赛尔仍在坚持战后的埃及制订的对阿拉伯事务政策的基本方针。他的境遇无疑加深了他的谨慎：他刚刚度过苏伊士危机；最后一批以色列军队刚刚撤离被占领土。

8月份，库瓦特利再次主动发出倡议。他宣称：“叙利亚最热切的希望是实现与埃及的联合，这一联合将是广泛的阿拉伯联合的核心。”9月初成立了研究经济合并的委员会。但是，是否单凭这样的倡议就改变了纳赛尔的态度，这是值得怀疑的。真正促使他改变其超然态度的是夏天的几个月中叙利亚危机的进程。纳赛尔在1957年9月9日对新闻界的声明中攻击了美国的政策并向叙利亚保证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两天后，比兹里将军和萨拉杰上校飞抵开罗与纳赛尔和陆军元帅阿米尔举行会谈。10月中旬，一小批埃及部队在叙利亚北方港口拉塔基亚登陆，与守卫叙土边界的叙利亚部队汇合。此部队不仅象征着纳赛尔对叙利亚防务的承诺，而且还标志着他同意更深地卷入叙利亚的内部政治。他想避免叙利亚政治左右两极分化，一极倒向苏联，另一极则不得不投靠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如要阻止沙特国王、赛义德或哈立德·巴格达什成为叙利亚复杂的内部斗争中的主宰，纳赛尔似乎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他自己那招人嫉妒的地位。

复兴党人把这一局势看成是既可维护他们在当地的阵地又可进一步推动纳赛尔走联合道路的大好机会。在国内，他们担心共产主义者可能夺走他们作为民族主义左翼的领导阵地；在国际上，他们担心尽管共产主义者取代他们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夺取政权，但它仍会挑起由伊拉克、约旦和西方支持的右翼军事行动。与埃及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将会减少这两种危险。而且，复兴党领导人相信阿拉伯联合必须从埃及开始，哪怕这只是因为埃及有足够的力量制止任何不包括它或不经它赞同的阿拉伯联合行动。

10月，复兴党领导人阿克拉姆·赫拉尼成为叙利亚议会议长。不久之后，米歇尔·阿弗拉克去开罗见了纳赛尔。11月，埃及新当选国民议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大马士革，并在那儿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建立联邦联盟。纳赛尔仍坚持不匆忙行事。他认为任何联合都至少需作5年的准备。他持谨慎态度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合并会使他的敌人团结起来并掀起一场国际风暴，叫人家指责

他在吞并叙利亚。然而，不到3个月，纳赛尔不仅接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而且还接受了大大超出了以前的联邦或邦联形式的阿拉伯联合方案的大合并。这是为什么？

叙利亚军队中的分歧以及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担心加速了联合运动。复兴党在地方上的权力争夺中开始攻击共产党反对阿拉伯联合这一在叙利亚大得人心的事业。于是共产主义者迫不得已与复兴党竞相热情支持与开罗搞联盟，尽管纳赛尔在埃及无情地镇压了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主张搞松散的联邦，而复兴党在12月提议建立一个组织得更紧密牢固的联邦国，但同时得建立有效率的地区政府和议会。

共产党随后加大了赌注。他们提议搞总联合，指望纳赛尔会拒绝，并迫使复兴党也拒绝这一建议。1958年1月12日，叙利亚的两位高级军官大吵大闹了一场之后，一个由总参谋长比兹里将军率领的由14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秘密飞往开罗去催促纳赛尔立即同意搞联合。他们在大马士革给叙利亚文官政府留下的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履行联合的保证。4天后，外交部长、复兴党人塞拉·埃丁·比塔尔去开罗加入了军官们与纳赛尔的会谈。

使纳赛尔最终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担心叙利亚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共产党或者亲伊拉克的右翼图谋夺权。3年半后，当叙利亚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离而去时，纳赛尔说：“你们都知道联合是怎么诞生的，叙利亚军队当时分裂成不同的宗派。”在1959年的反共运动中，纳赛尔宣称叙埃联合已“令叙利亚共产党人感到不安，他们以为能垄断叙利亚的日子已临近，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叙利亚的渗透已强大到可能建成一个共产党政府的程度”。

叙利亚复兴党人故意把危险夸大了，其目的是迫使纳赛尔表态压制叙利亚其他党派。他们还巧妙地激起了纳赛尔自豪和想象。纳赛尔在前文已引用的那篇有关联合的讲话中说：“我知道宪法制度上的联合不会是件容易事。我对那些在1958年向我要求联



合的人说：“让我们慢慢筹备这个联合吧；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叙利亚人随后问道：“你要放弃你早就宣布过的目标吗？”纳赛尔否认放弃了其原则，但他说：“为了确有把握，我们还是打好基础吧。”叙利亚人反驳道：“那末你的意图是否任凭叙利亚遭受分裂和仇恨的蹂躏？难道你眼看着叙利亚灭亡吗？”纳赛尔说：“我的回答是‘不，’叙利亚是我的第二祖国。叙利亚是伟大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对这民族的未来是满怀信心的。”

当联合的前景变得暗淡时，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回到他们以前提出的联邦体制的想法上来，这一构想是得到了叙利亚内阁的绝大多数人支持的。使他们吃惊和懊恼的是，纳赛尔坚持要搞两国的完全合并。他还要求像埃及那样解散叙利亚所有的政党，并使叙利亚军队从政治中脱离开，这就是他对联合提出的条件。

纳赛尔既然已经同意与似乎已分裂得无力自治的叙利亚进行联合，那他坚持一种会授予他全权的联合形式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形势的发展、埃及的利益和叙利亚人自己的哀求才推动纳赛尔勉强承担起了对叙利亚的义务；如果承担了这一义务却又得不到相应的权力，那在纳赛尔看来是加倍的愚蠢了。

复兴党人之所以接受了纳赛尔的条件，部分原因是他们仍希望在纳赛尔设立的用来取代党派的新政治团体“全国同盟”中发挥主要作用，尽管复兴党将被解散。叙利亚内阁在最后时刻仍坚持实行联邦制的企图被军方领导人发出的另一个最后通牒给否决了。军方已经决定接受纳赛尔的条件。以比兹里为首的军官们把整个内阁全赶到了开罗，对他们的警告是要么他们去埃及，要么去叙利亚的一个臭名远扬的监狱。次日，即1958年2月1日，在与埃及内阁的联席会议上宣布了叙埃联合方案，但还要由公民投票予以确认。新的国家将被称之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将是第一任总统。

3周后，以纳赛尔为总统的埃叙联合得到了公民表决的批准，在埃及和叙利亚得到的赞成票分别为99.99%和99.9%。无论这

些数字有多大的水分，但民众的热情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叙利亚已达到了万民同庆的程度。后来当纳赛尔首次访叙时，叙利亚人拥上街头和房顶欢迎他。纳赛尔早已把他的命运与这块土地连到了一起，但他在此之前还从未看到过它。

在公民投票结果公布后，纳赛尔在开罗的一次讲话中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阿拉伯人自己创立的第一个国家，它不是外国势力强加给阿拉伯人的；它是由完全摆脱了外国控制的两个国家组成的。它的创立是走向阿拉伯解放的第一步。为了让那些对如何获得这一“解放”存在忧虑的人放心，纳赛尔宣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一个“排斥极端主义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国家。他还保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阿拉伯人决不动手打阿拉伯人”。

纳赛尔早些时候在对埃及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已经对未来的麻烦敲了警钟。他说，有那么一些人会试图破坏新的联合。他还提醒说，“由于赶走了帝国主义，又会出现幻梦和希望的泛滥”，因此呼吁大家要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他用一句地道的埃及比喻说，有必要“给我们的愿望筑个坝并调节一下流量，否则它就可能像凶猛的洪水那样把我们淹没”。

但不到3周之后，面对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川流不息、热情奔涌的群众，纳赛尔自己也感受到感情狂潮的冲击，这在叙利亚可比在埃及强烈得多。在叙利亚这一“阿拉伯主义跳动着的心脏”，他感受到“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他说：“这是感情的狂潮在排山倒海般地奔腾。”他说道：“希望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的阿拉伯人民在内的包罗万象的阿拉伯联合。”他说：“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阿拉伯世界范围内的阿拉伯民族”并“为将阿拉伯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手中解救出来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他面临的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其责任之重大足以叫人充满敬畏”。在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之后，他号召新的国家恢复工作。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 第九章

### 叙利亚的挑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的建立(1958)

尽管埃及和叙利亚只联合了3年半,但这项试验却使阿拉伯人多年后一直念念不忘。除了埃及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之外,它是纳赛尔一生中最雄心勃勃的一次政治冒险,而且它也使纳赛尔将其政治家的天才和弱点都展示了出来。它显示了或许是他对埃及和阿拉伯事业最有价值的贡献:他的严肃认真的目标,他对惰性和失望的抗争,他准备努力将言论变为行动、将理想化为决断的决心。在排除早些时候的顾虑接受联合时,他无疑不仅感受到了迟钝、懒散的危险,而且也感受到了一场重大冒险的挑战和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埃及和叙利亚像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讲同一语言,大致信奉同样的宗教,有着同样的文化和历史经历。例如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比皮埃蒙特和西西里,或者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之间的差别大。但是联合的困难令人生畏。纳赛尔这位政治家的弱点,比如他不喜欢分享权力,总是猜疑别人搞阴谋,以及他过分依赖秘密警察而不是公开利用各派政治势力等,在习惯于个人主义的叙利亚政治急流中比在习惯于极权统治的埃及的政治气氛中得到了更清楚的暴露。

据说,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与纳赛尔这样谈到了他的同胞:“你现在掌管的是一个到处都是政治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50%的人相信自己是国民领袖;25%

的人相信自己是预言家,而且至少有 10%的人相信自己是上帝。”

埃及和叙利亚历史上也曾联合过,例如在它们一起阻止了近东蒙古人的入侵时,以及萨拉丁把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最终将十字军赶出巴勒斯坦时。纳赛尔变得喜欢引用这些先例了,在他的脑子里已将自己看作是第二个萨拉丁。但这两个国家在国民气质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有所不同。不仅两国的人口数量相差悬殊(埃及约有 2500 万人,而叙利亚只有 500 万人),在地理上也被分隔开了。它们不仅没有共同的边界,而且本可成为其天然陆路交通线的那一段路必须穿越敌对的以色列国境达 200 英里。除了与以色列接壤外,包围着叙利亚的是这样一些国家: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反对纳赛尔,反对其与叙利亚结盟的政策,对埃叙势力的扩张感到担忧,并愿意为搞垮它们尽力。

正如纳赛尔已预言过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创立引起了一场国际风暴。埃叙联合对阿拉伯的公众舆论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而且使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以及大国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苏联表面上虽然欢迎埃叙联合但却以又喜又忧的复杂感情看待这一事件。虽然此事似乎加强了与亲西方的阿拉伯政府相比算是中立的纳赛尔政权,而且使叙利亚不会跌入西方阵营,但它也意味着共产主义在叙利亚的影响黯然失色。叙利亚共产党像埃及共产党一样对联合扩大了反帝战线表示欢迎,但反对纳赛尔提出政党必须解散的条件。叙利亚共产党分裂了。它的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拒不解散党或签署联合宣言,于是离开国内去了某个苏联集团国家。

埃及共产党也屈从于广大党员的压力,谴责埃及和叙利亚对“民主自由”的压制。

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苏联人欢迎纳赛尔自 4 月 28 日起对苏联进行为期 3 周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两年前就定下的。这是纳赛尔对



一个大国的首次访问，也是首次访问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个共产党国家。他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初次会面。他还访问了列宁格勒、乌克兰以及穆斯林占人口一大半的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共和国。在4月30日赫鲁晓夫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午宴上，纳赛尔赞扬了苏联的援助。他说这一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包含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独立政策的任何干涉。

历史经验证明，苏联与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帮助我们铲除势力范围并发展我们的经济，使我国工业化这一真诚愿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有人想奴役一个国家，他就不可能帮助它发展实力，无论这种实力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工业发展方面。

苏联自身的工业发展和它允许苏联穆斯林享有宗教自由的程度都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发现他所参观的清真寺里人很多，尽管大都是老年人。但最重要的是，苏联人以庄重和尊严对待他，对待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这感动了他。他刚从苏联返回就告诉总统府前的人群说，苏联人对阿拉伯人“极为尊重”，苏联是“不怀有任何恶意的友好国家”。赫鲁晓夫与他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支持巴勒斯坦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自决权，并谴责了英国对也门的入侵。

只是到了后来，纳赛尔才透露了莫斯科会谈中不那么和谐的一面。赫鲁晓夫要求他允许叙利亚共产党更自由地开展活动。纳赛尔反驳说这一要求等于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政的干涉。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坚持，但后来在苏共21大时又公开提到这一点。

在访问归来发表的这篇讲话中，纳赛尔还透露，在他动身访苏之前，美国政府通知他说“美国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它将尊重我们的中立和独立”。纳赛尔的回答是，如这些意愿是真诚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表示欢迎。纳赛尔宣称，不结盟政策终于胜利了。它得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

国的承认。但是，斗争必须继续，直到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样获得自由。两个月前刚从叙利亚胜利访问归来时，纳赛尔曾说道，在进行了多年的斗争后，“我们的奋斗已到了阳光灿烂的顶峰阶段。”他的这一兴高采烈的宣言似乎有些道理。

但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险象环生。无论是叙利亚共产党的挫折还是纳赛尔提出对西方的中立以及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不足以克服美国、英国及其阿拉伯盟友的猜疑。

伊拉克政府谴责叙埃联合是被逼出来的，对于这一指责，纳赛尔在叙利亚当着如潮水般涌来听他讲演的群众予以嘲讽。当伊拉克和约旦政府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成立不到两周内就宣布两国组成联邦时，纳赛尔巧妙地用激将法火上加油。他对走向更广泛的阿拉伯联合的任何步骤一概表示欢迎，即使这种联邦是由“肯定会在某一天下台”的努里·埃·赛义德搞出来的。纳赛尔的这种宽宏仁厚不计前嫌的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开罗和大马士革的电台很快又开足马力大肆攻击巴格达和安曼的“帝国主义走狗”。伊拉克—约旦联邦在地理和经济上比叙埃联合更符合逻辑，但它在民众中并没有激起多大的热情。该联邦在其5个月的短暂生存期内一直仅限于形式上的联盟，其主要影响是强调了伊拉克在这个哈希姆式的联盟中的重要地位并使它合法化。

更带有人为色彩的是将也门纳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安排。在伊马姆·艾哈迈德领导下的也门于3月份以“阿拉伯合众国”（见第十四章）这一虚假的联邦形式加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还有一件事情说明纳赛尔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在日益增长，这就是在也门追随“阿拉伯合众国”之后的两周，沙特阿拉伯宣布沙特国王已将首相和外交大臣这两个职位交给了他的弟弟费萨尔王储。费萨尔得到的名声是更能干、更激进，而且在对待纳赛尔的态度上也比沙特国王更灵活：不出5年，他就成了纳赛尔的一个死敌。

在大马士革向纳赛尔欢呼致意的群众中，在专程前来向他顶礼膜拜的阿拉伯代表团中，有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这些人大部分

是穆斯林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涌过边界来到距贝鲁特仅 50 英里的叙利亚首都。这是下一场危机即将来临的不祥之兆。黎巴嫩将是这场危机的中心，而纳赛尔将要被卷进去。

黎巴嫩在阿拉伯国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教育最发达，并拥有最为自由的阿拉伯报刊；它有大约 200 万人口，其中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各占一半；它有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体系，旨在将 11 个不同的派别集团加以平衡，这些集团又分为两个主要的宗教派别。黎巴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基督教徒，特别是主要的基督教马龙派在穆斯林占压倒多数的阿拉伯世界中寻求自治的愿望。马龙派在他们的传统保护者法国人撤离后，不得不与黎巴嫩穆斯林联合拟定一项“全国条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与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做的一笔交易。（在这一运动中，黎巴嫩基督教徒，尤其是知识分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基督教徒们比起穆斯林来富有得多，而且他们还基于阶级利益与一些穆斯林富人结成同盟，这些都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但这也使教派和阶级冲突在危机时刻和危险地区变得更为剧烈。黎巴嫩的内部冲突由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创立更为加剧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于穆斯林的感情，对于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在两大教派中都进行社会变革的人，犹如一块刚从边界那边传过来的新的强力磁铁。纳赛尔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是各地阿拉伯主义的支持中心的宣言激励着黎巴嫩反对派和夏蒙政府进行对抗，它也使那些害怕其自治会淹没在穆斯林占压倒优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洪流中的基督教徒更为忧虑。纳赛尔理解这种担忧，他并不希望黎巴嫩解体，因为那有可能招致西方力量重返东地中海。因此，当他继续攻击夏蒙的亲西方政策时，他极力向全体黎巴嫩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保证，他并不想破坏黎巴嫩的独立。他告诉来大马士革会见他的黎巴嫩仰慕者代表团，尽管他欢迎与黎巴嫩搞联合，但这只能是黎巴嫩人民一致决定的结果。1958 年 3 月 9 日，保尔·马乌什这位曾抨击夏蒙分裂国家的马龙派领袖宣

布他接到了纳赛尔和叙利亚前总统苏克里·库瓦特利(现在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被正式称为“阿拉伯第一公民”)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黎巴嫩现在享有的完整主权和独立将不会受到触动”。这位领袖说:“这些兄弟只要黎巴嫩做一件事,那就是它不要成为反对他们的阴谋中心。”

纳赛尔明白,在压力和使人放心之间保持平衡是困难的。反对派越催促改变外交政策,让黎巴嫩与纳赛尔靠得更紧一点,夏蒙就越是责怪来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干涉造成了这种压力,而且他自己就越依赖美国的援助。各方私下都开始利用外国的帮助来武装自己。

1958年5月8日,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左翼基督教派报纸编辑纳西卜·马特尼在贝鲁特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遭到枪杀。反对派将杀害他的责任归咎于政府的支持者并呼吁搞一场全国总罢工,直至夏蒙辞职为止。罢工发展成暴乱,成了各敌对政治集团间的武装冲突以至于最后的武装叛乱。小小的黎巴嫩军队只有9000人左右,它将叛乱控制住后却没有加以平息。军队指挥官福阿德·谢哈卜将军担心,如果他按夏蒙总统所希望的那样更积极使用军队平定叛乱,那么这支军队,这支唯一尚能保证民族统一的力量就会像教派一样四分五裂。

夏蒙宣称叛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苏联的支持下煽动起来的。他呼吁美国予以援助。他称纳赛尔正在搞一个推翻他的政府的大阴谋。除非美国支持他,否则中东其他亲西方的政府,包括约旦和伊拉克在内,都会落到纳赛尔手中。

5月1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讨论了夏蒙提出的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响应他的呼吁的询问。他们的反应表明华盛顿当时的中东政策有多么混乱。杜勒斯知道夏蒙错误地寻求连任总统使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变得更尖锐,而且他的亲西方政策加深了这个国家内部的分裂。几周后,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特使罗伯特·墨菲确认黎巴嫩的局势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瓜葛。他发现:



许多冲突都与个人之间以及国内的争斗有关,而与国际问题毫不相干。在反叛中,共产主义并没起什么直接的或实质性作用。外来影响主要来自于埃及和叙利亚。

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写道:“我们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应对这场动乱负主要责任。”他还写道,夏蒙总统是坚定的亲西方盟友,驱使他这样做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关心的不是黎巴嫩的政治状况,而是试图借此机会向苏联和莫斯科的盟友,其中包括纳赛尔表明:美国虽在苏伊士危机时表现谨慎,但并不害怕通过军事干涉支持其盟友。他们急匆匆地把黎巴嫩动乱看成是苏联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动的政治攻势中的“又一共产主义挑衅”。美国对这种挑衅显然有些束手无策。

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夏蒙保证美国将给予支持,但条件是:夏蒙应该放弃他竞选第二任总统的计划;他向美国的求援要求应有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干涉部队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帮助黎巴嫩的合法政府。这种干涉只是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用。与此同时,美国第六舰队的两栖部队已调至东地中海,在欧洲的美国空降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

在一段时期内似乎看不出有使用美国军队的必要。黎巴嫩内战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寻求一项外交解决办法,以便消除黎巴嫩政府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责难。黎巴嫩政府在拒绝通过阿拉伯联盟做出妥协安排之后,将它的指控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黎巴嫩外长查理·马立克在会上指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通过向反叛分子大规模提供军火,通过训练并直接雇佣恐怖分子以及利用敌对广播和报刊宣传在黎巴嫩“进行大规模、非法和无端的干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奥马尔·卢图菲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并指出“反叛分子”包括一位黎巴嫩前总统,四位前总理,两位前议长,还有其他三位前部长及一位前外交部秘书长。

6月11日，在苏联投弃权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无异议的情况下，安理会决定派联合国的一个观察小组去黎巴嫩，以确保武器和人员不会向黎巴嫩渗透。观察员的任务很艰巨。黎巴嫩境内多山地；与叙利亚长达324公里的边界中只有18公里处于黎政府的控制下；边界两边经常发生绑架活动；人员流动是司空见惯的事。联合国观察组在首次报告中很少发现有外来的“大规模”干涉的证据。

纳赛尔无疑愿意通过叙利亚陆军“第二局”向黎反叛分子提供足够的军火和钱财，以确保他们不会轻易被镇压，并且逼迫夏蒙修正其政策。同时，他正在幕后试图为这场冲突找出个妥协解决办法。他对联合国派出观察员没提任何反对意见，他还向美国政府主动提出利用他的影响结束冲突。按照艾森豪威尔所说，纳赛尔所提的条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些条件是，夏蒙总统应结束他的任期；谢哈卜将军（我们的许多专家都感觉他是除夏蒙外最强有力的黎巴嫩政治家）应该继承总统职位；黎巴嫩国内的反叛分子应予以赦免。我们将这一信息通过外交渠道转达给夏蒙总统，而且有把握让他懂得我们的政府只是通讯员，并不是想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携手反对他。夏蒙总统显然不相信纳赛尔总统的动机，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按这一提示走下去”。

美方故意作出的超脱表示无疑迫使夏蒙做出了消极的决定。两个月后，当美国通过罗伯特·墨菲在背后施以影响时，夏蒙派就接受了一项类似的解决方案。

6月中旬，激战再度爆发，夏蒙又向美国请求帮助。但是当夏蒙于7月8日首次当众宣布他在9月23日任期届满后肯定不再谋求连任时，危机看来似乎不用美国干预就能消失。然而，夏蒙一直在向《巴格达条约》的穆斯林成员国中，尤其是向伊拉克争取援助，这些成员国将于7月14日在伊斯坦布尔开会讨论黎巴嫩问题。伊朗—约旦联邦首相努里·埃·赛义德会前对伦敦进行访问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进行干预以支持黎巴

嫩政府反对苏联通过纳赛尔进行干涉。他暗示说，伊拉克或伊约联邦可能在夏蒙总统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出兵黎巴嫩。

英国人在苏伊士危机后谨慎起来了。它认为努里的主要目标不是黎巴嫩，而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本身：他认为只要有了外来帮助，叙利亚就可以摆脱埃及。当努里飞返巴格达为事关重大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作准备时，伊拉克部队的两个旅已奉命调往约旦北部。在这两个旅的军官看来，这次调动像是对黎巴嫩的军事干预迈出了第一步——军事干预只能通过进入叙利亚完成，因为约旦和黎巴嫩没有共同边界。当人们以为这两个旅是执行命令调动时，它们却于7月14日凌晨调过头来迅速开入巴格达并控制了首都的要害部位。两位指挥官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准将和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雷夫上校宣告了革命的诞生和哈希姆王朝的完结。他们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内容包括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维护阿拉伯团结，实行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王宫被包围了起来，费萨尔国王、王储、前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和其他王室成员遭到枪杀。（或许是误遭枪杀。据说当国王及王室其他成员正走下王宫台阶投降时，阿卜杜勒·伊拉赫开枪了；待命的部队随即开枪还击，将他们全部击毙或击伤。）努里·埃·赛义德最初时从他的房子里逃出来了，但第二天当他用妇女袍服和面纱乔装后从一个藏身处转移到另一处时在大街上被认出来了。他被杀死，他的尸首在大街上被人拖着并被人群给撕成了碎段。

尽管伪装成针对叙利亚的军队调动为推翻政府提供了机会，但这次政变却由卡西姆一直秘密策划了3年。政变在民众中掀起了革命浪潮，它反映出在旧政权统治下各阶层人士的广泛不满一直在集聚之中。中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主流。他们之所以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努里对公众舆论采取了玩世不恭、冷漠处之的态度。他压制民众自由，姑息腐败现象并将伊拉克置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感情的主流之外。努里尽管大肆吹嘘将伊拉克石油收入的70%都用到了经济发展上，但他对经济和社会事务感到厌烦。他未

能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事业给予适当的注意，部分原因是他依赖大地主和部落族长的政治支持。

把一个新生而又充满分歧的国家捏在一起需要技巧。努里长期以来提供了这种技巧，但许多伊拉克人对这些都估计过低。他们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认为压在他们身上的是一个不顾他们利益只为西方强权服务的反革命无能政府。伊拉克成为《巴格达条约》的成员国就是一个标志。该条约似乎不是什么反苏的军事同盟，而是同 19 世纪的欧洲神圣同盟、同镇压国内激进或革命运动的警察俱乐部有些相似。在伊拉克内部发生的这些运动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了“共产主义”的帽子。

伊拉克革命对伦敦、华盛顿及其残余的阿拉伯盟友造成的心理冲击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它在几个小时内就将英美阿拉伯政策的主要支柱给毁了。苏伊士危机使英国人丢掉了由西方控制包括埃及和运河基地在内的阿拉伯地区防卫集团的幻想。伊拉克革命则把英美试图利用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将包括举足轻重的叙利亚在内的新月形地带牢牢纳入西方体系，同时孤立埃及直至纳赛尔也选择加入西方体系的希望给打破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对那些计划已经是个打击，但只要伊拉克完好无损，努里似乎还是希望把善变的叙利亚人争取回来。现在努里及其政府叫政变给毁灭了，这场政变看来即使不是由纳赛尔的行动策划的，也是由纳赛尔的思想给鼓动起来的。

黎巴嫩总统夏蒙和约旦国王侯赛因感到身陷绝境并紧急呼吁西方给以援助。英国人和美国人自己也感到震惊和捉摸不定。他们倾向于把所有阿拉伯激进主义和中立主义的行为都与纳赛尔要建立帝国的断言联系起来，并且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扩张挂上钩。这种倾向把他们自己都弄糊涂了。在华盛顿，艾伦·杜勒斯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头头报告说，伊拉克政变是伊拉克军队中的亲纳赛尔分子搞的，但“我们并没得到有关纳赛尔亲自在幕后插手政变的情报”。然而，艾森豪威尔断定：“如果我们不作出积极有力的反应，那



事态的恶化就可能产生使西方在中东的势力完全被清除的结果。”在与持怀疑心态的国会领导人磋商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同时，在夏蒙求援不到 24 小时之后，美国第六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开始在黎巴嫩登陆。两天后，第一批约 2000 名英国伞兵开始飞越以色列领空去约旦保卫侯赛因。

在这场可能带来灾难的国际危机中竟然出现了一出闹剧。尽管艾森豪威尔坚持说美国的干预是应黎巴嫩合法政府的请求而作出的，但美军在贝鲁特机场附近登陆时却以战斗队形展开——这并非由于预计他们会遭到反叛分子的抵抗，而是因为“不明白”黎巴嫩军队将持何种态度。谢哈卜将军实际上已要求将登陆推迟 24 小时，与此同时正举行谈判以确保他的部队不会开火。但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大使与第六舰队失去了电讯联系，一些黎巴嫩军队用坦克堵塞了通往贝鲁特的道路并迫使谢哈卜和美军指挥官都参加了停火谈判，结果是达成了美军活动范围只限于机场区和海港的协议。

艾森豪威尔准备一旦必要即在中东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他命令采取军事预备措施增援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而且如有必要还准备使用核武器保护科威特。他通过美国驻开罗大使警告纳赛尔，不要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抗击黎巴嫩美军的敌对活动。苏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谴责美国的干预是一种侵略行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保证支持伊拉克反抗任何进攻。

纳赛尔是在南斯拉夫度假并访问铁托时听到了伊拉克革命和西方行动的消息的。毫无疑问，他早已听到过伊拉克军队中暗藏不满的风声，但他如同西方大国一样对政变感到吃惊。他对危机可能具有的规模在当时也如西方国家一样摸不透。美军的大规模行动部分意图是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苏联反击，但也不排除这次行动最终将超出黎巴嫩和约旦，或许还要夺取叙利亚，然后再征服伊拉克。纳赛尔立刻飞往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商谈。他要求苏联人确保对他反对西方把行动扩大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予以支持。但他也

要苏联人确保自己不会单方面介入,也不作任何有可能挑起西方入侵或将中东变为核战场的事情。返回开罗后,他在7月22日的一次演讲中通报说,他在莫斯科讨论了“防止对阿拉伯国家的入侵,维护他们的独立,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纳赛尔后来在1959年与莫斯科发生公开争吵期间透露,苏联人没给过他任何军事支援的保证。在返回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他于7月18日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伊拉克革命领袖、副总理阿雷夫上校并重申了他对伊拉克反抗任何侵略给予支持的公开保证。纳赛尔“当时确信,在伊拉克遭到任何入侵或是在帝国主义对它发动进攻时,我们是唯一站在伊拉克一边,唯一会与它并肩战斗的国家”。

赫鲁晓夫并没有作出保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军事保证——苏联人知道,除非冒着打一场核战争的风险,否则难以实现这种保证,因为土耳其和伊朗是把苏联和中东隔开的障碍,而仅限于威胁,仅限于要求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并没把中国而是把印度当成第五大国,这就激怒了北京。纳赛尔支持召开首脑会议的倡议,他说:“我们对冷战厌烦了,对军事集团厌烦了,对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以及将世界拖到战争边缘都厌烦了。”

纳赛尔在去大马士革之前早已把他的命运与伊拉克革命者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并决定尽可能多地给他们军事援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给伊拉克人提供了供民众抵抗小组使用的小型武器,还有重武器弹药以及飞机和雷达设备。它还与巴格达新政府缔结了军事条约。纳赛尔承认:“我们当时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和独立进行赌博……因为我们相信伊拉克的独立会巩固我们的独立。”

对纳赛尔来说,这是一个充满胜利感但又是极其危险的时刻。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他的最可怕的阿拉伯竞争对手已被消灭。曾是西方势力基石的伊拉克已经加入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为核心的“解放了的”阿拉伯中立主义国家阵营。旨在将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从“帝国主义”控制下摆脱出来并结束外国在阿拉伯世界势力范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正方兴未艾,迅猛发展。纳赛尔在大马士革

面对伊拉克代表团发表演说时宣称：“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最终挣脱了锁链。阿拉伯人民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祖国充满了信心……自由的旗帜也将在安曼和贝鲁特上空高高飘扬。”纳赛尔同时也很清醒，如果危机导致了战争，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一切都可能失去。他力图缓解西方的忧虑，呼吁西方世界要认识到“占领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并且要求他们理解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拉克革命的真正含义。

纳赛尔在他的一次最具雄辩力和最有戏剧性的演说中责问美国为什么竟反对“伊拉克自由的人民”，尤其是现在伊拉克领导人已向西方保证伊拉克石油将继续流入其工厂。他说：

我们要使自己国家独立。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民族主义和尊严。我们正在为和平而努力，因为和平是我们的宗旨，而战争意味着完全毁灭……当伊拉克人民和军队奋起反抗时，他们仅是奋起反抗邪恶和腐败……在谈到平时，(纳赛尔说)我是在对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谈话，他们气极败坏，怒不可遏，他们正在将世界引向悬崖峭壁之边缘，换言之是引向战争。

几天之后，令人惊恐的局面开始全面消失。西方政府此时已明白巴格达革命主要是伊拉克的内部事务。在巴格达的暴徒最初的犯罪行为结束之后，卡西姆显示出他控制住了伊拉克的局势，而且不存在任何严重的有组织的反抗。他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和解的言论，宣称他愿意继续履行伊拉克的国际义务，包括在输出石油方面做出让步。尽管他没有立即退出巴格达条约，但伊拉克显然已成了名不符实的伙伴。他的政府很快得到了英美的承认。虽然纳赛尔和阿雷夫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同志在大马士革进行了充满感情的公开会晤，但卡西姆和纳赛尔都不急于将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联合起来。

赫鲁晓夫悄悄放弃了召开首脑会议的要求。同时，在美国使节

罗伯特·墨菲的帮助下，在黎巴嫩达成了一项政治妥协。如纳赛尔早些时候所暗示的，谢哈卜将军于7月31日被选为下一届总统。4天后，谢哈卜宣布他有意要求美军撤离。在内战的结果是“既无战胜者也无被征服者”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妥协内阁。

联合国召开了联大特别会议，结果也是在阿拉伯国家自己制定的决议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解决办法。它们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并同意由联合国采取措施以帮助阻止诸如偷运军火和广播煽动这样的“间接侵略”。在这一基础上，美军将撤出黎巴嫩，英军将撤出约旦。联合国的一位官员将代表秘书长“监督”保证协议的实施。

10月8日，美国宣布将撤出它的部队，实际上这支部队的人数已从高峰时的1.4万人缩减了许多。联合国观察员小组也将起程。英军将在年底从约旦撤出。

虽然伊拉克革命在政治上是个蔚为壮观的事件，但黎巴嫩内战的血腥味却浓得多，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3000人。

罗伯特·墨菲在执行中东使命期间曾前往开罗与纳赛尔会谈。纳赛尔长篇大论地向他谈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释了阿拉伯联合的必要性，是为了保证像埃及这样弱小国家的安全。当墨菲提及以色列的话题时，“纳赛尔耸耸肩，暗示对这一问题无能为力”。墨菲发现，由于美国的苏伊士政策，纳赛尔的看法，即“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虽有所动摇但并未消除。

对纳赛尔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他对阿拉伯事业的耿耿忠心是不容置疑的(墨菲的结论)。我尊重他，因为要为埃及数以百万计的贫民办些实事是个沉重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包袱，但他正是在为此而奋斗。然而，我是带着不安的感觉离开的。使我不安的是纳赛尔身上的压力可能导致他采取无助于和平的方法。

到了年底，美国和英国都已撤军，一场国际危机已经过去。令



纳赛尔满意的是，它标志着中东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与西方强权的斗争中，他赢得了第二阶段的胜利。在这一阶段，美国继苏伊士危机后又妄图将整个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西方强权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带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时期已经结束——无论如何今后几年不会再进行干预。该地区的“中立”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默许。它们在下一个10年中只能竞相通过经济援助、军火输送和宣传施加影响。昔日的帝国主义强国英法将它们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人员撤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外围。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一些富裕的石油王国里稳住了阵脚。法国这时在戴高乐的领导下继续在阿尔及利亚打仗，尽管这场战争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代价也越来越昂贵，不过法国对“法式阿尔及利亚”这一公式的信念却越来越减弱了。

英法在苏伊士危机后的失败和撤退留给中东的所谓“真空”并没有被苏联或美国在军事上或外交上独家填补，也没有像纳赛尔所希望的那样由阿拉伯国家自己组成的一个联合集团来填补。只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保持稳定，它就是这一地区潜在的稳定中心。但是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政府间继续争吵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自身的破裂则产生出一种动荡的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中，以色列或许将暂时以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强国的面貌出现。

甚至在美国和英国撤军之前，被纳赛尔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胜利之年”的1958年显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新近形成的革命团结不久就出现了紧张的迹象。7个月后敌对就公开化了，纳赛尔与卡西姆之间的宣传战如同他与努里·埃·赛义德之间的斗争一样激烈。同时，纳赛尔与阿拉伯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加剧了。他还与苏联之间闹出一场意识形态的争吵，这也使双方原有的裂痕加大了。

推动7月14日革命的伊拉克军官有着与埃及自由军官类似的背景和观点：他们大多出身于中层和中下层，或者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是激进派和清教徒。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的是温和的马克

思主义者,有的则是伊斯兰平均主义者。但他们与民众政治力量的关系却和埃及军官相比不太密切。

由于西方干预的威胁消退了,伊拉克的革命力量在两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伊拉克在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联合方面应走多远,党派政治生活应恢复到什么程度以及应以什么速度恢复。伊拉克前反对党派由于过去处在努里的压制下以及有地下斗争的记录,与埃及1952年革命前的反对党比较起来,它们的名声没有那么坏。共产党由于有地下斗争的经验,比起埃及和叙利亚的情况来也显得更强大一些,组织得更好一些,而伊拉克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比较却更弱小、年轻和更缺乏经验。伊拉克盘算阿拉伯联合时还考虑到其它两个因素:北方较大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还有或许是占伊拉克阿拉伯穆斯林人口一半的什叶派穆斯林中的一些人,反对任何密切的、由逊尼派穆斯林占优势的联合。因为搞这种联合他们的影响和势力就会缩小。

虽然所有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催促军方领导人恢复合法的党派活动和宪制生活,但它们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陷入分裂,这一分裂很快扩展到军队领导层中。复兴派、依斯蒂奎尔派、民族民主党的一部分以及军官中的一些无党派“纳赛尔主义者”要求迅速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联合。如有必要,这种联合应处于纳赛尔的领导之下。他们当中除复兴派和纳赛尔派之外,都要求不要把联合搞得像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联合那样完整。他们只是要一种联邦,这样可以给伊拉克多留点自治并能继续开展各党派自己的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库尔德人力量虽小但有影响。中间偏左的民族民主党中的一些人和军中的一部分人在对通过松散联邦搞阿拉伯联合进行敷衍的同时,却在秘密反对任何联合。很清楚,共产党是希望他们能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进而能最终夺回自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以来它在叙利亚所失去的影响。

副总理阿雷夫上校感情外露,精力旺盛,他是伊拉克革命政权中首要的“纳赛尔主义者”。他将阿拉伯联合置于伊拉克党派问题

之上,而且要镇压共产党,但同时又敦促进行一场激进的土地改革。卡西姆将军是总理和国防部长,他为人谨慎,守口如瓶而且圆滑。他担心,任何争取联合的过早举动都会给伊拉克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团结带来危害。卡西姆既没有力量,或许又没有气质来完全实现他自己的意愿,于是试图走中间道路——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和稍稍偏左的道路,在敌对的派别之间一会儿倒向这一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方。

纳赛尔后来宣称他同卡西姆一样谨慎,并且认为伊拉克的团结比起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要更紧迫一些。伊拉克的几位领导人,包括卡迈勒·沙迪尔奇这位民族民主党的元老来到了开罗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探讨联合的格局。

我告诉他们(纳赛尔说),不要匆忙行事,而要回去巩固革命成果……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之间搞任何形式的宪制联合,而是要建立更伟大的阿拉伯民族团结。为推行这一政策,我几次试图与卡西姆会晤。他找了些软弱无力的借口故意回避。

既然纳赛尔和卡西姆看起来都是要达到同一目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产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在两个人都有的自负和多疑的性格中可找到一部分答案,但更主要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彻底控制住他们在伊拉克的支持者或盟友,纳赛尔对巴格达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带给叙利亚的影响尤其感到不安。纳赛尔在伊拉克的个人声望很高,伊拉克的纳赛尔主义者倾向于不讲策略,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轻率鲁莽、讲话随便的阿雷夫很快就与卡西姆发生了冲突。他被解除了原职并派往波恩任大使。在他突然擅自返回巴格达之后, he 被捕了,罪名是阴谋反对政府。他被判处死刑,但没有执行。卡西姆曾定期去监狱看望他。卡西姆相信纳赛尔正策划搞掉他。为了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 he 比以前更倚重共产党。

共产党在政府中没有占据任何部长职位，它作为一个政党，在法律上仍是被禁止的。但它或它的同情者却在政府里得到了几个重要的职位。共产党在伊拉克的影响越大，纳赛尔就越变得焦躁不安。他开始将伊拉克的斗争看成是叙利亚那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斗争的再现。纳赛尔曾在早些时候（1958年）私下向赫鲁晓夫抱怨苏联外交官似乎在叙利亚鼓动共产党密谋反对联合。他还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关于阿拉伯“并吞”和镇压“民主自由”的批判谈话表示了关注。他相信共产党正在展开一场反对他的运动。它们和西方的某些报刊一样，指责他想并吞伊拉克以攫取其石油。在1958年秋，纳赛尔的反攻沉寂了下来。他想等待国际危机过去后再说，而且他还进行着事关重大的经济谈判，其成果是于1958年10月与苏联签订了协议，由苏联帮助筹措资金并帮助修建阿斯旺水坝。苏联人同意为大坝第一期工程提供4亿卢布（合3.3亿英镑）的信贷，并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

纳赛尔于1958年12月23日在塞得港的一次讲演中，放任了自己，在公开场合进行了首次试探性的反击。他攻击叙共是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说他们“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胜利看成是他们自身利益的完结”。他没有直接提及伊拉克或苏联，但他显然运用历史的类比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过去，纳赛尔在为阿拉伯联合的价值进行鼓吹和推动时，常常说起埃及和叙利亚是如何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共同击败了十字军，当时的帝国主义者是来自西方。现在，他却回顾起在萨拉丁领导下，联合起来的阿拉伯人也击败过侵入巴格达并到达叙利亚的鞑靼人（来自东方）。

1959年3月，以沙瓦夫上校为首的亲纳赛尔军队成员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起义流产后，新的争吵达到了高潮。策划这次叛乱的是力量日益增强的共产党和受共产党影响的“民众抵抗部队”。卡西姆指责叛乱是由叙利亚策划的，纳赛尔对此予以否认。

在摩苏尔叛乱前不久，纳赛尔在大马士革讲演时重申，他的政



策是不结盟,而且独立于西方或东方集团之外。他指责“帝国主义分子”试图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之间挑拨离间,挑起事端。他还透露,他已给赫鲁晓夫写信询问苏联在平等基础上支持阿拉伯解放运动的政策是否有了变化。他说,他刚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长达10页的回信。回信向他保证,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苏联仍将继续给予支持。信中还称,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而言,苏联并不希望干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内部事务。

但是,随着对摩苏尔叛乱的镇压,纳赛尔发动了一场更激烈、打击更狠的运动,矛头直指卡西姆和共产党,并最终指向了赫鲁晓夫本人。他利用卡西姆的名字在阿拉伯文中的双关含义,称卡西姆为“伊拉克的卡西姆”,即“伊拉克的分裂者”。他还指责卡西姆政府的恐怖性,以及在试图将伊拉克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分裂出去方面都是紧步努里的后尘。他攻击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都是外来势力的代理人,这些外来势力正妄图将阿拉伯人纳入某个势力范围。在控制叙利亚的计划被挫败后,“共产党已移往巴格达,为的是将伊拉克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并进而将共产主义扩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从而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新月形沃土”。

3月17日,纳赛尔发表声明,对赫鲁晓夫在签订苏联伊拉克技术财政援助协议时的讲话作了回答。赫鲁晓夫说:“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谈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时,他用帝国主义者的语言武装了自己,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仍将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赫鲁晓夫断言,纳赛尔坚持要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伊拉克联合起来,但这种统一必须由有关国家的人民来决定。虽然阿拉伯人在抗击帝国主义上有着共同利益,但每个国家在解放后又可能有着不同的,而且是不可忽视的利益。赫鲁晓夫说,苏联过去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干涉这样的事务,但是“它对正在离我们边境不远的地区内发展着的局势不会无动于衷”。这番谈话不祥地暗示了苏联有权干预以便支持和保护阿拉伯共产党。纳赛尔立即并有力地将它斥之为“不可接受”,而且“是对阿拉伯人民意志的

挑战”。他否认了他一直坚持与伊拉克统一；他敦促的只是阿拉伯的团结。而且他还宣告过，就任何联合而言，绝对必要的条件是要得到有关国家的人民的一致赞同。纳赛尔说他赞赏在互不干涉和平共处基础上同苏联建立的友谊，但“曾为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的阿拉伯人民将决不会同意成为卫星国”。

纳赛尔并没有在赫鲁晓夫的责难后放弃他的反共运动，而是加强了这一运动。3月22日，他在大马士革的一次讲话中，愤怒地讽刺了苏联总理称“阿布杜勒·纳赛尔是个年轻人，他好激动，头脑发热”的评论。他说：

阿布杜勒·纳赛尔并不是唯一的好激动和头脑发热者，整个阿拉伯人民都如此……没有这样的头脑发热，阿拉伯人就不会赢得反帝斗争、反对《巴格达条约》的斗争、反对英法入侵塞得港的斗争及其后来的伊拉克革命的成功。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间，埃及以激动和发热的头脑孤军与英、法和以色列奋战……没有哪个国家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我们与苏联没有任何协议……如果没有这种激情和头脑发热，我们的国家就会变为反苏的火箭基地，就会变为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西方基地。

纳赛尔将共产主义者支持“民主生活”的说法斥之为“虚伪的口号”。他说，他不要任何政党，既不要由西方帝国主义资助和支持的反动党派，也不要受到外国共产主义鼓舞并试图“将我们拴在独轮车上”的共产党。

纳赛尔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想要掠夺伊拉克石油的说法进行了嘲讽。他指出，伊拉克每年7500万埃镑的石油收入仅相当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收入加上它自己的石油收入。埃及的国民收入为10亿埃镑，它的预算为3.6亿埃镑，它出售棉花的盈利为1.2亿埃镑，叙利亚的预算达7500万埃镑。而伊拉克除石油外，其他收入仅为4500万埃镑。那么，纳赛尔问道：究竟是谁想要谁

的钱？

叙利亚共产党在伊拉克革命后已经恢复了活动。纳赛尔说，阿拉伯共产党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攻击内容为苏联集团的报刊所转载。由于阿拉伯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之间的联系，“我们突然面临着苏联对我们内部事务的明目张胆的攻击”。

作为反共运动的一部分，纳赛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同路人展开了清洗。塞得港演说一周之后，1959年1月1日凌晨，埃及共产党的280名领导成员和官员遭到逮捕。许多人都被押到因残忍而臭名昭著的阿布·扎贝尔沙漠集中营及军事监狱，据报道，有几个人在那儿死于酷刑。1961年3月，纳赛尔对美国记者苏兹贝格说，当时仍有280名共产党员关在监狱里，但另外340名已获释放。

曾受到宽容，而且确由纳赛尔通过哈立德·毛希丁编辑的开罗左翼报纸《晚报》鼓励过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公开讨论被限制。3月12日，在摩苏尔起义之后，哈立德·毛希丁连同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一起被解职。一周之后，在埃及和叙利亚都有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或同路人被捕。

埃及左翼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痛苦的窘境，他们力图将对纳赛尔的反帝国主义的中立主义以及增长着的社会主义计划倾向的支持与纳赛尔政府的反共和对民主自由的镇压这两者调和起来。

纳赛尔与莫斯科之间的裂痕逐渐被粉饰过去了。伊拉克的共产党搞得太过分了，变得很不得人心。这也有助于和解。卡西姆开始慢慢把矛头对准了他们。到了1960年年中，尽管卡西姆已接受了苏联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很明显，伊拉克共产党在走下坡路，它已失掉接管这个国家的机会。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设立共产主义政治根据地的前景无望的情况下，苏联人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去照顾卡西姆或阿拉伯共产党从而危及他们与纳赛尔的关系了。他们决定代之以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大笔投资。1960年8月，他们答应负责整个阿斯旺大坝而不仅仅是第一期工程的建设用外

汇开支,提供了一笔9亿卢布(8100万英镑)的附加贷款。他们早已保证给大坝一期工程提供3300万英镑,此外还将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工业化规划提供6000万英镑。苏联工业贷款的条件是十分优惠的——利息为2.5%,从有关工厂建成并开始投产一年后开始偿还,可在12年内付清。

1960年1月1日,纳赛尔在大坝奠基仪式上对苏联“无条件的援助”有一番热情过分的赞颂。他宣称,尽管大坝的物质目的是“极其重要的”,但它的最大价值是成为“阿拉伯人民的决心和独立意志”的象征。它说明“无论多小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就能干出伟大的事业”。

15个月前,随着1958年国际危机趋于平缓,纳赛尔曾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宣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不放弃对解放运动支持的同时,要求“将局势恢复正常”以便处理“稳定政治、稳定经济和提高国内生产力方面的紧急问题”。到了1960年初,似乎一个比较“正常”的局势正在中东出现。西方或苏联集团的干涉都少了;美国和苏联正通过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个人接触寻求改善相互关系。阿拉伯之间的斗争也更缓和了;对联合谈得少了,对独立国家间的团结谈得多了。

1960年7月9日,纳赛尔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全国联盟大会首届会议上发表讲话。他重申了共同的历史和语言使阿拉伯人成为一个民族,但他接下来对“我们争取联合”的原则重新下了定义。

第一,联合应通过自由和独立的选择和意愿来实现。第二,寻求联合的阿拉伯人民必须首先在“其现存边界内出现民族联合的可能性时,才能进而对边界以外承担义务”。(这可能是指像伊拉克、苏丹和黎巴嫩这样的国家,他们在维护不同教派和种族之间的民族团结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第三,有关国家的阿拉伯人民必须有决心,并对他们的联合意愿确信无疑。

纳赛尔补充说:“在这些基础上,我们相信联合应不断发展,而且不应当用政变来实现它。”



然而，在以后的两年内，纳赛尔与卡西姆的论战继续不断，只是激烈的程度时有变化，直至1963年2月卡西姆在由阿雷发上校领导并得到伊拉克复兴党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并被处以死刑为止。1961年，纳赛尔发现他自己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境地：为了保护石油王国科威特免遭卡西姆的侵略，他实际上成了英国人的暂时盟友，同时与苏联人发生了冲突。一小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技术部队在短时期内加入了阿拉伯联盟国家的混合部队。这支混合部队被派往科威特是为了接替于1961年夏赶赴这个新独立王国的英国旅。

纳赛尔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争吵也是没完没了，而且还不时沸沸扬扬。1958年，载送侯赛因的私人飞机在飞越叙利亚领空时遭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米格飞机的近距离骚扰。侯赛因认为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局蓄意对他的谋害。纳赛尔对这一指责予以轻蔑的否认。他称这只是许多同类事件的其中之一，原因在于侯赛因的飞机没有适当的识别标志。第二年，在纳赛尔发动了反共和反卡西姆运动之后，安曼和开罗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但休战是短暂的。广播战重新打响。1960年8月，约旦总理哈桑·玛贾利及另外10人被安放在他办公室内的一枚炸弹炸死。嫌疑犯逃往叙利亚。侯赛因又指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以激烈的言词攻击纳赛尔本人。1961年2月，当阿拉伯联盟面对约旦河水改道分流的威胁努力加强团结以抗击以色列时，纳赛尔和侯赛因之间又一次试图和解。但是6个月后，当侯赛因在分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大马士革政变后不到24小时就赶到叙利亚，喜气洋洋地承认这个分离主义政权时，争吵又猛烈地爆发了。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继续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给予支持。到了1961年，伴随着在埃维安举行的对法谈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已胜利在望了。但是，纳赛尔与突尼斯的布尔吉巴总统不和，布尔吉巴指责纳赛尔派埃及特工军官策划对他进行暗杀。1961年，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支持突尼斯打“比泽塔战役”后，双方和解

了。在此役中,有 1000 名突尼斯人死于法军火力下。纳赛尔和布尔吉巴在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会议上举行了 3 年来的首次会晤。纳赛尔还对伊朗国王发起猛烈的攻击并中断了与德黑兰的关系,原因是伊朗与以色列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伊朗通过以色列铺设的 16 英寸新管线从亚喀巴湾的埃拉特往海法的炼油厂输油。)

因此,纳赛尔从不缺少朋友或仇敌,尤其是后者。但与早些年相比较,纳赛尔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外的关注主要放在整个不结盟世界,尤其是非洲的事务上,而较少放在中东和阿拉伯问题上。

## 第十章

### “阳光灿烂的顶峰”：纳赛尔在世界舞台上(1958—1961)

20世纪60年代初,纳赛尔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他控制着阿拉伯世界中最强大的埃及—叙利亚联合共和国。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他还在数目剧增的非洲独立国家中享有领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内,他在由大多数亚非国家和南斯拉夫组成的不结盟国家这一更广泛的集团中的影响也是登峰造极。他之所以能连同印度的尼赫鲁、南斯拉夫的铁托、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一起成为“中立主义”的“五大领袖”,部分原因是他能在阿拉伯和非洲这两大集团中纵横捭阖。纳赛尔的这一地位在196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最高级会议”和1961年9月的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都得到确认。

由于不结盟国家加速推翻殖民主义的努力成功地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它们的注意力开始不断转向其他国际问题。贝尔格莱德会议对于遏制东西方冷战、阻止核军备竞赛如同对反殖民主义一样关切。在经济发展上缩小穷富国家的差距是1964年开罗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压倒一切的主题。但随着不结盟和亚非国家集团成员的增多,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却在不同的民族利益和重点的压力下开始减弱。随着1960年亚非国家间在刚果危机上的分裂,这种减弱的变化过程开始了。

1962年底,中国对印度发动边界攻势,美苏之间爆发了古巴

导弹危机,苏中的分裂增大。这些对于不结盟国家作为“第三势力”(它们称自己从未期望成为一个第三“集团”)都是严重的打击。整个世界分为东西方两大冷战集团,并由不结盟集团在这两大集团之间周旋的局面开始改变。美苏之间更直接地打交道,它们各自领导的集团则开始逐步解体;对于亚非国家,中苏间的斗争则是给西方国家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长期争斗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印度先是受到中国进攻的震撼,尔后又遭到尼赫鲁之死的打击,它在不结盟集团中的举足轻重的推动地位因而已不复存在了。在此情况下,纳赛尔更成为不结盟领导人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倾向于西方、苏联或者是中国的各派力量之间(他自己更倾向于苏联一些),尤其是这三方的争夺扩展到非洲的情况下,他掌握着居中的平衡。

在1960年和1961年,纳赛尔与其他中立主义领导人一样,最关心的是三个问题:不让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与非洲的,尤其是刚果和阿尔及利亚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混淆在一起;在巴黎首脑会议失败后,美苏间的紧张局面和军备竞赛的增长;这些危机对联合国前途的影响。

纳赛尔反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共产党的运动,以及他在1959年对赫鲁晓夫的蔑视,帮助他缓和了与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1960年,纳赛尔已经与英国、法国和原苏伊士运河公司解决了苏伊士事件所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还解决了运河公司国有化及战争破坏的赔偿问题以及对埃及资财的冻结和对英法在埃及的财产的扣押问题。1959年,与英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直到1961年春才互派大使。与法国的外交关系直到1963年才完全恢复。在华盛顿,纳赛尔有一段时间内被某些人看成是在中东起稳定作用的反共人物,在肯尼迪继承艾森豪威尔之后尤其是这样。美国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援助得以恢复,而且规模相当大。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美国对埃及的援助总计达5400万英镑。1960年8月,美国以相当于2080万英镑的当地货币价格售给埃



及 90 万吨小麦。(美援的 65% 用在资助埃及的经济开发上。)美援的很大一部分是用剩余食品的方式提供的,截止 1965 年对埃援助中断为止,美国总共向埃及提供了约 10 亿美元(3.5 亿英镑)。

纳赛尔与西方国家之间仍保持着基本上不信任的状态,然而其程度依随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反帝解放斗争的发展,以及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和东西方冷战的温度,在试图共处和激烈对抗之间来回波动。直至阿尔及利亚战争于 1962 年以戴高乐承认阿尔及利亚而结束,纳赛尔为支持阿拉伯世界解放运动所承担的义务阻碍了他与法国的真正和解。当时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者这一事实也阻碍着这一和解。妨碍纳赛尔与英国改善关系的首要障碍是英国继续在军事和行政上控制着亚丁和波斯湾的一些王国。纳赛尔不仅承诺向反对帝国主义残余统治的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提供积极的支持,而且相信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的地位并反对开罗支持的当地阿拉伯革命者,正在鼓励和组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敌人(有一阶段是伊拉克的卡西姆,或者是后来的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王国和在伊拉克转向后继承了《巴格达条约》衣钵的《中央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搞一个“伊斯兰联盟”。

纳赛尔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非洲解放运动和非洲国家中最激进和最富战斗性的集团搞在一起,这是与英国和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又一根源。肯尼迪政府于 1961 年 1 月上台后,美国对亚非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中立主义采取了更为灵活和谅解的政策。肯尼迪开始就中东问题与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进行私人友好通信。但纳赛尔在 1962 年 9 月之后与受美国庇护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就也门问题的冲突,又加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限制了美埃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西方舆论发现很难将积极的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主张与纳赛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报刊、电台对于西方的政策和行动的指责调和起来。共产党集团受指责的程度比西方要轻得多。对这种

不一致往好处说应归咎于纳赛尔和其他不结盟领导人虚伪的“双重标准”，往坏处说则应归咎于纳赛尔和苏联人秘密地联合起来破坏西方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

纳赛尔通过演说和接受采访多次试图阐明他的不结盟观点。他说，这与瑞士的“中立”模式不同。它不意味着一个国家从不站在哪一边，而是说一个国家的政策是独立形成的：是根据每一事例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而不是自动采取一个联盟或集团的态度。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说，“朋友就是朋友，敌人就是敌人”。如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批评美国和西方，这不是出于反美或反西方，而是因为它认为美国或西方的政策不公正。结盟意味着无论是正确与否，你都支持别人的政策；不结盟意味着：“我们将按事实说话，无论这讨不讨人喜欢。”

不论这样一种态度可能是多么值得称道，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通常都不能一贯这样做，除非是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或者是他们准备付出代价，吃苦头。

虽然不结盟国家关注军备竞赛和冷战的紧张局势，但它们不能回避对反帝、反殖或是反对所谓“新殖民主义”承担的义务。据说新殖民主义企图用经济垄断或军事条约来取代旧殖民主义的统治。在这一斗争中，即使它们不想隶属于世界上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即使它们要与东西方都友好，它们也不能保持中立，而且他们在意识形态或道义上也没有保持中立：纳赛尔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仍坚持反共。

1960年7月9日，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全国联合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说，在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时，“我们向今天的两个最大的强权美国和苏联发出了呼吁，向他们表达了我们的合作愿望”。苏联做出了“热情的反应，使我们能够在阿拉伯和苏联人民之间根据平等的原则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这种友谊的特点是紧密的经济合作，苏联参与阿斯旺大坝建设以及苏联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使这种友谊和合作达到

了高潮”。但是，纳赛尔说，“令我们十分遗憾的是”，美国尽管在苏伊士危机期间表现不错，但并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反应。对此，他责备了美国政策“与帝国主义力量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并责怪美国未能理解“阿拉伯人民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并能自由决定其自身的命运”。（但纳赛尔与莫斯科的关系也会继续冷淡下去。）

纳赛尔的结论是，在受到强权之间核军备竞赛和不断高涨的冷战威胁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发展中的不结盟国家才能给世界带来“良知和公正”。

1960年夏天，全世界为巴黎东西方首脑会议的破裂所惊恐，这一破裂似乎使正增长着的改善苏美关系的希望化为泡影。对于冷战形势的这一恶化，不结盟领导人，其中包括纳赛尔，都深感忧虑。那年秋天，在著名的联合国最高级会议，即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他们的主要力量将放在帮助莫斯科和华盛顿重新举行首脑会晤上。但他们的忧虑加剧了：他们更难于发挥可能的调停人的作用了，原因是那年夏天的刚果危机将冷战引入了非洲的心脏，并威胁着联合国自身的生存。

从埃及革命的早期开始，纳赛尔就强调了非洲对埃及的重要性。在《革命哲学》一书中，他将非洲大陆称之为这场革命所连结的三个环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是阿拉伯环，第三个是伊斯兰环。关于这个非洲环，他说：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置身于目前正在非洲大陆心脏地带迅猛展开的500万白人与2亿非洲人之间的残酷可怕的斗争之外。我们不能置身其外，有一个重要而且明显的原因——我们自己就生活在非洲。非洲人民可以继续指望我们的支持。我们是非洲大陆北大门的卫士，我们是非洲大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纽带。

非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阿拉伯和伊斯兰这两个圈子紧密相连的。除埃及外，还有五个伊斯兰教徒占本国人口压倒多数的阿拉

伯国家——苏丹、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都属于非洲。而其他几个不属于阿拉伯世界的非洲国家，如索马里、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塞内加尔，其国民全是穆斯林；或者是像尼日利亚那样，有大量的穆斯林。但是，就像纳赛尔与亚洲和东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的情况一样，对他来说，伊斯兰或者阿拉伯主义的问题都没有反殖、反帝斗争中的共同外交政策和团结问题重要。正如纳赛尔与中立主义的印度之间的关系要比与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的关系更密切一样，也正如尽管伊拉克是个阿拉伯国家，他照样与努里的伊拉克相敌对一样，纳赛尔在非洲与激进、不结盟和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紧密配合，却常常与阿拉伯的突尼斯和有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尼日利亚产生不和。

前面引用的纳赛尔的话中带有埃及是当然的领导者的味道，现在叫人听上去是有点夸张了。但在1953年纳赛尔写下这段文字时，埃及是除了在1951年获得独立的利比亚之外，唯一摆脱了昔日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统治并取得了独立的非洲国家。非洲大陆上其他的独立国家仅有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同时埃及和南非也是非洲的最发达国家。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无论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还是阿拉伯—非洲人混血的苏丹，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受到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英国和法国统治着大半个非洲大陆，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控制着一些重要的非洲地区。

埃及当时在非洲最关心的是苏丹问题，尽管它早已通过联合国在实现利比亚和索马里的独立上开始发挥作用，并通过阿拉伯联盟给北非阿拉伯国家即马格里布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支援。

埃及希望苏丹人一旦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就会走与埃及联合的道路，以便确保尼罗河谷的统一。但苏丹在1956年取得独立的时候却使埃及的这一希望破灭了。苏丹人在尼罗河水问题上极力讨价还价，这成了建设阿斯旺大坝的障碍之一。在1958年初的一次边界争端中，埃及施加了军事压力，这使得苏丹与埃及关系紧张。



1958年喀土穆发生了一次政变之后，苏丹建立了以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为首的军人政权。此后，它与埃及的关系得以改善。纳赛尔对喀土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后，终于在1960年签订了尼罗河水协议，为大坝开工打通了道路。

纳赛尔的非洲政策有几个关键之处。除了埃及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尼罗河水、对阿拉伯和穆斯林非洲感兴趣之外，纳赛尔把非洲看成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并通过积极中立争取和平的斗争舞台。1955年的万隆会议已使这种斗争第一次蒙上了国际意识形态的色彩，它或许已成为纳赛尔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中最富有激情和理智的一部分。正如阿拉伯联合一样，非洲的联合在纳赛尔看来似乎也是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一面。非洲国家之间更强大的联合和更紧密的合作对加强它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影响和经济力量是积极有利的。从比较消极的意义上讲，非洲的团结像阿拉伯的团结一样，可以成为保护非洲国家和埃及自身免受外国，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防御武器。非洲国家的解放通常会意味着西方，尤其是英国军队的撤离；获得解放的国家采取不结盟政策会导致西方军事基地的拆除。这会减轻东西方在非洲搞冷战的危险，还会除掉使埃及有可能再次被征服或受到政治军事压力威胁的大本营，这种威胁一直是纳赛尔的一块心病，苏伊士战争更加重了他的这一忧虑。

纳赛尔希望通过支持非洲解放运动，不仅可以牵制英法帝国主义，而且还可为未来找到有用的朋友和盟国。非洲国家独立后可在联合国获得投票权，并可在世界事务中赢得某些影响。纳赛尔想要调动起这些力量来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支持阿拉伯事业，以及在埃及直接卷入争端时支持自己一方。后来若干年中，当以色列开始讨好黑非洲国家时，限制以色列的这种影响就成了纳赛尔非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但最终又是最不成功的目标。

纳赛尔将潜在的亚非联合集团视为可在国际政治中讨价还价

的因素。他希望在这样一个集团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可以给埃及带来威望、影响以及可能的物质援助等好处。

如同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作出反应以及调动阿拉伯民族主义那样，纳赛尔从两个层次上接近非洲民族运动——通过政府和人民或非官方组织。起初，侧重点放在民众运动上，因为几乎无法和非洲政府打交道。埃及给了非洲民族运动以鼓励和庇护，一些民族运动组织将它们的流亡总部设在开罗，并且开罗电台为宣传它们而提供了特别节目。1958年初，亚非团结运动这一官方和非官方组织的混合体在开罗举行了首次会议，它还在开罗设立了常设书记处，秘书长是一位埃及人。这一组织和万隆会议不同，它还包括有中国和苏联的代表。对于为什么要把中苏包括进去，埃及官方的主要论点是亚非人民最关心的是反帝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谈不上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埃及因为自苏伊士危机以来得到了苏联人的经济援助，因而对他们产生了义务感，另外还有苏联人可能答应修建阿斯旺大坝的前景。然而，在埃及的策划之下，亚非团结运动对苏联人和中国人来说逐渐变得徒有其名，而没有成为他们向非洲施加影响的工具。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纳赛尔的兴趣转移到了非洲政府及其发展组织上。在1958年4月于阿克拉举行的非洲独立国家首届大会上，出席会议的8个国家中有5个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苏丹、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其他与会国是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及新独立的加纳。1960年6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二届非洲国家大会上，被邀请的国家增至15个（有两个未出席）。尽管加上了阿尔及利亚临时逃亡政府，阿拉伯国家现在反而居少数了。

阿克拉会议的决议为将整个非洲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以及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制定了共同的政策纲领。决议支持在敌对的国际集团之间搞不结盟，并提倡创立一种“非洲特色”并且要在万隆会议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

通过一项统一的对外政策加以表述。

1960年夏天出现的刚果危机是对非洲国家是否有能力扮演卓有成效的国际角色的首次重大考验。纳赛尔对此极为关切，他向当时的刚果总理帕特利斯·卢蒙巴许诺给予充分的支持，包括提供军火。这时卢蒙巴正在游说争取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以防美国和联合国都不帮他结束加丹加的分离，不帮他抗击比利时军队和雇佣军。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参加1960年8月由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举行的非洲“小型最高级会议”的13个与会国之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部队，即500名伞兵加入了亚非国家部队的行列，成为派往刚果的联合国部队的一部分，尽管在几个月之内这些部队继刚果中央政府在卢蒙巴和卡萨瓦布总统之间发生分裂之后撤了出来。

非洲国家起初尚能在处理刚果问题时维持共同的政策。在利奥波德维尔，它们同意支持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并谴责“加丹加的分离主义和殖民主义阴谋”。但是，到了纳赛尔去联合国参加1960年9月22日至10月4日的“联大首脑会议”时，非洲团结开始出现裂痕。分裂是随着刚果中央政府的破裂而开始的。当时卡萨瓦布总统在蒙博托将军的帮助下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卢蒙巴将此行动斥之为违宪。比政变本身更有争议的是驻刚果的联合国官员在政变发生时所采取的行动。应卡萨瓦布的请求，联合国关闭了刚果的机场和电台，只有它自己的飞机和人员例外。这就意味着卢蒙巴不能够通过广播把追随者召集起来，也不能使用当时由他调遣的苏联飞机调动各省支持他的军事力量。采取这一行动的联合国代表安德鲁·科尔迪耶辩解说，为防止刚果陷入内战，有必要采取这一行动。但它的效果是阻碍了卢蒙巴一派且激怒了苏联人。苏联人连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加纳大使一起被卡萨瓦布驱逐出了刚果。纳赛尔谴责了比利时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所做所为。作为报复，他将比利时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有财产（价值约1500万英镑）都予以没收并收归国有。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发表的一连串

怒气冲天的讲话中要求哈马舍尔德辞职，他拒绝同哈马舍尔德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合作。他呼吁对联合国秘书处按“三驾马车”的路子重新改组——用分别代表西方、共产主义世界和中立派的三方委员会取代秘书长，该委员会的决议必须是一致通过才有效。这就意味着将否决权从安理会延伸到秘书处的行政活动中，其中包括执行联大决议。

所有的亚非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内，都拒绝了苏联的“三驾马车”计划。如按此计划，那么这些国家在联大的影响就会遭到削弱。几乎所有的亚非国家，仍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都支持哈马舍尔德，尽管有许多国家批评了联合国官员对刚果事务的处理。但亚非国家在谁是刚果的合法代表这一问题上，以及在怎样以亲西方或中立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势力被逐出刚果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其基本点是中立主义者应如何保持中立——又被导致非洲国家不团结的其他几个新因素给加深了。首先是在 13 个新近独立的法语非洲国家中有好几个仍处在强大的法国经济和军事影响之下。

其次，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愿意中立与不太愿意中立者之间的分歧被摩洛哥对毛里塔尼亚的领土要求所引起的争端弄得更复杂了。这导致了摩洛哥与突尼斯之间的一场争吵。突尼斯支持其他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承认毛里塔尼亚的独立。

在这些问题上，非洲国家分成三个主要派别：第一个发展成所谓的卡萨布兰卡国家集团。恩克鲁玛、纳赛尔和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是这一集团的领导核心。这一派中包括最激进的国家、卢蒙巴派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对西方政策、对联合国官员的行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

另一派由 11 个法语非洲国家组成，其中领头的是象牙海岸<sup>①</sup>，刚果（布拉柴维尔）和马达加斯加。他们后来形成了非洲国家

---

① 现为科特迪瓦。——编者



中的布拉柴维尔和蒙罗维亚集团。在法国的强大影响下，它们毫不含糊地支持卡萨瓦布反对卢蒙巴，对加丹加分离主义持纵容态度。它们主要是出于其反共和反中立主义立场支持西方政策，并批评其他一些比较激进的非洲国家。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是很有影响的“温和派”，它包括尼日利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苏丹。它们对卢蒙巴和他的对手都不那么偏袒，对美国和联合国秘书处也不做猛烈抨击。

9月23日，纳赛尔飞往纽约（途中在马德里会见了佛朗哥）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赫鲁晓夫的倡议下，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的政治家，除戴高乐将军之外（当然，毛泽东也除外）都率领各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这届联大。这是纳赛尔除对欧洲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访问外，首次访问一个西方国家。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访问除纽约城之外的任何美国其他地方。这也是他首次在超出亚非国家范围之外的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上公开露面。他在公开亮相时和在与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麦克米伦及其他世界级领袖的会晤中都是举止威严。在9月27日的联大大会上致词时，纳赛尔语调平静，比较克制。他抨击了在刚果的“帝国主义用心”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他呼吁让阿尔及利亚通过由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进行自决，并重申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阿拉伯政策和立场。但他讲演的主要侧重点如同在私下会晤时一样，是放在世界和平问题和缓和两大集团间冷战紧张局势的必要性上。他说，必须把联合国当作维护和平的最佳组织来支持，不结盟国家在给冷战降温方面可发挥很大的作用。

纳赛尔回国后在两次公开讲演和对国民议会的一次讲话中通报了她的出访情况。他说，他之所以去纽约，是因为在与其他亚非国家和积极中立主义领导人磋商后感到，由于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这个世界正面临着—场能将它毁灭的危机；世界的命运不能交付给两个敌对的阵营。“当战争降临时，我们对头—颗原子弹会投向何方是没有把握的。”新独立的国家或许能帮助缩小东西方之间

的分歧。那种认为不结盟国家需要世界局势紧张以求得两大集团都给予援助的想法是“误解”，因为军事集团的扩张只能导致战争。这就是中立主义领导人（他本人、尼赫鲁、恩克鲁玛、铁托和苏加诺）为什么起草了一份联大决议，呼吁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会晤的原因。

虽然五位中立主义领导人的提议未能在联大获得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赞成票，但纳赛尔称这一投票仍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支持这一倡议的。这一提议以及纳赛尔在联大的讲演是纳赛尔出访纽约的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三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与世界上领导人的会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美国要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展友谊。纳赛尔回答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想建立这种友谊，但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向其提供军火是建立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障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要抵制在非洲的一切“帝国主义影响”。纳赛尔觉得这次会晤是“朝着阿拉伯—美国友谊迈出的建设性的一步”。（艾森豪威尔记述他在这次初次会晤时对纳赛尔的印象时写道：“刚一会面，他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他身材高大、强壮、生气勃勃。他的相貌，黑眼珠和带有灰白鬓角的黑头发，给了他一副生动的外表……他很快就谈到了具体问题。”）

纳赛尔说他在美国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他努力向美国人民解释了阿拉伯的观点。

世界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把我们（阿拉伯人）描绘成野蛮人和捣乱鬼……纽约市民以为会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欺骗美国人民所说的那样，看到一个大叫大嚷、狂言乱语的阿卜杜勒·纳赛尔，他们当时正是期待看到我是这个模样。但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反映了这一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的真实情况。

纳赛尔简单提到了他与安东尼·艾登的继任人、英国首相哈

罗德·麦克米伦的两次会见。这两次会见导致了一项与英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他与卡斯特罗举行了一次“最引人入胜的”会谈。他感到与卡斯特罗之间有一种革命同志式的亲密关系。

但他提到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两次会晤才是最为热情洋溢的。他们重温了“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旧谊”。为了巩固这种友谊的基础，他与赫鲁晓夫之间就他们在1959年相互关系中的危机作了“坦率会谈”。

到了年终，刚果内部的和非洲各集团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联合国大会承认了卡萨瓦布总统任命的政府为刚果的合法政府。接下来，卢蒙巴被捕，在东部的斯坦利维尔省建立了以基赞加为领袖的卢蒙巴派政府，该政府称自己为合法的全国政府。

应摩洛哥国王的邀请，1961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摩洛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纳、几内亚、马里、利比亚、锡兰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临时政府之间的“首脑”会议。这是纳赛尔对阿拉伯西部马格里布国家的首次访问。

卡萨布兰卡会议基本上是亲卢蒙巴国家的一次聚会。它集中讨论了三个主要的议题：刚果、以色列和非洲政治联合的构想。在会上，纳赛尔敦促卡萨布兰卡国家应该实施它们当中有的国家已提出过的从驻刚果的联合国部队中撤出的要求，除非是哈马舍尔德和联大接受重新授权的必要。它们还应向基赞加政府直接提供军援。当时在1.75万人的联合国驻刚果部队中，有1000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军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表明它是唯一准备向基赞加政府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但苏丹已拒绝让任何未经联合国批准的物质通过其领土领空运至斯坦利维尔。

斯坦利维尔与外部世界的主要联系需通过开罗，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直接援助仅限于提供一部电台和一些技术人员。

纳赛尔听从了恩克鲁玛关于政策需更谨慎一些的劝告。恩克鲁玛反对给基赞加以单方面的军事支持并敦促继续通过联合国采

取行动。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装备缺乏将会使得向基赞加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成为一项冒险举动。这种行动,尤其是若被怀疑成有共产党的背后支持,那就会导致对卡萨瓦布政府也提供援助的对等行动,那么刚果就会更深地陷入内战和外来干涉之中。作为某种补偿或替代,纳赛尔征得了恩克鲁玛的同意后搞了个谴责以色列是一个“帝国主义基地”的决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能够让非洲国家会议同意一项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他坚持这么搞可能是受到了已在西方报刊开始流传的谣言的刺激。谣传说以色列正利用设在内盖夫地区迪莫纳城的由法国援建的秘密核反应堆制造一颗原子弹。在来卡萨布兰卡前不久,纳赛尔已宣称,如果证实确有其事,那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不得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即使我们不得不动员 400 万人也罢”;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向以色列提供核武器,“那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原子武器”,那就不是中立与否,而是关系到未来生存的事了。

卡萨布兰卡会议决议呼吁非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团结起来,并且呼吁制定一部非洲宪章,其宗旨是取消非洲大陆上的殖民主义和外国军事基地。

纳赛尔在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成果作了评估。他将这次会议描绘成“体现了非洲团结和共同反帝的意愿,并且挫败了帝国主义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将整个大陆分割成阿拉伯和黑非洲的图谋,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纳赛尔已经意识到在一些“黑非洲”国家中存在着一一种比较愿意搞一个它们自己的组织,将阿拉伯国家排除在外的倾向,它们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某些事情——例如与以色列的争端——与非洲大陆无关。

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刚果事件之后在黑非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卢蒙巴在加丹加被杀害,使大多数非洲人深为震惊,卢蒙巴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象征;出现了通过谈判达成解决的各种尝试;1961年9月与联合国部队发生的首次加丹加冲突遭到惨败;哈马舍尔德 1961年11月因空难而死;一年之后在新任秘书长



吴丹的领导下,联合国在加丹加的第二次行动更为成功一些。这儿也不可能充分记述那些使相互争夺的非洲集团最终成为一体,即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会议。只要说在后面的两年中,非洲的统一和刚果的统一至少被证明为几乎与阿拉伯统一一样难以捉摸就够了。在围绕这两个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纳赛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由于更多的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走到了前列,纳赛尔对非洲事务的影响有所减少。即使在非洲阿拉伯国家中,在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获得独立后不久,革命的步调也是由富有斗争性的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本·贝拉来定。然而,纳赛尔能够防止他所担忧的那种阿拉伯与“黑非洲”国家之间的分裂。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诸如加纳和几内亚这些更富有战斗性和更激进的非洲国家连在了一起,这有助于增强它们的思想影响,最终使非洲统一组织达成协议,同意为非洲解放运动的事业和在国际上不结盟或不承诺的立场承担义务。这还有助于保持非洲施加压力以支持阿尔及利亚关于自决和独立的要求。这一因素必定在戴高乐的决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戴高乐决定结束这场夺去了成千上万阿尔及利亚人生命并两次将法国自己推向内战边缘的战争。

然而,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自身而言,从纳赛尔富有战斗性的非洲政策中所得到的成果,除了道义上的满足和获得威望之外,却不是那么显著。纳赛尔无法阻止以色列通过巧妙的外交和技术援助在黑非洲国家里所取得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他怀疑美国秘密资助和鼓励以色列提供援助,把它当成了抵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影响的工具。美国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容易把纳赛尔的非洲政策仅仅看成是苏联政策的扩展,认定纳赛尔是莫斯科的工具,是在报答苏联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纳赛尔政策的主要收获或许是,他在中东和非洲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之强使他从苏联和美国都获得了急需的经济开发援助。假如他像苏丹或者尼日利亚那样在非洲事务中扮演一个更谦恭、更温和的角色,那他还能取得这么多的成

果吗？或许不能，但他也会避免一些由于他的战斗性非洲政策而引起的与西方国家之间常年不断而且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摩擦。

毫无疑问，纳赛尔的头脑中盘算过这一切利害关系。某种不同的考虑有时也可能对纳赛尔非洲政策的方式和范围有所改变，但这不大可能改变政策的实质。纳赛尔除了是一位有心计的政治家外，也是一个富有感情和强烈信念的人。的确，无论他采用的一些方法可能看起来是多么不道德，但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是个有道德的人。如果不承认在他的一些最真诚的感情中有着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激烈仇恨（对这些字眼，西方人喜爱在书写时打上怀疑的引号。但在非洲或亚洲，很少有人不认识这些标志着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可恨的经验的象征），那就不公道了。对于那些吃过帝国主义苦头的人（无论是亚洲人、非洲人或是阿拉伯人），对于他们自尊自强自立，为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赶上世界上更富裕、更发达国家的努力，他抱有同等炽烈的同情。正是由于他急不可待地盼望着见到帝国主义的完结和这些努力的成功，才反映出他是一位革命家。

但在1961年夏天，非洲的动荡比起两个核大国之间存在的似乎是更大的战争危险，又一次成了小巫见大巫。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在5月份举行的维也纳首脑会议，远没有像不结盟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缓和了紧张局势，而是使局势更为紧张。赫鲁晓夫决定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肯尼迪决心向赫鲁晓夫证明他决非弱者，他的反应是派遣更多的美国部队去欧洲并增加了美国在南越的军事承诺。赫鲁晓夫又以修建将柏林城一分为二的柏林墙作为对抗。他还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而在过去两年中，在日内瓦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同时，苏联暂停了这种试验。

正是在这一阴暗的背景下，纳赛尔与其他23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1961年9月1日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会议的筹委会在开罗召开。如会议认为符合不结盟条件的国家必须推行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个国家既不应参加诸如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中央条约组织这样的多边军事同盟，也不应与大国结成双边军事同盟。它也不应心甘情愿地让外国军事基地设在其领土上。最后，它还应该承诺支持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28个非洲独立国家中只有10个参加了贝尔格莱德会议。突尼斯和尼日利亚是在最后一刻才得到邀请的：受到冒犯的尼日利亚人谢绝出席。

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召开以及它给不结盟下的定义表明，该会议在其中立主义的宗旨下仍倾向于反对西方强权，原因在于西方大国的殖民主义活动以及它们在刚果的政策。也表现出对苏联持更仁厚宽容的态度。然而，在得到纳赛尔支持的尼赫鲁和铁托的领导下，会议对苏美冲突比对反殖斗争给予的关注还要多。纳赛尔在演说中强调了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必要性，后来还提议会议应呼吁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重新谈判。

纳赛尔抨击了西方的军事基地和新殖民主义并谴责法国和葡萄牙动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镇压阿尔及利亚人和安哥拉人。他还批评了苏联恢复核试验的决定。他说，这个决定“令我同世界舆论一样感到震惊”。贝尔格莱德会议的最后公报未能写进对苏联试验的抨击从而激怒了华盛顿。会议决定向华盛顿和莫斯科派出特使，敦促两大集团开始谈判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战争威胁。当尼赫鲁和恩克鲁玛动身前往莫斯科劝说赫鲁晓夫、苏加诺和马里总统莫代巴·凯塔飞往华盛顿试图劝说肯尼迪时，纳赛尔回到了开罗。他面临的是一场内部危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处于分裂的边缘。

## 第十一章

###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兴衰(1958—1961)

鉴于 1958 年以后国际上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直接压力的缓和,纳赛尔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到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内部事务上。当他试图把当时正在埃及试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搬到叙利亚时,他发现自己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因为这些制度和体制是按埃及的具体情况发展起来的,它不适合叙利亚的国情。

当这两个国家开始合并的时候,纳赛尔本人对合并后社会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想法。但是从写入 1956 年埃及宪法的建立非党派国家政治组织的原则以及在第二年提出的创造“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和多方合作的社会”这一口号中可看出纳赛尔思想的端倪。他的思想倾向中有与加强同叙利亚的联合不相符的东西。从政治上看,这种倾向有些“右”倾,这不仅表现在对共产党人的压制,同时也表现在强调带有协商性的中央集权,而不是强调多元化决策;从经济上看,这种倾向又有点“左”倾,即倾向于实行公有制和国家计划,这种做法因 1961 年夏季发起的大幅度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运动而达到了白热化。

这些偏差在埃及可以被克服,因为纳赛尔本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他还控制着强大的军事和官僚机构。埃及国内的“左翼”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最初将工商业置于国家控制下的行为是外国人干的,而不是埃及人自己干的。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尽管大家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叙利亚的社会革命刚起步时,埃及的社



会革命已在工农业领域广泛开展了。要想在缺乏政治经济基础和像埃及那样强大的权力机构的叙利亚全面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纳赛尔需要叙利亚“左翼”力量的积极配合,尤其是需要得到倡导建立联合国家的那些人的支持。但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纳赛尔不仅取缔了共产党而且也冷落了复兴党人。他不信任复兴党人,当他发现复兴党领导内部之间的诡计和争吵时,他的反感更增加了。他开始在叙利亚军官中寻找思想比较保守、政治上相对独立的人做他忠实的盟友。他千方百计地努力避免因联合而导致叙利亚经济出现滑坡,所以他首先试图做的就是安抚叙利亚商业阶层。这样做的后果是当他倡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因1961年实施了一连串国有化措施而加快时(主要是为了与埃及的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他发现叙利亚小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左翼”势力的被压制及对伊拉克恐惧的消失(卡西姆已经开始控制共产党)而相对增强,并已开始背叛他。在处理叙利亚问题时,纳赛尔担心的是他究竟应控制到何种程度为宜。从叙利亚的政治现实考虑,纳赛尔需要与“右翼”妥协;而埃及的社会需要又使纳赛尔不得不转向“左翼”。为了平息叙利亚人的不满以避免让他们指责埃及统治了叙利亚,他有时也试图限制叙利亚领导人的独裁倾向。他赞成使用说服手段并采取比较自由的政策,但是他还不准备接受在叙利亚出现民主讨论的情况,因为这会给西方或苏联的外来影响提供温床并蔓延到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最终会破坏他在埃及的政治计划。结果,纳赛尔对叙利亚事务的干涉只是引起了叙利亚人的敌意而没能有效地推行他的政策。

在埃及,1956年宪法因苏伊士危机而暂缓执行。这部宪法规定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和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全国大会。1957年5月,纳赛尔任命他的三位亲密同事巴格达迪、毛希丁和阿米尔组成全国大会执行委员会,开始对参加议会选举的2500名候选人进行筛选并最终淘汰了几乎一半人。

7月份为争夺议会的350个席位而进行的选举有两个有趣的

特征：这次选举是强制性的而且首次对妇女敞开了大门。除了政府部长以外，大部分候选人和当选者属于中产阶级、职业男性、律师、记者、医生、高级公务员、前军官和一些商人、地主和农场主、村长及地方市长。贫困阶层中几乎没有候选人，主要原因是他们交不起50 埃镑的押金。当选者中有四位工人、七位公司雇员、两位妇女，但没有贫穷的农民。

国民议会于1957年7月22日革命五周年之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纳赛尔发表了就职演说。虽然候选人经过了精心挑选，但议会成员却没有仅仅成为官方的传话筒。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从前的一些政治组织有联系。这些组织包括“右翼”（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和“左翼”。国民议会于1958年3月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后被解散，在此之前它成为批评政府加强对大学的政治控制和虐待政治犯的论坛。取消对大学生的政治歧视的强大压力迫使教育部长卡尔迈勒·侯赛因辞职，但纳赛尔后来又恢复了他的职务。

1957年11月，全国大会在埃及成立，由萨达特任秘书长，并且按总统令制定了宪法。宪法第一章规定全国大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政治、社会和经济剥削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合作的社会”。

在1961年至1962年期间，这种制度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的和民主合作的社会”这一含义不清的口号一直是纳赛尔探寻有效的政治经济学说的指导原则。

在那些年里，被人们广泛谈论的“民主”对纳赛尔来说就是指全国大会和由它控制的群众组织，就是指国民议会以及它在小范围内展开的讨论；“社会主义”就是指国家对计划和投资的控制以及有限的财富再分配。最重要的词是“合作”，这不仅意味扩大农业领域内的传统合作，也包括政府和私人企业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进行“合作”的原则。

“合作”的观点在当时使纳赛尔的政治思想有了一定的凝聚力。在他看来，全国大会是一个政治机构，在此机构中，各个阶级的

利益冲突可以本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通过讨论和合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加以解决。在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拟定的六条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不仅要清除“封建主义”,同时也要消灭资本的支配权及其对政府的控制。自由军官们显然清楚政治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例如少数工业巨头通过政府的帮助以及华夫脱党授予他们的特权而控制了制糖、纺织和造船业。但正如土地改革的结果仍然使某些个人在国家的控制下掌握着整个农业一样,自由军官们看到埃及工业的发展也是由国家和私人一起推动的。他们看到了实施公私配合而使得埃及迫切需要的工业得到发展。在埃及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里,除了进行有限的土地改革和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外,新政权几乎没有触动埃及的经济体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新政权的全部精力都已投入为确保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政治革命中去了。均衡发展国营和私营经济的目标已在1956年宪法中体现出来。

从一个本质上推行自由企业的经济模式,通过一个“受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并不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政治理论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是对经济政治压力作出的反应。后来纳赛尔曾说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我们的理想,并且通过自己的奋斗发展了我们的理想。”在阿斯旺大坝建设中遇到的挫折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促使纳赛尔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西方撤回对大坝的援助以及在苏伊士危机其间和之后实行的“经济封锁”证实了纳赛尔对埃及过分依赖国外资本所持有的疑虑。这也表明他曾经想让西方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全面援助埃及。(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有些过头,尽管援助从未达到如他期待的那样多。)西方国家通过对埃及国外资产的冻结而进行的“封锁”迫使埃及政府在对进口进行严格控制的同时鼓励国内厂家生产替代进口产品。埃及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且它不得不比以往更加依赖自己的资本来源进行投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本身显然说明,使用这种办法既能获

得更多的资本和外汇，也能减少对外国资金的依赖。伴随着 1957 年 1 月所有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进出口机构的“埃及化”（它们不得不在五年内变成属于埃及所有的公司），“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经济组织”的职能是控制全部或部分属于国有的工业公司（包括钢铁、矿产、化学品和纺织品），同时还负责接管英国和法国遗留下的财产。埃及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和保险业都是法国的遗产。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没收来的或埃及化的公司移交给“经济组织”，而不是卖给埃及的私人企业。这是走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第一个重大的步骤。当由 200 人组成的技术秘书处和吸收一些外国专家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受命起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时，新建立的工业部已准备好了将于 1958 年生效的五年工业发展计划。此计划的目的是使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在五年内从 6% 增长到 16%。政府将提供所需投资的 61%，主要用于重工业或埃及的新兴工业，但它同时也希望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用于工业发展（这也是土地改革的一个目的）。

由于吸引私人投资并没能达到预期的规模（当时外国援助相对短缺），加上很难对私营企业实施有效的计划控制，因此，纳赛尔同埃及的商业阶级开始发生冲突，为此，他逐步加强了国家对投资的控制并最终实行了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国有化运动。从 1960 年开始，纳赛尔就清楚地看到埃及大资本家的抵抗和拖延态度对他的权力形成了挑战。与此同时，他还担心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会为另一种腐败打开方便之门，政府官员们很容易因批准有关发展计划的合同或帮助做进出口生意的亲戚、朋友而受贿赂。（在一起臭名昭著的受贿事件中，一位高级官员和他的工程顾问收取了占“解放省”工程费 1% 的佣金，“解放省”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农业发展计划。）一种巨大的危险已经出现，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与前自由军官及技术专家建立财政和社会联系而重新回到政府的核心权力机构。



由于纳赛尔感到革命的势头正在减弱,而且渐渐迷失了方向,他的忧虑更加重了。土地改革已陷于困境。从经济角度上看它是成功的:在土地所有制改变的刺激下和政府通过“监督合作社”系统提供贷款和技术建议的情况下,经过再分配的土地的产量提高了。然而,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措施,这次土地改革却不太成功。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大约100万农民及其家庭受益,但这些人大约仅占整个农民阶层的5%。数百万农民仍然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其余一些农民也只拥有或租用地主很少量的土地。由于土地和就业机会均极端缺乏,再加上佃农和农场工人极少公开提出抗议,因此政府没有重视用立法手段来限定土地租金和最低农业工资。报界曾指责政府逼迫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必须交付购买土地的资金和利息。在1960—1961年度,农民的情绪非常低落,因为这一年棉蚜虫泛滥成灾,棉花收成极为糟糕。尽管法律对个人或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作出了限制,但还是有人想方设法多占有土地。通过购买国家分给亲戚的土地和冒领土地等手段,革命前拥有不超过200费丹<sup>①</sup>土地的大地主现在则可能掌握了多达2000或3000费丹的土地,因此这些人在各自所在的地区仍保持着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埃及革命曾把大地主的这种势力看作是“封建主义”而极欲将之彻底根除。

在国际上,埃及在1958年的“胜利之年”后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但与伊拉克的卡西姆却仍在争吵不休,同时纳赛尔在叙利亚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不过,埃及民众却从未感到自己和上述两件事有什么关系。“阿拉伯民族主义”此时还无法鼓动起所有的埃及人,除非是遇到了国际危机。纳赛尔一定已认识到需要有一种新的政治动力来推动革命的继续前进,并促进社会经济更快地向前发展。如果埃及的发展步伐缓慢,它就会因本国人口的增长和发达国家的进步而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就是实行以国家

---

<sup>①</sup> 费丹为埃及土地计量单位,1费丹约合6.3市亩。——译者

计划和财富平均分配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这种决策做出之后,埃及政府很快又面临着一个从革命开始就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如何有效地发展经济还是应该首先考虑社会公平问题。政府首先强调了生产和效率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但这种政策带来的经济上的收益似乎并不能够抵消政治上的损失,所以国家一方面鼓励私人投资,一方面又在较大程度上重视平均分配财富的问题。

为了控制资金来源,政府于1960年将米斯尔银行国有化。该银行是埃及国内资本最雄厚、建立时间最长的金融、商业和工业联合体,它不仅拥有国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同时还拥有占埃及工业产值约20%的工业企业。这是在1960年实行国有化时最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报纸和杂志也实行了“社会化”,其形式是在全国大会的监督下实行半自治,但在读者看来,埃及的新闻界由此已失去了独立性,因而这一举措是不得人心的。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综合性五年计划,政府的宏伟目标是在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五年计划规定埃及的总投资为15.77亿埃镑,国民收入增长40%;叙利亚的总投资为27.2亿叙利亚镑(约为2.7亿英镑)。到1960年,政府已经至少控制了埃及资本投资的四分之三,但对实际产品的控制却依然微不足道。占埃及国民总产值大约三分之二的产品,包括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仍然不受政府的控制。

在1960年7月举行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全国大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和新的国民议会(埃及任命400名成员,叙利亚任命200名)开幕式的讲话上,纳赛尔强调了社会公正和加快生产步伐这个主题,同时也提到了发展混和经济的问题。但其后不到一年,纳赛尔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和私人资本难以为贯彻五年计划而进行合作。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家对这一计划的抵制,也可能是因为这种计划方式的效率低下,或两者兼而有之。纳赛尔的解决方案不是修改计划,而是让政府直接控制生产活动。接着他又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起了所谓的“社会革命”或“二次革命”(第一次“政治革

命”确立了独立自主权并且摧毁了“封建主义”势力)。1961年6月,政府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国有化措施和其他一些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政府接管了整个棉纺业并且控制了所有的进出口公司。1961年7月23日,即埃及革命9周年纪念日,纳赛尔宣布将大部分埃及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其中包括所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有的重工业或基础工业,如电气和电力运输业。在86个中型公司中,政府将其一半的股份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而在另外117个公司中,政府规定私人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1万英镑,其余部分则收归国有。小型轻工企业、“非剥削”行业和服务业没有受到触及。

与此同时,政府还实施了一些旨在进行财富重新分配和加强工人在企业中的主导地位的新措施。个人占有土地的限额由200费丹削减到100费丹,租赁土地最多不得超过50费丹。农民也不再支付农业和合作信贷银行贷款的利息(政府已减少了土地改革中购买再分配土地的农民的贷款利息并延长了偿还期限)。任何公司的职员年收入不得超过5000英镑,对于总收入超过1万英镑者将征收高达90%的累进所得税。

工人或雇员将有权得到公司利润的25%。他们在公司管理机构中可以按1:7的比例拥有自己的代表。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减少到7小时,工资不变。

7月23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发表演说时讲道:“这些措施的实施已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仇恨、暴力和报复情绪的新时代……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他强调要更为均等地分配财富,但声明所有被国家征收的财产均已得到了补偿:对地主的处理很宽容,他们留有100费丹土地,而无地的农民仅仅得到5费丹土地。

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人民的生活方式(纳赛尔讲道),我们不应只盯着亚历山大、开罗或大马士革闪烁的灯光……我们应透过大城市耀眼的灯光看出存在的问题。应该看看乡村农民是如何生

活的。他们靠为地主打工而得到的薪水生活。他们一年中有四五个个月干农活,而其余时间便失业在家。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子女。那么四处打工的农工的生活又是如何呢?他只能靠最低薪水生活。5年前,我访问了考姆·奥姆波(在靠近阿斯旺的上埃及)和那里的工厂。每个工人的午饭都是干面包和一个洋葱。我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难以忍受这种生活条件吧。

“没有经济上的公正和社会的平等,”纳赛尔说道,“只是没完没了地进行争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然而,很快就有迹象表明,新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弱点之一就是缺乏一个有效率而又讲民主的政治组织来实施这场革命。

尽管7月法令没能使埃及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变成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二人口从事的农业和小企业依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它毕竟使埃及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这些法令是由纳赛尔一手制定的,事先几乎没有在全国大会、国民议会及新闻界中进行过任何讨论。它们是以行政方式执行的行政决定。也许曾经对执行法令的方式有过某些批评意见,但基本政策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过。

在埃及,随着政府控制的逐渐加强和公有制的逐步扩大,多年来政府至少也为实施这些激进的变革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在叙利亚,除了近期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外汇控制之外,企业自主体制几乎没有改变。所以对叙利亚人来说,实施企业国有化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埃叙两国中都没有一个能够以民主方式有效地处理如此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的政治组织。

尽管成立了全国大会和国民议会,但埃及实际上仍然由纳赛尔通过强大的官僚体制来治理。革命以后,从前的军官和专家治国论者现在成了各部及国营经济和文化部门的统治力量。所有重大决策主要由纳赛尔本人做出,尽管他不时地同各部部长及自由军



官组织的老伙伴们进行磋商。在任何危机的时刻，纳赛尔所依赖的力量，仍然是忠实于他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由这些构成的网络不仅延伸到军队内部，而且占据了关键的行政岗位，尤其是在情报和安全部门。纳赛尔念念不忘拓宽他的政治基础。但在不允许政党存在的情况下（纳赛尔不愿让政党存在），他和自由军官们显然没弄明白像全国大会这样的组织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据说成立全国大会的目的是为了调动起全国民众的政治热情。国民大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政府都有联系，它们可以讨论政府的政策并提出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全国大会的高层机构和国民议会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呢？有一种解释是纳赛尔在试图克服广大民众的被动性。他在描写1952年革命时绝望地记载道，当军队的先头部队冲进旧政府的堡垒时，环顾四周，竟然没发现一个追随者。同时，他还担心民众在出现危机时表现出极端主义的倾向，正如在革命年代里表现出的那样。他不相信埃及人具有不搞帮派主义或不依赖来自西方或东方援助的政治意识。所以新政府对全国大会的态度如同对待它的前身自由联盟和后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一样是模棱两可的。这些组织是政府用来控制公众并指引他们走社会和经济计划道路的工具吗？或许纳赛尔心里有着双重目标，他既想从政治上动员和教育民众，同时又想把决策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旦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正如最终必然发生的那样，第二个目标就上升到主导地位。

全国大会是按金字塔结构组成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大众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大概是在村、镇和地区一级建立的基层组织。它的地区委员会就是为了帮助埃及地方政府实行民主化和非集权化，并且成为在保守的农村推动社会和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位于金字塔顶上的高级执行委员会是由纳赛尔从支持他的部长和自由军官中挑选人员组成的。

叙利亚的情况正好相反，直到它同埃及合并以前，叙利亚一直有一个活跃的政党，还有一个不仅能够进行讨论而且还能够做决

定的国会，尽管国会的权力因为反对派制造恐怖活动和军队派系的争权夺利而受到一定的约束。叙埃合并以后，叙利亚的政党被解散了。这样做是为了用代表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全国大会来取代这些政党。根据1958年3月5日颁布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临时宪法，由纳赛尔总统指定了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民议会，其成员中有400人来自埃及，200人来自叙利亚。议会中有一半成员是埃及国民议会和叙利亚国会指定的，另一半则是从全国大会的全国委员会中挑选出来的。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一个中央内阁和两个“区”执委会，埃及是“南区”，叙利亚为“北区”。1958年3月6日宣告成立的第一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阁共有34名成员，其中叙利亚人占14名。四位副总统中有两位叙利亚人，其中一位是复兴党的阿克拉姆·霍拉尼，另一位是民族党领导人、前总理萨布里·阿萨里。前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埃尔·库瓦特里退居幕后，他获得了“阿拉伯第一公民”的荣誉称号。叙利亚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物萨拉奇上校成为内务部长。

尽管从理论上讲，复兴党已经按照官方解散党派的要求不复存在，但在一段时间里，它依然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它和复兴党人以及纳赛尔派军官一道管理着叙利亚的日常事务。在埃及，纳赛尔的统治依然如故。在处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共同事务时，纳赛尔与他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的心腹助手们共同负责决策。中央政府中的叙利亚部长们（如到埃及来任职的叙利亚军官）发现他们的意见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了。他们在开罗拥有美观的办公室和漂亮的头衔，但他们逐渐在叙利亚丧失了政治基础，同时也没有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得到个人的声望。

纳赛尔和复兴党从一开始就相互有一种误解，两者都自认为是叙埃联合的总设计师。用萨拉赫·比塔尔的话来说，复兴党人认为合并的目的就是使“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化”，这是阿拉伯国家走向更广泛联合的第一步。他们已经接受解散党派并以全国大会

取而代之，因此认为复兴党人应在全国大会和政府中担任领导角色。他们希望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全国大会的成立将不仅仅是埃及模式的延伸，而应在思想意识和组织结构中反映复兴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不仅适用于叙利亚，而且也适用于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甚至也适用于将来的阿拉伯联盟。他们认为纳赛尔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他的个人声望将给复兴党人的思想增加权威性。但对纳赛尔而言，复兴党仅仅是叙利亚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小角色而已。他首先依靠的是他同萨拉奇领导的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关系。他一开始并不希望因为与复兴党结盟而疏远同叙利亚其他重要政治力量的关系。他最关心的是核查叙利亚解散党派行动的进展状况，同时他还特别关注西方干涉的危险以及卡西姆统治的伊拉克共产党施加压力的情况。他想巩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不想在这一阶段让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加入联盟。他只希望它们支持他的折衷外交政策并予以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摆脱复兴党而依靠叙利亚各界民众，包括希望社会稳定并担心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商业阶层的广泛支持。对自己的政治领导人感到失望的大多数叙利亚人并不把纳赛尔看成是一名外来的埃及人，而把他看成是一位有威望的阿拉伯领导人来欢迎。在他们看来，复兴党搞的只不过是“没有纳赛尔的纳赛尔主义”。另外，纳赛尔根本就没想让复兴党人在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意识形态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将使他们在埃及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对此纳赛尔是不赞成的。复兴党人坚信前自由军官和官僚构成的埃及新的统治阶层形成的势力不利于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很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势力和特权。

在复兴党人看来，宣扬“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团结是一项传教式的使命：他们的热情博得了叙利亚大众情感上的响应，尽管他们在国会里仍然是一个力量薄弱的少数民族党派。纳赛尔可能同样也为阿拉伯团结的景象而激动，但埃及的处事原则是利益而非

情感。纳赛尔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就是说服疑心重重的埃及大众相信阿拉伯结盟在情感、实践两方面具有的意义。为了加强说服力,官方宣传机器开始强调埃及历史上的阿拉伯世纪和埃及文明中的阿拉伯成分。但是,普通的埃及官员或专家治国者只认为已被埃及接管的叙利亚(同埃及的 2500 万人口相比它只有 500 万人)现在应服从于埃及的利益。在敏感的叙利亚中产阶级看来,这似乎又使他们看到了近似殖民主义者的傲慢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试图对叙利亚从经济上进行带有破坏性的剥削。相反,叙利亚在许多领域因为国家投资的增加和埃及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帮助而受益。同埃及人相比,叙利亚商人因为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比埃及人赚的钱更多。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讲话时,纳赛尔宣布了合并后第一年国内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他说,这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制定计划和研究经济发展。叙利亚的重大变化大概是土地改革的开始,边远地区废除了部落法以及实行了一项耗资 5.6 亿叙镑(约 5600 万英镑)的五年工业化计划。新建了许多学校和大学校舍,扩大了农业工程和发展了筑路业。在埃及,大坝建设和新河谷开发有了一定的进展。后者是一项宏伟的农业发展计划,目的是开发连接尼罗河和与其平行的大片绿洲之间的荒地。在开罗城外的赫勒万,由西德提供资金并派出技术人员帮助修建的钢铁厂已经开始生产。该工厂成了鼓舞埃及人实现工业化的象征,同时也是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基地,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这个工厂好几年经营亏损,耗费了大量极为宝贵的国家投资。

埃及和叙利亚经济的合并遇到了四个重大困难,首先就是难以对付的自然灾害。长达三年之久的干旱严重影响了叙利亚的农业生产并且使 1960 年叙利亚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干旱使叙利亚从出口谷物赚取外汇变为进口小麦。第二个困难一度看来比第一个还严重,这就是叙利亚社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土地



改革实施的方式。叙利亚的土地改革比埃及搞得更广泛和更激进，它涉及到60%的耕地，而在埃及却只涉及到10%。但批评家们指责这次土地改革对叙利亚不同地区的土地状况和不同类型的耕作方式及农场组织考虑不够周到。

第三个麻烦是由于埃及试图使叙利亚也像埃及那样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而造成的。叙利亚商人在自由兑汇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了进出口贸易。如果将外汇管理制度延伸到叙利亚（如果两国的经济合并能奏效的话，这种做法也许是必然的），那就必须迅速而又细致地做好准备工作，以免使叙利亚大量的资金流向国外。最后一个困难是由于叙利亚根据1961年7月法令引进了新的递增所得税制度并对银行、保险公司和工业企业实行大范围的国有化之后产生的。

许多著作都写到了叙利亚自由企业的优点与埃及强加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协调性。事实上，叙利亚经济无疑需要注入较多的计划成分并增加公共投资。公共事业的薄弱使得私有企业的经营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在许多情况下它没能为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灌溉、国家社会和技术服务业提供资金。尽管叙利亚占有土地辽阔、人口少和教育普及率高的优势，但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叙利亚的财富分配并没有因这种优势而比埃及更公平。在叙利亚，尤其是在某些特定地区，土地改革作为一种社会需要其重要性与当时的埃及一样。然而，每个国家的条件不同，其经济和社会计划方式显然也应不同。对叙利亚规模虽小但效率较高的工业实行国有化，从经济上来说并不像埃及那样紧迫或重要，但这种做法却导致力量悬殊的反对派政治组织的产生。国有化进程本可以缓慢一些。纳赛尔企图在叙利亚实行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他没能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政治组织，而这一失误导致了纳赛尔和复兴党人的分裂。复兴党人本应顺理成章地成为纳赛尔在叙利亚搞社会主义的伙伴。这种分裂对纳赛尔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后同叙利亚和伊拉克打交道的多年里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最终

引发了 1967 年同以色列的战争。

1958 年 10 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产生了新的中央内阁,霍拉尼·比塔尔和其他复兴党人被调到了开罗,因而实际上只留下萨拉奇控制着叙利亚。复兴党人甚至在叙利亚地区政府中都起不到主导作用,这个政府是由一名非复兴党人、前政府官员努尔·卡赫尔博士领导的。1959 年 10 月,纳赛尔任命阿米尔作为他在叙利亚的总督,全权负责处理那里的经济和政治事务。阿米尔同意适当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以便缓和同叙利亚商人的关系。从政治意义来讲,他首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全国大会最后阶段的选举。事实上是萨拉奇安排了这次选举。选举结果对复兴党领导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已经因为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和对伊拉克的政策同他发生了冲突。复兴党在叙利亚全国大会较高级的委员会选举中只获得了总共 9500 个席位的不到 5%。当选的大部分人是叙利亚传统的保守阶层中的“独立人士”。复兴党领导人霍拉尼和比塔尔辞去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央内阁中的职务,其他两名复兴党军官也离开了叙利亚地区政府。34 岁的萨拉奇则青云直上,逐渐控制了叙利亚全国大会(教育部长卡默勒·埃丁·侯赛尔是他在埃及的搭档)。他是 1960 年 6 月由纳赛尔任命的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全民大会 18 人高级执行委员会中 6 名叙利亚人的最重要的一位。5 个月以后,萨拉奇被任命为叙利亚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地区政府的首脑,而且纳赛尔把阿米尔调回了埃及。直到此时,除萨拉奇以外,复兴党人及其在军界的同情者已完全被排挤出叙利亚和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

1960 年 6 月,纳赛尔任命了由 600 名成员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民议会,并于 7 个月后又要求议会制定一项新的永久性宪法。然而在叙利亚,阿米尔的隐退和萨拉奇的荣升标志着警察对国家控制的加强,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已同纳赛尔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激进的经济变革造成的影响不相上下。纳赛尔于 1961 年 2 月访问了叙利亚。在拉塔基亚讲话时,他表示他已觉察到这个国

家人民的种种不满。但他在贝鲁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联盟“崩溃已不会为时很久”的说法是“帝国主义花钱雇佣的人讲的”。他对叙利亚要求经济自由表示同情，可他问道，叙利亚的工业到底在哪里？他在拉塔基亚能看到的唯一工厂就是一家木材厂。关于对政治自由的抱怨，纳赛尔说道：“的确，任何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自己家里指点江山，而我们不会对他怎样。让他们对人民讲讲他们所谈论的‘我们要公民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改造党派’吧”。他又说，如果真有了党派，那么叙利亚的国会将永远也不可能讨论土地改革或社会问题。

纳赛尔没有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激进的经济变革引起的不稳定而踌躇不前。这种变革在前几年已在埃及有了一定的雏形。1961年7月公布的国有化法令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一次飞跃。但公布时并没有同叙利亚的国民经济部协商。在此后的三个星期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单一内阁。纳赛尔在8月28日告诉内阁，新中央政府“在革命新阶段”的目标就是团结和搞社会主义。因此要为消除地区主义而斗争。内阁部长的职位也不再按照公民出生地来分配。中央政府每年2月到5月在大马士革办公，其余时间则在开罗或亚历山大。所有的经济计划都实行高度的集中制，但在执行政策方面却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

萨拉奇在这一过程中被任命为负责内务的副总统并调到了开罗。纳赛尔把萨拉奇从大马士革撤回的目的也是为了恢复受萨拉奇警察高压统治的叙利亚人的信心。尽管萨拉奇留给叙利亚人民感情上一块疤痕，但他的安全工具却是纳赛尔留下控制叙利亚的有效的保障，至少在他同左翼疏远而他的经济政策又必然导致他同右翼对峙的严峻时刻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萨拉奇的“荣升”使纳赛尔失去了监视叙利亚军官的最重要的耳目。在军官中互相嫉妒逐渐加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队统治者的下层军官日渐沮丧。

像以前的叙利亚部长们一样，萨拉奇发现他在开罗也没有掌握实权。两个月以后，也就是9月15日，他又回到了叙利亚。显然

在没有请求纳赛尔批准的情况下他于 11 天后就辞职了。他的安全部门的几名军官也跟着被纳赛尔解职了。1961 年 9 月 28 日，一伙军官乘大马士革政府情报机构瘫痪之机迅速发动了政变，从而使叙利亚在一个星期内就脱离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从附近的一个军营开进了大马士革，抢占了无线电台和军队总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副总统，陆军元帅阿米尔和第一军团司令费萨尔将军实际上已被捕。政变的领导人中有右翼军官，他们和受到叙利亚商业界支持的人民政治家组织结成了同盟。商界人士中有与“五人小组”有关的人物，他们集中控制了银行、保险和工业企业。“五人小组”的法律顾问马穆恩·库兹巴里博士是前军人独裁者施沙克里的一个部长，他成为第一届分离政府的总理。政府主要是由技术专家、商人特别是银行家组成的。反叛者在他们的第一个广播公报中控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直在把叙利亚人推向贫困的深渊。它说：“我们反叛了那些背弃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滥用了公众和政府基金、实行了警察统治并把最好的军事人员清除出军队的人。”

政变领导人一开始即暗示他们并不想肢解联盟，而只是想改变它的形式。基于这种想法，他们答应同阿米尔进行谈话，但纳赛尔认为谈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因而拒绝讨论妥协。阿米尔和费萨尔将军接着就被释放并飞回开罗。

纳赛尔是凌晨 2 点或 3 点从收音机中收听大马士革电台广播时听到政变消息的。他后来说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同一天早晨 9 点钟，他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的声音不大，却因感情激动而发颤。他说，正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比苏伊士入侵还要严重。因为这不是一次外来侵略，而是对长期奋斗的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击。他表明他将永远不会宣布解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将作为阿拉伯人民斗争的堡垒和先锋。“我们要避免流血，”他说道，“但第一军队现在正从四面八方大马士革集结以镇压叛军。”



中午时分,纳赛尔认为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波和拉塔基亚仍然在抵抗叛军,他又命令 2000 名伞兵从埃及飞去援助,跟着就动用了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海军和更多的舰载陆军部队。可当第二天听说阿勒波和拉塔基亚已经失守落到叛军手中时,纳赛尔又撤回了出兵令。飞机和舰只也都撤回来,并指示已在拉塔基亚着陆的 120 名伞兵不战而降。纳赛尔说:“难道阿拉伯人要向阿拉伯人开战吗?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将这个联盟变成一个军事战场。”从军事上与逻辑上来讲,他知道要想夺回政权是不可能的,除非叙利亚军队中的主要力量仍然效忠联盟。

事实上,他巧妙地来了个因势利导。在随后几个星期,他在埃及做了几次公开演讲,其中在 1961 年 9 月 29 日的首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联盟所遇到的困难,分析了解体的原因。他让埃及和阿拉伯人民做好思想准备,不是以愤慨而是以沉痛的心情来接受叙利亚脱离的事实。首先,他清楚地表明埃及不会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他最关心的就是要防止埃及国内反对对阿拉伯世界承担义务。他同时也想在阿拉伯舆论界把导致首次阿拉伯结盟试验分裂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以前先澄清自己。

他在开罗全国大会总部外对群众演讲时,阿米尔站在他的身旁。纳赛尔说道,埃及人应该化悲痛为力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应当依然是阿拉伯主义的堡垒和中心”。在谴责政变者是“反动派、分裂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时,纳赛尔同时预言(事实随后就发生了),叙利亚人民将不会放弃他们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所取得的社会成果。土地改革结束了农业封建主义,结束了资本主义统治。

三天以后,在开罗大学讲话时,纳赛尔一面谈到分裂的后果,一面又谈到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新改革的一种推动力量。他坚信“挫折”(阿拉伯民族主义最严峻的时刻)是由于对“反动派”的软弱和妥协造成的。“挫折”也可以转换为清除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反动派的动力。

纳赛尔否认了有关埃及搞帝国主义并在叙利亚实行警察统治的说法。他说，叙利亚只有95名政治犯，其中70名是共产党人，20名是人民党人。既然他可以坐在敞篷车里毫无畏惧地周游叙利亚，人们怎么会说他是专制统治者呢？埃及对叙利亚没有任何剥削。曾在叙利亚工作过的现又被驱逐出去的埃及人有军官、医生和工程师，他们都是保卫叙利亚和为叙利亚人民服务的。国有化的法令仅仅影响到叙利亚15%的公司，而埃及则是300家公司实行了国有化。10月5日，纳赛尔再次反驳了埃及从经济上剥削叙利亚的指责。他引用了结盟期间为发展叙利亚工农业和其他项目花费的数字。三年半内，投资总额达28.62亿叙镑（约2亿英镑）。叙利亚的黄金储备一直没有动用。叙利亚也分享了苏伊士运河的收入，而它的军事开销削减了4000万叙镑。

也就是在政变一个星期后的这次讲话中，纳赛尔公开承认了联盟的解体。在开罗的广播讲话中，纳赛尔宣布他将不反对叙利亚再次申请加入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的成员资格。他说他讲话时“肝胆欲裂”，但依然号召把民族统一作为叙利亚的首要任务。埃及将保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称、旗帜和国歌。伟大的试验，至少暂时地来说，是结束了。

尽管纳赛尔本人在叙利亚大众中依然很受欢迎，但叙利亚人民并没有为“脱离”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叙利亚人民也并没有全部联合起来拥护这次变革。结果证明由军官和政治家组成的右翼反叛联盟同大马士革的一般的同盟一样脆弱。复兴党的领导人霍拉尼和萨拉赫·比塔尔都在叙利亚国会的“脱离”宣言书上签了字。但当霍拉尼继续支持“脱离”，同保守者合作并发起对纳赛尔人身攻击的时候，比塔尔开始醒悟自己在宣言书上签字是犯了一个错误。比塔尔和阿福拉克仍然希望寻求一个同纳赛尔合作并恢复统一的新基础。

几年以后，比塔尔描述了纳赛尔在叙利亚失败的原因，他以一名复兴党领导人和持续了一年半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成员的

身分对此作了评论：

纳赛尔总统是很有能力的，但其他埃及和叙利亚人都远远低于他的水平而且不能胜任他们自己的职务。部长们从没就广泛的思想进行过真正自由的商讨和争论。国内外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都是纳赛尔制定的。在能力和领导地位上我根本不能与他相比，但我想争辩的是其他人没有任何地位。联盟政府因此缺乏必要的机构。关于阿拉伯的民族意识，纳赛尔和其他埃及领导人也有着分歧。纳赛尔脱离了埃及人，崇尚阿拉伯民族观念及看法，个人的伟大眼光把他推到了阿拉伯主义领导人的地位……但1959年纳赛尔和复兴党部长们之间的裂痕是由某种埃及人对结盟的霸权主义观点而引起的。

比塔尔在1968年阿拉伯被以色列打败一年后又说道：

纳赛尔是第一位也是唯一能够领导阿拉伯复兴的阿拉伯领导人。但是在贯彻阿拉伯政策方面，他没能够接受其他阿拉伯进步领导人的结盟。

## 第十二章

### 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国民宪章(1961—196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分裂对纳赛尔的声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打击来临时,他作为一个阿拉伯人、非洲人不结盟中立主义领导人正有着重大的国际声望。此时正是埃及国内关键的时刻,纳赛尔所奉行的经济社会制度方面的新变革引起富有阶级的强烈不满。“脱离”和社会主义措施造成的双重震动动摇了中等阶级和军官们的信心。

纳赛尔相信政府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也许是1954年纳吉布事件后最严重的国内挑战。对于希望埃及独立于阿拉伯世界,以及埃及国内想要同样颠覆社会主义变化的人来说,叙利亚政变的成功是很大的鼓舞。这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威胁。

经过短时间的踌躇和斟酌,纳赛尔以其特有的魄力和斗争精神作出了反应。他改组了他的政府,起用了5位革命老战友为副总统,并且从防御转为进攻。他根本没有注意那些主张他改变国内和阿拉伯政策的人,而是在国内外发起一场更为强大的革命运动。他肯定了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作用和作为他的政策基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且阐述了两者在奠定新的“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关系。这使他能成功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埃及本身的发展上并保持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成为自由的社会主义阿拉伯国家的典范和鼓舞力量。



它随时都准备帮助其他阿拉伯国家从外国或国内的封建和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它不愿与其他没有解放的阿拉伯国家结成政治联盟,因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宪法上的统一;最能够期望一致的就是政策上的统一。这样,纳赛尔把对新的革命原则的宣传和实际上部分吸收埃及的阿拉伯旧政策结合起来,如同叙利亚结盟以前那样。目的是要在埃及领导下使阿拉伯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态度。

“阿拉伯革命”的第一声号角是由纳赛尔在1961年10月16日对全国电视讲话中吹响的。他宣布社会主义是通向正义之路。按纳赛尔的理解,社会主义意味着由公民分享国民收入、按劳分配,但必须有平等的机会。

纳赛尔从叙利亚的动荡中吸取了三项将来发展的经验教训。首先是他过于迁就“反动派”,错误地相信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事实表明,他们是反对阿拉伯统一和民族主义、拥护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纳赛尔可能曾设想同叙利亚保守者妥协,但他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的警告是针对埃及不安分的有产阶级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政府没能够建立一个适合革命任务的政治制度。官僚们没有成为革命变革的力量,而成了瘫痪的原因。国家的结构必须进行修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进一步深入人心。向“反动派势力”敞开全国大会之门,并让他们以此作为掩饰真相的门面是犯了一个错误。全国大会必须改组,让它成为“人民大众进行革命的工具”。

纳赛尔在结尾时给那些担心社会主义会冻结所有私有财产的人吃了颗定心丸。他不反对个人所有制,但反对“剥削所有制”。在新的条件下,土地所有制和不动产不再意味着剥削。各个领域的个体活动投资渠道仍然敞开,纳税后的利润仍是合法的,自由职业的收入也一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所有想工作的人来说是有前景的领地,但没有百万富翁施展的地方。

讲话后,纳赛尔紧跟着就对埃及的“反动派和封建主义”进行

了威慑性的打击,他认为:他们会利用这次危机反对他。同时,他以牺牲“资本家”的代价进一步推行社会主义化计划。约有40名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包括旧政府的政治家前华夫脱党秘书长富阿德·塞拉哥·埃丁和前大地主家族的成员都被逮捕了。成百上千人的财产被没收。几个月以后,被逮捕的都获得释放。但成千上万的人,最终达1.2万人被“隔离”,剥夺了政治和公民权利,禁止参与政治或公众活动,包括联盟或合作社的贸易成员。查封和没收持续了好几个月,其间,大部分失去财产的人是有埃及国籍的黎巴嫩、叙利亚、希腊或犹太血统的人。由于国有化法律而导致的外国或少数民族血统,尤其是希腊人民的外流,在1962年春天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如同那些在苏伊士危机后出走的人一样,他们带走了宝贵的技艺和知识。

没收的财富是巨大的,没收糖业巨头和工业家阿邦德帕夏的财富据说达3300万埃镑,弗朗索瓦·塔吉尔的为1200万埃镑。而其中最大的财富是一个大地主家族巴德若维斯的。对贫困阶级也作了让步。租金、车船费和消费品的价格都被降低,学校和大学的费用也都减少了。

11月5日,在一次长时间的内阁会议之后,纳赛尔公布了他曾经在广播讲话中所号召的政治体制改组的细节。这将分三步走。首先,一个由来自各行各业的(除反动派外)150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将筹备1962年1月召开的“民族大众力量大会”的选举。纳赛尔将向大会提交一份《民族国民行动大众宪章》进行公开讨论。按照这一宪章,将为构成全国大会的大国会委员会举行大选。大国会将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并且负责起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永久性宪法。

新的国会筹备委员会11月25日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下在开罗召开。警察压制无事生非者,帝国主义阴谋筹划从不同角度在他们控制的报界大做文章。纳赛尔在开幕式上的长篇讲话表明了他对全国大会未来的毫不妥协的新思想。他说,他曾经想把全国大

会变成一个调解冲突利益和不流血解决阶级斗争的大会。但反动派却利用了这种对和平的渴望而使阶级斗争变为不可避免。现在全国大会和政治活动仅向那些真正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士开放。

纳赛尔说：“在一些讨论中，有人建议像西方那样成立两个政党和一个国会。其中一个为执政党，另外一个为反对党。我在1956年也这样想过，但我看到了发生过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他们所讲的党派和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专制的代名词。”他说：在1952年前的国会里，只有帕夏和省督，没有一个工人。

然而，在纳赛尔继续参加的委员会电视辩论中，又提到了政治自由的问题。埃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哈里德·穆罕默德·哈里德，一位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改革者，号召立即恢复公民自由，结束对左派的政治迫害并恢复国会生活。他对纳赛尔说道：“总统先生，你的反对者们和我们自己仅有一个简单的争论：国会哪里去了？宪法哪里去了？反对派哪里去了？我认为我们开始做任何其它事情之前，应该回答这些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你的旗帜下走向政治成熟。”

纳赛尔回答说，穆斯林兄弟会员被逮捕和审讯，因为他们有一个“随时欺压人民的秘密军队，但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不是因为他们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对外国列强言听计从。纳赛尔对自己思想的解释，尽管是协商性的，到底在将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中适合与否，在委员会决定选举代表大会的构成和那些被“隔离”的人当中体现出来了。代表大会中的席位将通过一个复杂的方式在某些政治和社会阶层中分配。这一做法保证了职业、工业、商业和官僚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将和工人、农民平衡，尽管在以前的埃及国会中后者所占比例很大。

在总共1750个席位中，农民占了375个，工人占了300个。其他席位是这么分配的：民族资本家（工商界代表）150名，职业协会会员225人，非结盟公务员135人，大学教师105人，学生105人，

妇女 105 人。

委员会规定受隔离惩罚的人员主要包括：受 1960 年和 1961 年国有化影响的地主；对革命存有敌意，并于 1961 年底逮捕的人；还有企图煽动人民搞政治腐败的人。

在发布的成千上万的隔离命令中，有 1600 个主要是针对自由派和左翼同情者的。在“大众力量”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几个月后，这些命令就被废除。

纳赛尔紧跟着就把矛头指向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动派和封建主义者”。12 月 23 日在塞得港的一次讲话中，他正式发起对埃及以外的“阿拉伯革命”，猛烈地抨击阿拉伯国王，特别是约旦的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他声称，这些国王不仅在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拉向后退，同时也要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破坏阿拉伯的社会主义，攻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的愿望。他宣布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阿拉伯联盟国家”中的也门中止邦交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只是一纸空文，伊马姆·艾哈迈德已经开始攻击埃及政府并开始谴责社会主义思想。

纳赛尔在 1962 年 2 月 22 日，埃及和叙利亚统一纪念日讲话时对阿拉伯国王和其他反动派进一步进行反击，他首先试图回答自己所听说的人们的发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不管其他阿拉伯人，而集中到自己的事情上来呢？尽管某些阿拉伯领导人行为不检，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阿拉伯统一是“自然发展的必然”。不统一是由帝国主义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勾结起来，分裂阿拉伯世界而构成的结果，我们不能把这些“傀儡”和阿拉伯人民混为一谈，一旦他们掌权，就不会有真正的统一。正像阿拉伯世界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和他们的代理人及影响一样，它也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推翻“剥削者、垄断者和富有的寄生虫”，并且摆脱落后。

1962 年 5 月 21 日，在大众力量国民大会的讲话中，纳赛尔用 5 个半小时宣布了著名的国家宪章。宪章是理解纳赛尔思想和他



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目标的关键性文件。在第一段话里，宪章重新肯定了埃及的阿拉伯文字，这在1956年的宪法中已经说明。宪章中说：埃及的革命试验有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也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但宪章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埃及的国内问题的。

埃及人民的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宪章说埃及人民抵制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他们反对任何阶级的专制，并且决定消除阶级差异使之成为所有劳动人民获得真正民主的手段。革命的保障之一就是义无反顾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上帝、对他的预言和神圣使命的毫不动摇的信念”。

纳赛尔在宪章中说道，阿拉伯革命有三个目标：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要求一种不受任何异想天开和恐怖主义力量支配的、由启蒙、彻底和自由讨论而产生的建立在科学信念基础上的良知。革命的进程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发生的激烈变革的影响。这些变革包括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民族运动和“具有无穷力量”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发展。同时也有不断来自“世界上的道德力量，如联合国、不结盟国家和世界舆论”方面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纳赛尔争辩道，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间接方式，通过经济封锁、垄断和冷战占领世界。因此，想通过同帝国主义缓解或者同他们讨价而获得自由是不可能的（苏伊士危机和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情就是例子）。在一个具有纳赛尔特色的文章中，帝国主义被谴责为“不仅是对人民资源的掠夺，也是对人民尊严的侵略”，宪章的两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以各种形式敌视帝国主义和强调进行经济发展的斗争。

宪章中包括了对埃及历史的一段较长的回顾，其中，纳赛尔反击了“法老派”埃及民族主义者，关于埃及不应该卷入阿拉伯事务中的论调，这些争论因为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的失败而有所抬头。他争辩说，埃及从没有与周围的环境隔绝，即使在法老的年代也是如

此。1919年埃及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性质决定的由地主阶级来领导，“忽视了社会变革的需要”，还因为他们没能把这项使命发展到西奈以外的地方，没能从历史中领悟出“埃及爱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冲突”。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因此在最严峻的危机时刻失去了埃及人民的革命力量，也因为埃及民族运动者认为阿拉伯土地的划分和占有同他们没有关系。

为了实现阿拉伯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阿拉伯历史和自然因素赋予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其领导者成为“核心政府”的责任。但在纳赛尔看来，寻求统一的方式不一定就得重复19世纪民族统一的试验模式，如德国和意大利模式。统一不可能被强加，它必须有一个群众基础。它的性质应是和平的而且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拥护。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斗争产生了阿拉伯政府之间的差异，而革命的洪流正是因为这些差异而发展着。

纳赛尔阐明了他新构想中走向真正统一的各个阶段的意义。“在阿拉伯世界内，在民族独立的框架内，任何代表人民意志并为此进行斗争的民族主义政府都是通向统一的一步。任何表达了两个或更多的阿拉伯人民意愿的阿拉伯世界的部分统一都是向统一前进了一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必须宣传它的统一和统一原则的号召，而且应在就是否在干涉别国内政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之前，毫不犹豫地进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认为支持任何人民运动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它不应该介入任何阿拉伯国家地方党派的争斗之中。换句话说，纳赛尔更感兴趣的是其他阿拉伯政府的广泛的政策，而不是政策的构成或他们内部事务的日常工作。从前，他主要关心的是这些政策应该同埃及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致。现在他建议根据它们的社会政策来衡量它们。根据宪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以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进步运动为主旨的合作性联盟”。“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为了继续进行剥削和掠夺财富，企图把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阿拉伯领土置于自

己的军事控制之下”。保卫阿拉伯地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队的主要职责。然而，最有效的防御是自我发展，军队的坚实后盾是他们身后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

纳赛尔在宪章中制定了这种实力的基础，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以这样的一个前奏开始：社会主义必然是不发达的解决办法，因为本国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他们无法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经济。但社会主义的办法并不是要求对各种生产实行国有化或废除所有私有制和继承权，有了一个集中进行发展计划的“有能力的公共事务机构”和在该计划内和公有制控制下的“私有阶层”就足够了。经济的所有基本基础设施，如道路、铁路、港口、机场、大坝、海洋、土地、空运和其它大众服务及财政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应纳入公有制范围。重型、中型企业和矿业应该是公有制或公有控制，而在轻工业上，国营部门须起指导作用。

土地不再国有化，而是实行一定程度的个人土地私有制，而且排除了由国内大地主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旧陋习的“封建主义”。农业所实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有限的土地所有制，也包括技术和信贷的合作制，以及灌溉和排水的大众服务。农村必须实行工业化，减少农村的失业状况并努力提高“村庄的文明程度”。

尽管重点放到了发展重工业上，但这将不同于苏联残酷的共产主义模式：埃及人民已经长时期地被剥夺了一切，因此必须发展消费工业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工业界将实行每日7小时工作制（主要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工工作），而且也正如纳赛尔曾经宣布的那样，工人们将参与管理，分享红利。在公有制的私有阶层，自由竞争和私人投资将继续存在。宪章上写道，“生产上的斗争”依然是阿拉伯社会生存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如果持续增长的人口不构成埃及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最危险的障碍”，计划生育也是需要的。

宪章提出的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建议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实力的基本观点和埃及的过去的教训。它辩论道，政治制度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利益的控制。因此埃及的国会制度反映了“封建主义和剥削资本”的统治结盟。农民不得不按照他们封建统治者的意愿投票，在同反动派斗争的同时，还有根本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需要在国家统一的组织范围内和平地解决。这种组织是由于新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也就是改组后的全国大会）内部合作的结果。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宪法应该保证农民和工人可以通过自由和直接的选举，进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各级政治和大众组织，包括占有国民议会一半的席位。还应采取强调民主控制的其他措施。选举出来的大众委员会的权力应高于国家的执行机器，地方政府应该逐渐从国家的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合作社和工会应该起到“领导民主的作用”，而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个目标，应该建立农业劳动委员会。

在国家的最高层次，“集体领导”是必然的（纳赛尔后来拒绝了代表大会让他担任终身总统的建议），而且“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一位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积极活跃的领导干部。

宪章号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项从来也没有明确答复的号召）。它宣称，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新闻组织的法律已经让人民拥有新闻的自由权。对自由的崇拜是“神圣的”，因此，要求整个民族警惕“反动派分子利用宗教的企图”（显然是指穆斯林兄弟会）。

宪章在社会领域内宣传“机会均等”的目标。它提到了医疗保健、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以及推广老年人和病人保险的需要。

在提交宪章后，纳赛尔在民众力量全国大会的公开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坦率地讲了在现实中，比如说在社会福利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他说要取消失业保险、病人保险和农业领域的老年人养老金是不可能的。还有实施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这也不是明天就能办到的。



纳赛尔指出了他搞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除了不赞成一个阶级专政另一个阶级之外，“阿拉伯社会主义”不宣扬土地的国有化而且让私有资本在工业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最后，不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承认宗教。

纳赛尔后来讲道，为了制定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他曾经研究过许多模式。他拒绝了紧跟铁托模式的建议，并说，他已经观察了苏联、中国、印度、古巴、瑞典和其他国家及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实践，并寻求可能适应埃及需要的理想模式。

对宪章的公开辩论持续了六个多星期，不仅在代表大会内，在新闻报道、电台和电视，以及其他职业组织内同样进行着。令纳赛尔失望的是，大会成员更关心的是他们特定的职业利益而不是原则方面的大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持自由或左翼观点的人，仍然对政府的警察统治持有戒心。然而，一个涉及整体原则的论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一些穆斯林宗教领导人想确保宪章和其他宪法重申伊斯兰为国教，伊斯兰法律是埃及社会的主导。这一企图没有实现。

6月30日代表大会一致批准通过最初的宪章草案。两天以后，纳赛尔向国会解释了他建立新的政治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想法。它的结构相仿于将被取代的全国大会，它将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群众组织，由从农村开始往上的各级群众委员会构成，包括公有制所有的或控制的公司、工厂和政府部门。同全国大会不同的是，它排除了“封建主义者”和“反动派”，并且特意保证工人和农民有50%的代表。它是确保为执行宪章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措施和政治民主而进行政治活动的论坛。但纳赛尔明确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将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人们本想主要把它作为动员人民群众支持新式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手段。同时，它也是作为对下层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论坛。下层阶级如果想克服他们长时期被动和受奴役的传统状况，弥合他们之间以及和比他富有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同胞之间的巨大的文化差异，就需要得到鼓励并提高自

己的素质。

纳赛尔同时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将成立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好国民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国民议会将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这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大体轮廓、它的学说和所倡议建立的机构及其制度。那么,纳赛尔将怎样把它们付诸实践呢?

## 第十三章

### 发展埃及：五年计划与政治体制

(1962—1967)

从国家宪章到第三次阿以战争埃及战败的五年间，纳赛尔进行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共遇到了四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继续建造高坝及进行其他主要工程。要努力扩展生产就要遇到几个危险：满足当前的而不是未来的消费以改善国民低劣的生活水平的需求必须同投资的需求保持一致；每年 100 万的人口增长速度带来了无情的压力，并有阻止生产增长的危险；埃及社会，尤其是国家机器懒散和无生气的传统曾一直是进步的障碍，如果投资基金不能从埃及自身的资源中筹集起来，埃及将会有外债累累的危险。为了使社会和经济改良运动相结合，纳赛尔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生机勃勃，但仍然驯服的政治体制。这一尝试成败的关键在于发展教育和正确对待不安定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缺少自由而疏远了政权。

纳赛尔的第二个问题是阿拉伯革命对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是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的主要内容）。不论纳赛尔是否宣布了阿拉伯革命的开始，在也门、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和北非都有可能发生革命性大变动。只是在也门，纳赛尔在有限的程度上控制了由他鼓动但不是他发动的革命的形势。在某些事件中，如从 1963 年开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的复兴党革命，1965 年在阿尔

及利亚本·贝拉的统治被布迈丁上校推翻,以及1967年民族解放战线在南阿拉伯取得最终胜利,这些大变革使一些曾与纳赛尔及其亲信随从发生过争端的人变成了当权者。但是无论好坏,纳赛尔和埃及参加了这些革命运动并且鼓动和帮助了其中一些革命运动。纳赛尔的这种身份对其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即他同超级大国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他对阿拉伯半岛及非洲的“解放运动”的支持虽博得了苏联的欢心,但也使他不仅同英国,而且同美国最终发生了尖锐冲突。西方仅仅为了保证不让纳赛尔被完全纳入苏联阵营才缓和了这种冲突。

纳赛尔的不结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1962年开始,在开罗召开的一次不结盟国家的国际经济会议上,纳赛尔更多地强调的是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主宰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关于政治目标的议题。鉴于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有一大部分是贫穷国家,因此纳赛尔认为这些国家应合力协作,同较富裕的国家多进行贸易,并从这些富有国家中争取援助。这个从政治向经济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埃及自身的物质需求,但也反映了不结盟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不结盟国家没有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仲裁者和调停者,却愈来愈有成为其牺牲品的可能。第三世界变成了美国、俄国和中国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新的三角斗争的战场。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日益暴露出准备使用军事性或是准军事性的手段来推翻或阻止那些可能支持共产主义国家却没有受到苏联直接军事保护的政权。

在这些年中,纳赛尔像走钢丝一样周旋应付于东西方之间、不结盟和反帝战斗之间以及国内发展的要求和阿拉伯革命运动的需要之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原打算最后考虑的问题——阿以冲突却正是使其失去平衡的问题。当纳赛尔提出他的关于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时,他正在尽力解决国内某些很严峻的实际困难。1962年初,由于叙利亚脱离埃及而产生了信任危机,而经济困难以及纳赛尔同军队和自由军官之间关系的危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1961



年，一半的棉花收成被棉花虫毁坏，棉花销售下降，外汇收入下降，可祸不单行，又恰逢国内粮食减产而需要进口更多的食品。埃及的外汇储备下降到 1000 万英镑，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 1.5 亿美元的贷款，并请求美国运送更多的剩余食品。埃及和华盛顿达成一项协议，根据此协议，美国提供 20 多万吨的小麦和其他食品援助。

在早些时候同肯尼迪总统通信时，据说纳赛尔曾以世界上最古老却最贫穷的国家的统治者的名义写给世界上最年轻却最富有的国家的总统一封信。他认为肯尼迪很难想象一个埃及领袖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肯尼迪不能亲自来考察，他建议肯尼迪最好派一位自己信赖的顾问来察看在狭小场所办公的埃及政府，然后向肯尼迪报告情况。1962 年春，肯尼迪派遣他的经济顾问爱德华·曼森和一位前哈佛大学经济教授前往开罗。在开罗，这位教授和纳赛尔以及几位部长举行了多次长谈。曼森带回去的是一个对埃及经济状况持乐观态度的描述：国民收入增长比人口增长快 2% 到 3%。

纳赛尔同以他的最亲密朋友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为中心人物的军队之间的危机，直到 5 年后，即 1967 年战争结束，阿米尔蒙耻自杀后方被披露。在对阿米尔同谋的审判中，以及后来海卡尔在《金字塔报》上，都将这次危机称为“无声的政变”。海卡尔和纳赛尔都对这次危机的本质闪烁其辞，尽管他们声称这次危机起源于（军队和情报机关中的）“权力中心”及军队所受的“特殊政治控制”，并把 1967 年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此。阿米尔以及军队变成了这次灾难的替罪羊，但对他们早期作用的批评自然应谨慎地评估。然而，一些出自埃及之外的证据逐渐证实这种危机的存在并且导致了以后几年中分别以纳赛尔和阿米尔及军队为首的双重政权的存在。阿米尔及其部下毕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纳赛尔以其他势力与其抗衡。

在革命初期，阿米尔曾被任命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阿米尔想让一名自由派军官来掌管作为军事力量的军队，同时负责他和军

队中自由派军官的政治联系。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的几年中，纳赛尔不大关注军事问题，几乎让阿米尔放手处理军队事务。接着，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之后，阿米尔被纳赛尔任命为他在叙利亚的总督，这是他首次担任重要政治职务。当叙利亚脱离阿联之后，阿米尔回到开罗，因未完成使命而一蹶不振。他在大马士革被捕，当时正值午夜，他还身着睡衣，阿米尔就如此屈辱地结束了其使命。阿米尔本人在叙利亚颇受爱戴，在那里，对埃及人的怨恨主要是针对那些随从的，他们大都是军队里的情报军官。由于这一点以及埃及需要加强安全防卫，使得纳赛尔以新的审慎的目光看待军队。与此同时，纳赛尔重新组织政府，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由五位副总统构成的新的决策机构。另外两个人，阿卜杜勒·拉蒂夫·巴格达迪和卡迈勒·侯赛因，想要阻止阿米尔保留其凭借对军队的控制和与纳赛尔的私人关系而得到的职位——事实上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把交椅。

出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纳赛尔决定对高级指挥官和军官团进行一些改革，并且决定把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控制分开。在提出以宪法治理国家后，他将军官划分成性质不同的两类：一类仍为职业军人，另一类将受聘担任一些政府和经济部门的文职工作。纳赛尔告诉阿米尔，如果他要保持政治上控制军队的权力，就应该放弃总司令的职位。在以后，总司令应该选择一位职业军人担任，其专业资历应更加适应时代要求，并且定期每隔3年或4年更换一次。纳赛尔还建议成立总统制内阁。这个内阁集体行使总统的政治权力，每一个副总统将负责不同的事务。阿米尔将负责军队事务。阿米尔同意了这些提议，然而他的一些担任副总统的对手却进一步坚持：营长以上军官的任命应由总统内阁统一批准。阿米尔被挫败，他接受了这项协议，但仍持有异议。

据说阿米尔天性宽宏大度，易感情冲动，但也比较软弱。他对朋友极其忠诚，明显具有塞迪斯人或上埃及人宽厚温和的秉性。由于军队中亲信的怂恿，阿米尔对将军队交给一个新的总司令更是

疑虑和不满。1962年3月的一天,当这一问题在仍处于胚胎状态的总统内阁中进行讨论时,阿米尔坚持保留其否决权,继而宣布辞职并离席。他销声匿迹了一段后在亚历山大露面。人们谣传军官正倒向他这一方,部队已在调动中。

纳赛尔愤怒了,并表示不愿再见到他。但当纳赛尔获悉阿米尔在和其他副总统的一次会谈中已经同意辞职并要离开埃及去欧洲呆一段时间时,他又急忙加以干预。纳赛尔担心阿米尔辞职会导致军队内部分裂,并有可能造成内战。再说,除了他和阿米尔的友谊外,更重要的是,阿米尔仍是他和军内自由军官组织的主要联络人,而军队则是纳赛尔在万不得已时赖以维持统治的工具。可能他也考虑到了如果阿米尔的对手能彻底击败阿米尔,他们与纳赛尔相对抗的力量就会得到加强。(实际上,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巴格达迪和侯赛因将在以后的两三年内失去其职位。)

为了防止军队分裂,纳赛尔已准备妥协。他说服其同僚撤销关于任命的协议并直接和阿米尔达成密约。阿米尔仍担任最高副统帅,拥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但同意以后任命一位职业军人为总司令。

与阿米尔冲突的结果是极其危险的。阿米尔的地位及其周围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的影响,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过去更为强大。1964年3月,总统内阁解散后,阿米尔有了第一副总统的头衔,成了纳赛尔的代表。实际上,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已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总统和政府实施的“一般政治控制”,另一方面是由纳赛尔及其部属实施的“特殊政治控制”。军队的战斗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对此纳赛尔早已预见到了原因:阿米尔不再具备部署和指挥战斗或战役的专业能力,而且对军队的职业领导艺术已过时。导致1967年灾难的种子至少有一些是埋藏于此。

难于确定的是,在1967年战争以前,阿米尔和以情报机构负责人萨拉赫·纳赛尔将军为首的军队和情报机关里的支持者以及

后来的国防部长巴德兰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独立于纳赛尔或对纳赛尔施加压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是纳赛尔选择的权力工具。为了使他们忠诚不渝,纳赛尔不追究他们在军队中的错误和过失,并对他们取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特权表示宽容。

毫无疑问,尽管纳赛尔支持并试图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建立起一个平民政治机构,但作为最后的手段,他继续依赖于国家安全机构——军队、警察和情报组织。在埃及境外推动亲埃及的阿拉伯革命运动中,军事情报机构也很活跃。纳赛尔同阿米尔的公私关系仍旧亲密无间。他派遣阿米尔作为他的代表执行了几次至关重要的使命,如访问沙特阿拉伯和莫斯科,去巴黎会见戴高乐。对武装部队的状况或是情报组织的行动,纳赛尔也不能逃脱责任;要么他知道内情,意欲如此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要么他没有有效地制止,或者是他被蒙在了鼓里而不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从1962年开始,在也门内战和亚丁以及南阿拉伯发生民族主义叛乱期间的一些事件中,有时候似乎是埃及情报机构自己在掌握主动权,有时候纳赛尔似乎迫于来自阿米尔和军队的压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政策。

在埃及国内,可能是由于纳赛尔对军队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明确分离的计划失败,从1964年起,他决定将自己更多的注意力转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发展上。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发展缓慢,从未真正在政治上形成势力。在国家宪章公布六星期后,纳赛尔向“民众力量大会”提交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建议草案,并于1962年10月颁布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章程(本书第十二章中已简略叙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将拥有7000个“基层委员会”和400多万成员。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后,它应该批准新的国民议会选举法,新的议会将于1963年7月23日召开大会。但是在埃及境外发生的事件,包括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就达成宪法联盟的可能性进行的会谈,使这部选举法的公布一直拖延到1963年11月17



日。350名议员(另外10个席位经任命产生)候选人的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能读会写,并且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其中半数必须是工人或农民。

1964年3月,经过选举而产生了议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开会前一天,纳赛尔宣布了一部临时新宪法,并解除了戒严令。但是因为他第二天又颁布了新的紧急法令,由政府行使的内部安全防御权力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同时,纳赛尔根据新宪法的规定组建了他的政府。总统内阁被废除,阿米尔在七位副总统中排名首位。执行委员会被改成内阁,主席阿利·萨布里成为总理。议会提名纳赛尔再次竞选总统。1965年3月,经过一次公民投票,纳赛尔获得了99.99%的选票,从而任期得以延长六年。

那时,纳赛尔年届47岁,执掌政权12年在他身上已留下了印记。几个月前,在1964年7月,我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在开罗采访他。9年前所见的身体健壮,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已变得较前沉静许多,动作迟缓,身体几乎有些虚弱。这是一个长期承受工作和责任的巨大压力的中年人形象。他的政治热情尚未全部消退,并可能刹那间使他那张忧虑阴沉的脸庞充满生机。然而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正在寻求安宁,寻求从无尽的困难中得以解脱的人,而不是一个渴望开辟新道路的革命者。

纳赛尔的生活方式依旧,谦逊质朴,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截然分开。他幸福地成了婚,妻子虽未像守旧的穆斯林教徒那样与世隔绝,却也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她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照顾五个孩子。纳赛尔本人对社交生活毫无情趣。他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则:他永远也不会光顾自己执政以前未去过的饭店和夜总会。他喜欢平淡的埃及饭菜,他的一些口味高的朋友把在总统官邸进餐看成是在饮食上受惩罚:菜单似乎是一成不变,几乎总是鸡肉、米饭和蔬菜。

纳赛尔对艺术界和知识界没有特殊的兴趣,尽管他广泛阅读

有关政治和历史的书籍。他喜欢看电影,打网球。除了阿米尔和其他政界同僚,纳赛尔最亲密的朋友是海卡尔。他与海卡尔一起讨论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海卡尔把他每天的活动和思想都完整地记在日记里,而且帮助他完成了《革命哲学》的最后一稿。然而,不论是在那时还是在后来,不论是海卡尔还是其他任何一位同僚,却没有人能像纳赛尔对内格伊布那样而成为纳赛尔的幕后操纵者。在纳赛尔周围各种不同势力中,海卡尔代表着某种政治思潮倾向。正如毛希丁、阿利·萨布里或阿米尔一伙代表其他倾向一样,海卡尔维护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主张发展同西方大国的联系和使国内的政治体制自由化。但是海卡尔从来没有他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他完全依赖于纳赛尔。

1965年3月,当纳赛尔开始他的新的总统任期时,埃及的经济状况是他最关切的问题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接近尾声。它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并赢得了赞誉,然而他试图把大量投资与高消费、扩大就业与好斗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的尝试正在造成过分紧张的状况。一些常见的发展过快的征兆业已出现:这就是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外债。埃及在也门战争中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包括失去美国的小麦援助)加大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可是,对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主要问题是把筹集资金的来源从国外转移至国内,并且同时使人民要求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和高速长期的经济增长保持平衡。

从1961年国有化法令颁布开始并在国家宪法中得以描绘的宏伟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已经建立,尽管在农业方面一个重要的新改革才刚刚开始。到1964年底,几乎所有不同种类的大公司都已国有化,使国营工商企业达到了800多家。

政府还控制了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商业,尤其是零售和批发业。但是土地和房屋没有实行国有化意味着国家财富的2/3仍为私有。因此,社会主义埃及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其主要特点是由中央计划和控制。国家计划为各级政府机构下达指标和方针,中

央计划仅控制投资和外汇分配。

纳赛尔没有设想使土地公有化,而是使更多的农民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扩大合作体系。到1965年,一个接一个的土地改革法令和其他政府措施使大约125万英亩(约为1952年可耕地面积的20%)的土地可供再分配。大约84万英亩的土地已重新分配给了30多万无地农民,他们代表着总数为150万人口的家庭。然而,这些人仅仅只是农村人口的10%,其他绝大多数或者是佃农、无地劳动者及其家属,或者是出卖、出租一英亩或更少田地的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要获得土地,希望得到因土地所有权限制而削减下来的土地(1969年7月,纳赛尔宣布把土地拥有最高限额降至50英亩)和政府的开垦计划。但能否找到工作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大,工钱和租费的高低,以及租地协议的性质也是影响其生活的重要因素。鉴于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和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官方制定的最低农业工资为每天18个皮阿斯特(约合18个便士或43美分)的法规难于付诸实践。1962年和1963年的新法律曾试图强迫大家更严格地遵守国家控制租金、租地和交谷租种田地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律规定了更长时间的租约,更多地保障租地使用权以及对偷漏税行为的更严厉的惩罚。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的农民还可享受诸多优惠,偿还的款项可适当减少,1961年和1964年中的利息期限可缩短一些。

农村人口中的各个阶层,包括无地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农村社会公益服务的发展。尽管农民保守而且贫穷,但是乡村福利中心在农村的建立以及清洁饮用水的引进,加之一场深入的消灭血吸虫病、沙眼和疟疾的运动,使健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联合乡村中心包括健康和妇幼保健站、农业学校和工艺学校。到1966年已有近700个这样的中心,换句话说,大约每两万农村人口中有一个这样的中心。然而,与在主要城镇中清除相当数量的贫民窟和廉价住房建设相比,改进农村住房的工作几乎没有进展,农场工人也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工业工人所享受的工会组织

及有限的社会安全保险有利条件。免费教育的快速推广和城市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对农村和城市工人都有好处。

1960年7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埃及的人均收入为50埃镑,但在农村还不足30埃镑,那些无地的劳动力的收入就更少了。1960年埃及的人口为2600万,预计每年以2.8%的速度增长,到1976年就会达到3200万,到1990年为5300万。

在埃及征集15.77亿埃镑总投资的计划旨在使国民收入增长40%,或使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每年达到7%。官方数字表明在此计划下每年的增长为7.5%,或共增长37%,其中农业增长17.8%,工业50.2%,电力128.6%,建筑96.6%。一位具有批判性眼光的非官方外国专家估计年增长速度在5%到6%之间。考虑到人口增长,这说明国民总产值的纯增长率每年都接近3%。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已是巨大的成就。

除了电力之外,建筑和交通取得了较原计划更大的发展,占投资1/4的工业生产的增值只是原先所希望的一半多一点。其主要原因似乎是由于外汇短缺而导致的投资和生产规模缩小。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优先考虑了一些花费大却相对没有收益的重工业工程,尤其像钢铁企业和在菲亚特公司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造价3000万英镑的纳斯尔汽车厂这样的企业。因为缺少外汇,无法购入进口原料及配件以供加工和组装,几所工厂被迫关闭一段时间(现已重新开工)或处于半生产状态。纳斯尔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工业生产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也由于政府优先考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国有化在多种情形下导致了已经泛滥的官僚主义进一步扩散蔓延,几乎没有官员受过足够的培训并愿意承担责任。政府试图通过对经理的培训和增加中等技术学校的数量来改进这种情形。

在整个经济部门中,雇佣工人的人数5年中增加了130万,增长了22%,而人口的增长速度为15%。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有22.5万人是在工业部门中。工资在国家支出中占的份额也有所增



加,以前的失业者是其最大的受益人。尽管工人平均工资5年中上升了22.8%,生活费用指数却上涨得更多一点,为23.2%,但由于社会公益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工人享受了一些免费待遇或有津贴的补助,其中尤其是教育和保健,以及较为便宜的住房。

这个计划提供了3.92亿埃镑,用于农业发展投资,包括灌溉,排水和阿斯旺水坝的一期工程。原指望农业产量每年增长5%,但实际只增长了3.3%。

土地改革增加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给予土改地区较大的帮助,但其主要目的是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快速增长的人口要求更大幅度地增加生产,以减小对外国进口粮食的依赖。这是否同私人拥有的少量土地的发展相适应,专家对此有意见分歧。土地被划分得支离破碎,归不同的所有者,这是高效率耕作的障碍之一。如果不愿牺牲合并和计划的优势,特别是根据大坝建设计划将可以得到新土地的情况下,集体或国家耕作有必要代替大的土地所有者吗?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尝试:即把土地私有制的优势同大规模生产规划,同“监督合作社”体制下的技术管理相结合。

这个体制所依赖的基础是农业合作社和在土改地区建立的政府技术监督的联合体,以及一种新的巩固农作物产量的办法。这个体制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由土改管理处和农业部控制的土改地区进行试点。尔后,在1960年,政府决定将这个体制推广到已办起农业合作社(大约有3500个这样的合作社,主要负责提供贷款和购买农用设备)的地区。1965年宣布的目标是最终在全国各地采用这种体制。

在此体制下,个人占有的小块土地被兼并(不改变其所有权)。为了生产的目的,把这些土地重新组合成1500费丹的单位。在一个农业大学毕业生和两个农业和中等学校毕业生监督下建立起来的新的合作社负责经营这些土地单位。其目的是为了改进土地经营,包括促进人们在大面积地区采用一致的农作物轮作法,使那些

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不会失去积极性和社会保障。政府极力改进排水、灌溉、改良种子、增加使用农业机械、肥料和杀虫剂，从而支持合作经营。从1952年到1964年，化肥（60%为埃及生产）的使用增加了一倍；机器马力也增加了60%。在同一时期内，受训的农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兽医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

从1961年开始，农民通过乡村合作社从国营农业信贷及合作社组织获取无息贷款。到1965年，农民进而通过政府控制的机构，以固定的价格销售其主要产品。这些信贷和市场销售便利条件使政府能更有力地将“监督合作社”体制推广到官方影响较小且没有搞土地改革的地区。

农业生产增长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耕地面积的增加。截止1960年，开垦荒地已达50万英亩；预计在以后的7年中大坝投入使用后，年垦荒地面积能增加到15万英亩。

到1970年7月电力设施安装完毕，新运河建成之后，大坝不仅要为国家的工业和都市发展提供用电，而且还要提供足够的水源以灌溉130万英亩的新土地，并把70万英亩农田变为四季灌溉。到1970年，大坝发电站在供应埃及电力的需求中占一半。越来越多的农村通了电，另外又有50万英亩的土地正在耕作中。

在大规模的开垦荒地中，另外两个实验不是很成功的。解放省和新河谷省的规划从技术上是生产性的，但实在太不经济，其投资被削减。尤其是新河谷省规划，纳赛尔曾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调查表明：大约在10年内，位于达赫拉和锡瓦之间西南绿洲一线的150万英亩的地区可成为耕地。如果能证实对该地区地下水含量的乐观估计，与尼罗河河谷相并列的“新河谷”就能开发成功。1959年，纳赛尔建立起一个开发沙漠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军队工程师和军事人员。他们在新河谷地区组织实验性开发，并在西奈沙漠和其他地方实施开垦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哈里杰和达赫拉绿洲就有2.2万英亩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在哈里杰绿洲掘井、平整土地、筑路、建造模范村、学校、诊所以及一个崭新的拥

有现代公寓的城镇。政府用特殊的物质刺激,如高工资、免费住房及去开罗的廉价机票鼓励专业人才去这个新的城镇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还不能充分证实这个地区存在着丰富的、有待开发的水资源,故没有理由进行大规模的扩展。

在五年计划期间,既要筹措投资资金,又不能削减国内消费,纳赛尔不得不严重依赖国际贷款。五年计划的目标是要停借外债,并在五年结束时使国际收支顺差达到4000万埃镑。实际上,在1964年到1965年间,支付赤字已达7600万英镑。五年的总赤字为4.13亿英镑。苏伊士运河外汇收入的增加正好能使形势得到控制。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后,埃及政府拓宽、加深了运河,以使更大的船只通行。从1961年这个项目完成到1965年,过境收入从5100万埃镑增加到8600万埃镑。

在1965年和1966年,埃及不得不大幅度减少进口,并且需多承受每年5000万英镑的额外负担,用于支付美国剩余粮食项目提供的小麦援助。在苏伊士湾和西部沙漠新发现的油田有望成为外汇收入的新来源。

就业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以及在进口和国内投资上资本货物优先于消费商品,导致了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国内农业生产增长不够迅速,以至于不能满足对食品的更大的需求,服装等其他消费品也供不应求。政府试图通过合作社控制供应和价格,结果出现了黑市和官方定价货物短缺的情况。到1965年夏,改变经济政策的路线方针已成为必然。纳赛尔的经济顾问们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必须有一个冷却阶段,以便减少外债,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增加国内储蓄。纳赛尔对他们作了让步。这就意味着要减少进口,重新安排短期外国贷款的偿还;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援助国寻求更多的援助;在国内采取不得民心的措施,提高税率和降低消费补贴,从而抑制消费。

1965年8月,纳赛尔访问莫斯科归国后任命毛希丁代替萨布里任总理并实施紧缩政策。他自己则开始设法与沙特阿拉伯和解,

以减轻也门战争造成的负担。次年以放慢发展速度,限制工资和消费以及大幅度提高生活费用为代价才使经济达到较大程度的平衡。从1965年到1966年,增长速度降低到4.5%;第二年在和以色列开战以前,增长速度甚至更慢。

1966年底,起草了一个罗列着投资项目清单的临时计划。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已被略去,1967年战争结束后,工作重心转移到将于1970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通货紧缩政策并未持续很长时间。1969年9月,纳赛尔撤换了毛希丁,由西德基·苏来曼接任政府首脑。这个政府的几名主要成员以前是军官,受过技术培训,并持有较激进的观点。纳赛尔似乎准备再一次改变方针路线,想回到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国外“阿拉伯革命”的战斗任务上去。当他正为1967年准备一个增长幅度更大的预算时,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了,战争的失败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政治动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门战争及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措施带来的紧张关系的反映。工人阶级对生活费用的上涨不满,一些专业人士和商人由于受国有化政策的影响也有怨言。一个由在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军官构成的特权团体的出现,以及也门战争后军队地位的加强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也激起了不满情绪。再者,那些曾很富有,但已丧失了至少部分财富和全部政治影响的人也有怨恨。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国民议会既没有缓解不满和对立,也没有成为审查和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工具。真正的政治斗争就如从前一样是在一定范围内并仍是秘密进行的:从事这种斗争活动的或是纳赛尔的两个最活跃的挑战者,“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主义的残余势力,或是那些在农村保持所有权、同政府机构相对抗的地方贵族,或是在政府内部,包括军队在内的对立权力集团。

“穆斯林兄弟会”对政权仍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它曾因1959年企图谋害纳赛尔而遭到残酷镇压。1965年8月,纳赛尔宣布了“穆



“穆斯林兄弟会”400多人被逮捕的消息，因为他们企图再次谋害他和其他内阁要员的阴谋泄露了，人们都很吃惊。大家不仅为这次拘捕的人数之多，也为被捕者的身份感到惊讶：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受过教育，并以某种职业为生，如工程师、医生、律师和军官。人们通常不把这些人于兄弟会对社会的陈腐的、神权政治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1966年4月，政府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运动，据称这股势力并未在对其实行的政治“孤立”中消亡。一大批可疑大地主的财产被没收。这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一位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乡村官员被谋杀。据说这次谋杀是一个报复行为，因为受害者已开始妨碍由老地主和其收买的新官员组成的地方“封建主义”统治集团。一个由陆军元帅阿米尔领导的反封建主义者委员会成立了，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调查委员会。

无论这次谋杀的真相如何，这次事件似乎使纳赛尔试图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设想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对以前的政治党派，尤其是对华夫脱党的镇压，削弱了上层大地主及其走狗的政治势力。但是权力和势力并未转移到贫穷的农民手中，而日益为政府官员或中等农场主和小贵族所掌握。后者中的一些人还掌握着很大的财富，往往是大地主家族的小成员。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有关章程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国民议会选举的成员和官员中半数应是工人和农民，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上述情况已受到批评并被要求政变。然而“工人”和“农民”的定义起初是这样地灵活，以至于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领取工资或工钱，没有雇用或解雇的职责，包括高级专业人员、专家和技师，或任何一个在自己土地上干活的人（尽管这块土地的面积很大），都可以要求以这种身份参加竞选。因为同一原因，“商行管理委员会”的两个法定的“工人”席位最初都由高级职员占据，而不是低报酬的工人。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旨在使其成为人民的监察员，通

过其在地方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在各个阶层对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实行监督。要努力完成这个任务,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必然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们是大革命中兴起的政府机构内部和与政府机构相关联的组织和机构中的一伙贪污腐化、享有特权和滥用职权之徒。在乡村,大多数农民贫穷、无知和消极,一个享受既得利益的人利用他们形成的网络控制他们并不困难。

在更高一层,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对军队和“军官阶层”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是另一种更加激进的政治权力来源。1966年,纳赛尔在国民大会讲话时,第一次提到存在“权力中心”,暗示了阿米尔和军队在反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更激进的发展。1968年4月,在纳赛尔宣布了巩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措施后不久,海卡尔对此作了回顾。“那些参加了1952年从英国占领军、英国皇家法院和埃及上层阶级的旧联盟手中夺取权力的人并没有预见到应把权力转移给劳动人民的新联盟……”

但是,纳赛尔自己显然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也拿不定主意。他想使之成为他的权力的民众基础、民众感情的指南,以及可能最终克服埃及民众的根深蒂固的惰性和奴性的政治责任感的教育工具。然而,由于他不愿让自己的统治受到真正威胁,因此不同意提供使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新生所必须的条件。由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由政治活动分子构成的机构,它尽管在村一级上发展了一定程度的地方民主和集体商讨制度以代替警察、工头或官员简单专横的命令,但在下级组织,它仍像从前的民族联盟一样,是一个驯服、呆滞的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受官员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在行政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方面。只有在最高层,在它的最高执行委员会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才能作为纳赛尔周围的权力集团之一,对政策制定有所影响。它的政策不是下级辩论的结果,但是下级讨论所得出的有关公共舆论状况的意见可能对制定政策有影响。

尽管纳赛尔的目标是要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并通过地方自治、合作社和工会发展下级领导,但是在短期内要使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真正发挥其效力的政治动力只能来自于知识阶层,并需得到能够提供明达批评的自由报界和电台的支持。然而,正如一位埃及左翼批评家所言,纳赛尔“想建立社会主义,却不要社会主义者”。而且,埃及城市中产阶级有很强的地位意识,他们和穷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因为不同的经济利益和较大的文化差距,而被分成两个不同的等级。

普遍西方化的高贵者与传统的伊斯兰和农村群众社会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可能一直是现代埃及政治发展的最根本的障碍。普及教育、工业的增长和已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阶级以及城乡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渐渐缩小了这种差距。

纳赛尔及其同僚非常关心教育。他们以每天一所的速度兴建学校,从而使受初等教育的学生的数量由1952年的130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340万(其中130万为女性)。初等教育的年龄为6岁至12岁,享受免费并具有义务性质。1969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这个年龄层中有3/4的人在上学。在以后3年的预备学校阶段,大约45%的适龄少年在政府学校和私立学校就读。中学阶段也为期3年,教育分为职业的(工业的、农业的和商业的)和综合艺术及自然科学。1969年,中学毕业生有8万名,其中2.4万名进入大学,另外有1万名进入高等学院。大学免收学生学费,但他们必须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特别有天赋的学生可获得小额的助学金。还有一个学生银行,每年可借给学生60英镑,毕业后偿还。埃及有四所大学,其中两所在开罗,一所在亚历山大,第四所在阿斯尤蒂。这些大学于1957年开学,在校学生于1969年达12万人。另外3万名学生在其他高等院校,并有1.5万名学生在1961年已现代化的阿扎尔伊斯兰大学。这些大学生中,女生有3.5万名,分别在包括工程学系在内的各个科系中,这个数字表明了近年来埃及知识阶层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进步。

由于政府新近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上,而不是放在革命前占有压倒优势的艺术学科上,医学、工程学(2.1万学生)和自然科学是现在最兴盛的学科。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953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69年的10万人。

随着学校和大学的快速扩展,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质量的下降,艺术学科尤其如此。特别是小学,缺乏合格的教师,教室拥挤不堪,课程中包含太多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说教。曾经培养了埃及历史上大多数具有世界水平教养的统治精英的300所或更多些的外国学校,被强行合并入国家教育体制(作为“埃及化”政策的一部分),影响了中等教育水平。

“埃及的新精英由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建筑师、工厂经理和军官构成”,这一事实是文化变迁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加强纳赛尔的统治力量,但同时也成了其政权突出的弱点之一,即政权与“非技术性”知识分子关系上的摩擦,后者也是国家生活中最有创造力的因素。

不过,教育的发展肯定是纳赛尔最明显的成就之一。



## 第十四章

### 也门战争：阿拉伯半岛与阿拉伯 联合运动(1962—1963)

在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纳赛尔宣布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后的那一年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日渐孤立，至少在有关的阿拉伯政府方面是这样。纳赛尔不仅同阿拉伯半岛的国王们（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的统治者），而且也同他的革命伙伴伊拉克的卡赛姆以及共和主义者、“反动的”叙利亚分离主义政权发生了公开冲突。虽然利比亚和摩洛哥国王较少直接受到纳赛尔的攻击，但也不可能指望他们欢迎纳赛尔对君主政体进行革命性的攻击。阿尔及利亚的共和主义总统布尔吉巴则因其他原因而不喜欢纳赛尔。他怀疑纳赛尔通过颠覆主义分子代理人干涉突尼斯的内政，而且担心纳赛尔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领导人中比较激进的分子结成联盟。只有在阿尔及利亚，纳赛尔才能够发现令人鼓舞的因素。1962年3月《埃维昂协议》的签订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经过公民投票，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从而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几个星期后，本·贝拉在阿尔及利亚领导层的内部权利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了完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第一任总理。

纳赛尔完全可以宣称阿尔及利亚实现独立的完成也有他一份功劳。阿尔及利亚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土生土长的革命。革命的主要外援来自突尼斯。突尼斯为阿尔及利亚革命者提供了军事基地、

庇护所和训练基地，在外交上也给予革命者以帮助。但是，纳赛尔从一开始就在武器、资金、宣传和外交方面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者有限的但坚决的支持；在法国的请求下，他还在幕后进行斡旋，帮助促成了最后和平谈判的举行，这一谈判最终导致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阿尔及利亚新总理本·贝拉也是一位纳赛尔式的革命家，他反对帝国主义，信奉社会主义，主张不结盟。

在叙利亚，尽管纳赛尔在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明智地摆脱困境以减少损失，但他并未放弃恢复他的阵地的希望；他寄希望于人民中继续存在的同情以及他同叙利亚军队中遗留下来的纳赛尔主义军官保持的秘密联系。而叙利亚政府则交替奉行寻求和解与积极进行反对埃及和纳赛尔的宣传运动的政策。

1962年6月，复兴党在为了阿拉伯的联合能在多大程度上同埃及和纳赛尔合作的问题上分裂。受阿克拉姆·胡亚尼影响的复兴党叙利亚地区司令部认为纳赛尔是一位独裁者，不可能同他妥协；在黎巴嫩建立的新的民族主义司令部则呼吁，在联邦、而不是中央集权国家的范围内恢复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联合，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允许政党的存在。

纳赛尔越过叙利亚政府继续向叙利亚人民发出呼吁。通过海卡尔的社论，他谴责复兴党人是联盟的破坏者，并拟订了重建联盟的新条件。海卡尔在6月11日《金字塔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叙利亚的脱离已经表明，未来将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阿拉伯联盟。在联盟的框架内，国家的实体必须依然清晰可鉴，各国政府对选出的民众权力机关负责。联盟在国防、外交政策和“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和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工作计划”方面必须是完整的。一个联合的阿拉伯国家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在这个中央议会里，国家实体应公平地体现，中央政府要对这个议会负责。海卡尔还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准备同任何能够提供它代表自由叙利亚人民意愿的证据、能够以调查在脱离主义者政变后对埃及进行“不公正指责”的方式证明它的诚挚和善意的叙利亚政府讨论走向联盟的步骤。

然而，叙利亚政府反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干涉的指控加剧了，这种指控还被正式提交给了阿拉伯联盟。为了研究这一问题，阿拉伯联盟于8月份在黎巴嫩的什陶拉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它引起了自联盟建立17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支持叙利亚的指控，但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因担心埃及的退出也许会完全破坏这一联盟而不愿过于紧密地卷入埃及与它的对手之间的争吵。在一阵大吵大闹不得不把警察叫进来干预之后，埃及代表因愤怒地退出会议，以抗议会议听取叙利亚政府对埃及的指控。随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宣布：除非联盟谴责叙利亚攻击纳赛尔是美国走狗的行为，否则它准备退出联盟。但是，如果纳赛尔真的打算同联盟最后决裂，他也可能因为埃及的哈苏那于9月15日重新当选为联盟的秘书长而未采取这一行动，因为这是一个抚慰埃及的姿态。

在这种被包围的孤立气氛中度过11天之后，纳赛尔得到消息，发生了一场新的阿拉伯革命。它不是来自阿拉伯国家中最复杂的国家叙利亚，而是来自未曾预料到的阿拉伯国家中最落后的国家也门。1962年9月26日，一群军官在也门首都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并宣布用共和国取代伊玛姆的神权君主国。

这场军事政变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开始人们认为伊玛姆已经死在被反叛者的枪炮打成废墟的王宫中，实际上他逃进了山中。伊玛姆在忠于他的部落中招募了一支后援部队，并在金钱和武器方面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帮助。反叛者呼吁纳赛尔给予援助，他立即作出反应。10月6日，第一批埃及飞机、武器、军事参谋人员和专家飞往也门，第一批载有埃及军队和重武器的船只也在随后抵达。

大约几周之后，也门的共和主义革命者和保王党人分别积聚起自己的力量，也门陷入了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这场在外部干涉下持续不断的战争，在随后的5年里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的一个烂泥塘。毫无疑问，当纳赛尔向也门派去部队时，他并未预见到将要承担的重负，就像肯尼迪或约翰逊总统未能预见到他

们最终将使美国在越南承担的义务有多重那样。

尽管人们当时并未料到也门会发生政变,但它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这个国家处于一种初级革命状态已经许多年了,而且也出现过几次未成功的政变企图。许多世纪以来,也门一直处于互相竞争的宗教派别和部族之间权力的无政府平衡状态。外国人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来或被请进来帮助维持这种平衡,但是,一旦外国人的势力变得过于强大,也门人则会暂时联合起来摆脱他们,并建立不稳固的联合或独立,直到无政府状态再次偷偷潜回。

但在1962年的这次反叛和1948年以来的几次流产政变中出现了新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动乱不仅仅只涉及朝代或宗教派别竞争的改变,而且涉及到也门社会的转变,牵涉到把在许多方面仍处在中世纪的也门带进现代世界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正在冲击阿拉伯世界最偏僻角落的第一次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浪潮。实现现代化和建立一个比较开明的政府的渴望使也门人民将多年来的教派纷争暂时抛在了一边。

从原则上看,纳赛尔无疑更喜欢让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权取代也门的伊玛姆政权,但他之所以支持也门的革命运动还有其他原因,即除了对伊玛姆对他的攻击感到气愤和渴望在叙利亚脱离后保持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外,还有埃及政权内部正在扩大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与埃及外交政策的分歧有关。阿米尔和支持他的军队赞成纳赛尔追求泛阿拉伯领导地位的政策,实际上,他们有时比纳赛尔设想的走得更远。自由军官中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巴格达迪和查卡里亚·毛希丁,则比较谨慎地奉行一种“埃及第一”的政策。

与国内在也门问题上的分歧相比,纳赛尔可能更关心反对沙特阿拉伯和驻在亚丁的英国人的运动。但他的盟友同所有阿拉伯王国中最反动的国王伊玛姆的矛盾、他本人对沙特君主政体的敌视(这种敌视据说是因为沙特君主政体的反动性而产生的)以及他对想同也门合并(这种合并不是在伊玛姆统治下的合并)的亚丁左



翼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已变得过于明显,因而,伊玛姆的反叛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宽慰。在伊玛姆脱离埃及的控制之后,纳赛尔试图为南阿拉伯半岛制定一项能解决某些矛盾的“民族解放”政策。结果,从开罗指挥“也门解放运动”的宣传任务委托给了一个三人小组,他们的领导人是老一代的改良主义者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祖贝里,另外两人是分别来自也门和亚丁的较为年轻和激进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其中,穆赫辛·艾尼是亚丁工会驻开罗负责同国际工会同盟联系的代表。他出生在也门,但是在开罗受的教育。去亚丁工作之前,他曾在索邦当过学校教师。另一位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比德海尼的人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出生在开罗,是一位也门移民的儿子。他也是在埃及受的教育,并同纳赛尔的一位亲密同事安瓦尔·萨达特的一个妹妹结了婚。他作为巴德尔王储的一位经济顾问在也门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59年伊玛姆疯狂迫害改革者时返回开罗。比德海尼更赞成在温和的纳赛尔社会主义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也门共和国,而不是只对教长职权进行立宪改革。

在1962年的前9个月中,生病的伊玛姆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在他的心地善良但软弱的儿子巴德尔等着继承教长职位时,针对他搞的阴谋变本加厉。公众对伊斯兰教长统治下的不满与恐怖以及对巴德尔的缺乏信任,将不可避免地酿成这个或那个集团反对他的政变。当记者在革命之后去采访萨拉勒时,他常常对记者说:“你怎么能指望人们不起来反对这种状况呢?即使这个国家是由猴子居住的,它们也会起来反对伊玛姆和他的野蛮政权。”在也门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各式各样的反对党分子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其中包括军官、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后者主要由商人组成。他们组成了一个人数虽少但很有力量的集团。在也门军队的400名军官中,有86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或与它有联系,其中许多人在埃及或伊拉克受训时就已变成革命者了。另外还有大约80名从外国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与一些商人构成了这一新运动的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在

军官阶层中还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人们的政治观点都各不相同，他们当中有改良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复兴党人、穆斯林协会会员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但他们在推翻伊斯兰教长政权和使也门现代化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同商人阶层相比，他们对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更感兴趣，而商人阶层的主要目的则同老一代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是想进行能使他们分享更大权力的立宪改革，打破王室对贸易的垄断，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府。如果伊斯兰教长政权同意进行民主改革，那么这些改良主义者将同意它继续存在下去。

埃及人同上述组织都有联系。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被明确说成是埃及的“工具”。埃及人主要是同也门军队的军官们，特别是同萨拉勒有联系。萨拉勒的观点属于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埃及人曾同萨拉勒商谈，建议他发动革命政变，但萨拉勒拒绝了，因为这一建议没有考虑到也门的部落状况和外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后来发生的政变是由一批比较激进的年轻军官发动的，萨拉勒事先对此一无所知。

当伊玛姆艾哈迈德于1962年9月19日去世、王储穆罕默德·巴德尔继承王位时，危机达到了顶点。反对派意见分歧和缺乏准备，秘密的革命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分裂。有些人主张立即发动革命，另一些人则受新的伊玛姆许诺进行改革的迷惑，想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巴德尔是否会演变成一位立宪君主。萨拉勒主张谨慎行事，他想同时得到部族和军队两方面的支持。青年军官在一位25岁的中尉阿里·阿卜杜勒·默尼的领导下采取了行动。这些人决定以谋杀新伊玛姆的方式迫使秘密革命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者及早采取行动。9月26日晚上，巴德尔在萨纳的王宫里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当他开完会准备离开时，他的卫队中的一位军官企图开枪向他射击，但未能成功并遭到了逮捕。这一企图失败后，另一批革命军官于半小时后用坦克和大炮向伊玛姆的王宫发起进攻。直到射击开始萨拉勒才接到通知，并同意作为未来的总统参加革命。军官

们抢占了广播电台,并经过一夜的交火占领了王宫。

起义者最初以为伊玛姆已死在王宫的瓦砾之下,并从萨纳和开罗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一消息,但伊玛姆却逃出城外,进入了山区。他在沿途聚集了数千名效忠于他的宰德派部落民,在离沙特阿拉伯边境不远的也门北部山区的岩洞里建立了总部。然后,他向阿拉伯各国政府发出电报,谴责这次政变是由纳赛尔操纵的。

在萨纳,起义者已在萨拉勒领导下建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他们宣布了伊斯兰教长政权的倒台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于9月28日在萨纳成立,三名流亡开罗的领导人加入政府,比德海尼成为萨拉勒的副总理,穆赫辛·艾尼当上了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祖贝里成为教育部长。

这场革命最初在城市和部分农村中受到了广泛欢迎。但革命者忧虑地注意到,过去搞的一些政变都被王室的残余成员在部落民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扼杀了,因而,在政变成功后的最初几天里,革命军官用近乎恐怖的手段屠杀了20多名伊玛姆过去的支持者、王室成员、部族领袖和政府官员。

革命者呼吁纳赛尔支持他们反对可能从沙特阿拉伯或在亚丁的英国人那儿来的外国干涉。他们还想从埃及得到技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帮助。纳赛尔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向也门派去了更多的技术人员、顾问和一些埃及空军分队,同时加强了已驻在也门的埃及军事使团。也门军队仅有20架陈旧的约克式运输机(这些老掉牙的飞机没有几架还能飞行),而且仅有一名飞行员。这次革命最初看起来几乎是完全成功的,纳赛尔向也门提供有限的援助就是为了使新政权巩固其地位。新政府似乎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因而,英国和美国驻也门的外交官劝告各自的政府承认也门新政权。

然而,这场革命在国外引起的反响不仅使纳赛尔,而且使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它已不仅仅是也门的内部事务。这场革命受到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舆论的热诚欢迎,它们将其看成是解放一个臭名昭著的落后国家的进步行动,是阿拉伯半岛内第一场现代革命运

动。正因为如此，也门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仍统治着除英国的殖民地亚丁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君主、神权和酋长政权的忧虑。在沙特阿拉伯，这场革命将使沙特阿拉伯政府更加感受到要求改革或推翻君主政权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作为纳赛尔反对阿拉伯国王们运动的一部分，由埃及的宣传和情报部门的鼓动造成的。在亚丁，也门革命受到了阿斯纳杰领导的政党和工会大会的民族主义反对派的热烈欢迎，它们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是也门工人，也门革命增加了他们对最终统一也门的希望。这场革命还加强了他们反对英国制订的南阿拉伯半岛联邦计划，这一计划将把相对先进的亚丁城同比较落后的保护领地苏丹国合并。同时，这场革命也强化了各殖民领地的统治者同英国人的联盟，因为那些苏丹担心在亚丁和萨纳的激进的联合主义运动的夹击下，他们的统治将被推翻。

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赖在亚丁的军事基地不走，并阻止纳赛尔的影响扩散到波斯湾的石油酋长国。建立南阿拉伯半岛联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一个殖民地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效率。后来英国人感到这一设想还有一个更诱人之处，这就是在联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苏丹进行统治，但命运掌握在英国人手里的南阿拉伯半岛国家。在这个政治框架内，英国也许能无限期地占有亚丁基地。以这个基地为依托，英国将能够继续支持它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

也门是纳赛尔动用埃及武装力量公开以支持一场当地革命的方式而进行干涉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纳赛尔虽然曾向叙利亚派出过军队，但那是在合法的叙利亚政府的请求下采取的行动。他的这次干涉还有另一种危险：这是自一个世纪前易卜拉欣帕夏的远征以来埃及军事力量首次出征一个阿拉伯半岛国家。正像穆罕默德·阿里向土耳其苏丹在阿拉伯和叙利亚的宗主权进行挑战引起了支持虚弱的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人的帕默斯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的敌视那样，纳赛尔对阿拉伯半岛传统统治集团的挑战，不仅遭到已经对他表示怀疑的英国人的敌对，而且也受到美国人的反对。



除了石油利益以及同沙特阿拉伯的长期政治关系之外，美国人在中东还以和帕默斯顿相似的方式支持反对共产党人的集团。

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则是苏联支持也门革命并向纳赛尔提供保卫这一革命所需要的经济援助、武器和技术指导的原因。苏联人希望能逼迫英国军事力量早日离开亚丁，希望英美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保护制度迅速削弱直至最终崩溃。尽管如此，除了提供武器、援助和技术人员外，苏联人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承担直接卷入也门的义务。当时，苏联人刚刚从古巴导弹危机中体会到，在后勤援助不如美国有利的情况下，以及他们的被保护人不完全处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地区承担军事义务的危险。此外，他们对也门革命本身也持怀疑态度。1962年11月23日的《消息报》写道：“如果我们认为在也门存在着一个由革新派组成的一致阵线，那就等于把希望当成了现实。”

纳赛尔后来承认，他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是一个“错误的举动。我们从未料到它将会变成后来那种样子”。当时进行干预所冒的风险并不像后来真正出现的那样大。这首先是因为外界对也门革命的反应一开始是混乱的。也门的伊斯兰教长政权一直以残忍和落后而臭名昭著，因而，没有任何政府愿意真正站出来保卫它。只要革命政权成功地维护住自己的统治，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不愿因支持一个已经失败的政权而招来它的怨恨。此外，这场革命以及埃及人对它的支持给英国人和美国人造成了进退两难的窘境。由于宰德派伊斯兰教长政权一直声称历史上的也门包括英国的保护领地在内，因此它成为英国在亚丁地位的主要外部挑战者。如果也门新政权准备致力于内部改革，不再坚持它对英国保护领地的要求，那么即使纳赛尔在萨纳的影响有所增加，这场革命对英国人或许仍有某些好处。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保卫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与他们想同纳赛尔保持较好的关系并使他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反共力量的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他们最后认识到，镇压也门革命并不能保护沙特阿拉伯政权；能保护这个政权的最好方法是进行内部改

革,使那里不会出现也门式的革命。

在沙特阿拉伯王储费萨尔因出席联合国会议而不在沙特的情况下,沙特国王的内阁成员对也门革命的反应不一,而且迟迟不能做出决断。部分内阁成员赞成承认也门革命政府,这些人出身平民,其意见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也门革命将影响整个阿拉伯半岛,它必然会导致反对沙特阿拉伯君主政体的动乱。一些年轻的亲玉们也持这种观点,他们中有四个人在沙特国王的异母兄弟、前财政大臣塔拉勒亲王的带领下逃离沙特阿拉伯,并宣布他们支持纳赛尔。但就在沙特国王自己犹豫不决时,他的家族的其他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开始组织援助也门保王党的行动了。在这方面,他们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鼓励。约旦国王侯赛因率先加入了这场斗争,并把它当作回击纳赛尔的一种手段。

到10月中旬,金钱、武器和其他供应品已通过沙特阿拉伯边界被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在宰德派亲王们统帅下正在也门山区组建的军队。约旦把飞机派到沙特边境地区,并送去供训练也门人使用的军械及技术人员。大批埃及部队也开始通过海路到达也门。在10月的最后一周和11月的第一周,埃及人的飞机轰炸了沙特边境城镇奈季兰里和周围的供应基地与训练营,埃及军队还从海上炮击了红海沿岸的一个沙特阿拉伯村庄。

10月24日,费萨尔王储从纽约返回,代替他的兄弟沙特国王成为首相。他断绝了同埃及的外交关系,大大增加了沙特对也门保王党人的援助。他从巴基斯坦和比利时为也门人购买了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也向也门人提供了资金。纳赛尔怀疑,英国人和美国人支持的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费萨尔还寻求美国帮助阻止埃及的进攻,如有可能的话则说服埃及撤出其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他还试图以一些早该实行的改革来加强沙特君主政体的地位:他放宽了关于公共道德的瓦哈比法(该法极为严厉),并命令彻底废除奴隶制——也门共和国政府在一个月前已颁布了类似法律。

在萨纳政变一个月后，共和主义者仍控制着主要的城市 and 大部分乡村，但保王党人在沙特的金钱和武器的帮助下，正在北部和东部山区及沙漠部族中积聚力量。看起来，共和主义者需要埃及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如果他们想把他们的统治扩展到全国、甚至只是为了确保他们自身的生存的话。10月底，纳赛尔派他在也门政治问题方面的主要助手阿米尔和安瓦尔·萨达特去也门，以便向他报告那儿的情况。阿米尔要求增援军队。埃及军队深信，只要再增加一部分兵力它就能控制这个国家。纳赛尔现在面临着极为困难的抉择。他未曾料到除了提供一些武器、金钱、少数顾问、技术人员和飞机之外，他还得供应更多的东西。现在，他将被迫向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而这场战争却发生在许多埃及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国度里，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和埃及没有什么关系的野蛮而文化落后的国家。此外，同沙特阿拉伯的冲突还将使纳赛尔同美国的关系恶化，而他近来一直在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美国的经济援助对埃及的发展计划是宝贵的。

另一方面，不干涉的政治风险也不可忽视。如果也门革命在求助于纳赛尔的支持之后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势力击败，他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将遭受严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遭受叙利亚脱离的打击后一年多来，除了阿尔及利亚这个仅存的盟友之外，埃及在阿拉伯各国政府中已被孤立起来。在埃及，纳赛尔一直在努力保护他的阿拉伯政策免受“埃及第一”主义者的批评。1962年春，他以妥协的方式结束了他同阿米尔之间的危机，这一妥协使他的地位同军方相比相对虚弱，他需要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提高自己的威望。他再不能冒犯军方。军方通过阿米尔向他保证，只需适当的增援部队就能很快击溃保王党人的抵抗，并教训一下沙特阿拉伯。在阿米尔和军方渴望取得军事胜利时，纳赛尔则主要对也门共和国的生存感兴趣。如果这一目标能用与鲜血和金钱相比代价较小的政治手段来实现的话，那将是再好不过了。因而，在同意派更多军队去也门的同时，纳赛尔也开始通过美

国进行谈判,以求得一旦也门共和国的地位得到保障,他将能使他的军队脱身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对也门革命的最初反应是准备把它看作阿拉伯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真实表现,并同时向沙特阿拉伯保证,反对因埃及武装力量进入也门而形成的对沙特阿拉伯的任何威胁。10月25日,肯尼迪总统写信给费萨尔,向他保证美国将全力支持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完整。一个月后,肯尼迪又写信给费萨尔、侯赛因国王和纳赛尔,提出了也门和解的要点。他建议,把撤出埃及军队和结束沙特阿拉伯及约旦对保王党人的援助作为第一步。美国承认也门共和国政权被认为是这一交易的一部分,尽管不清楚这种承认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埃及承担撤军的义务为条件的。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空军中队被派往利雅得和吉达显示力量,以警告纳赛尔不要把空袭扩展到沙特领土。

在1962年12月19日美国承认也门共和国时,也门共和国政府许诺遵守它的国际义务和条约,并同所有邻国和平相处,这一声明被理解为也门共和国政府保证遵守包括1934年英国—也门条约在内的所有条约。埃及也表示支持也门的声明,并宣布,在沙特和约旦对被推翻的伊玛姆的支持结束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愿意“采取相应的措施,迅速脱离接触,并分阶段从也门撤出其军队,只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提出这种要求”。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西德、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承认了也门共和国政府。英国政府宣布,它不卷入也门的内部事务,但以萨纳政府并未完全控制全国为由而没有宣布对它的承认。英国采取这种态度与其在亚丁的地位有关。

纳赛尔试图以向英国人保证他对亚丁没有野心的方式减少对他的干涉的反应。他说服萨拉勒降低共和国政府对保护领地拥有主权要求的调子,并主动向英国人建议达成一项交易,这一交易的内容包括共和国政府将悄悄地放弃这种要求;作为回报,英国应承认也门共和国政府。英国外交部认识到阿拉伯革命运动是也门革



命的基础,因此它倾向于接受这一建议,把南阿拉伯半岛联邦计划推迟到形势明朗时实施。它认为,纳赛尔当时不想削弱英国在亚丁的地位,因为他不想让伊拉克占有科威特,而亚丁是英国军事力量在波斯湾活动的基地。但英国政府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当时在邓肯·桑兹领导下的英联邦关系与殖民地事务部和驻亚丁的英国高级官员则坚决主张,不应与纳赛尔作任何交易,应尽快推动亚丁和前西部保护领地政府合并为一个南阿拉伯半岛联邦政府。为了这一目的,不应过早地承认萨纳政府,因为这样做会使那些苏丹们、特别是拜汉的统治者不安,而拜汉统治者的支持对新联邦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相反,应对经过英国控制的联邦领土转运给也门保王党人的援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政策受到了重视也门冲突中部族与宗教矛盾因素的分析家的支持。根据他们的分析,如果埃及人撤出,正在支持王室的山区宰德派部族战士必定会击败对共和国提供主要支持的相对不那么好斗的莎菲派平原居民。如果埃及人留下来,他们将陷入一场反对山区部落的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战争。无论出现哪种情况,纳赛尔都将受到损害。如果他想减少他的损失,撒手让也门共和主义者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作为阿拉伯革命领袖的威望将受到损害。其余阿拉伯国家将会在一段时期内不受他的影响。如果他继续战斗,他的财力将被倾注于一场遥远而无结果的战争中,从而削弱他在埃及的地位,限制他在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

事实证明,这种分析以及强调力量对比的作用、认为也门革命已不可逆转的看法都是对错参半。埃及人确实被牵制在一场长期的战争中,但以宰德派部族为基础的保王党人的力量显然也被夸大了。在埃及人与共和主义者起初忽略了部族和宗教因素的同时,那些想支持保王党人获得胜利的人也低估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宰德派和那些部族被分裂了。一些人支持共和国,因为他们一直憎恨伊玛姆的世俗统治。一些部族支持保王党人,因为他们的战斗有人付钱,形势有利时,他们就会改变立场,投到另一面去。这些

分裂促成了由温和共和主义者组成的“第三种力量”的脱颖而出，他们准备以妥协结束埃及和沙特人对也门的干涉。

在某些方面，萨纳新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它首先采取的措施包括废除奴隶制，结束为伊玛姆利用的部族敌对制度，改革税收、教育和市政机关的计划等。比德汉尼副总理拟订了一个以政府和私营企业为基础的两年经济计划，私人贸易取代了王室过去的垄断，并受到鼓励；一年半后建立了国营的重建与发展银行，发行了一种新的银币。他们认为不需要根据埃及的模式进行土地改革，因为也门的农业问题并非是土地短缺的问题。但构成也门 3/4 最好耕地的王室不动产被没收充公。

埃及的顾问、医生、教师、工程师和军官们帮助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也门人，使他们的政府走向现代化。他们帮助建立学校、医院和农业机构，训练军队。在第一年里，共和国控制地区的入学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从革命前的 1/20 增加到了 1/10。

新政府许诺用民主原则、人权和现代民事和陪审法规代替随心所欲的仲裁制度。这些许诺体现在 1963 年 4 月颁布的新临时宪法中，该宪法是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宪法为蓝本而制订的。萨拉勒成为总统、总司令和总统委员会主席。

也门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它的政府成员构成。开始时，政府成员中包括了过多的不知名人物，过多的莎菲派而不是宰德派人士，过多的被怀疑是由埃及提名的从开罗返回的也门流亡者。因而，它缺少足够的著名人士和部族领导来代表在一个极为保守的传统社会里仍需要的基础的东西。尽管萨拉勒自己在革命前已上升到最高军职，并且是一位宰德派人士，但他的弱点是出身低微，是一位铁匠的儿子。1936 年，在伊拉克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时，萨拉勒被派到巴格达接受军事训练。他带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返回也门军队。在伊玛姆叶海亚统治下，他的政治信仰使他两度坐牢。在叶海亚被暗杀后，他被判处死缓，在哈杰城堡里度过了 7 年时光。据说他研究过纳赛尔的《革命哲学》和关于法国

大革命的书。他把自己被释放和提升为军队总参谋长归功于王储的影响。尽管他最后变得不得不严重地依赖埃及的支持,但萨拉勒并非是埃及的一个简单的傀儡。他是一位也门爱国者,像其他也门人一样,他为自己的信仰而冒过生命危险。

在立即废除伊斯兰教长政权的行动中,革命政权不明智地忽视了伊斯兰教长在宰德派教徒,甚至那些反对伊玛姆的世俗统治的宰德派教徒中所起的精神作用的重要性。一些年轻官员在处理宰德部族的宗教敏感性方面的轻率和粗暴引起的怨恨同埃及人的到来混合在一起;埃及人不仅是外国人、是被狂热而独立的北部部族视为征服者的人,而且在宗教上是莎菲派。即使在接受了埃及人帮助的地方,他们也因其恩赐者的态度而受到憎恨。在拿钱去收买那些犹豫不决的部族的忠诚方面,共和国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接管了一个空虚的国库,它在外国的财产已被沙特阿拉伯冻结了。

到1963年初,也门战争的主要模式已开始呈现,共和主义者和当时在也门已有1.5万军队的埃及人控制着包括荷台达和外交首府塔伊兹港口在内的沿海平原,这些地区全是由忠诚的莎菲派教徒居住的同情共和国的地区。但共和国军事位置的主要轴线是从政府首都萨纳向北延伸到萨达的狭长的山岳。主要城市以外的山区大部分由居住在难以接近的村庄中的宰德派部族居住。但并非所有宰德派部族都支持保王党人,两个最大的部族同盟哈希德和巴吉勒的一部分开始时支持共和国,其他的部族被分裂或在向何方效忠方面犹豫不决。共和主义者和埃及人已用装甲纵队推进或空投伞兵部队的方式在东北及萨纳—萨达南方沿线建立了前哨阵地,但他们未能切断保王党人的供应线及保王党人与沙特阿拉伯和南阿拉伯半岛的交通。保王党控制着北部山区、东部沙漠地区和萨纳周围的山区的一部分。他们能够骚扰共和主义者的交通线,迫使共和主义者和埃及人的一些前沿阵地只能依赖空中补给,他们还阻止了埃及人继续向前推进,但未能切断共和主义者通向荷台达的供应线或占领萨纳。埃及人利用装甲力量突击和空中攻击

的联合行动阻止了保王党人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战争双方的行动都是残忍的。保王党人经常残杀俘虏，割掉他们的耳朵或鼻子，对被怀疑投靠敌方的村庄进行残忍的报复。埃及人也残忍地用飞机轰炸保王党人的村庄，包括在轰炸对方或可疑的部族人时使用毒气弹。埃及的空中攻击有助于阻止保王党人的军事行动，但这种攻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埃情绪，加强了部族对保王党人的支持。

任何一方都未表现出执行肯尼迪总统脱离接触计划的迹象，在阿米尔和萨达特对也门进行了另一次访问后，埃及向也门派了更多的军队。1963年2月底，埃及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把打击东北部保王党总部和保王党人同沙特阿拉伯及南阿拉伯半岛联邦的交通线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在占领东南部的马里卜和哈里卜城，并突入东北部的保王党人地区后，进攻势头渐渐消失。因而，这次进攻没有实现它的主要目标，但它却打破了保王党人对萨纳的威胁，迫使他们转入防御。

由于无力很快获得军事上的胜利，纳赛尔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外交。他感到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比过去更有利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在也门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而且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形势再次向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在伊拉克，他的对手卡西姆在2月8日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暗杀，因同情纳赛尔主义而被卡西姆一直关在监狱里的阿莱夫取代了他。这一军事政变是由阿莱夫和其他军官完成的，但伊拉克新政府中有很多人是复兴党成员。一个月后，一个由泛阿拉伯主义的军官和复兴党人联合发动了类似在伊拉克发生的政变，夺取了叙利亚政权，但复兴党人的地位更为突出。在叙利亚政变两天之后，伊拉克新政府建议，五个“解放了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应建立“军事统一”阵线。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推动下，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于4月份在开罗举行谈判，商讨宪法统一问题。

看起来一度萎靡不振的纳赛尔的“阿拉伯革命”现在似乎再次



鼓满了风帆。埃及不再孤立了。在阿拉伯世界再次出现了一种看法,那就是纳赛尔和复兴党将是席卷阿拉伯国家、使其走向联合和公正社会的未来潮流。也门只是以阿拉伯革命为一方与以帝国主义大国支持的阿拉伯国王和反动派为另一方之间更大冲突的一个战场。这种政治分野不仅在革命者一方,而且也在他们的对手一方明朗化。美国的飞机和战舰正在为沙特提供保护伞。1月份,英国恢复了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已因对布赖米绿洲的争端而中断近8年时间。同时,1月18日,英国在亚丁议会只有少数票赞成、当地民族主义者反抗的情况下,匆忙地完成了亚丁和南阿拉伯半岛联邦的合并。在联邦同也门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地区重新出现了冲突。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显然正在准备加入“阿拉伯革命”,因此作为纳赛尔政策和威望的考验的也门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也门是妥协还是战斗,纳赛尔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

就国际方面而言,也门形势不仅有地区性竞争者卷入的危险而且有大国卷入的危险。因而,美国和联合国提出了以脱离接触为基础达成一项解决方案的新倡议。1963年3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尔夫·邦奇去也门和开罗访问。在开罗,纳赛尔向邦奇保证,如果沙特停止帮助保王党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准备撤出自己的军队。纳赛尔向4月份同他会谈的美国代表埃尔斯沃恩·邦克大使作了同样的保证。在此之前,邦克在利雅得曾同费萨尔会谈,费萨尔对脱离接触计划表示怀疑,虽然这一计划附带有美国的保护承诺。

这两次访问于1963年6月促成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向也门派遣200人的联合国观察团,监督协议的执行。联合国观察团将监视、报告和阻止沙特阿拉伯向保王党力量提供供应的任何行动、监督埃及人从也门的最终撤出。一旦协议生效,双方应立即停火。

这个脱离接触协议在其主要目标方面注定要失败,埃及人没有撤走,沙特阿拉伯可能至少在继续对也门保王党人提供一些援

助。因为，崎岖的山区地形、语言问题和夜间观察所受的限制使联合国观察团极难知道供应是否正在送达保王党人手中。由于制止战端重开的努力已明显失败，联合国观察团终于在一年之后（1964年9月）撤了出来。

尽管如此，脱离接触协议和联合国观察团仍带来了两个有益的结果：它们阻止了战争可能升级到大国卷入的程度；它们使战争从1963年4月到9月暂停，以及在以后一段时间中不断出现心照不宣或公开的局部休战。在当年的最后3个月里，一些规模有限而无明显结果的战斗又重新恢复了。

这时，阿拉伯事务的趋势已再次变得对纳赛尔不那么有利了。由军人—复兴党人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推动的“阿拉伯革命”巨浪正在幻灭的冬天退潮。从埃及人几乎是全文发表的开罗联合谈判报告中就可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纳赛尔本人对由伊拉克和叙利亚革命开辟的阿拉伯联合的前景就未存幻想。他对复兴党人深表怀疑，因为他把1961年叙利亚脱离的责任归罪于他们。此外，复兴党本身也仍处于分裂状态。

因为巴格达政变推翻了已公开成为纳赛尔敌人的卡西姆将军而在开罗受到欢迎，新的伊拉克总统阿莱夫上校也以埃及的朋友而著称。一个月后在叙利亚发动政变的军官对埃及和纳赛尔也持有几分同情；因而，当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主动接近纳赛尔并讨论3国的联合时，纳赛尔很难拒绝，因为他们已给阿拉伯的舆论带来热切的期望。

纳赛尔认识到，如果联合能够成功的话，“这个联合的国家将从油田通过输油管延伸到苏伊士运河——也就是说从亚洲延伸到非洲。这将使伊拉克军队列阵于以色列边界，其潜力也许比法国还要大，其人口将达到4000万”。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将鼓励阿拉伯世界寻求进一步的联合。

但是，他不仅怀疑它能否实现，而且注意到如果它真的实现的话，埃及将被卷入新的危机之中并背上新的包袱。特别是伊拉克有

严重的麻烦，如果埃及的社会主义化计划被用于伊拉克境内的外国石油公司的话，它可能会像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那样使纳赛尔陷入同西方大国的尖锐冲突中。除非联合意味着由中央控制经济，否则，埃及也许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承担由伊拉克单方面决定石油公司国有化而造成的巨大后果的责任。当时，伊拉克还存在着库尔德人的叛乱，这场叛乱像也门那样是代价高昂的游击战；伊拉克还存在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问题。这二者都已引起了莫斯科的非难。同伊拉克的联合还意味着准备面对伊拉克的邻国土耳其、伊朗以及把这一联合视为对其在波斯湾利益威胁的英国人的敌对。伊拉克武装力量向叙以边界的移动也将会招致以色列人的进攻，特别是如果3国的联合导致侯赛因国王的垮台或约旦依附于这一联合的话。

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在开罗开始，经过3月下半月的初步会谈之后，不久就表明，纳赛尔和复兴党领导人正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接近联合这一主题：一方面真诚地相信阿拉伯联合的价值，并渴望获得它，这种感情大都表现在对法律形式和抽象的理想与概念的讨论中；另一方面谈判更关注于联合的外表而不是实质，他们是在策略上谈判，每个代表团都在试图利用联合服务于自己的国内政治目的。

纳赛尔担心出现复兴党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可能作为支配力量、然后在他们的控制下把这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前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了同叙利亚联合的教训之后，他宁愿缓慢地走向联合，只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有同他的政策目标相同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就行。但他说，他准备再次尝试，因为联合是“所有阿拉伯人的希望，它在我内心深处”。

尽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人都把阿拉伯联合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但他们担心那种已经威胁过他们政治个性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联合形式也许会再次使他们完全处于纳赛尔的控制之下。他们谋求同纳赛尔谈判，主要是为了避开舆论界以及在政

变中扮演了突出作用、使他们得以掌权的持联合主义观点的新纳赛尔主义军官的压力。复兴党人知道,这些力量对他们来说仍很强大,以至于他们不能冒在排除埃及的情况下联合在一起的风险。复兴党人真正想要的是关于形成一个未来的联邦国家的基本宣言,这一宣言将有效地解除纳赛尔或他的支持者对复兴党人地位的任何威胁,同时,这一宣言又要含糊和朦胧到足以使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人至少在今后两三年内自由行动。

埃及关于开罗谈判的报告是一个极为吸引人的文件。它是曾经发表过的有关阿拉伯秘密政治谈判及纳赛尔在秘密政治活动中的表演的最详尽的记述。它是阿拉伯革命思想的本质和特性的最好披露:它的坦率与狡诈、真挚与肤浅、鲁莽的理想主义与小聪明的奇异结合,它的理智源泉范围的广阔与它们的应用范围的狭小,它的战略的朴素与它的战术的精妙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报告还勾划出了纳赛尔的政治个性的力量和弱点。他运用理智、策略技巧和纯粹的个性力量支配着谈判。他巧妙地改变他的情绪。有时候,他耐心地倾听和辩论,显示出他明显愿意妥协。然而,突然之间,他又会发起一个无情的,有时是报复性的攻击,对一个对立的论点或人物作出尖锐而又常常是幽默的分析。在同叙利亚的复兴党领导人、两位温和的知识分子比塔尔和阿弗雷打交道时,他有一种猛虎般毫不留情的嘲讽技能。他还固执地关注所讨论的口号和宪法方案背后的权力事实。他可以惊人地坦率,但却对批评极为敏感。他认识到权力的雄辩,但却未认识到雄辩的力量;他给人留下印象但不去说服别人。在现实主义地分析和理解政治问题并剖析它们的实质方面,他超过了他的同事和其他大部分阿拉伯领导人。但他过分猜疑,以至于无法与别人分享权力,因而未能找到办法去调动那些同他有着共同目标、但却反对他的方法的人。

在各方就任何未来的联合形式都应是一个联邦,而不应是一个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后,复兴党人,特别是叙利亚人想把注意力集中在限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宪法结



构及明确的权力范围上来。但纳赛尔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对集体政治领导及一支联合的军队意见一致,没有它们,联邦宪法只不过是继续分裂的主权国家的幌子而已。纳赛尔认为,在中央政治领导中,他面对的不应是纯粹由复兴党人构成的、联合起来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代表团,因为复兴党人因此可能控制联邦的 2/3,还可能会在一些事情上通过投票压倒埃及从而影响到整个联邦国家的事务。

在联合政治机构中央的构成和权力方面未达成任何协议。接下来谈判集中于另外两个问题:已一致同意的政治行动全国宪章的措辞,这一宪章是以纳赛尔的埃及宪章为基础的;还有联邦宪法的起草。在谈判即将取得最后结果时,复兴党人突然改变了他们的立场。他们一直在催促迅速制定一部宪法,并强调这部宪法需要有一个议会民主形式(尽管这种民主仍受到一定限制。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敌人的政党和个人活动是被禁止的)。现在,他们却要求把宪法搁置起来,要求有一个直到举行大选为止的过渡期,要求把联邦的合并从数月延迟到数年。在过渡期间,他们只想在一个共同的而不是联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在 3 国之间形成一种松散的联合。

纳赛尔认识到复兴党人现在已从全面联合的立场上退却,便以追溯复兴党人一直在鼓吹的民族理想、谴责他的个人独裁的方式来嘲笑他们。

为了避免谈判以公开破裂而告终(这显然会激怒阿拉伯舆论),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并在 4 月 17 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了已一致同意的目标:建立在一位总统领导下的联合的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联邦国家。这一总统职位的人选不可避免地落在纳赛尔身上。这个联邦国家将有一个一致同意的“联合宪章”及一部宪法,一个以 3 个地区的民族阵线为基础的中央政治领导机构。在 5 个月内将举行公民投票,选举总统和他的副手,并批准宪法和政治宪章。在 20 个月内,包括设立美国式众议院和

参议院内容的联邦宪法将生效,并举行议会选举。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将在总统的领导下维持松散的联合,而总统的统治则通过总统委员会和内阁来执行。

乍看起来,这一联合似乎是比较 1958 年埃及同叙利亚的匆忙合并更加谨慎和明智的通向联合的解决办法。但这一协议的空洞显然暴露无遗。不管其动机如何,纳赛尔关于权力实质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按照纳赛尔的观点,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埃及与复兴党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增强。对这种信任的考验,在他看来,将取决于复兴党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其他亲纳赛尔的联合主义者合作的程度。

在 5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纳赛尔都不在埃及。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进行了庆祝胜利式的 12 天访问,然后又继续去南斯拉夫访问铁托。纳赛尔和铁托注意到,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和苏联、美国、英国之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即将达成,国际集团之间的紧张出现了缓和。但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和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斗争的尖锐化给不结盟国家带来了新问题。5 月 22 日,纳赛尔飞往亚的斯亚贝巴去参加非洲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他们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纳赛尔的国际威望似乎又回到 1961 年叙利亚即将脱离之前的最高峰。他是一个新联邦的既定总统——至少原则上是,这一新联邦比原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更大。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约旦国王侯赛因正表现出寻求同他和解的姿态。在也门,战斗实际上停止了,而且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政治解决机会,这一解决方案将使新的也门共和国完整无损。纳赛尔也在改善埃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摩洛哥除外,因为,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正支持由本·巴尔卡领导的摩洛哥左翼激进主义者反对国王和他的保守同盟者。埃及已恢复了同法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自苏伊士运河事件以来,第一位英国大臣费雷德里克·埃马尔以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了埃及。西德经济部长谢尔博士也访问了开罗,波恩已给予埃及条件优惠的 8 亿西德马克的长期发展贷款。纳赛尔在

已正式联合为一个组织的非洲国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尼赫鲁正全神贯注于印度对中国的边界争端，纳赛尔和铁托作为不结盟运动组织积极分子的地位因而显得更加突出。纳赛尔的中立主义活动的一部分是试图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起调解印度和中国的争端。埃及总理阿里·萨布里于1963年4月去北京访问，试图说服中国接受不结盟国家组织的调停建议时，途中还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据认为，萨布里已向苏联人保证，目前通向阿拉伯联合的行动并非是为了结成一个反共产主义阵线，开罗将努力说服伊拉克人减轻对当地共产党人的迫害。

纳赛尔还试图避免卷入中苏之间为影响亚非国家展开的斗争。当中国总理周恩来于当年年底抵达开罗访问时，纳赛尔清楚地表明，他同中国的友谊不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亚非国家不想从任何人那儿输入革命，而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返回埃及后不久，纳赛尔接待了——应埃及的要求已推迟很久——也门总统萨拉勒的来访。萨拉勒在当年早些时候同他的内阁中的首要亲埃及者比德汉尼发生争吵，他解除了逃到亚丁、后来又返回开罗的比德汉尼的职务。现在，萨拉勒急于作为“解放了的国家”之一而赶上新的阿拉伯联合的浪头，以增加自己的声望。他遭到了纳赛尔的拒绝，纳赛尔显然无意把也门引进一个正在拟议中的但已摇摇欲坠的阿拉伯联邦机构。

总之，新的阿拉伯分歧的阴影这时已再次降临到纳赛尔的光明前景上。在开罗协议达成后不到一个月，叙利亚和伊拉克复兴党内两个互相竞争的派别与他们的非复兴党亲纳赛尔的联合主义者盟友之间的权力竞争已经开始。在叙利亚，亲纳赛尔的联合主义者被从军队和政府中清洗了出去，更为激进的复兴党人的影响开始增长，他们倾向于如有必要就“单干”的思想，主张在复兴党左翼社会主义政府之下，建立没有地方盟友、没有纳赛尔的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联合。

5月17日，纳赛尔通过《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告诉世人，他

不能再与叙利亚复兴党领导人合作或共存了。但更糟的事情也即将来临,7月份,一些反对同纳赛尔公开决裂的温和叙利亚复兴党人被从政府里清除,拥有更激进观点的复兴党军官阿明·哈菲兹接管了政府。7月18日,一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联合主义者试图发动反对哈菲兹将军新政权的政变,但未能成功。27位涉嫌的策划者,其中包括13名军官,14名文职人员被处死。这是叙利亚现代史上对政变者最严重的血腥镇压,阿拉伯舆论对此极为震惊,因为它们习惯于叙利亚的温和传统。叙利亚通常对未成功的政变者判处监禁或流放。

这次处决对纳赛尔和埃及来说不啻是一个极大的打击。7月22日在开罗和4天后在亚历山大的两次讲话中,纳赛尔对复兴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宣布埃及已不再受4月17日联邦条约的约束了。掌管大马士革的复兴党人是“法西斯分子、机会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对他们来说,联合意味着“支配、恐怖主义、谋杀、杀戮和绞刑”。叙利亚复兴党人则以指责纳赛尔是一位“独裁者”和“分离主义分子”来回击。

伊拉克总统阿莱夫上校试图调解纳赛尔和复兴党人之间的新矛盾,希望拯救4月条约。他8月份访问了纳赛尔,9月份又去了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他为叙伊军事和经济合作达成了一项协议,随后叙伊之间最终形成了开罗条约规定的联邦。10月7日,叙利亚和伊拉克宣布它们的军队实现了联合。但巴格达复兴党领导人内部和复兴党人与民族主义军官之间的危机正在增长,这一危机起源于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复兴党全国大会。这次于10月5日至10月23日举行的会议是阿拉伯政治及叙利亚与纳赛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该党全国总部的组成和它正式通过的政策表明,复兴党正急剧向亲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左派靠拢。大会决定赞成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联邦式联合,并同时为日后埃及加入这一联合敞开大门。在联合的联邦内将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和集体农业政策,在坚持积极的中立外交政策的同时,大会号召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阵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由前内务部长阿里·萨利赫·萨阿迪领导的更为激进的复兴党人迫切要求实施党的新计划,即使同纳赛尔和他在伊拉克的支持者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这导致了伊拉克复兴党的分裂。尽管如此,这一在巴格达发展起来的危机,不仅仅涉及是接受倾向于埃及还是叙利亚的政策问题,而且也是由萨阿迪控制的真主党民兵“国家卫队”权力增长的问题,这支民兵队伍是为了弥补复兴党人在军队中缺乏影响而建立的。“国家卫队”已开始血腥地残害受怀疑的共产党人,并在当时的大街上出现了一种全面的恐怖势力。

11月18日,在阿莱夫总统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莱夫领导下,军队抓住复兴党内部继续争吵不休的机会在巴格达进行干预,解散了国家卫队,推翻了政府。作为一个全部由军队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的首领,阿莱夫总统接管了全部权力,成立了一个由军官、温和的复兴党人、无党派行政管理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新政府。开罗广播电台立即称赞他从“犯罪的、不可知的、反阿拉伯的、反伊斯兰的复兴党集团”手中拯救了伊拉克。

1963年底,在叙利亚同埃及再次发生争吵、伊拉克处于危机中、也门内战的战火再次突然燃烧起来、亚丁机场发生爆炸事件后亚丁宣布紧急状态、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因发生边界纠纷而发生战斗、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内战爆发的情况下,中东又处于一种为人熟悉的动乱状态。但另外一个旧有的、在过去的7年中相对沉寂的冲突因素再次出现,并开始反过来缓和另外一些纠纷。这就是以色列准备将约旦河上游河水改道、把它纳入以色列国家灌溉系统的计划即将完成。在过去两年里已把同以色列的对抗束之高阁的阿拉伯国家,现在正面临着包含有战争危险的挑战,而这一挑战正好发生在它们联合的希望已被再次打破之时。

对纳赛尔来说,约旦河水给他提出了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如果有人请求他冒战争的风险去阻止以色列的改道计划,那他将不得不为了叙利亚和约旦的利益而行动,而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却因

各种原因同他尖锐对立。它们同他的所有合作,其中包括军事上的合作,现在实际上都已不复存在了。另外,他清楚地知道,在其他方面的负担,包括他自己对也门承担的军事义务,使得阿拉伯人处于一种无力打败以色列的地位。然而,如果他们试图用军事行动来干预以色列将约旦河水改道的话,他们就必须准备应付战争升级。如果准备认真地对付以色列的挑战,阿拉伯人就必须把他们自己的争吵放在一边,以加强他们的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他们将不得不找到一些能对付以色列将约旦河水改道的、迅速而机智的应对措施。不然,埃及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承担一场由别人引起的战争的主要压力,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无法取胜。然而,已经担负起阿拉伯的领袖角色、现在又同阿拉伯的国王们和“反动派”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敌对革命者处于竞争地位的纳赛尔,无法简单地回避以色列问题,这一问题特别能引起叙利亚和约旦舆论的关注。纳赛尔当时唯一的选择是缓和他的“阿拉伯革命”政策,接受同敌对的阿拉伯政府的合作,至少是共存,他也许希望因此而组成一个更为联合的阵线,同时又能以分散责任的方式引导阿拉伯领导人谨慎从事,从而扩大在战争和平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

也许是由于也门战争代价的上升和第二次建立更紧密的阿拉伯联合努力的失败,纳赛尔乐于有这样一个修改他的阿拉伯政策的机会,希望借此从无结果的争吵和代价高昂的承诺中暂时解脱出来。12月23日,他发出了召开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以讨论约旦河水问题的呼吁。同时,他还暂时停止了反对他的阿拉伯对手——沙特国王、侯赛因国王、哈菲兹将军、叙利亚真主党人和哈桑国王(他因同阿尔及利亚的边界纠纷而受到开罗的攻击)——的宣传活动。

1964年1月13日至17日,第一次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在开罗举行。

## 第十五章

### 阿拉伯冲突与阿拉伯共存：也门、沙特阿拉伯、 复兴党人与马格里布(1964—1969)

开罗最高级会议宣告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纳赛尔奉行的政策是阿拉伯世界的“共存”和调整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在阿拉伯事务中，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也门问题的和平解决和采取一种针对以色列的谨慎、联合的阿拉伯政策。他以前曾坚持认为只有同他一起奉行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才能与他合作；现在，他又回到了埃及的一项传统政策上去，那就是，在阿拉伯联盟的框架内寻求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它们不敌视埃及就行。纳赛尔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伊拉克的关系改善了。这种变化的象征是：约旦于1964年6月承认了也门共和国，纳赛尔与阿莱夫于1964年5月和12月达成埃及—伊拉克“联合政治领导”（它实际上意味着阿莱夫与纳赛尔及各自政府定期进行协商）的协议。但是，阿拉伯革命并未被忘却，阿拉伯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总是甜蜜与光明的。

纳赛尔同叙利亚复兴党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继续，纳赛尔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断断续续地发展。叙利亚政府变得日渐孤立，有一段时间几乎受到经济封锁，这是由于叙利亚复兴党的内部斗争使叙利亚政府更偏向于左倾，因而受到埃及、伊拉克和约旦的敌视。在也门，战争仍在和平运动的间歇里继续，战火不时以短暂剧烈的战役、游击活动及空袭的方式突然燃烧起

来。在北非，纳赛尔也遭到了挫折，首先是他的阿尔及利亚盟友本·贝拉于1965年6月被军队领导人布迈丁上校推翻，其次是大约与此同时哈桑国王在摩洛哥恢复了全部权力。几周之前，纳赛尔还同突尼斯的布尔吉巴总统发生了争执。

纳赛尔并未放弃他的阿拉伯革命斗争，他鼓励反对英国人及亚丁和南阿拉伯半岛苏丹们的民族主义起义。从开罗最高级会议那天起，他的话题之一就是要求关闭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外国军事基地。其矛头直接指向英国人在亚丁和波斯湾的军事基地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

纳赛尔对西方大国的态度在挑战和妥协之间交替变换。1964年7月，他就南阿拉伯半岛问题主动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建议。如果这一建议被接受的话，它也许已经保证了当时显现出来的英国在亚丁的长期战略利益，也许还会确保南阿拉伯半岛有秩序地过渡到独立。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纳赛尔宣布，他准备承认一个真正独立的南阿拉伯半岛国家。他在保留英国在亚丁的一个军事集结地点和一个也许会被用来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全面的军事基地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他表示并不反对前者。他同意通过英国人同南阿拉伯半岛民族主义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而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南阿拉伯半岛国家，但并不坚持要求它同也门联合。

纳赛尔在继续维护他的意识形态及民族独立的同时，同苏联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这种奇妙关系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5月来埃及访问、参加阿斯旺大坝的竣工典礼时得到了证明。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同纳赛尔就共产主义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竞争的成就进行了愉快、但却是固执的辩论。

赫鲁晓夫与妻子和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米别伊）一起在埃及度过了16天。他在埃及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说，支持阿拉伯国家对约旦河水的“正义要求”，支持纳赛尔关闭亚丁、利比亚和塞浦路斯的外国基地的呼吁。

5月13日，在纳赛尔陪同下，赫鲁晓夫参加了为环绕大坝的



尼罗河水改道而举行的仪式，他点燃了炸去将水控制在阿斯旺峡谷中的沙坝的炸药。然后，赫鲁晓夫又同纳赛尔一起乘船来到阿斯旺大坝现场。由于酷热难当，赫鲁晓夫缩短了他在卢克索古迹的旅行，但抽出时间向纳赛尔及其他聚集在埃及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包括萨拉勒、本·贝拉和伊拉克的阿莱夫总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原理的演讲。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赫鲁晓夫说，阿拉伯人应考虑到列宁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而不是一种肤浅的、纯阿拉伯的所有阶级的联合，“阿拉伯农民和阿拉伯工人，”他说，“更倾向于我，而不是阿拉伯封建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

几天后在开罗，显然是由于阿莱夫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的刺激，赫鲁晓夫宣称，阿拉伯的联合应建立在劳动人民力量的基础上，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回答，纳赛尔为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辩护。他说，埃及联合的目标并非是种族上的联合。在赫鲁晓夫离开开罗回国的前一天，纳赛尔宣布，苏联给予埃及一笔用于工业计划的1亿英镑的新的长期贷款。

纳赛尔同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在开罗最高级会议期间就也门问题进行了谈判，但进展缓慢。也门保王党人发起的一场军事进攻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为了阻止这次谈判。在这场历时几个星期的进攻中，保王党人切断了萨纳和荷台达之间的交通。纳赛尔同生病的沙特国王在开罗最高级会议期间的会谈只不过是象征性表示和解而已。但在3月份，纳赛尔派陆军元帅阿米尔去了利雅德。阿米尔同沙特王储费萨尔达成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埃及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外交关系，两国在也门均没有野心。3月底，利雅德发生了宫廷革命，大多数亲王在宗教领导人支持下迫使国王沙特把他的全部权力交给费萨尔，费萨尔作为实际上的国王统治了7个月，直到11月2日沙特被正式废黜，费萨尔才在名誉上也继承了王位。

在此期间，也门共和国阵营中正在出现分裂。认为继续战争和埃及的军事存在比同保王党妥协更为有害的“第三支力量”正在向那些想依靠埃及帮助获得共和主义胜利的人挑战。萨拉勒的军事

政府与那些想制定一部更加自由的宪法的人也有着矛盾。埃及人试图说服共和主义者建立一个准备谈判的联盟,但条件是这种联盟不要造成也门政府同开罗关系的破裂,或使埃及人不体面地匆忙撤出。在1964年4月对也门进行第一次访问时,纳赛尔亲自做出了和解的努力。

但是,直到1964年9月在亚历山大举行第二次阿拉伯首脑会议时,解决也门问题的活动才真正开始出现进展。在这次会议期间,纳赛尔同费萨尔进行了谈判。为了加强在会议上讨价还价的地位,埃及人在也门及时地发动了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们进攻了也门西北部的保王党人阵地,使用了坦克、战车、伞兵以及由部族非正规军支持的步兵。到7月份时,纳赛尔认为这次进攻将获得完全的成功,对保王党人的胜利已经在望。但他的乐观被证明是错误的,埃及切断保王党人同沙特阿拉伯交通联系的主要目标未能实现。在遭受很大损失后,埃及武装力量最后撤了回去。

在9月份举行的会议上,纳赛尔和费萨尔都表现出准备敦促他们在也门的被保护者妥协的意向。随后,11月2日在苏丹的埃雷克威特秘密举行了保王党人和共和主义代表的会谈,埃及和沙特的观察员列席了会议。双方达成了关于停火和在停火后于11月23日举行由也门各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的协议。这次政治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联合的民族政府,这一政府的使命将维持到能够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也门未来的政府为止。但是,政治协商会议未能举行,因为无法就会议的参加者和议程达成协议。共和主义者想把前伊玛姆家族的任何成员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保王党人想把其议程限制为建立临时政府,而把关于未来宪法的讨论推迟到埃及武装力量从也门撤出之后;而共和主义者坚持,必须在埃及人撤出之前就未来的也门政府将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王国达成协议。

这次会议的失败导致停火的中断和共和主义者内部争吵的加剧。数百个持不同政见的共和主义者、部族酋长、宗教领导人和军官被萨拉勒和埃及人逮捕。1964年12月,3位首要的自由主义者:

副总理阿卜杜勒·拉赫曼、埃里亚尼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祖贝里以及咨询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诺曼辞职。他们谴责萨拉勒政府“腐败、无能和堕落”，要求制定一部更为自由的宪法。

这些变节行为使持不妥协立场的哈桑·阿姆里将军成为总理。与此同时，埃及人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并再次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却几乎没有占领新的地区。一些有影响的共和主义的部族人士一直对埃及的军事介入耿耿于怀并日益表现出难以驾驭的迹象。他们威胁说，除非让诺曼代替阿姆里将军当总理，否则就要占领萨纳。

面对没有希望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纳赛尔于1965年春决定进行重大的政策变更。他命令撤出那些比较遥远的埃及前哨阵地，把埃及武装力量集中在也门中南部的山丘地带，共和主义者可从这儿更容易地保护他们的主要据点，而且代价更低。同时，他同意让诺曼作为总理组成新的也门共和国政府，把这一政府作为通向和平解决新尝试的跳板。

诺曼是一位对宪法和社会改革具有西方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曾当过前伊玛姆巴德尔的家庭教师。同萨拉勒及其他革命者一样，他也在伊玛姆艾哈迈德的要塞监狱里呆过几年。在1955年和1962年期间，他曾被流放到开罗。他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有能力的政府，但这一短命政府仅延续了10周。当萨拉勒未同他的总理协商就建立了一个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来处理所有战争事务时，诺曼宣布辞职，并飞往开罗向纳赛尔求助。

诺曼相信，也门共和主义者与埃及之间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主要纠葛源于埃及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他认为，纳赛尔倾向于通过政治妥协解决也门问题，而以阿米尔为首的埃及军事领导人为了追求军事胜利的荣誉，继续设法使战争升级。纳赛尔曾私下劝告诺曼不要坚持把也门称为共和国，如果它是同保王党人达成协议道路上的障碍的话。诺曼曾经描述说，在他事前未征得埃及的同意而

试图同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时，在也门的埃及当局停止了对他的政府的财政援助，从而使他的政府受挫。当他飞往埃及去见纳赛尔时，他发现埃及总统完全同意他的和平计划。但在次日同纳赛尔的第二次会议上——安瓦尔·萨达特也在场——纳赛尔的调子却改变了。他说他们必须把这件事交给阿米尔处理。他们一块去了阿米尔的住宅。当阿米尔宣称埃及不能接受由也门人单独谈判的一个解决方案时，纳赛尔也改变了他先前的态度，反对起诺曼的计划来！

诺曼和几位飞往开罗加入他的行列的支持者被扣在了埃及首都，不允许返回也门。几十名诺曼的追随者在萨纳被捕。萨拉勒在萨纳又组成了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军事政府，阿姆里再次被任命为总理。

和平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遥远。据报道，埃及人正在加强他们在也门的军队，人数已超过5万人。纳赛尔在1965年7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威胁说，如果费萨尔不停止对保王党人的供应，埃及将恢复轰炸沙特阿拉伯基地。但仅在一个多月后，局势就再次改变，纳赛尔飞往吉达同费萨尔谈判一个新的和平协定。

推动纳赛尔去寻求和平的原因之一是也门战争正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使埃及付出日益增长的代价。埃及军队的死伤正在达到数千人，数千万英镑已经被花在战争及对也门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上。

到也门服役可得到额外津贴和购买并带回在埃及买不到的外国产品；因而，所有埃及军人并不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对埃及公众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生命和金钱正在被浪费在一个与埃及利益无关且遥远而忘恩负义的国度里；而在这个时候，埃及自身却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债务中，难以给自己的五年发展计划提供资金。迅速工业化造成的经济紧张正在带来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政治不稳的迹象。战争负担因也门战争受到国际方面的



冲击而加重。

1964年秋，华盛顿的约翰逊政府明确向纳赛尔表示，除非他作出更大的努力解决也门战争问题并撤出他的武装力量，否则他就不能指望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正受到国会中反纳赛尔游说者的压力，要求政府中止对埃及的援助。不幸的是，埃雷克威特停战协议达成后，纳赛尔很快就在刚果问题上同美国发生了冲突。在千奇百怪的刚果政治生活中，前分离主义领导人冲伯脱颖而出，成为刚果中央政府的首脑。由于人们认为他应对卢蒙巴的被暗杀负责以及依赖白人雇佣兵，因而他受到更为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诅咒。1964年7月在开罗举行第一次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时，尽管冲伯是刚果总理，但大多数代表团投票决定把他排除在会议之外。当冲伯来到开罗时，埃及政府极感为难，冲伯被相当礼貌地软禁了一段时间。冲伯在金沙萨权力中的崛起促使更加激进的卢蒙巴主义残余分子和斯坦利维尔地区的支持者发动了反对他的政府的起义。在非洲统一组织解决刚果内战的努力失败之后，纳赛尔对斯坦利维尔的起义者给予道义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支持因苏丹拒绝让武器和物质过境运交起义者而受到限制。因而，纳赛尔发现，自己站在了正在支持刚果中央政府的美国的对立面。

美国飞机运载了参加夺取斯坦利维尔并拯救被扣在那儿的欧洲人质行动的刚果政府军和白人雇佣兵。在斯坦利维尔的军事行动引起了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抗议。在开罗发生的一次骚乱中，美国大使馆的图书馆被烧毁。约翰逊总统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反应因一个与此无关的意外事件而加强。这一意外事件是，约翰逊总统的一位私人朋友的飞机被埃及的高射炮火击落，这架飞机偏离了它在埃及上空的航线，对一个盘问信号未能作出反应。约翰逊告诉纳赛尔，除非开罗采取对美国更友好的态度，否则美国将中止对埃及的援助。1964年12月，纳赛尔在一次急躁而具有挑战性的讲话中对约翰逊作出了回答。他说，如果美国的援助意味着政治附加条件的

话，埃及没有援助照样能活。他粗鲁地告诉美国人，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援助去“喝红海水”（用美国的一个词来说是“滚蛋”）。美国中止了进一步供应剩余小麦，但两国关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埃及的道歉和同意支付赔偿为结束争吵铺平了道路。但从那时起，开罗与华盛顿之间的信任关系至少可以说动摇了，美国的援助不可靠了。

这就是纳赛尔同费萨尔国王在吉达会谈的背景。经过两天的秘密谈判，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再次确认了在也门停火和举行全国政治会议的原则，这些原则已在埃雷克威特会议上达成一致，但未能实行。协议规定，埃及军队将从1965年11月23日开始的10个月内撤出，沙特阿拉伯将停止对也门保王党人的所有援助以及停止利用它的领土支援也门的军事活动。关于也门政府未来形式的全民投票将在不迟于1966年11月23日举行，也就是说在埃及的最后一名士兵撤出两个月后举行。为了决定全民投票前的过渡政权和临时政府，一个由5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将于1965年11月23日在也门的哈拉德召开，这50名代表由共和主义者和保王党人分别派出。

纳赛尔和费萨尔之间似乎还有一个秘密协议，这一协议的内容是在谈判解决方案期间把萨拉勒总统和前伊玛姆巴德尔排除在全国会议和也门之外。无论如何，萨拉勒离开也门去了开罗，并在那儿一直呆到1966年9月返回萨纳再次接管权力时为止。巴德尔移居到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变成了保王党人领导人中一位比以前更无价值的人物。

作为坚定的共和主义革命者的萨拉勒和旧神权君主政体为主要象征的巴德尔离开也门，被认为可能会有助于也门人为他们仍在争吵的问题找到一个妥协的答案。他们争吵的问题是也门过渡时期的政府应该如何称谓。是应该把它命名为一个共和国呢，还是将它简单地命名为一个“也门国”呢？后一种命名也许会为伊斯兰教长政权的复辟敞开大门。哈拉德会议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仍以陷入僵局而告结束，部分原因是由于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也门人自

己的不妥协是会议破裂的主要原因,但在僵局持续期间,也导致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信赖开始再次崩溃。费萨尔因哈拉德会议开始一个月后埃及人仍未表现出撤军的迹象而产生怀疑。沙特人认为,埃及许诺的撤军是无条件的,而埃及人则宣称,他们的撤军是以达成临时政治协议为条件的。

另一方面,沙特同英国达成的一项大宗武器交易引起了纳赛尔的不安。与美国合作的英国人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向它提供喷气式战斗机、地对空导弹和雷达装备的价值超过1亿英镑的武器合同,其中包括派技术人员培训沙特人使用这些新武器。报纸报道了这一交易之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汤普森于1965年9月访问了利雅德。汤普森还去开罗拜见了纳赛尔,他到达开罗的时间同英国因面临日渐增长的民族主义骚乱而决定在亚丁中止行宪刚好巧合。纳赛尔拒绝会见他。

纳赛尔认为,英国人现在正在把沙特作为一个伙伴来武装,英国人最终还可能把沙特作为保护南阿拉伯半岛联邦和海湾石油酋长国、反对当地受纳赛尔鼓动的革命力量的继承者。(实际上,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新政府的这一政策只不过是半心半意而已。威尔逊政府发现,在继续努力坚持它在中东剩下的军事立足点和同纳赛尔及当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达成一项新的政治协定之间很难作出选择。它来回摇摆于两者之间,结果两者都未得到。同沙特达成武器交易主要并非英国的阿拉伯政策,它部分地是商业性出口,部分地是为了帮助支付购置美国飞机费用的一项安排。英国订购了美国飞机来配合它的“东苏伊士”政策,英国人计划继续维持英美海空军以及通讯系统在印度洋的存在。)

纳赛尔的怀疑因英国在亚丁严厉镇压南阿拉伯半岛联邦起义而加强。在他看来,如果英国人万一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亚丁的基地的话,他们似乎决心在南阿拉伯半岛留下一个由苏丹控制的、同沙特阿拉伯结盟的附庸国。这两个国家都将由英国来武装,并由躲在幕后的英国空军和海军来支持。纳赛尔把它看成是一个阻挠阿拉

伯半岛的革命运动、确保英帝国主义一旦从门口出去、又能从窗口爬回来的诡计。他认为这同吉达协议的精神有直接的矛盾。吉达解决方案是在没有外国列强干涉的情况下由阿拉伯人自己达成的，它基本上是埃及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协议。这一协议的内容是，双方都不以军事力量干涉在一个阿拉伯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努力及其后果。

沙特人有理由辩解说，他们购买英国飞机和美国导弹是对埃及可能用苏式飞机对沙特领土进行轰炸的一个自然的防御性反应。他们反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纳赛尔从苏联购买武器那样自由地从西方购买武器呢？但是，当费萨尔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同伊朗国王一起呼吁召开伊斯兰国家会议时，纳赛尔的怀疑进一步加剧了。因为，费萨尔同伊朗国王这一行动的明显意图是把这一会议作为阿拉伯联盟最高级会议和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呼吁的对立物。纳赛尔把伊朗国王视为阿拉伯的敌人，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以色列并向它供应石油。伊朗还是巴格达条约的继承者——中央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它向也门保王党人送钱送枪，据说它还在秘密地帮助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起义，而且对巴林的阿拉伯酋长国提出主权要求，并准备充当波斯湾未来的领袖角色。

伊斯兰国家会议的主意——从未像纳赛尔描述的那样被当作联盟的建议提出来——是混乱的和不合时宜的。这个主意是错误估计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政治中的作用的结果。这一错觉曾促使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鼓励国王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位领袖同纳赛尔抗衡。如果说它的动机是明显的话，那么伊斯兰会议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实际上，它从未对埃及的影响构成严重威胁，也没有给费萨尔带来什么好处。但纳赛尔却把它看成是英美企图在阿拉伯世界扮演更积极地支持“反革命”或“反革命力量”角色的象征。在他看来，就像美国已经在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正在做的那样，这也许意味着，一旦埃及军队离开后，沙特阿拉伯和南阿拉伯半岛的苏丹们也许会马上联合起来扑灭也门革命。



1965年12月23日，在塞得港的一次讲话中，纳赛尔谴责了费萨尔和伊朗国王的新举动。他警告也门的保王党人，如果他们像他们所威胁的那样重新开始战争，共和主义者将予以回击。两个月后，英国政府在它的《国防白皮书》中宣布，它准备从南阿拉伯半岛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并在南阿拉伯半岛独立后的1968年放弃它在亚丁的军事基地。

英国的声明似乎对纳赛尔改变其从也门早日撤出埃及武装力量的主意起了重大作用。他的也门政策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那以后，这一政策不再仅仅是为了永久性地政治解决也门内战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适应使埃及军队呆在那儿直到英国人从南阿拉伯半岛撤出时的短期目标。

在也门击败保王党人并进而控制全国的努力将被放弃。也门的中央山岳、沿海平原和南部的的主要共和国地区将得到安全的却也是防御性的控制。纳赛尔的主要进攻行动将间接地指向沙特人、英国人、也门保王党人和南阿拉伯半岛之间假定的联盟中最脆弱的部位——南阿拉伯半岛和亚丁。在这儿，利用向民族主义者的起义提供武器、训练、金钱和政治支持的方法，纳赛尔就能像沙特在也门那样廉价地干涉，并更有可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他认为——后来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支持联邦的南阿拉伯半岛苏丹和亚丁保守派依赖英国的支持来维持他们的地位的程度比也门共和国依赖埃及还要深。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纳赛尔的脑子里也许有一个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传播阿拉伯革命的更为深远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也门共和国的剩余部分将同南阿拉伯半岛——在英国人撤离后，它本身将受到民族主义游击队和埃及军队的联合力量侵扰——形成一个革命基地。根据这些推测，阿拉伯革命将通过“阿拉伯解放运动”游击队的联合，从南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沿海，传播到海湾的石油酋长国，并最终传入沙特阿拉伯的心脏地带。通过在阿拉伯的卫星国体系，纳赛尔到时候将成为主要的中东石油供应者，他可以把它用作为针对西方的政治武器，并能抽取石

油收入用以资助埃及耗资巨大的经济发展。

这些推测似乎忽略了阿拉伯半岛地理方面的一些严酷事实：距离遥远和陆上交通不便。也忽略了纳赛尔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政策指导的根据。纳赛尔确实认为“阿拉伯解放”是世界范围的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他认为，国王、酋长、苏丹们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是陈旧的，这种统治在于使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中世纪状态，应该予以改变。他认为，如果阿拉伯国家联合行动，而不是彼此分离的话，它们就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包括石油）利益方面比世界其他地区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如果他们有联合的外交政策，那这一政策只能是不结盟的。因为，由分别同西方或东方集团结盟的国家之间组成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但是，纳赛尔并未给人留下他想实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政治联合的错觉，这种错觉是由于他同叙利亚的两次不成功的宪法合并或像某些西方领导人所分析的那样，他试图通过征服建立一个帝国而产生的。纳赛尔无论怎样野心勃勃，都会从自己的经验中看出，一旦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正取得完全独立，它首先想要的就是独立于开罗。

南阿拉伯半岛的民族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开始，纳赛尔支持南阿拉伯半岛民族主义起义组织中更为温和的南也门解放阵线。该组织在流放地塔伊兹和开罗成立，而且是成立在英国宣布亚丁处于紧急状态、中止宪法、恐怖主义爆发、对亚丁工会大会和人民社会党领导人被捕和流放之后。南也门解放阵线是由阿卜杜勒·阿斯纳杰和其他一些工会大会和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同前亚丁的部长马卡维一起成立的。这些领导人开始时反对恐怖主义，阿斯纳杰准备通过联合国的调停与英国谈判达成一项解决方案。但是，在其主要竞争对手民族解放阵线采取恐怖主义活动的压力下，再加上由于英国迟迟未能提出一个阿斯纳杰及其同事能够接受的、有希望幸存的政治条件，南也门解放阵线被迫逐渐采取了更为极端的立场。民族解放阵线要求英国人绝对无条件地撤出并结束

苏丹的统治。民族解放阵线开始时只由一小部分坚定的年轻革命者构成,但它很快得到支持,特别是当英国军队开始在反恐怖活动中对亚丁人民进行猛烈打击的情况下。

在一段时期内,南也门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竞争明显反映出埃及内部类似于在也门内战问题上的矛盾。有证据表明,在纳赛尔仍在支持阿斯纳杰和马卡维的谈判政策时,在也门的埃及军事情报部门却在援助坚信只有恐怖主义和不谈判才能说服英国人离开亚丁的民族解放阵线。也许是纳赛尔自己正在拉着他的弓的两根弦。但是,当起义的势头增强,民族解放阵线聚集了更大的力量时,埃及人正式把他们的支持转向了民族解放阵线,但并未完全抛弃南也门解放阵线。在英国的新闻媒介中,民族解放阵线经常被简单地称作埃及的恐怖主义工具。直到起义的最后阶段,当民族解放阵线开始表现出它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本土基础和坚持维护它独立于开罗的权利时,英国新闻媒介仍这样认为。然后,在家乡亚丁受到民族解放阵线打击、不得不从他们在也门和开罗的流放地开展活动的南也门解放阵线领导人,又开始被英国新闻媒介称作埃及的走狗。

关于纳赛尔的也门冒险的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纳赛尔对此行动缺乏计划。他以支持也门革命、打破沙特扑灭这一革命的企图的笼统概念予以干涉。这一行动符合他的总目标和他在当时的政治目的。但他的政策在和平与战争、脱身与增援、妥协及与沙特阿拉伯冲突之间不断摇摆,不仅表明了埃及内部的政治分歧,而且说明他的也门政策同他的首尾一贯的更广泛的阿拉伯和海湾战略没有什么联系。奇怪的是,直到他认为他明白了什么是他的对手明显的敌对战略概念的具体表现时,他才开始澄清他自己的目标。

如果他能在也门坚持到英国离开南阿拉伯之时,幸运的话,那儿的苏丹们将已经被推翻或被迫对民族主义者作出让步,那么,他认为由英国支持的反对也门共和国的钳形攻势就已被挫败。即使他不期待也门共和国和民族主义的南阿拉伯半岛之间在埃及支持

下形成联合,他也能希望自己在同费萨尔恢复谈判时处于更强的地位。在最坏的情况下,英国武装力量从南阿拉伯半岛撤出也能使他在另一个阿拉伯解放行动中分享一份荣誉,从而使他更容易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从也门撤走他自己的武装力量。

因而,纳赛尔在也门展开的控制性行动有四个方面。第一,由共和主义者和埃及人控制的地区被进一步收缩到使共和主义者的中央设防地区更容易控制,这一地区包括也门的大多数人口及萨那一塔伊兹—荷台达三角形防线内的主要城市。第二,需要一个可信赖并接受埃及人存在的共和国政府,这一政府要坚强到足以镇压那些可能想及早推翻它的也门人。第三,作出更大的努力巩固革命政权,以经济和社会援助的方式增强埃及的影响。第四,保王党人的进攻和保王党人政治联合的企图将被制止,特别是在更后来的阶段,用对保王党部族活动的山区和沙漠村庄进行残酷轰炸的方式加以制止。

在采取这种政策方面,纳赛尔也许受到了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许诺的鼓舞。这种援助不仅给予埃及,而且也给予也门共和国。加快英国从亚丁的撤离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苏联人还公开认为,他们正面对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革命进攻,其中越南就是最残忍的例证。他们把英国的“东苏伊士”政策看成是为了帮助美国充当“世界宪兵”角色。在冷战的这一新阶段,同中国的革命竞争已成为莫斯科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寻求促成“进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更紧密的联合。苏联特别想让纳赛尔同叙利亚恢复友好关系。1966年2月23日,叙利亚复兴党的一个好战的左派组织夺取了政权,并同莫斯科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促使纳赛尔同叙利亚恢复友好关系是1966年5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开罗的目的之一。

以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为象征的阿拉伯“共存”时期结束了,但它是1966年7月纳赛尔拒绝参加计划于9月份在阿尔及利亚举



行的下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时才宣告正式消亡。1966年秋天发生的几件事表明,纳赛尔正在掀起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在开罗,吉达协议后被任命为总理的毛希丁被西德基·苏莱曼取代,毛希丁是一位提倡经济节约和避免阿拉伯冒险的人物,而新总理苏莱曼则是一位没有独立政治立场或观点的、倾向于更快发展经济的工程师出身的官员。同叙利亚的一个新的防务协议签订了,反对沙特阿拉伯君主制度的激烈的宣传运动发起了。萨拉勒总统被派回也门去接管政府、镇压共和主义者中要求更加独立于埃及的日益增长的宣传活动。在哈拉德会议中断和战争重新开始之后,埃及人一直依靠萨拉勒和他的副手哈桑·阿姆里将军管理政府。但是,阿姆里并不像埃及所期望的那样可靠,他发现埃及对萨那的控制日益讨厌,特别是埃及军队阻止他直接得到苏联集团的军事援助,并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来分配武器。他已开始同诺曼、埃里亚尼和其他自由的共和主义领导人接近。纳赛尔决定派萨拉勒作为总统兼总理接管也门政权,尽管阿姆里提出抗议,萨拉勒仍于8月12日乘飞机抵达萨那。阿姆里试图用武力阻止萨拉勒座机降落,但却被埃及坦克阻止了。无法以其他方法离开也门的阿姆里和他的一些自由主义盟友乘飞机飞往开罗向纳赛尔求助,他们不仅没有受到纳赛尔的接见,反而被软禁起来。

在返回也门后6个星期,萨拉勒开始对他的共和主义反对派进行清洗,数百人被捕或流放,一些人被杀,8名被指控犯有叛逆罪的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在萨那的广场被公开枪决。

同纳赛尔一样,费萨尔也在面临着抑制他的也门被保护人的麻烦。1966年8月,他短暂地切断了对也门保王党人的供应,以阻止他们发动一场进攻。同纳赛尔一样,对费萨尔来说,赢得在也门的战争同其他相关的事情相比至少在当时已成为次要的了。只要埃及人正在撤出他们占领的地区而不是继续前进,他就满足于保王党人在原地踏步,别再浪费他的金钱。他也需要争取时间以紧急速度完成正在由英国人在也门边界安装的新的防空系统。

到 1967 年春天阿以战争前夕，尽管也门人对萨拉勒的警察镇压和大约 4 万埃及军队的存在不满，但也门共和国似乎正在增加其自身的政治稳定性，这一点是保王党人方面无法比拟的。由王室家族和贵族组成的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由政府官员、军官和商人组成的新的统治阶级所取代。这一阶级因在快速发展的教育计划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流入而得到加强。每个城都有为男女儿童设置的现代化学校，许多村子里都有了小学，以及医院、诊所、供水系统和正在帮助数世纪以来与世隔绝的也门人民结束其隔离状况的新的道路。在萨纳、塔伊兹和荷台达有 3 所由苏联人建立的中等师范学校。2000 名也门学生已被派往国外学习，其中 1000 名去了埃及，900 人去了苏联。埃及还提供了数百名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家及顾问，其他方面已有大量援助。科威特在初级教育方面提供了帮助，美国人花了 2200 万美元为也门建立了一条主要公路，中国人帮助建立了另一条。共产党集团的低息贷款援助总额达 1.18 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 2800 万美元和来自苏联的 7200 万美元，用于工业和农业项目。据信，还有几百名苏联技术人员呆在也门，其中约半数是军事人员。

战斗几乎停止了。在埃及军队控制的萨那一荷台达—塔伊兹三角地区之外的山区和沙漠地带，保王党人能四出活动，甚至渗透到萨那的郊区，虽然他们以较小组更大些的规模活动，但易受空袭。在只有沙特阿拉伯的有限援助以及缺少地方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他们无法为一个国家政权打下基础或发展经济。在埃及人已经撤出的无人的土地上，空中轰炸已经留下了被毁坏的村庄的遗迹。

尽管也门继续给埃及已经过于紧张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如果不是同以色列的战争的话，一段时期内纳赛尔还能在也门继续保持他的地位，至少呆到英国人离开南阿拉伯半岛为止。但在 1967 年 6 月被以色列打败后，纳赛尔需要将每一个埃及人和每一个皮阿斯特用来保卫埃及自身和维持它的经济。

在 1967 年 8 月底于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纳

赛尔和费萨尔达成了埃及军队到该年年底从也门撤出的协议——这一日期也是英国预定从新独立的南阿拉伯半岛联邦撤军的日期。在埃及人撤出时，沙特人将停止他们对保王党人的援助。以苏丹总理为首、由埃及提名的伊拉克代理外长和沙特阿拉伯提名的摩洛哥外交大臣组成的一个阿拉伯三方委员会将努力安排也门共和主义者与保王党人之间的和平会议和解决方案。

萨拉勒把喀土穆协议愤怒地谴责为埃及对也门的出卖。在三边和平使团到达萨纳时，迎接他们的是游行示威队伍。在这次示威游行中，一些也门人和埃及人被杀。因而，该使团只停留了不到 24 小时。但是，在一个月后的 11 月 3 日，因对一场即将发生的反对他的政变的担心，萨拉勒离开了也门。表面上是去莫斯科，实际上却去了巴格达，并留下一封辞职信。

在反萨拉勒的陆军部队接管权力后的 11 月 5 日，萨那组成了一个新政府。萨拉勒的国家元首地位被由 3 个自由派领导人组成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所取代，这 3 个人是埃里亚尼、诺曼和奥斯曼，新总理是穆赫辛·艾尼。由于其同事仍坚持除非把伊玛姆家族排除在外，否则就拒绝同保王党人谈判的立场，诺曼很快就辞了职。从开罗返回的阿姆里将军取代了诺曼，12 月 18 日，阿姆里再次成为总理。

在 1967 年 12 月 1 日至 15 日期间，最后一批埃及军队撤出时，保王党人逼近并包围了萨那。但是，关于没有埃及军队共和国就无法生存的普遍预测被引人注目地证明是错误的。对首都的包围持续了 70 天。这一包围被由阿姆里将军领导的坚定的抵抗力量和由新的也门共和国军队、伞兵部队以及突击队组成的精锐部队粉碎了。年轻的市民、知识分子、工人、店员和手艺人组成了抵抗力量，并制止了市内的恐慌。萨那市内的全体莎菲派市民宁愿战斗，也不愿冒投降后将遭受宰德派部族人抢劫和杀戮的危险，因为人们对本世纪初在伊玛姆叶海亚和他的支持者手中发生的一次类似的血腥屠杀的经历记忆犹新。

共和国的抵抗力量得到了更多苏联武器供应,这些供应据说还包括紧急飞进来的飞机。在这些年里,共和国在埃及的帮助下似乎把它自己建设得比它自己及世界大多数人认为的还要好。受到革命造就和埃及人训练的新的统治阶级精华能够自立并准备为保卫自己已经取得的果实而战。如果他们想控制山区的保王党游击队的话,也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沙特人仍继续向保王党部落出钱的情况下。但是,保王党人自己也表明,他们只不过是一种徒有其名的威胁,不可能控制国家。现在,也门形成了一种僵局,但未来的竞争对共和国有利。特别是相邻的南阿拉伯半岛在英国人完全撤出之前苏丹们的联邦政府就已完全崩溃、民族解放阵线在联邦军队的默许下已经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南也门共和国的情况下。

也门通向和平的主要障碍是部族想使战争继续下去,以便从各方获得金钱和武器。在沙特阿拉伯切断对它的援助后,战斗渐渐平息,保王党人和共和主义者再次开始寻求政治解决,但这一次是在保王党人承认共和国的基础上。到1969年夏天,尽管和平协议还未正式达成,但战争实际上已结束了。当年年底,战斗再度爆发,但几个月后沙特阿拉伯就正式承认了也门共和国。

也门战争使埃及在人员、金钱和国际友谊方面付出了极大代价。在导致1967年对以战争的灾难事件中,它也间接地起了部分作用。1967年同以色列的战争迫使纳赛尔在喀土穆会议上签署了在当时看来是羞辱的协定。如果纳赛尔曾希望在南阿拉伯半岛为埃及保留一个永久的军事据点的话,那么他确实失败了。但这不太可能是他的目的。在这一事件中,纳赛尔可以宣称,为了阿拉伯的解放及社会革命的需要和理想,埃及在也门的牺牲并非无益。也门共和国和也门革命无疑是被埃及军队拯救的,是被埃及的援助巩固的。

民族主义起义者从英帝国和当地苏丹的统治下解放南阿拉伯半岛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埃及人的帮助和也门革命。



也门革命产生的压力还加快了沙特阿拉伯政府推广社会改革。埃及人和也门革命甚至还有助于费萨尔从他的兄弟手里接过王位。

对于也门战争的延长、亚丁的起义和平谈判的一再失败，纳赛尔不是唯一应受到谴责的人，尽管他对阻止和解负有责任，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实际上负有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在南阿拉伯半岛问题上。费萨尔对保王党人的支持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些也门人的利益。在不成功地试图强行建立南阿拉伯半岛联邦和直到为时太晚才开始同民族主义反对派进行认真的谈判方面，英国政府也主要地是在追求自己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而不是亚丁人民的利益。

埃及武器给也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和灾难性的。弥补这一损失的是也门的较大的一部分被从极为落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为了少数宗教特权领导人的利益，这一制度一直以恐怖方式维持着。

无论也门战争有多么残忍，无论它给埃及带来的代价有多么高昂，纳赛尔在阿拉伯历史上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的！

## 第十六章

### 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大国：和平的破裂(1957—1967)

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纳赛尔的看法很可能不是根据他治理埃及的表现，而是根据他对西方影响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模式所持的敌视态度，特别是他对待以色列的态度而形成的。即便是那些同情纳赛尔为改造和发展埃及所作出努力的人（例如欧洲左翼人士），承认他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反对英国在中东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而展开的斗争是正义的反帝事业的人，也谴责他对以色列的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以色列分别于 1956 年和 1967 年对埃及发动的“预防性战争”。

1967 年，西方社会和以色列的许多人再次将纳赛尔看作是希特勒式的人物，认为他充当了一场大规模灭绝以色列犹太人战争的领导人或煽动者。在他们看来，激励纳赛尔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打算统治阿拉伯世界的狂妄野心，甚至是一种卑劣的种族仇恨——这简直就是西方人反犹太主义在中东的变种。支持以色列反对这种所谓的阿拉伯意图和动机也就成为对犹太人感伤的同情的自然表露。这种支持因西方人将他们普遍持有的对犹太人所受苦难的负罪感转移到阿拉伯人身上而增强了。

但是，有些西方观察家认为，纳赛尔并没有为以色列而深感担忧。他们认为纳赛尔可能是唯一一位愿意并能够同以色列人达成妥协的阿拉伯领袖，然而，由于他坚持要获得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并且错误地估计了战争边缘政策或俄国的伎俩,因此被拖入了战争。有一派思想家(其中包括一些杰出的犹太历史学家)认为,从1956年西奈战争到1967年战争期间的阿以关系史是不稳定地维持现状的历史,然而,这种现状最终却被一种新的决定性因素的介入打破了:这就是俄国人试图通过一场由代理人发动的战争,利用纳赛尔彻底消除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西方人的这些看法过分简单化了,因此导致了各式各样的误解。1967年战争的起因是很复杂的,根子也很深。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的10年间,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得也不尽相同。造成战争爆发的因素不仅有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恐惧和不满,而且有阿拉伯奉行的反帝和社会革命方针,阿拉伯各国及其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和不稳定的国际局势等。接下来,以色列本身的行为和政策也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到苏伊士—西奈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力量平衡的两个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是,以色列单方面决定改变约旦河水流向和秘密开发一座核反应堆,这将使它最终有能力造出核武器。这两个因素刺激了阿以双方在超级大国提供武器的条件下加速军备竞赛。俄国对中东的援助是造成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但美国的政策同样也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或许是纳赛尔和俄国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就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只要我们认识到纳赛尔对以色列的行为动机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本人脑子里业已形成的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的影响,那么无须更多的辩解即可搞清楚,纳赛尔所采取的那些最终导致了1967年战争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纳赛尔的看法是,美国人正在发起一场征服比较激进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并切断他们与俄国的联系的运动,他感到在这场运动中他显然会成为一名潜在的受害者,特别是在叙利亚的革命政权被摧毁、埃及已被孤立之后就更是如此。

不管纳赛尔和以色列发生冲突的动机是什么,反正他们和欧洲人的那种反犹太主义绝然不同。纳赛尔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童年时代居住在开罗时,他的邻居就是犹太人。他声称自己没有反

犹太人的偏见，而且同童年时代的一些犹太人朋友保持着联系。“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对一名来访的英国人说，“一个有头脑的埃及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摩西本人也是一个埃及人。<sup>①</sup>后来我敌视以色列的情绪和行动完全是由于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所做所为而激发起来的。”

纳赛尔是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在政治上的怀疑态度有时几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但在他的内心却没有那种会自然导致种族或民族偏见的倾向。他对作为社团的犹太人所持的态度恐怕要比穆斯林社会的传统看法更为开明。在穆斯林社会中，犹太人尽管忍辱负重，但也未遭到严重迫害，他们是政治上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遭受种族歧视的程度肯定不如当今某些以色列人歧视阿拉伯人那么严重。）在现代埃及，如同在伊拉克一样，犹太人已经在商业和文化生活中建立了受尊重并且有影响的地位：就犹太主义和以色列的发展而言，特别是就 1948 年、1956 年和 1967 年战争的结果而言，这样说大约是恰当的；即便在今天他们也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尽管它已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埃及，历史环境（部分原因和英国的占领有关）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高达大约 85% 的商业活动掌握在非埃及人和非穆斯林埃及人手中。一个独立的埃及民族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些“埃及化”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正如某些非洲国家极力要消除被亚洲人垄断他们国家的商业活动的状况一样。同样可能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情况会表现得对穆斯林多数派有利。埃及的犹太人社团无疑会因“埃及化”而在经济上蒙受一些损失，但除了阿以战争之外，他们不会因纳赛尔的统治而受苦受难。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在第三、四和六章），纳赛尔对以色列的敌视主要是由三个原因引起的：第一，毫无疑问，他同所有

---

<sup>①</sup> 摩西是基督教《圣经》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和法典大多是由他制定的。——译者



阿拉伯人一样认为,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不公正体现在成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被禁止返回现在已被以色列占据的家园。第二,以色列国的建立事实上在埃及和亚洲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陆上障碍。第三,纳赛尔担心以色列会对阿拉伯国家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不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本质上肯定是一个扩张国家,而且还因为他本人相信,以色列是远比它自身强大的外部势力——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西方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产物和工具。纳赛尔意识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带有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而犹太人并没有全部都参加这场运动;他明白西方人同情犹太人因遭受希特勒的迫害而蒙受的苦难。尽管如此,与以色列的冲突仍然使他产生了一种对犹太人的扭曲了的想法,这种看法受到了欧洲人反犹宣传的影响。例如,他抱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埃宣传产生的国际影响。有一次他曾向一位印度记者推荐说,他应读一读声名狼藉的反犹读物《犹太人祖先的礼仪》。“我将送你一部影印本。这部书表明,300名相互认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疑掌握着欧洲大陆的命运,他们从追随者中挑选他们的继承人。”

然而,不难搞清楚,为什么即使像纳赛尔这样一位明智而又见多识广的人,面对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以色列保持忠诚,以及生机勃勃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从西方国家成功地争取到了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在世界犹太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竟然会得出令西方开明人士听上去都感到不详和荒谬的结论。

与此相似,无论是纳赛尔还是其他阿拉伯人都应该看到以色列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以色列国是一场成功地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斗争及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产物。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在最早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人中,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利奥波德·埃默里以及贝尔福本人,将以色列建成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堡垒的思想恐怕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以及阿拉伯国家掀起驱赶英国军事基地的运动之后,某些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人士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美国官方显然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无论从外交上还是从特许美国犹太人聚集资金并转给以色列的经济政策上讲都是如此。在苏伊士运河—西奈半岛战争期间,以色列作为西方用以抑制阿拉伯人的工具以及它本身即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样一个概念,因法英以结盟而得到了肯定。

当然,这些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有些甚至是纯粹的不着边际。苏联曾和美国一道,根据1948年的联合国分治计划承认了以色列国,并且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帮助武装了以色列的军队。1956年,这两个超级大国发觉他们再一次暂时地站在了同一边,但这次是反对以色列及其盟国,支持埃及。西方大国的态度常常是前后矛盾的:当他们进一步支持以色列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公众的情绪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游说的影响,而且还在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其他地区反对西方立场而引起的西方人的敌视。

西方人在解释纳赛尔的政策时往往不仅夸大了他对以色列的好战性,而且也夸大了他与以色列讲和的意愿或能力。纳赛尔既不急切地盼望再打一场以夺回阿拉伯被占领土为目的的战争,也不急于实现永久性的和平,除非以色列做出重大让步。他一直把以色列问题看作是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由于解决这一问题极端困难,因此直到1967年为止,他一直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排在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的后面。(正如许多欧洲人都知道德国问题是欧洲的关键问题,但仍因一时无法解决而将之搁置一旁。)他试图暂时搁置针对以色列采取的决定性军事行动,而将发展埃及的经济(包括军事)、消除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和实现阿拉伯统一或者至少是实现共同的阿拉伯外交政策放在优先的地位。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不切实际的选择,而是出于客观实际,出于对以色列及其盟友力量的重视。他认为唯有阿拉伯

世界获得了解放和发展并且拥有一项共同的政策才能成功地对付以色列人。与此同时，他试图保持用军事或政治手段解决以色列问题的选择权，尽管他显然已考虑到任何有利于阿拉伯人的解决都将是军事力量、外交和经济压力结合起来的結果，而不能仅仅依靠打一场可能导致大国干涉的战争。

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不同，他没有说过“要把犹太人赶下大海”或“消灭以色列国家，杀尽这个国家的居民”。他预计将来或者创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杂居的国家（就像黎巴嫩是一个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杂居的国家一样），或者压缩以色列的面积，使之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犹太人避难所，并且恢复埃及和亚洲阿拉伯国家接壤的状况。西方国家也许仍然会支持这样一个面积缩小的犹太国家，但这个国家将不再会对阿拉伯国家构成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威胁，也不再是阿拉伯国家最终走向统一的地理障碍。

正式说来，纳赛尔政策的基础——也就是阿盟国家总体政策的基础——是实施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1947年的划分计划；使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或得到补偿以及耶路撒冷国际化。他还曾经表示过愿意根据1955年艾登在吉尔德霍尔演说中提出的妥协方案，寻求一种解决领土争端的办法<sup>①</sup>。阿拉伯联盟的官方政策即便不像1949年以后要彻底消灭以色列国那样，肯定也要求至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削减以色列的领土面积；使其首都国际化；使数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尽可能返回家园；将1948年以后来到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从原已划归阿拉伯人的地区遣散出去。

然而，尽管阿拉伯国家迟迟才同意实施分治原则，但这毕竟意味着它们承认了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小，其性质有了何种变化。但是，当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1965年做出了这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并提出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时，他的提议立即

---

<sup>①</sup> 参见第六章。

在中东地区引起轰动,并且导致开罗对他进行了一场攻击。

纳赛尔对以色列的担心因他对阿拉伯领导权的看法而加深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之后,纳赛尔倡导的“萨拉丁联合体”有了明显的进展。他认为通过这个联合体,他本人最终能够带领联合起来的阿拉伯国家恢复巴勒斯坦国,就像萨拉丁最终赶走了十字军那样。然而,纳赛尔对十字军的比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用这种不太痛苦的方式告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斗争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这是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的事,它的成功依赖于避免永久性的军事冒险,集中精力通过使阿拉伯社会更广泛的团结起来并实现现代化而逐步积聚阿拉伯世界的力量。纳赛尔最担心的危险是以色列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尚未重新组织起来之前便试图进行迅疾的打击。阿拉伯世界一方面不应放弃基本的要求和权利,另一方面则应避免同以色列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即便是一位目光比较短浅并且胸无大志的埃及领导人也会因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及埃及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而采取和纳赛尔相差无几的政策。

但是,在没有和平的共存和没有战争的冲突之间,政策的选择可能是极为不同的。从苏伊士—西奈战争到1967年战争期间,纳赛尔的政策一直在不断变化。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西奈半岛、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造成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紧张的两个直接因素消失了。边境非常安宁;阿拉伯突击队员没有向以色列发动猛烈的袭击,以色列也未进行过大规模的报复;以色列船只可以在亚喀巴湾和埃拉特港之间自由地航行。联合国紧急部队没有将其警戒线扩展到以色列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界。虽然这些地方仍然不断发生一些小磨擦(尤其是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非军事区内),但几年当中冲突也未扩大到激烈的程度。造成冲突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阿拉伯国家一直在抵制和阻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而以色列也一直拒绝让任何阿拉伯难民返回家园。如何分享约旦河水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控制约旦河水源附近的非军事区这一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这些争端——



特别是在约旦河水问题上的争端——引起的紧张局势因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和“阿拉伯革命”造成的影响以及以色列的国内政治等因素而加剧了。同样，大国之间在提供援助和外交支持方面、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寻求大国援助方面也存在着竞争。最后，一个新的因素——一场新出现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收复失地运动——终于造成了爆炸性的局势。

当纳赛尔成为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时，他在如何对付以色列这个问题上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他的政策在下述四个方面受到了考验：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问题；以色列策划改变约旦河水流向问题；卡西姆将军提出的创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的建议和以色列一所秘密核反应堆被泄露出来的问题。

早在1959年以色列就曾试图租用一艘丹麦货船，装载着运往以色列的货物通过苏伊士运河。这艘船被埃及人截住并扣留下来，船上的货物则被没收了。纳赛尔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仍不打算执行安理会有关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规定，除非以色列本身也执行联合国的其他决议，特别是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决议。这艘船在1960年2月被释放了，而船上的货却没有归还。后来有报道说埃及外交部长法齐博士已和哈马舍尔德达成协议，以色列货物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条件是不得使用以色列的或以色列租用的船只运输。纳赛尔对此断然否认。纳赛尔决心继续封锁苏伊士运河，他将这一措施称为“握在巴勒斯坦人民手中的一张王牌”。与此同时，他一直在顶着来自叙利亚复兴党人和伊拉克人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的压力。

1959年秋天，以色列宣布它打算在没有和阿拉伯国家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单方面实施改变约旦河水流向的计划。约旦河水的来源是分别发源于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的泉水和小溪。这条河的上游以及它穿过的太巴列湖处在以色列境内，下游则处在约旦国境内。以色列的计划引起了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惊恐。首先，它们担心这一计划会对它们国家自身

的水利发展计划产生不利影响,对约旦来说尤其如此。其次,以色列在围绕着这一计划而展开的宣传中强调,改道后的河水将用于灌溉内盖夫地区,这样成百万的犹太移民就可以在这里定居。后来,以色列人自己放弃了这项大规模灌溉内盖夫沙漠或干旷草原的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以便于较为经济地将河水用在更北边的业已可耕作的地区和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上。但在1959年5月,阿拉伯国家已经在联合国向哈马舍尔德表示了它们对犹太移民不断涌入以色列所感到的极大忧虑,以色列国民中的犹太人已从65万人增加到大约200万人。它们认为以色列的这种做法是打算“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既成事实:再没有任何土地可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按照联合国的决议返回他们的家园了”。以色列还打算以此来为已经扩大的军事机器提供人力储备并逐步造成人口过剩的危机,为对外扩张寻找借口。

1959年10月和11月,阿拉伯联盟内阁就约旦河水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纳赛尔和以阿克拉姆、霍拉尼为首的叙利亚复兴党的部长们发生了冲突。叙利亚人敦促以军事行动来阻止以色列的改道计划。先由霍拉尼提出,后被纳赛尔拒绝的一项建议要求重新阻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纳赛尔认为他是出于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才拒绝叙利亚人的建议的。根据海卡尔的说法,纳赛尔曾在11月份对内阁成员讲道:“除非我能打一场对抗我们的敌人和它所能得到的一切支援的战争并确保获得胜利,否则我将不同意发动战争。”既然纳赛尔相信假如以色列遇到严重的困难,它很可能获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那么,阿拉伯国家显然难以击败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

由于叙利亚极力反对达成任何有可能巩固以色列地位的协议,阿拉伯联盟在1955年最终拒绝了有关约旦河水问题的约翰斯顿计划。导致约翰斯顿谈判破裂的另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反对与它国分享流入本国境内的河水,对约翰斯顿和阿拉伯国家达成的将整个计划置于中立的国际监督之下的协议也不满意。按照约翰斯

顿和阿拉伯技术专家一致同意的计划,阿拉伯国家应该得到总计为60%的约旦河及其支流包括耶尔穆克河的河水——叙利亚占25%,约旦占45%,而以色列将得到满足了阿拉伯国家所占配额后剩余的部分。这就意味着按照约翰斯顿方案,以色列每年将得到4亿到4.9亿立方米水,这和它原先估计的有所不同。以色列原本计划在单方面利用流经它境内的约旦河水的情况下,它每年大约可得到5.5亿立方米河水。

为了替自己单方面采取的行动辩护,以色列保证它从约旦河提取的河水(事实上是从主要的贮水地太巴列湖提取的)将不超过约翰斯顿方案分配给它的份额。然而,阿拉伯国家担心以色列最终会采用超过约翰斯顿配额规定的约旦河水。除非采取军事行动,否则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它这样做。纳赛尔非但没有像叙利亚要求的那样采取措施改变以色列的做法,反而鼓励阿拉伯联盟研究唯一的一个替代方案,以便同以色列达成一项新的国际协议。这个方案要求采取措施保证阿拉伯国家充分利用起源于或是流经它们的国土上的河水。这样做或许会减少被以色列利用的水量。与此同时,它们可以尽力确保获得约翰斯顿计划分配给它们的份额。

从经济角度上看,这场争端对每一方来说都不值得打一场战争。如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分别施行了各自的改道计划,那么每一方得到的水量和约翰斯顿计划规定的份额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距。根据一位持中立态度的专家的估计,阿以双方按照各自的方案所得到的河水和按照统一的约翰斯顿方案的分配所得到的河水相差只有大约7000万立方米或上约旦河水总量的大约1/8。阿拉伯国家独自改变哈斯巴尼河(黎巴嫩境内)、班恩亚思河(叙利亚境内)和耶尔穆克河(主要在约旦境内,但也有一部分在叙利亚和以色列境内)河道的计划从道德上、法律上和技术上说和以色列的单方面计划没什么区别。

但这场争端变成了对政治意志,而不是经济需要的考验。每一方都威胁说,如果对方将其方案付诸实施,它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加

以制止。在阿拉伯国家实力过于软弱,无法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实施其计划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承认只有在军事上有能力抵御以色列进攻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实施自己的方案。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争执停留在外交和政治斗争的水平上,只是在叙以边境的非军事区内及其周围还经常发生一些小的冲突。

造成这些冲突的起因是以色列声称非军事区属于它的主权管辖范围,它可以在此耕作,进行管理,因为这地区处于旧的巴勒斯坦—叙利亚边境的以色列一方。叙利亚人则认为这一地区的主权尚未确定,因为按照联合国监督停战协定的规定,停火线被特别规定不能作为政治边界线。叙利亚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在非军事区内继续务农和抵制以色列人驱赶他们的权利。联合国监督停战委员会应该在叙以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帮助下监视非军事区的情况。但是,以色列自从1951年后已经抵制该委员会的行动并且经常阻止联合国观察员进入这一地区视察。

1960年初,以色列对非军事区内的一个名叫塔瓦菲克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声称以色列农民受到了来自这个村庄的袭击。这次空袭表明,仍在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并没有放弃他的积极报复政策。然而,古里安的主要目的仍在于将不稳定的共处改变成根据现状而形成的较为长久的解决,从而巩固以色列从1948年战争中获得的成果。与此同时,他积极加强以色列的军备和联盟。除了在亚非国家同纳赛尔竞争,努力扩大影响,增强与大国——尤其是美国、法国和西德——的交往之外,他还试图在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政府中寻找反对纳赛尔的盟友,而且终于找到了。他没能从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里获得对以色列边境的正式担保,戴高乐也停止了法国国防部援助以色列在迪莫纳建立秘密核反应堆的行动。但这座反应堆当时已经建立起来并能提供足够的原料制造核武器。正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核潜力的担忧才使得肯尼迪总统在就职后仅数月便准备为解决阿以争端进行一次新的尝试。



1961年5月11日,恰好在本·古里安访问华盛顿之前,肯尼迪给纳赛尔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写信表示,美国愿意帮助阿拉伯国家找到同以色列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表示美国支持根据联合国的赔偿建议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同时也为约旦河水分配问题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肯尼迪允诺美国要继续向“一切决心掌握自己命运的中东国家”提供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同时也允许他们的邻国追求相同的基本目标。后边这段话表明肯尼迪的目的是劝说纳赛尔将精力放在国内的发展问题上而不要在其他国家“制造麻烦”。

令肯尼迪极为惊讶的是,纳赛尔于8月22日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中陈述了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阿美关系问题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封信是纳赛尔和肯尼迪之间讨论中东问题和世界问题的大量私人通信之一。纳赛尔在信中着意向肯尼迪表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因情绪形成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因实际感受而造成的。阿拉伯目前面临的危险以及对未来的恐惧是“过去遭受侵略的结果”。纳赛尔写道,持续不断的犹太移民“在以色列内部造成了一种压力,使它不得不急剧向外扩张”。以色列往往容易被“帝国主义”用作“从地理上分割阿拉伯国家的工具”和威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纳赛尔说他无意要求将美国同意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当作与美国取得谅解的一个条件,但他呼吁肯尼迪改变为了在总统选举中赢得犹太人的选票而忽略美国的利益和原则的状况。肯尼迪的和平倡议未能取得成果,其原因部分在于本·古里安拒绝接受肯尼迪总统提出的以色列应该通过接受一些巴勒斯坦难民而开始和平进程的建议。

在1961年和1962年,以色列问题对于纳赛尔来说已远不如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重要。尽管阿拉伯联盟开过几次会议讨论约旦河水问题,但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兴趣却集中在建

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上。

由于战争和放逐,巴勒斯坦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社会上都已变得四分五裂。留在本地的巴勒斯坦人大约为 100 万人,这些人被分割在约旦河西岸(无论是居民还是难民都享有约旦公民地位)和加沙地带(他们在此要接受埃及的军政管理)。居住在约旦河东岸的大约 100 万巴勒斯坦人同样也有约旦国籍。另外还有二三十万人散居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只有几千人在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工作。当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凄惨地滞留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署开办的难民营时,另外一些人则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成功地从事商业及其他行业的活动。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公民中占有多数;在其他国家,他们使自己跻身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当中。但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政治组织。约旦的内阁大臣和高级官员中不乏巴勒斯坦人,但掌握实权的仍然是国王和忠于国王的军队。加沙的实权由埃及掌握。加沙的巴勒斯坦政府早已是名存实亡了。

早在 1959 年,伊拉克的卡西姆将军即提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的主张,其核心是仿照阿尔及利亚临时民族政府和阿尔及利亚解放军的方式,建立一个拥有流亡政府和志愿军队的巴勒斯坦独立共和国。卡西姆的这一主张是对他的阿拉伯敌人埃及和约旦发出的挑战。卡西姆控制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左翼。虽然纳赛尔斥责卡西姆的建议是“拙劣的伎俩”,但它造成了在赢得巴勒斯坦人的效忠和控制巴勒斯坦人等方面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会对阿以关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卡西姆的倡议反映了在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当中日益增长的要求:他们应该在决定自身前途的问题上享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感到阿拉伯各国政府自以为是地忽视了他们的要求,将巴勒斯坦人简单地当作难民来对待。侯赛因国王觉得有必要在 1960 年 5 月召开一次国会会议,居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在会上重申了他们效忠于约旦。纳赛尔在开罗电台开办了一个叫做“巴勒斯坦之声”的特别节目。

1962年3月，阿拉伯联盟建议“所有阿拉伯国家均应维护巴勒斯坦实体的存在，避免任何可能导致这一实体消亡的行为”。但是，直至1963年9月一名正式的巴勒斯坦代表才被任命参加阿拉伯联盟政治委员会。这位代表名叫艾哈迈德·埃希·舒奎里，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巴勒斯坦律师，以前曾为阿拉伯联盟工作过并代表沙特阿拉伯出席过联合国会议。舒奎里是由埃及提名担任巴勒斯坦代表的，但同时也得到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支持，因为舒奎里曾在联合国支持过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斗争。

此时，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问题再次变得尖锐起来。以色列对约旦河水改道进行的研究已接近完成，这项计划定于1964年开始实施。已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掌权的复兴党政权对以色列采取了更为好战的态度，他们敦促阿拉伯国家必要时在约旦河水问题上和以色列摊牌。但就在此时，本·古里安退休了，接替他担任总理的是较为谨慎的列维·埃什科尔，这使得以色列的对阿政策变得有所节制。

然而，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一个能把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且也是能被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用来向他进行攻击的借口。叙利亚复兴党人可能会呼吁按照他们的主张采取行动，以此作为和以色列打交道的必要前提条件。约旦可能会质问为什么纳赛尔声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却又不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和约旦边境的攻击而是安全地畏缩在联合国驻约旦部队的身后，并且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沙特阿拉伯可能会明确指出，埃及军队要比在也门的阿拉伯人更容易动员起来对以作战。

1963年12月17日，纳赛尔通过埃及报界宣称，他认为约旦、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正在试图将埃及推入同以色列的战争中，而他们自己则准备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他明确表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不打算采取冒险行动而落入这一陷阱之中。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之前，埃及不愿同以色列单独作战。一星期之后，纳赛尔

在塞得港发表讲话时向他的对手发动了反攻。他呼吁召开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最高级会议，制定出一项共同的对以政策。无论会议决定的是进行战争、实现和平还是继续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共处，必须由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而不是埃及一家对此承担责任。

在首次有国王和总统参加的“最高级会谈”上（1964年1月13—17日在开罗举行），阿拉伯领导人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以色列的河水改道计划。相反，他们原则上决定继续研究阿拉伯国家的约旦河水改道方案。哈斯巴尼河将改道流入班恩亚思河，然后这两条河一同通过一条运河流入约旦境内的耶尔穆克河，那里有一套单设的灌溉系统已在运行。阿拉伯产油国，尤其是科威特，将为这项工程提供资助。阿拉伯军队的首脑们指出，如果打算有效地保护阿拉伯的河水改道工程，那么阿拉伯国家就必须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因此，开罗最高级会谈达成一致意见，建立一个由埃及将军阿里·阿梅尔领导的阿拉伯联合军事指挥部。会议还以更为正式的方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实体”。最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承诺结束彼此之间的争吵，停止进行敌对宣传。在阿拉伯革命进行了两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时代开始了。

虽然最高级会谈的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但会上仍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纳赛尔唯一没有亲自接待的国家元首、叙利亚民族革命委员会主席阿明·哈菲兹少将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与纳赛尔发生了冲突。他呼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要采取行动而不是高谈阔论，并且暗示如果埃及不干，叙利亚将单独作战。

以色列对此作出了反应。埃什科尔·克尼塞特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将按照约翰斯顿计划的规定，在1964年开始从太巴列湖抽水。埃什科尔警告说，如果阿拉伯国家试图破坏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将采取行动。

开罗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唯一迅速产生结果的是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的决定。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迅速对以色列采取行动而不是鼓励这种做法，至少纳赛尔是这样打算的，这一



点很快即被人们看清楚了。1964年6月,巴勒斯坦国民会议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主席是艾哈迈德·埃希·舒奎里。参加会议的450名成员宣称他们代表着除沙特阿拉伯之外所有阿拉伯国家中的巴勒斯坦人。会议公布了一部国家宪章,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对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军事训练。这部宪章宣称“巴勒斯坦人有权在解放自己的祖国之后决定自己的命运”。它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的合法主人,他们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巴勒斯坦籍犹太人”(大概指那些1948年前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已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被看作是巴勒斯坦人,只要他们愿意和平而又忠实地居住在巴勒斯坦。

1964年9月,第二次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在亚历山大召开。在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的敦促下,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一支巴勒斯坦解放军。这个新组织将在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总部。他们将通过阿拉伯联盟得到几个阿拉伯国家的财政资助。就在亚历山大这次会议上,和贯彻会议一致同意的这项阿拉伯计划有关的几个问题已经表现出来;而在1965年9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建立阿拉伯联合指挥部的决定仍然只是一纸空文,因为与以色列毗邻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同意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驻扎在他们的领土上。侯赛因国王同样拒绝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出的在约旦自由地积聚资金、招募和训练巴勒斯坦解放军战士的要求,因为倘若答应了这个要求就等于为他的巴勒斯坦臣民建立了双重权力机构,一个国中之国。

实际上,只有叙利亚和埃及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军很大的物质和政治支持,而这两个国家做这件事的目的和动机却越来越不一致。纳赛尔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看作是一个工具,试图以它来疏导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约束任何对以色列进行游击战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冒险行为。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在1965年和1966年接连举行的军事政变中已越来越倾向于

左翼，因此，它继续宣扬要更加坚定地执行革命战争的方针，在打击以色列的同时将社会革命运动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叙利亚政权鼓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摆脱埃及的限制，寻找其他的援助途径，包括在叙利亚境内训练军队和获取中国的武器。它还资助在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中新出现的非官方、然而更为好斗的民族主义组织。

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是“法塔赫”（“法塔赫”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是“胜利”的意思）。渐渐地有十几个巴勒斯坦组织采取了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的直接行动，目的是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塔赫之外，另外两个规模略小但非常重要的组织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闪电突击队。闪电突击队是和复兴党有联系的军事组织，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则是另一个泛阿拉伯组织——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一个分支。阿拉伯民族运动最初是纳赛尔派的右翼，但逐渐转向了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反帝立场。由于阿拉伯民族运动曾断断续续接受过埃及情报局的金钱资助，因此它有时，比如在亚丁，停止了与埃及的冲突。阿拉伯民族阵线取得成就的地方是亚丁和南阿拉伯半岛，它在那里策划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该组织后来终于掌了权。

不论是法塔赫还是阿拉伯阵线都是在流亡于科威特和海湾各国的巴勒斯坦人中发展起来的。法塔赫创建于加沙地带，它奉行的信念是：西奈战争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事业的又一次失败；1957年的解放方案又一次表明阿拉伯各国政府，尤其是埃及，准备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为既定事实，不管他们的用词会有多么激烈。显然，巴勒斯坦人已不会继续依赖阿拉伯各国政府（甚至包括纳赛尔在内）为他们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巴勒斯坦事业和巴勒斯坦民族的活力。然后，他们必定要发动一场革命游击战争以阻止以色列巩固其地位。最后，他们一定会逼迫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

1957年初，法塔赫开始在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中建立基层组

织；从1959年至1960年，它一直在组建政治组织。从1959年起，它开始组建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闪电”突击队。这些“精英”人物受到了军事和地下斗争的训练，某些人得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在1964年组成第一支“突击”部队之前已经建起了一个秘密基地。根据法塔赫的资料，突击队首次采取的行动是1965年对太巴列湖上的一个以色列水泵站进行的破坏性攻击，这个水泵站和约旦河水改道工程有关。从那时起，法塔赫对以色列的袭击变得越来越频繁。法塔赫声称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它的经费来自居住在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北美和南美的巴勒斯坦人的资助。它的领导人是从年轻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或技术人员中选拔出来的。（1968年，法塔赫的军事指挥员中包括两名电力工程师、两名电子专家和两名数学家。）法塔赫与叙利亚、埃及和约旦政府的关系最初是“冷淡而且有保留的”，但随着大马士革的左翼复兴党政权逐渐奉行法塔赫宣扬的对以色列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法塔赫很快就取得了叙利亚军队的合作。

在1965年上半年，纳赛尔和叙利亚人在对以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以色列人在1964年已经开始实施从太巴列湖改变约旦河水流向的计划，而阿拉伯国家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阿拉伯国家甚至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来实施自己的改道工程或是对付以色列对叙利亚和约旦边境的武装袭击。叙利亚人抱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没有为易受攻击的叙以边境地区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空中支援。

1965年5月31日，纳赛尔在设于开罗的巴勒斯坦国会会议总部发表演说。他极为坦率地指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状况。他既谴责了布尔吉巴提出的与以色列妥协的建议，又抨击了叙利亚人急切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他说道，由于一个阿拉伯国家害怕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通过自己的领土，导致了“阿拉伯联合指挥部无法……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此刻连防御都无法做到，又如何谈得上发动进攻呢？”

在谈及叙利亚复兴党人时，纳赛尔说道：

他们说“赶走联合国紧急部队”。假定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最起码也得制定一个计划吧？如果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侵略，我应该进攻以色列吗？再者，以色列是注定要和我打仗的，它这样做正好给了我一个采取行动的理由。但是，这样做是否明智？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而以色列或许也盼着我们此刻与它开战……当5万名埃及军人驻扎在也门的时候，我去进攻以色列是难以想象的。

在1965年9月于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纳赛尔的谨慎政策得到了支持。会议拒绝了刚刚取代了本·贝拉的阿尔及利亚新领导人布迈丁上校提出的对以色列采取游击行动的建议。会议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和阿拉伯联合指挥部商量组建巴勒斯坦军事单位的事宜，以便最终建立一支巴勒斯坦解放军。这次最高级会议重点讨论的仍然是阿拉伯国家的共处和避免在阿拉伯国家仍处于软弱和分裂状态时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这两个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那么和谐一致。在会议召开前夕，布尔吉巴散发了一份长达17页的备忘录，对纳赛尔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备忘录宣称，只要阿拉伯联盟仍然是“埃及操纵的霸权工具”，突尼斯就要对它进行抵制。布尔吉巴写道：“在阿拉伯各国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目前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埃及自行承担起团结阿拉伯国家这一神圣使命之前，阿拉伯国家之间从未如此残酷地相互残杀过。”布尔吉巴谴责纳赛尔试图抛弃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国家：“在法老的精神召唤下，埃及试图为自己的产品寻找生存空间并为自己谋求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以便从东西方获得更多的援助。”

布尔吉巴与纳赛尔的争执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从表面上看，引起这次争吵的原因是他们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



拉伯国家与西德关系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布尔吉巴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外交“渐进主义”——在一段时期内采取稳妥谨慎的政治步骤,而不是提出过分强硬的要求或造成革命性的动荡,突尼斯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而获得独立的。他采取的立场符合阿拉伯联盟和纳赛尔所赞同的原则——实施联合国 1947 年的分治决议。但是,由于突尼斯远离阿以冲突的中心地带,同时国内政治也比较稳定,因此他准备公开承认分治方案的逻辑结果,即在将来某个阶段承认以色列国。由于断然拒绝承认以色列国(而以色列此时已是联合国的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削弱了外交领域的其他方面,而且自己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利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 1965 年 4 月对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的过程中,布尔吉巴在约旦和其他一些地方极为坦率地阐述了他的上述观点。他很快遭到了来自开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首都的大声谴责。布尔吉巴宣称,对他进行抨击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主张将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付诸实施,而是因为他拒绝追随纳赛尔断绝与西德的关系。

纳赛尔和西德人之间的矛盾是由中东地区日益加紧的军备竞赛引起的。有报导说,西德与以色列签定了一项价值 2000 万英镑的军火协定,其中包括允诺向以色列提供 200 辆巴顿式坦克。对此,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 1965 年初提出了强烈抗议。面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抵制的威胁,西德政府 2 月 12 日决定取消与以色列的军火协定,其基本理由是不愿向局势紧张的地区供应军火。为了平息国内的批评,西德政府准备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两星期后,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对开罗进行了正式访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暗示,如果波恩完全承认以色列,埃及就可能承认东德。这就意味着波恩必须决定是否要同阿拉伯国家彻底决裂,因为根据所谓“哈尔斯坦主义”,西德不能同承认东德的国家保持关系。西德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破裂对双方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阿拉伯国家很可能失去西德的经济援助和西方世界

中的同情者。阿拉伯国家在西方恰恰缺乏有影响的盟友。西德则面临着丧失中东市场的危险。为了发掘这一市场，西德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打算承认东德，那就会引起雪崩式的连锁反应，那些目前仍在观望犹豫的亚非中立国家也会跟着承认东德。哈尔斯坦主义的基础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无论是开罗的纳赛尔还是波恩的艾哈德总理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都不高明。当艾哈德拙手笨脚地犯错误时，纳赛尔则在咆哮责骂。3月7日，波恩决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似乎要以此方式报复开罗接待乌布利希，尽管纳赛尔并没有承认东德。纳赛尔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尖锐地抨击西德是“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和伪善的国家”，尽管他已经实现了阻止德国与以色列签定军火协定这一阿拉伯国家的主要目的。5月，波恩政府与以色列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大多数阿拉伯联盟国家断绝了同波恩的关系。突尼斯是三个拒绝同西德断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它认为这样做损害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德国人的利益。

纳赛尔对波恩大发雷霆的原因部分在于他认为西德同意向以色列出售军火是在秘密地按照美国的旨意行事。当时纳赛尔与美国的关系如同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正处于低潮，因为他强烈反对使用美国飞机镇压刚果斯坦利维尔<sup>①</sup>的起义。这是纳赛尔思想发展变化的最初征兆之一，它无疑要影响纳赛尔对美国的动机和以色列的打算所做的判断，同时也促成了1967年的战争危机。在1967年7月23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纳赛尔分析了1967年阿以战争的背景以及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两年前我就预感到有人在搞阴谋，因为对我们的援助中断了，美国要求我们不要发展我们的军队，不要发展我们的技术和军事力量。”他说，美国政治和外交在1967年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美国

---

① 扎伊尔基桑加尼的旧称。——译者

人在两年前即已开始搞的一项阴谋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消灭一切不愿被拉入势力范围的革命政权”。

纳赛尔所说的中断援助是指约翰逊总统在开罗对美国干涉刚果(参阅第十五章)表示愤怒之后所做出的反应。纳赛尔声称已引起警惕的另一件事是美国利用中止援助作为威胁手段,对埃及重振军备加以限制并迫使其接受美国对它的军火发展进行核查。美国人一直担心以色列和埃及可能会发展核武器和火箭,担心阿以双方在约旦河水争端公开化之后加速常规武器竞赛的步伐。美国人正在受到以色列要求提供现代化武器的压力,反过来他们却没能迫使以色列同意让他们核查狄莫纳核反应堆。他们并不真认为埃及人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且纳赛尔后来已经准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但是,如果美国人打算拒绝以色列提出的向它提供更多的常规武器的要求,那他们就必须从埃及人那里得到武器采购(以前主要是向苏联采购)的有效保证。在纳赛尔看来,美国人的做法是企图重新确立西方对武器供应的垄断(他通过1955年同俄国人做的一笔军火交易已打破了这种垄断),因而不能接受。他声称,1965年春,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曾带着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信来拜访过他。这位美国使节威胁说,如果埃及不接受美国对其核活动火箭研制进行检查,不愿限制埃及的武装力量,以色列就将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美国武器。

然而,在196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纳赛尔仍在遵循他所制定的阿拉伯共处政策,仍然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965年9月,纳赛尔任命查卡利亚·毛希丁担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理,撤换了阿里·萨布里。人们普遍认为此举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纳赛尔打算在国内推行更为保守的经济紧缩政策,在国际上表现出一个更为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形象,以此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更多的经济援助。毛希丁被认为是纳赛尔的助手中最美国化的人:他是一位朴实而又讲求效率的人,一位头脑冷静的管理人员,是埃及首屈一指的男子汉。

1965年11月25日,纳赛尔在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埃及和美国的关系在年初曾出现过危机,但此后有了很大的改善。“双方均为阻止关系恶化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纳赛尔发表讲话几天之后美国国务院即宣布开始为6个月后向埃及提供价值大约5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进行谈判。1966年1月初签定了协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外汇极为短缺。1965年,只是由于苏联提供了30万吨小麦,它才没有因美国中断小麦援助而受到严重的影响。然而,一两个月之后,也就是说在1966年的春天,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以及与美国修复关系的政策彻底破产了。他又一次投入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同时摒弃了美国的经济援助,转而投身于俄国的怀抱。

导致这种变化的有三个相互影响的因素。首先是费萨尔国王勾结伊朗国王在1965年12月提出召开一次伊斯兰“最高级”会议以及英美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飞机和导弹(参阅第十五章)。

第二个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由于西方国家不仅试图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保持平衡,而且要在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和对手之间也保持平衡,这就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1966年2月16日,美国国务院确认它同时向以色列和约旦出售了巴顿式坦克,并且打算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以色列已获得的霍克防空导弹。1965年2月19日,纳赛尔在开罗会见一位伊拉克记者时说道,以色列正在秘密得到军事装备,“我们也应这样做,以防以色列获得军事优势”。

导致纳赛尔重新投入阿拉伯革命斗争的第三个因素是1966年2月叙利亚发生的军事政变,复兴党的新马克思主义左翼极端分子在这场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紧接着加纳也发生了军事政变,正在北京访问的恩克鲁玛总统遭到废黜。在印度尼西亚,学生们在军队支持下展开运动,强迫苏加诺将统治权交给苏哈托将军,此举遭到了印尼共产党的抵制。这三个事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确实是偶然的,但它们似乎也有某些共同之处。它们是不结盟国家在政治



上出现两极分化的证明。在越南战争和中苏分裂造成的地区冲突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共同影响下,冷战已经蔓延到了新的领域。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看来,大马士革、安卡拉和雅加达的动荡标志着它们在全球斗争中的得失。在纳赛尔看来,恩克鲁玛的下台和苏加诺的失势意味着老一辈中立主义领导人的命运(除了他本人和铁托之外)看上去是凶多吉少。正如我们在论述也门问题时已谈到的那样,俄国人认为他们所目睹的是英美对中东地区发动的政治攻势,因此他们试图鼓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组成一个“前进的、革命的或解放了的”阿拉伯国家集团。这个集团将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这一构想中,俄国人仍然把纳赛尔看作是主要的推动者,但他们在大马士革看到了新的机会和新的危险。古巴类型的叙利亚新政权吸收了一两个共产党人加入它的内阁,并且宣布它将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然而,在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一问题上,大马士革的新统治者所持有的观点比他们的前任更为极端。他们认为“革命战争”不仅是对付以色列的一种手段,也是改造和团结阿拉伯国家的一种方式。3月8日,叙利亚国家元首努尔丁·阿塔西博士在大马士革宣称“解放巴勒斯坦”是革命计划的关键。他说,阿拉伯团结“将被纳入解放战争的框架之中”。

导致1956年苏伊士—西奈危机的几个因素又开始重新出现:英美采取实际步骤(据说如此)组建一个新的中东地区联盟体系,纳赛尔和俄国人对此做出了反应;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加快军备竞赛步伐;叙利亚在为阿拉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规定意识形态倾向时起着关键的作用;阿拉伯突击队袭击以色列的事件和以色列军队的报复行动都在不断增加。此外,大马士革和莫斯科公开宣称(再次采用了1956年和1957年的方式)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间冷战的中心,叙利亚政权是美国策划的阴谋活动的攻击目标。然而,如果对大马士革政权的这种外部威胁确实存在,那么这种威胁显然和美英没有任何关系。英美此时关心的主要是防止纳赛尔的影响

响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产油区，而不是频繁地晃动富饶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万花筒。

纳赛尔最初的反应是向伊拉克靠拢，因为他们仍对叙利亚复兴党人持怀疑态度。但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两方面均开始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澄清对叙利亚究竟持什么态度。1966年5月7日，俄国人通过在一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他们推行的新路线是支持叙利亚政权对付所谓被美国武装和鼓励的以色列进行的威胁。三个星期之后，塔斯社在—项声明中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进行挑衅并警告说：“苏联不能也不会对试图破坏某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位置靠近苏联边境——的和平的行为无动于衷。”1966年5月10日至18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访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时允诺继续向埃及提供经济和政治援助。到那时为止，苏联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估计已达到3亿英镑，其中包括援建阿斯旺大坝及另外133项工程。苏联还许诺向叙利亚新政权提供价值5000万英镑的援助，其中包括修筑幼发拉底河大坝。这项工程对叙利亚来说犹如阿斯旺大坝对埃及—样重要。令人奇怪的是，苏联对埃及援助的总金额——主要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和纳赛尔在那些年中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援助—样多。

到6月中旬，纳赛尔已下定决心采取—项新的方针。6月15日，他开始暗示准备放弃他的阿拉伯最高政策，理由是共处政策已被某些阿拉伯国家用来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进行密谋。阿拉伯国家之间重新出现的裂痕迅速地扩大了。面对着叙利亚的敌视，侯赛因国王开始向沙特阿拉伯靠拢，他宣称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合作的全部希望统统消失了，因为把持着该组织大权的是一些“搞阴谋颠覆活动的人”。纳赛尔抨击英国“假装”撤出亚丁，试图让南阿拉伯半岛获得“虚假的独立”。他谴责英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作战飞机和飞行员，沙特外交部迅即否认了此事。

在7月末发表的两次讲话中，纳赛尔终于宣告了阿拉伯“共处”的终结。他确认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将不参加定于9月份在阿尔

及利亚召开的下一届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因为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合作已成为不可能的事。这并不意味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将背离解放巴勒斯坦这一“最高”目标，“但是，”纳赛尔说，“我们将和其他阿拉伯革命力量共同努力，摒弃传统的方式，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解放巴勒斯坦。”

纳赛尔同时还透露出这种政策将使埃及付出的一部分代价。美国将不会恢复实施 6 月份已中断的小麦协定。埃及现在将不得不筹措 1000 万美元用于购买小麦，而以前它可以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美国的小麦。这将对埃及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产生不利影响。

这项新政策造成的另外一个更为惨痛的代价已经很明显地展示出来：叙以边境冲突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法塔赫部队对以色列的袭击越来越频繁。法塔赫部队有时是通过约旦北部进入以色列的，尽管约旦政府曾极力阻止他们这样做。以色列的报复也越来越凶狠。在以色列飞机于 1966 年 7 月 14 日用燃烧弹袭击了班恩亚思河改道工程之后，叙利亚向安理会发出了抱怨。不到两个星期，太巴列湖周围的边境地区又发生了战斗，双方都动用了飞机和大炮。10 月份，以色列政府向安理会控诉闪电突击队袭击了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电台正式公布了此事，而且叙利亚政府公开为之进行辩护。安理会要求叙利亚施加强有力的压力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一项决议被苏联否决了。

这样，到 1966 年 10 月底，叙利亚政府公开表态支持法塔赫的革命战争战略，它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宣称叙利亚作为阿拉伯国家中最“进步”的一员，很可能成为美国间接攻击的目标。但是，如果埃及不参加，法塔赫的计划就难以实现；除非纳赛尔参加行动（按照复兴党人的观点，在采取行动时最好由一位更为革命的领导来取代纳赛尔本人），否则叙利亚政权就难以实现它的革命梦想。如果处境孤立的大马士革政权能够得到埃及的大力支持，俄国人将大大松一口气，因为这样就可减轻莫斯科保护大马士革政权的直接责任。

有几个月纳赛尔曾犹豫不决，不愿彻底投身于阿拉伯“进步”阵营。他一方面逐渐向“进步力量”靠拢并且重新开始抨击“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仍然试图避免完全屏弃主张走中间道路的阿拉伯观点。但在11月4日，纳赛尔断然采取行动，同意与叙利亚建立新的防御同盟。从法塔赫延伸到大马士革和纳赛尔这一端的“解放巴勒斯坦”阵线的各个环节现在似乎已经连结起来了。但是纳赛尔仍然认为解放巴勒斯坦是长期而且有限制的斗争。他知道他在也门所承担的义务。他还知道虽然与叙利亚单独结盟可能会遏制以色列的大规模进攻并能在不发生战争的条件下稳定住局势，但没有约旦的合作，他不可能策划对以色列发动猛烈的进攻。

或许这就是以色列在11月13日出人意料地对约旦——而不是叙利亚——发动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边境袭击的原因。一个配备有坦克、大炮和飞机的以色列陆军旅攻击了希伯伦附近约旦的一个名叫塞姆的村庄，猛烈的炮火将这个村庄夷为平地。战斗中共有18名约旦军人和平民死亡，54人受伤；以色列军队也有伤亡。以色列当局声称这次行动是对最近发生的13起破坏活动的报复，其中有一次炸毁了一辆运输武器的军车，炸死3名以色列士兵，炸伤6名。据说破坏分子曾穿越约旦边境并隐蔽在塞姆村。以色列方面说，这次袭击的目的是逼迫侯赛因国王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防止破坏分子利用他的王国发动进攻。

这次袭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以及袭击目标的选择都使西方舆论感到震惊，同时也在以色列内部引起了争论。鉴于以色列官方对于选择约旦作为袭击目标的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这次袭击的直接效果非但没有增强侯赛因国王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它，因此，必须寻找另外的解释。人们注意到，埃什科尔受到了公众舆论和政治敌对势力，特别是受到了组织成员中包括达扬和佩雷斯这样的“活跃分子”的本·古里安的拉菲派（从以色列工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的压力，准备对法塔赫的袭击进行更严厉的报复。但是，如果不准备使用更强大的力量，不冒遭受更大伤亡的风险，仅以攻



击塞姆村的力量去进攻壁垒森严、重兵防守的叙利亚边境地区是不可能奏效的。对叙利亚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都可能导致苏联进行干涉的危险。因此，打击约旦的用意也可能是想对它进行警告，让它不要加入刚刚结成的埃叙联盟。

这次袭击引发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镇的普遍骚乱，那里的人要求对以色列施加更强有力的军事压力。然而，侯赛因能够把握住形势，除了已做出的承诺外，再不为阿拉伯联合指挥部承担任何新的义务。12月7日，阿拉伯防务理事会在开罗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内容是确定在遭受以色列进攻时每一个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但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协议。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约旦首相塔尔谴责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叙利亚没有支持约旦。他问道，原先允诺的埃及空中掩护在何方？为什么纳赛尔不把军队从也门撤回来自来对付以色列？

纳赛尔的回答是要求约旦同意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在其领土上驻扎并有权自由行动。这是侯赛因最不情愿答应的事。当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间的斗争重新开始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通常的宣传特点就是攻击纳赛尔和叙利亚人不仅不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反而对其他阿拉伯政权持敌视态度。开罗和大马士革攻击侯赛因和费萨尔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安曼和麦加的电台则嘲笑纳赛尔藏在西奈的联合国紧急部队身后并且听任以色列船只穿越亚喀巴湾。有报道说，在1月初举行的阿拉伯防务理事会会议上，约旦甚至正式建议埃及应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

侯赛因国王在12月底接受一家美国杂志采访时，已经提出了上述建议。他说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存在使埃及军队无法发挥它的威慑力量，而以色列则得以增强对其他国家的压力。

到1967年1月底，塞姆事件造成的震动似乎已经消失了。尽管冲突事件仍在不断发生，但无论是开罗还是特拉维夫当时均认为不存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在1967年底接受我的一次采访时，纳赛尔显然不太重视以色列问题。在和纳赛尔的外交部长穆罕

默德·里亚德进行了一次私下交谈之后，我的这种印象更得到了证实。里亚德认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已处于僵持状态。虽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经济磨擦还会持续若干年，但从军事观点上看，埃及不愿卷入过深，除非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一场全面进攻。

纳赛尔当时更为关心的是埃及的经济状况以及南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的斗争情况。但是，他已经看出中东发生的事件是英美反对激进的不结盟国家的“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他认为这个“阴谋”主要是为了反对他，因此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将它和以色列紧密联系起来。至少有一部分以色列领导人认为纳赛尔仍想避免同以色列发生冲突，而且阿拉伯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是他们内部的斗争而不是准备同以色列打仗。然而，俄国人仍在危言耸听地描述以色列对叙利亚的企图。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他们可能并不想煽动一场他们的代理人无法获胜的战争，更不想冒他们自己被卷入的风险。或许他们是在试图编织一幅由美国发动、由以色列充当工具的反革命战争的图画。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种情景是真实的，同时也是为了吓唬第三世界的盟友，让他们继续保持对自己的忠诚。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正在通过柯西金总理对英国的访问，极力促成美国和北越之间的和谈。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1967年3月底访问开罗时会怂恿纳赛尔向以色列开战，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尽管他可能敦促纳赛尔向叙利亚人提供更有力的公开支持。但葛罗米柯离开开罗还不到一个星期，叙以边境就爆发了一场新的同时也更为激烈的战斗，导致1967年6月阿以战争的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了。

## 第十七章

### 在战争边缘上：叙利亚、联合国紧急部队和 亚喀巴湾(1967.5—1967.6)

中东的这场危机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场危机的起因是以色列试图入侵叙利亚……以色列进行这场活动不单是为了谋求它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替那些无法忍受阿拉伯革命势力谋求的利益。

这就是六月战争之后纳赛尔所发表的声明，这段话很可能揭示出纳赛尔在危机开始时真以为以色列在美国的鼓动下准备对叙利亚进行一场军事打击，其目标至少是推翻大马士革政权。纳赛尔认为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这种事情发生。因此，他最先采取的行动就是极力阻止以色列发动令人担心的进攻。

要想完全解释清楚有关六月战争爆发的某些问题可能得等到几年之后，但是，关于这场危机的起因却几乎没有什么争议。4月7日，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因以色列人开垦非军事区土地而相互交火；在过去几年中，这种交火已成为这块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特色。这次交火升级成为一场战斗，双方均动用了坦克、大炮和飞机。以色列飞机攻击并打哑了叙利亚的炮兵阵地，击落了6架叙利亚喷气式战斗机。有几架以色列飞机甚至飞到离大马士革只有50多英里的地方，向叙利亚首都进行胜利示威。

约旦当局又一次奚落了叙利亚人的糟糕表现，并且指责纳赛

尔没有帮助叙利亚人。一家约旦报纸问道：“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遭到明目张胆的空中侵犯时，开罗做了些什么？”

回答是什么也没做，其原因部分在于叙利亚人拒绝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空军基地。在阿拉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重新开始斗争之时，如果纳赛尔继续无所作为，他能够保持住他自己的地位吗？4月10日，纳赛尔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空军总司令穆罕默德·西德基·马哈茂德将军派往大马士革，马哈茂德在那里同叙利亚军方人士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讨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理西德基·苏莱曼也访问了大马士革，双方互相保证对以色列可能进行的入侵采取联合行动。

导致危机的下一个行动直到5月中旬才发生。在这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中，法塔赫突击队在以色列境内发动了两次攻击。据说法塔赫战士在这两次攻击中表现出的专业训练水平比以往要高，武器装备也比以往要好。这一情况不仅引起了以色列人的忧虑，也引起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关注。（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午餐会上，吴丹说“这类行动是对该地区和平的威胁”，各国政府均有责任加以制止。）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新近发生的两件事合起来迅速将危机推向了第二阶段。以色列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和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拉宾将军分别在5月12日和13日发表声明，纳赛尔认为这两个声明是以色列为推翻叙利亚政权而即将发动进攻的危险信号。与此同时，纳赛尔收到了来自叙利亚、俄国以及埃及情报机构的报告：以色列正在其北部边境大规模集结兵力，可能对叙利亚发动进攻。

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使纳赛尔相信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以遏制以色列的进攻，然而，这两件事本身仍然有些令人不可捉摸。拉宾或埃什科尔究竟是怎么讲的，至今存在着某些疑问。更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是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联合国观察员都否认以色列曾集结这一问题。1967年5月22日，纳赛尔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空军前线指挥部讲话时断言，5月12日“以色列指挥官曾宣称他们



将实施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标是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叙利亚政府”。他接着说：“5月13日，我们收到了准确的情报：以色列正将11—13个旅的庞大兵力集结在叙利亚边境。这些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集结在太巴列湖以南，一部分集结在太巴列湖以北。以色列当时即已决定在5月17日对叙利亚发动进攻……叙利亚人也得到了这一情报。”

纳赛尔后来(战争结束之后)说：“由安瓦尔·萨达特率领的我国议会代表团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我们的苏联朋友告诉萨达特，对叙利亚的入侵已迫在眉睫……我们和叙利亚人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那决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几句话而已。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对付威胁叙利亚安全的危险。”

5月12日，埃什科尔在对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发表讲话时警告叙利亚，任何支持和煽动对以色列领土进行破坏活动的国家都将受到惩罚。同一天，他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又说道，迄今为止，叙利亚在反对以色列的战斗中显然充当了领导角色。然而，叙利亚的军队并不强大，“有理由相信，它在指望得到某些大国的保护。”

第二天，埃什科尔说，阿拉伯国家应该明白“无论在任何边境地区，只要它们那边能保持平静，我们这边同样也会保持平静”。但他又补充说，以色列“或许不得不给叙利亚一次比4月7日更为严厉的教训”。

对拉宾将军当时的讲话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报导。有一种说法是，拉宾说只要叙利亚政府仍在掌权，法塔赫的袭击就会继续下去。而另一种说法是他声称只有推翻大马士革政权，才能结束这种袭击。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周末以色列报刊发表的报导，这些报道显然是根据政府的授意，按照上述讲话的基调写成的。这些报道的要点是，以色列正在准备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其规模要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报复性袭击。联合通讯社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一封电讯援引“以色列一位高层人士”的话说，“如果叙利亚继续在以

色列进行破坏活动,它将立即招致一场目标为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军事行动”,即便冒埃及干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5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就加深这次危机的各种因素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

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发表激烈好斗的言论,以及报刊和电台迫不及待地加以报导,或多或少已不幸成为近东地区对立双方司空见惯的活动。然而,最近几周里来自以色列的报导表明,某些高级官员的声明极具威胁性;它们只能激怒对方,从而使局势更加紧张。

然而,有关以色列军队集结在叙利亚边境一事,吴丹报告说:

以色列政府最近向我保证,以色列军队没有在叙利亚边界沿线进行非正常的集结或活动,而且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以色列武装力量不会发动军事行动,除非对方首先采取这类行动。联合国停火监督机构观察员的报告也断定边界双方均没有出现军队集结和大规模调动的情况。

以色列政府后来宣称,它曾经一再邀请驻特拉维夫的苏联大使亲自去看看是否有以色列军队集结的迹象,但他拒绝了。由于以色列无论如何都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将其军队从叙利亚边境附近的永久性军营调向前线,因此,军队没有集结并不足以说明以色列对叙利亚的企图。出于这一考虑以及以色列军事活动的其他迹象,联合国停火监督机构指挥官奥德·布尔将军得出的结论(吴丹的报告所根据的就是这个结论)并没有被联合国驻这一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接受。

有人曾经暗示,叙利亚政权故意编造出受到外部威胁的谎言,借以在国内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巩固其地位。叙利亚复兴党和军队

的领导层当时确实遇到了麻烦，部分原因是公众对一家军队报纸发表的一篇反宗教文章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叙利亚、埃及和俄国人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竟然完全一致。有一种假设认为，在5月份的头两个星期中，以色列领导人显然试图通过故意放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行动的口风来恐吓叙利亚人。以色列领导人或许还临时调集了一些部队以显示威力，但由于纳赛尔做出了极端强硬的反应，埃及军队开进了西奈半岛以及联合国总部要求做出解释，他们只好把部队又撤了回来。

纳赛尔在这一紧要时刻的基本思想状况可以从他从5月14日发给在英国参加巴勒斯坦集会的阿拉伯学生的一封信中略见一斑。在这封信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核心思想：“阿拉伯革命”遭到了合谋破坏。根据这一破坏阴谋，“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和英国，同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反动派”正在一起采取行动。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和约旦政府一同向叙利亚施加压力，试图使阿拉伯力量在尚未准备就绪的状况下投入战斗。”这一阴谋不仅限于阿拉伯世界，它是在美国领导下“反对我国和整个第三世界要求自由、进步和繁荣”的反革命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已不单单是巴勒斯坦问题，”纳赛尔说，“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命运问题，是同时和我们所有的敌人勇敢地进行对抗的问题。”

纳赛尔的这番话是和他对国际局势的一贯看法相一致的，他认为以色列显然对叙利亚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在他看来，处于危急关头的不仅是大马士革复兴党政权的命运——他并无特别的理由去关怀这个政权——甚至也不仅是埃及眼下的军事安全，而是以他为象征的整个阿拉伯民族革命运动的精神和阿拉伯人掌握自己的命运、顶住大国压力的意愿。他认为叙利亚在军事上蒙受的耻辱不仅是以色列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的胜利。美国借以色列之手实现了它精心策划的孤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预谋，并且取代英国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

纳赛尔对发自以色列的报道迅速作出了命运攸关的反应。从

5月14日起,他开始源源不断地调集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入西奈半岛。5月16日,他要求由7个国家的3400名军人组成的联合国紧急部队从沿西奈半岛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哨所中撤走。这支部队在此已驻扎了10年之久。

不管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这一举动究竟是愚蠢的还是明智的,也不管提出要求的方式有多么粗鲁,值得争议的问题是纳赛尔是否拥有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离开的合法权利。吴丹认为纳赛尔有这种权利。5月18日,当吴丹刚收到埃及政府表达这一意向的正式请求,他马上就感觉到除了最终答应这一请求并命令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之外,实在是别无选择。他能够像某些评论家所建议的那样,利用巧妙的拖延战术为外交手段来推迟危机的升级而赢得一些时间吗?吴丹的见解与此截然不同,其有力根据表现在1967年6月26日他的长篇报告中。吴丹遵循他前任哈马舍尔德早已定下的程序,事先和组建联合国紧急部队时成立的联合国顾问委员会进行了磋商。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各不相同,但最终还是一致认为除了下令撤兵之外,吴丹别无选择。顾问委员会没有——它本来能够做到——将此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吴丹声称,即使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及早取得使联合国紧急部队能够留下来的实际结果,除非能得到埃及的同意——在他看来,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实际情况上考虑,这一点都是办不到的。

吴丹曾考虑以个人的名义向纳赛尔发出紧急呼吁,请他重新考虑撤兵的要求。纳赛尔通过其外交部长通知吴丹,他的这一倡议会被“断然拒绝”。纳赛尔同意吴丹应尽快来开罗。以色列也拒绝了吴丹提出的让联合国紧急部队开往边境地区以色列一侧的建议,认为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5月18日傍晚,吴丹命令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然而,直到5月29日部队才开始从埃及和加沙地带撤出,整个撤兵行动直到6月17日才完成,而战争此时已经结束了。

正当5月22日吴丹动身前往埃及时,以色列总理埃什科尔通



知克内斯特，为应付以色列南部边境地区出现的“严重局势”，以色列已开始进行部分动员工作。埃什科尔指出，一个星期以来，驻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人数已从 3.5 万增加到 8.5 万，共计四个装甲步兵师，并得到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以色列领导人最初显然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埃及人的行动只不过是炫耀武力，其目的在于减轻以色列对叙利亚施加压力。随着埃及的增援部队（其中包括从也门调回的部队）源源不断地涌来，以色列人开始较为认真地看待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埃什科尔仍通过第三方向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保证，以色列无意向它们发动攻击，愿意让它们保持和平，只要它们也让以色列保持和平即可。

当吴丹尚在前往开罗的途中，纳赛尔宣布重新开始禁止以色列船只穿越亚喀巴湾，自此危机进入了第二阶段。5 月 22 日，纳赛尔在前线空军指挥部讲话时披露，埃及军队已经占领了沙姆沙伊赫。他接着又说道：

亚喀巴湾属于我们埃及的领海。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允许以色列旗通过亚喀巴湾。犹太人发出了战争威胁。我们告诉他们：欢迎你们，我们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我们的军队和全体人民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放弃属于我们的任何权利。这片海洋是属于我们的。

纳赛尔是在最初将军队调向西奈半岛时就打算封闭蒂朗海峡的呢，还是后来发生的情况逼迫他不得不这样做呢？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何时下的决心？就在六月战争爆发之前，埃及官方消息灵通人士还对来访的西方新闻记者表示，埃及打算让联合国紧急部队留在沙姆沙伊赫，但联合国秘书长坚持认为，如果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该地区某个地方撤出，那么它必定要从所有的地方全部撤出来。

1969年7月，纳赛尔本人在同我谈起他对这次危机的看法时也谈到了埃及最初的打算。1970年初，他在接受两家报纸采访时再次公开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对我说：

我们当时并没有打算封锁亚喀巴湾。当我们把部队调入西奈半岛时，我们曾给吴丹写信，请他将部署在从拉夫哈到埃拉特一线（西奈边界线的长度）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将部署在加沙和沙姆沙伊赫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留下。我们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避免使亚喀巴湾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但是，吴丹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我们或者将所有的联合国紧急部队都留下，或者将它们全部撤走。”我想这是邦奇的主意……除了让他撤走所有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外，在我们面前别无选择。于是我们突然就面临着沙姆沙伊赫问题。我们并没有打算派兵去沙姆沙伊赫；我们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组织一些部队赶到那里。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尔夫·邦奇博士在1967年6月11日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愤怒地驳斥了开罗的说法。他说“那里面没有一点真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援引了联合国早些时候就埃及的要求及其部队的实际调动情况所提交的报告。

1967年5月18日，吴丹在第一份报告中谈到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6月26日，也就是对他处理这次危机的批评开始增加之后，他又在一份较为全面的报告中谈及了他对这次危机的看法。但是，他的前后两种看法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第二份报告中，吴丹写道，埃及武装力量参谋长法齐将军在5月16日傍晚致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官、印度少将里克耶的一封信中首次代表埃及提出了撤走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请求。这封信要求撤走“部署在我们边境线上的观察所中的所有联合国部队”。据吴丹称，送信的那位埃及准将曾告诉里克耶，他必须命令联合国紧

急部队立即从两个地点撤退：一处是沙姆沙伊赫，另一处是萨巴赫，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这样，埃及部队就可于当晚接管这两处阵地。第二天中午，在得知里克耶将军表示没有联合国秘书长的命令他不能撤退之后，法齐将军要求（根据吴丹的报告）当时驻扎在西奈边境哨所的所有南斯拉夫部队在 24 小时内撤离，但将撤离沙姆沙伊赫的时间宽限到“48 小时左右”。5 月 18 日正午，也就是吴丹收到埃及政府正式要求撤兵的通知 4 小时之前，埃及军官来到沙姆沙伊赫联合国紧急部队军营（这里有一个由 32 名南斯拉夫士兵把守的据点）说，他们已经来接管此地了，要求在 15 分钟之内作出答复。（事实上，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据点 7 天后才撤除。）

邦奇博士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争辩说，法齐将军要求撤走“部署在我们边境线上的所有联合国部队”，毫无疑问，其中包括“事实上是联合国的一个观察所”的“沙姆沙伊赫”。然而，法齐那封信的全文却表明，所谓沿着“我们的边境”指的是“我们的东部边境”，也就是和以色列接壤的地区，他在前一段话中已提到埃及军队已集结在这些地区，而沙姆沙伊赫则在西奈半岛的最南端。

吴丹的第一份报告全文引用了法齐的信，并且提到了法齐后来表示联合国紧急部队“可以用 48 小时左右的时间”撤离沙姆沙伊赫。但是，这份报告并未提及送信的那位埃及准将提出的立即撤离沙姆沙伊赫的口头要求（吴丹的第二份报告引述了这一要求）。相反，吴丹说：

应该澄清法齐将军那封信的确切意图。如果它意味着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整个边境线或其中部分地区暂时撤离，那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将联合国部队部署在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重开战端，不能为了使双方能够重新战斗而要求它们站到一旁。如果那封信的意图是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全面撤退，那么也应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直接和联

联合国秘书长联系,而不应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力量参谋长写信给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司令官。

吴丹在报告中说,他已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提出,它所提出的让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停火分界和国境线,或从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暂时撤离的要求将会被联合国秘书长看作是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彻底撤出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要求势必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

换句话说,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正如邦奇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就已经准确无疑地知道了纳赛尔到底是正式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包括沙姆沙伊赫在内的整个地区呢,还是仅仅要求它们撤出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甚至只是部分边境地区。

然而,吴丹却对纳赛尔说,要么全撤,要么全留:不可能是暂时或部分撤出,只能是彻底撤出。于是,纳赛尔只好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彻底撤出。

6月3日,联合国发布了一条消息,解释了吴丹做出决定的背景情况,从而进一步证实上述推论是合理的。这条消息提到了那种辩解,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最初只是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边境线,而没有要求它撤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并且认为“从实际情况考虑,这只是一种空谈”。它既没有完全否定这一辩解,也没有提及已被报道过的让里克耶将军立即撤出沙姆沙伊赫的那个口头要求。相反,它将法齐将军的信描绘为“隐秘”且“含义不明”。它认为,唯一被吴丹看作是官方意见的是5月18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向他提出的请求(在吴丹提出“全部撤离或全部留下”之后),而这一意见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全部撤离。

除了法齐将军的信使口头上向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官提出撤离沙姆沙伊赫这件事之外,吴丹在报告中未能解释清楚纳赛尔没有像他本人宣称的那样,最初并不打算让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沙姆沙伊赫,并且只是在被告知部分撤军不可能被接受之后才改变



主意的。然而，吴丹的报告确实指出，如果纳赛尔最初的设想的确如此，那么他没有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埃及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也没有监督实施他的计划。里克耶将军在与埃及军方人士接触后得到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即便不是从加沙地区，起码也是从西奈半岛的所有哨所——其中包括沙姆沙伊赫——撤出。

纳赛尔在1967年7月23日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在决定对以色列船只关闭亚喀巴湾之前，他曾于5月22日在家里召开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高级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过这件事。关闭亚喀巴湾“是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一直要求我们做的事之一”。但是，纳赛尔认为，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风险。他说，当他把埃及军队集结到西奈半岛时，他估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为20%。在决定封锁亚喀巴湾的那次会议上，他估计开战的可能性为50%；在另一次会议上他又估计为80%。直到6月初以色列政局开始发生变化，他才认为开战的可能性已是100%了。但在5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上只是讨论了防御行动。纳赛尔宣称，防御行动的目的是遏制对叙利亚的进攻。会上根本没有提及进攻以色列，其原因显然在于埃及确信这样做会导致美国插手保卫以色列。

一篇报导侯赛因·沙菲副总统在1968年2月开罗审判叛国罪时所作证词的文章指出，就在纳赛尔和他的同事们做出决定，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的那次会议上，同时还讨论了封锁亚喀巴湾的可能性。这篇文章指出，阿米尔完全保证武装部队已准备应付因采取这两个步骤所产生的后果。这表明至少从5月14日纳赛尔开始调动部队，以此对以色列可能威胁叙利亚作出反应时开始，他已经考虑封锁亚喀巴湾了。另一方面，据说埃及俘虏告诉以色列人，阿米尔曾在5月20日对一群军官说并不打算封锁亚喀巴湾。

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于5月23日抵达开罗后，纳赛尔告诉他已经决定封锁亚喀巴湾：他认为在吴丹到达之前公布这一决定比他离开后再公布更为有利一些。在谈话中纳赛尔向吴丹保证，他无

意主动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纳赛尔和他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将埃及的基本目标描述为“恢复到 1956 年以前的状况”以及埃以双方完全遵守停火协定。

吴丹警告纳赛尔“在蒂朗海峡限制无辜船只通行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并敦促他不要仓促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以色列已经宣布，这种限制被看作是宣战行为。

有关这次谈话的种种说法是异常混乱的。纳赛尔后来说道，他曾同意吴丹提出的在亚喀巴湾问题上留出一个“喘息空间”的建议，这样就可以有讨论的余地。其基本设想显然是，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均不要采取行动使问题激化：以色列不要让其船只和战略物资通过蒂朗海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要搜查任何船只。这一建议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显而易见，它只不过是吴丹要求各方克制的一个泛泛的呼吁而已。

纳赛尔声称，通过封锁亚喀巴湾和确定以恢复 1956 年以前的态势为斗争目标，可以使埃及重新获得因苏伊士—西奈战争而丧失的主权。几天之后，他又将其目标制定得更为远大：他谈到要恢复的不是 1956 年以前，而是 1948 年以前的态势；他还谈到要直接和以色列重新谈判整个巴勒斯坦问题。

5 月 26 日，纳赛尔在对阿拉伯工会会员讲话时回顾说，他曾因等待时机，直到阿拉伯国家强大起来并做好准备后再对以色列采取行动而受到非难，特别是在接管沙姆沙伊赫这一问题上。但是，“我们近来感到我们已经非常强大，可以和以色列进行一场战斗。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获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决定采取实际行动。”

纳赛尔说，接管沙姆沙伊赫意味着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对抗：

采取这一行动还意味着我们准备与以色列打一场全面战争。这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行动……如果以色列对叙利亚或埃及，那么，和以色列的战斗就将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的基本目标将

是摧毁以色列。要是在5年甚至3年以前，我很可能不会谈这件事。在1956年已过去大约11年的今天，我谈起了这件事，因为我有信心。我知道埃及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叙利亚拥有什么样的力量。我还知道其他国家——例如伊拉克——已将自己的部队派往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将派出军队。科威特也愿意派出军队。它们将派出装甲兵和步兵。这是阿拉伯力量。这是一度曾处于绝望状态的阿拉伯民族的真正复兴。

两天之后，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无论是埃及拥有蒂朗海峡主权问题还是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问题都已无需讨论。“以色列船只不能通过埃及领水。我们不会从这一立场上后退一步”。尽管他认为以谈判方式一揽子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毫无希望的，但他并没有谈到要发动一场进攻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我们已经重新获得了在1956年时曾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等待着以色列采取下一步行动。无论它是以暴力还是非暴力方式来对我们行使自己的主权作出答复，我们都已做好准备……如果以色列选择战争，那么它将受到欢迎。

纳赛尔一方面在蒂朗海峡问题上明确表示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只是泛泛谈及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问题。然而，第二天他在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讲话时谈到了恢复1948年态势的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恢复1956年的态势。这是问题的物质方面。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物质方面是次要的，而精神方面才是最为重要的。它包括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巴勒斯坦问题的再现以及每一个阿拉伯人，每一个巴勒斯坦人信心的恢复。在此基础上，如果

我们能够恢复 1956 年以前的状况，上帝肯定会帮助并敦促我们恢复 1948 年时的状况。

我们现在准备和以色列对抗。我们现在准备完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封锁亚喀巴湾、蒂朗海峡主权或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而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1948 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是英美勾结进行的一场侵略。

尽管开罗电台“阿拉伯之声”像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电台一样正在发出战争的威胁，但纳赛尔却仍然没有呼吁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6 月 2 日，纳赛尔在接受电视采访中接受英国下院议员克里斯托弗·梅休重申，他不打算首先发动进攻。梅休问道：“如果他们（以色列人）不进攻，你将不去碰他们吗？”纳赛尔回答说：“是的，我们不会去碰他们。我们不打算进攻以色列。”

但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却没有这么克制；他们在谈论战争时表现出阿拉伯舆论是如何从纳赛尔的讲话大意及开罗的广播宣传中理解他的意图的。叙利亚总理尤素福·朱伊安在 5 月 29 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宣布：“我们现在已开始进行一场决定全体阿拉伯人民命运的战斗。”朱伊安又补充道：为了重新获得被篡夺的阿拉伯权利而摧毁被（以色列）占领土上的经济和军事设施时，封锁亚喀巴湾而造成的“经济窒息将显示出它的真正意义”。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哈迈德·舒凯里 5 月 28 日对记者说：“我向你保证，零点已经到来。这是我们的人民在过去的 19 年中一直期待的时刻。”有报道说，后来在安曼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舒凯里讲道，1948 年以前即生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并且能从预计将爆发的战争中生存下来的那些犹太人将被允许留在那里，但他认为没几个犹太人能活下来。

5 月 26 日，海卡尔在《金字塔》报上撰文宣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海卡尔特别指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对比中，心理或士气将是决定性



的因素。封锁亚喀巴湾意味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阿拉伯民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功地用武力改变了以色列以武力强加给他们的现状”。因此，“这不是一个封锁亚喀巴湾的问题，而是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问题。这是整个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有鉴于此，海卡尔作出结论：“以色列必定会诉诸武力。”但是，埃及必须等待以色列首先发动攻击。“让以色列先动手。让我们做好反击的准备。让我们给它狠狠的一击。”

为什么纳赛尔不惜冒战争的风险，将他的行动目标从遏制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进攻扩大为改变政治现状或改变力量对比？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他相信他的军事指挥员所作的保证，重新估价并且过高估计了他在军事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根据海卡尔所说：“我们（埃及领导层）中的某些人被我们在5月15日到5月20日之间调往西奈半岛的强大军事力量迷惑住了。”

在事后分析这场战争时，海卡尔批评军事指挥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它所犯下的另一个“致命错误”是将过多的部队派往西奈半岛以显示力量，却没有真正作好战斗准备。“武装力量总指挥部中的许多人认为，”海卡尔补充道，“这场危机不会发展到动用武力这一步。尽管最高当局发出了明确警告，他们依然相信这一点。”

换句话说，纳赛尔已经告诉武装部队作好战争准备。但他相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此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并能赢得战争吗？鉴于阿拉伯军队之间，特别是埃及与约旦和叙利亚军队之间当时仍缺乏合作以及以色列遭到进攻时美国会加以干涉，这种可能性显然是不存在的。

纳赛尔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信了他那些过分自信的顾问们的错误判断，也可能被他的西奈半岛掌握的装甲师团所迷惑，但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想入非非，不可能只想着引诱以色列首先发动进攻，以便他能够打垮它。他后来声称：

我们对敌人力量的估计是准确的。它显示出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能够遏制和击退敌人的水平。我们意识到存在遭到武装进攻的可能性。我们承担了这一风险。

以色列对封锁亚喀巴湾做出了迅速而有力的反应；3天之后，美国和俄国均充分觉察到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5月23日，埃什科尔宣布，任何对以色列船只或装在其他船只上准备运往以色列的货物通过亚喀巴湾的限制都被视为“侵略行动”。他在致以色列议会的一份声明中宣称，根据联合国宪法第51条——自卫权利，以色列有权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保证以色列船只不受妨碍地自由通过蒂朗海峡。同一天，早些时候曾冷静对待埃及军队进驻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方领导人开始敦促以色列政府授权立即采取行动。

以色列议会以89票对4票（共产党议员）的表决结果，几乎完全一致地赞成埃什科尔在蒂朗海峡问题上的声明。因此，它开始着手准备建立一个密切合作的民族联合政府。但是，内阁和各党派在“不惜冒险立即诉诸武力”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来自华盛顿的一个信息敦促以色列不要试图用武力在48小时内打破埃及的封锁。也许这一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以色列政府决定首先进行外交尝试。它派遣外交部长阿巴·埃班绕道巴黎和伦敦前往华盛顿。

就在同一天，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

试图封锁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已经给这场危机造成了新的严重问题。美国以为亚喀巴湾是一条国际水道，封锁以色列船只非法的。这种做法将给和平事业带来潜在的灾难。自由无害地通过国际水道的权利是国际社会命运攸关的利益所在。

约翰逊同时还呼吁削减军队的集结。他宣布美国“坚决支持该

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苏联政府用了较长时间才对最近出现的危险局势作出评论。5月23日,它在一项声明中谴责以色列试图攻击叙利亚而造成了这场危机,并且支持纳赛尔进军西奈半岛和驱逐联合国紧急部队。声明又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近东地区发动侵略,那么它不仅会遭到阿拉伯国家联合力量的抵抗,而且也将遭到苏联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强有力的反对。”

但是,苏联的声明并没有提到亚喀巴湾。战后,俄国人通过新闻渠道透露,纳赛尔并未就再度封锁亚喀巴湾一事和他们进行磋商。5月24日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反对在安理会内部或四大国之间(由戴高乐总统提议)进行认真的讨论。5月25日,埃及国防部长沙姆斯·巴德兰率领一个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俄国人进行会谈。5月28日,巴德兰给纳赛尔带回苏联总理柯西金发出的一个信息:“苏联将支持我们进行这场战斗,除非恢复到1956年时的状况,否则它将阻止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如果纳赛尔对这一信息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俄国人至少是同意它将出面阻止西方国家为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或恢复联合国紧急部队在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位置而进行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俄国向纳赛尔和埃什科尔分别发出紧急警告,反对他们发动军事进攻。据法国消息来源报导,俄国人通过埃及和叙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通知这两个国家,如果它们进攻以色列并因此招致同美国对抗的危险,他们将不予支持;不仅如此,在以色列单独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向这两个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没有证据表明,在后一种情况下纳赛尔会要求或需要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尽管纳赛尔一直声称美国是站在以色列身后的真正罪犯,但他并不希望看到他与以色列之间的斗争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中东国家肯定会被毁灭。他把苏联的支持看作是阻止美国干预的一种手段,但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他不能首先发动进攻,这将对他在危机后一阶段的地位产生影响。

有消息说，埃以双方均认为对方即将发动一场进攻。也许正是这一情况促使苏联在5月27日清晨分别向纳赛尔和埃什科尔发出了警告。前一天纳赛尔的讲话和埃什科尔的文章可能也有助于引起莫斯科更大的警觉。也正是在这一天，约翰逊总统在即将开战的谣传声中在华盛顿接见了埃班。约翰逊向埃班保证，美国将坚决履行艾森豪威尔1957年做出的承诺，支持以色列“自由无害”通过亚喀巴湾的权利。约翰逊认为，埃及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但他听说以色列可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以色列这样做，它不仅可以打败埃及，而且可以打败任何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任何联军。有报导说，约翰逊总统敦促以色列起码在两星期之内不要动手，以便于国际社会有时间采取行动，使这一危机得到和平解决。

除了通过安理会采取行动以及与俄国进行磋商之外，美国开始探索由海湾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以获得它们承认自由通过亚喀巴湾的可能性。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试图求得海湾强国的同意，宣布坚持自由通航。第二个步骤是向海湾国家游说，以求得它们支持由一支国际海军力量为通过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船只护航，即所谓的“红海赛船”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探索与纳赛尔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可能性。美国派出国务院高级官员、前驻大马士革大使查尔斯·约斯特前往开罗以协助刚刚到任且又缺乏外交经验的美国驻埃及大使理查德·诺尔蒂。约翰逊后来又派前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作为特使前去拜见纳赛尔。

西方大国的紧迫目的是阻止任何一方首先发动进攻。戴高乐总统像约翰逊和柯西金一样，曾分别警告埃以双方不要首先开火。埃以双方日益担心对方会首先进行突然袭击的恐惧感导致危机进入了第三阶段。以色列军方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要求采取行动，它认为每耽误一天时间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在一场已不可避免的战争中多增加一份伤亡。在5月27日和28日晚上，以色列内阁开会听取埃班对华盛顿之行的汇报时，内阁成员在进攻还是等待外交



结果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埃什科尔是倾向于开战的，但在接到约翰逊总统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紧急警告之后，他决定不再强求他的同僚同意他的意见。5月28日，以色列内阁同意等待，埃什科尔据此意见向约翰逊总统做了答复。然而，以色列舆论却向内阁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采取更为好战的战争，要求起用更为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具体说就是要求起用典型的好战人物达扬少将。由于埃以双方的军事动员已造成了致命的怀疑和恐惧，所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公众情绪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更增加了双方的敌对。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加速了战争的来临。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的迹象导致了以色列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团结，反过来这又使阿拉伯国家更加相信战争已不可避免。

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约旦国王侯赛因5月30日突然决定飞往开罗，与他的宿敌纳赛尔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根据此协定，侯赛因国王的武装部队将置于埃及将军的指挥之下。两个埃及伞兵营被空运到约旦。令以色列公众更为惊讶同时也更为警觉的是，侯赛因回国时还带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

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事联盟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明显改变军事平衡，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尚需时日。不论这种合作所造成的威胁在短期内是多么没有效力，但它却足以煽动起以色列公众的情绪。它使大多数以色列人相信，阿拉伯国家正准备发动进攻；它削弱了那些主张等待以外交方式解决蒂朗海峡问题的以色列领导人所持的论据。6月1日，也就是约埃协定签署的第二天，一个以色列全国团结的新政府组成，达扬出任国防部长，贝京出任不管部部长。纳赛尔后来说道，正是以色列这届政府的组成使他相信，战争已是100%的不可避免了。

在接下来的4天当中，外交活动同公众情绪和军事恐惧进行了一场失败了的斗争。由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在加强各自的力量，造成这场争端的起因即封锁亚喀巴湾已退于次要地位，代之

而来的是双方在军事上都担心自己可能因耽搁而丧失主动，而对方却可能因先发制人而获得优势。以色列方面的感觉更为强烈：以色列的战略建立在快速进攻的基础之上，拖延时间只能削弱它在力量平衡中仍享有的优势地位。

6月2日，以色列内阁中颇有影响的劳工部长伊格尔·阿隆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时声称，除非亚喀巴湾重新开放，除非双方削减集结在边境地区的军队，并且阿拉伯各国政府明确保证停止游击战袭击，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他又说道：“这场战争及其每一阶段的结果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约旦和叙利亚边境。”

以色列公众的心态是迎接挑战，而不是干等着遭受阿拉伯国家不可避免的进攻或缓慢地窒息而死。开罗人的心态，正像当时在那里的一位美国外交官所描绘的，则是兴奋得意和宿命论的奇特混合体。他们为已取得的成就而兴奋得意，又因以色列肯定宁愿开战也不愿在政治上遭受重大失败而感到前景暗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以色列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尽管他们对战争的结局并不抱盲目的乐观态度，但是，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捍卫已经赢得的辉煌成就。

在6月份的头几天中，纳赛尔对形势的估计是自相矛盾的。虽然他认为以色列的进攻已不可避免，但他仍希望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最起码取得某些政治成果。他已分别向莫斯科和华盛顿保证，他将不会首先发动进攻。他相信美国一直在怂恿以色列进攻叙利亚，同时还将他本人当作最终的打击目标；但他又期望在危机的最后阶段，美国的压力会阻止以色列发动进攻。他错误地理解了华盛顿和以色列的关系，低估了以色列人，特别是达扬这一代以色列人单独采取行动的愿望和能力。除了过分乐观地相信埃及的军事力量之外，这是他的又一个严重的错误估计。

由于纳赛尔认为以色列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将华盛顿在遏制以色列问题上的失败看作是一个“外交伎俩”。但是，

就在他谴责美国有计划地“行骗”的同一讲话中,他又说道:“任何政治分析都可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将要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伊拉克军队已经开来,约旦已加入联合防御协定之后。”

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一直在起草自由通过作为国际水道的亚喀巴湾的宣言,并为实现这一目的寻求必要的措施。它们希望使尽可能的“海上强国”都来签署这一宣言。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同美国友好的“海上强国”表示愿意签署这一宣言,而考虑参加海上封锁行动的国家则为数更少。五角大楼和国会对越南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时,美国再在中东承担军事义务也无热情。

美国政府同时也在探索直接同纳赛尔谈判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5月31日,纳赛尔在开罗同约翰逊总统的特使罗伯特·安德森进行了会谈。他们一致认为纳赛尔应派其副总统扎卡利亚·毛希丁去华盛顿和约翰逊会晤,而汉弗莱副总统则应前往开罗同纳赛尔会晤。

纳赛尔准备妥协吗?6月4日,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纳赛尔声称他将把海上大国就亚喀巴湾问题发表的任何宣言看作是“对我们主权的侵犯”,是“战争行动的准备”。当时,阿拉伯消息来源曾暗示(战后又更为强烈地重申)纳赛尔已准备允许非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尽管仍禁止悬挂以色列旗的船只通过。不管以色列是否能接受这一安排,问题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纳赛尔是否同意让装载石油的非以色列船只抵达埃拉特港。有迹象表明,美国和英国正在考虑做出这种妥协,以作为6月2日哈罗德·威尔逊和约翰逊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时达成的临时解决办法。美英两国官员私下向新闻界透露,他们估计在过去两年中,通过蒂朗海峡的以色列船只大概只有2—4艘。这一信息显然来源于联合国秘书处。威尔逊在华盛顿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同样也指出通过蒂朗海峡的以色列船只为数很少。这些报导迅速被以色列官员所否定,他们声称以色列船只定期从埃拉特开往非洲和远东地区,每星期要通过亚喀巴湾两三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报导及对其的否认都是真实的:尽管以色列有定期航班,但其参加航运的船只数量只有两三艘,而主要装载石油的非以色列船只则要多得多。

纳赛尔将如何谈判及谈些什么仍然是个谜。根据海卡尔的说法,纳赛尔准备将蒂朗海峡是否属于国际水道这一问题提交到国际法庭。但他显然试图将谈判范围由亚喀巴湾问题扩展到阿以争端的其他方面。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放弃他认为使他处于强有力地位的封锁行动,那么他很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叙利亚非军事区、约旦河水源和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等)得到补偿。

在准备谈判的同时,纳赛尔也在准备战争。6月2日,也就是他通知约翰逊总统他将派遣毛希丁访问华盛顿那一天,纳赛尔在最高指挥部召集武装部队的所有军官开会。他告诉他们(据他本人后来说):“根据事件发展的迹象,我们必须料到敌人将在48小时至72小时内发动攻击。”他又说道,他“预测发动侵略的时间为6月5日星期一,首先攻击的对象是我们的空军。”

由于战争显然已不可避免,纳赛尔像埃什科尔一样受到军方要求先发制人的压力。1968年2月,巴德兰因叛国罪受审时说,埃及空军司令穆罕默德·西德基·马哈茂德曾要求首先向以色列发起攻击,因为如以色列先发动攻击即意味着20%的埃及空军将遭到毁灭。阿麦尔告诉他,埃及首先发动攻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将导致美国的干涉。纳赛尔声称,他从未考虑过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因为他确信美国将进行干预,以保证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先后承诺的以色列边境安全的不受侵犯。

以色列官方仍在信守它对约翰逊总统的承诺,在两周之内,即从5月26日起至少到6月9日止,不发动进攻。以色列政府的最后决定——不再等待,立即发动进攻——是在6月3日晚召开并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出的。根据来自一位权威人士的消息,以色列军方一直在敦促再不能丧失良机。6月4日,伊拉克宣布它已加入由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组成的军事同盟,这成



为促使以色列决定开战的重要借口。虽然伊拉克的行动引起了以色列公众背水一战的情绪,但他们对约旦和伊拉克是否加入这一军事同盟和是否存在埃及首先发动攻击的危险仍有些怀疑。有鉴于此,某些以色列领导人,特别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能力的以色列军方人士决定不再等待。再过几天将会出现的重要情况或许不是阿拉伯国家的进攻,而是纳赛尔与美国开始进行外交谈判。从华盛顿经伦敦返回的以色列特使带回的报告令人烦恼:西方软弱到准备“妥协”。特使之一是以色列情报局长阿米特准将,他对埃班和美国人会谈的报告持怀疑态度,因此亲自去华盛顿看个究竟。据说他写给以色列政府的报告“在战争与和平讨论的最后阶段起了重要作用”。阿米特准将从华盛顿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以色列迅速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在五角大楼看来)将使美国免去许多麻烦。

鉴于美英政策显然已出现变化,而法国保持中立,俄国则持敌视态度,与纳赛尔谈判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失败。这样他们就将被迫做出选择:或是让步,或是在敌人已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他们将得不到世界舆论同情的情况下发动进攻。以色列领导人此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当年艾登面临的问题相类似:随着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和要求在外交上妥协的压力越来越大,艾登眼看着完全改变纳赛尔的“既成事实”策略的机会从他的手指缝里溜走了。

的确,切断通往埃拉特港的航线尽管是灾难性的,但它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不如关闭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的影响那么大。但是,以色列人和艾登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力量关系问题。在以色列领导人看来,应做出何种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或者抓住这个意外的机会进行一次打击,使纳赛尔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也是它真正担心的唯一一支阿拉伯军事力量在未来数年之中恢复不了元气,或者承认力量对比中开始发生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每一阶段,以色列都将在较为软弱的地位上抵制一再要求它做出

让步的压力。以色列领导人把自己看作是慕尼黑时代同纳粹打交道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面对着最终被彻底征服的危险，他们认为最好在力量强大时尽早发动进攻，而不要等到以后处于较为软弱地位时再进行战斗。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色列政府始终认为它正在捍卫的西奈战争之后的10年中一直存在的政治和领土现状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以色列政策的不明智之处可能在于它没有认识到以色列的现状从本质上讲是危险的和不稳固的，这不是因为阿拉伯国家的报复狂热，而是因为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使用武力来维持给其阿拉伯邻国造成巨大伤痛的局面。真正的问题在于，以色列如果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来探求妥协解决办法是否要比依赖单方面保持军事优势更为明智一些。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以色列领导人还是纳赛尔都同样感觉到自己国家的未来生存已面临着危险，这不是指眼前的物质生存（虽然以色列公众认为如此），而是指一个政治、历史和道德概念。面临挑战的不是所有犹太人或所有阿拉伯人的生命，而是他们的自尊和国家实体的思想，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体现在犹太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中。失败对以色列来说可能意味着，以犹太复国主义来打破长期以来犹太人束手无策被迫生活在非犹太人世界的状况的伟大尝试已宣告结束。纳赛尔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会使阿拉伯国家重新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纳赛尔和以色列人都觉得自己正在孤注一掷，就像一个长期受人欺负，最后终于转身面对恶霸的学童一样。6月5日爆发的这场战争的悲剧性在于，这两个都在试图摆脱欧洲社会带给它们的耻辱的伟大民族非但不能相互帮助，反而因历史造成的原因而相互残杀。

## 第十八章

### 六日战争：挫折

(1967.6.5—1967.6.11)

第三次阿以战争于(开罗时间)1967年6月5日上午8点45分爆发。在战争爆发后的头3个小时之内,甚至可能是在头几分钟之内,以色列实际上已获得了胜利。但在为时6天的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丧生。

以色列的胜利,或阿拉伯国家婉转所称的“挫折”,从军事上讲是一次辉煌的成就。

以色列的进攻是以全面袭击埃及机场开始的。经过3个小时的空袭,埃及空军几乎损失殆尽,西奈半岛的埃及陆军在地面战斗中失去了空中掩护。在能够使用的大约340架埃及作战飞机中,有286架在第一天的攻击中即被摧毁,其中包括埃及所有的中程轰炸机。绝大部分受袭击机场的跑道都已无法使用。以色列几乎将其全部32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一半是轰炸机或战斗轰炸机——统统投入进攻,只留下不到12架飞机保卫自己的基地。在情报机构的有效帮助下,以色列空军为这次空袭进行了强化训练。它还使用一种新式武器——一种特殊炸弹来摧毁埃及的机场跑道。但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空军通过各种战术获得了进攻的突然性。有些飞机从不为人注意的地方贴着海面飞行;其他的飞机则沿着西奈半岛的山峦低空飞行,以避开埃及的雷达和防空导弹。首轮攻击的时间定于埃及飞行员黎明巡逻返航后在地面休息的时候

（虽然他们的飞机已被疏散开并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空袭和半小时之后开始的地面进攻恰好选择了几乎整个埃及最高统帅部都在飞行途中这一时机进行。或许以色列人事先对此情况已有所了解，因为他们很可能早就破译了埃及的军事密码。6月5日上午9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米尔陆军元帅和空军司令西德基·马哈茂德将军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军官一同乘飞机从开罗飞往西奈半岛的一个机场。埃及防空部队已接到命令，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否则他们在空中时不得射击。这一行人无法在西奈半岛降落，因为所有的机场此时都在遭到袭击，因此他们只好飞回开罗。在至关重要的90分钟里，他们和部队脱离了联系，并且无法下达命令。更为糟糕的是，西奈驻军的高级指挥官们因去机场迎接阿米尔而离开了各自的指挥岗位。

在以色列飞机对西奈半岛埃及前线机场进行首轮袭击之后，埃及指挥官过了10分钟才报告了受攻击的情况，这大概要归结于埃及人不愿向上级报告坏消息的习惯。但这一耽搁却使以色列人有时间对尚未察觉的更深远的机场进行攻击。

埃及最高统帅部很晚才认识到空军受损失的程度及其对地面战斗的影响。由于它相信了击落以色列飞机的夸大数字，所以它认为在第二天西奈半岛的战斗中，双方的空中力量仍然是势均力敌的。没有一位将军敢告诉纳赛尔受以色列打击的程度，直到星期一下午4点他才得知真实情况。那天早上他欢迎约旦参战时，他还以为他仍然拥有一支空军。当埃及空军被消灭的事实再也无法隐瞒，起码无法向纳赛尔和政府隐瞒时，空军指挥官试图以美英参与首轮袭击来为此辩解。最早谎报军情的显然是埃及空军。埃及军方普遍感到困惑不解的情况又加深了它对英美的指责。它认为参加攻击的飞机大大超过了以色列所拥有的飞机数量。纳赛尔在6月9日宣称：“敌人在作战中使用了超出其正常力量3倍的空军。”这种印象大约是因每一架以色列飞机均在频繁飞行而造成的，这是高效率的地面指挥的结果。接着又有一份报告说，约旦雷达发现大



批飞机正从海上飞来攻击约旦,这些飞机不可能是以色列的。6月6日星期二凌晨,侯赛因打电话对纳赛尔说,400架飞机正在攻击约旦。于是,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宣布美国和英国飞机正在帮助以色列人。结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掀起了反美和反英的怒潮,有几个阿拉伯国家断绝了同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科威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对这两个国家实行了石油禁运。埃及后来承认,尽管“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大规模援助(例如美国间谍卫星向它提供了埃及机场的详细资料),但无法证明美国空军本身参与了对埃及机场的空袭行动”。在那个时候,纳赛尔很容易认为英美会进行干涉,这不仅因为他相信美国和以色列在反对叙利亚和埃及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而且还因为苏伊士战争的经历。

直到获悉空军的损失时纳赛尔才认识到,埃及陆军在西奈半岛的地面战斗中已受到沉重的压力,它将不得不撤退。但他认为埃及陆军仍然守住横跨西奈半岛掩护苏伊士运河的防线。

驻在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埃及军队共有7个师(其中有两个是装甲师),大约10万人。(埃及陆军的总兵力大约为18万人,但其中有5万驻在也门。)西奈半岛有七八百辆坦克,其中半数配属5个步兵师。驻在加沙地带的步兵师是由巴勒斯坦解放军组成。埃及军队的主力驻扎在配备有坚固工事的防御阵地,负责掩护横跨西奈半岛通往苏伊士运河的两条公路干线;驻在西奈半岛北部拉法—阿里什地区的部队负责防守通往坎塔拉的沿海公路和铁路;驻在最南部阿布阿吉利亚地区的部队负责防守西奈半岛中部通往伊斯梅利亚的公路。一个埃及装甲师驻扎在比尔吉夫加法地区充当预备队,并负责防守通往阿布阿吉利亚的公路。

在1956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人首先向西奈半岛南部和中部发起攻击,而这一次他们却首先在北部发动攻击,其矛头直指联结加沙和埃及内地的拉法—阿里什地区。他们的计划是切断拉法—阿里什和阿布阿吉利亚这两个埃及主要防御阵地之间的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迅速前往至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山区,切断埃及

军队的退路。最后,他们将在西奈半岛摧毁埃及陆军,并且占领沙姆沙伊赫。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以色列统帅部动用了3个师团,大约4.5万人以及以色列的大部分装甲部队。以色列投入西奈半岛的坦克数量大约和埃及的相等,但以色列坦克的性能在某些方面比埃及坦克优越,例如,英制百人队长式坦克的105毫米口径大炮要比苏制坦克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以色列坦克兵和指挥官要比埃及人训练更为有素,更富有主动精神。以色列陆军的总兵力大约有26万人。由于以色列将其主要力量投入它一直视为主要敌人的埃及方面,所以,它在与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接壤的漫长边境线上只配置了相对力量的兵力。

在西奈战役中,以色列的总兵力处于劣势,但比较灵活并且掌握了主动,因此能凭借出色的战术和集中兵力在某些关键战场上形成优势数量。经过最初几个小时的战斗,以色列军队已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制空权。正是毁灭性轰炸为以色列陆军突破埃及军队在拉法地区的坚强防御铺平了道路。埃及军队在这里进行了顽强勇敢的抵抗,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第一天的战斗结束时,以色列人几乎已经完全摧毁了拉法地区的7个埃及师。他们已经切断了加沙地带和埃及内地的联系,占领了阿里什这个关键的供应基地和公路铁路枢纽。他们还突破了阿布阿吉利亚的第一道防线,并从后方将其包围。在西奈半岛南端,另一支以色列部队也已经越过了康提利亚防线。

空军的损失使埃及最高统帅部士气低落。情况就像是1956年战争的重演:埃及空军被英国轰炸机消灭后,只剩下陆军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在西奈半岛抵御着以色列的进攻。通讯联络中断,命令相互抵触。当纳赛尔来到最高统帅部时,他发现阿米尔在亲自指挥战斗,而没像事先计划的那样,由参谋长马哈茂德·法齐将军和陆军司令穆尔塔吉将军指挥战斗。他或者解除阿米尔的职务,或者让他继续指挥。他同意了阿米尔的意见,撤退是必须的,但又让

阿米尔去具体负责实施。

星期二早晨6点钟,阿米尔发布了立即从整个西奈半岛全线撤至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命令。1956年,纳赛尔不顾过分乐观的军事指挥部的反对,坚决要求撤退部队,理由是必须保存力量抵御英法对埃及内地的进攻。但这次纳赛尔却认为没必要仓促撤退。他认为撤退行动必须分散在几个夜晚进行,免得造成拥挤;部队可以在西奈半岛米特拉地区和比尔吉夫加法地区的山隘停下来进行阻击。他的意见得到了法齐将军的赞同。当他获悉阿米尔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后,他去最高统帅部否决了这道命令。正奉命撤退的第四装甲师又被告重新返回西奈半岛。但是,法齐将军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分4个晚上撤退的计划,阿米尔已公然对抗纳赛尔的指示,重新下达了全线立即撤退的命令。在作战期间,埃及军队要想有秩序地撤退无论如何也是很困难的。统帅部的犹豫和混乱更加大了困难。指挥作战的仍然是开罗,而不是战地指挥部。开罗总部里的气氛像是在做一场“可怕的恶梦”,因为最高统帅部一会儿极为乐观,一会儿又变得极度悲观;一会儿下令撤过苏伊士运河,一会儿又收回了刚下达的命令。结果撤退变成了向西奈山隘无组织的赛跑,在那里两个师的部队相互挤成一团,在以色列的飞机空袭下伤亡惨重。这是埃及陆军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纳赛尔没有理由指望其他阿拉伯国家,或其他盟友能来援助埃及。和1956年的中东战争相比,埃及的确不是在孤军作战;约旦和叙利亚已经参战;一个伊拉克师已在开往约旦前线中;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已同意出兵;阿尔及利亚的少数喷气式战斗机和陆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埃及。但是,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很弱,无法及时组织起来有效地遏制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长驱直入。由5.5万人和250辆坦克组成的约旦陆军必须防卫长达385英里的边境线,它主要依靠埃及提供空中掩护,因为约旦空军本身只有24架喷气式战斗机。战争爆发后,侯赛因国王决定兑现他在不到一星期前与纳赛尔签订的军事联盟。约旦空军向纳

塔亚地区和以色列的一个机场发动了一两次小规模袭击，约旦炮兵轰击了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埃什科尔通过联合国监督停火的官员奥特·布尔将军带给侯赛因国王一个口信，警告他不要参战，并且许诺如果约旦不卷入严重敌对行动，以色列将不进攻它。然而，即便侯赛因此时真想退缩，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在阿拉伯舆论的压力下，如果他试图超脱于这场战争之外，那他将既控制不了军队，也保不住他的王位。此外，如果以色列对埃及的进攻得手，那么，约旦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得听任以色列的摆布。

由于约旦炮兵仍在进行轰击以及约旦军队占据着耶路撒冷市郊政府大厦的中立地带（联合国停火监督小组总部设在这里），以色列军队发动了进攻。在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之后，以色列飞机于6月5日中午开始轰炸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约旦空军很快即被全部消灭，52架叙利亚飞机和9架伊拉克飞机被击毁。以色列陆军乘势对耶路撒冷和杰宁附近的约军阵地发起进攻。约旦军队进行了殊死抵抗，直到6月6日星期二清晨以色列的猛烈空袭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并消灭了他们的装甲集团和运输车辆后，主阵地才丢失。

叙利亚在战斗中首先对海峡炼油厂及其他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空袭并炮击了以色列边境的拓居地上加利利，6月6日又在炮火支援下对三处以色列拓居地发动了地面攻击，但均未成功。除了这些小规模作战之外，叙利亚陆军在前线地区的7个旅（其中有两个装甲旅）则只是固守着自己在戈兰高地的马其诺防线。

和1956年中东战争时一样，纳赛尔不得不一面应付军事危机，一面应付复杂的外交局势。尽管大国这次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但美国和俄国并没有协调一致，只有一点是个例外，这就是它们都不想让战争扩大到可能将她们自身卷入进去的程度。莫斯科对纳赛尔的支持仅限于保证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无论纳赛尔怎么说美国空军已经干预进来，俄国人就是不相信），同时它还向



R 14  
以色列发出口头警告,并在联合国给予埃及外交上的支持。

莫斯科发表的一项声明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并且警告说苏联保留“根据形势发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一项措施就是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热线”,就采取联合行动以实现停火同约翰逊总统进行了磋商。戴高乐将军也通过自己的“热线”同俄国人进行了磋商。他建议召开中东问题四国会议,并暂停对作战双方运送法国武器。这一决定是对以色列的一个打击,因为它的飞机几乎全是法国制造的。他曾警告过以色列和埃及不要首先开火。

英国赞成通过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以实现停火。当战争头一天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将采取的行动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苏联在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支持下,呼吁将停火与惩治以色列的侵略联系起来,并且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其原先的阵地;其理由是以色列首先发动,如果只是停火而不撤军,那么以色列就会占据侵略得来的领土。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要求实现无条件停火。美国代表阿瑟·戈德伯格争辩说,如果要求交战双方撤回到原先的位置,那么它们不仅应撤到6月5日前的位置,而且应恢复5月16日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前的状况。这将意味着纳赛尔不仅要同意联合国紧急部队重新返回,而且要解除对亚喀巴湾的封锁。美国明确表示,不管先开第一枪的是不是以色列,危机的起因是纳赛尔驱逐联合国紧急部队,特别是封锁蒂朗海峡。因此它不打算逼迫以色列撤回到自己的边境内,除非纳赛尔纠正他的行为。纳赛尔最初表示宁愿战斗也不愿接受上述条件或无条件停火。这可能是个不明智的决定,因为以色列在停火前获得的成果后来得到了承认。然而指望在国际社会干涉之前用3天时间实现主要目标的以色列人必然要在停火前全力扩大战果。这样,在战争第一天结束时,西奈半岛仍在进行战斗,而纽约的外交活动却陷入了僵局。

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阿拉伯国家的形势急剧恶化。在6月

5日至6日夜间,以色列军队在拉法地区粉碎了埃及军队的最后顽抗,经过7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了阿布阿吉利亚。据守阿布阿吉利亚筑垒阵地的有4个埃及步兵营,6个炮兵团和9辆坦克。以色列军队集中了上万人的兵力,一个装甲旅,一个坦克团,6个炮兵团和一个用直升飞机空投到埃及阵地后方的伞兵营。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

6月6日星期二上午,在空军掩护下,以色列军队突破了约旦防线,占领了杰宁以及阿拉伯控制的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在这一天,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整个加沙地带,冲过阿里什并沿着海滨公路向苏伊士运河挺进,然后在南部重新集结兵力,以便投入下一阶段的战斗——切断埃及军队通过比尔吉夫加沙和米特拉山隘撤退的主要路线。

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仍拥有完整的两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但是埃及坚固的主防御阵地已被攻破,以色列已彻底掌握了制空权。开罗指挥部发出的自相矛盾的命令以及某些战地指挥官的阵亡更加剧了因以色列突破防线原本已经出现的混乱。以色列空军的残酷轰炸一直持续了3天。6月6日,星期二,尚未参加任何战斗的第4装甲师奉命撤出西奈半岛。由于纳赛尔的干涉,它又奉命立刻返回西奈半岛,在指挥官去了开罗的情况下投入了战斗。这个师损失了3/4的装备,人员伤亡将近半数。

战后第3步兵师师长奥斯曼·纳赛尔将军受到了审判。法庭指控这个师在师长不在时选择了错误的撤退路线,在通过米特拉山隘时和摩托化步兵师的行车纵阵挤成一团,从而使这两个师成为以色列飞机从容攻击的目标。

到6月6日傍晚,在埃及和约旦前线继续战斗下去显然只会给阿拉伯国家带来更大的人员和领土损失。因此,俄国人在联合国放弃了有条件停火的要求,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立即无条件停火,停止这一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但第二天西奈半岛和约旦境内的战斗达到了顶点。以色列军队越过西岸,于星期三中午打

到了约旦河边。经过上午仓促发动的一场进攻，以色列军队在当天下午，抢在已被约旦接受的停火建议生效前占领了耶路撒冷旧城。

据纳赛尔说，埃及军队从6月6日至8日在西奈半岛有1万名士兵和1500名军官阵亡，5000名士兵和500名军官被俘。埃及陆军损失了700辆坦克，上百门大炮和上千辆卡车及其他车辆。

但到了6月9日，战争仍未结束。结束对埃作战后，以色列人掉过头来又对纳赛尔的盟友叙利亚发动了进攻。从6月8日至9日，以色列飞机持续不断地轰炸了叙利亚阵地。尽管叙利亚政府6月9日凌晨3点20分提出停火，但以色列军队却在当天中午11点30分发起了进攻。以坦克为先导的以色列部队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戈兰高地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击。进攻一直持续到6月10日，星期六上午，这时叙利亚军队放弃了阵地撤向大马士革。以色列军队没有遇到抵抗便越过了叙军阵地并不经战斗而占领了库奈特拉这座空城。此后不久，以色列便接受停火。当天下午4点30分，停火决议生效。六日战争宣告结束。

这是令纳赛尔最为沮丧的时刻。战争开始后他一直没有公开讲过话。代表埃及官方讲话的唯有不断重复最高统帅部公报的开罗电台。当整个战线均已崩溃时，艾哈迈德·赛义德等评论员仍在愚蠢地夸耀阿拉伯世界的胜利。尽管埃及公众可以从外国电台等渠道得知真实消息，但是直到埃及军队残部撤回之后，他们才逐渐了解到损失达到了何种程度。所以，纳赛尔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宣布停火一事使埃及公众感到震惊。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对纳赛尔的批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军队这么快就停止了战斗。尽管纳赛尔这次仍指责英美空军支援了以色列，但他无法像1956年那样以两个大国和以色列一道进攻埃及为失败的借口。差不多整个空军和80%的陆军损失殆尽。除了在也门的部队外，陆军的兵力已所剩无几。维护他的统治的中坚力量、以他的密友和助手阿米尔为首的军官团和他寄予陆军的希望一道被彻底粉碎了。以色列军队不仅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而且还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东岸。埃

及军队为了重新获得对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控制权曾冒过巨大的风险,为开发这一地区也曾做过巨大的努力。埃及的联盟也已经土崩瓦解了。纳赛尔 15 年来的辛勤劳动、从外国军队手中解放埃及、确立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以及在埃及人和所有阿拉伯人中重建民族自信心,这一切似乎在灾难性的 3 天中统统毁灭了。面对令人屈辱的有条件投降这一前景,纳赛尔最为担心的不是物质上的损失,而是阿拉伯民族运动会变得士气低落和曾经敢于骄傲地昂首挺胸独立自主地寻求幸福生活的人民不得不逆来顺受。他之所以敢冒战争的风险,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阿拉伯人,特别是埃及人迟早得转过身来正视以色列的力量,否则就得永远屈从于以色列及其国际支持者的政治意志。他冒了这种风险并且失败了。和 1956 年中东战争不同,这一次不可能因军事上的胜败而获得外交上的胜利。他认为英美积极援助了他的敌人,而俄国人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英美,也没有从物质上援助埃及。国际舆论也不再像 1956 年那样向埃及一边倒。

战前以色列已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受围困的堡垒的形象,周围敌对的阿拉伯国家不仅要将其打败,而且还要彻底消灭这个民族。因此,它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次也对以色列表现出较大的同情,因为它显然是在受到毫无道理的挑衅之后才被迫返回的。甚至在东欧共产党国家内,公众对政府奉行的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也表示出忿恨。此外,因为实际表现和早先发出的恐吓威胁相去甚远,阿拉伯人遭到了世人的嘲笑。以色列的心理战和宣传更是趁机推波助澜,它并不强调阿拉伯人缺乏作战技能,而是巧妙地指出阿拉伯人在作战中表现怯懦,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展示阿拉伯军队,特别是埃及军队所蒙受的屈辱,例如展出只穿衬衣的埃及战俘的照片等。(以色列的目的之一是毁灭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和盟国的形象。)但是,单是这些因素尚不足以说明埃及战败后为什么西方公众会出现奇特的轻蔑和敌视阿拉伯国家的浪潮。在西方政坛,无论



是左翼还是右翼一度均表现出类似排犹主义那样的反阿拉伯种族歧视，阿拉伯人受到的嘲弄类似于犹太人过去的遭遇：某些通俗报纸的漫画以纳粹用过的方式讽刺犹太人体质不佳，缺乏军人素质。在英国，特别是在法国，极右翼势力认为阿拉伯人被一个严阵以待的“白人”国家，一座在“野蛮人”中间建立的欧洲文明堡垒教训了一番，为他们过去屈辱地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前沿阵地和阿尔及利亚“撤走”狠狠地报了仇。

面对这种局势，当坏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呆在曼西特·贝克雷家中的纳赛尔耳中时，他的精神变得极度紧张，身体也垮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据说他的某些同事，其中包括副总统毛希丁，都曾敦促他寻求同美国达成谅解，以此作为唯一能够部分挽救损失的方式。他仍有足够的力量和自尊去选择另一种更为痛苦的方针。他决定公开表明由自己全部承担失败的责任，并宣布辞职，指定毛希丁为他的继承者。他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另一个悲剧事件的影响。6月8日，他听说阿米尔打算自杀。他去看望阿米尔并试图安慰他。他告诉阿米尔他打算辞职，因此让阿米尔也辞去他的军事指挥职务。在宣布辞职决定之前，他只将此事告诉了阿米尔一人。他甚至没有告诉毛希丁。

6月9日晚，纳赛尔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在电视屏幕上，他显得神情沮丧。他的面容憔悴，在宣读讲话文本时，他的声音哽咽，时断时续。他首先谈到战争的起因，将之归咎为“敌人入侵叙利亚的计划”。埃及的责任是不能以沉默来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它先向叙利亚下手，接着就要对付埃及”。无论是约翰逊总统还是苏联政府都曾强烈要求埃及首先开火。但是，敌人的攻击比我们预料的更为猛烈，这表明“以色列背后还有打算清算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其他势力”。纳赛尔重申了英美空军对以色列提供了援助的看法。

纳赛尔宣布，他准备对这次“挫折”承担全部责任。他表示他已决定辞去他在政府的全部职务，放弃政治地位，成为一名普通公

民。他要求毛希丁接任共和国总统。他说：“帝国主义势力想象阿卜杜勒·纳赛尔是它们的敌人。我要清楚地告诉它们，它们的敌人不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而是整个阿拉伯民族。”

纳赛尔告别性地总结了埃及革命的成就，他说：

因此，我不是在进行清算……革命导致了英帝国主义的撤退和埃及的独立。革命确定了埃及的阿拉伯特点，这就是同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作斗争。革命使阿拉伯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确定了由人民来掌管他们的资源和产品。革命使我们得到了苏伊士运河，并且为埃及的工业建设，为建筑高坝，将荒漠变成绿洲奠定了基础。革命使水利灌溉网遍及北尼罗河谷，并在长期的等待之后开发了石油资源。

比这一切更为重要的是，革命使工人阶级在政治活动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讲话结束时，纳赛尔赞扬了埃及军队的勇气，并号召全国团结起来：“这是行动的时刻，而不是悲哀的时刻。”

甚至在纳赛尔的讲话尚未结束之前，他一生的命运又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转变。开罗人民一听到纳赛尔宣布辞职的消息便蜂涌走上街头，民宅和公寓的窗台上也站满了人。他们呼喊，要求纳赛尔留下来。正在开罗采访的法国记者鲁洛曾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在因实行灯火管制而漆黑一片的街头上，成千上万的人走出家门，一边哭泣一边高喊：“纳赛尔，纳赛尔，不要离开我们，我们需要你。”呼喊声听上去像是一阵阵风暴潮。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悲哀之中。数万人聚集在国民议会大厦周围，高喊着“纳赛尔，纳赛尔”，并且威胁要杀死任何不投票支持纳赛尔的代表。50万人聚集在从纳赛尔的官邸通往开罗市中心长达5英里的马路两旁，通宵守卫着纳赛尔，并且想弄清楚他是否会在第二天去国民议会收

回他的辞呈。上百万人从埃及各地涌向开罗，他们要确保使纳赛尔留下来。

在埃及之外，特别是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种对纳赛尔的支持是很奇怪的，他们只能将之解释为一场有人在幕后操纵的表演。纳赛尔给埃及人带来了军事上的灾难，然而，他们非但没有砍掉他的脑袋，反而叫喊着不让他辞职。此外，如果埃及人打算摆脱一个独裁者，现在正是机会——他自己提出来要走。但是，他们不让他走。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迷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西方人仍然没有理解纳赛尔与埃及人民关系的实质，这是埃及人民赞成他的统治权威的决定性因素。他的国际活动主要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与此相比，埃及人民更重视他在本国取得的成就。埃及人不是简单地将纳赛尔看作一个军事领导人并以此来评判他的成败，不管他当时的失败有多么惨重，或许公众当时尚未完全搞清楚失败的程度。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推翻了国王，结束了英国人的占领，使埃及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开始建造高坝，实施了土地改革并试图控制地租，建造了许多工厂和学校，将清洁水和电力送往众多的乡村，开始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更多的埃及人在管理自身事务上的发言权。这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政权不会受到批评甚至反对。埃及人历来有尖刻地嘲讽他们的统治者的习惯——如果不可能公开，那就私下这样做。但是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遇到重大危机，他们也会紧密地团结起来。

对于习惯于几百年的独裁或家长式的统治而又不太世故的大多数人来说，纳赛尔已成为“国家主义”。现在，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这位父亲般的人物即将遗弃他们。但是，使这种感情反应得更加强烈的是人们，其中包括许多受过教育并具有政治意识的人，将纳赛尔看作为反抗的象征。埃及军队失败了，但整个国家并没有失败。敌人占据了大片的埃及土地，但大部分国土仍完整无损并需要保卫。这种形势和当年德国人逼近莫斯科大门时俄国和斯大林所

面临的形势以及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和丘吉尔所面临的形势是一样的，尽管此时埃及的军事地位更为软弱。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输掉了一场战斗，但它们并不打算投降。

这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因为纳赛尔并不只是埃及抵抗的象征，而且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他的下台将最终证明阿拉伯的失败和屈辱，想粉碎阿拉伯民族复兴精神的人会因此得到最大的满足。即使那些反对纳赛尔政策的人此时也本能地出于一种深厚的感情，敦促他不要辞职。人们或许确信，尽管纳赛尔犯了错误并且失败了，但在阿拉伯国家中唯有他才有处理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目前所面临险恶局势的足够威望。

纳赛尔决定辞职时是否预见到群众的这种反应？有证据表明他没有预见到，而且他的辞职打算是认真的。即使他希望出现这种反应，他也未做任何准备和组织工作。像1954年他推翻纳吉布时一样，支持他的游行示威并不是精心策划的。这些游行示威是自发的，没有受人操纵，尽管开始时左翼试图以反美和反对普遍认为奉行亲美政策的毛希丁的口号来引导它们。

在那天夜里，正当全世界的报纸都在为他准备政治讣告时，纳赛尔一直在犹豫徘徊。第二天他下定决心。他向国民议会表示，他决定撤回辞呈，但在战争的后果，即“侵略痕迹”被消除之后，他将再次提出辞呈。

他的决定使公众欣喜若狂。



## 第十九章

### 后果：为复兴而斗争(1967—1970)

在失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纳赛尔一直处于震惊和沮丧的状态。他后来说道，他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行走的人，四周都是流沙，他不知道如果向前走是被流沙吞没呢还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他面临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六日战争似乎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地图及整个力量对比。它使得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比以往更为强大。以色列部队盘踞在苏伊士运河、红海和约旦河一线，并且把战线推进到叙利亚高原距大马士革仅 30 英里处。以色列军队毫无疑问掌握了制空权。以色列控制了整个前巴勒斯坦，其中包括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 100 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整个耶路撒冷。它占领了除苏伊士河北端埃及的一处小桥头堡之外的全部西奈半岛，同时还占领了戈兰高地一千平方英里的叙利亚领土。

这场战争及其产生的后果最终迫使上万人离开阿拉伯土地上的国家：35 万人从约旦河西岸逃往约旦剩余的国土，其中 15 万人是第二次移居的难民，剩下的则是原先即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非难民。另外 11.6 万人则是从戈兰高地的农场和村庄中逃出来的叙利亚难民。埃及则有大约 70 万人撤出苏伊士运河区，那里已成为一片废城镇。苏伊士运河本身仍然关闭，河道被沉船封锁着。西奈半岛的埃及油田已在以色列掌握之中。在物质上受损失最严重的是约旦。它不但失去最富饶的农业区、主要的旅游中心和一半最为

活跃的劳动力,而且还背上了供养成千上万难民这一新的负担。

比物质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对阿拉伯人的士气所产生的影响。在埃及,战争失败使许多人对纳赛尔革命的基本设想产生了疑问。它使公众不再相信埃及军队是一支战斗力量和国家的主要支柱。平民批评家,特别是左翼人士,将军官们在战斗中怯懦表现和一个特权社会“武装阶层”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一阶层和资产阶级交往过于密切,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失败使人们对纳赛尔本人的领导才能和判断力以及政府作出重要决定的方式提出了疑问。战争失败还使人们对“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革命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和技术变革,使埃及社会现代化产生了怀疑。在左翼人士看来,战争失败使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走得还不够远,也不够快。战争失败导致重新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政策——从倡导“埃及第一”到怀疑苏联作为盟友的价值——提出批评。听任自己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让一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国打败的“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从政治上讲,阿拉伯世界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纳赛尔的主要阿拉伯盟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几乎没有进行战斗,倒是他的前敌手约旦在作战中有上乘表现。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除了声誉之外,其他方面没受到什么损害。埃及同美国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存在,它的不结盟政策也处于危险之中。

虽然纳赛尔决心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恢复埃及失去的领土,但他首先关心的是恢复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信心,使他们相信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他们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这种自信不仅是恢复军事力量的关键,而且也是他一直鼓吹的埃及和阿拉伯革命的主要目的。他面临着四项主要任务:重建埃及军事力量;找到以外交手段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力求使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埃及;同时从政治和经济上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在重建埃及武装力量方面,纳赛尔的目标是弥补埃及缺乏全面防御的状况,使它具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并最终迫使以色列人撤出被占领土,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把他们赶出去的话。纳

赛尔将军军事行动重新分为三个阶段：防御、遏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反击的能力）和解放。他的外交活动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真诚地寻求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在谈判初期，埃及在讨价还价时将处于“不正常的软弱地位”。但纳赛尔也和某些阿拉伯人一样对以色列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以色列真正想得到的是领土，而不是和平。他相信只有埃及的军事力量——不管是实际投入使用还是仅仅得到以色列领导人的承认——才能使以色列降低条件并全部撤军。

在复兴的道路上，纳赛尔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巩固他本人在埃及的权威并开始重新组建军队。在他宣布辞职尔后又收回辞呈时，首先是公众对他的支持促使他挑起了正在等待他的那付千斤重担。继尔苏联领导人又进一步给他以鼓励。6月10日，苏联领导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敦促埃及不要让步，并承诺帮助重建武装力量以及向埃及提供全面援助。俄国人已经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他们在战争中没有提供足够的援助极为不满，因此渴望通过除了采取军事行动或与美国彻底决裂外的一切手段来表示他们珍视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停火后不几天，他们即派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来开罗商讨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外交观点。苏联军火迅速运往埃及，苏联军舰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赛德港和亚历山大港。当6月下旬联大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中东局势时，苏联总理柯西金直接率领苏联代表团前往纽约，并且与约翰逊总统在临时召开的最高级会谈中会晤。

纳赛尔通过解除阿米尔元帅和50名高级指挥官的职务而展开了彻底改组陆空军残余部队的行动。他任命法齐将军为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本人亲自掌管军事事务。

纳赛尔最初采取的这几个步骤使他的地位在战败仅两天之后便受到了威胁。6月11日，某些支持阿米尔的军官要求纳赛尔重新恢复阿米尔对军队的指挥权。为实现这一要求，他们还炫耀了武力。6辆装甲车开向纳赛尔的官邸。总统卫队已被全部派往苏伊士

运河前线，纳赛尔还没有来得及亲自控制军队，它仍然掌握在阿米尔手中。夜里睡觉时纳赛尔在枕下放着一把手枪。有一段时间他的处境极其危险，但他丝毫没有让步。他答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解决反叛者感到不满的问题，但他坚决表示，尽管他欢迎阿米尔继续担任副总统，但不可能允许他继续担任军队的司令官。6月21日，纳赛尔改组了政府，他本人亲自出任总理，毛希丁和沙菲任副总统兼副总理。

尽管6月11日事件并未达到刀兵相见的程度，但它标志着纳赛尔和阿米尔集团冲突的开始。两个半月之后，由于阿米尔遭逮捕并自杀身亡，这场冲突达到了高潮。争论的问题部分是战败的责任，部分是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阿米尔及其支持者批评纳赛尔拒绝首先发动进攻，从而使以色列凭着先发制人而获得了优势。纳赛尔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军事指挥的混乱以及没有重视他所发出的防备以色列进攻的警告。1967年7月23日，纳赛尔在开罗大学讲演时为自己做了辩护，这是他宣布辞职继而重新掌权之后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他指出，如果埃及首先发动进攻，那么它将面临美国为支持以色列而进行的干涉以及俄国、法国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接着，纳赛尔表示拒绝接受“强加的和平，因为这意味着投降”这种说法。他呼吁埃及人民不要绝望或放弃他们的原则。他说，埃及不是输掉一场战斗的第一个国家，他以英国在敦刻尔克失败后坚强不屈为例证。他拒绝放弃他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承担的义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不幸，我们要采取的唯一路线是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这些权利。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纳赛尔接受了对埃及政治组织表现得软弱无力所提出的批评。他和平民一道批评了军队，并且赞成加快社会革命的步伐，而不是放慢它的速度。他间接承认在“军人阶层”和官僚阶层中腐败现象日益增加，并许诺取消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的特权。在埃及加强社会革命是必要的，因为“帝国主义和犹太主义侵略”的目的



不仅是为霸占领土,而且也是为了“全面瓦解阿拉伯革命”。纳赛尔指出,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挑战,如果它们试图回避,其代价将是重新回到它们曾试图摆脱的绝望状态中。

纳赛尔的声调忧郁、克制而又果断。仅仅几周之后,他又经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决心再次受到考验。9月4日,开罗宣布阿米尔元帅和前国防部长巴德兰以及其他一些军人和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一起被软禁。对他们的指控是阴谋策划一场有限的军事政变,强迫纳赛尔重新授权阿米尔统帅武装部队并撤消对军官的调查,因为这场调查的目的是想让军队承担战败的责任。

总共有149人受到了询问。除了阿米尔和巴德兰之外,这些人中还包括前内务部长阿巴斯·拉德万,前情报局长萨拉赫·纳赛尔将军,前陆军师长奥斯曼·纳赛尔将军和前突击部队学校校长贾拉勒·哈里迪中校。这4个人和巴德兰与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一起于1968年1月受到副总统侯赛因·沙菲领导的一个特别法庭的审讯。审讯持续了3个月。5名主犯均被判处终生服苦役。另外两名军官被判处服15年苦役。其他30人被判处监禁,14人被宣布无罪释放。

阿米尔没有活着忍受审判的屈辱,或被投入监狱。9月15日,他服毒自杀了。根据官方发表的公告,9月13日,他在调查这一阴谋的官员陪同下,准备在开罗家中接受询问时,事先已服下大剂量的毒药。经过抢救,他在休息室里苏醒过来,后来他再次吞下了他藏在身上的一只塑料棒里的乌头碱。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3小时之后去世了。有关阿米尔的死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谣言:有人说他并没有自杀,而是死于蓄意谋杀。可以想象,阿米尔很可能接受了自杀的选择,但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被蓄意杀死在休息室或医院里。

阿米尔死后,他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缺点不可避免地要被“曝光”。据说,在统帅军队时期,他一直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工作无效率。他任人唯亲的做法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发展。他的

懒散作风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左右急剧发展，他身上的波希米亚人的天性当时已暴露无遗。他与一位电影明星陷入爱河，将她当作第二夫人，开始寻欢作乐，过上了极为奢侈的社交生活。有人曾向纳赛尔汇报了这些情况，但他拒不相信。

纳赛尔和阿米尔的私人关系要比他同其他任何副手的关系更为密切，尽管他们有政策分歧。阿米尔无拘无束、热情奔放的性格显然是纳赛尔极为需要的。在私人交往中，纳赛尔紧张严肃的天性很容易使自己显得拙笨木讷。他们两家的姻亲关系和友谊已有30年之久。纳赛尔的弟弟侯赛因，一位空军飞行员，娶了阿米尔的一个女儿为妻。不管纳赛尔个人有多么悲伤，但阿米尔的死及其同伙的被捕消除了对纳赛尔的权威最为直接的严重威胁，它还可以使纳赛尔按自己的意志指挥军队的重新组建。在大批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陆军和空军在进行大规模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加强苏伊士运河一线的防御。通过召回驻也门的军队，在埃及招募新兵以及扩充和训练民兵和国民警卫队，可使用的兵力增加了。在重建空军的同时，苏伊士运河防线的火力因增加大量火炮而加强。1967年夏天，以色列人在运河一线仍占据着优势。他们能够阻止埃及船只在运河上的行动以及清除河道的任何尝试。他们猛烈轰击苏伊士运河沿岸城市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打死打伤上百人，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他们还炮轰并烧毁了苏伊士炼油厂，以此作为对埃及从赛得港发射火箭击沉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号的报复。纳赛尔命令将苏伊士运河区城镇居民撤往安全地带。埃及当时仍然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到1968年春天，埃及已大大加强了苏伊士运河一线的防御，纳赛尔宣称，埃及武装力量现在“有能力制止侵略”。

在1968年9月和10月，埃及炮兵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埃及陆军已派出小股突击队越过运河袭击东岸的以军阵地。以色列为了报复而实施了一场空袭：11月5日，以色列飞机轰炸了上埃及纳戈·哈马迪地区的电站、尼罗河大桥和

水坝。但是，当年最引人注目的阿拉伯军事行动是以法塔赫为主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扩大了游击战争。经过缓慢的起步，在1968年3月21日的卡拉梅战斗中，巴勒斯坦突击队有了政治影响，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注意。在这场遭遇战中，越过约旦河攻击卡拉梅难民营（约旦河谷中的一个突击队基地）的一支庞大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受到了突击队和约旦正规军的打击，损失惨重。（以色列宣称打死150名游击队员，还抓到一批俘虏，但承认自己也有近百人伤亡，其中包括21人阵亡。）从那时起，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便致力于以全面的游击战来夺回整个巴勒斯坦，以一个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合的巴勒斯坦国来取代以色列的事业。这一新出现的政治组织得到了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阿拉伯政府的承认。1968年秋天，纳赛尔和侯赛因国王在不放弃与以色列达成外交解决的努力这一前提下，宣布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尽管他们并不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

直到1969年春天纳赛尔才觉得埃及的武装力量已足够强大，可以从被动防御的第一阶段跨入积极进行威慑的第二阶段。这一变化的标志是埃及炮兵猛烈轰击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阵地，目的是阻止以色列建成所谓“巴列夫防线”（根据以色列军队参谋长的名字命名）上的工事。根据法齐将军的报告，纳赛尔宣布60%的以军工事被摧毁。以色列对此报道嗤之以鼻。

埃及军队同时还扩大了突击队袭击和步兵越过苏伊士运河进行巡逻的规模并加快了频率。与此同时，埃及空军首次穿越以色列领空，并攻击了西奈半岛的以军阵地。为了进行报复，1969年夏天，以色列空军猛烈轰炸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埃及阵地，并在空战中给予埃及空军沉重的打击。以色列军方领导人后来宣称，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摧毁了埃及的空防体系、雷达和导弹阵地，迫使纳赛尔放弃了早日越过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的希望。1969年9月，以色列向苏伊士湾埃及一侧的防空导弹阵地发动了大规模两栖进攻。3个月之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埃及阵地，并且用直升飞机运走了苏

式新型雷达设备。

早在1969年的五·一节讲话中,纳赛尔曾公开宣布,以色列只能撤军,埃及将不会允许它巩固其在停火线上的阵地,即使因此使埃及遭到报复也在所不惜。6个月之后,纳赛尔透露他打算打一场“消耗战”。他一方面要避免使埃及军队在尚未准备就绪之前投入大规模战斗,一方面又希望使以色列人因赖在停火线上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如果允许以色列人留在那里,停火线就会变成政治边界。1969年7月23日,他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埃及现在正进入“解放”的第三阶段,最后这一阶段必定是从西边跨过运河,到达东岸。1967年战争是不可能重演的。埃及必须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准备打一场消耗敌人力量的持久战。实际上,纳赛尔是因为自己处境窘迫才被迫选择“消耗战”的。埃及极为软弱,无法进行全面战争,当然,他不能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媾和,但他也不能面对着国内的批评和以色列巩固被占领土的做法而无动于衷。然而,纳赛尔选择这个时候宣布展开消耗战既是因为埃及军事力量的恢复已到了最后阶段,也是因为两年来政治解决战争问题毫无进展。

纳赛尔呼吁召开一次新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来协调阿拉伯国家的行动,为进入新阶段而调动阿拉伯的资源。这一呼吁最初并未得到响应,1969年11月在埃及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时,纳赛尔再次发出呼吁。这一次他讲得更为直截了当:鉴于一直没能实现政治解决,埃及必须准备进行战争,准备接受血与火的洗礼。阿拉伯国家同意召开最高级会议。会议于11月21日在拉巴特召开(叙利亚、伊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没有参加),但没有就埃及国防部长法齐将军提出的联合调配部队、武器和资金的计划达成协议。在返回开罗途中,纳赛尔在的黎波里与利比亚革命委员会新任主席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和苏丹总理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举行了会谈。他们一致同意三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上密切合作。

在1969年上半年期间,纳赛尔曾一再做出努力,鼓励伊拉克、



叙利亚和约旦加强自身的力量并密切合作,从而有效地建立起共同对付以色列的“东部前线”。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分歧妨碍了合作。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代表着不同党派——不仅互不信任,而且同是侯赛因国王的敌人。不过,约旦境内驻有大约 1.5 万名伊拉克军人,据说在 1969 年夏天又有一个叙利亚装甲旅进驻约旦北部。约旦军队沿约旦河谷挖掘战壕,用以抵挡以色列持续不断的空袭,这些空袭是对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出发袭击以色列进行的报复。纳赛尔一直鼓励巴勒斯坦游击队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法塔赫和其他几个较小的组织进行了合并,以法塔赫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接过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权。法塔赫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是一支主要力量,但它对其他一些组织,特别是由乔治·哈马什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只有有限的控制权。

到 1970 年春天,游击队力量已发展壮大到数千人(大概有 8 千至 1.5 万人;阿拉法特在 4 月 3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约旦境内有 3.2 万名游击队员,但他们只有 6 千支枪)。他们攻击以色列目标的次数成倍地增加。他们在南黎巴嫩和约旦河谷建立了行动基地并逐步成为约旦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同时也遭受着重大的损失,穿越以色列边境防线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避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遭受以色列的报复,他们把攻击目标集中在以色列本土而不是被占领土上,只有加沙地带除外,那里的独立游击队不顾以色列对平民施行残酷的报复,仍在进行坚决的抵抗。游击战使以色列因消耗战而受到的损失更为增大了。但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的军队合起来仍不足以对以色列形成有效的威胁,不可能在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减轻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前线的压力。

然而,消耗战略已开始见效,在持续不断的小规模交战中,以色列军队的伤亡不断增加。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死亡 803 人,其中 777 人是军人。根据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数字,从六日战争结束到

1970年1月31日为止,以色列死亡526人,其中435人是军人。在同一时期内受伤的2026人中有1469人是军人。军人伤亡中大约一半是和游击队作战造成的,另一半是在同阿拉伯正规军的战斗中造成的,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埃及前线。埃及方面的损失也很惨重。以色列宣称,至少有1000名埃及士兵阵亡在苏伊士运河前线;以色列共击落58架埃及飞机,自己仅损失8架。以色列对运河区城镇及内陆地区的炮击和空袭还造成上百名埃及平民的伤亡。以色列方面还宣称,大约2000名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在被占领土活动时被击毙或俘虏。

在1967年6月至7月战争刚结束即召开的联大特别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仍处于震惊、意见纷争和无组织状态,因而无法采取统一的外交立场。它们已分裂成两个主要集团。由埃及和约旦领导的一个集团认为,必须进行一切外交努力以实现政治解决;为了使以色列撤军,它们准备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它们认为,即使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了,也能为它们赢得恢复力量的时间。为了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阿拉伯国家无论如何也得向全世界表现出愿意调解的姿态。以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为主的另一集团则认为任何政治妥协都毫无用处。它们呼吁通过革命游击战争继续同以色列进行斗争。实际上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中采取军事行动最为消极的,它甚至阻止从本国领土出发进行任何游击战活动。阿尔及利亚也仅仅向埃及前线派出了少数的部队。纳赛尔之所以同意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俄国人满意。苏联政府想利用联合国大会公开发表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以此来抵消某些阿拉伯人士对苏联没有在战争期间提供军事援助提出的批评。它还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谅解,以此来限制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将来出现冲突时所卷入的程度,并帮助阿拉伯国家尽快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就是苏联总理柯西金1967年6月23日在葛拉斯堡罗与约翰逊总统会谈的目的。

尽管战败迫使埃及更加依赖俄国人的保护和军事经济援助,

尽管战败使阿拉伯舆论的反美倾向更甚于反苏，俄国人仍然希望实现政治解决。他们不愿看到再次出现导致六日战争的那种无法控制的危机。那种情况是极端危险的。虽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继续保持紧张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有利，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作为亚非国家中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苏联进行经济和社会合作的典范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为此需要给予埃及更多的关怀。此外，出于经济和战略这两方面的原因，俄国人希望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他们已在地中海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且期望将它扩展到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

纳赛尔粗暴地断绝了同美国的关系为阿拉伯外交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他匆匆忙忙地指责美国直接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援助激怒了约翰逊总统，否则的话，约翰逊很可能因以色列无视他发出的不要首先开火的呼吁而感到愤慨。美国政府此时的看法是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投入苏联的怀抱，约旦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它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其次是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黎巴嫩。然而，阿以冲突是一件周而复始而又充满危险的讨厌事，必须一劳永逸地加以制止。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俄国有某种共同的考虑。美国政策的目标是与俄国达成协议，限制对这一地区的军火供应，最终实现和平。但阿拉伯人，特别是纳赛尔，将不得不为战败付出一定的代价；他们最终会明白，依靠俄国是一个失策。

从联合国进行第一场外交斗争起，纳赛尔的目标就是以最小的政治代价——不承诺全面承认以色列，不放弃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要求——换取以色列军队撤出阿拉伯领土。埃及代表坚持认为以色列撤军，“消除侵略的痕迹”，应该先于政治谈判开始前进行。

以色列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永久性和平解决，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承认并且使边境地区更为安全。它的第二个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将被占领土，特别是前巴勒斯坦，其中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

划归自己管辖,只要不冲淡这个国家的犹太特征,政治上能够消化即可。它坚决主张进行直接谈判,并要求同阿拉伯国家签订正式和平条约。它不打算在直接会谈开始前公布它以领土为要求的和平条件,拒绝在缔结一个和平条约前撤军。

由于美苏分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联大的争论陷入僵局。然而,大会的确通过了两项决议。其中一项要求以色列放弃它对约旦人的耶路撒冷事实上的吞并;另一项则呼吁向受战火影响的平民和被迫离乡背井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待遇和帮助。

9月初,纳赛尔在喀土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脑举行了会谈。这次阿拉伯联盟“最高级会谈”日程表上的主要议题是阿拉伯对以政策,但像以往一样,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争执,特别是尚未结束的也门内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对以采取“不和、不谈、不承认”的立场声明没有表现出阿拉伯国家有任何妥协的意图,以色列也是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次会议是“温和派”的一个胜利。纳赛尔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除了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其领导人未与会)之外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一致认为应尽力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迫使以色列撤军。阿拉伯发言人后来解释,喀土穆宣言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和平协定,但也没有拒绝处于和平状态;宣言并不意味着要进行直接谈判,但也不反对通过第三方进行会谈;宣言并不意味着从法律上承认以色列,但认可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在随后发表的谈话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纳赛尔和侯赛因均明确表示,在不违反这些限制的条件下,他们打算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解决与以色列的争端。他们准备结束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在维持战前边界的条件下承认以色列事实上的存在,接受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安全、进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和自由航行的担保。

经过复杂的商讨,喀土穆最高级会议决定解除阿拉伯国家对美、英和西德的石油禁运,重新开启叙利亚输油管道,与此同时,纳



赛尔和费萨尔国王终于同意不介入也门内战。作为这些协议的组成部分,石油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保证每年向埃及提供 9500 万英镑,向约旦提供 4000 万英镑,帮助它们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其中包括因继续关闭苏伊士运河而造成的税收损失。当初实行石油禁运的目的是以此作为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制裁,以此促使它们压以色列撤军。尽管关闭苏伊士运河据说可能使英国进口石油的费用每年增加 2.5 亿英镑,但抵制显然没有生效。它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原定的受害者。

1967 年 8 月,联合国再次进行媾和的尝试。9 月 22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由英国起草的一项决议。决议规定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及实现这些原则的方式。这项决议成为以后 3 年中阿以尝试实现外交解决的基础。

这项决议的序言强调了某些基本原则:不承认用战争方式获得领土;需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以及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该项条款禁止某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除非是为了自卫。)

这项决议包含有 5 个要点:以色列应从最近的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军”(“领土”一词前省略了定冠词“那些”,明显是为了含糊其辞);一切要求都不应再次提出,交战状态应该结束;必须承认“这一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承认它们拥有在安全和得到认可的边界内享受和平生活的权利”;必须保证自由通过这一地区的国际水道,必须使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同时也应“通过建立非军事区等措施,保证该地区每个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独立”。

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指派一名特别代表去中东“促成一致”,并按照该决议的精神帮助实现政治解决。第二天,吴丹任命瑞典驻莫斯科大使冈纳·雅林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去完成这一使命。

安理会的这项决议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当雅林试图将之付诸实施时,决议中含糊其辞的语言给他造成了困难。在苏联的支持

下,阿拉伯国家坚持说这项决议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完全撤至 6 月 5 日时的边界线。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它们引用了决议中有关不承认通过战争获得领土的第一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人则声称,这项决议将撤军同建立“安全和得到认可的边界”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边界和 6 月 5 日时的边界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在阐释决议时还产生了其他一些分歧。以色列仍然坚持至少要在谈判后期进行直接会谈。它认为雅林得到的训令只是将各方召集在一起。它将安理会的决议看作是仅仅为直接谈判提供了一个方针或框架。在能够面对面和阿拉伯各国政府谈判之前,它仍然拒绝公布它所设想的“安全和得到认可的边界”。

埃及和约旦最初对此项决议持怀疑态度,后来才宣布承认这一决议。但它们将这项决议看作是将要严格实施的计划。作为调停人,雅林的使命仅仅是找出各方如何实施这项计划的途径。这可以通过间接谈判来实现,但在此之前,以色列必须表明它也准备实施这一决议,并且准备撤军。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雅林往来穿梭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设在塞浦路斯和纽约的总部之间,试图达成一项协议,甚至想促使谈判开始,但没有获得成功。

随着时间的流逝,边界战斗、巴勒斯坦游击战和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报复行动都在不断增加,双方感情上的鸿沟更深了。到 1968 年底,情况已变得非常明朗:除非美国和苏联在解释安理会决议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利用它们的巨大影响说服各自的受保护国接受这一决议,否则雅林的使命难以取得任何进展。尼克松政府的上台似乎为出现一个新的开端提供了良机。

俄国人主动采取了行动。1968 年 12 月 21 日,苏联外长赴开罗拜会了纳赛尔。征得他的同意后,苏联外长向美英法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解决阿以争端的建议。

四大国会谈于 1969 年 3 月开始,但与会者的级别仅为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也在继续进行会晤。事情很快即明朗了:真正的交易是在美苏会

谈时进行的。

以色列对举行四大国会谈的主意进行尖锐的抨击。在1969年五·一节讲话中,纳赛尔说,埃及支持四大国会谈的原意是基于以下考虑,即这次会谈应致力于如何实施安理会的决议。但他很快就确信政治解决是无法实现的,其原因在于他认为美国仍从外交和军备两方面全面支持以色列。他认为以色列想得到的是领土而不是和平。为了证实这一看法,他指出以色列的内阁部长们在参加其国内初期选举活动时纷纷公开提出分割阿拉伯被占领土的要求。

1969年12月,纳赛尔拒绝了(尽管是非正式地)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提出的一项新的和平计划。罗杰斯计划没有回避恢复埃以原有边界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讲,它对埃及是有利的。但是,纳赛尔从下述3个主要方面对它进行了批评:首先,这项计划没有明确要求以色列从沙姆沙伊赫和加沙地带撤军,而是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区的地位留待将来公开谈判;其次,这项计划显然试图通过单独媾和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分裂开;最后,罗杰斯同时向约旦提出的建议并没有提出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或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因此,这项计划不如安理会决议对阿拉伯国家有利。

到1970年初,纳赛尔和以色列政府分别表明了各自在媾和问题上的立场。纳赛尔正式通知雅林和四大国,埃及准备贯彻安理会的决议(按照它自己对决议的理解),它不再坚持以色列军队首先撤出后才能进行讨论或采取行动的立场。它将同意一揽子解决决议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并打算在撤军开始前签字以及按照双方协商同意的时间表实施该项决议。它将不会接受直接谈判、双边和平或从外交上正式承认以色列等的建议,但它愿意通过联合国的调停人和以色列进行间接谈判。它愿意签署一项存放在联合国并由四大国担保的契约性多边和平文件(如同1962年在老挝建立中立区的文件)。这项文件将规定双方设立委员会以及履行协定的方式,包括承认在安全和被认可的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国

际水道的自由通行和通过补偿或赔偿手段妥善解决难民问题。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但埃及也将同意建立非军事区和驻扎联合国部队,条件是这支部队应部署在边界两侧。它还同意联合国部队驻扎在沙姆沙伊赫,监督自由通过蒂朗海峡的协议执行情况。

纳赛尔设想分两阶段实施这些措施。第一阶段包括“消除侵略痕迹”,以色列撤至六日战争前的边界,临时建立非军事区,结束交战状态,承认以色列的主权以及在国际法院就蒂朗海峡是否属于国际水道做出法律裁决之前,允许各国船只自由通过。它还可能包括就进入和管辖耶路撒冷的圣地这一问题达成一项协议:纳赛尔准备接受就耶路撒冷归属问题达成的任何协议,其中包括约旦国王愿接受的使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协议。第二阶段将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确定“被认可的边界”、解决难民问题和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问题。

以色列仅将安理会决议看作是谈判的框架。它们认为直接谈判是必不可少的。在明确而又是永久性的和平协议签定之前,它不会撤回一兵一卒。这种契约性协议应是由以色列和单个的阿拉伯国家分别签署并应导致建立一种正常的和平关系,包括法律上的完全承认和自由贸易。必须明确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难民问题应通过将他们重新安置在阿拉伯国家而不是遣返以色列的方式解决。如果要建立非军事区和部署联合国部队,那么它们只能在阿拉伯国家边境一侧,而不能进入以色列领土。以色列不能退回六日战争前的边界,撤军之前必须通过谈判来确定新近“获得并被认可的边界”。耶路撒冷必须保持“统一”,这就是说阿拉伯耶路撒冷应划归以色列,但也可以实行联合管理,可以让约旦管辖穆斯林圣地并使用一条旅游公路。

在谈判开始之前,以色列不可能正式公布它的其他领土要求。以色列联合政府的部长们对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或归还被占领土意见不一。但他们显然大致同意坚持一条界限,即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靠近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那一部分无论如何



不得放弃。以色列军队将部署在约旦河沿岸或沙姆沙伊赫,但以色列是否还应保留约旦河谷的一长条领土并使之殖民化,或者是否还应兼并沙姆沙伊赫和沿亚喀巴湾海岸通往此地的一条西奈半岛领土(按国防部长达扬的提议),部长们的意见不一。西奈半岛的其余部分可归还埃及,但应使之非军事化。加沙地带无论如何不能交还埃及管辖,但有些以色列领导人想将它并入以色列,有些则准备将它划归约旦。

在以色列政府内部,以不管部部长贝京为代表的右翼赞成吞并整个前阿拉伯巴勒斯坦。达扬显然也支持兼并约旦河西岸。1969年7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约旦河西岸已开放为犹太人定居地,“纳布卢斯、希伯伦和杰里科”(约旦河西岸除东耶路撒冷外的三个主要阿拉伯城市)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部分领土。6名右翼部长在1969年11月选举后进入以色列内阁,从而增强了兼并主义者的力量。

以色列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埃及是阿拉伯方面主战还是主和的关键。令人感到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以色列领导人既把纳赛尔看作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又认为他的地位不稳,如果因战败而造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他就会垮台。每过几个月就有人猜测纳赛尔维持不下去了,然而尽管压力巨大,病魔又不断发作,但他仍在继续执政。1968年夏天,糖尿病综合症、操劳过度造成的疲惫和阿米尔自杀对他的打击加在一起使他病倒了。他去苏联进行治疗,结果疗效甚佳。

纳赛尔于1969年9月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在他去世后才被透露出来。在长达6星期的时间内,他失去了工作能力。官方当时公布他患了感冒。据海卡尔说,纳赛尔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一直在忍受着病痛工作,尽管他没有轻易表现出来。

从战争结束到他去世3年间,纳赛尔经受住了好几次政治风暴的考验,埃及经济恢复之快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埃及经济度过了六日战争结束之后那段困难时期。由于苏伊士运河关闭和

西奈油田的丧失,外汇收入锐减。战争来临时,埃及政府正准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缩之后大规模增加预算,投资金额虽削减了,零件和原材料进口却不得不增加。许多工厂仍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除了大坝及配套工程外,开发项目的建设速度大大放慢了。大坝和电站于1970年完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下降到仅为2%,低于人口增长率。但到了1969年年中,经济已开始复苏。阿拉伯产油国根据喀土穆协议提供的援助超出了因关闭苏伊士运河造成的外汇损失。石油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并可望大量出口。战前埃及石油的年产量为750万吨。由于失去了西奈油田,年产量下降到250万吨。但在此后两年中,年产量猛升至1400万吨,其中大部分产自苏伊士湾南部的摩甘油田。计划到1970年底石油生产将增至2500万吨,如果西部沙漠的大油田得以开发,1972年石油产量将增至4000万吨甚至更高。棉花和水稻——1972年产量为90万吨,超过了1966年的产量,达到创纪录水平——的较高出口价格和从国际市场进口小麦的较低价格同样有助于收支平衡。1969年7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在过去的一年中实现了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外贸盈余。1967年至1968年度赤字为8400万英镑,而上年则盈余4300万英镑。这一成绩的取得部分在于进口减少了6400万英镑,同样也在于出口增加了6300万英镑。外债问题至少暂时缓解了,因为按照谈判达成的协议重新调整了赔款额并设立了滚动信贷(按此协定,一笔旧贷款付清时立即提供一笔新的贷款)。在埃及的大约10亿英镑外债中据说有2/3是欠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尽管没人知道埃及通过什么方式,支付了多少劳动军火的费用。(纳赛尔在1970年五·一节讲话时披露,六日战争结束时,即6月12日,苏联允诺免费补偿埃及损失的武器。)这些债务很可能是在较长时间用埃及对苏贸易每年大约1600英镑的盈余偿还的。但是,埃及从西方国家获得新的贷款仍然极为困难,除了那些短期信贷之外。像大坝系统和新的钢铁联合体(总计耗资4亿英镑,由苏联人建成)这样的主要工程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按照定

于 1970 年 7 月开始的新的五年计划,大坝的电力、钢铁联合体和石油生产将成为扩大工业化项目的主要基础。此外,铺设从苏伊士到亚历山大的一条新的大规模输油管道的计划也进展顺利。在苏伊士运河关闭期间这条管道将成为可供选用的国际输油线;当它重新开放时,这条管道被作为运河的补充运输线。1967 年至 1968 年度的工业产值为 11.32 亿英镑,其中增加的部分主要来自私人产业。到 1969 年中期,工业出口额达到每年 1.3 亿英镑的水平,工业出口外汇收入头一次超出了进口设备和原料的支出。1969 年至 1970 年度预算的支出总额为 24.13 亿英镑,和上年实际投资 2.9 亿英镑相比,投资额再次突破 33 亿英镑。据说这项预算中的国防开支达到创纪录水平,其数量没有公布。1969 年 11 月 6 日,纳赛尔在国民议会讲话时说,埃及计划动员 50 万人,投资 5 亿英镑用于军事。根据 1970 年 5 月公布的预算数字,国防费用达 5.13 亿英镑。

经济的综合增长率据估计已上升到 5%,工业增长率则达到了 11%。由于采取了严厉措施,即削减政府开支和食品补贴,通货膨胀已基本得到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埃及的财政状况良好。但增长幅度仍不足以为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 50 万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

为了削减每年达 100 万的人口增长率,纳赛尔敦促努力推动家庭计划生育。纳赛尔最初并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埃及政府也只是在 1967 年战争爆发前夕才开始认真推行计划生育。

1969 年 7 月 23 日,纳赛尔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讲话时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方案。他同时就如何管理通过利用大坝水和政府的其他工程而新获得的 7 万公顷土地提出了某些新的建议。个人拥有土地的限额降低到了 50 公顷,虽然每户拥有土地限额仍为 100 公顷。纳赛尔建议新的土地应由国营公司掌握。这些公司可以自己开垦土地并出售产品,也可以将土地长期出租给农

民,或在优先照顾战争致残人员的前提下,出售给新的小地主。这样,纳赛尔的建议在后来若干年后一直被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日益增多的小农场主应优先获得土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土地必须由大规模农场来掌握。在此前的一些讲话中,纳赛尔已开始强调适当鼓励某些私人企业,特别是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他采纳了在1968年3月大清洗后进入政府任职的那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建议。1968年3月的政府改组是阿米尔事件后纳赛尔遇到的又一次重大政治危机。1967年7月23日和11月23日的两次讲话表明,纳赛尔显然已意识到了战败的震动已造成了舆论的批评和自责。他在11月讲话中指出,已有人要求政府采取“严肃有力的行动”,要求放弃特权,要求“革命的纯洁”,要求更多的自由。他宣布释放两年前被捕的某些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犯,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中近1000名秘密政治和军事组织成员仍被监禁。某些没收财产的命令也被废止了,较多的人可以自由从事政治活动。

纳赛尔声称情报部门的势力下降了。他认为“在试图净化埃及的公共生活时,这股势力是我们不需要的最消极因素之一”。他嘲笑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报导,这些报导说埃及存在着两大敌对势力:一个是以毛希丁为首的“右翼”势力,另一个是以阿里·萨布里为首的“左翼”势力。他说任何相互竞争的势力集团均已不复存在,领导层是团结的。

3个月之后,由工人和学生引起的骚乱使公众的失意和不满公开爆发出来。这是自1954年3月纳赛尔和纳吉布发生冲突以来首次出现的示威。其直接起因是公众对因六日战争失败而判处埃及空军司令西德基·马哈茂德将军和其他一些军官监禁感到极为愤怒,他们认为判决过于宽大,这是军方袒护自己的又一例证。然而,1968年2月21日在赫勒万发生的第一场骚乱却是官方办事混乱造成的。工人们当时正在参加由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官方组织的一场游行,警察事先并未得到通知,因此试图加以阻止。赫勒



万游行遭到镇压的消息使成千上万名开罗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20多名学生和60名警察受了伤。学生们的示威目标之一是《金字塔报》的报社，他们在那里向《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提出了新闻报道应自由而且比较真实的要求。

这场示威游行的动力是人们的挫折感和对一个办事笨拙而且效率低下的政府不满，这个政府不仅实行愚民政策，而且仍在实施令人窒息的安全管制。抗议活动的矛头指向警方在大学里的特别行动和政府对学生会的控制，有些抗议活动还要求自由选举议会和自由成立政党。

虽然这次示威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自由，但它至少反映了3种不同派别的意见：与想要回到议会生活中去的老的中上层阶级联合起来的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和左派。左派认为所谓更广泛的民主就是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建立一支更积极、更独立的政治干部队伍。

在由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例如医生、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等）组成的日益扩大的精英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感觉，即应当让工作更有效率、更有资格胜任的人走上政府部门的负责岗位。他们希望消除革命的后几年中在军官内部形成的“老伙伴网”。由于六日战争的失败和军队及情报部门已名声扫地，纳赛尔一直试图拆散“军人阶层”，同时为了实现军事目的，他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的统治基础是他在埃及民众中享有的巨大威望。他从前是通过安全部门、军队和前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的。现在，这些统治机构已腐朽无力，他想与人民群众（在这些人中他仍是受崇拜的偶像）以及更难驾驭的受过教育的人士保持接触并控制他们已变得很困难了。纳赛尔对2月动乱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改组政府，答应进行改革并亲自和学生领袖对话。他解除了自阿米尔元帅之后他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毛希丁副总统的职务，这标志着除纳赛尔本人之外，阿拉伯革命的老一辈维护者已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革命委员会最初的13名成员中，除纳赛尔之外唯一能留在政府中的是地位

比较低的侯赛因·沙菲。另一名成员安瓦尔·萨达特是国民议会会议长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高级执委会成员。(1969年12月,他被任命为副总统和纳赛尔的代理人。)阿里·萨布里不是13人委员会的成员,他留任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一职(在1969年9月发生的一起微不足道的政治事件中被解职),但不再担任副总统。

为了满足群众提出的让合格的人进入政府任职的要求,纳赛尔用平民替换了内阁中的4名成员,其中包括安排名牌大学的教授担任几个部的部长。但由于内阁成员中多是技术人士而非政治人士,纳赛尔更不得不独自处理政治问题。现在,他的主要统治工具是国民议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这两个很大程度上仍是徒有其名的机构。为了在这条鸿沟上搭起一座桥梁,他制定了一个“政治行动计划”。在3月30日的广播讲话中他概述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后来这个计划就被称作“3月30日计划”。他允诺给予更多的人身和政治自由,但没有给予某些人希望的在政党基础上进行议会自由选举的自由。他没有选择国民议会,而是选择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实现民主化的途径,但他没有批准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建立左派一直要求成立的那类政党。他答应将按照中产阶级技术专家的要求,进一步清除官僚主义,建立一个有现代效率的政府,但他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要经过“自上而下的自由选举”来进行重建。中央委员会将继续保留并制定全面的国家政策。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属下的一个委员会将检查政府的安全措施,目的是遵照最高法律的要求维护阿拉伯革命。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还可以接替国民议会起草一部永久性宪法。尽管3月30日计划试图改变统治机器效率低下的状况,但它没有解决本国知识阶层政治上深重的压抑。在5月2日的投票表决中,这项计划以99.98%的多数票获得通过,这个数字本身即说明情况没发生什么变化。接下来就是定于6月23日开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

代表大会的选举。国民议会的选举工作将于翌年1月进行。但这两项选举都没有激起丝毫的政治热情。几乎没开展什么竞选活动。冷漠成为普遍的情绪。造成这种气氛的原因部分在于人们对言论自由和限制秘密警察的活动这类许诺持怀疑态度,同时也是因为尽管纳赛尔仍是埃及政治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但由于疾病的折磨,在夏天的几个星期里他实际上处于无法工作的境地。一位经常能见到纳赛尔的亚洲外交官认为他在那个夏天中的沮丧心情和尼赫鲁在中国进攻印度后的情绪是一样的。尼赫鲁能够通过深入到农村的全国旅行逐步恢复他本人乃至印度公众的情绪。纳赛尔则发现亲身接触基层群众是异常困难的,尽管他的政治天才的一部分就是他善于把握公众情绪的内在能力。

没有纳赛尔在政治上的推动,政府陷入了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泥沼。由于政治上没有出现真正的变革,军事前景也没有重大的改观,另一场示威活动出人意料地爆发了。1968年11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这一次发生在亚历山大、曼苏拉和阿西特等城市。在亚历山大,示威活动演变为自革命前开罗的“黑色星期六”以来最为严重的骚乱。阿西特骚乱的起因是伊斯兰神学院的学生要求改变检查制度。有4名学生丧生。在亚历山大,骚乱始于要求公民自由的示威。有491人被捕,91人被监禁,其中46人被送上审判席。

在亚历山大骚乱中,除了学生之外其他阶层的人士也参加进来了。这场骚乱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警察和整个统治机构的愤怒,警察局和其他政府建筑成了攻击的目标。造成这场骚乱的主要原因是埃及青年人对政治的不满。据报导,在亚历山大首先发起示威活动的学生和大学青年教师中包括一些自称“自由社会主义者”的人,但和开罗2月发生的骚乱一样,参与者中包括持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从穆斯林兄弟会会员到介于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共产主义者。示威活动的口号既有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也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既有号召对以色列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也有要求更多的

政治自由的。

学生们向记者散发了一份由亚历山大大学法律系学生起草的七点备忘录。备忘录呼吁用一个“新社会”取代建立在“预先构想的口号”这个基础之上的现存社会，并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

纳赛尔对这场骚乱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他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责这场骚乱是“反革命分子”和大学生中“不负责任的少数人”煽动的。他呼吁学生们承认在以色列仍然占据着埃及领土的情况下，维护全国团结是“压倒一切”的要求。这场骚乱导致内部安全措施为加强以及新一轮间谍和叛国罪审判的开始。12月底，7名埃及人，其中包括1名政府律师——一所政府所有的建筑公司的经理，2名军官，1名农民，1名职员和1名大学医科讲师，被指控计划在1968年5月暗杀纳赛尔和政府其他官员。指控书说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埃及全国会议”的秘密组织，目标是推翻现政权，与以色列缔造和平条约。

在196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的政治生活一直保持着平静，尽管在这种表象下面批评意见和紧张空气依然存在。开罗的气氛正常得犹如处于昏睡状态一般，知识分子的情绪显然已近于绝望。政府和知识界的批评者之间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逾越。政治自由已很少听说，新闻管制和以前一样严格。公众仍然对官方声明和新闻报导持深深的怀疑态度。纳赛尔主要关心的仍是对以军事和外交斗争以及埃及经济的发展。

1969年9月，贝鲁特报纸登载了令人震惊的传闻：埃及的亲苏派左翼势力密谋发动军事政变（据说阿里·萨布里也参与其中），纳赛尔在军事和政治最高领导层中进行了清洗。谣言的根据是一些东拼西凑的事实：在以色列装甲部队袭击苏伊士湾沿岸之后，纳赛尔解除了陆军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他还撤换了一家著名左派报纸的主编，免去了负责管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事务的一位官员的职务，此人是阿里·萨布里的门徒。纳赛尔本人则



按官方公布患了重感冒。后来，官方又宣布阿里·萨布里被解除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的职务，尽管他还是最高执委会的成员。据说这次降职是因为从莫斯科返回时，阿里·萨布里的随行人员试图随身带回超出规定范围以外的物品。

事情的真相到现在仍未大白于天下。但有证据表明并没有出现过发动军事政变的密谋。纳赛尔是在采取另一个平衡措施。虽然萨布里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和他的门徒以及那位左翼报纸主编的失宠可能是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左翼发出的一个警告，同时也可能是在告诫苏联人限制他们的影响。阿里·萨布里的权力早已被大大削减了。他在1968年11月患了心脏病，从那以后他的工作节奏已经放慢了。1969年3月，纳赛尔任命他担任埃及空军和苏联人之间的首席联络官，他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得宠了。

虽然官方公布纳赛尔患了感冒，实际上他得的是心脏病。他不得不休息6个星期，这为他不参加9月22日在拉巴特召开的伊斯兰国家最高级会议提供了方便的借口。

自从2年前召开喀土穆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再未举行过，尽管纳赛尔为召集这样的会谈做出过种种努力。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不想举行最高级会谈。沙特领土没有被别国占领，费萨尔袖手旁观，让纳赛尔承担决定战争与和平的责任，显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此外，他还可以少说一些诸如收复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之类好战的话，少让驻扎在约旦南部为数不多的沙特军队抛头露面，少给埃及和约旦提供援助。

鉴于旨在解决阿以问题的国际外交活动一直未获成功，纳赛尔再次要求在1969年夏天召开一次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以便协调阿拉伯军事和外交行动。费萨尔表示反对并重新提出召开伊斯兰国家最高级会议的建议。8月间，位于耶路撒冷以色列占领区内的亚克萨清真寺被部分焚毁给费萨尔提供了一个机会。亚克萨清真寺是最受崇敬的穆斯林圣殿之一，这件事引起了各地穆斯林

的强烈反应。

纳赛尔不赞成召开穆斯林国家最高级会议有几重原因。他认为这种会议是费萨尔要求召开伊斯兰会议的旧方案的续篇，或者它还是一种契约，目的在于通过招揽像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样的比较保守而又亲美的伊斯兰国家而削弱纳赛尔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他还反对利用伊斯兰教作为政治活动的基础，因为这和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世俗传统是对立的，而且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和诸如黎巴嫩这样的半基督教（埃及本国也有大约 300 万科普特基督教徒）阿拉伯国家内部造成分裂。这种观点和纳赛尔国内的宿敌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张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做法会损害埃及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埃及同印度的友谊显然要比它同穆斯林巴基斯坦的关系重要得多。最后一点，纳赛尔认为伊斯兰国家最高级会议不可能认真协调对以行动，而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则肯定会这样做。在穆斯林国家中，有些国家，例如土耳其和伊朗，同以色列关系良好，同埃及的关系却很糟或很冷淡；另一些国家，如某些非洲国家，则不觉得有义务站在阿拉伯国家一方。

纳赛尔明白，由于费萨尔以财政援助为手段施加压力，因为他不可能召开纯粹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也不可能阻止召开穆斯林国家最高级会议，因此他尽力表现出欢迎的姿态。他认可了召开一次穆斯林国家最高级会议的主张，并将会议组织工作交给了费萨尔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与此同时，他又安排在开罗召开一次直接和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的“小范围最高级会议”。苏丹也参加了后一阶段的会谈。9月22日穆斯林国家最高级会议在拉巴特开幕时，纳赛尔称病没有参加。这次穆斯林国家最高级会议并没有对费萨尔或阿拉伯事业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给纳赛尔造成多大的危害。费萨尔可能希望这次会议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陆军中出现的骚动已对他的地位形成了威胁。有报导说，9月份发生了试图推翻沙特王朝的阴谋，有数百人被捕，有些人被处决，这其中不仅有

沙特正规军,也有由一直被认为忠诚的贝督因游牧民组成的费萨尔的“白军”。

另一方面,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因苏丹和利比亚的亲纳赛尔的激进民族主义军官发动的革命而得到加强。在伊拉克,以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于1968年6月推翻了阿里夫总统,这是纳赛尔受到的一个挫折。虽然开罗和巴格达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密切友好的,但作为盟友,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成了一笔债务,而不是一份资产,最终它变成了埃及的仇敌。它对政治对手的血腥迫害,它搞的搜捕间谍和叛徒的活动和公开执行死刑,包括吊死几名犹太人,以及重新开始和库尔德人进行战争(1970年3月达成停火协议)玷污了伊拉克在国际社会的名声,也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名誉受到损害。与此同时,由于巴格达政权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它与大马士革复兴党的宗派之争以及与邻国伊朗的争吵(伊朗国王乐意使之激化)等事情上,因此它几乎发挥不了反以军事同盟的作用。然而,当纳赛尔在1970年7月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停火倡议并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时,他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谴责。

纳赛尔在阿拉伯群众中的威望一度因六日战争而动摇,但现在已基本恢复到3年前的高度。这已经不是中东的阿拉伯人喜欢或不喜欢纳赛尔的问题:大多数人确实认为他是唯一的阿拉伯领导人。在埃及境外支持纳赛尔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看来,他的声望已不再是完美无缺的。“他就像一只裂了缝的中国花瓶。他将永远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这是六日战争结束半年之后一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在黎巴嫩说的一番话。崇拜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埃及青年军官和把埃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技术和社会落后以及自身被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的知识分子现在均以批评的眼光来衡量纳赛尔的表现。

面对着最近出现并日益增强的政治逆流,纳赛尔显然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内部、在偏向右翼或左翼、偏向西方或苏联之间掌握

着平衡,尽管在大部分时间内他还更多地倾向于左翼,倾向于苏联。这种偏左或偏右、亲东方或亲西方的趋势并不一定恰好和要求同以色列媾和或打仗的压力重合的。这也不是好战的纳赛尔在煽动爱好和平的群众。相反,纳赛尔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比他们的人民更清楚地了解阿拉伯军事力量有多么软弱,而人民更多意识到的是屈辱和极大的不公正。的确,在埃及的中产阶级,特别是老一代人当中有一股强劲的势力,他们要求迅速与以色列媾和,即便因此而抛弃埃及的阿拉伯盟国也在所不惜。他们认为埃及已为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现在它应减少损失。但是,埃及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和年轻军官的普遍情绪显然是赞成尽快重新开始对以作战,只要能恢复受到伤害的民族自豪感就行。

纳赛尔的立场介于这两种要求之间。他不打算放弃他的整个阿拉伯政策,不打算为了使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而屈从于新的美国势力范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相信他会这样做。无论如何他也不会相信埃及能脱离阿拉伯世界而独立生存。但他准备和以色列解决问题,这将有效地(用他的一位随从对我说的话)将巴勒斯坦问题“暂时冻结起来”。即使是在巴勒斯坦游击活动日益增加,他的观点更不容易得到承认的情况下,他仍以为只要实现了包括妥善安置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内的和平,游击活动将不会成为重大的障碍。与此同时,他正在重新组建埃及军队,准备必要时用战斗来夺取被占领土,但他不得不劝告那些急于采取军事行动的人保持耐心。

战后的形势发展表明,纳赛尔已同埃及公众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他显然已成为现代埃及舞台上不可取代的人物,一座民族的丰碑。然而,尽管令人生畏,但他仍然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物。他常常受到批评和嘲笑,然而,甚至他的错误也使他和埃及人民的感觉更为相近。埃及人民觉得自己的历史是一场悲剧,他们往往更尊重动机的正确,而不在意实施的效果。



纳赛尔将埃及的所有重大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不仅是总统，而且还担任着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和唯一允许存在的政治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主席。他正在亲自监督埃及武装力量的重建工作。留在他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享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些人都是小人物、下属和执行他意志的工具，但这些人为了对他施加影响而相互竞争，耍弄阴谋诡计。如果说军队中有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在密谋推翻他，就像他当年密谋推翻法鲁克那样，那么迄今还没有人听说过这些军官的名字。当一位法国记者问纳赛尔未来的纳赛尔们是否不可能存在时，据说他笑了笑回答道：“我希望如此。”

如果说纳赛尔的地位显然很稳固的话，那么他的政治机器则因士气低落而没有效率。也许他的创造力快要失去，埃及需要有新人来管理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纳赛尔是在1969年7月。他显然已完全从疾病和上一年夏天的情绪低落状态中恢复过来。他看上去很健壮，心情快乐而又轻松。他已不再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休息、早上9点起床，而是在午夜前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早饭前打一个半小时的网球。他的家庭生活仍很平静。他的3个儿子中，哈立德正在大学学习工程课程，阿卜杜·哈米德在海军学院学习，阿卜杜·哈基姆仍在上中学。他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并都有工作。莫娜有了一个名叫贾迈勒的儿子，她在《金字塔报》的儿童读物出版部工作。霍达在总统府研究室工作，有个女儿。纳赛尔总是设法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并和他的两个外孙共享天伦之乐。

纳赛尔的总统秘书处规模不大，但其中有一两个人是有影响的助手，其中包括为他解决外交问题的能手哈桑·霍利。他愿意直接和他的部长们打交道。内阁每星期天开会；星期六上午四五位部长总要开会处理经济问题。纳赛尔频繁地打电话进行指导。他仔细阅读阿拉伯文和外文报刊，关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国民议会的讨论；借此了解公众舆论，特别是国外的舆论。

纳赛尔一手掌管着制定政策、行政和立法这三方面的工作：第

一项工作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进行,第二项通过内阁进行,第三项通过国民议会进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和基层支部中的讨论提出政策指导方针,然后向最高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由纳赛尔担任主席的最高执委会做出最后的政治决断,并指示部长们起草必要的法令。这些法令经内阁(纳赛尔担任总理)同意后送交国民议会讨论批准。这就是权力运转程序,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许多事情可能就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在一般问题上,纳赛尔总是尽可能征得阿拉伯社会主义最高执委会多数成员的同意,但实际上在遇到重大或紧急情况时,他会越过这个机构直接发号施令。

1970年6月,战争已过去了3周年,以色列军队仍占据着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仍然关闭着。尽管纳赛尔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他显然已从战争的创伤中明显地恢复过来。由于产油国的援助,埃及在财政上有了偿付能力。它已能够捍卫自己,虽然军事开支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重新开始。埃及仍然对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承担着义务,尽管前者此时显得比以往更加沉默。埃及对苏联的依赖大大地增加了,但它仍然没有变成苏联的卫星国。纳赛尔衡量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履行其义务的标准是看它们能为埃及的复兴、能为对付以色列做出多大的贡献。

从战略上看,埃以军事对峙仍处于僵持状态。但“消耗战”已开始明显地升级,美苏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性已大大增加。

埃及军队已重新装备到和六日战争前大致相当的水平,在坦克和大炮方面可能要比战前更强一些,在进攻性飞机方面要弱一些。埃及军队能够使以色列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强行突破苏伊士运河防线,把以色列人赶出西奈半岛的程度。以色列军队能够守住苏伊士运河防线并发动空中和地面袭击,但不可能入侵并占领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以色列空军仍占有优势,在美国提供了50架鬼怪式远距离战斗轰炸机之后,它

的攻击力更是大大地增强了。但埃及空军也已显示出能够进行有限的攻击。

摧毁了埃及的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之后，以色列人在1970年初将他们的空袭目标从运河区扩展到开罗市郊。在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造成上百名埃及平民的伤亡后，纳赛尔要求苏联人提供更为先进的萨姆式防空导弹。据报导，配备苏联操作人员的导弹已紧急运出；1970年4月29日，又有报导说苏联飞行员正驾驶着埃及飞机在执行“作战使命”。这标志着苏联对埃及防务承担的义务又升级了。

以色列请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鬼怪式和天鹰式战斗机以及其他武器装备，据说这笔军火的价值为10亿美元。美国曾公开对以色列“深入”埃及腹地进行空袭表示哀叹，因此它决定在为结束战争进行新的外交尝试之前暂不考虑以色列的请求。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停止对苏伊士运河30英里以外埃及目标的轰炸，以免与苏联飞行员发生冲突。反过来他们集中力量对苏伊士运河区的埃及军事设施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埃及方面的伤亡人数据传已经上千，但以色列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埃及在运河区的防空力量因引进苏联新式导弹而得到加强。因为以色列在运河区的空中优势一旦被打破，驻扎在运河东岸的以色列步兵便很容易遭到炮火轰击，最终还会受到地面攻击。

苏联人和美国人一样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感到不安。在约旦，影响日益增加的巴勒斯坦游击运动是使人们感到忧虑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和平解决的时间耽搁得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巴勒斯坦游击队和约旦军队2月份在安曼发生了冲突。约旦政府试图强行禁止游击队员在城市里携带武器。但游击队领导人怀疑侯赛因国王或他的某个亲信为了迎合美国的计划、实现政治解决以色列问题，正在有计划地消灭他们。4月份游击队组织了示威活动，反对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事务的官员约瑟夫·西斯科访问约旦。西斯科此行的目的是讨论和平的前景。

在五·一节讲话中，纳赛尔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他警告说，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如果想避免阿拉伯人民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这种状态或许会延续几代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由于以色列仍在进行空袭，埃及陆军跨过苏伊士运河，两次实施了最猛烈的白昼攻击。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是，游击队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和安曼军队进行的。据报道，在6月7日至11日期间，安曼等地多次发生冲突，造成400人死亡，800人受伤。约旦当局谴责巴勒斯坦游击队企图暗杀侯赛因国王，游击队则对此加以否认。

阿拉伯联盟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调解，侯赛因国王和游击队领导人于7月10日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侯赛因国王同意解除他的舅舅纳赛尔·贾勒米将军担任的总参谋长的职务，解除他的另一个亲戚扎伊德·沙克尔少将担任的装甲师师长的职务。游击队领导人怀疑这两个人试图搞垮他们。约旦政府保证游击队可以自由行动，反过来，游击队也保证遵守约旦国内必要的安全措施并用纪律约束游击队员。这项协议使游击队控制了安曼市内的许多地区，但整个首都则被约旦军队包围着。

美国原打算就中东问题提出一项新的外交倡议，后来被耽搁下来，其原因部分在于尼克松总统决定对柬埔寨进行干涉。到这场干涉结束，美军于6月底撤走时，国际气候，特别是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已不适于就中东问题提出新的建议，因为这样做必须得到苏联的合作。

但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6月25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重新恢复联合国调停人雅林肩负的使命，并呼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停火并开始对话”。他说，这项新倡议是根据尼克松总统4月29日的命令对中东局势做出评估后得出的结果。由于4月29日是以色列宣布苏联飞行员在埃及参加作战行动的日子，因此可以看出，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加是



促使美国提出这项倡议的新的因素。在7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方面批准了新的和平倡议,另一方面又保证维护以色列要求的力量平衡,以此威胁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进攻。

6月19日,罗杰斯致信埃及外交部长马哈茂德·里亚德,提出了美国的和平计划。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以色列、约旦和苏联政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美国的建议有三个要点:达成停火90天的协议;交战双方重申承认1967年安理会决议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埃及和约旦承认以色列的主权,以色列则撤出被占领土;就通过雅林进行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停火条件——应另行谈判——包括停止向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停火区运送任何新的军事物资和装备。

6月29日,纳赛尔秘密飞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讨美国的计划。他在莫斯科一直呆到7月17日,同一天莫斯科发表的一份公报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公报表明苏联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但强调埃及和苏联将继续遵照安理会的决议,寻求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

这样,纳赛尔接受美国计划的道路已经畅通,在7月23日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纳赛尔对此也加以肯定。纳赛尔声称,就接受美国的建议而言,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措施,因为埃及一直表示承认安理会的决议和雅林的使命。他还告诫埃及人,如果政治行动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土,他们绝不能忘记首要事实:被武力夺走的东西只能使用武力夺回来。

美国的计划同样被约旦和以色列所接受,苏联、英国和法国也表示同意。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在阿拉伯世界,接受这一计划均导致了内部的政治分裂。在以色列,以贝京为首的6名右翼部长集体从果尔达·梅厄夫人的联合内阁中辞职。纳赛尔的决定遭到了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指责。所有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都在抨击美国的计划,然而,法塔赫领导人在批评纳赛尔本人时却比那些爱走极端的同伙显得慎重些。他们极不希望在和谈能否成功尚不明朗时和埃及决裂。如果和谈失败了,他们

就不必疏远埃及，因为埃及是他们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如果只剩下难以对以色列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他们，游击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的确，纳赛尔寻求政治解决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在重新开战时“东部战线”会被以色列攻破。

8月7日，苏伊士运河区实现了停火；18天之后，雅林在纽约同埃及、约旦和以色列的代表举行了初步会谈。但以色列于9月6日正式宣布退出会议。他们声称埃及向运河区新运送了防空导弹并增设了导弹发射场。埃及一方则抱怨以色列破坏协议，建筑了新工事。以色列的指控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因此以色列拒绝在埃及撤走进攻性导弹之前重新开始谈判。

正当美国的和平倡议因此而即将搁浅时，它又突然受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严重打击。约旦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倡议使侯赛因国王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在9月的第一周内，安曼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战斗，约旦北部也出现了小规模交火，其原因主要是约旦军队对游击队发动了攻击。战斗造成了成百人的伤亡。停火协议刚一签订即被破坏了。双方均试图在最终摊牌之前增强自己的地位。如果因美国的和平倡议实现了同以色列的和解，最后摊牌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正当约旦滑向内战的边缘时，9月6日发生了另一桩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新闻：巴勒斯坦游击队中极左势力“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试图同时劫持4架国际航班。首先受到劫持的是一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它在飞临北海上空时，机内发生了一阵枪战，这次劫持行动被挫败了。战斗中有一名劫持者被击毙，另一名24岁的姑娘被逮捕，并在伦敦机场移交给英国当局。紧接着被劫持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飞机降落在开罗机场，待乘客和机组人员离开后，飞机被劫机者炸掉了。但另外两架分属瑞士航空公司和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则被迫飞往约旦北部沙漠中的一个简易机场，飞机降落后乘客和机组人员被扣作人质。

3天之后,英国航空公司的一架 VC-10 班机在从波斯湾飞往贝鲁特途中也被劫持到这里。最后,300 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分别关押在 3 架飞机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威胁说,除非被扣押在其他国家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获释,否则将连飞机带旅客一同炸掉。因为劫持飞机或袭击机场而被关押在英国的游击队员有一人,关在西德的有 3 人,关在瑞典的也有 3 人。以色列关押的人数不详,但其中肯定有两名著名的阿尔及利亚军官。

与劫机案有关的 5 个国家一致认为,与游击队商议交换条件时必须包括释放所有的人质。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非官方机构充当了谈判的中间人。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最初只有伊拉克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埃及和法塔赫游击队组织谴责劫机行为损害了阿拉伯事业在国际上的声誉,并呼吁无条件释放人质。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给纳赛尔写去一封密信,请他帮助保证人质的安全获释。凭着纳赛尔的个人影响,埃及外交在导致人质全部获释的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约旦已陷入流血的内战,谈判处于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阶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劫机者,最初只释放了大约 250 名妇女和儿童以及除了拥有美国、英国、瑞士、德国和以色列国籍之外的男子。接着他们炸毁停在机场上的 3 架飞机,带着剩下的 54 名人质藏到了安曼城内的一个秘密地点。

正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被称作“革命机场”的这个特殊的地方——3 架载满人质的飞机被态度和蔼但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守卫着,反过来他们又被约旦军队的坦克包围着——忠于王室的约旦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已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内战。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国际舞台上耀武扬威、蔑视一切权威——包括以法塔赫为核心的巴解组织——的时候,约旦政府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种情形激怒了约旦军队的一些军官。他们敦促国王——如果他需要别人敦促的话——抓住这

个机会确立自己的权威，在游击队尚未控制全国之前，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极左翼游击队组织已引起中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不太遵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已把自己搞得不得人心。法塔赫组织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但是，面临着对整个游击运动的挑战，它必定会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及其他极端主义分子站在一起。

9月16日，也就是在另一项停火协议刚刚签署后的第二天，侯赛因国王解散了内阁，任命了一个军政府。

几小时之后，约旦军队开始对安曼和约旦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据点发动全面进攻。游击队员拼命抵抗，但兵力对比悬殊，而且只能用轻武器来对付约旦军队的大炮和坦克。接下来发生的内战和游击队请求阿拉伯国家帮助的呼吁使纳赛尔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由于这场内战的起因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反对按照安理会和美国和平倡议的设想用政治手段解决以色列问题，因此纳赛尔站在侯赛因国王和约旦政府一方，而没有支持游击队。他早已下令关闭了法塔赫在埃及设立的电台，因为游击队攻击埃及的政策。另一方面，基于国际政策的考虑和他作为一位激进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声誉（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因为他与以色列媾和的有效性依赖于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权威），他不可能同意侯赛因国王消灭游击队，至少在这个时期不行。

长期以来，纳赛尔对待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声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搞某些极端活动——例如劫机——与自己无关，另一方面又向法塔赫提供武器、资金、训练和政治活动设施（如在开罗架设一架电台）以及在阿拉伯世界的特定外交地位。他同情作为民族抵抗运动的游击队组织，承认它们对阿拉伯民众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并把它们看作实施消耗以色列战略的有效工具。原则上他也同意游击队的目标，即创建一个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组成的非宗教单一巴勒斯坦国，以取代以色列和西约旦。实际上他认为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同纳赛尔一样，愿意接受



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只要这个解决办法包含着以色列撤出全部被占领土的内容即可。如果这种解决成为现实而巴勒斯坦游击队仍持反对态度,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但冲突规模可以得到限制。作为最后一着,游击队的领导核心将服从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人则很容易被消灭掉。与此同时,只要以色列的态度使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妥协办法仍然很成问题,那么巴勒斯坦游击队和阿拉伯政府将悲惨地相互残杀。此外,游击队组织继续存在于约旦使纳赛尔确信侯赛因国王将不会冒险单独同以色列缔结条件不利于埃及的和约。

面对约旦的内战,纳赛尔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使战斗停止,使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免于毁灭,使侯赛因国王不要遭到政治上的失败。他对这场自相残杀的大规模内战感到震惊。

危险的是,这场内战还可能导致来自阿拉伯国家或以色列和美国的国际干涉。华盛顿故意透露,如果必要,特别是如果阿拉伯国家向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大量援助的话,美国将为挽救侯赛因而出面干涉。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认真地看待美国的这一威胁。

纳赛尔认为,如果得不到外部援助,巴勒斯坦游击队注定要被力量占绝对优势的约旦军队消灭掉。因此在向法塔赫提供武器、弹药和调动驻扎在埃及前线的巴勒斯坦解放军3个团增援的同时,纳赛尔告诫阿拉法特,埃及不可能以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方式帮助他,并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帮助实现迅速停火。与此同时,他写信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请苏联尽一切力量向美国施加压力,不要让它进行干预。苏联的反应是谨慎的。不管苏联人私下向美国发出过什么样的警告,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明确告诫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不要参与约旦内战,以免使美国和以色列找到干预的借口。唯一的一次直接干涉是装备有叙利亚陆军坦克、可能还得到叙利亚的某些技术援助的巴勒斯坦小规模正规军——巴勒斯坦解放军——从叙利亚出发向北约旦发动的一次象征性短暂突击。驻在

约旦的伊拉克军队一直在袖手旁观。

由于相互威慑的作用,这场战争才没有发展到更大的规模。与此同时,正在开罗参加最高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试图调解这场冲突。激烈的战斗在约旦,特别是在安曼已持续了9天。安曼的居民区,其中包括游击队据守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约旦军队的大炮和装甲车的无情轰击。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竟受到本国军队的围攻和炮击,而且有报导说大街上布满了尚未掩埋的尸体,这种情景使阿拉伯舆论震惊不已。伤亡人数估计——最初有些夸大——在500人到2万人(显然是宣传数字)之间。后来公布的比较可靠的数字是死亡2000人。

9月26日,经过以苏丹总理尼迈里将军和突尼斯总理兰德汉姆为首的阿拉伯调解团的调解,双方同意停火。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双双飞往开罗,同聚集在那里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商解决办法。与此同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关押的最后一名人质也在安曼被无条件释放。不久,在西德和瑞士关押的哈立德等6人也获得了自由。

经过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巨大努力,新的也是最后的停火协议于9月27日在开罗签订。协议条款包括由阿拉伯各国派出一个军事监督团和政治观察员。巴勒斯坦游击队和约旦军队都将撤出城市和农村;巴勒斯坦游击队将其兵力集中在与以色列接壤的约旦河谷前沿阵地。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巴勒斯坦游击队领导人曾要求侯赛因国王离开约旦,以此作为和平条件。阿拉法特发誓,将来绝不可能与侯赛因国王合作,因为“鲜血流成的大海已把我们分隔开”。纳赛尔不得不利用他自己的威望、魅力和说服力把这两个人拉在一起制定出一项新的协议。长时期的谈判和情绪紧张把他折磨得精疲力尽。当朋友们在会谈期间敦促他休息时,据说他的回答是:“男人、妇女和儿童正在死去。我们是在和死亡竞争。”

9月28日,也就是这次最高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纳赛尔

在回家途中心脏病发作。3个小时之后,他在家中去世。

海卡尔曾经深情地描述了纳赛尔一生中最后的24小时、他与阿拉法特在开罗会议上交涉的经过以及他的病倒和去世。

据海卡尔说,9月27日下午召开的最后阶段会议充满了暴风雨般激烈的争吵。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首次一起出席了会议。海卡尔描述了纳赛尔抵达前希尔顿饭店会议厅里的紧张气氛。侯赛因国王和他率领的一些官员坐在会议厅的一角,阿拉法特坐在另一角,“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侯赛因国王和阿拉法特都随身携带着手枪。海卡尔半开玩笑地向在场的沙特阿拉伯国王建议“在会议开始前他应实施一个解除武装行动”。费萨尔回答说这是唯有纳赛尔才可以做的事。

两个半小时之后,会议暂时停止,同时开始尝试草拟一项协议。纳赛尔回到饭店11层他的套间里睡了两个小时。然后他接见了尼迈里将军和兰德汉姆总理,同意了他们准备的协议草案。正当他们讨论这项协议时,阿拉法特派人向他们通报了一个紧急情况:约旦军队正在加紧攻击安曼,目的是在当天夜晚控制住这座城市。纳赛尔请阿拉法特来商议这个情况并试图劝说他在全体会议重新开始前接受协议草案。阿拉法特带着怒气冲冲的失望情绪来了。他气愤地问纳赛尔:“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些人?我们正在这儿进行讨论,他们却在试图消灭我们。谈没有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或者是他们完蛋,或者是我们完蛋,听其自然吧。”

纳赛尔敦促阿拉法特控制住自己,要记住主要目的是尽快实现停火。纳赛尔提醒阿拉法特是他本人希望并请求停火的,因为“你在安曼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你的人已经被包围在伊尔比德”。阿拉法特也不能指望埃及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来帮助他。纳赛尔所能做的只是极力赢得时间增强游击队的抵抗力,以便实现一个合理的解决,并阻止约旦军队对游击队的抵抗“进行致命的打击,这种打击的后果将破坏阿拉伯战斗力量的团结一致”。纳赛尔含蓄地做出了抛弃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威胁,他告诫阿拉法特,他可以当即结

束这次会议，因为从他本人角度看，这次会议在政治上已取得了很多的收获。但是，纳赛尔做出结论，停火仍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因为这将为阿拉法特重新估计自己面临的形势和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队提供一个机会。

纳赛尔将劝说和施加压力、同情而又讲求现实揉和在一起，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当天晚上，停火协议被阿拉法特和最高级会议所接受。海卡尔会后晋见纳赛尔时表示了自己的惊讶。纳赛尔笑了笑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海卡尔阴郁地回答说这项协议并没有改变他在约旦发生内战时已表达的观点。“我仍然认为阿拉伯人的智力又回复到本能状态。我们的思想正化为灰烬，我们的情绪像一团烈火。我们仍然是部落人。我们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冷静。我们动不动就拔枪相对，然后又互相握手拥抱，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纳赛尔再次笑了笑说：“现在先别做这种哲学探讨……等明天有了时间你再尽情去思考这个问题吧。”

第二天，也就是9月28日下午1时，纳赛尔给《金字塔报》海卡尔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从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已是精疲力竭。他说去机场为科威特领导人送行后他要休息了。海卡尔建议他去亚历山大度假。纳赛尔回答说：“我太累了，现在还不能去。我要在这里先睡上一整天，然后再考虑去亚历山大。”

纳赛尔让海卡尔通过美国驻开罗外交使团团团长唐纳德·伯格斯捎给正在地中海和美国第6舰队访问的尼克松总统一个口信。这或许是纳赛尔一生中最后一次政治活动。这个口信为了告诉尼克松，纳赛尔仍在为按照安理会决议和平解决以色列问题而努力奋斗，但“他们在导弹问题上（指以色列和美国指责埃及非法向苏伊士运河停火区运进防空导弹一事）的叫嚣已超过了限度，而且不合逻辑”。纳赛尔告诉海卡尔：“我不认为他们能理解任何问题。然而我想把我们的立场阐释清楚——即便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罢——让他们做自己愿做的事去吧。”纳赛尔又说：“今天晚上我可能不再同你联系了，我要去睡觉了。”接下来海卡尔写道：“我发现自



已感情冲动地说了一句：‘晚安’。纳赛尔笑了：‘别忙，现在还是白天。’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在机场与科威特领导人道别时，纳赛尔忽然感到头晕目眩，接着就汗如雨下。他被送回家中并请来了医生。当海卡尔赶到总统官邸时，纳赛尔已快不行了。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医生们守在四周。阿里·萨布里、侯赛因·沙菲和安瓦尔·萨达特已先于海卡尔来到这里。萨达特口中吟诵着可兰经。穆罕默德·法齐将军悲痛万分地走进来时正听到一名医生在说：“一切都结束了。”法齐将军痛苦地说：“不，这不可能。他还得继续干下去。”在场的医生都哭了。泪如雨下……

当天晚上，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代表官方在广播中公布了纳赛尔去世的消息。萨达特已于1969年11月被任命为纳赛尔的代理人，按照宪法规定，他是纳赛尔法定的继承人。

消息传开后，埃及人涌上大街，发狂似地表示着他们的悲哀。男人们流着热泪，女人们掩面恸哭。人们一面在开罗大街上游行，一边哭喊着“纳赛尔没有死”。3天以后举行葬礼时，数百万埃及人从全国各地涌向开罗，堵塞了送葬队伍经过的街道。每一处高地，每一个楼顶，每一所阳台，每一座雕像和每一棵棕榈树上都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外国的政治家，其中包括代表官方出席葬礼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刚走出几步就不得不离开了送葬队伍。这是数百万受屈辱的埃及人向他们尊为“国父”的人道别的日子。

纳赛尔的死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忧虑，这说明他作为一个埃及领袖和阿拉伯领袖的地位已得到了承认，不管某些国家的承认来得多么迟。阿拉伯世界在此关键时刻显然失去了统一而又负责的领导。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埃及国内还是阿拉伯世界都担心伴随纳赛尔去世而来的将是一段时期的混乱，甚至可能发生冲突。在埃及，敌对的军人和平民组织之间，想恢复比较自由的议会制的自由派和要求实行南斯拉夫式政治统治的左翼激进分子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人们关注的中心集中在几位可能继任的竞争者

身上：副总统萨达特；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前副总统、现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并得到苏联人青睐的阿里·萨布里；1968年退休并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前副总统毛希丁；《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海卡尔和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但至少在最初阶段，人们强调的是稳定、连续性和符合宪法程序。集体领导取代了纳赛尔的个人统治。据说所有可能继任的竞争者曾在一起聚会，并同意通过内阁、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委会和国民议会的协商，制定出一套恰当的宪法程序。国民议会提名安瓦尔·萨达特为新任总统，经过1970年10月15日的全民投票表决，这一提名正式得到确认。萨达特发誓将全面继承纳赛尔的各项政策。他任命70岁高龄的马哈茂德·法齐博士为总理。法齐博士是埃及老资格的政治家、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外交家。他曾任外交部长，后来成为纳赛尔的主要外交事务顾问。这项任命以及法齐内阁成员的构成表明，埃及正在小心翼翼地寻求外部的和平，在国内可能还会寻求进一步的自由化。新政府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再次和以色列停火90天，并呼吁通过雅林博士重新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另一项行动是降低某些消费品和服务设施的价格。埃及政权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也因伊拉克和叙利亚政权受约旦内战的影响发生变化而得到了加强，这使得阿拉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更愿意和开罗合作。

显然，将来争夺埃及领导权的斗争很可能不是由某个个人决定，而是取决于某些集团和机构的竞争。自纳赛尔革命以来，这些相互竞争的势力——军队和“军人阶层”、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官僚阶层特别是控制着大部分社会化经济的经营和技术的官僚阶层——已经发展起来了。但也同样有理由展望，纳赛尔留给埃及的主要遗产之一将会被证明是一个扩大了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受过教育，能干而又负责任，有能力在比较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率而又稳定的政府。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纳赛尔时，我曾问道，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

就是什么。纳赛尔思考了一两分钟后说道,那是 1952 年的那场军事政变:虽然政变进行得很顺利,但它是长期准备的结果。如果没有这场政变,他就不可能做后来的那些事。革命的主要成就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了机会平等,使埃及社会各阶层彼此更为相近。尽管埃及仍然非常贫穷,但“我的司机的儿子能上大学,而我的女儿则入不了大学之门,因为她的考分不够。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女儿送到这里的美国大学。有人认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或 1961 年的国有化是主要的成就,实际上它们只是实现机会平等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

阿拉伯世界及它的统一和发展的前景如何?纳赛尔回答说,这场战争及其后果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目前还难以预料的影响。“年轻人将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力量。教育正在普及到全国各地,这将改变形势……可能会出现飞跃,也可能进行一场对话,没人知道。”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